

Criminal Profiling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vidence Analysis



犯罪心理画像

——行为证据分析入门

[美] 布伦特·E. 特维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犯罪心理画像

——行为证据分析入门

著 者：〔美〕布伦特·E.特维

翻 译：李玫瑾 屈 明 庄东哲

于 阳 刘 杰 王子涵

初 审：崔岩峙

总审校：李玫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4-135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犯罪心理画像/[美]特维著；李玫瑾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4

ISBN 7-81109-061-9

I. 犯... II. ①特... ②李... III. 犯罪心理学 IV. D9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4057 号

原 书 名：Criminal Profiling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vidence Analysis

书 名：犯罪心理画像——行为证据分析入门

著 者：[美] 布伦特·E. 特维

译 者：李玫瑾等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10003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版 次：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4 月第 1 次

印 张：44.75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709 千字

印 数：0001 ~ 3000 册

ISBN 7-81109-061-9/D·056

定 价：88.00 元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010) 839032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E-mail: cpep@public.bta.net.cn

www.jgclub.com.cn

目 录

译者的话	(1)
为中文版的序言	Brent E. Turvey (1)
英文作者介绍	(1)
第一版序	Dr. Richard Saferstein (1)
第二版序	Dr. John Thornton (1)
第一版前言：犯罪心理画像的专业化	Brent E. Turvey, M. S. (1)
第二版前言：新千年中的刑事侦查	Brent E. Turvey, M. S. (1)
答谢声明	(1)
第 1 章 犯罪心理画像的历史	Brent E. Turvey, M. S. (1)
第 2 章 归纳性犯罪心理画像	Brent E. Turvey, M. S. (24)
第 3 章 演绎性犯罪心理画像	Brent E. Turvey, M. S. (37)
第 4 章 案件评估	Brent E. Turvey, M. S. (55)
第 5 章 犯罪再现简介	W. Jerry Chisum, B. S. (81)
第 6 章 证据动态变化 W. Jerry Chisum, B. S. and Brent E. Turvey, M. S. (95)	
第 7 章 分析伤害形态	Brent E. Turvey, M. S. (112)
第 8 章 被害人研究	Brent E. Turvey, M. S. (134)
第 9 章 死因心理剖析	Dana S. La Fon, Psy. D. (156)
第 10 章 虚假报案 John J. Baeza (ret.) and Brent E. Turvey, M. S. (168)	
第 11 章 犯罪现场特征	Brent E. Turvey, M. S. (187)
第 12 章 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错误的二分法 Brent E. Turvey, M. S. (218)	

第 13 章	理解犯罪惯技	Brent E. Turvey, M. S. (230)
第 14 章	伪造犯罪现场	Brent E. Turvey, M. S. (250)
第 15 章	识别犯罪人标记	Brent E. Turvey, M. S. (283)
第 16 章	犯罪动机	Brent E. Turvey, M. S. (311)
第 17 章	犯罪人特征	Brent E. Turvey, M. S. (342)
第 18 章	法庭上的犯罪心理画像	Brent E. Turvey, M. S. (364)
第 19 章	纵火和爆炸——行为表现	Brent E. Turvey, M. S. (398)
第 20 章	心理变态行为	Brent E. Turvey, M. S. (418)
第 21 章	施虐狂行为	Det. John J. Baeza (ret.) and Brent E. Turvey, M. S. (436)
第 22 章	弑亲案件	Brent E. Turvey M. S. (468)
第 23 章	性窒息	Michael Mcgrath, M. D. and Brent E. Turvey, M. S. (489)
第 24 章	追踪骚扰	Wayne Petherick (507)
第 25 章	系列杀人	Brent E. Turvey, M. S. (521)
第 26 章	系列强奸	Brent E. Turvey, M. S. (538)
第 27 章	网络模式：因特网上的犯罪行为 ...	Eoghan Casey, M. A. (556)
第 28 章	道德规范与犯罪心理画像专家 ...	Brent E. Turvey, M. S. (584)
附录一		
行为画像协会：行为画像的指导方针		(600)
附录二		
就山姆·斯皮尔德状况诉俄亥俄州：案号. 312322		(608)
附录三		
初始评估：威斯康星州诉约翰·麦勒尼（桑多拉·麦勒尼死因疑点）		(625)
附录四		
初始评估：昆士兰州诉格雷厄姆案（利恩·霍兰德的被谋杀案） ...		(645)

附录五

初始评估：伊利诺伊州诉杰尔拉德·西蒙斯案 (666)

附录六

并案分析：在加利福尼亚州诉韦恩·安德姆·福德案 (675)

译者的话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们一直认为“变态杀人狂”只存在于西方世界。可是近几年，人们突然发现他们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杨新海先后跨 4 省，制造灭门案件 22 起，杀害 67 人，每一处现场几乎都很少留下物证；黄勇在家中自制怪异的杀人工具，以网络游戏诱骗杀害 17 名花季中学生；北京有一名出租车司机，在半年多时间里杀害 5 名卖淫女并残忍碎尸，碎尸后还生吃器官，其心态的怪异令人无法理解……诸如此类的案件，不仅动机怪异、行为诡秘，而且犯罪人的反侦查意识也随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而明显增强。这些都为刑事侦查和犯罪预防提出了新的难题——怎样理解犯罪人的心理问题？怎样在越来越难获得物证的背景下进行犯罪侦查？打击犯罪？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也与我们今天的情形相似，当每年面临约 30 多起心理怪异的系列杀人案件，而被害人高达 5000 人时，联邦调查局的一些警官们认为，在侦查过程中，要与犯罪人打交道，就应该研究犯罪人的行为规律和心理规律。于是他们申请了一个项目，有计划地、系统地对在押犯人的心理和行为问题进行调查。他们进入关押和矫正罪犯的机构中去访谈那些罪犯，了解他们的成长背景、犯罪本身、犯罪现场和受害人，从中发现和掌握了大量的犯罪人心理、行为和生活背景的规律。在这项研究中，他们还使用了许多司法机构提供的大量资料，如警察的勘查报告、讯问记录、精神鉴定的结果、犯罪人的前科记录、法庭记录等。在这一调研基础上，他们形成了一种新的侦查思路与方法，即通过犯罪现场

对犯罪人的行为进行分析，然后推断作案人的心理特点，再通过心理特点的描述刻画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形象特点、家庭背景和一些个性特征，从而形成一个“犯罪人的心理画像”。

笔者自 1982 年就开始从事犯罪心理的教学与研究。由于犯罪心理学在中国属于一门较新的学科，因此，笔者一直在探索如何将这一研究应用于实践需要。在 1992 年至 1993 年期间，笔者曾到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四方公安分局工作。在基层期间，对于刑侦与预审工作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并认识到犯罪心理的研究在分析带有变态特点或动机怪异的案件上具有独特性。后来，在我们大学的外文图书资料室查阅国外相关资料时，读到了美国学者对犯罪心理画像的研究著作而深受启发，于是开始系统地开展这一研究。

1999 年，笔者去美国访问时曾想接触并了解美国联邦调查局 1978 年建立的行为科学部。但由于来去匆忙未能实现。回国后，经过我国公安部第一位派驻在美国的缉毒联络官孔宪明的帮忙，与退休的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官员，也是最早从事系列杀人案调查与心理画像研究的雷斯勒有过联系与接触。后来，又通过互联网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并由此结识了布伦特·E. 特维（Brent E. Turvey），即本书的作者。

2002 年，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外事办的帮助下，我们成功地邀请了特维来华讲学。特维在中转 3 次飞机、经过 20 多个小时的飞行，于临近午夜的时间到达北京后，第二天早晨就精神饱满地出现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讲堂上，开始他首次来中国的第一堂课。后来，他又到武汉、杭州、上海等地为中国的刑警们讲授他的研究，即“行为证据分析法”。这是继美国联邦调查局早期研究提出的“犯罪两分法”、道格拉斯（John Douglas）提出的“犯罪现场惯技一标记分析法”、肯特（David Canter）提出的“犯罪环境一空间分析法”之后，又一影响较大的犯罪心理画像分析的方法。

由于时间有限和语言的转译，现场的讲授往往留有许多的遗憾！但是，中国之行和中国的警察给特维及他的同伴麦格拉·迈克尔（Michael McGrath）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回忆。特维很高兴地将他的专业著作送给我这位中国同行。当我提出想将他的著作译成中文版时，他爽快地答应了，并帮助我们联系他的出版社，让出版社给我们在中国出版该书时以最好的优待。

我之所以希望翻译特维的著作，是因为国内相关的研究较为薄弱，通过这种翻译介绍，一是我们可以较系统地了解美国这一研究的发展过程和最新的研究状况。二是可以与我们的工作和研究进行比较，由此找出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我希望此书的翻译出版能为中国的犯罪心理研究以及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提供参考，同时也为相关的教学和研究提供帮助。

本书的内容共有28章，分别介绍了犯罪心理画像的历史，犯罪心理画像的基本方法，还有如何从犯罪现场、证据、伤害形态、被害人、犯罪行为、犯罪动机、犯罪人特征等角度进行犯罪心理画像。此外，本书还介绍了对一些常见案件类型如杀人、强奸、变态犯罪和网络犯罪的心理画像研究。在本书中，作者还专设一章用于论述“心理画像作为一门职业”所需要的严谨态度和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作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审慎和严肃的态度。

在翻译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特维明确阐述的观点，“犯罪心理画像不是科学……犯罪心理画像是一种经过专业训练后进行的推断或推测……犯罪心理画像者提出的意见并不是科学的结论。但是，这并不妨碍犯罪心理画像工作者参与刑事司法与法庭辩论的理由，因为他们的意见并不是一种法庭的判决”（见原作附录二）。这段话非常客观并严谨地揭示了犯罪心理画像的本质。在一种较新的研究和应用手段面前，我们既不要不屑一顾、简单地斥责其不完

善而拒绝，也不要将其视为一种全新的、具有神通性的东西而盲目接受。事实上，在多样化的社会里，犯罪手段的多样化就决定了我们在打击犯罪过程中也要学习、研究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手段，了解各种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就是我翻译介绍这本著作的主要目的。

今天，当此书与中国朋友见面的同时，还需要感谢一位令我敬重的老师——崔岩峙。崔先生是中国刑事技术学会刘文会长介绍我认识的。他在刑事侦查方面的英语水平造诣极深。在特维访华期间，年事已高的崔老师冒着8月的酷暑一直承担着特维讲课的口头翻译工作，后来又为本书的主要章节进行过翻译指导。此外，参加本书翻译的人员都是我的研究生，他们是屈明（目前在公安部工作）、庄东哲（目前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工作）、于阳（目前在公安部工作）、刘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读研究生），他们先后为此书的翻译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最后，此书得以顺利出版还因为得到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李玫瑾

2004年12月

为中文版的序言

Brent E. Turvey

只有当你了解问题的全过程，你才会知道怎样解决它，结论出现在调查研究之后，而不是之前。

——毛泽东

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我们既面临着必须紧紧抓住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必须认真应对的严峻挑战。尽管当今世界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 2004 年年会发表演讲

在 2002 年，我荣幸地受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女士的邀请来中国讲学，在此期间，我先后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市公安局、武汉市公安局、杭州市公安局和上海市公安局讲学。作为第一次来中国的客人，我几乎天天晚上都要走上这些城市的街头，就像在家门口一样尽情地游览，目不暇接。中国真的很安全，感觉非常好！

作为一个西方人走在街上我非常显眼，但过往行人对我非常尊重并友好，没有人警惕地盯住我，也没有人对我窃窃私语，尽管我不能讲他们的语言，但当我有问题需要他们帮助时，他们都会友好并善意地回应我，帮助我。我还记得，最初与我的中国朋友共同进餐或外出时几乎离不开翻译，但到后来，我们彼此的交流似乎有着人类间的心领神会，语言似乎已没有障碍，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中国朋友对我们整个访问过程的细心安排和周到的照顾。

通过接待我的中国朋友和我自己的观察，我更多地了解并熟悉了中国的文化，也从中了解了他们所面临的犯罪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似乎与其他国家不同。那时的中国人极少关心文化、个人和技术等问题，更多地关注彼此的争斗。由于个人之间冲突颇多，普通人往往互相监督制约，个人隐私必须让位于社会要求。个人的流动也受到限制，居委会或村委会控制着每个人的生活，包括私人的、社交的和政治的生活。与此同时，这种社会控制也有利于对犯罪的控制。使人容易知道曾经犯过罪的人住在哪儿、在干什么，还知道这些人不许乱走乱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那样闭关自守，而是越来越开放，社会利益仍然很重要，个人隐私也开始受到尊重。主动谋求发展不再受到限制反而受到鼓励。经济改革也触及并改变某些重要管理部门的状况，他们积极寻找国外的投资，改革者的态度和积极做法使得中国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中国人已经逐渐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生活安排，转向更为积极的生活、工作、流动、追求物质满足和有效的技术追求。

作为这种积极的改革开放的结果，人们不再被严厉地限制行动，他们可以在不同省份之间自由流动，寻找更好的工作或生活方式。这种流动，使人们可以彼此以匿名的方式相处，从而也使得相互监督的能力下降。一些人为了追求自私的享受而选择各种形式的犯罪。对老人而言，现在出现了许多过去很少见的犯罪类型。

今天的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新型建筑物，许多大城市都盖起了摩天高楼，他们在为迎接2008年的奥运会做着准备。同时，全国上下都加快了现代化的建设步伐，这也使得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越来越多的西方商人、旅游者和外币进入中国，同时，西方式的犯罪，甚至西方的犯罪人也随之而来。

我认为，中国可能要为“现代化”的到来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有的已经出现，最严重的恐怕尚未出现。人员的匿名化倾向、信息的无限制获取、自由地出入境、高新技术广泛地应用都改变着中国的犯罪形式，过去不过是在邻里之间进行盗窃犯罪，现在则可出现类似于美国的对陌生人系列强奸的犯罪，随之而来的是，恐怖的系列杀人犯罪也会出现。

在2001年，中国的武汉就曾发生过专门用刀捅穿红衣服的女性的系列杀

手，先后有13位女性受害。3个月后，一位29岁、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被逮捕。在2003年，先后有3名系列杀手被逮捕。根据警方发言人所述（2003）：

在最近的10个月里，深圳、广东警方宣称逮捕了马勇和他的女同谋段智群，这二人自2003年5月先后杀害了12名在当地职业介绍所寻找工作的女子，并劫取了她们的私有物品。

系列杀人犯杨新海也在这一年的11月3日被河北省沧州市警方抓获，据其供述，自2000年起他先后杀害67人，然后进行抢劫和强奸。杨新海曾因偷窃与强奸先后两次被劳动教养。

在同年的12月份，河南省平舆县的警方抓获了系列杀人犯黄勇，据其供述，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先后杀害17名青少年。警察介绍说，因为他看了恐怖的暴力片，于是就想做一名“杀手”。自2001年9月以来，一直持续犯罪，直到案件被揭露前，一名学生从黄勇家中逃出报告给警方，此案才被发现。

显然，系列杀手并不只产生于北美的文化背景下，在北美，人们一直认为，暴力的系列杀人犯罪是从欧洲传入的。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媒体一直在炒作一起变态杀人碎尸案，作案人是杰克。这一案件在当时几乎成为通俗文化的主题，传播渲染与现实生活中的暴力犯罪相互影响着。在美国，通俗文化也时兴编写有关系列强奸和系列杀人的故事，编写相关的书籍，同一题材的电视片和电影也在泛滥，人们由某一案例进而想像着或杜撰着各种各样的变态杀人故事，由此导致现实生活中的同类案件增多。因此，中国在开放和现代化的背景下，也将会出现这一切情况。

这意味着，在中国的法制改革进程中需要给公民提供更多的自由度，那么，关于暴力犯罪的所有信息也要公之于众。这一方面是告知或警示公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得到公众的支持，得到破案的信息。然而，有时刑事侦查中的重要信息和技术手段也会被同时曝光或被犯罪嫌疑人所掌握。因此，信息共享与媒体管理也极为关键。

这本著作被我的朋友和同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教授主持翻译成中文出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它表明：蔓延的暴力犯罪也是一种跨文化现象，因此，可以在侦查方法、行为分析、案件串并和案件侦破等问题上具有共同的方法和手段。我希望这本书也能为中国的司法工作者提供参考，用于对付那些不断以新的表现方式出现的暴力犯罪。

我们共同期待着共同合作，共享信息，在致力于刑事科学研究、发现事实真相的专业同行之间建立彼此的联系，为公众的安全和司法的公正服务。这是我们共同的希望、共同的信念。同时，这也是此书的价值所在。



英文作者介绍

巴赞·J. 约翰 (John J. Baeza), 侦探 (记者)

巴赞·J. 约翰的执法生涯是从纽约州的一名矫正官开始的, 当时他在 sing - sing 和 Otisville 的看守所工作。他至今已为纽约市警察局工作了 11 年半。他真正成为一名警察是从哈林 (纽约市的黑人住宅区) 第 32 区的巡警开始的。接着他被派到曼哈顿上城缉毒处作了 3 年的侦探, 在此期间提升为探长。从 1994 年到 2000 年, 他被派到曼哈顿特别受害人小组, 在那里, 他负责进行性犯罪和虐待儿童案件的研究。

凯西·伊奥根 (Eoghan Casey), 文学硕士

凯西·伊奥根目前是知识解决公司的一位合伙人, 全职的教师和教育技术发展者。在他的课上, 他教给人们如何研究计算机和网络犯罪, 以及怎样将因特网作为一种研究工具进行使用。在知识解决公司, 他负责对涉及计算机、网络 and 因特网的犯罪案件进行研究。

凯西·伊奥根从纽约大学获得教育交流和技巧方面的文科硕士学位。在纽约大学, 他运用认知科学的理论对犯罪心理画像和电脑犯罪进行了创新的研究和发展, 这些研究目前已用于本公司提供的相关课程教学中。

同时, 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 (Berkeley) 校区取得机械工程学的理科学士学位。在 Berkeley 学习期间, 他致力于机械系统的电脑实时控制 (监控) 的研究。他曾经当过网络管理员、卫星操控员和微软程序设计员, 拥有因特网及其操作方面的广泛知识。

他写过多篇关于数字证据和计算机犯罪方面的文章, 如现在在做教材的《数字证据》(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读者可以通过“知识解决公司”的网址了解到关于他的更多信息:

<http://www.corpus-delicti.com>

奇热姆·杰瑞·威廉。(William Jerry Chisum)，理科学士

奇热姆·杰瑞·威廉自 1960 年一直是名犯罪学家。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Berkeley 校区跟随 Paul Kick 学习，并取得了化学学士学位。后来，他曾在 San Bernardino 工作，不久在加利福尼亚的贝克斯菲尔德 (Bakersfield) 建立了肯郡实验室 (Kern County Laboratory)。在为加利福尼亚司法部门工作期间，他曾暂停在斯坦福 (Stanford) 研究所的工作 (1971 年~1973 年)。在他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担任肯郡实验室里的管理和领导职务。

他曾 3 次当选为加利福尼亚犯罪学家协会的主席。他也曾担任过美国犯罪实验室学会主席和斯坦尼斯洛斯郡 (Stanislaus) 和平官员协会的主席。在为加利福尼亚司法部工作了 30 年以后，他于 1998 年 10 月退休，作为私人顾问工作至今。

他是行为画像学术协会的创始成员，现任该学会副主席。读者可以通过以下网址了解到关于他的更多信息：

<http://www.ncit.com>

拉丰·S. 达纳 (Dana S. La Fon)，博士

拉丰博士在 Loyola 学院的 Mary Land 校区获得了她的心理学博士学位。她加入美国海军犯罪人研究服务中心后开始从事案件的心理分析工作。从那时起至今一直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经常有专业性的文章发表。拉丰博士曾经是 Johns Hopkins 大学的一名研究员。如今她除了为 MaryLand 看守所工作外，还用司法心理学的知识为法庭做鉴定工作。她既是危急事件应激任务组成员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Team)，同时也是巴尔的摩 (Baltimore) 市警察局人质谈判队的成员 (the Hostage Negotiation Team)。她的联络方式是：

Dr. Dana S. La Fo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Loyola College in Maryland, North Charles street, 4501, Baltimore, Maryland, 21210-2699。

麦格拉·迈克尔 (Michael Mcgrath)，医学博士

麦格拉·迈克尔是一名被纽约州颁发许可证的正式法医精神病学家。他在从事医药和牙科医术研究的 Rochester 学校担任临床精神病学助教 (书中所

述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校方无关）。他是行为画像学术协会的创始成员，现任该学会主席。

读者可以给他发邮件：

mmcgrath@profiling.org

佩瑟里克·韦恩（Wayne A. Petherick），社会学学士（心理学）、犯罪学硕士

佩瑟里克·韦恩在 Bond 大学先后取得了社会学理科学士（心理学方向）和犯罪学硕士学位。现在，他在建于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 Bond 大学犯罪学系工作，同时是 Bond 大学犯罪学咨询会的成员。

读者可以通过法庭犯罪服务的网站获得与他有关的更多信息：

<http://www.forensic-crim.com>

也可以给他发邮件：

wptherick@profiling.org

布伦特·E. 特维（Brent E. Turvey），理科硕士

布伦特·E. 特维是一个私家的法庭科学家和犯罪心理画像学家。作为知识解决公司的全职人员，他负责教授犯罪心理画像、系列强奸和系列杀人方面的课程。作为 Bond 大学澳大利亚黄金海岸校区的犯罪学系的副讲师，他每年都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国外讲学，并同时在他们的犯罪学咨询会工作。作为一名法庭科学家和犯罪心理画像专家，他与执法部门以及全球的律师事务所都有案件上的来往和联系。他对强奸和凶杀案件的凶手作案习惯有丰富的经验，可谓这方面的专家。

布伦特从 1990 年着手对暴力犯罪和故意犯罪的行为特点进行研究。他拥有历史专业的理科学士学位和心理学学士学位。在他读研究生期间，通过所作的研究和对被关押犯人的采访，他渐受启发，将犯罪心理画像、心理学理论和法庭科学联系起来，从而更好地对系列犯罪案件进行研究。

布伦特同时拥有 New Haven 大学的法庭科学硕士学位。在 West Haven 学习期间，他潜心在上述领域内进行深入的研究。他常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高校开设讲座，也经常应邀前往参加多个领域及执法机关举行的专业讲座。

他是行为画像学会的创始成员之一，现任学会秘书长。读者可以通过“知识解决公司”的网站得到关于他的更多信息：

<http://www.corpus-delicti.com>

或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与他联系，他的邮箱地址是：

bturvey@profiling.org



第一版序

Dr. Richard Saferstein

《犯罪心理画像——行为证据分析入门》是第一本或最早的专用于指导同一题目而编写的书。影片《沉默的羔羊》使犯罪心理画像专家这一角色深入人心；电视广播等媒体的讨论又进一步扩大了它的知名度，以至于它现在已作为犯罪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对于像我这样的法庭科学家而言，犯罪心理画像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这仅仅是追赶时髦的科学家们寻求社会认同的另一个努力？或者说犯罪心理画像真的是犯罪侦查过程中的一个附属部分？如同许多新的努力一样，答案最初并不十分清楚。不管侦查信息能否在互联网上找到，提供心理画像服务更多的是个人的力量或人格号召力。不管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心理画像的专业原则和程序得以发展。

犯罪心理画像以充分的事实证明这一技术正成为犯罪侦查中一个合法的辅助手段。然而，本书的作者却一再告诫我们，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离不开犯罪调查中各种力量的共同协作。物证是经由自然科学分析证明的证据。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对这样的物证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是完全必要的。我十分高兴地发现参与本书写作的作者对这种必要性予以高度的重视。同样令人欣喜的是，作者关于犯罪现场再现得出的有价值的分析结果也被高度重视。尽管这样的努力使犯罪心理画像的主观臆断的可能性得以有效地减少和降低，书中依然不忘时时提醒读者，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完全可以成为一门艺术，一门依赖于犯罪心理画像专家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的艺术。

在布伦特·E. 特维以及其他专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正逐步成为一门系统化的、适宜教学的科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读者们读完此书后，就可以迅速成为一名犯罪心理画像专家了。对于一名成功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而言，长年累月的实际工作的经验积累是必不可少的。然而，

犯罪心理画像作为合法职业的一种，必然要有坚实而广为接受的学术基础，《犯罪心理画像》一节就是适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

《犯罪心理画像》作为一项严肃而被期待已久的著作，在学科知识的整体性和内在聚合性上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布伦特·E. 特维为读者提供了理解犯罪心理画像所蕴涵原理进行探寻的路标。对于将来及现在从事犯罪侦查的人员来说，他们可以通过阅读这本书增强其基础性的能力。

第二版序

Dr. John Thornton

有的时候真需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会相信我们自认为已知道的东西？我们确信或者认为，心理的能量能够驱使着人们互相伤害或残杀，这是如何研究的？我们为什么能知道这一切？认识论告诉我们，涉及所有行为的动机都是能够分类的，根据生物动力、社会动力、神明动力和心理动力进行分类（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似乎可以用来证明这点）。如果某个人实施犯罪的部分原因是他自身特定的心理动力结果，那么，不管他们是多么难以交往，或者是多么让人恨之入骨，努力理解他们的动机和理由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我们用常人的逻辑，以及自儿时所学到的知识去判断，犯罪行为看上去似乎是难以理解的；然而，如果我们能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往往便能迎刃而解。在侦查过程中，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会使我们的工作更有效地进行下去。

我们一般认为，有七类传统的行为动机能够导致的犯罪活动：金钱、性欲、嫉妒、恐惧、愤怒、仇恨以及偏见。这其中有四类并不是毫无道理的，与七大原罪中的四类相吻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对金钱、嫉妒和（传统意义上的）性欲非常熟悉，尽管我们声称对这些东西已经完全了解固然有妄自尊大之嫌，但至少我们已经发现，这些动机或多或少可以理解。然而，几乎没有人能明显地分辨出失控的仇恨、恐惧与愤怒之间的区别，本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布伦特·E. 特维（Brent E. Turvey）和他的撰稿人将告诉我们，一门正在迅速成为成熟并严谨的科学学科的逻辑基础。

这本书将使我们了解我们社会文化中的黑暗面。本书比第一版更为完善，因为它更加系统地将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建立在坚固的科学基础之上。本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前提条件是，在发表见解之前，考虑到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复杂性，犯罪必须首先被当成一个主题进行完整的阐述与分析。对于犯

罪现场，在我们试图弄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之前，我们应当首先弄清楚“它是什么”。这也就强调了证据动态研究、分析伤害形态、犯罪现场再现的重要性。关于这些，本书的作者们也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并且客观、公正的描述。不论是连环杀手还是性暴力犯罪人；不论是真的变态还是仅仅因为品质恶劣，所预谋并实施系列的耸人听闻的罪恶行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真实存在的舞台，在那里，通过犯罪嫌疑人做过的事情、接触过的东西、带走的东西、留下的东西，其被夸张的性格特征以及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特征都得以彰显。犯罪心理画像并非是一种基于主观印象的臆测，而是将多种材料细心编织而成的一幅备受瞩目的美妙“挂毯”。所有那些从事于此领域工作或单纯抱有浓厚兴趣的读者都会从本书中获益。

第一版前言：犯罪心理画像的专业化

Brent E. Turvey, M. S.

为自己的发明洋洋得意是人的天然弱点。

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乌托邦》

犯罪心理画像，正如本书中介绍的那样，是一项融合了多学科知识的刑事事实。这些知识至少包括犯罪侦查学、对死因鉴定的法医学和心理学。然而，即使今天让我在这里给犯罪心理画像下一个定义，我也不敢说它已达到“专业化”的高度。

任何一个专业都必须具备系统化、专业标准和界定，并建立一套标准化的程序和必要的规范，使之能与其他专业保持一致。这就要求同一专业必须拥有统一的专业术语和定义、道德标准和准则、实践与方法。然而，上述各项似乎并不适于形容长期以来各自为政地从事犯罪心理画像工作队伍的实际情况。

这一点对于大众甚至对于一些执法机构都是出乎意料的。这种状况背后有其自身的原因。事实是许多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不认为犯罪心理画像、其形式或方式能够被专业化。

造成犯罪心理画像领域缺乏专业化兴趣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点可能是，从事犯罪心理画像实践者极少愿意放弃自己独特的标志，而建立一个无派别的作为资格认定的专业机制，或形成这样一个专业化机制，在这一机制中能够按照统一标准授予权威资格，然而，专家们似乎对任何事件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另外，现实工作中也存在部分原因。首先，画像工作者们出于对信息的敏感性和机密性的考虑，不希望将他们办的案子公之于众（这是大部分司法

类科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但仍可以通过改编案情的方式解决，使之简易为适于教学的内容)。其次，国家或联邦的许多机构，或通过制定政策，或通过政治恐吓的手段阻止民间组织与之共享此类信息。最后，目前尚不存在具备统一的道德标准和准则以及实际操作的、无派别差异的犯罪心理画像专业性机构。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没有多少机构为犯罪心理画像专家们提供公开的专业演讲和信息共享的机会，因此，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和服务机构的原因，他们被剥夺了这些权利。

还有其他的因素，有些犯罪心理画像专家认为，为这一领域建立标准和规定无异于为其创造性的思维制造障碍。他们的共同抵制也是影响犯罪心理画像专业化发展的一个因素。更有人主张，相对于一门学科，犯罪心理画像更应保持其艺术的特质，不应使其走专业化的道路。那样做只会使拥有这方面天资的人丧失其独创力并熄灭其智慧的火花。

这种观点十分有趣，甚至也很迷人。但是，我认为，仍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果人们对其专业化的发展抱有深切的渴望，那么这些种种困难都是可以一一克服的。

或许在犯罪心理画像领域造成这种对其专业化强烈抵制的最大的原因是自我观念。犯罪心理画像领域的形形色色的工作者们，以个人的名义也好，代表某个机构或国家机关的也罢（包括笔者本人在内），对于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所应研究的对象、合格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所应具备的素质至今未能达成共识。每一个人都是首先把自己摆在犯罪心理画像技术领域不可或缺的位置上，并且总是不情愿根据需要对自己的目前具备的知识水平、得到的训练和已具备的能力作出调整。不幸的是，目前此领域的工作者们（或是自称为犯罪心理画像专家的那些人）几乎不具备实际案例分析的经验，所受到的训练也并不充分，而是在本应作出贡献的专业圈子里徘徊着。

或许自我观念所带来的最令人不安的问题在于，一些犯罪心理画像工作者自认为，单凭他们一个人的力量，单凭他们那主观性极强的个人见解（这其中的大部分知识与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实际要求相去甚远）就足以完成这一工作。这样的行为模式完全否定了在个体经验和影响力之外也许还存在着更为充分有力和合理方式的可能。这样的行为模式也鼓励了那种自认为犯罪心理画像专家生来具有否定其他人的观点、具有天赋直觉、可以不通过相关人

员或机构“跳出事外”而寻找答案的荒谬说法。

在犯罪心理画像领域，这种以自我观念为基础而产生的不同意见时而表现为彬彬有礼，时而表现为善战好斗，时而又恶意中伤。它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机构以及不同的学术研究领域、心理健康和执法团体都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其影响深远的连带反应是，从事实际工作的犯罪心理画像工作者无法正确处理专业与专业之间、人与人之间或者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分歧，并有效地与同行交流。对于有能力的人而言，由于他们的自我观念，或是他们自恃太高，在工作中几乎很难彼此表现出应有的欣赏和尊重；对于能力低的人而言，考虑更多的是自己若被人嘲笑的恐惧，因而出于自我保护，很少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方法，或者干脆表现得含混不清。

由于上述各种原因阻碍其专业化的进程，下列问题依然是犯罪心理画像界尚未解决的焦点：

1. 用于本题目教学的必需品。
2. 犯罪心理画像的专业术语和定义的恰当用法。
3. 当心理画像被认为是“画像”时所必须包含的、公认的基本信息。
4. 心理画像的应用和可验证的方法是否充分。
5. 在侦查与审判中使用犯罪心理画像是否有约束的协定。
6. 关于胜任者标准资格的协定。
7. 关于道德与非道德行为标准的协定。
8. 心理画像过程是否应该有被复核的协定。

如果不强调上述的基本考虑将会导致犯罪心理画像领域的更大混乱，甚至还会导致公众对此的极大困惑。此外，与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和实践有关的传闻和神话正通过大众传媒肆意蔓延着。街上的巡警、犯罪现场的侦探、实验室中的刑事技术专家、审判时的律师以及法官席中的大法官，他们的脑袋里就装满了关于这些问题的误解。同时，这种混乱也为那些根本不合格却想从事犯罪心理画像而可能造成危险结果的个体大开了方便之门。

由此，我萌生了聚集所有资深的专家合力编写此书的念头。我一直坚信，犯罪心理画像在现实中必须专业化，必须更加科学，必须从众多学科角度进行研究。当犯罪心理画像被作为一门刑事科学所接受，那么，它作为刑事侦查和司法活动的一部分也就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心理画像者的资格标准和实践要求以及有效的方法。我们还有责任改变对那些含混不清的参考文献和主观的个人经验的信赖状况，并且有责任用一致的方法来说明我们的方法。

这种职责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司法学科中，我们的观点和解释的影响力已非同小可，人们会因此丧失自由，甚至有可能被剥夺生命。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迄今为止，法庭已开始大量采信犯罪心理画像专家的意见（若前后矛盾将会影响到他们的审问，特别是当他们与执法部门交往时）。然而由于某些人不具有胜任的资格或缺乏专业化的知识，他们将会滥用这一权力。虽然犯罪心理画像在一定意义上讲已经存在了 100 多年了（甚至更久），我们至今却仍未找到更加切实可行的方法，所进行的仍无法被称之为科学有效的调查研究，并且，对于我们具体观点的正确性还并未做到每时每刻把握十足。

于是这本书应运而生。本书试图建立一个参考课本用于犯罪心理画像演绎方法的应用。它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建立和完善与之相关的专业术语和专业核心观念的同时，能十分清晰和形象地对这种方法加以介绍。此外，另一个目标是，建立刑事物证、行为证据和犯罪心理画像之间联系的牢固基础。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也希望借助此书，能有效地破除种种在各种文学、影视作品中宣扬夸大已久的、已深入人心的错误观点。

书中主要围绕两个核心观念展开：首先，犯罪心理画像工作者只要抱着谨慎和质疑的态度就不会出现大的危害。其次，一个犯罪心理画像工作者必须首先对事实负责，而绝非向某一个组织或机构负责。

各自为政和派系各异的时代已经结束。政治第一的时代也已经结束。犯罪心理画像工作者不能继续扮演电影作品所描绘的形象，而应该力求达到专业化的水准，保持专业的完整性。犯罪心理画像学界应该开始加强交流，并在资格标准、实践行为、专业术语和实施方法等方面取得一致。如果这项技术不想在 21 世纪消失的话，就必须改变过去单纯建立在主观性极强的专家意见之上的信任，而走上更为科学、更为专业的道路。

由于我们没有及早认识到这一点，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大了。

第二版前言：新千年中的 刑事侦查

Brent E. Turvey, M. S.

侦查人员的工作有时在进行一半时还毫无进展；有时他们能破获难解之谜并出色地完成工作，这意味着成功；还有时辛苦一番却毫无所获。

汉斯·格罗斯（Hans Gross）：《刑事侦查》（1924，p.3）

犯罪心理画像是调查和勘查犯罪行为的过程，其目的是为识别犯罪嫌疑人类别提供帮助。^①它是刑事侦查的一种补充，或者说是刑事侦查的一种方法。因此，一名好的侦查员更像一名犯罪心理画像者。多年以来，观点不同和需求迥异的人们试图提出种种看法来探讨犯罪心理画像和刑事侦查究竟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还是别的关系。这些观点有浪漫型的假设，也有学术型的研究，甚至有人认为犯罪心理画像与刑事侦查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这反映了我们人类的本性——要么夸大，要么贬损，或者为了迎合自己的结论而在某种程度上修改证据。这一点已经在格罗斯的开场白中直率地谈到了（1924），他认为：

我们乐于发现一些根本不存在的虚构的事物，而且我们描述怪物和恐怖之事比谈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更加津津乐道。这一点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虽然程度上有所差别，但却真实地存在着。大量的证据，比如我们经常读的书报、最乐意听到的消息、传播最快的新闻，都证明了大多数人天生就有一种夸大的倾向。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恶行，我们经常用夸张的手法来美化我们周围的事物，如果没有了夸张，我们就将缺少美妙和诗意的意境。但是，刑事专家必须以最饱满的热情和最谨慎的态度将一丁点儿的夸张都克

^① 种属识别不同于同一认定。这些概念将在第15章、第16章、第17章中谈及。

服掉，否则，侦查人员就将成为对工作毫无价值甚至对人类构成巨大威胁的人了。我们不得不坚持认为侦查人员应该阻止自己滑向夸张的陷阱，他应该经常客观地批评自己和他人的工作，并且，如果他没有发现夸张倾向的苗头也应该以极大的细心来审查自己的工作。

第二版的《犯罪心理画像》力争对学生、侦查人员、法庭科学家、精神病学家以及法庭能有所裨益。如前所述，本书在研究犯罪心理画像时将不会夸大或虚构与犯罪有关的事实。第二版如同第一版一样，把犯罪心理画像理解为一种刑事侦查过程，即通过透彻地分析犯罪嫌疑人的个性和行为来帮助破获实际案件的过程。

下面就谈谈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

问题

虽然目前关于犯罪心理画像的论著很多，而且互联网使我们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没有一个人能透彻地理解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个性和行为特征。可能沃勒莫（Vollmer，1949）说得最为准确，他的话在世纪之交依然折射出真理的光芒：

对犯罪和犯罪行为异常复杂的本质缺乏透彻理解的并不仅仅是门外汉（p. 19）。

并且

每个撰写犯罪题材的作家或演讲家，或者每个以对付犯罪或犯罪行为为己任的人都被错误地贴上了犯罪学家的标签。因此，可以说，虽然他能够权威地作出有关犯罪和犯罪行为的所有论断，但离真理却还相去甚远（pp. 38 ~ 39）。

柯南费克（Kenefick，1970），一名司法精神病学家，正在写有关司法精神病学和刑事侦查的论著，他对这个问题的实质有非常专业的见解：

警察以外的外行和专家很少能坐下来仔细研究一下谋杀和谋杀案，甚至警察经常碰到的也只是那些通常难以琢磨的东西。

完全掌握刑事案件材料的人（如警官、刑警、私人侦探等）缺乏用有效的方法对案件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而具备这些学术研究能力的人（如教授、学生、专业研究者等）却往往无法得到完整的案件材料，或者他们欠缺侦查

人员研究问题所应具备的基本知识。为防止这种情况愈发严重，这两个群体应当经常配合并分享各自的专业知识。

就算研究犯罪的人具备了侦查和学术两个领域的知识，也不能保证他们就高枕无忧了。研究犯罪和犯罪行为特殊之处在于与其说它是一项科学研究还不如说它更像一项神职活动。也就是说，专家应该是通过积累知识经验而不是散布自己的所见所闻来保持自身学术权威。在这种背景下，批评性的思维能力不可能得到发展和提高。而且也不可能培养出好的学生，因为学生被看成是自己的竞争者而不是将来整项事业的先期投入。这也就自然道出这样一个事实：破获疑难案件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在目前的侦查圈子里几乎接近枯竭。

既然如此，新千年中犯罪心理画像者明显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克服这些可能存在的障碍，提高自身在侦查和学术两方面的素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一方面要学习精湛的学术知识和提高科研能力，这不仅对犯罪和犯罪嫌疑人进行出色的心理画像，而且还要有助于识别非犯罪行为和无辜的人。另一方面要努力学习刑事侦查，可以通过专业合作、课程学习、阅读书籍等途径来学习，最好能直接参与实战。同样也可以通过研究案件档案来学习，研究在某个具体案件中侦查员做了哪些工作，以及在解决各种难题中刑事侦查如何发挥作用或者为何导致失败。理论和实践必须相互交融，相互取长补短。有价值的要吸收，无价值的要抛弃。^①

犯罪心理画像者的必备素质

侦查和分析犯罪事实是犯罪心理画像作出结论的关键^②，这涉及犯罪心理画像者众多必备的素质。首先让我们看看格罗斯（Gross，1924，pp. 15 ~ 25）

① 我们将系统地论及什么有价值而什么没有价值。除非另外提到，假定我们论述的都是与侦查有关的内容。我们讨论的事物和所要克服的困难都要符合一条标准——它对澄清犯罪事实是否有价值。运用这条标准非常简单，但接受它的结论却经常面临巨大的困难。

② 在里克（Reikl，1959）有关刑事侦查和犯罪心理学的论著中，他详细地论述了“从行为到行为人”这一概念。案件事实提供了行为（如犯罪嫌疑人行为或行为选择等），这些事实综合起来就提供了行为的整个过程。他认为借此可以分析犯罪嫌疑人。

的观点，他认为，侦查人员必须具备下列素质：

1. 任何时候都具备充足的精力。
2. 较高的自我否定能力。
3. 精明机智的头脑。
4. 谦逊的态度。
5. 良好的教育。
6. 在探索事实和阐明问题真相时的高度精确和严谨。
7. 聪明的计算能力。
8. 严密的推理能力。
9. 在权衡事态轻重前做好认真准备。
10. 诚实的品质。
11. 朴实的性格，不愿在公众面前卖弄成功。
12. 掌握有关人类和人性的丰富知识（包括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和专家）。
13. 知识渊博。

阿斯顿－沃尔夫（Aston－Wolfe，1930）在他关于犯罪心理画像的论著中，支持了格罗斯（Gross，1924）的观点，他认为：

虽然科学知识和理论对探究犯罪是必不可少的，但还远远不够。现代侦查技术依赖各种基本的规则，而且先前这些研究都必须是有条理的。侦查员所需要的每门知识也都只是整座大厦的一部分，而这座大厦的根基是犯罪认定。

科克（Kirk，1974，p.1）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犯罪和物证（犯罪现场）的知识都是侦查人员所必备的：

所有的犯罪侦查都涉及人和物——犯罪嫌疑人不是单纯地实施犯罪行为，他不可避免地要利用一些中介物。

因此，一项合理的侦查活动应当是双重的：一方面涉及人，另一方面涉及物——犯罪中的物证。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一名好的犯罪心理画像者也应当是一个喜欢博览群

书的人。^① 广泛阅读的实际效果就是形成了一所犯罪心理画像者非常熟悉的个人图书馆。所有的教育、阅读和知识积累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这将超出某个特定案件的范围。犯罪心理画像者读书的目的不仅是为解决当前的疑惑，而且还要通盘预见将来遇到的问题。在攀登知识顶峰的征途中同样也不能忽略大量的课本和杂志。要警惕那些不爱读书也没有知识储备的所谓的犯罪心理画像者、司法科学家、刑事侦查人员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庭专家。

这些优秀的品质是犯罪心理画像者应该具备或努力追求的。没有一项品质是无关紧要的或可以彼此相互代替。这些品质都无疑是正确的。

格罗斯（1924）、阿斯顿-沃尔夫（1930）、科克（1974）用潜在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这些品质在破获案件方面比别的因素更为重要。教科书也在同样的理论之上完成。涉及犯罪侦查，别的因素（如个人因素、政治因素、宗教因素、金融因素等）就列居次要位置了，这些优秀品质才至关重要。

因此要格外注意的是，当一个人积累这些优秀品质的时候，他应该与周围的人持有相似的侦查哲学。这有益于探求事实真相、获得知识、弄清事情原委。不能将个人的侦查结论强求于他人。无论与人共同研究还是个人独自研究，无论与人一起工作还是自己工作，首先不要试图改变别人，他们可能与自己的看法不同。要能够接受那些来自男性或女性提出的客观和相反的少数意见。找出共同点，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我们自己的信仰和期望。

所以，一名好的犯罪心理画像者最优秀的品质可能就是调查事实中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基于此，这项工作才能有更深入的发展。缺乏这份热情，所有的阅读、训练、经验都将付诸东流。犯罪心理画像者必须对破获案件抱有浓厚的兴趣。否则就必须重新考虑犯罪心理画像者从事的工作了。

^① 就如同我经常提到的，书籍具有永恒的价值。书籍一经完稿和出版就固定化了、不可变了。以后的编辑只是修正一些拼写错误、强调一些重要思想，并为今后的发展提出一些观点。但是，每本书都是某个时代思想的结晶，提供了把握某个领域思想脉络的无价参考。智慧和无知同样都纪录在书中。通过书籍及其永恒性，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思想前进了多远以及徘徊了多久。

参考文献

1. Ashton – Wolfe, H. (1930) The Forgotten Clu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 Gross, H. (192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3. Kenefick, D. (1970) "Forensic Psychiatry: The' Boston Strangler' Investigation", in Curran, W. and Shapiro, E. D. (Eds.), Law Medicine, and Forensic Science, 2nd ed.,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4. Kirk, P. (1974) Crime Investigation, 2n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5. Reik, T. (1959) The Compulsion to Confess, New York: Grove Press.
6. Vollmer, A. (1949) The Criminal, Brooklyn: The Foundation Press.

答谢声明

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下列朋友和同行曾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鼓励和指导，在此我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向所有的撰稿人——感谢他们对此项事业的热爱，感谢他们的友情，他们的专业水准和正直，以及他们及时送来的大量稿件，使得我们比较顺利地组成了今天这支专业性极强的队伍以迎接刑事侦查的挑战。

约翰·J. 巴赞探长（Det. John J. Baeza），纽约警察局（记者）——感谢他的友情，以及在打击犯罪这项职业中所表现出的毫不动摇的献身精神。是他，在我前进的道路上不止一次地为我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乔治·巴格（George Baggen）——作为我历史学方面的一位朋友，感谢他在我复审这本书的过程中，一直耐心地容忍我的反复和沉思。

梅利莎·巴格（Melissa Baggen）——感谢她的深厚的友情，她以极大的耐性和自制力完整阅读和修订了本书的第一份原稿，找出了其中的许多错误。

杰丽·奇斯姆（Jerry Chisum），犯罪学家——感谢他的友情，感谢他的敏锐与细致，以及在完善司法科学和犯罪重现的研究中表现出的献身精神。他的个案研究对我书中的案例研究而言，具有基石或准绳的意义。

迈克尔·麦格拉（Michael McGrath）博士，法庭精神病学家——感谢他的友情，感谢他一直以来对我的坏脾气的忍耐，感谢他对本书所提出的诸多建议，以及他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表现的孜孜不倦的可贵精神。是他帮助我为这门刚步入正轨的技术确定了研究的范围和领域。同时，由于他那广博的学识，我本人的技艺也得以完善。

韦恩·佩瑟里克（Wayne Petherick）——感谢他的友情，是他使我在很大程度上忘却了犯罪心理画像工作中的艰辛。事实上，他并未在实际工作中帮我太多，并且到今天为止他也没打算这么做，然而他就是那样的一位挚友。非常谢谢你，韦恩。

理查德·萨弗斯坦（Richard Saferstein）博士，犯罪学家——我在此向理查德表达我最深切的感谢。要不是他的忠言和私下对我的鼓励，我想至少这本书也要推迟几年和读者见面。由于他的建议，他那崇高的理想，以及为我们的读者所带来的充满智慧的作品，我要向他献上我个人最诚挚的感激之情。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博士，犯罪学家——感谢他的友情，感谢他的专业建议，感谢他那细致耐心的讲解，以及作为我的一名知音。我成为一名刑事科学家，他是我这样做的理由。通过阅读他的著作和案例研究，我学到了对于一名普通大学生而言远远学不到的知识。

同时，由于下列专家学者的著述，我也想向他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1. John DeHaan 博士。
2. Hans Gross 博士。
3. A. Nicholas Groth 博士。
4. Robert Hare 博士。
5. Paul Kirk 博士。
6. John Thornton 博士。

第1章 犯罪心理画像的历史

Brent E. Turvey, M. S.

当我们没被要求使用智慧时，我们就必须要聚集智慧；否则当智慧使用的时间来到时才聚集智慧，收获的时间早就错过了。

——格罗斯（Gross）：《犯罪心理学》（1968，p.4）

对实施犯罪的行为人进行个性特征推断的过程通常就被称为“犯罪心理画像”。进行犯罪心理画像的专业人士有很多种，包括侦查人员、行为学家、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物证专家。他们参与到未被侦破的刑事案件当中，并提供一些侦查线索及确认犯罪嫌疑人身份等。从这个方面看来，涉及多学科知识的犯罪心理画像被认为有助于缩小犯罪嫌疑人范围、串并案件以及在某些悬案中提供一些侦查线索和方法。^①

犯罪心理画像也被一些人称为“行为画像”、“犯罪现场画像”、“犯罪人格画像”、“作案人画像”、“心理画像”等，此外还有些称谓并不常用，最近常用的一种称谓叫“犯罪侦查分析”。目前，在进行画像的方法中存在着不一致或不协调的地方，加之画像技术涉及诸多学科，因而在涉及画像过程的各种技术中，这些称谓常有前后不一致和张冠李戴的现象。就我而言，我愿意使用通常的称谓——犯罪心理画像。

但是，在我们开始描述和了解这种独特的犯罪心理画像方法及本书中所出现的一些概念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其历史。了解历史有助于让我们了解我们是怎样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的。历史能让我们回顾过去，评估进步与挫折，揭示我们对此评价观念的广度和深度，能让我们知道我们过去如何，将来又怎样。

^① 参见格罗斯（Gross，1924）、狄普（Depue）等人以及科克（Kirk，1974）和特维（Turvey，1999）等人对犯罪心理画像的使用及功效的讨论。

通常人们认为某段历史只有在事件或一系列事件之后的若干年后所记录下来的史料才是真实准确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些历史学家保持公正性和客观性，或许才能让历史学家摆脱因阿谀奉承而不得不歪曲历史的压力。现实生活说明即使在最详实的记录中也永远不会得到事实真相，因为即使付出了种种努力，任何人也是不可能将信息提供者的主观判断与事实真相完全分离开。历史学家爱德沃德·切尼（Edward Cheney）曾提出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警告（Cheney，1988）：

读者所查阅到的任何资料都是由历史学家解释过的。事物都是通过个体自身的主观角度来审视……读者的视角往往受历史学家的摆布……历史冲突被那些年代的记录者按自己的视角而永远记载流传下来了。因此历史的真相往往被一些学者给歪曲了。

当看到一些有关犯罪心理画像的资料^①或历史故事时，我们都要回想起上述的话。尽管作者都尝试着保持客观性，但历史的观点却是通过作者的角度呈现出来并用作者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当犯罪心理画像发展深入下去时，不得不审视多门学科在技术领域中的地位及贡献。尽管不是很全面，但对犯罪心理画像贡献的看法却提供了一个基础。读者应当借助这些历史上的相关叙述作为了解犯罪心理画像的第一步，并慢慢拓宽视野而完整深入地理解犯罪心理画像的过去和起源。

针对犯罪侦查行为最先出版发行的犯罪心理画像教科书叫《巫师的锤子》（The Malleus Maleficarum）。这本书最先作为缉捕巫师（Kramer and Sprenger，1971）的专业手册在1486年左右出版。在实践中，这本书为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审判异教徒的人员在确定巫师身份、审判、处罚巫师中提供了一些指导。各种巫师的画像方法被提到，大多数常用的刻画方法都把巫师描述成是对居

^① 有关犯罪心理画像的过去仍然很少被谈及，即使涉及也只是有关联邦调查局参与办案的一些东西。在当今社会有关犯罪心理画像的报道多见于媒体，在描述一些特别犯罪心理画像者个性的文章中往往会在开头的一段或两段来阐述犯罪心理画像。如果认真收集资料就会发现这些文章中都会提及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疯狂炸弹手”（George Matesky），其中布鲁舍尔博士（James Brussel）因为在那起案件中对凶手进行了准确的刻画而受到表彰。对大多数人而言，当准确性和全面性尚未变成历史的一部分时，心理画像的客观性也就变得不重要了。

住区、男人或孩子带来伤害或灾难的女人。通过一段简短的摘录可以来透视作者的推理和动机（Kramer and Sprenger, 1971, p.89）：

……我们祈祷上帝让读者不要在每例案件中去寻找证据，因为只要找出证人所见所闻的例证或是有可靠证人提供的证词来证实就足够了。

这段话明确指出这本手册的读者应该明了他们被告知的东西是基于专家的意见和作者的个人意见而得来的，无须经过过多的审查。^①不幸的是，当时许多人轻信手册照此办理。因而一个人很容易就被认为是巫师（仅仅凭借含混不清和主观性的推断），然后被宗教裁判所宣判烧死在柱子上。在中世纪天主教审判异教徒期间（1478～1834）全世界大约有数以万计的人被认为是巫师而被处死。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就代表了最原始的犯罪心理画像的滥用。

多学科的历史看法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现代的犯罪心理画像由于有着复杂的历史，故而立足于犯罪行为研究（犯罪学）、精神病研究（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和物证检验技术（刑事技术科学）。在众多的形式中，犯罪心理画像总是能为犯罪侦查和审判过程提供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但是，这些特征描述中所包含的推理过程并不总是连贯一致的。其中包含数据分析、犯罪嫌疑人行为判断及个人的直觉经验等几个方面。下面我们来分别一一阐述。

探寻起源：犯罪学

要全面了解犯罪心理画像就要先了解犯罪行为的由来和犯罪行为的划分。犯罪行为及其分类都属于犯罪学范畴。犯罪学是研究犯罪、犯罪人、犯罪行为的学科，它包含有关犯罪行为的研究文献及解释犯罪行为理论的演变等内容。文献资料表明除个别例外，大体上有两种类型的犯罪学家已经在利用犯罪心理画像的相关理论：一种是研究由犯罪人的生理特征来推导犯罪人的心

^① 这种形式的推理在当今的画像技术和法庭科学领域也存在着。某些事实也常常通过征求专家们的意见而得出推断和观点，而没有进行大量的调查或解释。桑顿（Thornton）（1997, pp. 15～17）曾警告我们要反对这种推理方式。他在书中讲到：“具有经验并不能让专家失去责任，而是让专家们在一些可争论的科学现象面前作出判断时更负有责任。”在后面的章节我们将对此进行详细的阐述。

理特征的犯罪学家，另一种是与犯罪侦查实践相关联的刑事学家。

犯罪人的生理特征

著名的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1835～1909）被公认为是第一位通过数据比较来划分犯罪人的犯罪学家。^① 在1876年龙勃罗梭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犯罪人论》。龙勃罗梭通过对种族、年龄、性别、身体条件、教育背景及地域环境等方面相似的犯罪人进行比较，他认为犯罪行为的起因和动机能够被理解，并能因此进行预测。

龙勃罗梭研究了383例意大利在押犯罪人。他提出了犯罪行为起因的进化论和人类学的理论观点。基于这些研究，社会上存在着3种类型的犯罪人（Bernard and Vold, 1986, pp.37～38）。

天生犯罪人：天生犯罪人是退化的、原始的犯罪人，他们在生理上具有低等进化的返祖现象。

精神病犯罪人：这些犯罪人具有精神上或生理上的疾病或缺陷。

有犯罪倾向的犯罪人：大部分犯罪人并不具有明显的特征。他们并没有可明显识别的精神障碍，但是他们精神上和情绪上的某些缺陷往往使他们在一定的情形下倾向实施犯罪行为。这种分类跟精神病院的精神错乱的个性紊乱症状形成对比。

根据龙勃罗梭的犯罪人类学理论，有18种生理特征，其中至少有5种是可以直接观察的生理特征，可表明是天生犯罪人（Bernad and Vold, 1986, pp.50～51）。

1. 头盖骨的形状与犯罪人同一种族和同一居住地的普通人不一样。
2. 面部不对称。
3. 有较大的下颌和颧骨。
4. 眼睛奇特并有残障。

^① 爱利思（Jean Morris Ellis）写了一本热销书《面相分析》（Ellis, 1929）。在这本书里爱利思认为，欧洲的解剖学家弗朗西斯·约瑟夫·高尔博士（Francis Joseph Gall）（1758～1828）的研究成果为当代的面相分析（又称“骨相学”）和犯罪学理论奠定了基础。有些人认为高尔博士是第一位犯罪学家（Dickman et al., 1977）。

5. 耳朵的大小与正常人不一样。有的非常小，有的像黑猩猩一样直接向外伸张着。

6. 鼻子歪长着，鼻孔向上或扁平（多为盗贼）或像鹰鼻或鼻子顶部肿胀（多为杀人犯），或是鼻尖如峰，鼻孔肿胀。

7. 嘴唇肥厚、肿胀、突出。

8. 脸颊上有眼袋，像有些动物一样。

9. 上颚就像一个大的、居于中心的山脊，周围是一系列的洞穴并且有些像爬行动物身上长的瘤，颚还是裂开的。

10. 不正常的齿系。

11. 下颚退化或超长或像猿类的下颚一样短粗。

12. 皱折多并早现。

13. 头发不规则，具有异性发质的特点。

14. 胸腔有缺陷，如肋骨或多或少，或者多乳头。

15. 骨盆异性化。

16. 手臂过长。

17. 手指和脚趾的异数。

18. 头盖骨不对称，造成两脑半球不平衡。

龙勃罗梭的犯罪起源论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该理论主张犯罪人代表了人类的返祖现象。当然，并不是没有犯罪的人就被认为进化程度更高，并与猿的差距更远。根据龙勃罗梭的研究，他发现了与犯罪行为密切相关的生理特征。这种观点类似于“该隐标记”^①（mark of Cain），所有的邪恶都能借助圣经上的这个标记来被认定并进行分类，然后被驱赶出伊甸园。

自从根据智商、种族、遗传、财富和其他生物学或环境因素来分类及给犯罪人或潜在的犯罪人贴上犯罪人标签以来，许多犯罪学家都已经进行了类似的尝试，其中也包括了身体类型理论等观点。

在1914年，美国性格分析学家杰拉尔德·福斯布鲁克（Gerald Foshbrooke）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面相分析观性格》。在该书里，福斯布鲁克提出以下

^① 又称“凶手标记”。该隐（Cain）是《圣经》中亚当的长子，曾杀害其弟亚伯（Abel）。在此喻为杀弟者、杀人者、凶手、恶魔。译者注。

一些观点（Fosbroke, 1938, p. xx）：

伴随着我们身体和智力的成长，我们的性格特征也日趋定型。在我们的性格成型期间，我们的面貌也在逐步进化，让其他人认清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性格是否坚强或柔弱。

我们的面相表面上是由我们自身确定的。大自然不会制造矛盾或撒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已经从我们的生理上反映出来了。

福斯布鲁克自诩自己的专著是根据 30 年的观察和研究基础之上形成的（Fosbroke, 1938, p. xx）。福斯布鲁克认为，通过观察个体面部的生理特征，就可以推断出该人的性格特点。

这个年代同时还有德国犯罪学家埃利池·沃尔芬（Erich Wulffen）博士的著作，如《女性性犯罪》（1935）。沃尔芬博士是萨克逊司法部缓刑和假释部主任及监狱管理部的负责人。沃尔芬博士致力于女性犯罪行为研究，他认为他写的著作书名不只暗示着女性犯罪仅涉及性犯罪，他还探索了女性犯罪人的社会、心理、生理和精神等原因。他针对各种女性犯罪的行为和犯罪动机提出了一些看法，并列举出一些例子来论证。例如，其中一个“杀死丈夫的妻子”的案例他是这样描述的：

这样的案例和其他案例很相似，这些案例的发生方式几乎都是一成不变的。……丈夫可能比较凶残，他虐待自己的妻子并且酗酒；或是以其他放荡方式来打发时间而不管不问自己的妻子等。……妻子对婚姻已经很失望；感到很失落，遭受冷遇；她的性需求仅仅在外面与其他男人发生关系才能得到满足；随后出现了一个爱自己的男人，这个男人在谋杀案中成为帮凶。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女人才敢冒险单独去实施犯罪。……在犯罪过程中的细节方面，她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最初对丈夫的轻微冷漠倾向很容易转变为厌恶或仇恨……凶手会认为，杀死丈夫就能摆脱男人的征服，由此而产生强烈的杀人动机……当一个男人成为她在案件中的教唆犯或帮凶时，这位女性杀手就显得信心十足、充满勇气和毫不顾忌等。

沃尔芬博士在文中其他部分继续论述大多数女性犯罪都与特殊的女性性欲、女性性骚动或女性性异常等情况有关。

德国犯罪学家恩斯特·克雷斯奇曼尔（Ernst Kretschmer）深入犯罪预测领域进行研究。他指出身体体型、性格类型和犯罪可能性之间存在着高度相

关。在1955年，通过对4414起案例的初步研究，克雷斯奇曼尔提出犯罪人中间大致存在着4种身体体型（Bernard and Vold, 1986, pp.57~58）：

1. 瘦弱型或虚弱：这些人个高并且很瘦。主要涉及数额较小的偷盗和诈骗。
2. 运动型：这些人肌肉很发达。主要涉及暴力型犯罪。
3. 矮胖型：这些人个矮并且肥胖。主要涉及诈骗，有时也会实施暴力犯罪。
4. 混合型：这些人是多种体型的混合。主要涉及有悖行为准则和道德的犯罪，也涉及暴力犯罪。

但一部分人对克雷斯奇曼尔的理论产生了怀疑，因为他从来没有公布他的研究。其推论和描述总是令人不可置信、含混不清，并且没有和非犯罪人进行专门的比较分析。总之，克雷斯奇曼尔不愿将他的研究成果提交给同行进行评论，另外他的研究方法还明显缺乏科学性。因此，许多人认为有关他的研究理论仅仅是未经证实的一种推论而已，称不上是科学。经过对生物和环境起因的犯罪学研究，目前有一种前提假设也将延续下去：如果能正确破解犯罪人的共同特征，那么就能对犯罪行为进行预测，也能推断出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并且还可以制止犯罪行为的发生。当然，这种前提假设存在的风险是分析出某种类型犯罪人的特征却并不能具体确定某个犯罪人。“犯罪人”这个词应该是指法律规定的具体描述、而不是归纳出来的可能。^①

当现代人认为龙勃罗梭和克雷斯奇曼尔的理论荒谬时，学术界也就不得不放弃了龙勃罗梭提出的三种犯罪人的划分方式。然而，现代犯罪学家、法庭神经学家、精神病学家及心理学家仍然在寻求“该隐标记”。今天他们使用的工具有：计算机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图（CAT Scan）、酶切割（Cutter enzymes），尝试着人格鉴定等手段，像龙勃罗梭的理论观点一样，现代研究的脑部异常、基因或性格类型的测试方法也同样受到广泛指责：科学团体都不自觉地通过科学依据封杀那些主观地认为犯罪行为可被预测的理论观点。

^① 已退休的联邦调查局画像人员罗伯特·K. 勒斯乐（Robert K. Ressler）就是现在其中一位赞成在犯罪心理画像利用克雷斯奇曼尔的归纳总结的支持者，并且他还将这些归纳直接运用到他自己接手的案件中（Ressler and Shatchman, 1992, p.4）。

进行研究的刑事学家

格罗斯博士（Gross）是切尔诺维茨（Czernovitz）大学的刑法学教授、布拉格大学（University of Prague）的犯罪学教授，后来成为格拉茨（Graz）大学的刑法学教授。在格拉茨大学他创建了犯罪学博物馆。在1893年，格罗斯出版了一系列的犯罪学丛书，分别写给治安官、警官和法律工作者。这些著作已经再版5次，并在1908年前被翻译成8国文字出版发行（Gross, 1968, pp. xi ~ xii）。在1898年，格罗斯博士开始担任犯罪人类学与犯罪学刊物的编辑，他自己经常为刊物撰稿。他介绍刑事科学的研究，这本刊物目前仍作为介绍科学侦查方法的主要媒介（Saferstein, 1998, p.4）。

现代犯罪心理画像之父——格罗斯权威性地指出人们要意识到认真研究犯罪人行为的重要性。比如在《犯罪侦查》一书中，格罗斯提出了几种对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进行画像的方法，这些犯罪人包括杀人犯、纵火犯、盗窃犯、假币制造者、谎报强奸案的女性等（Gross, 1924）。在这本书里，格罗斯通过列举犯罪案例来阐述他对犯罪人的认识和观点，包括在《犯罪侦查》一书中利用作案人惯技来进行案件侦查的相关叙述（Gross, 1924, p.478）：

几乎在每个案件中，盗窃犯都在犯罪现场遗留下最重要的作案痕迹，也就是说，盗窃犯的作案方式已经遗留在案发现场。事实上每个盗窃犯都有自己的作案特点或惯技，并能与其他作案人区分开来。而且，盗窃犯不能完全隐藏这种特点；有时这种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就算是侦查新手也能毫不费力地识别出来。但一方面，侦查新手却不知道如何归类、区分或利用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另一方面，作案过程中的特别之处也并非都能轻易识别出来。

在格罗斯的另一本名著《犯罪心理学》中，他也同样表现出对作案人进行犯罪心理画像的倾向（Gross, 1968, pp.54 ~ 55）：

是否每一行为都是作案者总体特性的体现，我们不得而知。行为和特性是否是相互关联的一组概念？行为所建立起来的特性不能只从行为本身当中推断出来吗？……只有当确定行为特点与某人的人格特性有关时，每个特殊的行为才是值得可信的——某一特点倾向于确定某人一些行为，另一特点则让人们觉得这些行为与此人无关。

格罗斯继续提出一些其他观点。这些观点涉及女性，尤其是作为被害人

的母亲，作为孩童谋杀案中的犯罪嫌疑人，如何考虑这些被害人的特点和环境（Gross, 1968, pp.358 ~ 359）。下面的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对于孩童谋杀，不必总考虑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状态。当然，犯罪嫌疑人当时是否处于精神病发作却是必须要被确认的。因此第一步就有必要了解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特征。在法医学、司法精神病学、犯罪心理学的教科书上都能查到相关资料。其中，著者引用的大多数案例说明女人在精神状态很好的情况下常常会按这种方式来实施行为：如果她们是穷女孩，人们立即假设她们是孩童谋杀者。并且，这些案例都说明性情温和、没有伤害性的动物在进行分娩时或在对孩子和丈夫产生仇恨的短期内都会变成真正的野兽。一些动物蚕食自己刚生出来的子女的习性可以用来解释许多孩童谋杀者的行为。对这类案例的认识往往影响我们在审理孩童谋杀者时会认为凶手都怀有母性的精神错乱状态（这种精神错乱应由精神病医生来确认），同时，也会让我们像精神病学家和人类学家那样在解释任何事物时都把精神状态联系在一起考虑。

格罗斯是一位追求专业道德规范、事物客观性、要求详细审查物证、讲究科学方法应用及犯罪现场再现的支持者。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刑事犯罪侦查的专业化。

在1935年，第一版的《现代刑事犯罪侦查》由约翰·康奈尔（John J. O'Connell）（纽约市警察局首席巡视员）与哈里·索德曼（Harry Soderman）（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律学院警察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合著出版。第二版再版时给侦查人员提出了如下一些建议（O'Connell and Soderman, 1936, p.1）：

对犯罪嫌疑人的惯技和作案手段、理解力、技能、耐心、老练程度、从事的行业、细心程度等方面的了解，再加上一位才干突出的优秀侦查人员，将是刑事侦查工作中的一笔珍贵财富。

康奈尔和索德曼在1936年完整地提出了各种类型犯罪人的画像方法。针对入室行窃，他们分别描述了阁楼行窃、翻窗行窃、商店行窃、住所行窃、公寓行窃、餐厅行窃、晚间行窃及各种类型的私人住所行窃等各种犯罪人的性格特征（pp. 302 ~ 313）。就盗窃犯罪而言，他们叙述了暗中盗窃、扒手、骗子等各种类型犯罪人的性格特点（pp. 330 ~ 355）。他们同样也关注各种类型的抢劫犯罪（pp. 362 ~ 376）和纵火犯罪，包括纵火狂人的性格特点（p. 382）。

很有意思的是，当康奈尔和索德曼在 1936 年重点对犯罪心理画像提出上述总结时，他们对凶杀案件调查的总结却更详细、更系统。他们并没有谈及典型的犯罪人，而是讨论了如何通过物证检验和凶手行为来确认犯罪嫌疑人。他们强调的重点一直是物证的识别和物证重建，在所提出的侦查指导原则部分（pp. 254 ~ 260），他们清楚地知道，通过诸如作案动机、凶器、作案路线、使用的交通工具和作案工具等行为证据的认真分析来确认犯罪嫌疑人。

就犯罪心理画像而言，刑事犯罪学家的研究工作已经和刑事科学家的研究工作相互重叠了。这也可能是后来学科发展的必经之路。犯罪侦查已经通过访谈和讯问方式来收集事实真相，法庭调查也是围绕物证和物证科学展开，并且，犯罪行为的社会心理内容仍属于行为科学的研究范畴。

探寻起源：刑事科学家

刑事病理学是医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用医学原理和知识来解决法学领域的问题（DiMaio and DiMaio, 1993, p. 1），刑事病理学家有责任记录和了解在被害人和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环境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在刑事死亡案件调查中，刑事病理学家应该注意尸体和所有与被害人尸体有关的刑事证据（如伤口痕迹、疾病、环境及被害人历史记录等）。

在 1888 年英国的怀特魁堡尔（Whitecapel）谋杀案期间，乔治·菲利普斯博士（Dr. George B. Philips）是警察分局的外科医生（相当于法医病理学家）直接参与了心理画像工作。他不是简单对比档案里普通犯罪人的特点，而是更多地通过仔细检验一些另类凶手所杀的被害人的伤口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他通过检验那些特殊犯罪人对被害人实施的行为来推论犯罪人的特征。在这些范例中，可以通过法医专家对伤口的损伤形态来解释犯罪人的行为。

例如，他指出怀特魁堡尔谋杀案中的被害人之一安尼·查普曼（Annie Chapman）的伤口说明了凶手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具有的某种专业技能和知识（见图 1-1）。



图1-1

菲利普斯博士尤其提到安尼死后身上器官的移除，他认为这些切口相当干净利落。正如在第一版的《犯罪心理画像》附录 I（Turvey，1999）中所讨论的那样，关于未知凶手特征的前提假设和结论都应该值得审慎看待。

无论对于未知凶手技能水平的推论是如何得出的，这种方式的解释很明确。正如威尼·巴克斯特博士（Dr. Wynne E. Baxter）、米德尔塞克斯郡东南地区（South Eastern District of Middlesex）的验尸官在调查安尼死因过程中向菲利普斯博士讲的那样：“通过尸体检验我们不仅能确认死亡原因，并且还能得知犯罪行为的实施方式。在杀死被害人后实施的毁尸行为可能暗示着凶

手的某些特征。”他们认为凶手实施的行为是表明凶手性格特征的一种证据（Sugden, 1995, p.131）。

怀特魁堡尔谋杀案期间，法医们被要求做到调查被害人伤口的损伤形态、特点及尺寸大小并详细记录下来（尽管不必要通过照相拍摄）。这种调查方式的价值在于，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当时，都能从伤口情况的记录中推论出一些有用的结论。^①在怀特魁堡尔谋杀案中刑警和刑事技术人员第一次进行这样的伤口情况分析显然不是首例。但是，这种调查方式提供了一些从凶残、异常、碎尸犯罪行为得出的有关凶手的情况的最早记录。

在莱斯特·阿德尔森（Dr. Lester Adelson）《杀人者病理学》一书中，作者基本不谈“心理画像”这一概念。阿德尔森与格罗斯一样提到了侦查工作中的全面性和精确性等概念，但他认为，刑事病理学家是一群肩负特殊责任队伍中的一员（Adlson, 1974, p.6）：

通过对致命创伤的观察、研究和分析，病理学家常常能推导出一些重要的事实和结论，这些事实和结论对再现案发现场当时的情形和重现杀人事件本身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病理学家的贡献被认为有助于说明发生杀人事件的生理变化的原理。

阿德尔森继续阐述包括侦查人员在内的其他人员的各种责任。侦查人员必须经历“困难、迷惑及追踪、缉拿犯罪嫌疑人的危险……”（Adlson, 1974, p.8）。在他的论述中，刑事病理学家通过确认被害人死亡的一些事实和情形来证实或反驳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刑事病理学家的角色更多地被看做是诊断性的，而不是调查性的。阿德尔森明确指出，案件调查人员必须去寻找犯罪嫌疑人，并把病理学家提供的一些线索应用到案件调查之中。

迪玛欧二人（DiMaio and DiMaio）（1993）至少用了两章来阐述与犯罪心理画像完全相关的内容——第11章“婴儿猝死综合症状”和第12章“杀新生儿者，杀婴者及孩童杀手”。后一章专门讨论了如下内容：

^① 了解被害人、凶手受伤情况的类型和范围被认为是在当今犯罪心理画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通过伤口的特殊形态的有无和其他一些物证得知案发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掌握凶手特征目标的关键步骤。现代心理画像人员已经懂得，法医病理学以及其他一些物证可以提供这种类型的信息。

1. 受虐儿童综合症状。
2. “冲动型”或“激怒型”杀人者。
3. 温和型杀人者和各种变态型致命杀人者。
4. 晃动型婴儿综合病症。

尽管这些都与犯罪心理画像有关，但是迪玛欧二人指出这些都是从医学角度得到的客观发现，至于要把它们与犯罪原因联系在一起需要人为地进行解释。^①正如阿德尔森1974年的著作一样，他们二人也未深入涉及犯罪再行为后面所隐藏的心理特征。这就意味着当人们把刑事病理学从犯罪心理画像技术中分离出来作为一门专业技术时，上述两篇文章已经认识到法医病理学对犯罪调查中的重要价值。

已故的犯罪学家保罗·科克博士（Dr. Paul L. Kirk）还进一步强调过犯罪心理画像。在他先后出版的两个版本的刑事教科书《刑事侦查学》（Kirk, 1953, 1974）里，反复讨论了犯罪心理画像能推导出什么样的结论。他或多或少地认为犯罪心理画像是犯罪学研究的结果（Kirk, 1974, pp. 4~5）：

物证研究能为警察寻找犯罪嫌疑人提供物质上的帮助……

在刑警已经拘捕某个犯罪嫌疑人或事实上已经开始怀疑该人是作案凶手之前，物证常常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如果实验室能得出犯罪嫌疑人当时穿什么样的衣服，确认出犯罪嫌疑人的体型、年龄、头发颜色或相关信息，那么刑警将大大缩小对犯罪嫌疑人的排查范围。

在实践中可以经常看到，在对犯罪现场遗留的微小物品进行仔细的检验后，能准确地判断出犯罪嫌疑人可能从事的某种职业或居住的环境情况。这些事实并不能证明某个人是否有罪，但却可以提供一些犯罪嫌疑人的重要背景资料……

下面的一个例子说明了实验室里的推断结论的真实性及推论过程所存在的缺陷。通过检验遗留在盗窃现场的一只手套，就能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1. 作案人是一名建筑工人。
2. 他的具体工作是推手推车。

^① 在《法医病理学手册》（1933年版的简易参考读本）同一章节中也谈到了心理学和侦查学的调查方式（Dana and DiMaio, 1998, pp. 151~159）。

3. 他居住在市区外面的一个小农场或花园里。
4. 他是南欧人。
5. 他养鸡并饲养了一头牛或一匹马。

正如上文所表述的那样，科克博士是在同龄人认识到犯罪心理画像的潜在价值之前，甚至在他生活时代的刑警对心理画像认识清楚之前，就主张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也应该考虑利用犯罪心理画像。

自从科克博士起初和其他一些刑事科学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都承认物证检验和犯罪现场再现在犯罪心理画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DeForest, et al., 1983, pp. 29 ~ 30; De Haan, 1997, pp. 394 ~ 418; Geberth, 1996, pp. 707 ~ 791; Lee, 1994, p. 193）。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除狄罕（De Haan, 1997）之外没有人像科克博士那样更加专注和深思熟虑。但是，当你看到最初出版的书籍都是由科克博士撰写的并且很多书上都提到科克博士的大名时，你大可不必惊讶。在《纵火案件调查》第一版中，科克博士首先提出了犯罪再现和犯罪心理画像的基本方针，而这些方针在随后的学术研究发展中并没有被淘汰（Kirk, 1969, p. 161）：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注意到当犯罪侦查人员能置身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时，侦查人员就能在案件侦破上有所突破；最优秀的侦查人员就是这样能进行换位思考的侦查人员。他们能想犯罪嫌疑人所想，做犯罪嫌疑人可能做的动作，通过这样的换位思考侦查人员就能揣摩出犯罪嫌疑人作案当时是如何实施的犯罪行为。

探寻起源：行为科学家

精神病学是对精神错乱症状进行诊断和治疗的医学分支学科。刑事精神病学家或精神病医生是在司法领域内的精神病学专家。精神病专家经过培训，通过面对面的临床交谈、个人记录的全面检查及个性测试等手段来得出与精神错乱有关的一些特殊信息。精神病学专家把鉴定结果运用于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当中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但在 20 世纪，美国纽约州格林威治镇（Greenwich Village）的精神病学家詹姆斯·布鲁舍尔博士（Dr. James A. Brussel）被公认为推动了刑事侦查思想的发展，这些思想里面就明显包含着犯罪心理画像的应用。作为一位临

床医生，布鲁舍尔是通过临床诊断来进行画像的。布鲁舍尔的方法就是从犯罪现场所见对未知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的精神状态的诊断来刻画犯罪嫌疑人。他借助自己的临床经验，将已掌握的精神错乱症状用来比较未知犯罪嫌疑人精神错乱的症状，进而推论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布鲁舍尔博士认为某种精神疾病与一定的生理结构是相关联的，这种观点与一个世纪以前的犯罪学家的理论观点很类似（尤其是将克雷斯奇曼尔的观点用于“疯狂炸弹手”案件）。因此，布鲁舍尔博士对未被侦破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征进行了画像（Brussel, 1968, pp. 32 ~ 33）。

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疯狂炸弹手”曾威胁着纽约市。凶手在纽约所有的火车站和电影院至少引爆了37枚炸弹。布鲁舍尔博士对这个案例专门进行了分析。他确认该案犯罪嫌疑人具有如下一些特征（Brussel, 1968, pp. 29 ~ 46）：

1. 男性。
2. 具备金属制造、组装管线和电工知识。
3. 曾遭受不白之冤，使他形成慢性疾病。
4. 偏执狂。
5. 形成慢性精神错乱。
6. 有持久性错觉。
7. 有稳定、系统的并伴有逻辑参与的错觉。
8. 病态地以自我为中心。
9. 根据他是偏执狂，可推断他具有像运动员一样匀称的体型。
10. 根据他精神病发作和持续实施爆炸行为可以得出他是中年人。
11. 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不是大学生就是高中生。
12. 未婚。
13. 可能是处男。
14. 独居或与一位母亲一样的女性居住。
15. 斯拉夫裔。
16. 罗马天主教徒。
17. 居住在康涅狄格州。
18. 穿双排纽扣的西装。



图 1-2

在 1956 年 12 月 25 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布鲁舍尔博士对炸弹手预测的一些信息(见图 1-2)。但这篇报道没有说明该犯罪嫌疑人穿双排纽扣的西装(Brussel, 1968, p. 47)。当警方在 1957 年最终证实并逮捕了爆炸案犯罪嫌疑人乔治·米特斯基时(George Metesky),警察发现这位犯罪嫌疑人与布鲁舍尔博士的预测基本上吻合。尽管听起来像是神话故事一样,乔治被逮捕时穿的是退色的睡衣,而不是他经常穿的双排纽扣西服(Brussel, 1968, p. 69)。

从 1962 年 6 月到 1964 年 1 月,在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波士顿(Boston)市发生了 13 起勒杀致被害人死亡的性犯罪,警方认为这些案件相互存在着关联。警方常用的侦查措施并没能成功地排查出案件犯罪嫌疑人和这位“波士顿绞杀手”。由精神病专家、妇科医生、人类学家和其他一些专业人士组成的画像小组聚集在一起,然后商讨如何对这种类型的杀人凶手进行“心理画像”。

画像小组得出的结论是,凶杀案由两个不同的犯罪嫌疑人所为,其理由是:一组被害人都是老年妇女,而另一组被害人却是青年妇女。画像小组也感到在这两组被害人之间的性行为心理存在着差异。他们认为,老年组的被害人是由一位专制、长相漂亮的母亲抚养的男子杀害的。这个凶手不能向自己的母亲发泄憎恨而导致针对老年妇女实施性伤害。这个凶手是独居者。他们认为,如果这个凶手能支配自己专制母亲的话,那么他也能像正常人一样表达出自己的爱意。专家们进一步分析,另一个凶手是个同性恋者,可能与被害人相识,并杀害了那些年轻女性。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心理画像小组的观点。警方曾邀请布鲁舍尔博士参与了 1964 年 4 月的案件调查,希望布鲁舍尔博士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像纽约的“疯狂炸弹手”那样有价值性的建议。布鲁舍尔博士却并不认可画像小组的判断,他们的意见相左。布鲁舍尔博士认为,这些案件都是由一个人单独作案。但当布鲁舍尔博士参与分析这些案件的时候,这种凶杀行为没有再发

生过，并且那时画像小组也已经解散了。

在1964年11月，阿尔伯特·德萨尔沃（Albert DeSalvo）因性犯罪而被初次逮捕（见图1-3）。德萨尔沃随后向精神病医生承认他就是“波士顿绞杀手”。由于他与布鲁舍尔博士向警方提供的画像存在着惊人的一致，警方于是就认定德萨尔沃是作案凶手，当时也没有进行控诉就结束了这起案件的审理。在1973年，当德萨尔沃在监狱服刑时，被同牢房的服刑人员刺死。德萨尔沃从来没有被宣判或认定为是“波士顿绞杀手”，因此任何有关这个案件的画像都不能在法律上生效。^①



图1-3

布鲁舍尔博士的推理方法主要依据个人的精神病鉴定和龙勃罗梭的犯罪学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据他对有关地区同类人口统计数据的掌握了解，而这些人群是持续变动的。这样得出的结论只是一种归纳总结，其中任

^① 在布鲁舍尔博士的论文集里，“疯狂炸弹手”案件是警方第一次征求他意见的案件（Brussel, 1968, p. 12）。布鲁舍尔曾很有意思地提到，“我感到我的专业使我成为了裁决者。令人好奇的是，我也成为控方的证人之一，但我是否真正地完全了解犯罪嫌疑人并能觉察他们的全部吗……”（Brussel, 1968, p. 15）

何一个推论都可能因为某些环节上信息的缺乏而出现错误。

应该指出，布鲁舍尔博士的众多画像结论中仅有一个画像结论是被部分证实过（尽管没有这方面的正式记录，因此没有人确信是这样）。其他画像结论仅仅被假设为是正确的，却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调查或证实。有一点值得注意，如果只依赖心理画像——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画像来认定案件的凶手，将很可能导致司法公正不能完全得到实现。

联邦调查局（FBI）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圣里安德洛警局（San Leandro Police Department）的哈沃德·特登（Howard Teten）警官开始改进犯罪心理画像的方法。特登的研究受到国际知名犯罪学家科克博士、旧金山医学检验专家布瑞富科尔博士（Dr. Breyfocal）及在纽伦堡战争审判中著名的精神病专家科利博士（Dr. Kelly）等人的影响。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上述这些人是特登警官在伯克利（Berkeley）大学犯罪学院的导师。特登潜心钻研犯罪心理画像，其中也受到格罗斯博士研究成果的鼓舞（此人在本书中会经常被提到）。对刑事科学、刑事医学死亡调查和精神病学等跨学科知识的了解奠定了特登早期刑事调查能力的基础，并促使他形成了犯罪心理画像的方法。

作为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殊侦查人员，特登在 1970 年开始实施犯罪心理画像计划。他把犯罪心理画像当成刑事调查的一种辅助手段，并与其他调查手段配合起来使用。特登在 1970 年联邦调查局的国家学院第一次讲授他的犯罪心理画像课程时，他把犯罪心理画像称为“应用犯罪学”。同一年，特登作为一位联邦调查局侦查人员在得克萨斯州（Texas）的爱莫雷洛（Amarillo）首次应用他的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 1970 年，特登和帕特·穆乐尼（Pat Mullany）合作前往联邦调查局的纽约分局去讲解犯罪心理画像中的变态心理问题。当穆乐尼居住在纽约市时，穆乐尼和特登在 1971 年曾多次合作在全国多个培训学校进行专题讲座。他们共同剖析犯罪行为，穆乐尼讲解变态行为的种类，而特登则进一步讲解如何分析犯罪现场的证据来确认出凶手的行为是变态行为。

在 1972 年，美国政府设立了新的联邦调查学院，特登申请将穆乐尼调到

学院任教。在他们都调到新学院任教不久，特登和穆乐尼首次将他们的理念作为联邦调查局人质绑架谈判的行为指南。在1974年和1975年中，穆乐尼曾应用这些新技能成功地处理了几起人质绑架谈判案件。他们根据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改编而来的谈判技术首次教授给所有的联邦调查局谈判人员。后来联邦调查局资深侦查人员康·哈斯乐（Con Hassel）和汤姆·斯准司（Tom Strenz）适当修改和补充了这些谈判技术。

同样在1972年，一位名叫杰克·科斯奇（Jack Kirsch）的联邦调查局侦查人员创立了联邦调查局的行为科学部（Behavioral Science Unit）。科斯奇对犯罪心理画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富有远见地赋予穆乐尼和特登在他们职责范围外的一些自由空间进行心理画像研究。在穆乐尼和特登的协助下侦破一些案件之后，犯罪心理画像就声名远扬了。很快美国各个警局都要求学习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哈斯乐和斯准司随后经过培训也开始教授应用犯罪学中的部分课程。

穆乐尼1975年离开了联邦调查局，特登的搭档变成了专职侦查人员迪克·沃尔特（Dick Ault）。在1978年，又变成吉姆·瑞斯（Jim Reese）。同年，特登退休离开了联邦调查局。在科斯奇之后，分别主管行为科学部的负责人是侦查人员约翰·萨夫（John Phaff），1978年是罗杰·迪普（Roger Depue）。当迪普退休后，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负责行为科学部。在联邦调查局早期的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主要思想创始人是穆乐尼和特登，但是他们都没有领导过行为科学部（Teten, 1997）。

在20世纪90年代，行为科学部门（BSU）多次进行重组，并且联邦调查局的画像部门不再沿用以前的名称。目前，这个部门受设在维吉尼亚（Virginia）的匡堤科（Quantico）的“国家暴力犯罪分析中心”（NCAVC）直接领导。“国家暴力犯罪分析中心”最初是联邦调查局画像研究的一个分支机构。

组建完善犯罪心理画像部门或进行犯罪心理画像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机构不只是联邦调查局一家。在美国的许多执法部门都有自己专职的画像部门，并且世界各地也兴建了这样的部门。在美国，大量的联邦机构和州立执法机构都设立了这样的画像部门。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荷兰等国执法部门也设有专职的画像部门。

而且，世界上还有许多私立的公司和团体进行犯罪心理画像的侦查实践及理论研究。最早的一些先例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由退休的联邦调查局画像人员组建，他们有的依靠自身力量或是与在维吉尼亚的学院共同合作来开展工作。尽管先前的联邦调查局画像人员公开宣称，联邦调查局的画像技术和方法在近几年里没有大的变化，但是，有些人已经在重新学习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学习联邦调查局技术的这些人员逐渐会适应、依靠和最终在执法部门和类似的私人机构里重新形成新的画像方法。

现代犯罪心理画像协会

现代的犯罪心理画像团体由各种相关或无关专业背景的专家或非专家人员组成。其中一个处于领先地位的团体叫“行为画像协会”（Academy of Behavioral Profiling），该协会成立于 1999 年 3 月（本书作者就是其中的 5 名创始人之一）。该协会是第一个国际性、独立的跨学科专业团体。该协会主要是针对进行画像工作或正在学习画像的人员而设立的。行为画像协会由 1 个学员部、1 个对画像感兴趣但不是画像专家人员组成的部门、3 个成员部门（行为组、调查组和科学部）组成。正如从《行为画像杂志》创刊号编辑来信中摘录的那样（Turvey，2000）：

行为画像协会的成立是针对行为画像领域的快速发展却非专业化的倾向。由于不满意看到画像专业技术的滑坡，参与行为画像协会的人员决心在这个领域创立一些具有长远及合法性的东西。行为画像协会是由刑事、行为和侦查专家组成的跨学科团体，该协会已经创立了职业道德行为准则，首次写出了犯罪心理画像指南及目前正在进行心理画像常用知识检验。

行为画像协会不仅是一个培训组织或社会组织，还制定了完备的道德行

为准则，协会成员如果违背这些准则将会受到各种相应的处罚。^① 该团体的目标是为进行心理画像工作的各类专家提供组织和支持，并允许会员凭各自的工作质量开展工作。

无论是谁来开展这项工作，也无论专业前景如何，犯罪心理画像本身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职业，而是一种跨学科的技能，同时犯罪心理画像专家也要精通其他专业的学科知识。这种技能才会被壮大和发展。因此，目前全职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人数很少。但是随着人们意识到犯罪心理画像涉及的东西在不断递增，将出现更多的专业培训，文献著作的扩充以及从事犯罪心理画像工作的人士开始相互交流，这种情形就会发生变化。

参考文献

1. Adelson, L. (1974) *The Pathology of Homicide*, Springfield: Charles C. Thomas.
2. Bernard, T. and Void, G. (1986)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3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Brussel, J. (1968) *Casebook of a Crime Psychiatrist*, New York: Bernard Geis Associates.
4. Cheyney, E. P. (1988) "What is History", *University Archiv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76, cited in Novick, P. (1988) *That Noble Drea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46.
5. Dana, S. and DiMaio, V. (1998) *Handbook of Forensic Pathology*, Austin, TX: Landes Bioscience.
6. DeForest, P., Lee, H., and Gaensslen, R. (1983) *Forensic Science: An*

^① 行为画像协会不隶属于或挂靠任何大学、组织或团体，因此也不会像前面几种机构那样容易受政治影响。在专业团体内制定客观标准和方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另外，行为画像协会的大多数道德准则毫无例外地依从于刑事团体中的准则：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结论进行撒谎、不能剽窃他人的思想成果、要保持公正性等。但是，其中有几条准则更为重要：要求行为画像协会向合适的授权机构或专业组织报告某些人员缺乏职业道德的行为来确保专业团体的性质和标准；如果行为画像协会会员有理由认为这些信息不能在法庭上出示的话，会员应该尽力告知法庭那些相关证据的性质和含义。连同其他道德准则，这些准则保证行为画像协会会员不能容忍其他任何刑事专家的非道德行为。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将会具体讨论与职业道德有关的问题。

- Introduction to Criminalistics, New York: McGraw – Hill.
7. DeHaan, J. (1997) Kirk's Fire Investigation, 4th ed. ,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 Hall.
 8. Depue, R. , Douglas, J. , Hazelwood, R. , and Ressler, R. (1995) "Criminal Investigative Analysis: An Overview", in Burgess, A. and Hazelwood, R. (Eds.), Practical Aspects of Rape Investigation, 2nd ed. , New York: CRC Press.
 9. Dickman, T. , Savitz, L. , and Turner, S. (1977) " The Origin of Scientific Criminology: Franz Joseph Gall as the First Criminologist", in Meier, R. F. (Ed.), Theory in Criminology,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pp.41 ~56.
 10. DiMaio, D. and DiMaio, V. (1993) Forensic Pathology, New York: CRC Press.
 11. Ellis, J. (1929) Character Analysis, 2nd ed. , Los Angeles, CA: Jean Morris Ellis (selfpublished).
 12. Fosbroke, G. (1938) Character Reading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Features, New York: Garden City.
 13. Geberth, V. (1996) Practical Homicide Investigation, 3rd ed. , New York: CRC Press.
 14. Gross, H. (192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15. Gross, H. (1968) Criminal Psychology, Montclair, NJ: Patterson Smith.
 16. Kirk, P. (1953) Crime Investigation, New York: Interscience Publishers.
 17. Kirk, P. (1974) Crime Investigation, 2nd ed. ,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8. Kirk, P. (1969) Fire Investig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 Kramer, H. and Sprenger, J. (1971) The Malleus Maleficaru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0. Lee, H. (1994)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Taoyuan, Taiwan: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Press.
 21. O'Connell, J. and Soderman, H. (1936) Moder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edited reprint, New York: Funk and Wagnalls.
 22. Reik, T. (1945) The Unknown Murderer, New York: Prentice – Hall.
 23. Ressler, R. and Shachtman, T. (1992) Whoever Fights Monster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4. Saferstein, R. (1998) Criminal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Science, 6th

- ed. ,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 Hall.
25. Sugden, P. (1995) *The Complete History of Jack the Ripper*, New York: Carroll & Graff.
26. Teten, H. (1997) Personal communication to the author, May 5.
27. Thornton, J. I. (1997) "The General Assumptions and Rationale of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in Faigman, D. , Kaye, D. , Saks, M. , and Sanders, J. (Eds.),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Law and Science of Expert Testimony*, Vol. 2,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
28. Turvey, B. (1999) *Criminal Profiling: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vidence Analysis*, London: Academic Press.
29. Turvey, B. (2000) "Criminal Profiling and the Problem of Forensic Individuation", *Journal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2000 1 (2).
30. Wulffen, E. (1935) *Woman as a Sexual Criminal*, New York: Falstaff Press.

第2章 归纳性犯罪心理画像

Brent E. Turvey, M. S.

如果人们没有根据他人提出的前提假设来进行推论，或把仅可能发生的事实看做是确定的事实，或仅把偶然观察到的事情当做经常发生的事情时，那么无数各式各样的错误均可避免发生。

——格罗斯（Gross）：《犯罪侦查学》（1968，p. 16）

有关犯罪心理画像的文献里充斥了大量带有主观、归纳性的画像技术和概念，本章将讨论如何在犯罪心理画像技术中运用归纳推理的方法，以及归纳推理潜在的不足之处。读者应该将本章视为对归纳思想及犯罪心理画像中相关争论的一般性看法，而不是通过任何方法来作总结性分析。本章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帮助读者了解犯罪心理画像中演绎推理方法与归纳推理方法的不同之处。

认可超自然现象

在1981年，美国作家托马斯·哈瑞斯（Thomas Harris）写了一本书名叫《红龙》（Red Dragon）。在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部的协助下，哈瑞斯生动地塑造了一位名叫威尔·格雷厄姆（Will Graham）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这位画像专家利用物证和侦查直觉进入系列杀手的内心世界去并捕获这些杀手。这个故事成功地将犯罪心理画像表述为刑事科学、侦查能力、直觉而最终自我毁灭性移情的综合运用。在1984年根据《红龙》改编的电影《猎人》，在内容上基本忠实于原作，这部电影当时被认为是把尖端的刑事科学与犯罪心理画像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优秀作品。这本著作的电影创作以及后来的续集《沉默的羔羊》尽管在技术细节上欠准确，但均以其中虚构的犯罪心理画像人的神秘、模糊及充满血腥的浪漫生活情节吸引了当时的大批观众。

如今，社会上存在着许多对犯罪心理画像人员的虚构描述。这些犯罪心理画像人员经常被描述成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人，他们依靠自己观察事物的洞察能力，往往根据诸如好与坏这样的主观道德判断，而较少地依据诸如物证和鉴定性的辨别技能等这样的客观考虑来进行犯罪心理画像。小说作家基本上都利用这种描写手法，这也是市场需求使然，读者想要看到的是扣人心弦的情节及充满矛盾、善于思考的人物角色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却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吸引人。

尽管这些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并不自认为具有超自然能力或精神能力，但是画像领域很少有人对这种普遍的社会性看法提出什么异议。实际上，美国电视节目《新千年与画像人员》中的技术顾问中就有一部分是著名的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就我个人的观点，我并不认为这些画像人员具有超出常人的洞察力或其他能力。但是，他们以顾问身份出现在电视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但也往往给电视观众留下他们可能具有这种超常能力的印象。

更添乱的是，一些著名的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公开宣称犯罪心理画像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也就是说，有的人天生就有这种能力，而有的人却不具备。这就引发了一个疑问，即是否存在对犯罪心理画像进行专业培训的必要性问题。

然而，与大众观念即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天生都具有画像能力相反，任何人在犯罪心理画像方面都不存在天生的、神秘的或是不可思议的能力。这与精神能力无关，也不依赖超人。

论证与推理

摆在世人面前的一个疑问是：犯罪心理画像具体涉及哪些方面的能力，犯罪心理画像的方法体系又是依据什么来进行呢？许多情况下，大家都认为犯罪心理画像纯粹是大量经验积累的结果，并作为专业技术而不为外人所知。科克在列举大量经典的例子时，就提出了如下一种看法：

就专业性证明而言，大量经验是如何获取的在法庭程序中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也没有很好地被理解。……经验的多少及从经验当中具体学到了什么其实并不是重要的。

经验并非不重要。但是，人们仅将经验作为画像技术的基础就成为问题。

这至少被看做是思维不敏捷或懒于思考的一个显著标志。

任何根据某种结论或意见进行的犯罪心理画像都是一种推理的过程。当专家们运用这种推理最终认定或确认作案嫌疑人时（或出现其他有关的意见，或对案件提出意见时），他们虽说不能掌握画像所需的全部信息，但至少也应该掌握绝大多数的信息。作为一个出色有效的犯罪心理画像，任何推理都不应被隐藏起来，而应该能将其推理过程解释清楚。

按照这一原则，犯罪心理画像过程如同其他逻辑推理过程，也存在着两种推理方式：其中一种被称为归纳性推理，即通过比较、相关研究和统计分析进行归纳，如同经过临床而积累精神病症状的经验一样；另一种被称为演绎性推理，指基于物证和对特殊作案人的行为过程的调查结果进行推理的方法。特维在 1998 年对上述方式首次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他是根据 1990 年出版的《爵士和学徒》（Knight and Prentky）一书中的性犯罪模式研究中得到启发的。

何谓归纳性推理

现在要了解的是，即便一些受过正式教育的人群也都没有正确理解的归纳性和演绎性推理概念。人们不仅常将这对概念相互混淆，而且还把归纳性推理看做是演绎性推理。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是从一般到特殊，再从特殊到一般进行推理的一对概念，这对概念往往让人迷惑，人们最终是根据定义来运用这对概念。显然，当我们进行假设和进行推理时，如果我们不具备严谨的思维，或对逻辑和推证过程没有充分的认识，我们就会处于危险的边缘。

自从本书第一版出版发行以来，对于什么是归纳性推理和演绎性推理，人们仍然存在着困惑，同时社会上也有一些让人充满疑惑的著作。不仅在通常情况下，就是人们在诸如犯罪心理画像的刑事物证和犯罪指认过程中对此概念运用也是如此。^①毫无疑问，桑顿对这对概念作出了精辟的解释（1997，p. 13）：

^① 犯罪心理画像经常被描述为与归纳性推理相关，道格拉斯（Douglas）曾对此作出定义（1995，p. 34）。道格拉斯认为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运用的分析方法就是归纳性推理。这种错误论述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同并被转用。

像福尔摩斯那样把一般性结论运用在特殊的犯罪现场物证的确认过程都涉及演绎推理。归纳是从一系列的特殊情况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这个结论被称之为前提。这个前提是在一定条件下适用的假设，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情况。相反，演绎是从一般情况推论特殊的个案，在司法实践中演绎过程是普遍存在的。如果假定这个前提成立，那么演绎的结果也是有效的。但是，要知道这个前提是否成立很关键，人们很容易受骗上当，把无效的前提误当做有效。

大多数物证学家对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区别漠然视之。他们没有认识到归纳并非演绎，归纳是前提假设，需要检验和理论修正。他们往往把前提假设看做是演绎法，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因此，当前提假设仍需等待检验证实时，他们常常就把前提假设看做是演绎结果。

学习心理画像的人应该去查找一些有关逻辑、归纳推理、思维批判和演绎推理的书籍进行阅读。这将有利于对眼前问题的理解，尤其是提高进行心理画像的理解力。本书多次强调，严谨的思维和对前提假设进行质疑没有尽头。不要假定任何事物，对一切事物都应持有质疑态度。

那么，究竟什么是归纳推理呢？我们首先要记住，命题是所有论证推理的基本模块。一个命题就是一个结论，这一结论是由单个或多个基本的前提假设而来。前提假设要么正确，要么错误（Walton, 1989, pp. 108 ~ 109）。这与犯罪心理画像中的前提假设类似。

犯罪心理画像包含一系列的犯罪嫌疑人特征描述，这些描述是根据在犯罪心理画像内容中需要解释清楚的前提假设得来的。正如前面已经说明的那样，演绎推理是根据前提假设来进行逻辑推理。如果前提假设成立，那么随后推出的结论必须也是成立的。归纳推理则包括归纳总结或数据论证，这种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不同，在随后得出的结论不成立时，其进行推导的前提假设却可能是成立的。就犯罪心理画像而言，笔者进一步拓宽了包括论证在内的推理定义范围，许多论证者在论证过程中常常假设这些前提都是成立的，但实际却没有去证实这些前提假设是否成立。

归纳性论证促进了前提假设的发展，并产生了多种前提假设形式（Lee et al., 1983, p. 2）。在犯罪心理画像实践中有两种归纳论证方式比较常用：第一种是归纳总结（deductive reasoning），即从特殊到一般（笔者遇到的许多

画像人员都认为这是惟一界定归纳推理特点的方式，达到字典里的含义范围）。归纳总结，就是对某个事件、某个人或小数量事件、人物的观察分析得出有关犯罪嫌疑人特征的结论（Walton, 1989, p. 198）。然而草率地归纳结论往往意味着在以后遇到的类似事件或人物特征将受到最初观察到的特征或样本分析的影响，进而得出似乎一致的结论。

第二种形式是在犯罪心理画像当中普遍用到的数据论证（statistical argument）。数据论证的本质在于数据论证是一种可能性和近似性（Walton, 1989, p. 199）。数据论证似乎听起来不错，甚至更具有说服力，并往往让我们产生好感的一种常用模式。这也是数据论证吸引人的地方之一。但是数据本身却潜在地存在着不可靠问题。

还应该记住，归纳推理可能既包括也可能不包括统计论证，它们彼此并不相斥。

为了说清楚和追求准确性，归纳推理应该包含一些必要的限定词，诸如“通常”、“可能”、“经常”、“许多”、“很少”、“大多数”、“一些”、“极可能”、“大抵”、“总是”、“从不”等。问题在于许多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在没有告诉画像过程最后使用者的情况下，在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宣传他们的推理和结论过程中已经不再使用这些限定词了。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归纳推理并不严谨，相对于演绎推理而言缺乏准确性。不能限定结论和前提假设的其他主要原因在于犯罪心理画像人员的自负和无知；许多画像人员并不真正希望让读者最终知道他们论证过程中的不足，或是暴露不严谨之处让别人来提出疑问和进行指责。

下面是一个通过演绎方式进行归纳推理论证的例子（尽管前提假设和结论都必须是正确的）。

具备适当条件的归纳推理。

1. 前提假设：大多数已知的系列杀人凶手是白种人。
2. 前提假设：大多数已知的系列杀人凶手是男性。
3. 前提假设：大多数已知的系列杀人凶手在气候温和的地区作案。
4. 结论：可能的情形是系列杀人凶手极可能是在气候温和地区作案的白种男性。

同样的例子，由演绎性方式来体现（但过分肯定）。

1. 前提假设：大多数已知的系列杀人凶手是白种人。
 2. 前提假设：大多数已知的系列杀人凶手是男性。
 3. 前提假设：大多数已知的系列杀人凶手在气候温和的地区作案。
 4. 结论：系列杀人犯罪嫌疑人是一个在气候温和地区作案的男性白种人。
- 笔者在查阅到的犯罪心理画像的资料中经常看到这种夸张性叙述。

归纳性犯罪心理画像

多数归纳性的犯罪心理画像又被称做心理症候群的刻画。重要的是，心理症候群（syndromes）就是一系列相关的症状。另一种画像的方法是用一组能集中表现或体现一群个体特征的标记和征兆。对任何症状的临床诊断一般包括：将个体的行为和征兆与过去研究的类似环境下其他个体行为和征兆之间进行比较。心理健康委员会第一次为“心理症候群”命名是在1980年，即“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一命名被正式纳入《精神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DSM-III）。从那时起，侦查术语“心理画像”（Profiling）在法律界学者的眼中慢慢地变成了心理学术语“症候群”的同义词。这种情况的出现在于，归纳性的犯罪心理画像与在法庭上作为判案推论和论证而提出的心理症候群存在着类似性。

对一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画像是根据对一系列犯罪人的特征归纳而成，通过对犯有类似案件人员的相关特征、经验性的和数据统计研究推论得出。归纳性画像特征最好被当做一般性特征来理解。归纳性推理是数据统计或比较分析的产物，具有普遍性意义。因此，这使“归纳”术语更像“症候群组”^①。

归纳性犯罪心理画像往往要根据那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研究，即对那些著名的犯罪人或被囚禁的犯罪人研究后进行描述。这些画像也包括仅根据画像者的实践经验来进行描绘。关于特殊犯罪人的特征，个人的佚事往往被回忆起并被用于作为推理的基础。归纳性画像的结果经常是一个样板形式：一个普通的犯罪心理画像包含某类犯罪人特征的一般性总结。运用归纳性画像技术的人员

^① 当归纳性画像被当做预测性工具来划分潜在的凶手时，归纳性画像不仅组建症候群——其本身就是症候群。想像一下在《精神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中列举哪些接近“系列杀手症状”。考虑到犯罪心理画像在相关领域内研究的不足和人性的本质，这并非好的研究。若回顾一下，请重新翻阅第一章的《巫师的锤子》和西班牙宗教审判。

相信，对某类犯罪人的特征其一般性总结也能适用于某些未知的犯罪人身上。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郭顿（Gordon）1985年出版的关于一个18岁女孩吉格·海登（Ginger Hayden）谋杀案的犯罪心理画像。被害人吉格的尸体在死者的公寓里被发现，身上被刺了56刀：

1. 凶手是一个17岁至24岁间的男性。
2. 凶手以前曾来过被害人的公寓；在杀害死者的那个晚上是经过被害人的同意而进入了房间。
3. 凶手脾气暴躁。

毫无疑问，这个画像结论的第一点就是归纳性论证。也就是说，第一点对年龄的推断结论包含一定的范围或是凶手年龄的平均值。这个推断并不是凶手的确切年龄，而是根据其他类似案例凶手年龄得出的接近值。^① 并且，这个推断结论认为凶手是男性。现场没有令人可信的目击证人，也没有像脱氧核糖核酸（DNA）或精液这样的物证（现场可能存在，但是需要花费一定工夫去收集），这样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妨碍侦查工作。换句话说，这代表了关于犯罪行为的一种预先推测理论（Preconceived Theory），这种理论会导致侦查人员不去考虑凶手是女性。^②

凶手曾经去过被害人公寓只是一种猜测，这种猜测是基于未经证实的前提假设：凶手是经过被害人同意而进入房间。至于认为凶手是经过被害人同意进入房间的结论是对犯罪现场环境的主观判断得出来的；被害人遭受突然袭击死亡而现场却没有门窗破坏的痕迹。这些现场情况将通过完整的犯罪再现和专业的刑事技术来加以证实。这项证实工作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警察和犯罪心理画像人员。无论如何，最后结论的得出也过于肯定，还需要一些合适的解释。

正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笔者根据经验认为，归纳性画像通常涉及推论

① 这是一个归纳性画像的范例。但是这个画像人员可能用类似的一般性归纳来推断某些特殊的犯罪嫌疑人。也就是说，这个画像人员进行还原性推理：从已知的犯罪嫌疑人来推断未知的犯罪嫌疑人。有时作为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当核实其他画像结论时，很有必要通过对所利用的方法学知识来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这种可能性不能被排除的话，那么将会出现其他新的问题。

② 预先推测理论将在第4章中详细讨论。

过程，而这个推论过程的前提本身是被假设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归纳性画像人员不必费心去验证他们提出推论的前提是否可靠，或为了证明某个结论而简单地假设一个前提。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尽管大多数画像人员并不愿承认是这样，其原因在于大多数画像人员并不具备证实他们提出的前提有效性的知识或能力。^①

根据凶手对被害人刺了56刀推断凶手具有暴躁脾气，但是，这个结论仍是归纳性结论并容易令人误解。这个结论说明，只要被害人伤口很多就意味着作案人脾气暴躁。这听起来有点可信，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即使那些具有温和脾气的人内心愤怒经过长期积压，当某件事情激怒了他时，此人也会通过残忍的暴力行为来宣泄自己的愤怒。凶手肯定具有暴躁脾气的判断并不真实。为了更准确地说明此案，作出如下的演绎证明则更具有说服力：“通过被害人身上的56处伤口可以说明凶手对被害人怀有极大的愤怒。”

就此而言，目前用于归纳性犯罪心理画像的数据汇编和数据分析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来源：第一种，对典型案例或对被囚禁的犯罪人其正式和非正式的研究，这些研究是通过连续性的临床和非临床的访谈来进行；第二种，实践经验，画像人员对分散性的佚事（记忆和经历）进行回顾；第三种，大众资料来源，包括大众媒体（例如，联邦调查局承认他们也收集一些新闻报道用来补充暴力犯罪行为的计算机数据库）。

归纳性画像的优势

归纳性画像的模式其优势很明显。首先，归纳性画像是一种非常便于运用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不需要具备针对犯罪行为或犯罪进行调查研究必需的刑事专业知识、教育或培训。这也就意味着那些使用这种方法的人员不必花时间和精力去接受培训。另外，人们不需花费多大力气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能得出归纳性画像。进行归纳性画像能节省大量的时间。归纳性画像是对

^① 参照 FBI 罗伯特·哈兹伍德（Robert Hazelwood）的陈述。在参议院的武装服务协会（Senate Armed Service Committee）针对 FBI 的刑事调查过程的前提假设提出了一连串的质疑时，罗伯特说出这项陈述，而 FBI 对美国战舰“爱荷华”号哈特威格（Clayton Hartwig）死因分析的调查前提假设却没有加以证实（The U. S. S Iowa, 1990, pp. 25 ~ 26）：“当我们（FBI 的犯罪心理画像组）在任何时候进行案件调查时，我们都假设有专家进行调查。他们为我们提供所参阅的证明资料，而这些证明资料正是我们所要参阅的。”

犯罪嫌疑人潜在特征的剪切。

归纳性画像的弱点

在批评家看来，归纳性犯罪心理画像的弱点较为明显。

首先，画像所用的信息常常是从有限的人群样本中概括出来。这些信息并不是与任何类型的案件都有关联。因此，从本质上讲，归纳性画像不是专门对某个犯罪嫌疑人进行的画像，而是对一系列个体特征进行概括。因为收集者的知识和能力大小不一，所以，这些个体中有的适合、有的则不适合作为样本。这些概括若被用来描述或预测某个犯罪人的行为特征，并不具有必然性和可靠性。

其次，正如通常所提及的那样，归纳性画像仅从大众所熟悉的、少量已知的、在押的犯罪人中概括推论出的行为特征。因此，一个归纳性画像不能完全或准确地用来解释目前仍逍遥法外的凶手。事实上，归纳性画像并没有将多数智能性犯罪或有技能犯罪人的特征纳入画像的范围——因为这些犯罪人成功地并多次逃脱警方的追捕。

再次，同任何归纳总结一样，归纳性画像在排除无辜嫌疑人时也存在不确定性。当归纳性画像被某些非专业出身、喜欢哗众取宠的画像人员当做确实可靠的预测工具时，这种殃及无辜的情况就会发生。

最后，从侦查的角度来看，归纳性画像最主要的弱点是它不适合特殊的案例，因而不能作为画像的主要手段。

为归纳性画像结论和观点提供依据的错误前提假设包括如下这些：

1. 不具有犯罪现场再现知识或经验的画像人员对犯罪行为的物证进行解释。
2. 无论是否可能，都将勘查犯罪现场视为浪费时间。
3. 将少数已知的犯罪人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作为未知凶手也应具有的特征进行推论。
4. 或许认为，过去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人若与目前的犯罪人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他们则有相似的环境影响和相同的一般性，有时也有同样特殊的作案动机。
5. 通过对小范围样本的特征和行为的最初数据统计就能对个体行为和特征进行概括和预测。
6. 个体的行为和动机一般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并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等特点。

统计和科学

长期以来，文献中充斥着不准确的统计数据，不仅因为这些著作的论证缺乏科学性，同时从研究中得出的推论也缺乏科学性。正如格罗斯警告我们（1924，p.16），单凭一次观察到的事物不能把它当做通常规则。格罗斯曾中肯地指出（1924，p.16）：

这个问题不是教推论者如何进行思考，这个问题是证实其他人是如何得出推论并且他得出的推论对我们的结论可能有什么价值等。

统计方法的使用或复杂仪器的使用并不能确保某门学科、研究过程和研究发现具有科学性和有效性。数据本身只是数据。它们必须在科学方法中或在假设检验中才能有效，才能让数据本身具有意义和效果。^①

当我们考察犯罪心理画像领域内的归纳数据时，科学方法或假设检验就变得非常重要。在这类研究中，不仅存在着普通归纳中的逻辑性谬误，而且，在已有的出版物中也毫无标准可言。由于某些原因，犯罪心理画像研究不能出现在法庭上，并将其作为专家意见而被引用。

例如，1996年的《刑事科学期刊》刊登了迪耶滋（Dietz）等人写的一篇有关性虐待系列谋杀案的文章。在我们分析这篇文章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迪耶滋等人在犯罪心理画像领域做了一些有意义和有见地的工作，本人也从中受益。他们将所见所闻都写出来并让大家知道，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令人赞赏，这种方式也区别于一般人的做法。因此，无论这种工作的缺陷多么明显，至少他们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文章上，发表出来并参与到以后的研究讨论中，这堪称一种学术探讨。

前面已经说过，迪耶滋等人帮助读者进行下列分析：这篇论文提供了一些个体特征、惯技及20起性虐待系列谋杀案的被害人特征。作者用这种方式安排资料，我们可以把论文看做是对性虐待系列谋杀者的一个归纳性画像。作为根据已知的20起案件的作案凶手得出的一个归纳性犯罪心理画像，这个画像用在侦查和法庭审判中就显得先天不足了。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侦查人

^① 科学方法将在第3章讨论。

员和画像人员容易利用这个以偏概全的研究结论来支持侦查和法庭的观点。但是我们姑且先将这些放在一边，不过多地进行讨论。

这篇论文发表在享有很高声誉的、专供业内人士参阅的刑事科学期刊上。而且，作者有多年的实践经验，享有卓著的专业名望（Dietz et al.，1996）。很遗憾的是，这篇论文在方法体系上存在着基本错误，这种方法体系自龙勃罗梭时代起就在刑事科学领域研究中屡见不鲜。下面我来解释一下：

样本数量少

这项研究的样本数量很少，只有 20 个案例（N=20）。这么少量的样本根本就不能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几乎不能说明已知的许多作案凶手的情况，而这些凶手很容易被认为是这项研究的众多参数的其中一部分。这么少的样本更不能用于对未知凶手判断的参考。

没有对照组

这些数据根本就没有与非性虐待系列谋杀犯对照组中的行为习惯或方式进行比较。这些数据也没有与非刑事犯罪人群进行比较。这些数据更没有与凶手同一地区和人口统计地区的非犯罪人群进行比较（在论文中根本就没有讨论样本的地理学区域）。没有这些比较，数据就不具有说服力，这些数据就没有背景意义，这些数据就被称为“未决悬案”。

可疑的数据来源

迪耶滋等人研究的数据资料是根据国家暴力犯罪分析中心提供的资料。据说这些资料的统计标准是：犯罪凶手是否符合虐待狂特征，以及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同时连续杀害 3 个或 3 个以上被害人。这两个标准是不太令人相信的主观标准，对此标准的解释也很微妙，应由专家来确定此标准。但是，我们也知道国家暴力犯罪分析中心利用新闻报道来补充分析中心的数据库，其中也包含不少的错误（当执法部门向公众发布新闻时，这些新闻报道都有失实的可能）。我们却没有任何办法知道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在阐述和所掌握的数据中那些潜在错误将容易影响到研究结论。

不明确或不完整的结论

迪耶滋等人研究的结论如下：“研究表明，性虐待杀手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系列杀手。这些系列杀手的专业性和犯罪的完整方式给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第一，既然代表一种特殊类型杀手，其样本应该满足研究该样本的内

在标准（即突出他们的特征），这一点却明显没有做到。第二，许多性虐待系列杀手的定义（这是迪耶滋等人的定义）缺乏完整性和相关的犯罪知识。第三，其资料都源于对女性的性虐待系列杀手的记录。第四，论文没有说明，性虐待系列杀手为什么比其他类型的杀手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也没有说明性虐待系列杀手是凭借何种特殊技能逃脱警方追捕的。而警方在追捕许多类型的暴力犯罪凶手时都需花费很大的工夫（更不用说日常的那些杀手了），并且这些暴力犯罪人都对社会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总而言之，尽管迪耶滋等人的研究富有挑战性，但是这项研究却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很遗憾，法律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必须能排除这样的干扰而去探寻真相。

当读者看到任何形式的研究和结论进行严谨思考时，他们将会面临挑战。正如研究人员有责任将他们自己的研究发现准确地、不带任何偏见地表述出来一样，那些读者有责任避免轻信那些不准确的笼统总结和有害结论。

归纳方法的运用

尽管本章看上去主张放弃归纳性研究、方法和推论，但是笔者承认，在科学地引导下归纳性方法也可以合理利用。所谓合理利用，包括在有心理症候的案件中可以用归纳性方法进行诊断和治疗，也包括用归纳性方法进行适当的数据分析、研究。因为归纳推理能使这些事情变得很容易并成为一种可能。

但是，在目前的归纳性犯罪心理画像实践中存在着一些谬误、不足和缺点。这些谬误、不足和缺点在随后得出的结论中被不恰当地利用。因此，在涉及要么是有关侦查工作，要么是有关法庭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问题时均不适用。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在侦查或法律程序过程中的首要责任是不能误导刑事调查以及让无辜的人蒙冤，而归纳性犯罪心理画像却极易铸成上述两种错误。

参考文献

1. Dietz, P., Hazelwood, R., and Warren, J. (1996) "The Sexually Sadistic Serial Killer",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41 (6), 970 ~ 974.

2. Douglas, J. (1995) *Mindhunter*, New York: Plenum Press.
3. Gordon, P. (1985) "FW Police Release Profile of Killer" *Dallas Morning News*, October 4.
4. Gross, H. (192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5. Kirk, P. (1974) *Crime Investigation*, 2n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6. Knight, R. and Prentky, R. (1990) "Classifying Sexual Offenders – The Development and Corroboration of Taxonomic Models", in Barbaree, H., Laws, D., and Marshall, W. (Eds.),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New York: Plenum Press, pp.23 ~ 52.
7. Lee, H., DeForest, P., and Gaensslen, R. (1983) *Forensic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Criminalistics*, New York: McGraw – Hill.
8. The U. S. S. Iowa (1990) "The U. S. S. Iowa: Guilt by Gestalt", *Harper's Magazine*, March, pp.25 ~ 28.
9. Thornton, J. I (1997) "The General Assumptions and Rationale of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in Faigman, D., Kaye, D., Saks, M. and Sanders, J. (Eds.),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Law and Science of Expert Testimony*, Vol. 2,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
10. Turvey, B. (1998) "Deductive Criminal Profiling: Comparing Applied Methodologies Between Inductive and Deductive Criminal Profiling Techniques", *Knowledge Solutions Library*, January. Electronic Publication, URL: http://www.corpus-delicti.com/Profiling_law.html
11. Walton, D. (1989) *Informal Logic: A Handbook for Critical Argument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第3章 演绎性犯罪心理画像

Brent E. Turvey, M. S.

“若要揭示彼此有关联的事实，就要通过揭示它们彼此的实际意义将它们联系起来。从一些偶然性事件中提炼出必然的因素，从特定的前提假设中推导出结论——所有这些都需要进行逻辑推理。”

——西奥多·瑞克（Thodore Reik）：《未知杀手》（1945，p.26）

“犯罪心理画像”简言之就是指根据物证和行为证据对作案人的心理特征进行推论。从遗留在犯罪现场的物证，如作案人的头发和精液等，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可以从中推论出作案人是一位头发颜色特殊的男性，很可能是某一个种族的人。^①同样也可以从行为证据当中推导出作案人的生活方式和个性。

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应是刑事侦查人员的一部分——他们为案件侦查过程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当犯罪心理画像作为悬而未决案件的一种侦查方法时，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应该根据案件分析得出完全值得信赖的推论。心理画像人员也应该将自己的推论与犯罪嫌疑人紧密联系起来，并推动警方对高度怀疑的犯罪嫌疑人有针对性地进行侦查。要使人们明白，演绎性画像（deductive profiling）和行为证据分析法（behavior evidence analysis）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标。

在前两章问题讨论的基础上，人们或许认为，本章极有可能阐述行为证据分析法比归纳性方法的优越之处。有人进一步推测，本章将可能极力推崇行为证据分析法的科学有效性及准确性。但是，任何的自我（ego）都服从于理性。

^① 当然知道物证分析的人也可以得出这种类型的推论，并不仅局限于心理画像人员。考虑到演绎推理有很高的可靠性，这种推论应该是任何画像人员进行推理的核心。

本章不仅避免将犯罪心理画像中的行为证据分析法视为完全科学的和准确的方法，而且，还避免把行为证据分析法当做纯粹的演绎方法。

本章将讨论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思维及这两者与行为证据的关系。但愿读者能理解犯罪心理画像的演绎方法对画像过程具有指导性。也就是说，演绎方法促使侦查人员在各种侦查过程中用全面、整体的方式来看待物证、受害人和犯罪人行为，它的价值就体现在侦查过程的普遍完整性上。

经过内在逻辑关系逐步推论出犯罪人的特点，这对于查明犯罪事实的贡献不言而喻。这使行为证据分析更可能成为犯罪侦查的一个原理，而不是成为一个黑匣子（人们在其中存放一些固定的结论、可预测的结果）。^①这也意味着案件侦查需要更多、更完整的工作而不是可以减少侦查，即要求更多时间、更准确的侦查活动，而不是狭窄、快速地确定侦查方向。

科学方法

当谈到科学方法及科学方法如何运用时，毫无疑问，整个司法领域对此极其无知。费格曼等人（Faigman et al.，1997，p.47）的如下评述相当尖刻，却是让人觉得他很坦诚：

从小学课本到研究生论文，科学方法的对象已经被无数次描述了，大多数著作认为其对象是复杂多样的。但大多数律师和法官们都对此一窍不通。

索恩顿（Thornton，1997，p.14）认为，大多数从事多个科学方法对象的司法参与者不能理解科学是什么，也不能理解如何准确地运用科学方法：

这些从事科学工作的个体很少学习科学方法。当然，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或许边干边学来获取科学方法。大部分科学家都不研究科学方法的运用。

就同一话题，他又写道（Thornton，1994，p.485）：

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的刑事科学家不仅疏忽科学方法，而且是无知……

^① 犯罪侦查就本身特点而言是不可预测的，其原因在于案件事实的发现与案件发生时的顺序颠倒。侦查人员首先意识到案件已经发生，然后从案件结果来倒推案件发生的原因。并在依靠证人、技术、环境和资料时总是以不同的顺序来进行。加之受害人和作案人在动态的环境（案发前、案发中、案发后）中具有不可预测性。

我不相信刑事科学家缺乏对他们使用的科学方法进行说明的智慧，而是由于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要求使得他们不必这样做。

考虑到前面提到的大家对科学方法的忽视与无知，有必要进行一个简要的讨论。科学是说明可观察（自然的和物质的）世界的一个知识体，是用科学方法收集起来的真相集合体。科学方法通过动态的信息收集和验证过程来获取知识。这个过程称之为“实验”，实验包括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从归纳推理的角度讲，孤立的事件被集中和合并起来而形成概括性观点或假设。从演绎推理的角度讲，将普遍接受的规则被用于特定对象的结论。因此在科学里，归纳是推理的开始，是研究的起点。而演绎则形成有效的论证，这一论证是希望得到的结论。

索恩顿（Dr. Thornton, 1997, p. 12）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

科学的古典定义是“被清楚阐明原则的有序知识体”。虽然这个定义能满足多数研究者的目的，但仍需要对这个定义增加一些限定词。例如，普遍附加的要求是，在特定情况下需要进行验证检验，科学就是事情的真相。

大量的假设检验正试图来反驳这些假设。要想使自己信服某个理论或者让其他人赞同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并不困难。然而，一个好的理论必须要经得住伪证的考验。^①

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关于批判性思维有许多种定义。较公认的看法是对推论过程的前提假设不带任何偏见地进行质疑就是批判性思维。这意味着对作为推理基础和其他

^① 在笔者的工作中，经常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作出决定或是解释未知事实，这实际上是集思广益：在一个群体里让大家提出各种观点，然后，再让大家通过逻辑的和推理的方法对这些想法进行讨论，提出这些观点的不足之处。任何一种有力的结论或理论都应该经受这种考验。

正如李昌钰等人（Lee et al., 1983, p. 2）所讨论的那样：“进行事件再现的刑事科学家要遵循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要试图再现发生在犯罪现场的事件，例如，首先是仔细观察和汇集所有已知的事实真相，然后用各种假设去比较哪一种假设更适合所有的事实。通过深入观察发现或是实验证实来揭露其他事实真相，这样才可能得到符合事实真相的结论。”

人观点依据的前提假设持有怀疑的态度，同时对自己的前提假设也应有这种质疑的态度。^①

根据保罗和斯科瑞温（Paul and Scriven）的观点（1996）：

批判性思维是对通过观察、实验、反省、推理或是交流得来的信息进行积极、巧妙的概括、运用、分析、综合和评估的智力运作过程。批判性思维作为信念和行为的指导方针而存在。

批判性思维由两种成分组成：

1. 一种技能，即加工和概括系列可信信息的技能。
2. 一种习惯，即运用智慧将上述技能用于指导行为。

与此相反的情形是：

1. 简单地获取和保持信息（因为这涉及一个获取和处理信息的特殊方式）。
2. 简单地掌握一系列技能（因为这涉及技能需要连续地使用）。
3. 在对技能没有理解的情况下简单地使用这些技能（只作为一种练习）。

批判性思维按其动机不同也有所差别。当动机出于自私目的时，批判性思维常常表现在考虑自己的或小群体的利益。因此，无论它在实效方面有多么的成功，这种批判性思维都有典型的智力缺陷。当动机出于公正和无私的目的时，尽管常被那些习惯于自私目的的人们诋毁为“理想主义化”，但此时的批判性思维仍是高水平的智慧。

令人悲观的是，笔者遇到的大多数学生根本不了解什么是批判性思维、包含的成分以及在解决问题中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事实上，读过本书的读者也并非马上理解批判性思维的概念。这是因为批判性思维本身涉及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即尽管教育者的数量不断增长却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对于提出“为什么”的问题，其反应要么是不耐烦，要么就是含糊其辞。

无论何种问题或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学生的问题不断地受到限制，他们

^① 索恩顿（1997，p.20）提出了一个衡量他人推理过程的基本标准：“刑事科学不能仅从它得出的结论上去衡量；也应该从证据被检验、解释过程的合理性的角度去判断。在书写的报告或法庭证词里，刑事科学家提出的任何观点必须有一个事实和理论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得出的结论就失去了有效性并应嘲笑这个结论。”

只被要求不要再对问题进行质疑，不要进行批判性的思维。只要求他们将老师的权威性意见当做事实来接受。这是一种危险的、自以为是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在侦查中对前提假设进行质疑是任何刑事科学的基本原则。细读本书就会发现，在画像领域中这种危险更加明显。在大学校园里，学生被限制、远离批判性思维也是很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这种讽刺性在于，大学强调给学生最大的礼物是自由的教育艺术，而自由的教育艺术其关键在于教会学生进行严密的推理和批判性的思维技能。任何情况下，那就是教育理论。

在我们看来，良好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是促使犯罪心理画像人员能胜任工作的关键，因此，在我们继续本章或本书的其他章节中深入讨论批判性思维之前，我们需要考虑一些其他因素。我们需要跳出那些由我们的同事、朋友、老师和经验左右着我们的局限思维。无论消息来源是什么，我们都需要对任何假设、前提、论证和已确定的内容等提出质疑。我们需要从简单听讲、做笔记而去接受的旧习惯当中解放出来，并养成向自称无所不知者发难的习惯——不断提出“为什么”。

演绎推理 (DEDUCTIVE REASONING)

从严格意义上讲，演绎推理是论证过程，在这种论证当中如果前提成立，那么结论肯定也是成立的。在一个论证过程当中，结论直接根据假定的前提推导得来 (Walton, 1989, p.110)。正如李昌钰等人描述的那样 (Lee et al., 1983, p.2):

在演绎逻辑中，结论不可避免地从一个或多个前提当中推导得出。如果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推导得出的结论也是正确的。

据说演绎论证是从一般到特殊进行推理。就犯罪心理画像而言，笔者认为，犯罪心理画像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一般行为模式进行认可，而这些一般行为模式往往暗示着某个特殊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但所有这些正如事实真相本身的字面解释一样。

一个演绎推理的例子。

1. 前提：犯罪嫌疑人将受害人的尸体置于偏远的山区。
2. 前提：抛尸地点发现了轮胎印。

3. 结论：如果轮胎印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话，那么犯罪嫌疑人是开着机动车来到抛尸现场的。

注意到如何从这两个前提中得出物质的（轮胎印）和行为的（在偏远地区抛尸）证据的总结，这些证据意味着一个特殊的结论。同时也要注意到这个结论如何在未破案件中暗示着侦查策略（即扩大犯罪嫌疑人可能再作案的区域，从轮胎类型和轮胎间距推测机动车类型）。

演绎性犯罪心理画像法

演绎性犯罪心理画像法（deductive criminal profile）是对犯罪嫌疑人系列特征的描述，这些特征是从一个或一系列相关案件中的物质证据和行为证据推理而来。相关的物质证据往往表明犯罪人的行为痕迹、受害人的特征、犯罪现场特征等，这些特征直接用于支持心理画像的任何推论。笔者提出的这种演绎法画像过程，就是根据上述的直接物质证据、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进行推理的过程。在这个演绎画像过程中重要的是关注犯罪行为的某种特定模式，而不是一般的犯罪行为模式。

另外，笔者认为，理解以下术语对于了解犯罪心理演绎法画像是很有用的：

犯罪心理画像是指通过全面详细的案件分析，对某一特定的或系列的犯罪嫌疑人的侦查及相关特征的评估和描述报告。这一报告建立在犯罪分析、受害人信息以及符合逻辑的证据基础之上，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每一具体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报告（Baeza et al.，2000）。

犯罪分析（Crime analysis）是指对犯罪现场提取的证据进行检验和评估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对某一特定案件或一个系列案件的行为证据形成一个观点（Baeza et al.，2000）。犯罪分析包括科学原则和知识的具体运用，如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批判性思维、分析逻辑和证据动态学等。

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Locard's Exchange Principle）是刑事科学的基础。该原理指当作案人与一个场所或另一个人发生接触时，就会发生物质交换（Safestein，1998）。这个物质交换的结果是当作案人离开时将会在现场或被接触人身上遗留下自身上的某些物质，并且也会从现场或是被接触人身上带走某些物质。

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是对通过观察、实验、反省、推理或是交流得来的信息进行积极、巧妙的概括、运用、分析、综合和评估的智力运作过程。批判性思维作为信念和行为的指导方针而存在（Turvey, 1999）。在法庭分析中，批判性思维包括对物证的有用价值和缺陷进行评估，并在评估的基础上对物证进行检验，得出结论。而不是先确定自己的立场观点，然后只选择那些有利于自己个人观点的证据。

逻辑性分析（Analytical logic）是指对犯罪现场及所有相关的记录文件进行研究后得出逻辑严密、推理严格的结论的能力。逻辑分析首先要在观念上形成假设，这些假设能够被案件事实证实，从而获得验证。这个过程最终结果是从现场证据中很自然地得出案件结论。这样的结论可以被看做是演绎法画像（Thornton, 1997）。

证据动态变化（Evidence dynamics）是指任何被认为故意地改变、移位、模糊或抹除物证的影响。这种影响出现在某一物体被作为证据开始时至案件判决结束期间的任何变化（Chisum and Turvey, 2000）。

其余关于演绎性心理画像法的信息还包括以下内容。^①

法庭与行为证据（法庭疑点分析，Equivocal Forensic Analysis）

正如导言所指出的，一个完整的法庭分析必须在进行犯罪心理画像之前提供全部可靠的物质证据，这样才能确保犯罪心理画像人员所分析的作案人行为及犯罪现场特征的完整性。受害人和用于推断分析的作案人行为也必须有可证实的来源。这些来源包括物证、证人证言或两者的结合。那些没有足够科学知识的人员不能简单地进行这种行为证据的假设或推断。这种假设或推断应该由符合条件的法庭科学家利用公认的犯罪再现技术来完成。

被害人研究

被害人研究是对被害人特性全面的研究和分析：了解已知被害人的每一事件，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如何安排时间，他们如何生存，等等。根据一个被害人特点，可以推断出作案人的动机、惯技及确定作案人幻想行为等。被

^① 关于这种画像的结构和内容的详细资料和定义，请查阅本书的附录“行为画像协会：犯罪心理画像指南”。

害人研究中的部分内容包括风险评估。心理画像人员不仅对被害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活方式的风险系数感兴趣，而且也对被害人遭受袭击时的风险系数，以及作案人对被害人实施犯罪行为时所冒风险的风险系数感兴趣。在行为证据分析方面，对被害人进行评估所花费的时间与推论作案人特征所用的时间大致相当。

犯罪现场特征

能够构成犯罪现场特性的有：犯罪接近方式、攻击方式、控制方式、场所类型、原始场所、性行为的顺序、器械的使用、言语活动及案件预谋的方式等。犯罪现场的特性取决于刑事证据和受害人的研究。因为犯罪现场特征依赖证据，但并不是所有的证据都能收集到手，所以不是所有的犯罪现场特征都能得到确定。在某些系列性案件中，诸如系列强奸或系列谋杀案件，犯罪现场的独特性及相关分析则取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犯罪现场发生变化还是没有发生变化。一个作案人的犯罪现场特征能帮助画像人员辨别出作案人的犯罪惯技行为（Modus operandi，简称 MO）和标记行为（Signature behavior），进而推断出作案人的精神状态、行为计划、幻想和动机等。

演绎性心理画像法的前提假设包括：

1. 不存在没有动机的故意犯罪行为（尽管有时只有作案人知道其确切的作案动机）。
2. 由于每个作案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和动机，应该根据具体案情开展侦查。
3. 不同的作案人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可表现出相同或近似的行为。
4. 考虑到个人行为的天性、人的相互作用及环境影响，没有两个案件是完全一样的。
5. 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行为由于环境和生物学的因素影响而具有独特性。
6. 犯罪惯技行为可能随着时间和实施多起犯罪行为后而发生变化。
7. 同一个作案人在实施多起犯罪行为过程中，乃至在实施一起犯罪行为中都有可能具有多种动机。

尽管数据归纳和经验理论在刚开始时有所帮助，但这些并不完整，最终

可能误导侦查，还可能导致侦查人员的惰性发生——当我们认为已经有了案件的答案时，我们不仅可以据此去收集符合答案的案件证据，而且还可能认为进行全面详细的侦查已经根本没有必要了。^①

在行为证据分析中运用科学方法

科学方法的运用促使画像人员从许多个人偏见（诸如种族、性别歧视、固有观念和个人经验、趣事概括等）中解脱出来。科学方法的运用也让画像人员放弃利用毫不相关但很相似的案件作为解释和推断特殊作案人动机的依据。只有根据手里的具体案例资料中的行为证据得出的行为模型才可以影响到最后的画像结论。这是演绎性犯罪心理画像法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即没有两个犯罪人，或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取决于其成长经历、情感和心理综合动态的发展结果。因此，每个犯罪人都有这种潜质，即按自己的方式去创造犯罪现场来满足其独特的心理和情感需要。纵观犯罪人他们可能会有大致的相似性，但是，演绎性犯罪心理画像法能够帮助我们从不同个体犯罪人所共有的特征中找出差异性。

通过物证和行为证据分析犯罪行为模式，然后从这些行为模式中推断出犯罪嫌疑人特征的过程被称为“行为证据分析”（BEA）。读者不要认为作者正试图把行为证据分析冒充为科学。作为人类需要的起源和行为的动机，若要判知或预测实在是太复杂了（参见第16章）。但是，行为证据分析之始的三个步骤（刑事分析、被害人研究和犯罪现场特征）绝大部分是建立在犯罪现场再现的科学原则和已确认的刑事科学基础上。这三个步骤是犯罪现场再现的一种解释语言，它要说明发生了什么（what）、是如何发生的（how）。第四个步骤，通过对物证和行为证据的综合考虑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演绎推论，其过程仍然充满着艺术性，因此，演绎画像得出的结论只是一种专家的意见而不是科学的结论。上述四个步骤最终构成完整的嫌疑心理画像，整个过程尽管不能称之为科学，但仍然得益于科学方法的使用。

科学方法一般被视为具有下列的基本步骤：观察、收集资料、推测、假设检验和形成结论（Lee et al.，1983，pp.1~3；Faigman et al.，1997，pp.47~

^① 这是一种预测理论的典型。预测理论将在第4章详细讨论。

80)。以下是科学方法在演绎性犯罪心理画像法（行为证据分析）中的使用：

1. 详细说明问题（即观察）。对于一个具体的案例，评估已知的刑事证据和行为证据、被害人研究，确认已知的犯罪现场特征。

2. 收集具体信息（即收集资料）。根据步骤一，确定还需要进一步收集哪些证据和信息，分析或检验有用的法庭信息和行为证据、被害人研究和犯罪现场特征。

3. 建立一个初步假设或解释（推测）。形成书面的初始评估（threshold assessment）（参见第5章），包括已知的物证、已知的被害人研究、已知的行为模式（即惯技和标记）、可能的动机和人格特征的信息。将这些已知信息作为协助最终进行心理画像的一种侦查工具。

4. 通过实验来验证假设（假设检验）。在对所有已获取的物证与行为证据进行完整分析和解释之后要重新评估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同时，当出现任何新的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并随之产生新的案情分析时，也要重新评估犯罪嫌疑人的特征。还应征求法庭刑事科学家对案件疑点的看法和观点。

5. 诠释结果。根据渐已明朗的案件证据来解释犯罪人特征的有效性。抛弃那些没有任何物证和行为证据支持的犯罪人特征而保留有效的其余特征。

6. 提取结论和根据需要适当修改假设（形成结论）。寻找表现犯罪人特征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包含心理的、情感的、个性的信息及社会关系信息，而这些信息是从物证和行为证据、被害人研究和犯罪现场特征的总结中推论出来的。这些行为模式组成未知犯罪人的画像。画像中的任何要素都应该是根据可论证的行为证据而得出。

再次强调，对上述方法不可有任意的想像扩展，这意味着行为证据分析的整个过程都具有科学性。我们不能把任何涉及解释本质上复杂多样的人类行为的学科称其为一门严谨的科学。但是，行为证据分析仍是通过严密推理和逻辑性进行的。

演绎画像是过程而不是结论

人们通常对犯罪心理画像的最大误解也许就是认为犯罪心理画像的主要目的是得到一个固定的、硬性的结论，就像临床得到的诊断书一样。这些临床得到的诊断结果可能被运用到案件或系列案件侦查之中，说出谁是犯罪嫌

疑人。一个长期存在但最后证实是误解的信念就说明了上述情况。这个信念是形成一个描述典型系列杀手、强奸犯，甚至是犯罪现场的普遍行为或心理模型。《犯罪分类指南》（Burgess et al.，1997）和《系列杀手》（Norris，1988）等犯罪学教科书就不恰当地进行了这种刑事临床诊断，并继续坚持这种令人遗憾的做法。

心理画像的临床观点认为，犯罪人的行为症候以及相关的刑事分类都可以作为一种用于临床诊断的参考，这种临床诊断的目的是推荐治疗方案或解释原因。如果某人既是法庭心理学家又是法庭精神病专家，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但是，对犯罪人进行矫治的目的与犯罪心理画像的目的毫不相干。因为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同时是临床医生的人很少见，并且有医学知识背景和培训经历的人也很少。我们应该接受这样的事实：不是每个临床范例都适合犯罪心理画像，而且临床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但画像人员却是进行案件侦查。

人类总是在不停地学习、变化和成长。人类也受时间、空间和相互关系的影响。因此，通过演绎推断出的心理画像不能总被视为精确的、固定的、不变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了新的证据和相关案件，画像结果也必然随之发生改变和进一步修正。也就是说，当发生了一起新的案件，发生了一起新的袭击事件或是发现了一具新的尸体，收集并分析了新的证据时，犯罪心理画像的完整性就应该重新评估。演绎性心理画像法在于不断地学习。新的信息不是被用来支持旧的画像结论，不是用来划分犯罪人的类型，也不是对侦查假设作出合理化的解释，而是用来对身边发生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画像。因此，演绎画像和行为证据分析不应该被当做一种固定的结论，它是一种进行时的、动态的、质疑的过程。对犯罪人的行为分析也是随着时间推移出现的变化而变化的。

演绎画像的主要目的

与临床医生治病救人形成对比，犯罪心理画像人员的首要责任是为司法服务，在案件侦查中发现事实真相。嫌疑心理画像者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公众安全，而临床医生的首要职责是治疗病人。从道德职责而言，行为证据分析的目的与临床医生的目的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

任何犯罪侦查都可以从这一假设开始，即地球上的任何人都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是普遍存在的。演绎性犯罪心理画像法其主要目的是利用行为证据分析来帮助不同阶段的案件侦查，从犯罪嫌疑人普遍性特征中提炼出更确切的犯罪嫌疑人特征。它并不能具体指定某一犯罪嫌疑人，或把某个犯罪嫌疑人从多数犯罪嫌疑人中甄别出来。但是，演绎画像法能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大致个性特征。这种演绎方法能用来指导案件侦查人员、律师、法官和陪审团等（参见第 16 章，pp. 29 ~ 30）。

画像的各种阶段

行为证据分析有两个相互独立但同样重要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划分不仅要依据得出结论的方法，而且要依据不同的目标和顺序。目标和顺序都由必要性所决定，这种必要性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需要心理画像者的技能。这两个阶段一个是侦查阶段，指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以前；另一个是审判阶段，指犯罪嫌疑人在法庭受审期间。

侦查阶段吸引了大量的媒体关注，当然也是流行小说的重点内容。当人们一提起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就会想到那些未决的系列杀人案，想到那些在偏远的山区里刑事科学家们正费力地工作、尽力恢复已经腐烂的尸体原样；而心理画像人员则被想像成远离社会、陷入深思、洞察着他们所要猎寻的犯罪嫌疑人的内心世界。这些由小说和媒体所呈现出来的观点不仅完全偏离事实，而且也不全面，只列出了等式中的一半。

审判阶段是行为证据分析的第二部分，但在媒体和出版发行的小说中都很少受到明确的关注。尽管同样重要，但由于这个阶段缺乏侦查时那种对系列犯罪逼真的心理画像所带给人们的无尽想像和戏剧效果，也就缺乏了一定的吸引力和卖点。

侦查阶段

犯罪心理画像在侦查阶段主要通过行为证据分析对已发生案件的未知犯罪嫌疑人进行行为方式的分析。当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物证不能充分推动侦查过程继续进行下去时，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往往就会被召集起来协助侦查暴力性案件、性侵害罪案件和抢劫案件。当警方邀请画像人员参与案件侦查时，往往是他们已经苦苦等待了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因为他们当时不

懂得什么是犯罪心理画像，也不知道心理画像对侦查有着怎样的辅助作用。

主要目标

1. 在案件侦查中排查犯罪嫌疑人，缩小搜索犯罪范围，并帮助警察确定优先选择哪些犯罪嫌疑人展开侦查。
2. 通过确认犯罪现场证据和行为模式（如惯技和标记等）来串并案件。
3. 对一般犯罪行为（如骚扰、尾随、偷窥等）逐步升级到更暴力或更血腥的犯罪其可能性进行评估。
4. 为侦查人员提供一些与侦查相关的指导方针和策略。
5. 帮助警方保持整个侦查工作步入正轨而不走偏。

审判阶段

犯罪心理画像在审判阶段主要通过行为证据分析对已列为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时是已被认定的被告人）的行为进行分析。这种情况发生在聆讯和审判中（包括定罪、判刑和上诉阶段都是使用画像技术的合适阶段）。

主要目的

1. 参与对提交法庭的具体犯罪物证进行价值与特性评估过程。
2. 参与进一步的询问或讯问策略制定过程。
3. 帮助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幻想和动机。
4. 帮助分析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前、作案中和作案后（即作案计划程度、懊悔的证据、防止事情败露的准备行为等）的心理状态。
5. 通过对惯技和标记行为的分析，阐明并案审理的理由或根据。

思维策略

要想最大限度地达到行为证据分析的目标，犯罪心理画像人员首先要有批判的、分析的思维能力。前面已经讨论过，画像人员必须具备强烈、经受历练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及客观、系统地分析案情的方法。他们必须有热情去探究细微之处，愿意对所有的前提假设提出质疑，并对刑事科学和犯罪侦查技术相当熟悉，以至于能提出合理的、正确的疑问。

除此之外，犯罪心理画像人员还必须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他们必须知

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并对自己的个性有全面的认识。他们必须能够辨别自己的需求、爱好、愿望和道德观，借此他们才能清楚地洞察一个特定犯罪嫌疑人的需求、爱好、愿望和道德观。这意味着心理画像人员必须知道他们面临的是一类个人满足水平极不规范的犯罪群体，他们所有的问题都是针对受害人的生活，也为了解决他们自己的生活。心理画像人员必须知道他们的力量、恐惧、幻想和弱点。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更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

画像人员在不具备自我认知和批判性思维技巧时就将自己的看法、需要和道德观转到画像中将具有较大的风险性。没有经过专业教育和培训的画像人员得出的画像结论普遍存在着对画像人员自身需要的描述明显多于对犯罪嫌疑人行为模式的描述。为了避免这种不足，并让画像过程具有严谨性、可分析性和客观性，画像人员被告诫必须遵守如下思维策略（Depue et al., 1995, pp. 119 ~ 123）：

生活经验

通常人们认为年龄的增大将导致经验的增多，经验又产生智慧。事实并非如此。世界上有许多人不能从他们自身的错误或成功之处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些人最终会否认任何形式的智慧和应用知识。生活经验不等同于专业知识或观察力。而且，所有的侦查人员和司法人员的经验水平并不完全相同。我们试着比较以下的差别点：

1. 15 年的执法经验。
2. 15 年负责凶杀案的刑警。
3. 15 年负责乡村凶杀案的刑警。
4. 15 年负责性犯罪案件的刑警。
5. 15 年负责大都市警察局性犯罪案件的刑警。
6. 7 年的治安警，8 年巡警。
7. 3 年巡警，12 年的狱警。

尽管每个例子都说明有 15 年的执法经验，但是那些经验的种类和性质却是有很大差别的。科克（Kirk, 1974, p. 16）对此有句精辟的总结：

经验的多少比较起来并不重要，关键是人从经验当中学到了什么。

问题在于，我们开始运用侦查或执法经验，或接受他人的某些经验作为我们推理的基础之前，我们必须了解每种经验的确切性质。必须对来自经验的知识进行衡量和比较，要恰当地使用这种经验，而不能不加区分地运用。

直觉

毫无疑问，任何形式的经验积累都将导致直觉的产生。直觉是在没有借助推理的、理性的、可解释清楚的过程就能知道或确信某些东西。如果因为我们有一种信念，或者我们仅知道某些东西却不能用逻辑的方法说清它，这时的直觉本身就是罪魁祸首。因为直觉和内脏的本能反应完全可能是偏见、成见、固有观念和无知的延伸。它们可以极大地破坏侦查工作。除非能用推理的、可解释清楚的论证过程说明它们的内在联系，否则这些直觉就应该被排除在侦查策略、建议和最终的画像结论之外。

桑顿（Thornton，1997，p.17）对用直觉或经验替代演绎逻辑得来的科学事实有很清楚的阐述：

经验既不是真相的同伴也不是真相的敌人。经验是一个有用的东西，但它不应该作为一个面具去阻挠合理的科学审查，审查的种类通常与各种科学证据相对应。阻挠合理的科学审查其做法缺乏专业性和科学合理性。……经验应该为专家提供事件的时间、方式、原因、人物和事件五大素材。经验不是让专家减少责任感，而是让专家有更强的责任感去寻找可用于辨别的科学事实而形成判断意见。

偏见

在案件侦查阶段，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切记对于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信息无论何时都要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有关犯罪嫌疑人的信息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画像的结论，致使画像结论像经过专门裁剪一样。正如伯吉斯（Burgess et al.，1988，p.137）等人所讨论的那样：

在案件资料中，画像人员不想要的信息是与潜在作案人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不自觉地使画像人员产生偏见并使画像人员得出的画像结论与这些潜在作案人相吻合。

这是一条非常好的指导方针，但是在实际案件的侦查中，这条方针不是总能得到遵守。例如，在没有陌生人参与的案件中，作案人也许是发现死者

尸体的人（如邻居、配偶或亲戚）。在收集和检验犯罪现场信息和被害人情况时，与受害人有上述关系的人的详细情况是不可避免要碰到的。这种情况有可能使画像人员产生偏见，这就是为什么画像人员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必须避免产生偏见的原因。通过根据客观情况得出的信息和对演绎推理技巧的精益求精可以消除这种偏见，也可以通过画像人员请同行对自己工作业绩和方法体系的自由评价来消除这种偏见。

避免道德评判

永远不要在心理画像中使用诸如“病态”、“疯狂”、“发狂的”、“卑鄙的家伙”、“毫无价值的”、“没有道德的”等术语来描述犯罪人。这些术语代表了画像人员根据个人的主观感受而得出的道德评判。在犯罪心理画像中不应出现个人的主观感受。当描述一个犯罪人特征时，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是避免使用或尽可能少地使用形容词。

广开思路

思路开阔并不与批判性思维相矛盾。广开思路意味着画像人员不受偏见、成见或某种先前理论学说的影响。广开思路意味着以开阔的眼界对待所有可能的事物并不对任何事物进行种种假设。广开思路其中包括接受两种非常重要的现实：首先，任何行为，在我们看来无论多么令人排斥、令人厌恶或不可思议，都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其次，一些人的所作所为可以从他选择的道德观来推断，因为在他们的道德观里的有些价值体系和快乐观念的联想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陌生的。这种观念或联想的一个例子就是伤害他人在犯罪人看来是感到快乐并感觉相当好。

广开思路的关键不是简单地认为所有观念和理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样重要、同样具有优先权，而是不让我们自己的联想、偏见和成见掩盖住事实的某种可能性。一旦可靠、合理的东西在开阔的思路中占据了位置，那么批判性思维就必须开始了。

像犯罪人一样去思考

没有两个犯罪人思考的问题是完全一样的。不同的特殊需要、经验和联想激发着每个人。因此，我们并不可能会像一般犯罪人那样去思考问题。一个好的思维策略就是要尽量了解当前犯罪人的知识和技能水平。通过对犯罪

人的理解来验证其所做的行为，并从其他犯罪行为的环境和相互关系来试图理解犯罪人作出的每个行为所要满足的某种需要。一起单独的犯罪行为，一旦脱离了犯罪行为的环境，将不可能含有任何有用、合理的意义。只有那些特殊犯罪行为模式和总和才具有一些说明意义。那些行为的总和可以用来解释一些特殊行为的动机指向。

常识

常识最佳定义为自在的良知判断。换言之，常识是指个体在经常遇到的情况下有助于作出决定的知识积累。常识不是大家所共有的。社会所接受的、合理的、所期望的东西往往不能从一国迁移到另一国，一个州迁移到另一个州，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邻居间相互迁移，甚至从一个人迁移到另一个人。因此，用我们自己的常识、眼睛和信念去观察、审视他人的行为可能是一种荒谬的冒险。因为它错误地假定犯罪人和画像人员是在同一文化氛围中生活的人，所以应该对什么是常识拥有同样的见解。

参考文献

1. Baeza, J. , Chisum, W. J. , Chamberlin, T. M. , McGrath, M. , and Turvey, B. (2000) "Academy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Criminal Profiling Guidelines", *Journal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1(1).
2. Burgess, A. , Burgess, A. , Douglas, J. , and Ressler, R. (1997) *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San Francisco: Jossey - Bass.
3. Burgess, A. , Douglas, J. , and Ressler, R. (1988) *Sexual Homicide: Patterns and Motive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4. Chisum, W. J. and Turvey, B. (2000) "Evidence Dynamics: Locard's Exchange Principle and Crime Reconstruction", *Journal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1 (1).
5. Depue, R. , Douglas, J. , Hazelwood, R. , and Ressler, R. (1995) "Criminal Investigative Analysis: An Overview", in Burgess, A. , and Hazelwood, R. (Eds.), *Practical Aspects of Rape Investigation*, 2nd ed. , New York: CRC Press.
6. Faigman, D. , Kaye, D. , Saks, M. , and Sanders, J. (Eds.) (1997)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Law and Science of Expert Testimony*, Vol. 1,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
7. Kirk, P. (1974) *Crime Investigation*, 2nd ed. ,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8. Lee, H. , DeForest, P. , and Gaensslen, R. (1983) Forensic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Criminalistics, New York: McGraw – Hill.
9. Norris, J. (1988) Serial Killer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0. Paul, R. and Scriven, M. (1996) " Defining Critical Thinking", Draft statement for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Excellence in Critical Thinking. www.criticalthinking.org
11. Reik, T. (1945) The Unknown Murderer, New York: Prentice – Hall.
12. Saferstein, R. (1998) Criminal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Science, 6th ed. ,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 Hall.
13. Thornton, J. I. (1994) " Courts of Law v. Courts of Science: A Forensic Scientist's Reaction to Daubert", Shepard's Expert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Quarterly, 1 (3), 475 ~485.
14. Thornton, J. I. (1997) "The General Assumptions and Rationale of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in Faigman, D. , Kaye, D. , Saks, M. , and Sanders, J. (Eds.),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Law and Science of Expert Testimony, Vol. 2,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
15. Turvey, B. (1999) Criminal Profiling: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vidence Analysi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6. Walton, D. (1989) Informal Logic: A Handbook for Critical Argument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第4章 案件评估

Brent E. Turvey, M. S.

根据错误前提对事实进行不正确的陈述实际上比推理过程中缺乏演绎方法的危害性更大。

——西奥多·瑞克（Theodore Reik）：《未知杀手》（1945，p.35）

当接手各种类型的刑事案件时，侦查人员所要处理的现场记录和信息量浩如烟海。因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进行现场记录的侦查人员通过标准的、系统的方法对之去伪存真。案件评估的目的就是完成上面提到的那一点及提醒侦查人员如何将这一过程进行下去。案件评估是有关发展性策略、案件侦查计划的内容。结合侦查人员及刑事科学家的判断性意见，将案件评估恰当地纳入整个侦查过程，好的案件评估策略能有效地帮助侦查人员作出有关调查过程和随后犯罪嫌疑人排查顺序的决定。

本章节将主要讨论两个案件评估策略：刑事疑点分析和初始评估。

刑事疑点分析

在此的“疑点”（equivocal）是指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现象，即某事物可能有两种以上的解释，或对事物的解释模糊不清。“刑事疑点分析”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对所有物证进行分析，并对所有相关的假设和结论进行质疑。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在分析案件时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进行刑事疑点分析。

除非对物证进行分析并作出正确解释，否则，任何人都不能得出一个全面准确的心理画像结论。心理画像人员对被害人和犯罪人行为证据的分析需要经过物证的考查来加以证实。行为证据的分析过程就是犯罪心理画像的过程。一名称职的心理画像人员必须能够用他自己的刑事科学知识及其他刑事

科学家和同行的相关知识来证实物证的准确性和含义。^① 如果物证和随后进行的犯罪证据考查缺乏准确性和价值，那么在此基础上得出的任何画像也将同样缺乏准确性和价值。

目的

刑事疑点分析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助于让心理画像人员保持客观立场以防止他们进行调查假设。许多画像人员都怀有这样的假设：他们被邀请参与协助的案件都是经过警方全面、认真的调查。他们假设警方和犯罪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曾经合作过，对被害人、犯罪人行为和犯罪现场特征已经形成了一致性、公认性意见（即现场是否是第一现场，是否是抛尸地点，在系列谋杀案件的被害人是否都认识作案人等）。许多画像人员都没有认识到对警方提出的假设或者是刑事技术人员得出的结论进行质疑的必要性。画像人员认为这样做是一种不好的行为方式，有的甚至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其实不然。

进行刑事疑点分析的理由很明显。它有助于防止画像人员形成想当然的调查偏见。当现场勘验人员、刑警、犯罪现场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参与案件调查的人员没有根据案件事实就得出一些意见时，这种先入为主的调查偏见现象就会发生。这些意见，大多数是根据主观生活经验、文化偏见及个人偏见得出的，并能影响到调查人员是否能正常识别和收集犯罪现场的某些物证。先入为主的调查偏见也能影响调查人员是否能正常考虑到有关案件真相的某些其他意见。

格罗斯在《刑事侦查》中曾对相似的“预先推测”进行过阐述。他的阐述很有意义，在此将这些内容原文摘抄如下。尽管这本书是一个世纪以前出版的，但格罗斯的著作仍然还有较高的参考价值（Gross, 1924, pp. 10 ~ 12）：

第四部分——预先推测

在刚才描述的方法中还应展开并行调查，并行调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相互控制，是避免产生预先推测的最好（有人认为是惟一的）方式。而预先

^① 演绎性心理画像法作为一门刑事科学，需要广泛的刑事和侦查知识，并非所有的画像人员都能具备这些知识。许多画像人员仍根据所谓的研究和统计知识归纳性思维。一个画像人员即便精通归纳方法，也有的仍不能称他是一个合格的刑事科学家。这一点往往也正是法庭、调查机构和画像人员没有考虑到的地方。

推测是所有案件调查最致命的敌人。预先推测比那些工作热情高涨的侦查人员更加具有危害性。这些工作热情高涨的侦查人员最容易形成预先推测。那些工作不热心的侦查人员并不怎么关注案件，一般也就形不成什么固定思维模式，只是顺其自然地办案罢了。当一个侦查人员满怀激情地钻研案情时，这个侦查人员可能会找到某种参考点来思考问题，问题在于，这名侦查人员可能夸大了这一点的重要性，或者误解了这一点。侦查人员对此形成了一个难以摆脱的观点。在认真检查我们自己想法的过程中（我们几乎在别人身上发现不了什么，也不能观察到他人的纯精神特征），我们将有许多机会研究“预先推测”是如何在我们头脑里产生的。我们将惊讶地发现，那些毫无意义的、纯属假设性的偶然叙述是怎样产生了一个推测。尽管我们早已认识到：产生这个推测的根源是多么荒谬，但我们却不能轻易地根除这个推测。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也不会发现什么。但是，当我们排查作案人时、当我们去勘查现场的路上时，我们会有意无意地作出某种推测。也并非毫无根据，或是别人一个偶然性建议，或是别人一个肯定的表情，或是上千个偶然意外的事件，尤其当我们忽视眼前的结论与预先推测存在着联系，而这些预先推测没有法律根据，也没有经过事实来加以证实。只是根据表面上的联系，你可能听过类似的故事，也许你以前已经遇到过这样相似的案例，长期以来，你认为事情的真相必将如此这般，这就足够了，你再也不能用质疑的思考来研究案件的详情。

并非所有人都如此，但常有人如此：选择一种既定原则，如同假设：“如果某种情况下，M和N都已被证实，那么，某事若发生在同样的环境下或同样的方式中其结果也必须相同。”这个推理可能很好，但由于某一原因或其他原因，有关M和N的证据长期得不到证实，乃至最终也未得到证实。而所谓证实的观念仍存在于脑中，结果是作为依据的观点事实上从未得到过证实。

另一种经常发生的情况是：预先推测理论之所以发生错误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观察就错了。就视觉而言，根据肉眼观察物体，物体可能会呈现出错觉现象。同样，观察人员从一个错误的角度来审视事件——而这个错误角度观察人员并没有改变，也会出现错误的预测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最细微的事情，如果不确切观察，都可能有很大的危害性。假设偏远地区报告

发生了一起纵火案，不管这个纵火案真实情况如何，就会有人对这个现场产生设想。例如，有人想像自己根本没有亲眼目睹的房屋位于道路的左边。总部获得有关信息之后，对现场的观念才会变得更加详细和不可动摇了。在头脑的想像中，整个现场和一些次要细节都被呈现出来了，但是在头脑中总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放置在道路的左侧。这个观念通过某人深信房屋就在路的左边，产生的所有疑问通过有人确实见过房屋就在路的左边位置上而得到证实。但是，假设这个房屋真实位置在路的右边，并且这个错误根本就没有得到校正，那么，因假设房屋位置而得出的结论或形成犯罪案件的推测在一定程度上就混淆了侦查的思路。

这一切都源自主观上的臆断，而这一点在每个人身上都难以避免。更要命的是办案当中的想像，即总想从案件有限的信息中获得更多信息，其实案件本身根本提供不出那么多信息。人们通常认为，侦查人员不会愿意因有虚假的信息改变或夸大案件的本来性质。但就人性而言，人恰恰崇尚猎奇而不屑于平常的日常琐事。我们喜欢寻找本身并不存在的浪漫特征，甚至比起日常生活事实我们更喜欢奇异和恐怖内容的描述。每个人都是这样，尽管在表现程度上有的人会突出些，有的人轻微些，但的确就是这样。对此我们可以找到上百件证明包括我们所最爱读到的、听到的和什么消息不胫而走等，都表明大多数人出生时就已经具有了夸张的倾向。夸张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危害性。我们进行夸张的倾向往往是美化我们周围的事物。如果没有了夸张，我们将缺乏美感和诗意。但在刑事专家的职业中，专家们都必须要积极、认真地排除含有任何细微夸张成分的观念。否则，这些刑事专家在其领域内将毫无价值可言，甚至对人类也具有危害性。我们必须坚持认为刑事专家不应该有夸张行为，他应该用这种态度持久地来批评自己和他人的工作；如果刑事专家没有发现夸张的蛛丝马迹，他应该细心地检查自己的工作。在我们看来，夸张是潜移默化的，没有人知道一旦有了夸张的痕迹它会发展到什么严重程度，并在什么地方结束。侦查人员所能采取的惟一补救办法就是更仔细地观测自己，用心去思考工作，并消除任何含有夸张的苗头。正因为侦查人员需要刚毅和果断的反应力，人们发现优秀的侦查人员也稍微会对虚构的东西感兴趣：侦查人员将通过对自己认真的观察来感知并发现虚构的东西，并遵从

严格的科学规律来排除这些虚构的东西。

由于预先推测的普遍存在，我们必须注意，在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参与案件调查之前，物证的识别、记录、收集和检验过程可能是不完整的、没有被充分认识，或带有偏见，或不合格，甚至也受到刑事经验的影响。尽管这看上去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但这绝不是针对司法工作者的观点。侦查人员必须重视那些称职的犯罪心理画像人员提出的要求，即更精确地证实各种假设的来源，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信念去认定某些东西。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考虑到一个画像产生的调查结论可能影响法庭的审判结果，画像人员要求对信息的来源渠道进行质疑怎么说都不过分，因为画像人员正是依据这些信息得出有关结论的。

如果一个案件调查者、侦探或律师要求一位画像人员评价一起强奸杀人案件，画像人员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询问他们如何确定这是一起强奸案以及如何确定这是一起杀人案，然后画像人员根据他们的回答来追溯案件情况，并对他们提出所有的假设和结论进行质疑。^①

在叙述完上述原则之后，笔者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是：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所有的刑警和警方调查人员都受过刑事科学方面的基本培训吗？当他们形成对案发现场的调查意见时，他们被要求过与犯罪实验室的技术人员一起合作吗？他们将如何针对可能性很大的犯罪嫌疑人展开侦查工作？他们验证自己的侦查假设吗？但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否定的。

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所讨论的那样，在审判和警方人员中刑事科学知识和培训的水平相当低（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1997）。在一些案件中，审

^① 画像人员有责任询问案件的相关情况并对所有的假设进行质疑。心理画像需要得到这样的帮助。毕竟，如果一个调查机构仅希望一个画像人员来认可目前的侦查思路，那么画像人员就要远离这样的调查机构。就调查机构是否想侦破手中的案件，他们对被画像人员所询问的问题作出的反应是一个非常好的检验方式。同样，对律师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检验方式；那些追寻客观、独立的画像人员希望这些调查人员或律师能告诉自己需要知道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想要听到的东西。那些对这些观念不感兴趣的调查人员或律师应该被当做瘟疫一样回避，因为接触他们只能让那些有道德感的画像人员产生痛苦。

判和调查人员的刑事科学知识几乎没有。^①

霍瓦斯和密森（Horvath and Meesig）在1996年总结了这种情况，笔者也赞同他们的结论，即在犯罪调查中物证很少被使用。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为调查人员提供有效的证据，而是已提供的物证经常被忽视，或者没有用来进行刑事分析，这是由于一些调查人员和检察官的态度或思路所造成，这些调查人员和检察官仅仅按照他们自己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来选取物证中的部分可利用价值。

在案件调查和随后的起诉过程中，物证能被充分利用的案件是极少数情况。有资料表明许多案件中物证甚至根本就没有被收集。资料还表明，当物证被收集后也很少被分析，而是放在证据架上束之高阁。即使物证被收集并经过认真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也很少用在法庭上而成为政法理论的补充（Horvath and Meesig）。笔者也有同样的经验：当某些物证可能不符合调查人员的案件推测时，这些物证就继续留在架子上，根本不会有人去检验和分析这些物证。

所有这些情况都可能影响到信息的特征和质量，因此，在心理画像开始之前进行刑事疑点分析就变得非常重要。面对错误多发的可能性，画像人员必须能够准确地确定物证的含义，并能大胆地对调查假设或案件结论进行质疑。这并不意味着画像人员假定他们所得到的信息都是不可靠的，而是画像人员在进行画像之前有责任确定在被害人与犯罪人行为之间发生的事情哪些是已知的或哪些是可知的。

信息来源

犯罪心理画像不是某个人独自完成的。每个画像都包含着众人收集的大

^① 笔者在经常出现的情况中发现了警察培训的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例子：辖区内案发率较高的大警察局的主要任务是打击犯罪，然而小警察局因为发案少，所以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业务培训。这种结果导致大警察局里经常有许多缺乏正规培训而办案经验丰富的调查人员，而小警察局里倒有经过高级培训、却没有能运用自己所学知识实际破案的经验。同样的原因，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在小的警察局里，一些调查人员不知道何时或如何应用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所学到的东西。这是极大的浪费，但目前笔者还没有想到解决这种不一致现象的实际办法。

量信息。他们对于画像的作用至少与画像者本身同样重要。那些不承认别人在自己画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画像人员要么不诚实，要么就没有参考任何客观信息而得出画像结论。

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出色的犯罪现场勘查可以提供准确的物证，而准确的物证就确保了犯罪再现的准确性。而准确的犯罪再现才能保证做到一个正确的犯罪心理画像。这就意味着每位画像人员都需要与他人合作，没有人能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下进行心理画像。与人合作，并尽最大努力干好自己的事情，结果必将是真实的。

由于每起案例都有所差异，每起案件都根据自身惟一的特性所引发，所以，有关案件的文件如何形成、根据哪些法律条款、有哪些证据来源，这一切都必须在提交心理画像结论之前加以审视与考虑。

有关犯罪再现和行为信息的资料来源总结在此，读者要更好地理解刑事科学需要查阅下面的一些参考文献。在进行刑事疑点分析时，读者应该掌握相关的文献请参考脚注。^①

任何一个具体案件的文件和报告，都必须根据犯罪类型、现场证据的有

① DeHaan, J. (1997) *Kirk's Fire Investigation*, 4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 Hall.

DeForest, P., Gaenssle, R. and Lee, H. (1983) *Forensic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Criminalis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DiMaio, D. and DiMaio, V. (1993) *Forensic Pathology*, New York: CRC Press.

Faigman, D., Kaye, D., Saks, M. and Sanders, J. (Eds.) (1997)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Law and Science of Expert Testimony*, Vol. 1,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

Gross, H. (192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Kirk, P. (1974) *Crime Investigation*, 2n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man, K., and Ruidin, N.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DNA Analysis*, New York: CRC Press.

Rynearson, J. and Chisum, W. J. (1997) *Evidence and Crime Scene Reconstruction*, 5th ed., Sacramento, CA: National Crime Investigation and Training.

Saferstein, R. (1998) *Criminal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to Science*, 6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 Hall.

效性、参与刑事侦查人员的能力，以及他们侦查的技能而形成。^① 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必须关心所有的记录和报告，他应该不厌其烦地对这些记录和报告进行全面的核实。^②

犯罪现场录像

原始的、没有被破坏的初始犯罪现场应用录像方式保存下来。这样做花费小也相对容易做到，并能保留一个没有人为破坏、内容丰富的犯罪现场记录。在没有亲临现场的情况下，现场录像和静态照片是了解犯罪现场性质和类型的最好方式，因为现场录像与当时的现场情形紧密相关。

犯罪现场照片

结合现场录像，犯罪现场照片提供了一个查看现场附近物证全貌和特征的最好机会。根据现场的性质，现场照片也提供了一个在周围环境中寻找一些具有心理学价值的物品（如著作、性用品等）和发现死者身上未能解释的伤口痕迹的潜在线索的机会。若用其他手段可能无法记录这些物品和线索，现场照片还可提供发现新物证的机会。

调查报告

任何进入犯罪现场的人员，或名字出现在笔录签名上的人员都应该被要求写一份他们在现场活动和观察的报告。这是由于各机构之间书写报告的方法和标准程序不同。这些报告的重要性就在于其能被用于帮助之后的判断：谁看见了什么，谁收集到了什么，这份报告是否和其他报告以及用于犯罪再现的物证相一致。心理画像人员应更加密切地关注这些报告，因为这些报告能提供一些其他记录方式没有注意到的现场细节问题。

根据笔者的经验，年轻巡警书写的报告往往最详细，而且价值也最大。

① 对于侦查人员和现场勘查技术人员等而言，首要原则是对现场多记录一些比少记录一些要好得多。侦查人员在现场拍照再多，记录再繁也不为过，因为这确实重要。一旦取消对现场的封锁后（这是早晚的事），重新回到现场提取证据就毫无意义了。不要着急离开现场，将现场详细地记录下来。

② 对工作缺乏兴趣是一种糟糕的坏习惯。尽管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它仍应该引起侦查人员的注意。对工作缺乏兴趣是心理画像人员遇到的第一个障碍。这也可能是警察未能成功地侦破犯罪案件其中一个未能说出来的最大原因。

他们没有经过培训或具备知道什么东西是不重要的经验，因此他们极可能记录下现场的所有事物。老练、经验丰富的警察往往会在书写报告中遗漏掉一部分内容，仅仅叙述一些他们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尽管如此，这些报告仍能反映出书写人的一些个性特征和经验，因此没有两份报告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心理画像人员应阅读有关犯罪现场活动、观察行为完整描述的所有报告。

犯罪现场草图

在任何犯罪现场取消封锁前，应对现场画个现场草图（手画，不要求严格按照比例关系，但要经过测量）。画草图的目的在于表明收集到的现场物证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这份草图与证据记录单、调查报告和最后的犯罪现场图（具有法庭证据价值，按一定的比例关系，用简洁、清晰的描绘方式制成）可相互对照参考。犯罪现场草图对确定那些没有收集到的物证也具有价值。

犯罪现场证据记录单和证据意见表格

在犯罪现场每一个被辨认、记录和收集的证据（包括胶卷和录像带等物品）都应登记在证据记录单上。证据记录单是给画像人员提供现场发现的原始记录。这个记录能与现场照片、录像所记录下来的物品进行相互对照参考。照片、录像所记录下来的物品可能没有被收集，也可能丢失了或仍需要犯罪实验室的分析等。并非任何被收集起来的東西都能让实验室人员对它作出分析，也并非任何提交给实验室进行分析的物品都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因为在一些案件中，主管案件的调查人员会自行决定进行什么样的检验，而不是由专门对证据进行分析的刑事科学家拿主意。分析这些证据物品并知道它们能为侦查犯罪行为带来什么类型的信息是非常关键的。

刑事分析结论

具有代表性的是实验室里的犯罪学家准备那些详细叙述刑事分析结论的报告。他们已经对由侦查人员提交过来的物证进行了检验。但什么证据需要提交给实验室，对哪些证据进行何种检验往往都是由侦查人员来决定。

物证和随后进行的分析都有许多不同的类型。正如在本章开始提到的那样，读者被鼓励利用那些给出的参考资料，并最大可能地熟悉那些内容，这绝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即使是学识丰富的教授也需要对知识定期更新和接受相关培训。

医学检验和法医报告

根据案件发生地的法律规定，根据死亡的性质，可以对死者进行验尸并写出一份验尸报告。进行验尸的人员可能是法医验尸官或是医学检验人员，也可认为他们是刑事病理学家。

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简称 CDC）估计，每年由医学检验人员和法医检验的死者约占美国境内 200 万例死亡者中的 20%。在管辖区域间和管辖区域内尸检的实施和要求也是不同的。目前，美国的 22 个州实行医学检验制度，11 个州实行法医验尸官制度，还有 17 个州并用这两种制度。

医学检验人员（MEs）被分为州、地区、郡等级别或直接由上至下地任命。他们必须具有医生执照，或许还需要取得刑事病理学家资格（在美国这种成员不超过 1000 人）。但是，法医验尸官大多数是被选举或委派的官员，他们通常不要求具有医生执照，只需要符合年龄要求 and 居住在案发地区。法医对死者的性质和类型调查能对案件产生巨大的影响，并能让刑事疑点分析成为必要，甚至是对合格的心理画像而言也至关重要。

看看下面从科比著作中节选的例子（Kirby，2000）：

鲍尔温郡（Baldwin Country District）律师达威德·惠斯顿（David Whetstone）说道，1999 年对一名小孩尸体进行验尸的医学检验人员所导致的错误使对该案犯罪嫌疑人的起诉复杂化。

达威德引用刑事病理学家朱丽娅·高定（Julia Goodin）博士的最初结论“22 个月大的小孩梅森（Mason）所受的伤害是一起意外跌落事件造成的，这也是达威德为被告人进行轻罪辩护的原因之一”。

在警方侦查人员对此结论产生怀疑并要求进一步调查后，高定博士才断定小孩梅森死于他杀而不是由于在家玩耍时摔伤所造成。

“在我看来，是刑事科学家补救了这个案件。”高定说。高定 1999 年 12 月离开当地成为爱荷华州的医学检验员，当与他电话取得联系后，高定决定一周内对此事作出评论。阿拉巴马州（Alabama）的刑事科学部主任厄普肖·道恩（J. C. Upshaw Down）博士说，高定的离开与梅森案没有任何关系，她是被提拔到爱荷华州当医学检验员。

道恩说，他不想评价为什么高定第一次没有得出正确的验尸结论情况。

他说每桩案件都应区别对待，而且尸检往往是根据警方反应来进行的。高定的法医鉴定结论受到质疑并非首次：1991年版的著名非科幻读物《谋杀：杀人街上的一年》记录了高定对一个巴尔的摩市（Baltimore）两岁女孩死亡的验尸过程。

根据这本书作者戴伟德·西蒙（David Simon）的叙述，作为巴尔的摩市一位医学检验部刑事病理学家的高定认为这个女孩死于他杀，然而警察局认为这个女孩死于意外事件。这本书也成为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关于警察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活生生的街道谋杀》的剧本。

尽管警方拒绝逮捕犯罪嫌疑人，但医学检验部还是认定那个女孩死于他杀。《太阳报》的头版头条“女孩死于谋杀，但没有得到起诉”的报道提出了警方与医学检验部出现不一致意见的情况。

医学检验员或法医报告的最坏情况是，由根本就不称职的人员写出错误百出并令人误解的记录报告。而最好的情况是，一份合格的报告能对被害人的受伤性质和范围进行说明，并说出死亡原因和死亡方式。一位画像人员应用验尸照片来评估这样的报告，并与相应的照片和图表来比对伤口情况。没有照片的验尸报告在心理画像人员了解被害人和他们周围环境间关系的性质，以及这种互动关系是以什么方式导致或引起被害人死亡时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心理画像人员应寻找那些没有被记录或进行任何解释的伤口，并说明急诊中心（EMS）的验尸行为所产生的新伤口。心理画像人员更应关注哪些伤口是临死前、死亡过程中、死亡后才形成的相关意见，因为这些意见在解释随后的犯罪行为内容时非常重要。

验尸录像

医学检验人员或法医在验尸过程中进行现场录像并不是普遍现象，尽管很多情况下都有条件能做到这一点。心理画像人员没有亲临验尸现场，当时的录像将是非常好的资料，能给画像人员提供被害人的伤口情况。除非通过录像，心理画像人员根本无法了解到这些伤口的实际情况。否则，就只好通过二维的平面照片了。

验尸照片

在死亡调查中的重要记录能用这些验尸照片加以保存。这些照片应有死

者内外伤口的近距离、位置关系镜头，及死者在验尸清洗前后的比较镜头。这些照片也许能提供一个发现那些被忽略或被误解的伤口痕迹的机会。这些验尸照片能与在验尸报告中的内容相互参照，并能与在验尸现场的医学检验人员或法医代表所作的意见陈述进行比较（这些意见可能与侦查报告不一致）。

性犯罪的原始记录

侦查人员经常表示有些犯罪现场不能被隔离开来，因为强奸或性侵害行为可能就发生在繁华的大街上，或在一个不知名的角落，或在作案人的私车里。随后，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物证不能被收集到，因为不存在犯罪现场。

这并不是案件的真实情况，甚至当环境条件不允许或犯罪人的故意行为使侦查人员不能发现真实、未被破坏的现场时，在被害人身上仍能发现潜在的移动的证据。在任何被怀疑或确认是性侵害案件现场，对被害人实施性犯罪也会存在原始记录。物证从犯罪人和犯罪现场转移到被害人的衣服或身体上，这些物证是可以被识别和收集的。在能找到被害人的情况下，被害人也是犯罪现场的延伸。

在一些案件中，医护人员或性侵害检验人员可以借助医疗方式，如在医院急诊室的检查记录，或通过接触死者尸体的医学检验或法医工作中形成的性犯罪原始记录。在一些案件中，性犯罪原始记录也可能由那些根本没有经过培训或不具有经验、不能辨别刑事证据的人员形成。无论如何，进行身体检查的专家应自己来书写报告和意见，用表格和照片来记录伤口情况，并收集一些证据提交给犯罪实验室。心理画像人员、侦查人员和犯罪学家应翻阅所有的这些记录。如果能找到被害人，这种证据包括任何伤口形态都应与被告人的陈述进行比较，查看是否一致。任何不一致的地方都需要进一步查明。

书写、录音方式来记录证人和被害人陈述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把对证人和被害人的询问过程用录音磁带记录下来。在询问录音的记录中记录的内容和讲话的口气用以查找事实和不一致的地方在案件侦查中都很重要，想单独从书写报告中来清楚地了解访谈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

结论

刑事疑点分析使我们知道物证的优缺点。物证可能证实犯罪调查有关的信息，也可能无法证实犯罪调查有关的信息。因此，心理画像人员首先要被培训成为刑事专家。他们也必须学会与犯罪学家、刑事病理学家和其他刑事科学家合作。一个人仅凭自己的能力对案件中的所有证据作出充分的解释说明是不可能的。

下列目录是根据李昌钰等人编著的《刑事科学：犯罪学导论》（Lee et al.，1983，pp.29~30）改编而来的。李昌钰等人认为在案件调查中利用刑事科学的目的在于刑事科学能提供说明案件真相的一些有用信息。总而言之，下列这些与行为有关的证据类型可以通过恰当地识别、记录、收集、分析和再现的物证来得到证实。

实体罪证

“实体罪证”的字面含义是犯罪实体，在这里指表明犯罪发生情况的客观事实。

例如，为证实入室盗窃犯罪，对犯罪现场证据的刑事分析应包括诸如下列的证据物品，当然不局限于这些证据：

1. 现场入口处的工具痕迹和指纹。
2. 破坏的门窗。
3. 在盗窃者鞋里和裤腿里留下的现场玻璃碎片。
4. 室内一片狼藉。
5. 丢失的贵重物品。
6. 在屋外入口处地板上的鞋印。

但是，为证实一起强奸或性侵犯案件，对犯罪现场物证的刑事分析应该寻找诸如下列证据物品，当然不局限于这些证据：

1. 犯罪现场的被害人血迹。
2. 在被害人阴道和其他部位的强奸犯罪嫌疑人的精液。
3. 是否使用可随身携带的凶器。
4. 被害者的伤口形状。

5. 被害人的破碎衣服。
6. 强奸犯罪嫌疑人用来捆绑被害人的物品。
7. 在强奸犯罪嫌疑人车里的被害人的毛发或衣物纤维。
8. 在被害人身上的强奸犯罪嫌疑人的阴毛。

惯技

所有的犯罪人都有惯技。惯技是犯罪人的习惯、技能和特殊行为的反映。有时惯技具有连续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犯罪人技能水平的不断提高，惯技也会发生改变（O'Hara, 1970, p. 597）。物证有助于证实惯技（参看第13章）。

例如，为证实入室盗窃犯罪，对犯罪现场物证的刑事分析应包括诸如下列的证据物品，当然不局限于这些证据：

1. 进入现场的工具（如螺丝刀、钢锯、前门钥匙等）。
2. 带走的物品（如现金、珠宝、信用卡、衣服等，包括值钱物和癖恋物）。
3. 在入口处没有指纹，意味着作案人当时戴有手套。

为了证实强奸案件中的惯技，对犯罪现场物证的刑事分析将包括诸如下列的证据物品，当然不局限于这些证据：

1. 从纤维到伤口形态（如果现场有的话）中发现捆绑被害人的物品类型。
2. 在现场附近可能表明进入现场的车辆类型的印迹。
3. 被害人伤口痕迹能说明凶手使用的凶器类型（即在被害人背上的刀刺痕迹或咬痕）。
4. 用于遮住被害人眼睛或堵嘴的带子。

标记行为

作案人在犯罪现场实施的某些行为可以视为标记行为。正如加利福尼亚州法院控诉欧德尔一案（California v. Odell Clarerice Haston, 1968）^①：

^① 在联邦调查局进行犯罪心理画像实践之前，“标记”这个词已被用于描述独一无二的惯技行为。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道格拉斯（Douglas）声称社会上也是这么传的。他首次起用了“标记”这个词，实则不然。

麦克阔密柯（McCormick）教授说，“在此（就犯罪手段是否体现犯罪惯技的认证而言）重要的不是犯罪的纯重复性，也不是犯罪的同一类性，如重复入室盗窃或偷窃，只有那种与众不同、有特色的作案手段才能被视为标记”[McCormick, Evidence (1954) 157, p.328]。

在加利福尼亚控诉欧德尔（1998）中有关标记行为的叙述又再次引用了麦克阔密柯的话：

标记行为必须明显地与众不同，由此才能确认两起案件是同一个人所为。

犯罪方式和特征必须与众不同、有特点才能被视为一种标记，如同罪犯的签名一样独一无二 [1 McCormick, on Evidence (4th ed., 1992), § 190, pp. 801 ~ 803]。

由标记行为可以判断出犯罪主题。作案人实施这种标记行为往往是为了满足心理上或情感上的需要（参见第15章）。物证可帮助我们推估标记行为及行为意义。

例如，分析入室盗窃案件的标记行为，在对犯罪现场的物证进行刑事分析时将包括下列的证据物品，当然并不局限于这些证据：

1. 撕碎衣橱里的衣服。
2. 射精、小便或大便。
3. 总选择一些特殊地点。
4. 偷女性的内衣。
5. 破坏家具。
6. 破坏车库里的汽车。

为分析强奸犯罪案件的标记行为，在对犯罪现场的物证进行刑事分析时将包括下列的证据物品，当然并不局限于这些证据：

1. 使用的捆绑物类型。
2. 性行为的特殊顺序。
3. 被害人的伤害程度（从轻微到残忍的程度）。
4. 使用的特殊凶器。

5. 拿走与偷窃无关的被害人个人物品，如身份证、衣服或价值不高的珠宝等。

将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联系起来

血迹、人体组织、毛发、纤维物质和化妆品可能从被害人身上转移到作案人身上，而且，在犯罪嫌疑人身上发现的一些物品可以与被害人联系起来。例如：

1. 在作案人的阴茎或衣服上已经干燥的被害人的阴道上皮细胞。
2. 在作案人车上一根绳索上的被害人皮肤细胞和毛发。
3. 在作案人刀上的被害人血迹。
4. 留在了作案人车上的被害人在搏斗中脱落的人工指甲。

一些微量证据也可能从作案人转移到被害人身上。应该对犯罪嫌疑人的财物和衣服进行彻底检查来搜索这种类型的微量证据。对被害人和被害人的财物和衣服也要进行类似的检查。

将人和犯罪现场联系起来

通过物证分析把人和犯罪现场联系起来的方式是一种常用的、重要的方式。指纹、手套印、血迹、精液、毛发、纤维组织、土壤、子弹、弹壳、工具痕迹、脚印或鞋印、轮胎印及属于作案人的物品都是遗留下来的证据（Lee, 1994, p.5）。依据犯罪案件类型，我们可以推论出犯罪现场的各种证据可能会被犯罪嫌疑人带走。被盗走的财物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利用物证的双向痕迹特点也可以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甚至是证人与犯罪现场联系起来。

反驳或支持证人证言

物证分析可以肯定一个人对一系列事件的看法是否值得信任，或这个人是否具有欺骗性。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交通肇事逃逸的汽车司机。对汽车检查可以发现在保险杠下侧的血迹和其他生理组织。这个驾驶员可能解释说自己开车撞上了一条狗。对血迹进行简单的类型检验就能证明这些血迹是狗的血迹还是人的血迹。

对犯罪嫌疑人的确认

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最可靠证据包括指纹、咬痕证据和 DNA（即脱氧核糖核酸）。在案发现场、被害人皮肤上或物品上发现指纹，后经确认是某人的指纹，这将会确认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在强奸和性侵犯案件中，从下列途径得到的 DNA 能被用于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当然此表内容并不完全）：

1. 遗留在现场或被害人身上的精液。
2. 遗留在现场的加害人伤口血迹。
3. 在自卫反抗中被害人手指甲下的加害人的生理组织。
4. 遗留在现场或被害人身上的加害人的阴毛。

在强奸和性侵犯案件中，从下列途径得到的咬痕能被用于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当然此表内容并不完全）：

1. 在被害人挣扎过程中为制伏被害人而在她们身上、背上留下的咬痕。
2. 性侵犯中对被害人生殖器的伤害，这也是性侵犯的一种方式。
3. 对被害人惩罚（孩童虐待），在被害人脸上和四肢留下的咬痕。

提供侦查方向

物证分析能给案件侦查提供一些正确方向。例如，在一起交通事故逃逸案件中，一块汽车的油漆碎片就能缩小可能涉及此案的汽车数量和种类的范围。在一起强奸或性侵犯案件中，DNA 证据能迅速排除一些无关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咬痕能得到本地牙医组织的鉴定，咬痕就能确定犯罪嫌疑人。

在此，笔者提出初始评估可以作为一种其他类型案件调查指导的工具。

初始评估

初始评估是一种侦查记录，是对具体案例或系列性案件的行为痕迹、被害人分析、犯罪现场特征等原始物证的最初评估。其目的是为办案人员提供案件侦查的指导。刑事科学家不可能在评估之前得到所有的犯罪现场记录、被害人情况和物证的全面分析报告。初始评估就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案件事实进行评估。初始评估包括提出证据之间的可能关系，初步的分析，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策略，以及对调查思路的初步印象，即画像人员认为需要优先考虑的或直接进行的侦查。

正如比兹等人（Baeze et al.，2000）所陈述的那样：

4.0 初始评估

初始评估就是一种侦查记录报告，是对具体案例或系列案件的行为痕迹、被害人分析、犯罪现场特征等原始物证的最初评估。其目的是为办案人员提

供案件侦查的指导。初始评估报告应包括就事件而言哪些已经了解，哪些事件还没有掌握，以及对能证实这些事件所用方法的意见，等等。初始评估不应该与心理画像相混淆，更不能称之为心理画像。

4.1 方针

初始评估应包括下列因素：

4.1.1 对案件相关犯罪行为的确事实作出恰当评价。

4.1.2 对案件相关被害人情况的确事实作出恰当评价。

4.1.3 对案件相关犯罪现场特征的确事实作出恰当评价，并提出支持性论证。

4.1.4 对可能的犯罪动机和其他方面提出初步性合理假设，并提出支持性论证。

4.1.5 对可能的犯罪人特征提出初步合理假设，并有支持性论证。

4.1.6 对需要进行确认或证实的相关事件提出意见，其中包括对现有物证作进一步的刑事分析的意见。其目的是补足犯罪行为顺序链的逻辑中断部分。

4.1.7 对进一步收集到的被害人情况提出意见。

4.1.8 对调查犯罪嫌疑人的侦查策略或方法提出意见。

初始评估不应该含有肯定性的结论或意见。那是心理画像需要得出的东西。初始评估可提供侦查指南，或提出该做什么的目录，随案件进展收集阶段已知的或侦查进一步需要掌握的证据。初始评估提供最初的观察、所关心的问题 and 优先调查的要求等。初始评估应由与侦查相关的问题、建议和最初的印象判断组成。

尽管初始评估可以具有与心理画像一样的书写格式，但初始评估是在不同的情形下为达到不同的目的而得出来的。初始评估不应该像完整的心理画像结论那样被引用或使用。这一点很重要，当我们在撰写最初报告时或在查阅画像人员撰写的报告时，我们应记住，心理画像与初始评估报告具有不同的使用背景和目的性。

进行初始评估的原因

对案件进行初始评估，不仅仅是为等待更多的信息，或只为了得出一份完整的心理画像报告，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如前所述，初始评估能为侦查活动提供指导。初始评估收集并提供的信息能够简明、有效地提供建议。初始评估能为心理画像不偏离侦查方向提供帮助。它还能指导侦查人员收集有助于心理画像的相关信息，因为归纳在初始评估中的信息（原本是为心理画像提供信息）将会对参与案件侦查的每个人，而不只是对画像人员有所帮助。

第二，在侦查阶段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公众安全感问题。在案件随时可能发生的地区，我们可以赶赴当地进行心理画像。为了当地社区群众的利益，我们可以让画像人员依据最初的、哪怕是不全面的信息得出一些看法，以便让调查人员及时根据画像人员的意见在最短时间内开展进一步的侦查。

只有对已做过的调查进行价值和利弊权衡之后才能决定是否进行初始评估。提出吊人胃口的、有误导可能的观点和看法，或许在今后组织实施的侦查过程中很难消除其影响。根据笔者的经验，当初始评估被当做犯罪心理画像或被视为心理画像结论使用时就会出现麻烦。如果侦查人员预先能注意到特定初始评估的性质和目的，那么就on容易避免形成那些为案件侦查带来障碍的误导和过高估计的现象。这不仅要求如实地介绍犯罪心理画像内容（不要过高或歪曲理解初始评估的信息），也要求侦查人员有责任恰当地利用初始评估中的信息。

在有关特定犯罪人特征方面，初始评估和犯罪心理画像人员的肯定结论不能相混淆时，这种观点和解释对在法庭审判中利用初始评估也具有同样的意义。首先，初始评估基本上没有什么结论，只是探寻最初的侦查方向。其次，初始评估是基于不完全的（可能是错误的）信息而得出来的。

案例

对各种类型案件进行的初始评估案例可以在本书末尾的附录中查找。

悬案评估

悬案（cold case）指已公开的，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侦查进展的未破案件。案件没有进展是由于许多影响因素或客观情形所造成的。这些影响因素和情形如下：

1. 被害人和刑警之间缺乏合作。
2. 缺乏案件证人。

3. 缺乏物证。
4. 现有线索均已查完。
5. 侦查人员或调查部门缺乏政治方面的支持。
6. 由于被害人类别（如妓女、帮派分子、毒品犯罪嫌疑人、在逃人员等）而没有重视案件。
7. 侦查人员被安排调查其他重大案件。

由于谋杀案件没有法定时效，警方必须始终保持这些案件的材料直到最后侦破为止。^①

解决办法

悬案通常是在侦查同类案件时得到侦破。不同之处只在于侦破时间的长短。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因为供述、证人作证或物证的发现，使一些案件变得容易侦破。侦查人员和心理画像人员需要了解这种可能性，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可能性。

新的犯罪事实

一旦犯罪嫌疑人因为某起案件被拘捕，犯罪嫌疑人可能对自己做过的、涉及的或以前实施的犯罪予以承认。这就使曾因证据不足无法证实的犯罪调查出现转机，出现侦查人员一直寻找的有利因素。这种有利因素还会使犯罪嫌疑人产生强烈的内疚感，此时，犯罪嫌疑人也会主动供述以前的犯罪事实。在讯问过程中，一定要给犯罪嫌疑人以合适的机会，让他们交代他们想要说明的全部问题。

当犯罪发生在一个新的环境背景下就可能出现一个自愿作证的证人。假如在此作案的犯罪嫌疑人被认为与以前的一些案件有关，证人证言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相互呼应也可为以前案件的侦破提供一些帮助。

案例

以下是罗伯特（Robert，2000）提供的一个相似情形的案例。

有名男子被怀疑杀死一位女演员，其父亲带领警方找到了女演员的尸体。10年前其父亲曾帮他儿子在其房间的后院掩埋了这具尸体。

^① 在加利福尼亚州大约有 5000 个被悬置案例。西雅图警察局自 1960 年来已经有 360 起悬而未破的案例。

布莱恩·大卫·黑尔（Brian David Hill）在1989年开枪杀死了25岁的托德亚·历山大·阿穗（Todd Alexander Asay），然后要求父亲帮他掩埋尸体。在1989年警方曾针对这起案件专门讯问过布莱恩·大卫·黑尔，但当时并没有逮捕他。直到黑尔做了另一起案件，警方才在12月逮捕了黑尔。

圣诞夜警方在黑尔居住的西南托曼大街（Tolman Street）7900街区房屋的后院里发现了阿穗的尸骨。黑尔曾在此居住过。

警方找到这具尸骨是源于黑尔的父亲富兰克·黑尔（Frank Hill）的举报，因为儿子又杀死了他的前妻——安娜·李·黑尔（Anna Lee Hill）。富兰克·黑尔向警方指出了埋尸体的地方，在随后的起诉中富兰克·黑尔被认为无罪，因为警方认定富兰克·黑尔没有参与杀害阿穗的具体过程。

内疚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涉案的个人由于实施犯罪的直接反应，会产生与日俱增的内疚感。他们可能在1年后或10年后更愿意谈他们所看到的、所做过的事情，或者当时没做成的事情。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涉案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或在案件最初发生时没有主动出来指证的证人证言来得到证实。在讯问过程中，一定要给犯罪嫌疑人合适的机会让他们交代他们想要说明的全部问题。

案例

以下是罗伯特（2000）提供的一个相似情形的案例。

22年来，詹姆斯·库姆（James B. Kuenn）一直保守着一个可怕的秘密。

本周詹姆斯通过录像带向陪审团交代了他隐藏的秘密：在1976年詹姆斯与16岁的卡罗尔·胡托（Carol Hutto）约会时因为她拒绝了他的求婚请求，詹姆斯在一所空房间里杀害了胡托。

一个由8名男性和4名女性组成的陪审团听了詹姆斯的供述后，在经过长达22分钟的合议后最终认定詹姆斯犯有一级谋杀罪。

詹姆斯1998年被逮捕前在康涅狄格的潜艇上服役。当詹姆斯在陪审团裁决后从法庭押送出去时脸上带有一副阴沉的表情。他将在下个礼拜得到法庭判决。

这位年已40岁的美国海军下级军官将面临终身监禁。起诉官没有想给他死刑。

这名被告从案件发生后就已经是犯罪嫌疑人了，但经过几番讯问较量，詹姆斯矢口否认与胡托案件有关。

在 1998 年 7 月，当海军军事调查局官员在讯问詹姆斯有关胡托案件情况时，调查人员的运气来了。早在 1994 年海军刑事调查局就参与过此案的调查。

“对此你很难过，是吗？”在同时录像的讯问中，一位声音听起来富有同情心的调查官员问詹姆斯。这是一起意外事件，调查官员告诉詹姆斯，作案时你还小，尚未成年。

在 30 分钟后，僵局被打破了。

“那是一起意外事件。”詹姆斯在抽泣中回答道。

相互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会淡漠、中断、改变或结束。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过去充满忠诚的信念也会变化或消失。随后，同谋者或证人可能愿意与案件调查人员交谈，甚至不同于案件刚发生后的讯问，他们更乐意交谈。上述关系将包括但不局限于同伙、朋友和亲戚关系，这些人或是参与者，或是证人，或是在过去的数年间偶然知道一些信息的人。

案例

以下是对瓦斯奎兹（Vasquez，2000）的访谈，说明了一个因关系恶化而交代的案例：

圣何塞（San Jose）警察局警官基尔·维族斯（Gil Vizzusi）周三了解到他被抽调去负责悬案的侦破。基尔说当自己遇到比较棘手的案件时，他不惜踏破铁鞋进行走访与调查。许多时候，基尔需要的答案可以从退色的、过去的警方报告或已辞职的负责凶杀案件刑警的潦草记录中找到。

基尔说：“实事求是地讲，科技对我没有什么大的帮助。”基尔是已有办理凶杀案件 7 年、经验丰富的警官，他以前已经侦破了堆积在办公桌上多年的 6 起悬案。“到目前为止，案件侦破主要是根据证人，他们主动提供线索，或是我们找到现在愿意交谈的证人。”

数年前，当一起积压 15 年之久的凶杀案通过一个电话而被侦破时，这是基尔的一次开门红。一个女人与其妹夫有矛盾，然后，她给基尔打电话告诉基尔，她妹妹的丈夫在圣何塞的一个酒店里开枪打死了一名男子。

这名女子的话属实，居住在新泽西州的犯罪嫌疑人被缉捕归案。

害怕

在犯罪行为发生时，那些知道案件真相的人由于担心自身安全或其他人安全而不敢向警方提供证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害怕可能会减弱（迁居到外地，远离凶手的威胁），他们面临的一些威胁可能会消失（凶手死亡），或借助他人的意志而克服自身的害怕心理（如因为担心生活、健康和子女或亲属的未来等心理）。如有上述情况发生，这些人可能更愿意向警方透露案发后不愿讲出来的信息（如果他们接受过询问）。这些人往往是凶手的亲属、以前的朋友、家庭成员和子女等。

新技术

在案发时，现场收集到的证据鉴于当时的水平作用不大，现在则可以用新研发出来的刑事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分析或重新分析。

案例

1973年，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一条街道上发现了木材商人格瑞特·维纳德（Gerrit Weynands）的尸体。在他的后颈上有个弹孔，身上衣服的口袋都向外翻出。1996年，一位警方技术人员通过指纹自动识别系统（AFIS）随意地对悬置的凶杀案件的指纹进行对比，偶然发现一枚指纹与犯罪嫌疑人留在格瑞特租来的汽车上的血指纹相吻合。

案例

1983年，在俄亥俄州的托尔都（Toledo）一间空屋子外的一块三合板下面发现了23岁的登尼斯·豪厄尔（Denise Howell）部分裸露的尸体。死者被人用她自己的丝袜勒死。1998年，刑警将DNA证据重新提交检验，最后确定原来的犯罪嫌疑人为杀人凶手。这名凶手被判20年监禁，至今仍在服刑（Emch, 2000）。

当访谈证人或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新技术和潜在证据影响可能是有效工具。用新技术来检验旧证据可能会促使那些原先由于内疚感、焦虑或忠诚观等原因而保持沉默的人，现在愿意与警方合作。

新证据

在案发当时，刑警、现场勘查人员，甚至是刑事病理学家可能会忽略一

些潜在的证据。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他们往往缺乏经验、培训经历、专业知识、存在着调查偏见或在判断和理解上受到外界影响。

案例

在验尸过程中拍摄的照片可能会包括一些没有进行调查的伤口。这些伤口形态包括咬痕或其他一些不熟悉这种伤口形态的人容易忽视的伤口。

案例

一起新案件的犯罪现场可能会发现与某起旧案件的关联性，由此可以对这起旧案件进行调查并因此发现一些潜在的物证。

对于证据潜在作用的重新检验可以视为一种询问证人或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有效工具。这种检验会促使那些曾经保持沉默的人，或由于内疚感、焦虑或忠诚观等原因当初不愿意配合的人转向愿意与警方合作。

培训需要

当警方堆积了大量的、由于上述多种原因而至今没有解决的悬案时，许多警察局都认识到，该采取行动来侦破这些案件了。这些未侦破的案件当然被划分为悬案类型。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组建悬案侦破小组或指派一名或两名刑警专门负责侦破这些悬案。在小范围内，建立经过严格培训的悬案任务组也是一种解决办法。但这些初步行动往往会处于成功的边缘或是完全失败的境地。

悬案难以侦破的首要原因是侦查人员的态度。侦查人员千万不能带有“悬案难度很大”或“不能被侦破”的先入为主的想法来调查悬案。最有建设性和解决途径的办法是不把悬案当做难度大或不能侦破的案件来看待，尽管这些案件确实如此。悬案的调查应该按现案一样来开展侦查。这就把侦查人员调整到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状态上，从而大大地降低他们以前对悬案难以侦破的固有偏见。

悬案难以侦破的第二个原因是侦查人员没有接受充分的培训。实际上一些案件仅仅需要引起侦查人员足够的重视，这些案件的侦破就能迎刃而解。但是，事实表明要想侦破未决悬案单凭重视是不够的。

根据一项研究（Horvath and Meeting, 1996）：

1. 在美国仅 5% ~25% 的刑事案件在庭审中利用到了物证。

2. 刑警或律师很少接受业务培训来懂得物证的作用并在庭审中利用物证。

3. 物证能有助于获取口供或证实证人证言，所以在庭审中就最常用。

这项研究表明，尽管刑警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询问证人非常在行，但这些刑警却经常没有意识到如何利用物证。如果悬案侦破小组能起用那些物证经验丰富并接受过访谈技巧专门培训的刑警，那么侦破小组也将会打开对悬案的侦破局面。

悬案不仅意味着资源不足和大量积压待办的事务。悬案也是一种警示标记，需要让侦查人接受培训的标记。这意味着侦查人员破案只投入时间及物力资源的相应办法都不够。侦查人员也需要进一步培训，这些单独培训正如在前面解决办法中所提到的那部分内容，至少包括基础的，但也需要中级的和前沿的各种刑事科学课程（即刑事学、法医死亡调查、法医病理学、法齿学、血迹痕迹分析、刑事 DNA 分析等）。

在缺乏这些必要培训的情况下，从事悬案侦破的调查人员必须能求助于那些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员并与之共同合作破案。

参考文献

1. Baeza, J. , Chisum, W. J. , Chamberlin, T. M. , McGrath, M. , and Turvey, B. (2000) " Academy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Criminal Profiling Guidelines", Journal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1(1, January).
2. California v. Erving (1998) No. B111324, April 29, 1998 (73 Cal. Rptr. 2d 815).
3. California v. Haston, No. 11710, 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 In Bank, August 19, 1968
4. Emch, D. (2000) " Cold – case Unit Uses DNA to Solve Nearly Forgotten Killings", The Toledo Blade, April 23.
5. Gross, H. (192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Ltd.
6. Horvath, F. and Meesig, R. (1996)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rocess and the Role of Forensic Evidence: A Review of Empirical Findings",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41 (6, November), 963 ~ 969.
7. Kirby, B. (2000) "DA: Autopsy 'botched' case", Mobile Register, July 27.

8. Lee, H. (Ed.) (1994)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Taoyuan, Taiwan: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Press.
9. Lee, H., DeForest, P., and Gaensslen, R. (1983) Forensic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Criminal – istics, New York: McGraw – Hill.
10.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1997) National Guidelines for Death Investigation, Research Report 167568, Washington DC: NIJ.
11. O' Hara, C. (1970) Fundamentals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12. Roberts, M. (2000) "Father Led Police to Body in Back Yard" The Oregonian, February 10.
13. Seven, R. (1996) "Cold cases, hot leads", The Seattle Times, October 1.
14. Vasquez, D. (2000) "Thawing ' cold cases'", San Jose Mercury News, February 13.

第5章 犯罪再现简介

W. Jerry Chisum, B. S.

浅薄的人相信运气……而有实力的人相信因果关系。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代表性人群》（1850）

什么是犯罪再现

犯罪再现（crime reconstruction）是指对曾发生过的犯罪行为活动进行推断。犯罪再现可以通过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幸存的被害人陈述或对物证的检验和分析来完成。物证是指现场遗留的、被破坏的或被到过现场的人拿走的物品。一些人认为犯罪现场再现就是利用上述证据进行推测的过程，但是，在再现过程中，不是把犯罪现场简单的拼凑复原，而是对犯罪行为过程进行重现。

举个简单案例，试想有个泥球，它是个滚圆的球体，但有一小块平坦的表面。我们推测这个泥球掉在平面上导致球体的一部分变为平面。为验证这个推测，我们用同样大小和重量的泥球来做实验，把泥球从不同的高度掉向地面，然后检验每个泥球的平面。当我们发现其中一个泥球的平面大小与最初的那个泥球平面形状很接近时，我们就可以假定这两个泥球基本上是从同一高度掉下来的。

还有其他解释吗？当然，可以根据原先那个泥球的样子重新捏造一个很相似的泥球。那这个泥球经过平面的撞击了吗？答案是否定的。那将导致产生两个平边——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实验来证明这个结论。这个平面可以用削掉泥土的办法得到吗？我们可以检查泥球表面来确定在泥球表面是否发生过变化。我们可以想像各种不同的修剪方法——用剃刀的刀面、激光等。但是，

每种方法将会改变泥球切面的特征。

为了排除其他可能性，我们需要进行实验。如果单凭对部分证据进行实验并不能确定哪种可能性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还需要对证据的其他部分进行实验，或者还需要研究物体的背景情况。在上述这个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有两种解释作选择：其一，该球体本来就是我们所发现时的形状；其二，它是从一定高度掉下，摔成现在的样子。为了排除其中一种可能，我们就要对发现时的球体平面进行实验。为此，我们可以把球体的平面和地面贴吻，还可以把原球按预定的高度坠落到平面上。然后把球拿走，查看地面上残留的碎渣的数量和形状有没有区别。我们甚至还可以让球留在落点上，确定接触时间有没有影响。然后复查一下球体原来的平面和哪一次实验造成的平面特征相符。

当我们发现只剩一种可能的选择时，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最先的假定是正确的。或者就像柯南·道尔刻画的神探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所说的“在排除了一切其他因素之后，剩下的必为真理”[见柯南·道尔（A. Conan Doyle）1888年著的《四签名》中向华生（Dr. Watson）医生对自己所采用的方法的解释]。

上述所描述的方法就被称为科学的方法。我们先进行观察，再进行推理或假设，随后进行实验并通过实验肯定或否定我们的假设。如果实验肯定了我们的假设，那么，假设就是真理。问题是如何进行正确的实验。我们必须知道，存在各种可能的解释，为此必须通过实验设计来检验各种假说，并且在不带任何个人偏见或好恶的情况下作出选择。在我们尽力保持客观性的同时，还必须意识到仍有一些我们难以觉察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决定。正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所言：“诸如个人经历和性格等主观标准，对于我们能否作出科学决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根本无法从思维过程中彻底消除这种主观标准，但是我们必须警惕它们的存在。

格罗斯认为，我们需要观察任何事物，探究事物发生结果的原因。因为生活的所有经验都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犯罪再现必须有观察结果和推断原因。问题是在进行犯罪再现时，个人的偶然行为将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难题，正如考古学家斯科特和科耐尔（Scott and Conner, 1997）所提出的：

根据物证来再现人的行为是一个多维拼图谜团。这个谜团的部分地方残缺不全，有的地方被破坏了，有的地方甚至经过伪装。这个玩具的各个部分看上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不同类型资料——一些是肉眼可见的，一些需要通过显微镜来观察，并要经过数天的专门分析来证明其存在。在一些案件中有些证据是无形的，如口头证词。但两个不同学科的科学——考古学家和刑事科学家，他们由于不同的原因，各自坐在自己的书桌旁坚持不懈到组装完成这个拼图谜团。

在侦探小说里，负责凶杀案件侦破的刑警似乎都在进行犯罪现场再现并排查犯罪嫌疑人。但在现实生活中，负责凶杀案件侦破的刑警很少具备相关的科学知识来进行犯罪再现。对多数侦探而言，他们在进行证人访谈和犯罪嫌疑人讯问时往往把物证的利用摆在次要的位置上。为了分析犯罪人的行为进行某种实验，这需要掌握一些相关的基本科学知识。

许多刑事实验科学家分工过于专业化，从而不能将各种观测结果综合起来分析。他们缺乏刑事学科的多种视角来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刑事科学重视专家分析，通常情况下，犯罪实验室的专家并不出现场，因而他们很难形成犯罪再现的技能。进行犯罪再现必须亲临现场，分析保留在现场的物证。例如，现场血迹的喷溅形状比起血迹的DNA分析更能说明问题。另外，在犯罪实验室工作的专家也没兴趣去学习访谈或讯问技术，学习其他相关的专业课程来提高他们对人类行为的理解能力。而如果对人类基本的行为不了解，这些刑事专家就更不能对犯罪现场进行再现。

现场勘查技术人员（Identification，简称ID），即主要从事指纹提取、现场照相和收集证据的人员在案件侦破中也很少有人听取他们对案件的看法。人们往往认为他们只需要完成他们的本职工作。乔·彼得森（Joe Peterson）在1973年就指出，在案件调查中对某事感兴趣是不能被接受的行为（Peterson，1973）。对学习现场勘查技术的学生进行访谈的结果表明，这依然是他们被传授的工作态度。他们不被鼓励去潜心研究犯罪再现所必需的技能。在较大部门的现场勘查技术人员比在较小部门的现场勘查技术人员有更多的机会亲临犯罪现场。如果没有敏锐的观察力，他们就不能识别证据。正因为如此，他们是一群潜在的信息源。但是，由于他们在现场不受重视并且经常奔波于各个现场，他们很少能提高除自己工作范围外的其他侦查技能。

地方检察官（District attorneys，简称 DAs）则有他们自己的办事规则。他们想说服陪审团相信被告有罪。但是，有关证据的解释并不总是有利于起诉。准备案件起诉的地方检察官总是用一大堆的犯罪学理论来准备起诉，他们希望陪审团相信他们的犯罪理论。他们很少根据犯罪侦查结果进行犯罪再现，似乎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起诉。没有客观的实物，这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已经认识到他们需要对犯罪现场进行再现。为了解释犯罪人行为，心理画像人员需要知道在犯罪现场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仅对犯罪行为有所了解后，通过犯罪现场的研究发现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动机分析有多种答案。尽管一些画像人员缺乏科学技能，但他们已经在犯罪再现领域具备了一定水平的技能。

要想成功地进行犯罪现场再现就要涉及前面提到的各种能力。侦探的侦查能力、刑事科学家的科学实验能力、心理画像人员的行为分析能力等都将用于分析犯罪现场。现场勘查技术人员最初的勘查、巡警对犯罪现场的最初反应也可以弥补再现过程中的某些漏洞。侦探、刑事专家、现场技术勘查人、现场和心理画像人员必须意识到，他们具有不同的技能，这些能力相互补充。犯罪侦查并不是谁的“自留地”。检察官只有在这种合作式的刑事侦查和犯罪现场再现之后才能在法庭上轻松地说服陪审团。

何时需要犯罪再现

当犯罪人的活动和行为能给刑事侦查或审判提供有用的信息时，就有必要进行犯罪再现。那些没有头绪、长期搁置、带有疑问的命案等案件，侦查人员应该邀请犯罪再现分析家来验证那些照片、草图和现场报告来重新确认这些案件资料中是否存在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案例

一名刑警邀请一位犯罪再现分析家参与一起已经搁置 6 年的夫妇双方被害的谋杀案。这名男子贩毒，可能因购毒者对他不满而将其杀害，在案件中没有什么线索。

在查看照片的过程中，犯罪再现分析家注意到这位妻子中了两枪——一枪从前臂穿入下巴，另一枪打在太阳穴上。其中一枪是用床单靠近枪口击发的。毯子被手臂扯到了一边，手臂上的血滴落在胸口上，丈夫靠着床跪着，

从他的姿势和他的衬衣和床单被扯动的样子推断这名男子是被子弹击中右太阳穴而倒向身体的左侧。整个现场看上去像丈夫先杀人后自杀的样子。但是现场没有枪。

通过对照照片的仔细观察，发现在丈夫右手腕上缠有台灯电线。在丈夫没有推翻台灯的情况下，他身体倒向左侧，是不可能出现照片上这种情形的。犯罪再现分析家推测枪被不想接触这具尸体的人拿走了。根据这种推测，刑警重新调整了侦查方向。刑警发现是死者的儿子和他的一个朋友发现的尸体。死者儿子在房屋外等警察来，这位朋友呆在屋里扔出屋里的可卡因并破坏掉了在后窗的毒品存货。警方对这位扔可卡因男子的朋友进行访谈，发现这位扔可卡因的男子曾吹嘘他从死人旁边拿走一枝枪，具体时间与案发时间吻合。这个案件当初被搁置下来是因为没有对现场进行仔细观察和简单的犯罪再现，数周的侦查工作也就付诸东流了（见图5-1）。

在第一个侦查人员进入现场前就应该对现场进行犯罪再现。调查人员应该收集各种对案件假设有关的信息，如死者是自然死亡、意外死亡、自杀，还是谋杀致死等看法，这是调查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确认从案件发生以后犯罪现场发生过什么变化。应对最初进入现场的警察和医护人员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在现场都具体做过什么事情。他们的职责分别是维护现场秩序和救治病人——如果他们必须花费时间去保护现场物证的话，他们就不能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调查人员必须要认真证实这些现场发生的变化情况，防止得到误导性信息。



a



b

图 5-1

在下面的案例中，刑事学家和现场勘查技术人员被召集起来共同进行刺伤案件的调查。

案例

当他们到达现场时，他们发现从入口到二楼楼房的空地上有汽车加速时留下的地面摩擦痕迹。沿着楼梯有血滴和血鞋印——血迹停止在汽车加速时地面摩擦痕迹附近。他们小心地登上楼梯，尽量避开那些血迹。血迹溅到门的内侧，一直延伸到右边的水池。在水龙头上也有血迹。从门到左边的卧室里也有血迹。他们注意到卧室里一团糟——在电视机前到处都是血迹和啤酒易拉罐。咖啡桌被掀翻在地上，靠近电视的台灯是碎的。在咖啡桌和沙发间有一摊血迹，沙发上也有血迹，在靠近前窗的书柜上有一把沾满血迹的刀。

根据现场的暴力迹象，刑警立即请求实验室技术人员支援。刑事学家和现场勘查技术人员经过6~8个小时的工作详细地记录并收集了现场证据。但是，首席刑事专家询问到达现场的第一位警察进入现场当时看到了什么。这位巡警回答在沙发上躺着一个人，腹部插有一把刀。然后就查看房间去寻找犯罪嫌疑人——当他返回来时，医务人员已经来了正给伤员进行急救。于是他走出房间等待刑警的到来。

这些医务人员后来被问及他们当时具体采取了什么急救措施时，他们回答当他们到达现场时他们看见沙发上的人被刀刺中腹部。他们不能在沙发这种软平面上进行急救，于是他们不得不将伤者抬到地板上。但当时他们不能直接将伤者放到地板上，因为咖啡桌是倒在地上的。为挪开咖啡桌，他们还不得不拿开坐垫，这个坐垫打翻了台灯。他们推开咖啡桌，桌子又碰翻了散落的食物和啤酒易拉罐。他们然后抬起伤者把伤者平放在地板上。当他们做这些的时候，刀自己从伤者的腹部掉出来了。他们担心膝盖碰到刀，于是他们又将刀放到了书柜上。当他们在抢救伤者时，伤者的血从伤口喷出来溅到了他们的手臂上、手套上。他们来到水池边拧开水龙头洗掉血迹。当他们抬着流血的伤者下楼时，血从担架上滴在了楼梯上。走在担架后面的医务人员踩在血迹上，留下了鞋印。医务人员将伤者抬进救护车，然后救护车加速冲向医院，在地面上留下了汽车加速时的轮胎摩擦痕迹。

这个案例说明当发生意外事件时，现场不会总是保持原有的样子。对这

样有变动的犯罪现场进行的犯罪再现其结果是完全错误的。

调查人员必须确定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对能确认的物品的初始位置准确记录下来。这些信息必须转交给犯罪再现分析专家。其中的一些变化是可以预测的——这些变化能用于犯罪再现。这些变化包括干血迹、尸斑和那些遵循自然法则（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变化的事物。其他一些变化是不可预测的，如上面案件所叙述的一些变化或由昆虫或动物造成的一些破坏。

何时进行犯罪再现

在案件调查的初始阶段、调查过程中和审理过程中，犯罪现场再现的价值就在再现最初的犯罪现场。被害人、证人和/或犯罪嫌疑人的叙述内容是否属实，犯罪现场再现分析家在进行访谈时就可以确定。在了解再现内容的前提下，实施访谈的刑警能够识破犯罪嫌疑人的一些诡计或破绽。就经验丰富的刑警而言，应用犯罪现场再现可能是一种非常实用的调查手段。

犯罪现场再现也可以推导出有关案件的更深入的线索和证据。例如，在某被害人身上的弹孔会让调查人员知道应该到什么区域去寻找弹壳，而且我们会想到把尸体翻转过来查看身体的背面是否有弹头出口，接着我们会寻找这枚弹头。在大多数情况下，子弹的前进方向将会指向被害人靠近弹壳身体的另一侧。在犯罪现场再现过程中，案件调查人员要确定出弹道轨迹、射手和被害人之间的位置关系，这些都是一些简单的步骤。

通过对犯罪现场内人物的行为方式进行再现，我们经常能发现指纹和其他一些证据。

案例

一个窃贼从屋顶闯入一家商店。他从天花板处挪动了一块嵌板露出一个豁口，天花板离地面还有3米的高度。现场勘查技术人员推断，如果这个窃贼从天花板跳到地面上，那么他可能用手扶地来防止身体碰撞地面。现场勘查技术人员在天花板豁口下面的地板1米范围内撒上粉末，发现了两枚清晰完整的掌纹。这位鉴定人员的现场再现最终认定了先前一个多次成功作案的窃贼。

多数情况下，审查案件尤其是检查用于犯罪再现的证据都在法庭审判的准备期间，在这一过程中，起诉的检察官可能会发现一些与犯罪行为有关的问题，他们要求通过犯罪再现来帮助他们的起诉。有时他们也会得到一些与先前推测不一致的答案。更多的时候，现场再现将有助于他们向陪审团说明他们在始辩中所要证明的和在终辩中得出的结论。同样被告人的律师也会应用现场犯罪再现进行答辩。

并非所有的犯罪现场都可以进行再现。许多时候只有拿到实验室检测结果后，刑警才能进行判断解释。例如，尸体附近墙壁上的血迹可能是凶器甩出时留下的血迹，也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受伤后留下的血迹。因此，现场记录必须尽可能的完整，包括照片、草图、现场测绘、录像及笔记等。进行犯罪现场再现的人可能不得不依靠这些记录来说明犯罪行为是如何实施的。如果进行犯罪再现的人没有亲临现场，他们就必须根据这些现场记录来进行犯罪再现。

为何进行犯罪现场再现

犯罪现场再现其实并不容易，不是每个人都能说明犯罪的行为逻辑。作为优秀的犯罪现场再现专家能用人们理解并能接受的方式来说明自己的推理过程。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些人来专门从事犯罪现场再现呢”？

进行犯罪现场再现最明确而又重要的理由就是防止误审。例如，下面的案例中一名行政长官确信在受理一桩谋杀案。

案例

一个女人跑到她妹妹家来躲避她脾气暴躁的丈夫。当其丈夫过来找她时，她妹夫手握来复枪并警告他姐夫如果他乱来，他就开枪。这个女人的丈夫被枪杀了——下巴上有个大洞，在后颈上有个小洞。死者妻子第一次说死者朝她妹夫手中的枪口冲过来。第二天她又否定了昨天的说法，重新解释在死者与她自己谈话的过程中，其妹夫莫名其妙地开枪杀了自己的丈夫。

通过对现场、枪支和同等身材的被害人的模拟调查表明子弹是从后方射中的，不过证据同样并不能排除子弹是从前方射中的。遗憾的是，进行尸检的医生不是一位法医专家。他误把颈部组织里的一块铅块当做火药末。他还注意到颈部弹孔的组织是向内收缩的。验尸官没有注意到在他查看尸体前，

行政长官已经将他的手指伸进伤口里并用一根木杆探过头部伤口。事实上，验尸官没有用探针穿过伤口并拍摄子弹的穿行角度。面对这些事实，这位医生却对子弹的贯穿尸体的方向作出了判断。

在准备葬礼和下葬间隙对死者做了 X 光检验。X 光片显示有一个铅锥在下巴处。其他一些铅粒在后颈一带，与洞口有约 2.5 厘米的距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子弹击穿下巴并从后颈穿出。

犯罪再现的另一个理由是获取有关案件当事人和他们行为的信息。这些信息能用于指导案件侦查或心理画像。当然，犯罪现场再现是用来重现案发当时的真实情况。检察官需要犯罪现场再现则是为帮助他们在法庭上的诉讼与辩论。

如何再现犯罪现场

要想进行犯罪现场再现，必须要了解证据在其中的作用。同一证据可能起到不同的作用。例如，血迹可以用来再现犯罪中的部分行为方式，但是，这些血迹也可以用来确认到底是谁的血迹。我们将证据分为许多不同的种类，但是为达到再现目的，根据证据的作用我们需要对证据重新进行分类。

大多数证据都是用来证实一些具体的情况。指纹、DNA、子弹、弹壳、毒品、纤维物质、保险柜绝缘层等证据都需要查明来源或物主身份。有些类型的证据需要送到实验室进行分析来确认物体的性质或来源。

在现场的证据可以用来进行犯罪现场再现。我们利用证据来确定事件的发生顺序、发生的位置和轨迹，推断方位、推断时间或持续的行为等。某些用于判断案发当时情况的线索具有关联性（relational），即在犯罪现场的一个物体往往与另一个物体或犯罪行为有关；同时这些线索也具有功能性（functional），即它们表明某些物品的作用以及它们在犯罪活动中起何作用；还有时间性，即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事物将发生变化。

关联性的证据是根据它与其他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来确定的。例如，把弹壳和弹道结合起来分析就能得出枪手所在的确切位置；在碎玻璃下的小血滴可能暗示着有人先杀了人然后敲碎玻璃伪装成入室盗窃。根据这些现场物体的所在位置，证据所具有的价值比在实验室里分析所得到的价值要大得多。当现场物体被移动或被收集时没有得到准确记录的情况下，相互关联的线索

就被破坏了。正如斯科特和科耐尔（Scott and Conner, 1997）所指出的：

模拟人的行为其关键是研究人为结果的空间排列是由哪些行为所为。正因为如此，人为结果的物体相互位置关系、包括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比它们自身要重要得多。把某物体从其空间背景中移走将会破坏它对现场行为的再现的作用。

在犯罪现场再现之前调查人员移动某些物体，这样做将会破坏一些物体原先客观位置的信息。

功能性证据是一个术语，用来说明事物如何发挥自身作用和功能。甚至人的身体有时也可以被视为功能性证据。人在某种移动的情况下并不会导致骨折，因为被害人对侵犯行为的反应性动作也是功能性的。

功能性证据指一个物体的操作状态，如在自杀现场的枪支保险没有被打开或枪膛里剩余子弹的数量可以看做是功能性证据当中的最重要部分。

案例

一个老头在他妻子看电视时说自己已经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老头发现妻子不在身边。她躺在卧室的地板上，身上有枝霰弹猎枪。一个弯衣架绕过扳机。看上去她是因左肋中枪被杀的。

当警方检查猎枪时发现里面子弹是满的。后来老头承认是他开枪打死了妻子。老头当时忘记警察会检查武器的功能情况。

对这些证据类型的观察和检验为现场再现提供了基础。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的证据类型，即丢失或推测的证据。犯罪嫌疑人从现场拿走的东西也是证据，对现场再现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不得不推断这些证据的原始位置情况。

通过时间和周围环境对证据产生的影响效果，我们对证据作了分类，现在我们转向现场再现过程中的证据使用类型：

1. 顺序性证据。
2. 方位性证据。
3. 行为证据。
4. 位置证据。
5. 所属关系证据。

6. 限定现场的证据。

顺序性证据在于确定事件发生时间的先后。例如，在车印上的脚印，说明是汽车开走后才有人站在车印上面。

方位性证据帮助我们判断现场发生过的活动方向。例如，血滴的尾尖指朝溅血的方向，子弹的跳弹痕迹和鞋印等能说明事物的前进方向；反之，也说明事物的来路方向。

行为证据则显示当事人的动作或行为。这些证据有时与方位性证据是一致的，如血液喷溅点表明某种动作及动作方向，但也有些证据表明某种行为，诸如一些碎片或墙上的凹陷点往往说明有物体被人摔过或撞击过，地毯上一些细微的塌陷痕迹则说明家具通常就放在这个位置上。

位置的判断并不只是根据各种证据的位置，还要根据这些证据的位置朝向。在客车窗内壁上的手印意味着这个人曾在车内。如果手印指向朝下，可能意味着这个人扒着玻璃想和驾驶员说话。在门上的工具撬盗痕迹其朝向则可以说明这个“窃贼”实际上是一个汽车保险的诈骗犯。

所属证据或证据来源通常是由刑事实验室进行检测推断。谁的指纹？谁的血迹？谁的鞋印？谁的工具？所有的问题都将由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来回答。这些问题的答案对犯罪现场证据的解释至关重要。

限定性证据是说明现场情况的证据。这些证据通常不被视为证据，但我们却在草图、照片和录像当中把现场记录下来。房屋的墙是界限，方位性证据可以让我们超出第一扇墙进入另外一个区域或房间，去寻找现场的其他部分甚至是第二现场。墙是不是把其他人员排除在现场之外的真实界限，还是人为认定的界限还值得商榷。如果现场有证据表明还存在其他犯罪场所时，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界限拓宽。当然，首先把现场的界限扩大然后再适当收缩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

即使是几个月或数年以前的案件，进行犯罪现场再现的人员也必须尽量亲赴现场。利用照片来观察空间位置关系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一份带有详细测量数据、附有照片的草图能提供三维模型或计算机制图。这在视觉上、感官上效果很好，当犯罪现场再现人员不能亲临现场查看时，这样的草图可以被利用上。福尔摩斯说过：“排除其他可能性，所剩的无论多么不可能也都是事实真相。”分析人员从什么地方寻找案件的各种可能呢？第一个需要去看

的就是被告提到的地方。我们已经讨论过，如何利用被告人的陈述与证据的不一致来发现被告人在撒谎，但我们必须要证明他的陈述与证据相矛盾的地方。

案例

一天晚上，爱尔墨（Elmer）和爱德娜（Edna）在酒吧里喝多了。他们走出酒吧不久，爱尔墨给警察局打电话说他意外开枪打死了爱德娜。当刑警到达现场后，爱尔墨给他们看他的半自动22点来复枪，给警察讲爱德娜取笑他阳痿，于是他打算自杀。爱德娜过来抢夺他的枪，结果枪走火打死了爱德娜。

爱尔墨的陈述听起来似是而非，但爱德娜身上中了三枪。一枪在离胸部中央18厘米距离点，一枪在靠近右胸12厘米距离点，一枪在后背靠下6厘米距离点。刑警认为爱尔墨在撒谎，因为没有人会意外地连开三枪！鉴定人员对现场进行了彻底详细的记录。这份记录报告考虑到犯罪现场再现专家没法到达现场时要对现场进行再现，所以记得很详细。从房间的家具和尸体的摆放位置来看，爱德娜是被近距离正面击中的。在这种布局下，弹壳应该在开枪者的右侧（被害人的左侧）的梳妆台上。但为什么弹壳在开枪者的左侧呢？当有人用来复枪自杀时，自杀者通常都会旋转枪支以便自己的拇指能够得到扳机。如果来复枪是被自杀者托着，那么枪是被倒过来的，子弹应射向自杀者的左侧。如果拇指弯曲并挂住扳机保险，试图打开保险会可能造成多次击发。

通过对爱德娜右手袖子的检查发现有火药屑末，这与她右手夺枪是符合的。但很遗憾的是，当时警察没有想到提取来复枪上的指纹，后来想到这一点再去提取指纹时已经太迟了。

爱尔墨的陈述似乎是真的，但还没有证据来证实他的陈述。与此相反，部分证据的所在位置却支持了他的陈述。

这个案件的关键是没有根据各种可能情况对证据进行解释，也没有摒弃犯罪嫌疑人的自我陈述。弹壳的位置需要被分解来解答这个疑问。如果弹壳、家具的位置没有被准确地记录下来，这个案件将会导致一起冤案。

证人对案件的陈述也会出现上述那样的多种可能性，因此需要用物证来加以证实。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目击证人的证词是不可靠的。目击证

人经常会用自己所看到或所听到的一些东西来充实他们所看到的不连贯之处。但是，物证却不会因此发生变化。在询问证人时一定要小心，告诫他们不要对所看到的事物进行归纳整理，同时，要用证据去核实他们的证词。现场调查人员经常对现场发生的情况进行推测，这些推测如果不正确，将会误导他们的侦查方向。对犯罪案件要尽可能快地进行现场再现来验证这些推测。

检察官通过说明案件极其残忍的性质来让人们相信被告就是真正的作案凶手。被告辩护人却极力开脱被告人。他们对犯罪行为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推测都带有主观性。他们的观点都可能不正确，如果没有进行现场再现，两者可能都是错误的。他们的推测只是一种可能性，需要用证据来证实。

当谈到可能性时，有人可能会说：“是的，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外来人闯入后院实施了这起案件。”这是一种想像的可能性，应该立即被抛弃。但利用想像去发现其他可能性是合法的。在整个凶杀组侦查人员绞尽脑汁讨论各种可能性的情况时，这种方法对案件侦破中是有效的。

对案件的任何推测都必须有逻辑性——说明物证和物证在现场中的位置关系。正是通过这样的分析，画像人员把作案人的行为呈现出来，并说明犯罪人作案的行为动机和目的。

参考文献

1. Gross, H. (192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London: Sweet and Maxwell, p. 2.
2. Kuhn, T. S. (1997) The Essential Tension, Objectivity, Value Judgment and Theory Choice, p. 320.
3. Peterson, J. (1973) Monograph on Crime Scene Technician.
4. Rynearson, J. and Chisum, W. J. (1997) Evidence and Crime Scene Reconstruction, 5th ed., Sacramento, CA: National Crime Investigation and Training.
5. Scott, D. and Conner, M. (1997) In Haglund & Sorg (Eds.), Forensic Taphonomy, Haglund & Sorg, (Eds.) Ch. 2, New York: CRC Press.

第6章 证据动态变化

W. Jerry Chisum, B. S. and Brent E. Turvey, M. S.

犯罪现场再现是推断犯罪行为发生期间的事件和行为的过程……

犯罪嫌疑人画像是根据犯罪分析来确认最大可能作案嫌疑人的大体特征的过程。

——李昌钰：《犯罪现场侦查》（1994，p. 191）

刑事科学家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对犯罪情境及行为进行犯罪再现。结合证人真实的证言，犯罪再现是确定案件事实真相的有力方式。当遇到相互冲突的证言时，犯罪再现可以提供更为客观的依据；当缺少证人证言时，犯罪再现还可以用来探究、确认犯罪现场的真实情况。总之，犯罪再现在刑事案件调查和司法审判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由于牵涉到各种复杂证据和现场情形，犯罪再现工作者需要渊博的刑事科学知识，并对物证的鉴定、理解持有客观、公正但又不保守的态度。正如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里华生医生所说的那样“犯罪再现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推理能力”（Reik, 1945, p. 246）。

尽管犯罪再现对刑事侦查和司法审判非常重要，然而，犯罪再现经常被那些无知的和自负的人员进行。他们缺乏有关物证特性和刑事科学的相关知识与培训。在犯罪再现范围内，有些专家的鉴定也经常被作为其他未经检验结论的前提，或者有些案件的事实是来自案件的记录文件。尽管专家具有大量的学习、训练和经验，然而，未经检验就加以引用，这是不合法的实践。“已具有的经历并不能减少专家的责任感，相反，必须以站得住脚的科学依据支持自己的见解”（Thornton, 1997, p. 17）。

在司法实践中，没有人怀疑根据现场物证进行犯罪再现得出的有关犯罪

情境及行为的结论。但事实上这样的结论也经常包含一些不可靠的因素，如证据上的漏洞、逻辑上的不连贯及不能排除的可能性等。笔者这样讲并不是否定犯罪再现在刑事侦查和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而是想说明，犯罪再现的作用不仅仅是得出某种确定性的结论，更重要的是重现整个犯罪过程，搞清楚受害人、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检验证人证言，指导侦查方向，以及甄别潜在的犯罪嫌疑人等（Lee，1995，pp. 10 ~ 11）。

此外，在案件中还经常发生某物证被排除，或无法确定，或模棱两可的现象，这对于侦查和司法活动也有重要影响。刑事分析往往就一般而言，犯罪再现则关注具体的内容，这种具体的内容能从现场的物证中得到印证，然而，有时现场的物证也无法确认某些事实。如此看来，认识现场物证的作用和局限性对犯罪再现非常关键。由此出发，我们将深入论述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犯罪再现、证据的动态变化三者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刑事鉴定中的应用情况。

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的发现

19 世纪后期，阿封斯·贝迪永（Alphonse Bertillon）（1853 ~ 1914，法国人类学家）在巴黎创立了一种记录个人特征的科学方法（Lee et al.，1983，p. 10；Saferstein，1998，p. 3）。他从 1879 年开始在警察署分局任职。当时警局堆积如山的罪犯档案亟待整理。贝迪永借鉴他父亲——一位人类学家对人体骨骼测量的方法对警察局卷宗中的罪犯记录进行了整理。

他改进了其父亲的骨骼测量方法并应用到犯罪嫌疑人身上。这种方法基本上是采用了一些相对简单的步骤对人体进行一系列的测量，但仅仅局限于生理指标。然后再将这些测量数据填写在一张个人身份卡上并放进警察局的档案袋中。随着这种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贝迪永还在这种个人身份卡上添加了照片。对于当时的刑事侦查人员而言，贝迪永给他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一些犯罪分子的背景资料。

贝迪永进一步改进他的方法不仅是为了更方便地查找犯罪分子及他们的行踪。他的这种方法是为了证明他的个人信念，即在地球上的任何事物都具有独特性（Rhodes，1956）。他的这种想法在当时的侦查领域不失为一种前卫的创新。当时，他有一个很先进的观念：在刑事侦查及解决犯罪问题上应该广泛应

用刑事科学和逻辑学。正如贝迪永的传记中所言（Rhodes, 1956, p. 73）：

直到1879年，法国警方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沿袭着当时耍小聪明但不道德的刑警尤金·维多克的违法手段，即随意启用秘密侦查力量和诱发犯罪人。

贝迪永的方法至少被法国执法部门采用了20年，直到后来被指纹登记所取代。在1893年，奥地利的治安法官和犯罪学家格罗斯博士曾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变化：指纹登记明显比贝迪永的方法先进并且更可靠，而且，被公认可以万无一失地取代后者作为人身识别手段（Hans Gross, 1924, p. 185）。

但是，贝迪永的贡献不仅局限于刑事技术科学。他还创新了人体精确测量方法、摄影技术并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应用。贝迪永还首先在对犯罪嫌疑人的容貌和物证进行摄影时利用了标尺。这种方法迅速被刑事侦查人员所接受并流传开来。贝迪永经常和刑事侦查人员一起勘查犯罪现场。他对受害人尸体、现场脚印、污迹、工具痕迹、现场入口等进行拍照，而在此之前刑侦人员和法庭只能依赖不准确的绘图和记录来了解罪案全貌。

贝迪永还指导过数位学生，并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包括埃德蒙·洛卡尔（Edmond Locard）博士。他的贡献即提出了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学术界一致认为该定律奠定了刑事科学技术的基石。洛卡尔博士同他之前的格罗斯博士及贝迪永一样，都极力主张在刑事侦查和物证鉴定过程当中采用科学方法和逻辑推理。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犯罪学家、刑事科学教授桑顿（Thornton, 1997, p. 29）所言：

“刑事科学家几乎已经普遍地接受了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这条定律是洛卡尔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当时洛卡尔是法国里昂第一所犯罪实验室的主任。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是指一旦两件物体相接触，其间必将发生物质交换。”

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贝迪永的影响，洛卡尔确信，当人与其他物体或其他人发生接触时，他们之间必然出现物质交换。通过寻找、记录和检验这种物质交换的证据和特征，就能发现某犯罪人是否与某现场、物证和受害人有关。勘查这种物质交换的痕迹就能判断两个客体之间的联系。这就是所谓的因果关系的逆向推理，知道结果就能找到原因。

刑事科学家也认识到这种物质交换的特征与范围不仅能用于确定犯罪人

与现场、物体和受害人之间的关系，还能确定与某种特殊行为的关系。^①

犯罪再现

犯罪再现是指重现案发时犯罪嫌疑人在现场实施的犯罪行为（Chisum, 1999）。只有对犯罪现场的物证进行仔细、专业性的勘验和详细的犯罪现场记录才能确定案发现场当时的真实情况。贝迪永创立的现场照相对于犯罪再现也是非常必要的。各种证词，包括证人证言、受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的交代也可以通过犯罪再现来进一步得到确认。

现代犯罪再现的方法都是从以前的逻辑分析理论和刑事技术应用中发展而来。贝迪永、格罗斯博士、洛卡尔等人对上述方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流传下来的主要思想包括在刑事案件侦查中注重物证、证据的客观性、逻辑应用，以及关注证人证言、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陈述等。

在19世纪末期，格罗斯博士曾论述过怎样进行犯罪再现，提醒犯罪侦查人员对待案情要具有客观、公正的态度，以及系统分析和判断的能力，并在案件调查中注重逻辑性、事物发展的连续性，逐一全面地定位分析每个情节（Hans Gross, 1924, pp. 11 ~ 12）：

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不可能知道什么……

刑事侦查专家只要发现哪怕点滴的夸张迹象，就应竭力认真回避，否则这些专家所作的鉴定结论将不具有可信性，甚至所作出的鉴定报告还可能害人不浅。

……所有的犯罪现场因素都必须从头至尾加以考虑并要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检验。如果在某个环节上逻辑不清晰，侦查人员就应该产生质疑，并在这个地方停顿下来进行分析研究。

洛卡尔博士对待利用物证及犯罪再现上也有相似的观点（Reik, 1945, p. 246）：

犯罪学家从犯罪嫌疑人留下的细小痕迹中发现了真凶，就正如考古学家从他们的发现中重组了古代生物一样。

^① Cwikil, 1999; Lee et al., 1983; Inman and Rudin, 1997; Kirk, 1974; Safeestein, 1998; Taupin, 1996.

维也纳大学的心理分析教授，弗洛伊德的早期弟子瑞克博士，也主张在犯罪案件的调查中同样要讲究客观性及逻辑性（Reik，1945，p.29）。

刑事学家进行推理的目的就是对物证进行分析并找出真凶……

冷静依据逻辑原则对案件事实保持客观态度及犯罪再现是刑事侦查人员推理过程中的重点。

在20世纪后半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刑事学教授科克博士，在证人证言、现场物证及犯罪再现问题上与格罗斯博士和洛卡尔博士持有相似的观点（Kirk，1974，p.33）：

物证的充分利用在解决大多数刑事案件过程中非常关键。警方将不会再轻信口供，但过去却恰恰相反。证人证言并不完全可靠，有丰富经验的刑事侦查人员或律师都不轻信证人证言。只有现场物证被充分检验、分析研究后才万无一失。

科克博士本人完全赞成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指出这种物质交换对犯罪再现的重要性（Kirk，1974，p.2）。

“无论犯罪人在哪儿停留，无论他接触过什么，无论在现场遗留了什么，即便是无意识状态下的所作所为，现场物证都将会作为一名无言的证人目睹他所做的一切。不仅他的指纹或脚印，而且他的头发、衣服纤维、他打碎的玻璃、留下的工具痕迹、刮下的漆皮、身上留下或排出的血迹或精斑，所有这些都可以作为物证。这些物证将会记录下犯罪嫌疑人所做的一切，而且永远生效。”

但是，科克博士也提醒在对解释物质交换现象时要特别谨慎。例如，在确定一个物体来源同一性的过程中，他明确指出，即使在非常好的条件下，得出的结论也并不一定真实可靠（Kirk，1974，p.15）：

在检验和分析物证时必须区别其同一性与独特性，这样有助于刑事学家的判断及辨别这些材料的来源。两个物证，一个已知而另一个来源不明，那么，仍可以根据两个物体的同一性判断其有相同的来源。作为专家证人，刑事学家应该敢于承认绝对的同一性是不存在的，但证明两件物质为同一来源则并不困难，所以，当他就此而面对反诘时决不必心虚。

更确切地说，在对待专家证言时一定要谨慎。某些不合格的或带有偏见的专家证人容易对某人或对某一类型人的身份进行错误的同一认定，事实上，

这种同一性根本就不存在。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他们混淆了同一性的特征，或不能正确评价他所观察到的结果，或由于他整个技术水平太差而得不出有意义的结论。

李昌钰（Henry Lee）博士，前康涅狄格州州立警察犯罪实验室的主任，也主张刑事学家在犯罪再现过程中一定要将物证和逻辑分析结合起来进行（Lee, 1994, p. 191）：

犯罪再现不仅涉及现场的科学分析、现场场景的模式解释及实验室对物证鉴定的结果，还包括现场相关信息及逻辑的系统分析。

前面提到的科克博士的学生，桑顿博士也主张刑事学家在进行物证鉴定时一定要严格应用逻辑学原理（Thornton, 1997, p. 13）：

归纳是一种逻辑推理形式，即从个别到一般，得出一个概括性的结论，归纳结论常被称为前提。但这个前提是在某种情况下的假设，它可能并不一定成立。演绎是从一般到个别或特殊的逻辑推理，这种方式经常应用在刑事侦查实践中。如果我们认为前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演绎结论也应成立。但在刑事侦查实践中，能否肯定前提是否成立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在实践中常常误认为某些其实不然的前提成立。

对大多数刑事学家而言，他们在对待归纳与演绎方法上并不谨慎。他们未能认清归纳不是演绎，归纳仍是需要检验的假设和修正的理论。当某个假设仍需通过验证时，他们已过早地宣布其假设就是演绎推理的结论。

刑事专家理查德·绥弗斯丁（Richard Saferstein）博士，前新泽西州警察实验室的首席刑事专家也认为（Saferstein, 1998, p. 69）：

犯罪现场遗留的物证在重现案发当时的情景时非常关键。对现场物证的收集、记录是进行犯罪再现的基础。

本书作者之一，也是科克博士的学生曾在法庭上作出令人信服的辩论，他认为，对于法庭而言，就是要根据犯罪再现来判断一个案件的真实过程（Chisum, 1999）：

检察官通过描述案发现场是如何的惨不忍睹来使大家相信被告就是真正的罪犯，而辩护律师却为被告开脱罪行。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双方都出示各自收集到的证据来说明案发当时的具体情境。但事实上两者不可能都是对的，因为他们都没有进行犯罪再现，并且也可能都错了。

对两种说法都应通过证据来鉴别，任何观点都必须具有逻辑性，能合理地清楚地解释现场存在的物证及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只有通过这样的分析才能揭示作案人的真实行为。

如前所述，犯罪再现涉及对所有现场物证的检验，这些物证包括遗留在现场的物品，还有从受害人、作案人身上移动过的物证。刑事专家通过这些物证，根据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来确认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或现场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对互动关系的判断也要根据有效的和可靠的证人证言、受害人陈述，还有犯罪人的交代。由此，既能得出有关犯罪情况的一些假设，也可能形成对案件真相的曲解。最后根据逻辑推理而得出结论便是合情合理的。正如侦探小说福尔摩斯在《四签名》中所言：“当你已经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事，所剩下的即使看上去不太合乎常理也一定是事实。”

证据完整性假设

犯罪再现过程往往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遗留在犯罪现场的所有证据已经按其原始面目被寻找到、记录、收集、鉴别、比对识别、复位。这个假设要求警方做到对现场进行摄像、封锁、拍照、测量等措施，还必须保护好现场内的物证。随后通过刑事技术鉴定和犯罪再现得出的结论被认为是对现场的真实反映。但事实上这种假设也不总是正确的。

即使是一条可信赖的证据链被确认下来，^①但是证据在警方收集或鉴定过程前或过程中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变化。除非证据的完整性被完全确定下来，合法的证据干扰得到解释，但证据链本身仍不可能提供令人完全信服的科学鉴定结论。

在犯罪再现过程中其中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是证据的影响力或证据动态变化。

证据的动态变化

犯罪再现就是要发现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做过的行为痕迹或行为结果。正如 Grosz 博士所言“何为行为痕迹？何种原因所致？”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

^① 参见 Lee et al. (1983), Dehaan (1997), Lee (1994) and Saferstein (1998)。

利用逻辑推理及刑事科学理论，诸如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常忽视某些物证在被检验前后就发生了变化，进而缺乏这方面的深入研究。

“证据的动态变化”已被众多学者丰富和发展。许多学者提出，证据会在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发生变化、移位、模糊或消除现象。证据动态变化发生在物证开始被作为证据被收集至案件终结之间。对于那些熟悉证据受动态变化影响并能对这些影响进行分析的刑事专家而言，他们把“证据的动态变化”当做一个必要的术语用于描述现场再现。就整个犯罪再现过程来说，恰如其分地评估物证的动态变化是非常必要和关键的。

在理解证据的动态变化时，要注意两个问题：首先，从案发当时起到对证据进行检验，要考虑这段期间有没有一些证据发生明显变化？如果某个物证被挪动、变动或模糊，物证鉴定人员在分析这些物证时一定要同时考虑到这个物证在何时、何地发生过什么变化。其次，现场是否存在一些能消除或破坏现场物证的因素？刑事技术专家只有通过他们的分析判断来确认现场中存在的物证是否发生过变动。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理由说明现场情境能影响或改变物证状态的话，那么，物证鉴定人员就不应该假设现场物证已发生过变动。

影响证据动态变化的可能性有许多种，这种可能性的东西曾被视为证据。这些因素虽不全面但应考虑到，以下列举了一些。

犯罪行为：作案人从开始实施犯罪到完成犯罪，这期间的行为将会影响遗留在现场的证据性质和类型。这些行为包括反侦查行为（precautionary act）、仪式行为（ritual）、幻想行为（fantasy）及现场伪造行为（stage）。反侦查行为指作案人在作案前、作案中或作案后有意识地实施阻碍、混淆或转移侦查视线的行为。通过这些行为犯罪嫌疑人想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使侦查人员确认不了他与案件行为乃至案件本身有什么关系（Turvey, 1999）。现场伪造则是一种特殊的反侦查行为，这种行为主要破坏现场物证、掩盖事实真相并转移侦查人员的视线使作案人能逃避罪责。现场伪造行为通常包括，对现场物证进行添加、毁灭或变动处理以掩盖作案人真正的作案动机或目的。犯罪行为过程中的仪式或幻想行为也会影响作案人的行为，如碎尸、奸尸、在现场有目的地放置或排列尸体或物品等（Turvey, 1999）（见图6-1）。



一名男子死在房间里，身上有被殴打的伤痕和刀伤。凶手在死者尸体周围摆放了许多色情图片，在死者的生殖器旁、衣服里面也放有色情图片。凶手把一个沾满死者鲜血的网球放在死者头部旁边的茶几上的一个玻璃杯里，在受害人死后还用火柴烫死者脸部。凶手还实施了其他行为来发泄带有性指向的愤怒

图 6-1

受害人行为：受害人在犯罪行为发生前使用过的一些工具也可能被误认为是现场证据。受害人在受害过程中的行为，如挣扎、搏斗、逃跑等也能影响遗留在现场的证据，还会影响到被告人的行为，这些行为可能导致证据的变动和转移。受害人行为还可能包括受害人在受害后清洗身体或现场，这将严重破坏现场证据。

物证二次转移：我们所论述过的物证转移是由于受害人或作案人的身体接触，或他们与物体之间的接触而产生的物质转移（Cwiklik, 1999; Lee, 1995）。物证二次转移则指证据经过一次性转移后的第二次转移，与第一次证据转移的情境没有任何关系（见图 6-2）。

例如，一名身穿羊毛衫的罪犯在受害人家里杀死了一名女性。罪犯在受害人身上留下了大量的羊毛纤维。受害人邻居听见了搏斗声前去营救。当受害人邻居冲入房间抢救受害人时，一些羊毛纤维也沾在了这位邻居的衣服上。当把这件衣服送往实验室进行检验时，发现衣服上的纤维和死者身上的纤维

相一致，致使刑事侦查人员怀疑这位邻居就是犯罪嫌疑人。除非犯罪现场被彻底地勘验过，并意识到物证可能发生二次转移，这位邻居将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杀人凶手。



这是一个强奸杀人案件的受害人，一位年龄才10多岁的女孩裸露的尸体在乡村的一个长有茂密草丛的农场边被发现。死者的衣服在附近被找到。凶手强奸了她，然后用刀把她捅死。她的尸体被抛弃在现场，身上盖有一些草，不注意看根本看不出有具尸体。凶手把现场布置好后有充足的时间逃离现场。尽管现场足迹表明这是第一现场，但是否属实还值得怀疑

图6-2

证人：在犯罪行为发生后，证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证据的性质和效力，例如，为保护受害人的尊严而不如实作证，以及在现场上，从奄奄一息或已死亡的受害人身上偷拿东西，等等。

天气或气候：案发当时的天气也能影响各种现场证据的效力，如由于天气或气候造成证据的毁灭或破坏，影响着尸体腐烂的速度快慢，等等。

尸体腐烂：尸体伤口处的肌肉组织腐烂将会破坏、毁灭或新产生一些损

伤证据。人们通常很少留意腐烂尸体衣物上残留的微量物证或转移证据。

昆虫活动：苍蝇、蚂蚁、甲虫和其他昆虫也能破坏尸体上伤口处的证据痕迹。它们也能移动、破坏或毁灭那些转移的证据。



a



b

一位老妇人在房间里被发现死于枪杀。凶手先开枪打死了与她住在一起的儿子，然后再开枪杀了她。凶手后来放火烧着房间的东西。受害人儿子的尸体在房屋外被发现。在将火扑灭以后，警察才能进入房间搜查，发现受害人的尸体趴在厨房里。现场着火和救火行为很可能破坏了现场的血迹痕迹和枪弹痕迹

图 6-3

动物的觅食：本地各种野生动物，如老鼠、野狼和熊的觅食行为将会挪动、破坏或毁灭尸体及伤口处的证据痕迹，或造成新的伤口。

现场着火：在一些案件现场能发现有着火燃烧痕迹，部分是人为故意放火点燃的，但也不排除有自燃的可能。现场着火燃烧的后果能够使与犯罪活动有关的一切物证变得模糊甚至完全毁灭。作案后纵火还能掩盖犯罪行为，甚至毁掉证据，不过纵火的证据却能保留下来（见图6-3）。

救火行为：在着火现场往往就有灭火行动乃至动用消防队员参加的灭火过程中经常会使用高压水龙头、大型水龙带，还可能使用化学试剂。上述灭火器械或试剂的单独或联合使用都将会改变现场证据的位置，破坏证据的外在形态，造成潜在的、令人误解的证据变化，或者给现场新增一些人为的证据。^①

警察：首先赶到案发现场的警察的首要职责是抢救伤员而不是保护现场。但他们也尽量做到保护现场避免遭到进一步破坏。他们的行为也可能改变了现场证据的原始位置、破坏了物证形态，导致证据转移或新添一些现场人为证据。

医疗救护人员：医疗救护人员在现场抢救伤员的过程中可能改变了现场证据的原始位置、破坏了物证形态，导致证据转移或新添一些人为证据。并且，他们还可能给受害人新添一些医疗救助的创伤（见图6-4）。



在一起便利店抢劫案中，一个成年的亚洲女性被枪杀。从图上可以看到死者衣服被脱掉，咽喉部位被医疗人员剖开进行急救。如果没有准确的记录或观察，这种情况会被误认为是凶手干的

图6-4

^① 人为证据指犯罪嫌疑人以外的其他人行为致使现场证据发生改变或增添了附属物的证据，往往被误认为是案发现场的真实证据。

现场勘验人员：现场勘验人员在现场寻找、保存、记录和收集物证过程中要求做到不改变现场证据的原始位置、破坏物证形态、避免证据转移或新添一些人为证据。勘验人员在进入现场前必须把现场进行全面摄影记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勘验过程中人为造成的现场变化能被清楚地识别出来。

刑事勘查的技术人员：现场勘查的技术人员其勘查行为也可以改变现场证据的原始位置、破坏物证形态，导致证据转移或新添一些人为证据。造成这样的结果可能是由于采用了不合适的物证保存方法，或者对物证使用了破坏性的分析方法，或者在受害人尸体或衣物的运输和保存中改变了物证的一些原始痕迹。

法医：法医从现场移动尸体的行为过程中也能改变现场证据的原始位置、破坏物证形态，导致证据转移或新添一些人为证据。这些行为过程包括将尸体在最初发现的地方进行移动、将尸体放进尸体袋，以及从现场运走尸体的过程。上述行为将会改变在受害人衣服上的图案证据，以及可能毁掉有潜在价值的转移证据。

典型案例

下面的案例均摘自作者的案例记录。

案例 1：现场着火和灭火行为

一名年轻女子到她男朋友家居住，家里有她男朋友的母亲。由于这名女子和她男朋友发生争执，当晚这名女子的男朋友和他母亲被枪杀，死于失血过多。这名男子的尸体在屋外被发现，附近有血痕。在这名女子拿走屋里值钱的东西后放火烧了房子和她男朋友的尸体。考虑到屋外的尸体，附近有拖动的痕迹和血迹，有关犯罪行为和情境一目了然。但是，随后对发生在屋内的枪击、放火行为以及作案人与受害人之间的位置关系的现场再现效果明显被削弱了。其原因在于墙壁、家具、地板、屋内物品、这位母亲的尸体及现场血迹都有挪动和被破坏的痕迹。这个案件的现场分析部分如下：

这个案例不能进行精确犯罪再现的原因在于从案发后至刑事技术人员进入现场之前的火灾及救火行为破坏了现场。由于救火，火被扑灭后只能对残缺不全的现场进行摄影录像。救火行为的破坏性方面包括：

火灾殃及两层楼的多间房屋；

每分钟向屋里灌入近 4600 升的水，为灭火和抢救财物而毁坏或挪动屋里物品，还有消防水龙带在房屋里拖动所造成的破坏；

大约 50 名消防队员在救火过程中在房屋里进进出出也对现场造成了破坏。

案例 2：尸体腐烂及昆虫活动

一名青春少女失踪两周后被发现。尸体躺在一片无人居住区后方的草丛中。尸体被放在一个沉重的水缸下，用一张新丢弃的地毯包裹住，上面又盖了几层旧地毯。

根据验尸报告，死亡原因是堵塞受害人的口并可能同时扼勒颈部使其窒息而死，从尸检照片可以看到死者嘴里塞着她的内裤。同时死者的下颌遭受重击而骨折。

存在的疑问是凶手是用手掐还是用某种绳子勒住受害人使其窒息死亡？由于尸体高度腐烂，颈部的软组织已被大量的蛆所吃掉，因此很难作出判断。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刑事技术人员不可能确定凶手是否同时用手掐还是用绳子勒死受害人。但这些都不能排除，只不过无法断定，故不能作为分析的假定依据。

案例 3：证据二次转移和现场勘验人员

一名年轻女子的尸体在她屋里的沙发上被发现，家里住有她母亲和弟弟。死者被发现时只穿有一件衬衣和胸罩。死亡原因是被人用手勒住颈部窒息而死。该女子处女膜早已破损，有大量的肛交创伤并有过性滥交历史，从这些可以推断该女子行为放荡。在死者会阴部位发现一些精虫，经过 DNA 鉴定，认定是死者母亲的情人留下的。

考虑到犯罪现场的位置和周围环境，很难对现场证据的转移问题作出精确判断。其中一种可能是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发生过性关系，结果精虫留在了死者的会阴部位。但是，犯罪嫌疑人与死者的母亲在她母亲的床上也发生过性行为，死者与她弟弟在她母亲的床上嬉闹过。也有报告表明犯罪嫌疑人与死者母亲在沙发上也发生过性行为，这个沙发死者也曾坐过。另外，现场录像也显示当几个现场勘验人员有时戴有手套或没有戴手套检验尸体或进行拍照时，接触过靠近沙发及其他位置的物证，然后又接触死者身体的好几个

部位。鉴于上述可能以及死者生前行为，该案例可能潜在的物证转移情境如下：

1. 在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强行发生性关系时精虫从犯罪嫌疑人身体转移到死者身体上。
2. 在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自愿发生性关系时精虫从犯罪嫌疑人身体转移到死者身体上。
3. 犯罪嫌疑人在沙发上留下的精虫转移到死者身体上。
4. 犯罪嫌疑人在死者母亲身上留下的精虫转移到死者身体上。
5. 借助现场勘验人员手指将精虫转移到死者身体上。

案例4：医疗救护人员

一名年轻人被一伙对立的帮派分子捅了几刀，他在跑向住处的途中倒在地上。在医疗救护人员赶到前拍摄的现场照片显示地上有一摊血迹，受害人面朝下躺着。随后的现场照片显示5名医护人员在受害人腹部进行包扎。受害人被翻转压在血迹上，因此现场血迹被严重破坏而无法作为复制死亡当时情况的依据。

案例5：法医行为

一个受害人遭受性侵犯并且其喉咙被割断的案例，现场拍摄的死者照片显示在受害人衬裤上有一块血斑。死者衬裤上的血斑可能是凶手遗留下来的，法医当时没有在现场脱掉死者的内裤。当衬裤被送往实验室的过程中在尸体袋里被死者的血迹所浸湿了。这块血迹就这样被毁掉了，因此很难通过提取这块血迹来认定凶手的身份。

案例6：受害人的行为

在这个案例中，受害人在案发前的行为产生的“虚假证据”被误认为犯罪物证。一女子和她的男友在其男友的汽车里发生了性关系。该男子开车送她回住所。当该女子开门进入卧室时发现了一名入室盗窃者，在这名入室盗窃者勒死她之前该女子极力挣扎并拽烂了衣服。随后其男友被警方怀疑是强奸杀人犯罪嫌疑人。因为在该女子的阴道内发现了其男友的精液。在通常情况下法庭会宣判他有罪，幸运的是该男子有发案时不在场的辩解。他送女友回家后在离死者住所几条街的地方被缉毒队盘查，随后被带到警察局。当时

他没有作案时间，因为邻里听到发案时的呼救声时此人还押在警所里。

案例 7：家人行为

一名老年男子死在床上。经过法医检验发现在他的颈部上有勒绞的痕迹。这些痕迹看上去像是上吊后才产生的。当询问家人时，家人最后才承认该男子是上吊自杀。由于其家人不愿让他的自杀行为给家人增添耻辱，于是家人把他放下来给他换了身衣服并把他放在卧室床上。自杀现场就这样出于顾及脸面而被死者的家人给破坏了。

结论

总之，如果在犯罪再现过程中忽视证据动态变化将可能导致对物证的歪曲理解，并使犯罪再现结果不准确或不完整。在刑事侦查、法庭审判及行为证据分析中，应用上述的证据将缺乏根据性并降低了可靠性，会在司法、侦查及学术领域内造成危害结果。刑事专家有责任谨慎地对犯罪情境和相关行为进行犯罪再现，还要意识到，证据是动态的，证据的变化也会影响犯罪再现。只有这样考虑，才能使有关犯罪再现的结果成为对现场物证最全面而准确地反映。

参考文献

1. Chisum, W. J.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Crime Reconstruction", in Turvey B., Criminal Profiling: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vidence Analysis, London: Academic Press, pp. 73 ~ 85.
2. Cwiklik, C. (1999) "An Evalu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ransfers of Debris: Criteria for Association and Exclusion",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44 (6), pp. 1136 ~ 1150.
3. DeHaan, J. (1997) Kirk's Fire Investigation, 4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 Hall.
4. Gross, H. (192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5. Inman, K. and Rudin N.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DNA Analysis, New York: CRC Press.
6. Kirk, P. (1974) Crime Investigation, 2n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7. Lee, DeForest, P. and Gaensslen, R. E. (1983) Forensic Science: An

- Introduction to Criminalistics, New York: McGraw – Hill.
8. Lee, H. (Ed.) (1994)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Taoyuan, Taiwan: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Press.
9. Lee, H. (Ed.) (1995) Physical Evidence, Enfield, CT: Magnani & McCormick.
10. Reik, T. (1945) The Unknown Murderer, New York: Prentice – Hall.
11. Rhodes, H. (1956) Alphonse Bertillon: Father of Scientific Detection, New York: Abelard – Schuman.
12. Saferstein, R. (1998) Criminal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Science, 6th ed. ,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 Hall.
13. Thornton, John I. (1997) "The General Assumptions and Rationale of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in Faigman, D. , Kaye, D. Saks, M. and Sanders, J. (Eds.),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Law and Science of Expert Testimony, Vol. 2,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
14. Taupin, J. M. (1996) " Hair and Fiber Transfer in an Abduction Case – Evidence from Different Levels of Trace Evidence Transfer",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41 (4), 697 ~ 699.
15. Turvey, B. (1999) Criminal Profiling: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vidence Analysis, London: Academic Press.

第7章 分析伤害形态

Brent E. Turvey, M. S.

伤害是由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实施的故意行为或意外行为造成的结果。伤害的严重程度、范围大小，以及伤害形式由施加外力的大小、作用的时间、身体的着力部位和施暴物体或凶器的特征等因素决定（DiMaio and DiMaio, 1993, p. 87）。因此，伤害是行为和动机的物态识别标志，是行为证据的一种。

分析伤害形态（Wound pattern analysis）包括伤害的鉴别、保护、记录、检验及分析伤害的性质、成因、目的等工作。在分析判断案件是否涉及凶杀、性侵犯或虐待或其他人身暴力伤害时，分析伤害形态对于案件调查和犯罪再现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受伤的鉴定、保护及记录都由负责性侵犯和虐待案件的专业医生进行，并负责提供报告或记录文件；死亡案件的报告及记录文件则由验尸官和法医提供。鉴于参加鉴定的人员其资历和水平参差不齐，因此，需要针对所有伤害记录文件进行刑事疑点分析，以防止漏检或错误判断的发生。

基于本书编写的需要，笔者将主要讨论个体间暴力犯罪的伤害形态分析。需要指出的是，笔者不否认，其他犯罪或非罪事件也可能对个体造成超出下述讨论范围的伤害。

伤害类型

在进行任何伤害检查时首要的是判断，根据全面记录的伤害情况（具体包括：测量、照相、标尺辅助照相等）作出判断并确定伤害的类型。判断伤害的类型要求在处置时必须使用准确的语言对伤害情况作出专业的描述。对于伤害描述的语言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学习这些语言需要具备一定的医药学知识基础。后面列举的伤害类型主要摘自迪梅奥（DiMaio, 1993）的著述，

所列举的内容，虽不能包括所有的伤害类型却也概括地介绍了大致内容，以便读者熟悉伤害的相关专业词汇。如果读者需要掌握更加细致、准确的伤害形态信息，必须查阅书后推荐的参考书目。

钝撞伤

钝撞伤（blunt force trauma）是由强力所致。阿德尔森（Adelson，1974，p. 378）将钝撞伤的产生机理描述为：由于凶器暴力地接触身体某部分或整个尸体硬撞在坚硬界面上的结果，或是由于碰撞与施暴两种力量的结合结果（见图7-1）。



图为一名被杀害儿童肩部的典型挫伤。这一方向性挫伤很可能是被害人被拖至户外第二现场（发现被害人裸露尸体的现场）过程中造成的

图7-1

钝撞伤具体分为以下几类：

1. 挫伤（abrasions）。挫伤指表皮全部或部分脱落而形成的伤害。例如，在勒痕中皮肤的破裂、变红而形成的伤害；当身体被拖过如混凝土等粗糙表面物体时，身体上留下的痕迹等均属于挫伤。

2. 撞伤（Contusion）。撞伤通常指由钝器打击造成的皮内或皮下出血。撞伤可以是典型的（具有痕迹，无方向的），也可以是非典型的。撞伤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包括淤伤和出血。通常情况下，可以通过伤痕的颜色判断伤害发生的时间。判断生前伤害和死后发生的撞伤对于分析犯罪及犯罪过程的再现至关重要（Adelson, 1974, p.382）。

3. 撕裂伤（Lacerations）。撕裂伤主要由撕扯形成，或由钝器的突起部分钩扯形成。在撕裂伤的边缘经常伴有挫伤和撞伤。撕裂伤与锐器伤的主要区别在于，组织撕裂口的边缘是否显示受冲击力作用而撕裂。阿德尔森（Adelson, 1974, p.387）告诫检验人员应当认识到，在子弹斜着击向皮肤而没有击穿的情况下，检验人员容易误认为是撕裂伤或切伤（见图7-2）。



图为一枚点357口径手枪子弹击中男性被害人腿部的照片，子弹被灼烧过的组织包围着

图7-2

4. 骨骼断裂伤。局部骨裂伤是有限的力作用在特定区域对骨骼造成的伤害，坍塌伤是大量的力作用在一个较大区域而对骨骼造成的伤害。贯通伤是大量的力作用在一个较小区域造成的伤害。

灼烧伤

烧伤（burns）主要由下列情况引起（见图7-3）：

1. 直接暴露在明火前。
2. 直接接触过热物体。
3. 热辐射。
4. 热液体烫伤。
5. 化学灼烧。
6. 微波灼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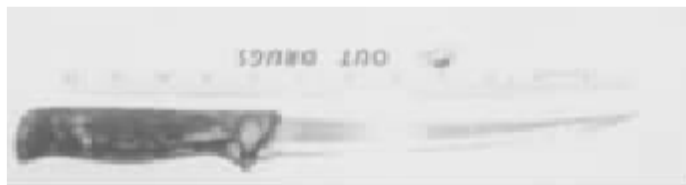
图中男性与图7-2中为同一被害人。当他躺在地
上时，身上浇了燃油而引火

图7-3

锐器伤

锐器伤（sharp force injury）主要分为如下几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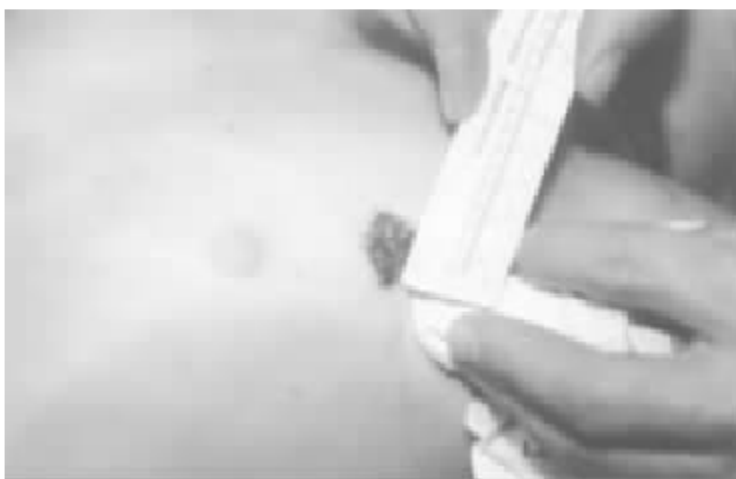
1. 刺伤（stab wounds）。这类伤害主要是由尖锐的工具刺入人体所造成的。通常情况下，刺入机体组织内部的深度伤口要大于皮肤表面的伤口（见图7-4）。
2. 切伤或割伤（incise wounds）。这类伤害主要是由锋利的刀刃工具压住皮肤并移动造成的伤害。这种伤害的皮肤创口其长度要大于深度。



a. 尖刀



b. 尖刀造成的伤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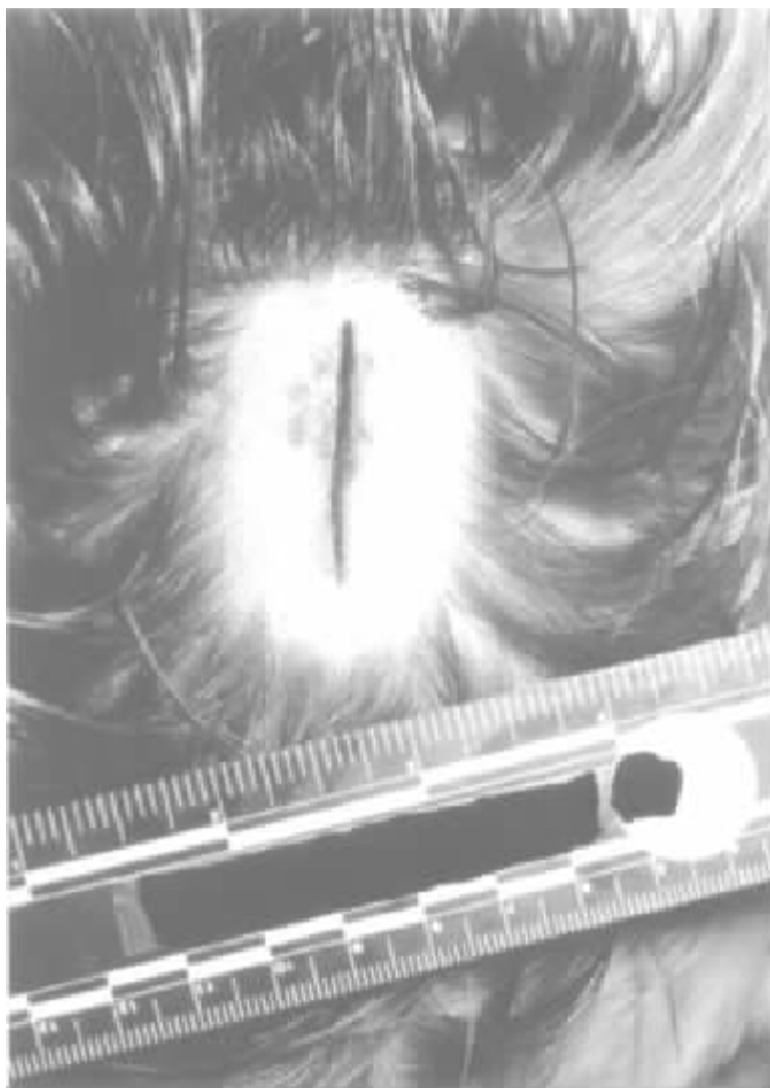


c. 尖刀造成的伤口

图为对一名男孩性谋杀的照片，犯罪嫌疑人先是割开被害人的喉咙，然后在被害人的颈部、胸部及躯干无规律地刺伤数处

图 7-4

3. 砍伤 (chop wounds)。砍伤主要是由具有一定重量并且带有刃面的工具所造成的伤害。这种伤害一般都深及组织，触及骨骼，往往伴有切创和撕裂伤。典型的砍创工具主要包括斧头、大刀、剑以及屠刀等（见图7-5）。



图为一被杀害儿童头部的裂伤。这个伤口最初被错误认定为刺伤。请注意组织的边缘不齐，这不可能是由锐器造成的伤害

图7-5

枪伤

枪伤（gunshot wounds）是指由于使用枪械（包括步枪、手枪和霰弹枪等），通过单一或多个弹孔实现力量的远距离传递所造成的伤害。一般地说，弹丸能够以足够的力量射入（只有入口伤）或射穿（同时具有入口伤和出口伤）目标。其中，入口伤可包括接触枪伤、近距离枪伤、中距离枪伤、远距离枪伤。枪伤也可分为出口伤和各种入口伤两大类（DiMaio et al.，1993）。

救治与诊断造成的伤害

这种伤害是由医疗急救服务（EMS）人员在治疗过程中造成的伤口，具体包括针孔、各种各样的（手术）切口、刺孔，甚至在搬运过程中造成的挫伤。在分析伤害时，了解医疗急救服务（EMS）人员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将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无关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分辨出来。

死后伤与生前伤

在创伤模式分析时，非常重要却又经常被忽略的是判断伤害是发生在死亡前、死亡过程中或死亡后。这常常是一个棘手的、含混不清的过程，只凭伤口的检验还不够。但是，如果伤害的发生与死亡时间十分接近，那么确切地确定伤害与死亡的时间前后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在此使用这种含混不清的术语“死亡过程中”（perimortem）。

生前伤（antemortem）是指发生在死亡前的伤害。一般情况下，生前伤导致迅速死亡的主要是大量出血，分内出血与外出血两种情况。如果较大血管被破伤，如遭枪击或深度刺伤，在死亡发生前会出现“血喷”。如果较小的血管（腕部、踝部）受到破坏但没被击穿时，就会有内出血渗入组织周围的细胞中。

死后伤（postmortem）是发生在死亡后的伤害。死后伤在动脉或静脉破裂后，常伴有轻微出血甚至没有任何出血现象。当然，由于每一具体伤害都有其自己的特点，这不是一条必然的规则。

考虑到判断伤害与死亡时间关系的困难性，建议在伤害情况不明的案件中（对伤害发生时间和规律无法准确判定）要采纳多方人士的意见（包括法医、犯罪再现专家和纵火鉴定专家）。

分析造成伤害的起源

如前所述，伤害是由各种各样的故意或意外因素所造成的。在一些案件中，造成伤害的凶器从外观就能发现，或者根据伤口的不同形态判断推论，或根据伤口的环境特征进行区分。然而，在另一些案件中，伤害的原因并不那么容易发现。伤者的受伤原因就有争议，发生伤害的原因也较复杂，这种伤害就被称做“可疑的伤口形态”（equivocal wound patterns）（见图7-6）。



a. 女性被害人



b. 尸体上的勒痕

图为一名被谋杀的女性被害人，尸体上有明显的勒痕。被害人是在周末教堂洗礼完毕后被绑架、强奸，而后被遗弃在被害人的车上，车被停在附近偏僻的地方。现场被伪装成勒颈自杀，但伪装得很蹩脚

图7-6

分析可疑的伤口形态时，最重要的是将犯罪现场所有潜在的关系把握在心。无论是总体的犯罪再现，还是伤口形态的分析，还是具体的行为证据都涉及上述关系的正确判断。这些关系的判断还要排除这种可能，即根据已破案件的关系特征来分析此案的关系。最后，在分析伤害形态时也要运用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以此分析伤害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①

伤害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的凶器

凶器指犯罪现场能够找到的（可提供的物品），是被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带到犯罪现场，用以实施暴力的物品，具体可包括：

1. 一个石块，用来击打被害人头部，造成撕裂伤、挫伤和撞伤等。
2. 一枝枪，用来射击被害人，并在其前额留下接触伤。
3. 一把菜刀，自卫时砍断了攻击者的手臂。
4. 一根灯绳，用来捆绑被害人，在其腕部留下了平滑勒痕。
5. 一个颈圈，用于控制被害人并造成其脖颈挤压挫伤。

对被害人的捆绑伤害

捆绑物是在现场可以找到（或是被带到现场）用来对被害人身体进行控制、限制、勒绑等物品。使用捆绑物的目的之一是减少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的威胁，使得未死亡的被害人更加顺从，或者便于“运输”被害人。当被害人顺从、无意识，甚至已经死亡时，捆绑物通常会只留下表面光滑的印痕，或是依据束缚的松紧程度产生皮肤的轻微变红。当被害人不顺从并极力反抗时，捆绑物往往会四处移动，从而产生捆绑的运动痕迹，引起捆绑部位周围

^① 斯文森和温德尔（Svensson and Wendel, 1965）在其著作中阐述了关于犯罪现场再现的两个重要观点。第一，该书第 297 页论述了关于损伤与衣物破损的关系问题。衣物破损主要包括撕扯、挤压、切割或被带刃的武器刺破、斧头打击等。这种破损是可度量的，相关报告必须包括衣物破损的种类、位置、尺寸及损伤发生的方式。在相关案件的尸体解剖过程中，衣物破损应当与尸体上相关损伤的位置相比较。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掌握致伤时身体的具体姿势、对尸体特定部位造成损伤的重要信息。第二，该书第 415 页通过组图向读者介绍了一些损伤特征可能反映一些如今已不常见的行业特点，包括银行职员、面包烘烤师、雕刻匠、珠宝商、裁缝、装饰匠、洗染工、摄影师、化工工人、泥瓦匠、木工、油漆工、煤炭工和炉前工等在手或脚上留下的印记、伤疤、磨损和硬茧等，以及在一些专业人员的手掌和肢体末端的特殊磨损等。

及皮下组织的多处挫伤及勒伤。其严重程度取决于捆绑的松紧程度和被害人移动的幅度（见图7-7）。

实例包括：

1. 用力拉起被害人的颈圈以控制被害人行动而留下的挤压挫伤。
2. 被害人腕部的手铐（可以从正面铐，也可以从背面铐）会留下环状的挫伤和勒伤。
3. 性侵犯案件中，常会出现将被害人的牛仔裤拉至脚踝处，既利于接触性器官，还同时用以约束被害人的双腿。这种情况下，金属拉链或纽扣会造成被害人大小腿表面皮肤的挫伤，“牛仔”裤材料也会在脚踝上形成挤压勒伤。
4. 有的性攻击开始时，犯罪嫌疑人使用绳索勒住被害人颈部导致的被害人颈部的挫伤和勒痕。



a



b

图为一儿童被害人。犯罪嫌疑人使用被害人的鞋带将被害人的手腕与脚踝捆在一起以便被害人死后运输。这个被害人是被钝器击中头部致死的

图7-7

环境对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伤害

环境伤害形态可由犯罪现场中除犯罪人手中凶器之外的任何物品所造成。由于环境伤害的存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与环境接触的痕迹也因此保留下来。也就是说，某些能造成伤害的物品就是犯罪现场的一部分，事实上，它们既可以对被害人造成伤害，也可以对犯罪人产生意外伤害，这往往是被害人与犯罪人互动行为的意外结果。

要记住，犯罪现场既可以在室内、室外，还可以在机动车内，犯罪现场的任何环境特征都可以反映在之后的犯罪被害形态中（地毯痕迹意味着现场或在室内或在车内，而植物痕迹则意味着犯罪现场是在室外）。

实例包括：

1. 在运输已死亡的被害人过程中，汽车后备箱的地毯纹路会印在裸露的皮肤上。
2. 野外抛尸现场的植物叶片会把形态印压在弃尸身上。
3. 拖拉尸体经过粗糙路面时必然在皮肤表面留下拖痕。
4. 当死者赤脚逃跑经过岩石地带时，在此人的足底将留下撕裂伤和挫伤。
5. 为了野外弃尸而身体暴露在室外时，犯罪嫌疑人身体上可能会留下蚊虫叮咬的痕迹。
6. 当被害人在灌木丛中被攻击时，犯罪嫌疑人可能被毒藤或刺藤刺伤。
7. 凶器上镌刻凸显的商标印记在暴力接触中也会印在被害人身上。

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彼此造成的伤害

“人对人”的伤害是由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一方使用身体的某一部位作为攻击的手段对另一方造成的伤害。作为攻击手段的身体部位也会给对方造成有明显特征的伤害。此外，伤者的衣着也能表明伤口的不同特征，这不仅强化了它的可识别性，也增强了它与其他伤口的区别性。

对于防御型的伤害，阿德尔森曾有叙述（Adelson, 1974, p. 490）：

被害人为保护自己免受伤害而在采取防御性行为的过程中，在手掌、前臂、腕部会造成撞伤和挫伤等，这些伤害被称为防御性伤害。造成的指甲碎裂或撕脱等伤害往往是反应犯罪人的攻击行为，或是源于被害人自卫时的抓挠抵抗，等等。

有关犯罪攻击型伤害，阿德尔森也曾有叙述（Adelson, 1974, pp. 490 ~ 492）：

被害人具有攻击作用的防御行为在被害人关节处造成的挫伤和撞伤。而被害人指部关节的伤害可能是由于在犯罪嫌疑人张嘴时打在了他的门牙上所造成的。

实例如下：

1. 用拳头打在被害人脸上，形成“黑眼圈”。
2. 用手掌打在被害人脸上，留下明显的手印。
3. 用手指掐住被害人的喉咙，在颈部皮肤上留下指甲造成的压伤和挫伤。
4. 徒手扼杀被害人时，被害人自己的项链、围巾等在颈部留下的明显的压痕。
5. 戴戒指的犯罪嫌疑人重拳击中被害人额头，在其头部留下戒指形状的明显痕迹。
6. 犯罪嫌疑人大力踏在被害人背上，在其背部留下清晰的鞋底花纹压痕。
7. 被害人在遭受攻击时用牙齿咬犯罪嫌疑人的手臂，在其手臂上留下齿痕。
8. 犯罪嫌疑人为迫使被害人顺从，用牙齿咬被害人的肩部也会留下齿痕。

分析伤害动机

当导致伤害的物证来源和特征被确定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对施加伤害的一般动机进行评定和确定。威尼·巴克斯特（Wynne E. Baxter）博士曾指出：

“侦查的目的不仅在于断定死亡的原因，而且要判断导致死亡的方式，任何伤害方式都会表现出加害者的性格特征。”

伤害是使用暴力行为的结果。作为行为证据，经常存在于各种犯罪特性中，研究伤害形态能够帮助我们分析加害者的动机和意图。真正准确地解释动机和意图，不仅要考虑物证的再现，还应同时考虑科学性与技巧性。当专家们基于分析伤害形态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行为动机和意图，以及分析导致伤害的相关因素时，专家们已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着模糊的犯罪心理画像。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有一些伤害并非是故意所为，有些伤害则是在无意识的用力下造成的。这往往是偶然的行​​为结果，或是环境因素的结果，并不具有充分的理由，或经过深思熟虑，既不能反映其作案的行为方式（如惯技），也不能反映其心理需要（如标记）。

而其他的伤害形态则是加害人故意实施暴力行为所为。无论有无计划，加害人的行为都是有理由的，经过预谋的，能够反映其犯罪行为方式和心理上的需要。正如阿德尔森（Adelson, 1974, p. 516）所论述的：

通过全面考察大量钝器致命的杀人案件，发现在这类案件的初始阶段，加害人最初并没有杀害对方的目的，甚至给对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的意图都没有。基于此，这类案件中，被害人的死亡与使用枪支直接击中头部，或用刀直接刺入对方胸口的案件中被害人的死亡存在很大的差别。可以肯定地说，在后面的情况下攻击人具有杀害或严重伤害对方的故意。

故意使用暴力的情况在下列情形的犯罪案件中普遍存在：

防御型暴力

防御型暴力行为（defensive force）是指个体为保护自身免受攻击、威胁或伤害而采取的持械攻击行为。使用这个术语并不意味着这种行为在法律或道德上是正当的，更准确地讲，这个词是用以说明这类行为的意图。

防御型暴力造成的伤害包括：

1. 为迅速逃跑，被害人踢中攻击者的小腹。
2. 被害人因出于自身或其他人的安全向攻击者开枪。
3. 被害人在遭受性攻击时，狠咬攻击男性的生殖器。
4. 犯罪嫌疑人在被踢中小腹后猛地推开被害人。

反侦查性暴力

反侦查性暴力行为（precautionary force）是指进行人身攻击的犯罪嫌疑人为了阻碍或防止犯罪物证的收集、阻挠侦查而在对方身体上造成的伤害。

此类行为具体包括：

1. 灼烧被害人的阴部以毁灭性犯罪的证据。
2. 砍掉被害人的双手和头颅，给侦查中被害人身份的确认制造障碍。
3. 在被害人尸体上制造假象，让侦查人员误认为这是一起家庭成员之间惩罚过度而造成的意外死亡。

泄愤伤

泄愤伤（experimental force）往往被界定为具有敌意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目的是要将痛苦和折磨转移到其他人身上。这类行为需要一定的客体作为

发泄对象，在多数攻击案件中，其对象往往是活着的、有意识的被害人。但是，泄愤式的暴力并不满足于攻击行为，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需要或以想像为导向的需要。因此，这种暴力并不需要一个有意识的或是活着的被害人作为攻击目标。

发泄性暴力造成的伤害包括以下形态：

1. 在被害人死后将被害人的内脏取出。
2. 在被害人死后咬被害人的乳房。
3. 在被害人死后割掉被害人的乳房。
4. 在被害人死后以对称或不同深度反复刺被害人的尸体。
5. 在被害人死亡过程中或死后，向其身体的孔窍中塞入大量异物。
6. 在被害人死亡前，对因药物或酒精造成昏迷的被害人施以暴力强奸。

分析伤害形态：一般原则

下面是笔者总结的在实际案件侦查过程中的基本原则：

1. 分析伤害形态依赖于大量细致的、全面的伤害记录，包括可能导致伤害发生的环境情况记录。还应包括“否定性记录”，即被害客体哪些部位没有伤痕，以及发生的伤害并不是周围环境的任何物体所造成的情况记录。
2. 不仅对被害人进行伤害分析，而且对犯罪人也要进行伤害分析。
3. 对伤害的解释或分析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在相应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和解释。要考虑来龙去脉、考虑环境的影响和事件的前后顺序等。
4. 确定伤害的形成是在生前、在死亡过程中还是在死亡后是至关重要的。
5. 判断导致伤害的起源也很重要，如造成伤害的可能是什么，是什么行为，怎样造成的伤害，等等。用大脑认真思考和实验对于实现上述目的是非常有用的。
6. 无论受过怎样的训练，有过怎样丰富的资历，任何人都不可能熟悉现实存在的所有伤害形态。多种刑事科学都应该用于分析复杂的、存在疑问的伤害现象。这将提供多角度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增强经验的基础，降低忽略的或错误的分析伤害形态的可能性。
7.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在分析某一伤害的动机和企图时要考虑其前

后关系（context）。要判断其伤害是故意造成的还是偶然造成的。如果伤害是故意造成的，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分析加害人施加伤害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上述分析不可能脱离事件的前后关系，或缺乏事情的整体脉络来完成。

8. 分析伤害形态主要基于客观的物证。但是，客观物证可能被隐藏、被忽略，未记录或记录很糟糕，甚至遗失进而根本无法提供。因而，关于伤害的起源、意图、动机等分析若要得到清晰、准确的结论是有困难的。所有关于伤害形态作出的确定性结论都应当与已知的案件事实相吻合。

如果读者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伤害形态的知识，笔者建议参考一些书目。^①

分析伤害形态的规律

对于任何犯罪行为的再现过程而言，分析伤害形态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Lee, 1994, p. 193）。它不仅需要一整套严格的方法，而且需要多学科的专家介入。无论如何，这是最基本的科学分析的原则，也符合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即认为，无论是谁，无论任何情况下，只要进入犯罪现场，就与现场存在着物质交换，即留下某种物，或带走某种物质，或兼而有之（Saferstein, 1998, pp. 4 ~ 5）。任何被害人，所遭受的伤害（或无伤害）都属于犯罪现场的延伸部分。

① Adelson, L. (1974) *The Pathology of Homicide*, Springfield, III: Charles C. Thomas.
iMail, D. and DiMail, V. (1989) *Forensic Pathology*, Boca Raton: CRC Press.

Dimaio, V. (1993) *Gunshot Wounds: Practical Aspects of Firearms, Ballistics, and Forensic Techniques*, Boca Raton: CRC Press.

Gresham, G. A. (1975) *color Atlas of Forensic Pathology*, Chicago: Year Book Medical Publishers.

Gross, H. (192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Monteleone, J. (1996) *Recognition of Child Abuse for the Mandated Reporter*, 2nd ed., st. Louis, MO: G. W. Medical Publishing.

O'Hara, C. (1970) *Fundamentals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Svensson, A. and Wendel, O. (1965) *Techniques of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New York: Elsevier.

anezis, P. (1989) *Pathology of Neck Injury*, Somerset, UK: Butler & Tanner.

Whelan, M. (1997) *Color Atlas of Sexual Assault*, Mosby Medical: New York.

下面通过具体案例解释分析伤害形态的应用：

帕垂克之死

案件涉及帕垂西娅·范·温克（Patricia Van Winkle），一位母亲，被指控伤害并杀害了自己的儿子帕垂克·范·温克（Patrick Van Winkle）。在这起案件中，在法庭辩论过程中双方都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被害人在近期受到性侵犯。控方认为，被害人胸口的淤伤是由被告的鞋所造成的，身上的多处伤痕是由被告用刀割的结果。但是，辩护方认为，被害人胸部明显的淤痕仅仅是不规则的血液淤积的结果。

下面将对案件的相关内容作一详尽的介绍。法庭控辩双方的刑事专家相互对立的观点也被列举在文后，以供参考。案例内容主要摘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温考案（Louisiana v. Van Winkle 1994）。

1991年7月间，被告帕垂西娅一家住在杰斐逊城（Jefferson Parish）泰瑞公园路572号公寓D座。除母亲（被告）外，还有被害人也是她的儿子帕垂克，女儿查蕾妮·范·温克（Charlene Van Winkle）和房客赫斯特（Hurst）。公寓共两层，一层是厨房和起居室，二层有一间洗澡间，三间卧室。母亲与女儿同住一间卧室，儿子与房客各住一间。

1991年7月12日，星期五晚，被告与房客赫斯特在公寓楼下喝着啤酒看电视。大约在13日凌晨，在楼上玩牌的儿子跑下楼对他们说他前晚作了噩梦。据赫斯特陈述，帕垂克梦见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必须给某人200美元才能救活他的母亲。当母亲重生后，却拿着刀要杀掉他。在帕垂克继续讲述自己梦境的时候，有些醉酒的帕垂西娅走进厨房，从抽屉中取出一把小刀，站在距帕垂克约1.5米远的地方对他说：“是呀，我就是那恶魔，我就是要杀了你，我要你的命！”然后，被告大笑着返回厨房。

但是，在此之后，她显然被此举激怒了。帕垂克问他的妈妈为什么喝酒。被告对他咆哮，不要管她喝酒，她做什么不关他的事！赫斯特最后就上楼睡觉了，楼下只留下帕垂西娅母子俩。大约凌晨3时到4时之间，赫斯特听到男性的叫喊声，像是受伤后发出的声音。他还听到了重击的嘈杂声音，好像还有人在隔壁房间里跑动。另外，他看到帕垂克房间的灯亮了。他听到响动后，起身到窗口和门外看了看，什么也没有看到，他又回到床上继续睡觉了。

赫斯特证实他没有进一步观察这些怪异的声响主要因为他认为这些情况是由于孩子们还在地上玩耍，被告进入孩子的房间让孩子安静睡觉等原因造成的。

赫斯特起床后与被告在楼下看电视，帕垂克的朋友们来到门口找帕垂克去玩。被告走出门外与他们说话，然后回到楼上。这时，听到被告的尖叫。赫斯特赶到楼上，看到帕垂克的被子掉在地上，赫斯特发现孩子可能是遭受过毒打，因为他的腿部有明显的斑痕，脖子上也有伤口。当赫斯特准备把孩子摇醒时才发现他已经停止呼吸了。这时，被告跑到电话前拨打了 911 报警电话。

杰斐逊城警署的警官布鲁斯·查威特（Bruce Chauvet）赶到现场时，他发现被告和赫斯特坐在楼下储藏室内。当被告发现警官后，突然变得号啕大哭，叫喊道：她的孩子咽气了，她怀疑孩子自杀了。然后被告带领警官上楼进入孩子的房间。警官进入现场后发现，孩子面部朝下，身上已经有尸斑，估计孩子已经死亡数个小时了。他同时注意到，孩子颈部有明显的撕裂伤，靠床一边的墙上有血液喷溅的痕迹。布鲁斯陪同被告一起下了楼，然后通知警察局派凶杀组的法医和刑事技术专家到场。

在其他警官到达现场后，现场勘查工作才开始，进行现场拍照，提取部分物证等。在这段时间内，被告签字同意警官搜查整个公寓。她也非常合作，同意警官带走任何想要的东西，因为她想知道孩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警官们在被告的房间提取了一把刀和一双 8 号码的徒步旅行靴。

.....

杰斐逊城的验尸官苏珊·加柯娅医生（Susan Garcia）对被害人进行了尸检。她描述了她所看到的被害人尸体上的伤害情况。但是她断定，所有的这些伤都属于皮肤表面的切口，并不会危及生命。她的观点是被害人属于窒息死亡。另外，她还提取了被害人肛门和口腔内的棉拭子样本，以确认近来是否有性行为发生。尽管被害人的肛门口扩大，但是被害人的直肠并没有伤害。

控方的分析伤害形态专家迈克尔·怀斯特医生（Michael West）将从被告家中提取的鞋与被害人身上伤痕处的鞋印进行了比对。通过比对鞋的形状、鞋号和鞋底花纹，怀斯特医生认为这双鞋与被害人尸体腹部伤口上的鞋印高度一致。怀斯特医生也对刀与被害人身上的刀伤进行了比对，结果为两者高

度一致。

.....

辩方律师请了两名专家为被告作证。病理学专家克里斯·斯拜瑞（Chris Sperry）医生在认真阅读现场照片、尸检报告、犯罪实验报告和怀斯特医生的报告后，认为帕垂克的死因是被带子勒死而不是被枕头闷死的。他同时指出，孩子尸体上的伤痕是由于不规则出血导致的，如果对胃部蹬踏，被害人应有内出血，但被害人却没有内出血症状。

辩方的另一名证人——足迹、犯罪现场再现、犯罪实验方面的刑事科学专家荣·辛格（Ron Singer）在看过各类照片、报告后，认为被害人身体上的伤痕与被告的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他进一步证明，本案在案件发生4个月至5个月后进行精液检验是严重违反侦查实验程序的。在法庭质辩中，他承认，虽然他没有见到那把用做证据的刀，但是他认为并不能确认是否由那把刀造成的被害人尸体上的伤痕。

最后，陪审团倾向于控方的观点，宣判帕垂西娅有过失杀人罪，判处劳役21年。但是，刑事科学专家们关于分析伤害形态的证言在判决书中并没有被质疑，尽管双方都请了专家证人到庭。

贾尔斯强奸谋杀案

这起案件为一名叫威廉姆·贾尔斯（William Giles）的男子在其已分居的妻子公寓内殴打、强奸并杀害了已分居的妻子。在这起案件中，分析伤害形态帮助确认了在现场找到的犯罪嫌疑人使用的刀与锄头等，这些很可能被用做凶器，并且证明锄头柄在插入被害人阴道之前，被害人并没有死亡。

下面的事实描述了案件发生时的情况。案件中刑事科学专家提供的分析伤害形态观点也被提及。材料主要摘自贾尔斯案，见密西西比州案例记载（Giles v. Mississippi, 1995）：

1991年8月19日，威廉姆·贾尔斯被控犯有一级谋杀罪，杀害其妻子并伴有性攻击行为。

1990年10月26日晚，威廉姆·贾尔斯去位于密西西比州罗瑞尔南公园镇（Laurel South Park Village）其妻子窦娜（Donna）的公寓看望他的妻子。他们之间的谈话冲突逐渐升级。结果，贾尔斯野蛮地使用锄头和匕首伤害他

的妻子。验尸结果显示，窦娜女士的头部和颈部有 75 处到 100 处的砍刺伤害，胸部、背部、手臂及大腿共有 41 处砍刺伤。另外，在其阴道前庭发现有挫伤和刺伤。最后，窦娜尸体的腰部以下有被焚烧的痕迹。致命伤是由于腹部刺伤和撕裂肝脏造成的大量失血。被告贾尔斯在 1990 年 10 月 27 日被捕，然后供认犯有谋杀罪。

杰米·布什（Jamie Bush）警官作证说，他与其他警官一起勘查了现场。他在被害人尸体旁发现了一把破损的锄头，并在锄头的裂缝处发现了人体组织和阴毛。哈罗德·贝克豪斯（Harold Buckhaults）警官负责搜寻被告贾尔斯。他在距离现场约 3 公里贾尔斯朋友的流动房屋内发现了当时藏在床下的贾尔斯。贾尔斯的衣服、鞋以及身上血迹斑斑，在流动房间内还藏有一把带血的匕首。贝克豪斯警官将贾尔斯带往警局与他谈了 3 次话，告知其享有的权利。在两名警官和一名书记员面前，贾尔斯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承认自己杀害了自己的妻子。第二天，他在摄像机前承认了自己杀害妻子的事实。

药物检验、分析伤害形态专家迈克尔·韦斯特（Michael H. West）医生证实，匕首和锄头与被害人尸体上的伤口同一。而且，他认定锄头柄曾插入过被害人的阴道，造成了被害人阴道的伤害。法医病理学专家斯戴文·海恩（Steven Hayne）医生证明他检查了被害人的阴道，发现阴道前庭有明显的挫伤和刺伤。同时还断定，当锄头柄插入被害人阴道时被害人还活着。

威廉姆·贾尔斯被判犯有一级谋杀罪，被判处死刑。在这起案件诉讼中，辩方没有应用有关分析伤害形态的刑事科学。但是，辩方强调，贾尔斯与窦娜已经结婚并且在凶案发生的时候并未离婚。按照密西西比州的法律，如果夫妻双方居住在同一住所，性攻击行为并不被认为有罪。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最终支持了辩方的诉讼请求，承认法庭当庭并未以此提醒陪审团，故而对此错误应予以纠正。1995 年，贾尔斯的死刑判决被改判（Giles v. Mississippi, 1995）。

史密斯的被绑架、强奸、谋杀案

在下面这起案件中，控方运用了分析伤害形态作为证据证明了拳头可能导致被害人头部的淤伤，阴道的伤害发生在被害人生前。控方还采纳了法医学家的证言，他证明被害人腕部的齿痕是由莱文·布鲁克斯（Levon Brooks）

的牙齿所造成的。辩方的法医学家只证明不能排除布鲁克斯咬过人。

下面的材料介绍了案件发生的情况、控辩双方刑事技术专家分析伤害形态的观点均得到陈述。材料摘自布鲁克斯案，见密西西比州案例记载（*Brooks v. Mississippi*, 1999）：

1990年9月15日凌晨，3岁的史密斯（Smith）被人从床上带走，两天后，在Noxubee镇距离她家不远的池塘发现了她的尸体。布鲁克斯是史密斯妈妈的一位朋友。史密斯5岁的姐姐艾斯·史密斯（Ashley Smith）指证他就是从床上把史密斯带走的男子，她借隔壁房间电视屏幕的光线看清他从屋里走出，警方遂以谋杀罪将布鲁克斯逮捕。

案发当日，布鲁克斯带着小史密斯逃离公寓后，艾斯曾试图叫醒家里的惟一的成年人——她的舅舅托尼，但是没有成功。当其他大人清晨回到公寓发现史密斯不见了时，他们开始四处寻找。在上午8点报了警，警察开始搜寻被害人。下午1时，没有任何结果，搜寻工作暂时中断。第二天，史密斯的尸体在距离被害人家90多米的水塘边被找到。

当地警方的首席调查官欧内斯特·里查博格（Ernest Eichelberger）证实，史密斯尸体的头部和阴道部位有明显的出血。他访问了艾斯，艾斯说是“干爹”，在照片排查中指认了布鲁克斯。

海恩医生证实，尸检的结果证实，被害人是溺水死亡；被害人头部的淤伤很可能是拳头击打造成。他进一步指出，被害人的阴道壁被割开，处女膜破损，一切伤害均系生前所致。海纳医生在被害人腕部发现了咬痕。法医学家迈克尔医生专门负责检查这个咬痕，他认为该咬痕为布鲁克斯的牙齿咬出的痕迹。而辩方的专家哈里·明彻（Harry Mincer）医生证明该咬痕不一定为布鲁克斯所为，但也不能够排除布鲁克斯的嫌疑。

布鲁克斯最终被判一级谋杀罪名成立，判处终身监禁。

在这起案件诉讼中，辩方认为，因为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并没有将咬痕作为证据的判例，所以医生迈克尔的证言不能够被采用。基于这个观点，州最高法院发现辩方在庭审过程中并没有反驳迈克尔医生的证言。而且辩护方也请出了法医学家明彻出庭作证，他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况且明彻又是迈克尔的学生。故此，州最高法院认同了咬痕证据的使用，维持了布鲁克斯的有罪判决。

埃沃森医生被勒杀案

这起案件包括了对埃沃森医生的绑架、抢劫以及谋杀。在这起案件中，控方提出了分析伤害形态证据以证明勒杀工具可能是腰带，并且整个勒杀并未快速将被害人致死，这一过程中包含着搏斗行为，被害人遭受了严重的痛苦。

接下的事实主要提供了案件发生的环境。分析伤害形态的观点由刑事科学专家们提供。资料全部摘自密歇根州的科奴姆尔案（Michigan v. Croomer, 2001）：

被告安妮塔·科奴姆尔（Anitra Croomer）与共同被告麦康纳尔·亚当斯（McConnell Adams）1997年10月在奥克兰（Oakland）巡回法院由不同陪审团分别审讯。他们被指控绑架和杀害了黛博拉·埃沃森（Deborah Iverson）眼科医生，此案曾轰动一时。1996年5月16日，埃沃森医生离开她位于伯明翰的精神医生办公室后不久就被绑架。第二天埃沃森医生的车被发现停在Macomb County的郊外。医生的尸体在车内被发现，尸检显示她是被勒窒息死亡。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在埃沃森医生失踪的当天上午，她的两张共1300美元的支票在驾车途中的两家银行被换成了现金。直到1996年12月30日，警察通过一个律师打来的匿名电话，才找到了犯罪的被告和共同被告。

.....

验尸官于1996年5月17日进行了尸检，证明埃沃森医生已经至少死亡24小时。死亡的原因是作案人使用腰带勒住被害人颈部使其窒息死亡。尸检显示双方之间发生过搏斗，被害人挣扎了一段时间后才被杀死，死前可能很痛苦。

科奴姆尔被判一级预谋杀人、严重谋杀罪和绑架罪，并且因一级谋杀罪被判无期徒刑，不得假释，以绑架罪判处15年到60年的监禁。然而至终审时，又判决为绑架罪及重罪不成立，科奴姆尔一级谋杀罪成立（Michigan v. Croomer, 2001）。

参考文献

1. Adelson, L. (1974) The Pathology of Homicide, Springfield, Ill Charles C. Thomas.

2. Brooks v. Mississippi (1999) 748 So. 2d 736 (Miss. 1999).
3. DiMaio, D. and DiMaio, V. (1993) Forensic Pathology, Boca Raton: CRC Press.
4. DiMaio, V. (1993) Gunshot Wounds: Practical Aspects of Firearms, Ballistics, and Forensic Techniques, Boca Raton: CRC Press.
5. Giles v. Mississippi (1995) No. 92 – DP – 00428, Feb. 2, 1995 (650 So. 2d 846).
6. Gross, H. (192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7. Lee, H. (1994)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Taoyuan, Taiwan: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Press.
8. Louisiana v. Van Winkle (1994) No. 93 – KA – 843, March 16, 1994.
9. Michigan v. Croomer (2001) No. 208849, April 6, 2001 (2001 WL 338154).
10. O'Hara, C. (1970) Fundamentals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11. Saferstein, R. (1998) Criminal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Science, 6th ed. ,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 Hall.
12. Svensson, A. and Wendel, O. (1965) Techniques of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New York: Elsevier.

第8章 被害人研究

Brent E. Turvey, M. S.

我第一次知道的有关性的知识是，性是不好的。我觉得我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性欲。我非常敏感，男人们说我很性感，但是我却得不到高潮。当我的激情被唤起的时候，我就大哭一场。

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父亲和女儿的乱伦》（1981，p. 123）

被害人学是对被害人所作的研究，^① 这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它包括任何情况下，如犯罪、事故和自然灾害的被害人。为达到这项工作的目的，我们需要把精力集中在犯罪造成的被害人身上。“被害人”（victim）指的是那些遭受伤害、诽谤、遗失或者死亡的个体。

忽略被害人

在调查犯罪的匆忙过程中，你很容易出于对犯罪行为和动机（motivation）的兴趣——尽管可以理解，但因此忘记了解被害人。例如，那些对犯罪心理画像很感兴趣的人经常会觉得要能用罪犯的双眼观察一切将是多么惊心动魄和富有挑战性！似乎这已经成了工作的重点。事实上，只有当你严格地做到以下几点，才能容易地做到通过罪犯的双眼去看外界：

1. 当考虑其他人的行为时，要摒除自己的爱好、欲望、幻想、需要及道

^① 在汉斯·亨蒂格（Hans von Hentig）和本杰明·门德尔森（Benjamin Mendelsohn）的重要著作之后，很多研究人员继续对被害人进行研究。在他二人的书中，他们建立了被害人类型学，并探索了各种被害—犯罪关系（Tobolowsky, 1999）。据卡尔曼（Kamen, 1984）记载，门德尔森在194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创造了“被害人研究”（victimology）一词。

德观。

2. 应该承认，任何行为或情感都可能引人入胜或引人欲火中烧。

如果一个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可以做到以上两点，他将很容易取得成功。如果做不到，他就会失败，因为在画像（profiles）中会反映出他自己的心理现象或性格（character），有时，这些反映甚至比对犯罪行为的反映还要多。

事实上，在进行犯罪心理画像的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对整个被害过程的推断。大量的侦探、侦查人员和司法人员都有情感方面的应付机制，他们能够超脱对被害的情绪反应。被害者往往被视为一个物体，他们的身体、生命和死亡，以及所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可怕的事情，都被视为该被检查和分析的对象。感情应付机制的好处就是无须情感投入，不会被痛苦所影响，而仅仅是对事物的客观分析。

这样做的缺点是，当我们如此冷漠地看待被害人以及他们的遭遇时，我们是在冒着丧失人性的危险。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种情感应付机制要求我们不断地强化一种意识，即把被害人看做一个客观物体的意识。如果我们把被害人赋予人性，那么，我们将会把他们想像成我们自己的儿子、母亲、父亲、姐妹、兄弟、妻子、丈夫或者朋友而陷入一种困境。为此必须保持这种超脱态度，我们要主动地避免知道有关被害人是一个个体的信息。我们不认识他们，除了他们所遭受的犯罪之外，我们不想知道他们的私人生活，为了不使自己为情所动，这样做也许会令我们自责。我们不希望花费时间把他们看做是正常的人。

在作者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对整个被害过程的推断对很多警探、侦查人员以及司法人员来讲并不是一个常规的内容。当你想要做得很好时，被害研究则要求我们对被害人的了解程度远远高于我们对自己生活中大多数人的了解。它使我们置于潜在的情感冲突中。我们会将被害人的个人情感当做我们自己的。它也使我们将置于潜在的移情中，我们会把对其他人的想法和感情强

加给被害人。了解一个被害人的经历和人格的细节从情感上讲并没有好处。^①

但这却是必须的。

为什么对被害人画像

一位有水平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至少会花费像检查犯罪人那样多的时间来检查被害人的经历。这一点在国家司法学会《对死亡调查的国家指导大纲》(NIJ's National Guidelines for Death Investigation, 1997)中得到了非常清楚的论证:

对死者的画像将决定对事物来龙去脉和周围环境的发现。这一基本的画像内容将决定随后的侦查水平、司法水平和权威性。而进一步调查重点(广度/深度)也将依靠这些信息。

被害人研究是首要的侦查手段,它能提供事情的前后背景、相互联系及侦查方向等信息。在一个未破获的案子中,犯罪嫌疑人是未知的,一个准确的被害人分析可以划定嫌疑范围。因此,对他们的一般生活方式和特殊行为活动必须仔细检查,以便确定是谁能接近他们,他们又能接近谁,他们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接近的,以及接近的地点。

如果我们掌握一个犯罪嫌疑人为什么或怎样选择这一被害人,我们就可以建立起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某种关系链。这种关系也许是地理位置上的,也许是工作关系,也许是按时间表进行的,也许是同学关系,也许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者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还有其他的关系。这些线索提供了一个包括熟知的或能接近连锁范围的嫌疑圈。

^① 尽管大多数的警官都会否认他们对工作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感到心烦意乱,但事实是,他们自杀的人数比因公殉职的人数还要多。这是因为承认心理有问题会影响到提升,甚至会影响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种类(如巡警或者是管理者)。太多的心理问题会使他丢了枪,暂停工作,甚至被解雇。法律强制执行是一个狭隘的范围,在这一范围内,一个人的地位由一枝枪、一枚盾形徽章的权力来决定,并决定他们是否有给公民戴上手铐的权力。失去了这些东西,他会马上变得沮丧。所以,他们会否认自己心理有问题。据莱(Ly)(2001)记载:“根据国家警察自杀基金会的统计,1999年,有300名执法人员自杀,因公殉职的只有174名。一些官员警告说,这个数字或许会更高,因为有些自杀并没有报告。”大量警察自杀都与家庭问题和酒精中毒有关。

此外，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一个犯罪嫌疑人为什么选择这一被害人，以及怎样选择被害人（通过研究完整的被害人情况，尽管随着时间和事情的发展，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当然也可能不变），我们就可以更好地预测他们以后犯罪所选择的对象。

即便我们发现一个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的选择是随意的，或者是随机的，这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结论。被害人研究是把被害人当做一个真正的人来了解。除非我们知道被害人是怎样一个人，他们怎样生活，否则，我们就不能说我们真正知道他们的真实死亡情况或是导致死亡的事件。

把被害人当做现实的人

在侦查人员、侦探和司法人员中有一种趋势，那就是在一个给定的案件中，美化或是丑化被害人。

美化（deification）包括使被害人理想化，他们或许是学校里的孩子们、失踪的青少年，或者是那些已经被媒体或者公众神化过的人物。由于在某一区域的政治或公众文化里，被害群体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党和公众的同情。这种观点使花费时间调查案件变得合理化，而这恰是其他案件调查所不能享受的，也就不能毫无偏见地进行被害人研究和真正的被害内容的调查。

案例

两个9岁的女孩在公共汽车站被绑架。第二天有人发现她们两人的尸体被遗弃在90多米外的一个下水道里。媒体称被害人是“陨落的小天使”，侦查人员并没有调查被害人的家庭历史，而是把焦点放在了一个可能的连环谋杀案上。可是案件没有进展，渐渐冻结了。一年以后，当粗略的被害人研究完成之时，才得知其中一个被害人有放火的经历，她曾经和其他孩子打架，而且曾经被诊断有吸毒史和注意缺乏性障碍。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走访她们的家庭，查阅医疗以及精神病记录，侦查人员发现有一个亲戚曾经猥亵其中一个被害人有一段时间了。突然间，侦查有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丑化（vilification）包括把某一被害人群看做是卑微的或是注定被遗弃的。这种观点认为，属于某一生活方式，或者是某一种族，或者信仰某类宗教，或是某个门派的信徒，以及属于社会某一阶层的人、妓女、毒品贩子、瘾君

子，甚至逃亡者，最终，导致侦查人员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个人的道德观带进工作中，使得侦查工作毫无人情味。

持这种观点的侦查人员会觉得对发生在这类被害人身上的犯罪行为不需要进行彻底的调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有经验的犯罪人正是利用了执法人员的这种态度。他们选择的下一位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执法人员是否认为他们是可以被任意处置的。

案例

有个妓女在城市的某个角落被强奸了。3天后，另外一名妓女在距这个地方6条大街以外的地方也被强奸了。两个星期以后，在同一区域，又有一名妓女被强奸了。她们都报了案，但是没有收集到证据，也没有进行并案，尽管案件之间有联系。只有在更容易引起同情的被害人被强奸或杀害之后，这些案件才会被调查。

事实上，被害人也是人。他们不是在我们的道德、真实的犯罪小说或者是电影的偏见中虚构的模型。我们曾经偷偷地害怕，而且也必须承认，他们就如同我们自己的女儿、儿子、母亲、父亲、姐妹、兄弟、妻子、丈夫或者朋友。只不过因为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或是某种生活状况才使我们认为他们根本不值得或很少值得我们关心。如果我们美化或者丑化他们，我们就不能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我们也不可能进行完整的画像，更不能够依靠被害人—被害人、被害人—犯罪人之间的联系来分析侦查方向。如果我们一贯认为，无论哪类被害人均值得我们同情，那么在执法中就无冒险之虞。当然，我们就会尽快地从我们自己的人性中走出来。

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是对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关系的风险度的一种评估。风险度取决于可能遭受的伤害或损失程度。就犯罪心理画像来说，评估风险度就像全景透视法（perspective），也就是说，评估要观察双方的风险度，即被害人的风险和犯罪人的风险并存。在进行被害人评估时，二者都应被考虑到。

风险与谴责

本章所给出的术语和定义旨在帮助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描述与被害有关的

生活方式和环境关系，进而获得针对这种被害人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的信息。他们给画像专家提供了建立在行为证据基础之上的有关案件事实的文字材料。这些最终使我们深入地了解已知的犯罪嫌疑人，使其难以逃脱罪责。

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即被害人对嗜血成性的犯罪人的行为没有任何责任。这是显而易见的结论，但不幸的是，很多人指责被害人应部分或全部地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某一犯罪负责。在这一点上，格罗茨（Groth，1979）详述了有关性骚扰的常见虚构情节，它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力，包括：

1. 被害人也是犯罪的一方，因为被害人对犯罪人进行了勾引或挑逗。
2. 如果被害人愿意的话，能够阻止性骚扰。

思考下面的案例：

案例

一个人走到了城镇中的“危险地带”遭到抢劫。有人说，这首先是被害人的责任，“他们早就应该知道那里根本不该去”。

这种判断，常常是道德上的判断，却在犯罪心理画像中没有位置。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不适宜的偏见和判断理由，我们来比较一下一个妓女的风险和一个住在安全的建筑物里的学生的风险：

案例

一个妓女工作在一个大都市里，生活中她随时都可能受到伤害和损失。不断增加的风险与下列因素有关：她所处的犯罪环境，她的工作时间（夜晚），她需要面对的是很多具有潜在暴力倾向的陌生人，以及卖淫与吸毒的密切关系，等等。

一个学生住在大学城，在一个很安全的建筑物里，任何时候遭受伤害的可能性都比较低，但是，对学生而言，也有易受伤害的时候，比如说，从车里出来通过锁着的前门进入楼里，这一过程将会持续5秒至7秒。同样，从楼里出来进到车里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两个过程中，都会有一个不专心致志的时刻，她会集中注意力去找钥匙然后去开楼门或是车门。很多犯罪人恰恰会等待这个被害人易受伤害的时刻实施犯罪：抢劫、性骚扰等。

以上的比较证明，尽管被害人尽最大的努力来保证自己的个人安全，但是他们所做的仅仅能对付那些不是很有经验的犯罪人。从另一方面来讲，被

害人是否成为犯罪人的猎物并不单单取决于被害人为他们的自身安全所做的努力，犯罪人的经验、犯罪时间以及犯罪人所选择的接近方式和攻击方式都是重要的因素。

一个侦查人员或许会指责上例中的妓女，指责她使自己成为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同一个侦查人员或许会把上例中的学生看做是一个不幸的被害者。但是，对被害人进行指责对侦查工作毫无帮助。所有的公民都有易受攻击的时候，不管他们生活中的风险有多大。犯罪人并不只在公民易受伤害的时候实施犯罪。正如我们将要讨论到的，这要求我们需要理解生活方式风险（lifestyle risk）与意外风险（incident risk）的不同。

被害风险

被害风险（victim risk）指的是遭受伤害或损失的可能性，这是我们作为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对于一个特定被害人所持的观点。对被害人来说，他却不一定持这一观点。同时这种看法也有主观性，因为在调查特定案件时，主要依靠画像专家的知识 and 经验。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画像专家的知识 and 经验不尽相同，但在一个特定案件中，对于被害风险，专家们的大多数意见确实是相同的。当两位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在被害风险上有不同意见时，他们最大的分歧在于对被害人历史的调查深度。很多犯罪心理画像专家都有这样一个习惯，那就是他们往往带有很多偏见来看待被害人，而这种偏见来自于由不完整的以往被害人信息所预先形成的理论。这种原始的信息，如果没有彻底经过被害人研究的考查，很容易成为被害风险错误评估的基本资料。

影响犯罪心理画像专家作被害风险评估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政治的影响，这是令人悲哀的。如果画像专家觉得某一被害风险指出了某一特定犯罪人的类型（这正是案件中的其他人所怀疑的），往往会通过忽略评估中的风险因素来修改风险评估，而这是很危险的。为了防止这类陷阱和骗局，最好的办法是彻底相信和依靠事实而不是假设，把事实作为评估中所有结论的基础。判断一份说明或是结论的真实性永远要看它能否对事实作出合理的解释。

对被害风险进行分类

以下的术语和定义都引自哈兹伍德（Hazelwood，1995）的著作并有一定

的修改:

低风险被害人 (low-risk victim), 指的是一个人的私生活、职业以及社会生活通常都不易遭受伤害或损失。中度风险被害人 (medium-risk victim), 指的是一个人的私生活、职业以及社会生活都有遭受伤害或损失的可能。高风险被害人 (high-risk victim), 指的是一个人的私生活、职业以及社会生活随时都有遭受伤害或损失的危险。

但是, 要知道被害风险是相对的。

这里被调查和回答的问题是: 一个特定的被害人其特殊的风险是什么? 试问, 一个特定被害人的生活方式是怎样使他遇害的? 例如, 一个 10 多岁的男孩子, 如果他生活在一个父母都是酒鬼的家庭, 那么他就面临着家庭暴力的高被害风险。同时, 在其他方面, 如被绑架、被强暴、被陌生人杀害等方面的危害其面临的风险就较小, 因为这是由他的生活规律所决定的, 他的生活环境大多为团体环境, 并有成人监护。

如果这些还不够全面的话, 那么被害风险可以被进一步划分为生活方式被害风险和意外被害风险。

生活方式所致的被害风险

生活方式所致的被害风险 (Victim Lifestyle Risk) 是指由一个人的性格、私生活、职业和社会环境所导致的所有可能使其遭遇侵害的风险。我们相信, 某一特定的生活环境、习惯, 或者行为都会导致个体受伤害或损失的可能性增大, 而且, 被害风险还由被害人的性格特点所影响。生活方式风险是由“谁”(指被害人)与“如何生活”(指生活环境中所存在的危险度)之间的函数所决定。下面列出了一些人的个性特点, 属于容易形成危险的生活方式而被害的个性特点, 虽不很全面, 但也可以给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提供一个开始工作的平台。这些特点在被害人的生涯中出现得越多越强烈, 那么他全部的生活方式风险就越高。

1. 侵略性。
2. 愤怒。
3. 情感爆炸。
4. 极度活跃。

5. 易冲动。
6. 焦虑。
7. 有沉迷于某一行为的倾向。
8. 有自我毁灭行为的倾向。
9. 病态恐惧或无理性或不可理解的恐惧。
10. 和上司关系难处。
11. 个人空间或私人问题。
12. 不活跃。
13. 不自重。
14. 沮丧、没有希望。
15. 消极。
16. 感情迟钝。
17. 无精打采。
18. 需要关注或同情。
19. 有自我伤害的历史。
20. 有自杀企图或威胁的历史。
21. 有越轨的性行为。

这些特点应该与被害人的年龄、职业、犯罪历史以及成为被害人之前的被害经历联系起来。

意外被害风险

意外被害风险（Victim Incident Risk）是指犯罪人根据被害人当时的精神状态及当时环境的危险因素而对被害人实施的犯罪，包括以下因素会增大被害的意外风险，在此所列因素并非涵盖所有方面：

被害者生活方式的风险度

如前所述，这一判断必须置于事件的前后背景中，从被害人的心理状态开始评估。

被害人心理状态

这是指被害人在遭受攻击之前、之中和之后的情绪状态，当然，其犯罪攻击可通过综合的行为方式分析以及可信赖的证人描述予以证实。例如，激

动或痛苦的情感状态会增大被害的意外风险。除此之外，如果被害人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或条件下感觉安全，那么他的行为与感觉不安全的被害人是不一样的。

案发时间

一天中特定时间段的风险比其他时间要高，但是这个因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案发地点。它可以受很多方面的影响，如某一活动的灯光、出席公共场合的人数。

案发地点

地点是影响被害意外风险最重要的因素。有一些特定环境会容纳更多的犯罪活动，另一些地点则不能够给被害人提供及时的援助，还有一些地方则完全隔离了被害人。所有这些都会在最低生活方式风险的基础上增大意外风险。

被害人的数量

一般来讲，人多的时候总是安全的。那些和别人一起参加活动的人总是面临较低的被害危险。但这首先要求自己的同伴并非面临很高的生活方式风险或是意外风险，对这两种情况需要独立调查和评估。

吸毒和酗酒

使用改变精神状态的药物会降低一个人的身体反应能力，而且会损害他的判断力。在这两种情况下，被害意外风险明显地增大，甚至对那些风险较低的被害人也是如此。

上述因素使我们了解整个犯罪的背景，每一因素只有被置放在一个案件所有已知的事实里才有意义。对每一项的调查都不能单独用来评估被害意外风险。

犯罪人风险

犯罪人风险（offender risk）是指当犯罪人试图猎取一位被害人时，他所能意识到的危险、伤害、损失、被发现和被捕的暴露风险。它不同于犯罪心理画像专家的视角，也不同于被害人的想法，因为一个犯罪人只能根据他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估计特定的情况。这应该由物理证据所显示出的行为事实来评估。

与被害人风险一样，犯罪人风险也是相对的。

这里需要被调查和回答的问题是，就获取一个特定的被害人同时避免被发现和逮捕而言，犯罪人觉得或者认为妨碍他犯罪的障碍是什么，以及随后犯罪人计划如何克服这些障碍，等等。我们可以讯问每一例偶发事件，看看这些犯罪人自己认为他们冒了多大的风险。

为了充分理解在一个特定意外事件中犯罪人风险的特征和范围，我们把此类风险分为惯技风险（modus operandi risk，简称 MO risk）和犯罪人意外风险（offender incident risk）。

惯技风险

惯技风险指的是一个犯罪人以达到自己犯罪目的在实施犯罪之前、之中、之后为避免被法律制裁所采取的技巧、计划及反侦查行为的特征和范围。犯罪人通常认为，他采用的技巧、计划和反侦查行为越多，所冒的暴露风险就越低。

低惯技风险

低惯技风险（Low MO risk）特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之前、之中、之后使用大量的技巧、作了详细的计划，采取了严密的反侦查措施等。它还指所选择的被害人一般不致马上失手，即便最终未达犯罪目的。同时，它也可以指犯罪人有较强的控制力，而且他被注意到的可能性很小，并且事后也不易被发现的意外事件。如下例：

1. 黑暗的或是照明欠佳的地区。
2. 一天中的某个时间，午夜或是黎明，这个时候很少有人能够为犯罪行为作证。
3. 案发地点离犯罪人居住地很远。
4. 犯罪人绑架被害人到一个很远的或事先计划好的地点。
5. 犯罪人由于生活方式的原因选择被害人。
6. 唾手可得的人员（如离家出走者或是妓女）。

有一点是必须要记住的，那就是对犯罪人来讲，高风险的被害人不一定是低惯技风险的（例如，没有人陪伴的孩子们是高风险的被害人，但是，他们对于犯罪人来讲也是高风险的，因为父母或照看他们的人，或是他们的法定监护人很快会发现他们不见了，于是会全力寻找）。

高惯技风险

高惯技风险（High MO risk）指的是犯罪人在实施犯罪之前、之中、之后没有使用恰当的技巧、没有作详细的计划，也没有采取任何严密的反侦查行为。它也指犯罪人所猎取的被害人是容易受人关注的，被害后很容易被周围关心他们的人发现。它还指当犯罪人实施犯罪时被人注意到，或事后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大（如白天人很多的公共场合，或是案发地有安全监视器）。

高惯技风险也用来指那些犯罪人由于犯罪的作为和不作为而易于被认出、被识别、被逮捕的几率增大的情况。这包括很多情形，例如，让被害人看到犯罪人的长相，让被害人幸存，或袭击一个熟人、使其能够认出犯罪人并很容易将他们抓获。

犯罪人对犯罪行为的风险认知会影响他们在预谋、实施犯罪时以及事后的一系列行动。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犯罪人对实施犯罪的风险认识也有不完整和陷入错误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评估其惯技风险都可以使犯罪心理画像专家直接地理解犯罪人的想法：他该作些什么计划，使用什么样的技巧，以及为什么采取或不采取反侦查措施。

犯罪人意外风险

犯罪人意外风险是指在犯罪心理画像专家看来容易使犯罪的伤害与破坏事件暴露，而犯罪人却没有意识到的风险。因为犯罪人未必像犯罪心理画像专家那样对被害人和犯罪现场特点考虑那么周全。

案例

作者应邀去咨询一个案例。被害人是一名21岁的女性，身着紧身裤，系着一条金链子的腰带，化着很浓的妆，涂了迷人的指甲，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的午夜在街上来回走着。犯罪人晚上在露天酒吧喝完酒后开车行驶在公路上，他认为她是一个妓女，就把车停在居民区的一个僻静处，步行走近被害人，先跟她谈了一会儿话，然后开始发动攻击。他把她拖到居民区里，把她绑起来，对她进行性骚扰，在车里折磨了她两个小时。当他走的时候从她的身份证上记下了一些信息，并帮她整理好衣服以及被他扯坏的首饰，警告她不要告诉任何人，然后让她走了，他也开车走了。

事实上，被害人并不是妓女，她只是一个车子坏了步行去酒吧的年轻女子。

犯罪人认为，这种被害人使他处于低风险。他还认为她不会告发他，因为她是卖淫女，他还误以为事后没有人会关心她，所以并没有带她去很远的地方实施更长时间的骚扰，即使他可以很容易地做到这些。

上述案例是为了使我们理解犯罪人的想法。犯罪人看见什么，他们如何去做，他们的行为受哪些影响（是否全部受影响），由此来判断犯罪人的惯技风险度，将其行为与意外风险度相比较便可判断犯罪人选择作案方式的知识层次。

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犯罪人都会使他们处于非常显著或明显的风险中，在这种案例中，信息是十分有用的。犯罪人愿意承担什么样的风险去实施犯罪，不仅可以告诉你犯罪人的需要是什么，还可以告诉你，为了满足这一需要犯罪人会做什么。

被害人研究：一般指导方针

就一个完整的被害人研究而言需要什么，国家司法学会在《死亡调查的国家指导方针》第五部分^①指出，“建立和记录死者的心理画像信息”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作者并不建议读者把他们自己局限在独立的被害人研究中。相反，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应该把任何有关被害人的信息都看做是重要的。也就是说，分析它所呈现的每一个特点直到没有任何的可能价值为止，以便看出它如何与被害人的其他信息相关联。

韦斯顿和韦尔斯（Weston and Wells, 1974, p.97）提供了一个预先准备好的被害人情况快速询问清单。这个清单已经被证明在引出调查信息方面是最有用的。^② 这是在调查人员到达犯罪现场之前需要立即收集的信息，这些问题包括：

1. 被害人是否认识犯罪人？
2. 被害人是否怀疑任何人，为什么？
3. 被害人是否有犯罪的历史，或者举报犯罪的历史？

^① 原文：The NIJ's National Guidelines for Death Investigation, Section E（译者注）。

^② 在此之前，康内尔和索德曼（O'Connell and Soderman, 1935, p.258）只讨论过与辨识被害人有关的问题，并没有深入研究被害心理和相关的侦查问题。

4. 被害人是否有武器？
5. 被害人是否具有好斗的个性？
6. 被害人是否曾经成为过警察记录中的人物？

下面是被害人研究最基本的要求，作者经常将其应用在实际工作中。把这些信息与经仔细检查过的物理证据汇集在一起，就可以给侦查活动提供出发点。当然，下列内容并不涵盖全部相关问题。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必须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仔细地考察每位被害人的个人经历。在此所列内容也包含在《国家司法学会的指导方针》（1997）之中：

1. 确定被害人的自身特征（如民族、体重、身高、头发颜色、眼睛颜色等）。
2. 确定被害人的职业或是上班地点，以及上下班次。
3. 收集被害人的犯罪经历。
4. 收集被害人每天的生活规律、习惯、活动。
5. 收集所有被害人家庭成员的相关信息，并逐一询问。
6. 收集所有被害人朋友的相关信息，并逐一询问。
7. 收集所有被害人同事的相关信息，并逐一询问。
8. 收集被害人的医疗记录。
9. 收集被害人的精神病史，并逐一询问所有给被害人提供过心理帮助的人。
10. 收集被害人所使用过的药物，与已知的被害人的毒物作比较分析。
11. 收集被害人的经济背景（如信用卡、纳税及保险情况）。^①
12. 收集被害人的教育背景。
13. 收集被害人的居住背景（如曾经何时、何地、跟谁住在一起等）。
14. 尽可能花时间关注被害人身边的个人事情（如常去的地方、工作、家/卧室等）。检查任何可利用的相册、日记、杂志。记录下被害人的音乐和文学爱好，以便发现他们崇拜谁，他们想让其他人怎样看待他们，还有他们总体上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

^① 在犯罪人的家中通常可以发现此类信息和文件，如果被害人的家不是主要现场，也仍需要检查，就如同它也被包含在犯罪之中那样。

15. 收集关于被害人的计算机和网络的所有可利用的信息。^① 可能的话，至少下列内容是必须要收集的：

- (1) 确定被害人网络服务商的情况。
- (2) 确定被害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 (3) 检查被害人的通信录及其连接的数据库。
- (4) 检查被害人的收发邮件。
- (5) 检查被害人计算机中的所有文档。
- (6) 确定最近一次计算机的用途及各种软件的用途。

16. 根据证人证言和证据，建立一个被害人最近活动的时间表。

17. 走一遍被害人最后一次走过的路，不管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尽量从被害人的视角来观察这条路，再以犯罪人的视角来观察这条路，但一定要分开来观察。

18. 寻找被害人所经过或想经过的路上的监控录像，它可以重现被害人的行为甚至真实的犯罪情形。

建立时间表：最后的 24 小时

回顾被害人最后的已知行为和建立时间表，对于了解被害人、了解他们同环境的关系、了解他们同其他事件的关系、了解犯罪人如何选定被害人都很重要。

通常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心理画像专家熟悉被害人最后的已知行为，如果可能的话，随后要确定被害人如何到达某地、何时到达某地，如何使犯罪人在这一地点或时间内接近他。这张时间图表需要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做起。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做并能给我们以启发的过程，是不可忽略的。

建立一张好的地点和事件的时间列表至少需要下列步骤：

1. 收集所有可利用的法庭证据和事实证据。
2. 收集所有的犯罪现场照片。
3. 收集所有的证人资料。

^① 在尝试收集这类信息之前，请参见第 27 章“计算机模式：因特网上的犯罪行为”。该部分提供了收集有关被害人这类证据的更详细的情况。

4. 建立一个事件时间顺序和地点的线形列表。
5. 要尽量详细地建立一张被害人受攻击之前 24 小时的活动路线图。
6. 根据地图和法庭证据的引导，实地走一遍被害人在最后 24 小时里走过的路。
7. 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下所有事件线路上的背景因素：被害人曾接触或跟其走过的车辆、人员、活动及职业者等，犯罪人完全可能、或许经过伪装，就藏在上述情况中。

要尽量确定以下内容：

1. 犯罪人在什么地点接触到被害人。
2. 犯罪人在什么地方实施了攻击。
3. 能否从周围的地方来观察攻击行为，能看到多少。
4. 犯罪人是否熟悉这个区域，以便知道某一特定的地方，以及如何到达那里。
5. 是否熟悉被害人、并对其生活日程中所要经过的路线很了解。
6. 是否需要提前踩点或守候。
7. 这条路线是否将被害人置于更高或更低的被害风险中。
8. 在这条路上获取被害人是否将犯罪人置于更高或更低的风险之中。

对各种迹象的调查

对各种迹象的调查是很重要的。各种各样的犯罪人，有的或许知道被害人，有的或许与被害人有熟人关系，或者有着某种未被调查到的关系，这些关系有时远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尤其是犯罪人初次实施犯罪时，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了解更少。

要调查所有的被害人之间有无某种关联的迹象，或调查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是否存在关系的迹象。在案件中，当第一次根据事实提出被害人的情况时，应对所有的与被害人相关的调查假设提出质疑。如果事实不成立，那么

就不应该被假设。^①

被害人研究中的归纳和推理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介绍了对某一特定案件进行被害人研究的过程。毫无疑问，这一过程中有归纳的成分。“风险”这一概念本身就是指所有遭受伤害或损失的可能性，包括对特定被害环境的检查，以及将其同其他相似被害环境进行比较。不过，这样做并非是通过少量个案的研究取得薄弱的结论，进而广泛地使用其结论进行推理。对潜在风险性的鉴别更主要的是使有可能增大或减少风险系数的行为和环境变得更加明确和清晰。例如，妓女和陌生人一起上车并与之发生性关系，没有人认为这不会增大某些风险（如骚扰、偷窃、绑架）。这只是归纳性的结论，因为这种事并不总能发生，但这种事情的发生确实需要引起侦查人员的关注。

确实有人试图通过研究尽力描绘被害人的特点或是典型的被害人形象，

① 对于部分或整个与被害人研究相关的特殊参考资料，笔者强烈推荐读者参考以下著作：

芬恩凯霍·D.（Finkelhor D.，1979）：《被性犯罪所残害的孩子们》（Sexually Victimized Children），纽约，自由出版社。

郝加顿·J.，利普西 N.（Haugaard J.，Reppucci N.，1988）：《儿童的性虐待》（The Sexual Abuse of Children），圣弗朗西斯科，Jossey - Bass 出版社。

赫尔曼·J.（Herman J.，1981）：《父亲和女儿的乱伦》（Father - Daughter Incest），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蒙蒂利万·J.（Monteleone J.，1996）：《正视虐待儿童的委托报告》（Recognition of Child Abuse for the Mandated Reporter），第二版，圣路易斯，GW 医学出版社。

斯特朗·M.（Strong M.，1998）：《刺耳的红色尖叫》（A Bright Red Scream），纽约，北欧海盗出版社。

尤其是某一类的犯罪被害人。^① 这些著作的科学性、精确性和实用性经常受到怀疑，所以最好是像读其他书那样，仔细的、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读这些著作。

吉娜·甘布尔（Genna Gamble）谋杀案

在这个案件中，道格拉斯·毛塞（Douglas S. Mouser）因为谋杀了他14岁的继女——吉娜·甘布尔（Genna Gamble）而被审判。吉娜赤裸的尸体于1995年10月1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瓦特福特郡（Waterford）、沿干溪河畔的山坡上被发现，她是被勒死的。

侦查人员和联邦调查局培训过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迈克尔·布罗丹（Michael J. Prodan）推测，毛塞首先在摩戴斯托（Modesto）的家中杀害了吉娜，而后开车二三十分钟去抛弃尸体。他们认为，这件事是在吉娜洗澡时或是在刚洗完澡时发生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她的身体是赤裸的。

在这个案例中，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最终被允许出庭就有关问题包括被害人的情况作证。作为一个犯罪分析和被害人研究方面的专家，犯罪心理画像专家证实了以下内容（在此并非全部内容）：

1. 他不是法庭专家，也不知道什么是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
2. 犯罪现场证据和被害人研究都是犯罪分析中很重要的部分。
3. 他没有过多地使用可利用的被害人资料来补充自己的观点，他也不知道下面的两个事实：其一，吉娜的哥哥在外面吸毒；其二，吉娜曾经和两个性骚扰者约会过。
4. 他没有勘查犯罪现场。
5. 他只用看了上百个犯罪现场和法医检验照片中的15张就提出了他的

^① 这样的一些研究是有益的，但是，有人开始质疑，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经常被引用。例如，菲格曼、李和斯坦顿（Feigelman, Li and Stanton, 1999）进行了一项对349个都市人的研究，包括低收入的非洲、美洲的儿童和青春期少年，有198个男孩和151个女孩，年龄从9岁到15岁，目的是要确定他们是否为因毒品交易而遭暴力犯罪之风险以及有无其他风险行为。研究表明，参与毒品交易的孩子更容易冒险、容易违法、容易使用毒品和暴力手段，并对同龄人的风险性行为认同。我们都知道，毒品交易往往与吸毒、极端暴力共存，这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这项研究试图确定毒品是否能给一个团体中的孩子们带来问题，比如增大他们的风险，事实证明确实是这样。

观点。

6. 他没有考察桑顿博士对案件的犯罪再现就提出他的观点。
7. 吉娜是一个低风险被害人。
8. 吉娜有可能被某个认识她的人所杀害。
9. 吉娜有可能先在家里遭到攻击。

没有相关的事实证据被提供来证明布罗丹的观点。事实上他承认，他所获得有关被害人的相关资料相当少，他责怪侦查人员没有把资料提供给他。^① 最终，他所持观点的基础被认为是来自他本人的教育、训练和经验（见图8-1）。



这是吉娜被谋杀的山坡现场，注意拖拉的痕迹是从河床底部向上形成，还有尸体的位置

图8-1

^① 我们来重温一下联邦调查局的画像专家罗伯特·哈兹伍德（Robert Hazelwood）在军事委员会法庭（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面前就克莱顿·哈特维格（Clayton Hartwig）在美国爱荷华州军舰上死亡分析中出现未被核实的调查假设而被提问和回答的证词。“无论何时，我们（联邦调查局的画像部门）被要求为调查部门作案例分析，我们所做的假设都是根据相关的专业知识。他们给我们提供所需要的材料，那就是我们观点所根据的材料。”这之中，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对他们的调查与意见其质量与信息是否全面都不负责任。笔者认为，一个称职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必须要求他们所提供的是可以利用的信息，并尽力去评估信息是否完整。

笔者作为被告方聘请的犯罪分析和被害人研究专家，对此案作出下列鉴别（在此并非全部内容）：^①

1. 检查所有已发现的与被害人相关的资料。
2. 检查由被告和原告双方提出的刑事勘查与报告。
3. 审核所有的犯罪现场和尸检照片，包括犯罪现场录像带。
4. 亲临犯罪现场两次，其中一次是和桑顿博士一起去的。
5. 吉娜有可能是在发现尸体的地方或附近被杀害的，理由如下：

（1）从被害人的鼻子、耳朵清理出来的物质与周围环境的特性相符，就像桑顿博士在案件犯罪现场再现中的第一条所讨论的那样。

（2）尸体是从有水的方向被移动到最后的位置，而不是从马路的方向被移到山坡上的，就像桑顿博士在案件犯罪现场再现中的第二条所讨论的那样。

（3）在被害人的尸体上发现了浮萍，就像桑顿博士在案件犯罪现场再现中的第二条所讨论的那样。

（4）在被害人尸体上还发现了植物生长和水岸边土壤的痕迹，就像桑顿博士在案件犯罪现场再现中的第二条所讨论的那样。

（5）被害人的头发顺向在山坡上扫过的痕迹冲着水的方向。

（6）缺少尸体从其他场所转移的可信证据，如生理体液、头发或其他压

^① 没有证据表明在吉娜的家里有犯罪或打斗的迹象，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毛塞和这件事有关。在5个月的案件审理中，原告的律师仅仅出示了一份间接证据：一张被害人腿部的痕迹照片，是由摄影测量专家格雷·罗伯逊（Gary Robertson）检查到的。他证实这道痕迹与毛塞车里座位上的安全带的痕迹是一致的，因此他支持起诉方的观点。

但是，罗伯逊却被孤立了，其他的法庭专家都认为这一发现不符合科学逻辑性。而且，有几位专家证实吉娜腿部的痕迹和她的内衣痕迹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吉娜在受攻击时被脱掉了内衣）。这些专家包括：被告方聘请的犯罪学家桑顿博士（Dr. Thornton）；起诉方聘请的犯罪学家约翰·约雪达（John Yoshida）；起诉方聘请的罗伯特·劳伦斯（Dr. Robert Lawrence），法庭病理学家，尸检报告就是由他做的；詹姆斯·R. 威廉森博士（Dr. James R. Williamson），是一个有着工程硕士学位的摄影测量专家，曾在联邦调查局学习过图像分析。

当起诉方试图使罗伯逊的观点被联邦调查局图像分析部门认可时，他们却在报告里说罗伯逊夸大了他的发现。作为报告的一部分，联邦调查局解释说罗伯逊并没有排除其他原因可以导致吉娜的腿伤。他们进一步说，罗伯逊似乎没有搞清楚整体证据和个体证据的本质不同。

印的形态证据。

6. 吉娜是一个暴力犯罪的高风险被害人，理由如下：

(1) 被害人曾被诊断为执拗对抗性精神障碍患者 (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她的精神治疗医生形容她的特点是突然发脾气，蓄意与他人对抗，拒绝遵从父母的教导，易冲动。

(2) 被害人是一个很轻浮的人，这使她在面对某一类的性犯罪人时非常容易上钩 (这些犯罪人用奉承或是可以接受的建议即可骗取信任)。

(3) 被害人经常在某些社交场合同那些没有大人看管的、与她年龄不符的男性来往 (Mall, Camelot and Funworks)。

(4) 被害人还曾与一名性犯罪人有过来往，这名犯罪人选择的被害人就是像吉娜这一年龄段的女孩子。

(5) 被害人被认为可能是和她从卡迈罗特娱乐场所 (Camelot) 认识的一个人上了车。

(6) 被害人的哥哥戈林·甘布尔 (Gerran Gamble) 曾经贩毒，并把毒品藏在家里。

7. 关于吉娜的死，还有许多不能解释的性方面的问题，在犯罪现场没有因图财或因愤怒而杀人的证据。在这个案件中，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准确、完整的被害人研究，勘查犯罪现场，以及在提供专家法庭意见之前，充分利用所有法庭检查的结果。这些信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专家的观点。但是在提供专家意见时不具备上述信息，结果也会适得其反。

1999年12月20日，星期一，陪审团判定毛塞二级谋杀罪名成立。当我写这些时，这个案子还正在上诉之中。

参考文献

1. Feigelman, S., Li, X. and Stanton, 8. (1999) "Exposure to drug trafficking among urban, low-income African America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rchives of Pediatric and Adolescent Medicine, 153 (2), 161 ~ 168.
2. Groth, A. (1979) Men Who Rape, New York: Plenum Press.
3. Hazelwood, R. (1995) "Analyzing the Rape and Profiling the Offender", in Burgess, A. and Hazelwood, R. (Eds.), Practical Aspects of Rape Investigation:

-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2nd ed. , New York: CRC Press.
4. Herman, J. (1981) Father – Daughter Inc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 Karmen, A. (1984) Crime Victims: An Introduction to Victimology,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Publishers, pp.2 ~3.
 6. Ly, P. (2001) "Defending the Need to Talk About It", Washington Post, August 9, p. GZ12
 7.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1997) National Guidelines for Death Investigation, Research Report 167568, Washington DC: NIJ.
 8. O'Connell, J. and Soderman, H. (1935) Moder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9. The U. S. S. Iowa (1990) "The U. S. S. Iowa: Guilt by Gestalt",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Harper's Magazine, March, pp.25 ~26.
 10. Tobolowsky, P. (1999) "Victim Participation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Fifteen Years After the President's Task Force on Victims of Crime", New England Journal on Criminal and Civil Confinement, Winter.
 11. Weston, R. and Wells, K. (197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asic Perspectives, 2nd ed. ,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 Hall.

第9章 死因心理剖析

Dana S. La Fon, Psy. D.

死因心理剖析（Psychological Autopsy）是一项考查死者生前心理方面的技术。它是被害人学的延伸（如有关被害者的信息）。它将重现导致死亡和死亡当时的心理状态。考查内容包括死者的行为、思想、情绪情感和个人的亲属关系等（Ebert, 1991）。程序上包括对死者家庭、朋友、同事、熟人的调查访问，还有对法医验尸和毒物学报告、个人档案（职业、心理健康状态、住房、婚姻史、家族史等）等方面的考查，还有对死亡现场勘查记录与照片等材料的检查。更多时候还要排列出其主要的的生活压力（财务问题、失业或失恋，以及药物依赖等）、心理状态，主要的生活事件（生日、结婚纪念日等）。然后用心理学理论分析这些材料，确定死者的个性特征以及他死前的心境。通过再现死者的背景和个体人际关系、个性倾向性以及其应付机制，死因心理剖析即帮助理解死者在他或她的死亡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Gelles, 1995）。

心理剖析的历史

心理剖析的开始要追溯到1958年，洛杉矶（Los Angeles）法医就可疑死亡的分类向洛杉矶自杀预防中心咨询。^① 当时施奈德曼（Shneidman）^② 首先提出了“死因心理剖析”的概念以帮助法医澄清那些看起来不确定或可疑的死亡及死亡方式。

① Clark and Horton - Duetsch, 1992; Litman, 1989.

② Litman et al., 1963.

确定死亡方式

法医通常可以明确死亡原因（导致死亡的病理过程），但是死亡方式（manner）可能就不那么清楚了。死亡方式与死亡的特殊环境相关（Jobes et al., 1987）。死亡方式通常有四种：自然死亡、意外事故、自杀和他杀（Spellman and Heyne, 1989）。可能还有第五种死亡方式，那则是无法确定的（Jobes et al., 1987），可能存在不能明确死亡方式的环境因素。艾伯特（Ebert, 1991）以跳伞者坠落死亡为例阐明了几种死亡方式的差别。死亡原因很清楚，都是由于撞击伤死亡，然而，死亡方式就不那么清楚了。死者是不小心从飞机上坠落（意外事故），还是有意不使用降落伞跳下（自杀），还是被别人从飞机上推下（他杀），还是在下落的途中心脏病发作而使他或她不能拉动绳索（自然原因）呢？这些都不能确定。通过心理剖析，可以给法医提供信息以帮助确定其死亡方式。

死因心理剖析类型

死因心理剖析有两种基本的分类可应用：自杀心理剖析（suicide psychological autopsy, 简称 SPA）和可疑死亡心理剖析（equivocal death psychological autopsy, 简称 EDPA）（la Fon, 1999）。这两种心理剖析方法采用相似的剖析程序。然而，这两种方法的目的或目标是完全不同的。自杀心理剖析是在死亡方式被确定为自杀的时候使用的。疾病控制中心（CDC）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确定了自杀为一种适当的死亡模式（Jobes et al., 1987）。根据这些指导方针对死亡方式分类时，确定在发现自伤证据和明确无疑的死亡意图的时候可确定为自杀。

自杀心理剖析（SPA）的目的是了解是哪些心理因素导致自杀。自杀学家收集自杀心理剖析资料，并建立信息库是为了可以更好地了解自杀的原因，以实施自杀干预和预防。自杀心理剖析之后不需要之后的法律或法庭调查。

第二种心理剖析方法叫做可疑死亡心理剖析（EDPA）。可疑死亡是指死亡方式不清楚的死亡。什么原因导致的死亡不详就需要死因心理剖析。施奈德曼（1981）评估大约 5% ~ 20% 的死亡为可疑死亡。可疑死亡心理剖析将引起死亡侦查，它要调查死亡的各种可能方式，力图提供死亡背景信息以使

有关专家能进一步研究（Spellman and Heyne, 1989）。

可疑死亡心理剖析的基本目的是给法医提供最初的辅助信息，以帮助其确定死亡的方式（M. G., Gelles,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ne, 1999）。在进行可疑死亡心理剖析之后，就可以提出关于与死亡方式（即事故、自然原因、凶杀和自杀）相关联的行为方式的临床意见。如果死亡方式是自然原因（natural causes）或事故死亡（accidental death），并且这个结论被法医所赞同，那么死亡方式就被确定，即可结案；如果死亡方式是自杀（suicide），也可以结案，在这一点上，死因心理剖析资料可以如同自杀心理剖析一样应用，这些资料可以被存入自杀学数据库以进行自杀干预和预防；如果结论是谋杀（homicide），则案件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第五种死亡方式结论是无法确定（undetermined）的死亡，则不能就此结案，还需长期的进一步法律调查。

由谁来进行自杀心理剖析和可疑死亡心理剖析

由于深入的实验应用依赖于心理学的理论，一般的死因心理剖析都由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完成。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或对自杀问题有研究的精神健康专家（或称自杀学家）经常进行自杀心理剖析。由于不要求作死亡方式判定，进行自杀心理剖析者不必经过刑事学科的训练，然而，很多人都具有法庭心理学的知识或死亡侦查的经验。

通常，进行可疑死亡心理剖析的人则须是经过法庭相关训练或有此方面经验的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许多作者在谈到这一问题时都明确地要求，进行死因心理剖析的人必须具有正规的法庭或犯罪侦查训练与经验（Annon, 1995），还需要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与司法界人士介入，形成多学科的人员小组（Annon, 1995）。专家们都赞同，除了了解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之外，还需要具有死亡侦查和法医学两方面的训练或经验（La Fon, 2001）。如果没有刑事侦查训练，要判定死亡是因意外事故、还是自杀、还是谋杀（即可疑死亡案件）是相当困难的。

施奈德曼被誉为死因心理剖析之父，他明确表示，侦探、检察官或“雇用枪手”式的心理学家不能进行任何类型的死因心理剖析（Shneidman, 1994）。

当今死因心理剖析的使用者

如今，可疑死亡心理剖析除了为法医提供信息之外，还为很多人提供服务。保险公司、公民个人都通过可疑死亡心理剖析来帮助他们提出索赔诉讼。关于死亡方式的论战经常会扰乱人寿保险的正确诉讼主张。大多数人寿保险公司都在保单上约定，如果是自杀便不予赔偿。当死亡方式疑难不确定的时候（经常难以判定是自杀还是事故），保险公司或其原告就都容易丧失他们应得的大量金钱。心理学家经常被要求进行可疑死亡心理剖析来帮助判定死亡方式以使保险公司能确定诉讼主张。

美国军方也是心理剖析的主要使用者。海陆空军都有可疑死亡心理剖析的任务以帮助调查在军事基地上或军职人员的可疑死亡案件。许多文官和军队的心理学家都接受相关训练，可为各自的部队进行死因心理剖析。

有趣的是，与私人自杀案件是否提出诉讼索赔请求不同的是，不论军队中军人是怎样的死亡方式，死者都将得益（指亲属）。然而，军队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困难，像自杀这样的突然死亡方式往往使其父母或家庭成员在一段时间内难以接受，并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痛苦。对这些丧失亲人的人其敏感性、对其悲痛过程的熟悉程度和认知都对进行死因心理剖析的人来说异常重要。

既要为死者家属考虑也要为军方考虑是件困难的事情。在军队中，处理突然的死亡的死因心理剖析要经命令而做，然后再交给曾与死者在一个部门服役的个人。在任何工作环境下因意外或自杀而丧失同事都是件难以克服的悲痛事，军队中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经常进行死因心理剖析以帮助上层军官克服人员损失和采取预防措施。

美国的法院和执法机构也用可疑死亡心理剖析来帮助确定死亡原因。在法庭上，使用可疑死亡心理剖析技术的主要难点是法庭证据可采性问题。如果没有以往判例的支持，任何一门科学技术在法庭上其证据采用都是一个难题。根据可用于民事和刑事审判的联邦证据法则（2000），特别是第702条的规定，“如果科学的、技术的或其他专门知识在审判中能帮理解证据或判定事实，可通过专家证人，其资格是根据其知识、技能、经验、训练，或教育而被许可，在法庭上以意见或其他方式进行作证”（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p.1）。第702条取代了弗赖伊检验（Frye test）（即在相关科学领域内已被普

遍接受的即认为是可靠的^①），指派主审法官评价专家证词的基本方法是否“科学有效”。很多因素与此要求有关，包括“（1）证词建立在足够的事实或材料基础上。（2）证词由可靠的原理和方法产生。（3）证人将原理和方法正确地运用在案件事实上”（O'Connor and Krauss, 2000）。

将评估可疑死亡心理剖析证言是否可采用的任务交给了评审法官。本章的全部内容给法官提供了有关死因心理剖析的历史应用，相关科学领域在实践中提出的对可疑死因心理剖析的基本内容项目，以及从事可疑死亡案件的死因心理剖析者需要掌握的经验和知识及训练课程的标准（Gelles, 2001; La Fon, 2001）。结果是，当前的资料不仅允许法官根据经验、训练和教育成为相关专家，而且还可以在法庭上评判专家证言是否将剖析原理和方法可靠地运用到案件事实当中。

例如，如果一个专家以前没有经过相关课程的培训，法官就可能认为专家受训不足，从而不具备将死因心理剖析方法正确运用到案件事实中的能力。最终，法官就会判定此专家无作证的资格，而并非所采用的科学手段其准确性问题。然而，专家们的方法学也是有争议的问题，必须判定其是否符合证据采用标准。尽管当前的知识界开始谈论“死因心理剖析”是否可以被作为证据采用的话题，但是，进一步研究死因心理剖析过程中的科学精确性（也就是确立信度和效度）仍是必需的，从而确保司法准入并促进死因心理剖析的整体价值的提高。

死因心理剖析实验的准确性

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确定死因心理剖析统计学的有效性（准确性）或任何一种死因心理剖析可靠性的研究。有一些研究，^② 它们把死因心理剖析作为其方法的一部分。然而在操作上，死因心理剖析很少被详细解释，并且，也没有在自杀心理剖析和可疑死亡心理剖析之间作出区别。将死因心理剖析作为科学手段的文章主要描述其特点，偶尔提供一份某作者对死因心理剖析所列出的意

①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1993.

② Clark and Horton – Deutsch, 1992; Grieger and Green, 1998; Wolford and Reihman, 1991; Younger et al., 1990.

见要点（Ebert，1991；Gelles，1995）。尽管可操作性的详细解释对死因心理剖析实验研究的发展非常有用，但这些文章，无论是对自杀心理剖析还是对可疑死亡心理剖析，都缺乏准确的统计学判定，从而没有帮助的意义。

缺乏实验的确认并不意味着死因心理剖析作为一种科学的工具是无效或没有用的。它仅意味着死因心理剖析的研究工作还没有像犯罪心理画像那样达到其实际应用水平。然而，死因心理剖析在给用户提供他们需要的死者死亡类型信息，或更深地了解死者心理状态、死者的个性特征等方面是十分有用的。

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为最初的实验有效性做准备。不拘泥于以前文献中通常提出的“检查目录”，拉丰（La Fon，2001）提出了可疑死亡心理剖析所包含的检验核心内容（见表9-1）。这些内容是建立在全国范围内专家意见的调查基础上。这个目录内容提出了得到本科学领域认同的进行可疑死亡心理剖析的可操作性的详细说明。这项研究为建立科学的信度和效度提供了一个平台：对于现今的研究者来说，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把死因心理剖析的临床凭直觉的操作变为一个经过实验检验具有有效性的科学工具。

表9-1 值得注意*的重要项目

描述项目	重要的 n	不重要的 n	p
访谈家庭资料	23	0	.000*
访谈主管者或雇员资料	21	2	.000*
访谈同事资料	23	0	.000*
访谈密友资料	23	0	.000*
访谈最后见到死者的人	22	0	.000*
访谈其目前的邻居资料	17	6	.022*
法医报告、实验室研究、毒物分析报告	23	0	.000*
警察报告、犯罪或现场证据	23	0	.000*
检查死者药箱内容	22	1	.000*
考查死亡如何发生、何时发生与发生地点	23	0	.000*
死者最近写过的东西	23	0	.000*
死者的书籍或音像资料	18	5	.007*
家族成员	21	2	.000*
家庭史(父母,亲属关系,死亡 Hx)	23	0	.000*
病史	23	0	.000*
毒品和酒精服用史	23	0	.000*

(续表)

描述项目	重要的 n	不重要的 n	p
教育史(教育、水平、年级等)	20	3	.000*
工作史(稳定性、困难)	23	3	.000*
外伤史(包括先前自杀/他杀行为)	23	0	.000*
居住史(包括稳定状态)	21	2	.000*
人际关系史	23	0	.000*
违法记录(包括犯罪记录)	22	1	.000*
精神疾病治疗史	23	0	.000*
死者人口统计情况	22	0	.000*
死者死亡时身体状况	23	0	.000*
死者最近的职业	18	5	.007*
死者宗教活动	21	2	.000*
死者个人经济情况	22	0	.000*
描述死者个性	22	1	.000*
描述死者生活方式	22	1	.000*
死者应对压力方式	23	0	.000*
最近压力、紧张	23	0	.000*
生活方式和死亡事件中酒精因素	23	0	.000*
生活方式和死亡事件中毒品因素	23	0	.000*
死者生前习惯的改变	23	0	.000*
死者人际关系和人际网络特点	23	0	.000*
死前进行沉思苦想	22	1	.000*
确定有无对某人的愤怒	22	1	.000*
动机的确定:死者有死亡的意图或动机	22	1	.000*
死者死亡构思过程	22	1	.000*
表现出典型的自杀前行为	22	1	.000*
审查自杀遗书,如果有的话	23	0	.000*
死者对死亡方法的熟悉程度	23	0	.000*
死亡致命性评估	23	0	.000*
报丧者对死者死亡的反应	19	4	.002*
风险水平评估(即处于高风险被害/还是低风险被害中)	21	2	.000*
建立时间表:再现死者死前一天发生的事件	23	0	.000*
建立时间表:再现死者死前 12 个月至死时发生的事件	19	4	.002*
死者与死亡地点的关系	20	2	.000*
有无性物品随身	18	5	.007*
任何特殊情况或特殊特点	22	1	.000*

* 值得注意的重要项目指 $p < 0.05$

这个可疑死亡心理剖析的内容也给相似的联邦调查局的暴力犯罪缉捕项目（Violent Criminal Apprehension Program，简称 VICAP）提供了一个建立凶杀案件被害人流行情况调查数据库（epidemiological homicide victimology databases）的平台。暴力犯罪缉捕项目是专门分析暴力犯罪的全国数据信息中心。它包括已侦破和未侦破的谋杀案、谋杀未遂、失踪人口，已明确死亡方式或怀疑是谋杀的未被人辨认的尸体等数据。暴力犯罪缉捕项目其目的是分析作案惯技的方式、研究被害人（根据物质状态而界定——活着或死亡——对其识别鉴定、身体描述、衣着和居住地）、物证、犯罪嫌疑人描述和犯罪嫌疑人行为（Ressler et al.，1988）。上述分析用来帮助执法机关在侦查过程中迅速确定和拘捕对其罪行有责任的犯罪嫌疑人。

暴力犯罪缉捕项目不包括对被害者个性和行为方面的分析。但根据死亡心理剖析中谋杀死亡的数据，就可以分析出被害者的行为信息以确定其被害风险或高或低的特征。从可疑死亡心理剖析数据中得出的凶杀被害者的数据可预防或干预凶杀案件的发生，使被害人的研究从一个个案件的评估水平发展到由经验逐步展开的具有心理学基础的被害流行情况调查平台的建立，如今这一平台还包括公众的健康调查。

执法官员显然依赖被害人研究以帮助破案（即疑难死亡案件分析和暴力犯罪缉捕项目）。联邦调查局为了在案发后对杀人犯、强奸犯和恐怖分子进行心理画像而将信息分类，凶杀案被害人学数据库还可以帮助凶杀案的侦查员加深他们对被害者的理解，同时可以对潜在的被害者进行更准确的心理画像以防止谋杀的发生（即在谋杀行为发生之前识别高风险的被害者）。

可疑死亡心理剖析与其他死亡侦查类型（可疑死亡分析、心理画像、谋杀侦查）的比较

可疑死亡心理剖析（EDPA）可以从几个方面与联邦调查局通常进行的可疑死亡分析（Equivocal Death Analysis，简称 EDA）区别开来。联邦调查局使用的可疑死亡分析主要帮助可疑死亡案件的刑事侦查。可疑死亡心理剖析和可疑死亡分析其资料来源都基于他们的侦查活动。只不过可疑死亡心理剖析是心理上的分析，由心理学家用心理学理论来帮助其客户确定死者的死亡方式，而可疑死亡分析通常由执法人员实施来协助死亡案的侦查。可疑死亡心

理剖析建立在心理学理论基础之上，而可疑死亡分析是侧重于执法技术和传统的被害人学的案件分析。

可疑死亡心理剖析和可疑死亡分析之间另一个主要区别是，联邦调查局并不为可疑死亡分析收集自己的数据，而是采用提出案件调查的当地司法机构已经收集的案件信息（Poythress et al.，1993）。

死亡时间判定也是可疑死亡心理剖析和可疑死亡分析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可疑死亡心理剖析通常要求在死亡发生后尽量及时地协助确定死亡方式；而可疑死亡分析则在死因侦查过程中的任意时间内进行，更多的时候是执法者在所有的侦查思路失败后提出要求增加额外的侦查服务以提供其他的案件信息时才进行。这使得可疑死亡心理剖析往往在侦查进行中介入，甚至在案件被认为“冻结”之后才开始介入。奥尔特（Ault）、哈兹伍德（Hazelwood）和罗伯逊（Reboussin）（1994）认为，由于司法机构的专业人员把可疑死亡分析作为刑事技术来使用，他们确信，他们不再需要在心理健康领域坚持相同的伦理和专业标准。然而，他们仍被要求严格遵守他们自己专业的伦理和法庭的要求（Ault et al.，1994）。

若将犯罪心理画像与谋杀侦查相比较，可疑死亡心理剖析可以作为正在进行的犯罪侦查的辅助信息。可疑死亡心理剖析包括犯罪心理画像的被害人研究部分，并且，还超出其范围提供心理学方面的资料给侦查人员。可疑死亡心理剖析可以给犯罪心理画像者提供大量被害者心理状况和个性特征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建立在几十年科学研究的心理学理论基础之上的。

这些信息可以包括以下方面：

1. 可能性，即死者在他或她自己的死亡中起作用的可能性以及这一作用是否能实现的可能性。
2. 预测的理论根据，即预测死者生前至临死时的行为、认识、情感的理论根据。
3. 准确地评估，即根据死者的知识水平准确地评估他或她个人生前的各种表达。
4. 建立一个时间表，即死者死前的行为、想法以及情感活动情况。
5. 相关的行为解释，即结合死者生前、他或她的家庭和相关的他个人的材料对出现的任何精神障碍或人格障碍进行相关行为解释。

6. 协助排除与死者个性不相符合的活动或行为。

可疑死亡心理剖析所提供的信息不能取代正在进行的侦查假设，而是用系统可靠的方式支持或否定那些假设。

总结

死因心理剖析是对死者死时和死前的回顾性心理检查，它是被害人学的扩展。重现死者死前的心理状态有两种心理剖析：为自杀做的（自杀心理剖析）和为可疑死亡案件做的（可疑死亡心理剖析）。两项研究的资料来源与在死亡侦查中获得的资料相似。然而，心理学理论的应用是死因心理剖析与其他类型的刑事被害人学调查相区别的地方。进行可疑死亡心理剖析的人通常是具有死亡案件侦查和法医学训练或经验的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

从1958年使用死因心理剖析以来，它一直在帮助法医确定死亡方式上起重要的作用。如今，死因心理剖析资料的使用者已扩展到个人、为大众服务的保险公司、美国军方、美国司法系统以及司法部门。死因心理剖析与正在进行的死亡案件侦查相结合，可疑死亡心理剖析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地考查死者的心理状态和个性特征。这些材料给死亡案件侦查员提供了辅助信息来源，有助于支持或否定现行使用中的侦查假说。

参考文献

1. Annon, J. S. (1995) "The Psychological Autopsy", American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ology, 13 (2), 39 ~ 48.
2. Ault, R. L., Hazelwood, R. R., and Reboussin, R. (1994) "Epistemological Status of Equivocal Death Analysi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9 (1), 72 ~ 73.
3. Clark, D. C. and Horton - Duetsch, S. L. (1992) "Assessment in Absentia: The Value of the Psychological Autopsy Method for Studying Antecedents of Suicide and Predicting Future Suicides", in Marls, R., Berman, A., Maltzberger, J. T., and Yufit, R. I. (Eds.), Assessment and Prediction of Suicide, New York: Guilford Publications.
4.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1993) 509 U. S. 579 (1993).
5. Ebert, B. (1991) "Guide to Conducting a Psychological Autopsy", in Anchor, K. N. (Ed.), Handbook of Medical Psychotherapy, Lewiston, NY: Hogrefe &

Huber.

6.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On – line] (2000) Washington, DC: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Producer and Distributor].
7. Gelles, M. G. (1995) " Psychological Autopsy: An Investigative Aid ", in Police Psych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p. 337 ~ 355.
8. Grieger, I. and Green, P. (1998) " The Psychological Autopsy as a Tool in Student Affairs ",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39 (4), 388 ~ 389.
9. Jobes, D. A. , Berman, A. L. , and Josselson, A. R. (1987) " Improving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Medical – Legal Certifications of Suicide ", Suicide and Life – Threatening Behaviors, 17 (4), 310 ~ 325.
10. La Fon, Dana S. (1999) " Psychological Autopsies for Equivocal Death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ency Mental Health, 3, 183 ~ 188.
11. Litman, R. E. (1989) " 500 Psychological Autopsies ",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34 (3), 638 ~ 646.
12. Litman, R. E. , Curphey, T. J. , Shneidman, E. S. , Farberow, N. L. , and Tabachnick, N. D. (1963) " Investigations of Equivocal Suicides ",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13 (1), 46 ~ 54.
13. O'Connor, M. and Krauss, D. (2000) " Legal Update: New Developments in Rule 702 ", American Psychology – Law Society News, 21 (1), 1 ~ 18.
14. Poythress, N. , Otto, R. K. , Darkes, J. , and Starr, L. (1993) " APA's expert panel in the Congressional Review of the USS Iowa incident ",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 (1), 8 ~ 15.
15. Ressler, R. K. , Burgess, A. W. , and Douglas, J. E. (1988) Sexual Homicide: Patterns and Motive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16. Shneidman, E. S. (1981) " The Psychological Autopsy ", Suicide and Life Threatening Behaviors, 11 (4), 325 ~ 340.
17. Shneidman, E. S. (1994) " The Psychological Autopsy ", American Psychologist, 49 (1), 75 ~ 76.
18. Spellman, A. and Heyne, B. (1989) " Suicide? Accident? Predictable? Avoidable? The Psychological Autopsy in Jail Suicides ", Psychiatric Quarterly, 60 (2), 173 ~ 183.
19. Wolford, K. M. and Reihman, J. (1991) " Psychological Autopsy Database

Development: A Strategy for the Study of Suicide", Forensic Reports, 4, 437 ~ 450.

20. Younger, S. C. , Clark, D. C. , Oehmig - Lindroth, R. , and Stein, R. J. (1990) "Availability of Knowledgeable Informants for a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 of Suicides Committed by Elderly Peopl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38 (11), 1169 ~ 1175.

第 10 章 虚假报案

John J. Baeza (ret.) and Brent E. Turvey, M. S.

当物证与口供背道而驰时，物证更有说服力。物证虽然是沉默的，然而，无言的事实在真实证据的等级中却有着相当高的地位。

菲律宾人诉阿奎那多（Rodrigo Lteyro Aguinaldo）案（1999）

格罗斯博士在其影响深远的刑事侦查的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讨论侦查理论先入为主的危险性。他曾例举了一个最早的、广有疑义的案例：即一个人如何做了一个有关性侵犯的虚假投诉（Gross, 1924, pp. 13 ~ 14）。格罗斯博士在书中作了大量相关题目的讨论，包括报告虚假案例的不同动机，自残行为的发生，侦查人员的有关责任。在最近的一篇有关强奸案的文章中，对于虚假报案的概念和结果的讨论进一步提供了这方面的观点和相关问题（Palmer and Thornhill, 2000, pp. 159 ~ 161）。对欺诈和性别差异的讨论是其主题，其中包括了本题目内容并附有统计数字。这些作者总结说，社会因素和性别的不同导致了公众不愿意相信女性被强奸的投诉（Palmer and Thornhill, 2000, p. 160）。

本章的作者们曾一起参与了数百起儿童被虐待和性骚扰案例的调查、犯罪再现和评估工作。当时发现，至少有 20% ~ 30% 的案例被确定为假案。同时，笔者也考查过其他没有被侦查员鉴别的假案。有许多案例当时是作为未决的案件合法处理的，如果不涉及对一个犯罪嫌疑人的重新逮捕和起诉的话，一个犯罪嫌疑人曾被错误地指控是很平常的事。

比较而言，上述情况说明，作为专业团体普遍缺乏对虚假报案问题进行仔细探讨的过程（如侦查人员、画像专家、法庭科学家、律师、精神健康专家等）。

相关文献

假案经常在媒体中被揭露出来，非正式的假案报告率将会对公众公开。^①但是，一方面，关于虚假案例的报告这一主题的专业著作还很少。例如，几乎没有科学地对假案率或假案百分比的调查研究，而且，一般以假案为题公开发表的文章也很少。另一方面，研究强奸或是性骚扰这种案例的人并不会专门去研究假案，更不会单独论及假案问题。本章作者所持的观点是，这并非是小范围的事实，即许多研究人员害怕被诽谤，被列入黑名单，或者被威胁说要取消他们的职业许可，因为他们的结论与占主导地位的性政治潮流不相符合。^②

麦克唐纳（MacDonald）

麦克唐纳（MacDonald, 1973）指出，在1968年，强奸案的全国平均发案率是18%。他进一步指出，在科罗拉多州（Colorado）的丹佛（Denver）一年的时间里，有25%的强奸案是无根据的。他继续解释说，这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因为丹佛市的警察没有把那些值得怀疑的报案列为假案。参照同样的研究，麦克唐纳（1973）认为，20%的强奸案的报案是可疑的。关于这一点，他并没有作详细的解释或提供资料来进一步说明情况。

麦克道尔（McDowell）

查尔斯·P. 麦克道尔（Charles P. McDowell），在美国空军特别督查机构工作的人员对假案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尽管他的研究没有公开，但事实上，麦克道尔调查了1218个最初被报告为强奸的案例。他发现460例的报案已被证实，212例报案则被否定，546例报案被搁置。全部案件的假案百分比是17.41%

^① 1999年，《纽约邮报》就如今已经令人不齿的奥利弗·朱维诺菲克（Oliver Jovanovic）谎报强奸案（Dunleavy, 1999）刊登了一篇社论，笔者采访了律师林达（Linda），在接受Penthouse杂志记者采访时她声称，在曼哈顿（Manhattan）每年报告有4000例强奸案，但是有一半其实并未发生过。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费城（Philadelphia）从1995年到1997年，有大约2000件未被调查的案例，调查人员确定有600件案例为假案，不能计算在犯罪数量之列（Inquirer Staff, 2000）。

^② 这种观点基于笔者和有关侦查人员的讨论，还基于一个事实，即有关此方面文章的作者都遭到来自专业团体的严厉批判。抨击他们的原因是，他们担心认定并起诉虚假强奸报案者将会使真正的被害人不敢再向执法机关报案。

(212/1218)，已决案件的假案百分比是 31.55% (212/672) (McDowell, 1985)。

凯尼恩 (Kanin)

在印第安纳州布鲁大学 (Purdue University in Indiana) 的尤金·凯尼恩 (Eugene Kanin) 教授是较少公开研究假案的专家之一。凯尼恩教授研究了发生在一个 7 万人口的不知名的中西部小镇上的、从 1978 年到 1987 年的所有 (109 例) 强奸案。他发现假案的报告率是 41% (Kanin, 1994)。值得注意的是，凯尼恩教授对假案的判定只是根据报案者本人的陈述判断。在同一篇论文中，教授也讨论了他 1988 年未公开的研究结论，这项研究包括 3 年期间在两个中西部大学校园里的所有暴力强奸案，假案的报告率是 50% (Kanin, 1994)。

迪耶滋和哈兹伍德 (Dietz and Hazelwood)

笔者发现了没有公开的一些作者关于虚假报案或假案陈述的研究。不管怎样，在特瓦娜·布罗利 (Tawana Brawley) 一案陪审团面前的证词中，帕克·艾利特·迪耶滋博士 (Dr. Park Elliot Dietz) ——一名法庭精神病医师建议有下列 20 个“红色标记”的案件有可能是假案，这是他和已退休的原联邦调查局 (FBI) 特别调查员罗伊·哈兹伍德 (Roy Hazelwood) 一起研究提出的 (Court TV, 1997)。在这份专家证言中，迪耶滋博士说，根据他的个人研究和与哈兹伍德的探讨，在假案中有如下 20 个特点^①：

1. 案件情节古怪而且夸张。
2. 她冒充受害而伤口属于自伤，有时会显得很严重，或者假装受伤以获得同情。
3. 她所陈述的那种被害方式令其他人觉得不可能是别人对她做的事情。
4. 冒充被害者往往不在事件发生之初立即向警察报案。
5. 声称袭击者是一个不认识的人。
6. 冒充被害者声称犯罪人使用了无法抵抗的暴力，自己进行了强烈的抵抗，或者是有多个犯罪人。

^① 这些红色标记的论述大多出自艾肯·伯吉斯和哈兹伍德 (Aiken, Burgess and Hazelwood, 1995) 的著作中，特别是报假案的红色标记的那一部分，即“虚假强奸案陈述的红色标记”是由麦克道尔 (McDowell) 和尼尔·S. 希勒 (Neil S. Hibler) 完成的 (Hibler and McDowell, 1995)。

7. 冒充被害者的叙述过于详细或是非常模糊。
8. 冒充被害者往往声称自己在受攻击时闭上了眼睛、失去知觉、昏迷、不记得发生了什么、被用了药，因此不能提供细节。
9. 冒充被害者对她自己的伤势漠不关心。
10. 实验检验没有出现所期望的发现。
11. 冒充被害者对被攻击的地点说不清楚，或者在现场没有证据证明其陈述。
12. 冒充被害者衣服上的损坏与她身体上的伤痕不一致。
13. 冒充被害者在其生活中有不断升级的个人问题。
14. 冒充被害者过去曾经耳闻过同样的事情。
15. 冒充被害者被害后的行为与她的陈述不一致。
16. 冒充被害者与警方的调查工作不合作。
17. 冒充被害者在与专家谈话时，她总是把谈话内容从具体引向不确定。
18. 冒充被害者具有身体上的迹象。
19. 有过其他的冒充被害报假案的历史。
20. 有过较大范围的医疗保健历史。

显然，以上的假案标志是有价值的。但是，其中有一些太模糊而必须通过解释后才能用在犯罪调查上。可再参考迪耶滋（Court TV，1997）对此类现象作出的进一步解释：

推迟报案：是什么导致了被害人推迟报案？是否说明被害人在拨打 911 报警电话之前先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或者被害人所说的犯罪发生在 3 个月以前？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标志，需要更多的解释和理由才可作为有用的指标。

被害后行为：被侵害后的行为需要详细解释。作者在此指的是被害人在不恰当的场合放声大笑、变得歇斯底里、哭泣或者是不哭泣吗？如果没有这些细节和解释，那么这一特点就很难在实际案件中得到应用。

指控陌生人：本书作者发现，很多报假案的人在她们的陈述中都会指定一个犯罪嫌疑人。这样的案例或许不是作者所调查的假案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案例是很多的，足以构成标记。无论如何，我们要对它进行很认真的研究之后才能推断出它的含义。

身体迹象：尽管身体迹象在特瓦娜·布罗利的案例中出现过，但在作者

的经验中却不多见。如果可以通过犯罪重现或是伤痕检验来确定被害人是否为自残致伤，那么这一行为就是有侦查价值的。如果不能，这一证据的存在便没有什么意义。对这种行为的发生我们同样要进行很认真的研究，然后才能由此推断出其含义。

希勒和麦克道尔（Hibler and McDowell）

希勒和麦克道尔（Hibler and McDowell, 1995）提出了一种询问策略，即在遇到疑似报假案的人时使用的策略。他们建议侦查人员请一个监督员或是一个同事作为“第二意见人”（second opinion）对被害人进行询问，让他们交谈，在他们对话之中或之后发现矛盾之处，而侦查人员只在一旁做记录：“如果直接由侦查人员以质疑的口气对疑似报假案者的陈述进行询问，那么可能会收到相反的效果。”他们指出：

主要的侦查人员对于自称被强奸的人来说应该是可信赖的，他们应该保持中立，支持并且同情被害人。对于那些无法自圆其说的自相矛盾、冲突、缺乏证明资料等情况都应该由一个调查监督员或是同事来提问。这样，投诉人和主要的侦查人员才可以保持较好的关系，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改善。

关于这一建议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如果对被害情节的真实性有怀疑的话，那么，最应该去调查这些可疑之处的人必须是对案件了解最多的人。这个人应该是主要侦查人员。其同事或者是调查监督员通常会缺乏对案件细节的了解。对于假案来讲，熟悉案件的细节是很重要的。

第二，如果有怀疑，而且这些疑点被事实证据所支持的话，侦查人员应该告诉被害人：他们知道她没有讲真话。这时就要靠询问技巧了。有很多方法让一个人明白：你知道她在撒谎。但这时你仍可表现出中立、支持和同情被害人。侦查人员不能不假思索地说出：“我知道你在撒谎！”他们可以用其他更婉转的策略。事实上，在讯问一个强奸案中的犯罪嫌疑人时，他们也用同样的策略。

第三，希勒和麦克道尔没有正确地阐述米兰达规则（Miranda warnings）。米兰达规则是当犯罪嫌疑人被监禁和讯问的时候，应该让他知晓他的权利。法庭已经从很多方面解释了监禁和讯问前的要求。在某些司法过程中，犯罪

嫌疑人在被警察讯问时可能不被告知米兰达规则，除非他们将被剥夺人身自由。其他多数时候，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都会告知这一规则，而不管犯罪嫌疑人是否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在询问时，侦查人员或许有证据来反驳被害人的谎言，这些证据或许很有力，以至侦查人员可以逮捕假冒的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其讯问过程中最好是让假冒的被害人（这时候她可能已经是犯罪调查中的犯罪嫌疑人了）知道米兰达规则。这一举动本身对报假案的人供认事实真相是很有效的。^①

第四，一位调查监督员可能缺乏正确的询（讯）问技巧。尽管并不总是如此，很多监督员，有做巡警出身的，还有的做其他与犯罪调查不相关的工作。一个人有较高的警衔或是有较长时间的工作经验并不代表他在犯罪调查和询（讯）问方面很有经验，也不代表他具备很多从事犯罪调查需要掌握的知识。^②

① 这是因为一旦被害人知道侦查人员知道她是在撒谎，情况就很不妙了，她们可能会意识到继续捏造事实的严重性。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告知被害人米兰达规则，然后自己离开审讯室，给她一个机会去思考自己目前状况的严重性。当侦查人员再进入询问房间的时候，或许会发现被害人急于承认事实了。在这一点上，被害人应当因为报假案而被起诉。

② 每一个国家的执法部门或是政府里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不同的工作和职责。在美国的执法部门中，职责是这样划分的：巡警管理交通以及对犯罪事件的第一反应，包括给予援助、接受市民投诉、保护犯罪现场、等待刑警到来。在一些部门，他们也承担一些侦探部负责的案件调查工作，如入室盗窃和家庭暴力（有一点鲜为人知的事实是，一些执法部门对于这种类型的案子并不是很积极，根据美国司法统计局的统计像入室盗窃和车辆盗窃这类案件的破案率几乎为零）。刑警负责犯罪调查，但在很多部门里，巡警仅仅经过考试而不经任何额外的、正规的有关犯罪侦查方面的培训就成为了刑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处理很多犯罪的大部门里，用来培训的预算却很少，这就导致了一个很有经验的侦查人员却几乎没有受过正规培训（这让我们对他们的经验质量也产生了怀疑）。与此相反，小一点的没有接很多案子的部门却有很多钱用来培训，结果导致这些侦查人员很少有机会去运用他们所学的知识（因此，当有大案子来的时候，他们没有经验去把事情做得很好）。由督察员负责监督出现场的刑警和巡逻警。这些监督员可能在工作成绩和知识方面还不及自己的下属，却获得了这个职位。这是由于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从来只是从事与案件无关的管理工作。

这就意味着，身在执法部门工作的人不一定是刑事侦查的权威。只有那些把学到的知识和工作经验正确结合起来的侦查人员才敢这样宣称。然而，实际上真正敢于说这种话的人往往更为谦虚谨慎，而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反而经常在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的电视台抛头露面。

第五，调查员和被害陈述人（现在已是报假案的犯罪人了）之间的关系常常在他们对质并在随后的坦白供认事实后得到改善。被害人或许会觉得放下了一个包袱，还会感谢侦查人员帮助他们度过了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候。这一幕通常发生在通过对报假案者进行一次谈话和故意提供一个承认的机会之后。简而言之，我们要相信与过去那种浪费时间和人力的调查方法相比较，用另一位侦查人员或是监督员来询问被害人将会是更成功的方式。只要主管的侦查员有过很好的培训并且得到主管部门的支持，他就完全有能力去应对这类案件并揭穿报假案人。

布朗、克鲁利、佩克和斯劳特（Brown, Crowley, Peck and Slaughter）

布朗、克鲁利、佩克和斯劳特（Brown, Crowley, Peck and Slaughter, 1997）进行的研究重点是被性骚扰的女性被害人中阴部受伤的问题。这项研究调查了1985年1月至1993年12月间加利福尼亚圣路易奥比斯普综合医院急诊室（San Louis Obispo General Hospital's emergency room in California）接受治疗的311位强奸案的被害人。这项研究也包括一组来自同一时间、地点的75位女性作为对照，她们都有过经双方同意的性交行为。在这75位女性中，48人最初被认为是强奸案的被害人，但是后来她们都承认，她们最初是经过双方同意的。尽管没有特别去研究虚报案件的问题，但是这项研究却最终揭示谎称被强奸的报案人占13.37%。须知，不管是被害人还是自称的被害人都走进了急诊室。这与到警署报案相比，确实是一个不同的例子。

侦查建议

以上提到的这些著作都论证了两件事情：第一，侦查人员和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在处理性犯罪的时候，都很有可能碰上报假案的情况。第二，由于有关资料十分缺乏，而且侦查经验也十分有限，侦查人员和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在遇到这样的案件时可能毫无准备。在关于这方面的更多研究被公布、情况好转之前，下面这部分内容试图给出一个通用的指导。

逐项分析

同自称被性侵害的报案人进行交谈和询问或许是性犯罪侦查员努力建立

事实真相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不幸的是，即便是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也经常在接受一个自称是性犯罪受害人的报案或听其情节陈述时没有任何的疑问或质疑。这或许因为担心对被害人的干扰，或许是受被害人的支持者或同事的左右，惟恐被他们视为立场有问题，或是缺乏对此类谎报案例的侦查知识。它也可能源于一个警察文化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缺乏调查的积极性。^①很多侦查员宁可花时间去搪塞报案人自称被害情节中存在的矛盾之处。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逃避对报案人所陈述的内容的逻辑和根本理由进行仔细的逐项检查。不管后果如何，对每一个自称被害人的陈述都要进行认真仔细的检查。如果在逻辑上有漏洞，那么就应该经过严密的调查来解释这一漏洞。正像格罗斯所说的（Gross, 1924, pp. 14 ~ 15）：

为了确切知道的对已发生的事情所持的态度是，所有的犯罪事实都应被考虑，而且从头到尾都要服从严格的逻辑检查。如果在某一时刻，有一些东西不能被解释的话，这个疑问必须要被证实，检查工作暂停，目的是要找出是否能对疑点作出合理的解释。如果能，那么其他的调查就很容易解决了。

逐项分析（frame - by - frame analysis）是一个很重要的询问概念，所有的性犯罪侦查员在询问被害人（或者是犯罪人）时都要考虑这一点。解释这一概念的最好方法是与电影相比较。如果我们实时地看一部电影，我们可能会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可能看不清楚细节，但是如果我们以慢动作重放电影时，就可以更好地辨认出每个动作细节。如果性犯罪侦查员要捕捉所有的犯罪细节，他们必须运用这个概念。精确的逐项分析是鉴定假案的必经之路。

询问假案的策略

报假案的人会像一个真正的被害人一样向警察提出报案。询问人将会像对待其他案子一样对待这个可能的假案，直到正式询问的第二部分逐格分析。

^①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其他因素使得侦查人员、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和研究人员远离有关假案的鉴别和研究。除了冷漠之外，由于大的政治环境抵制这样的鉴别和研究导致一种恐惧调查心理的蔓延。一旦对假案的鉴别失败，未能充分揭露假案，办案人则时刻担心会遭到政治上的报复。正如帕默和桑希尔（Palmer and Thornhill）讨论过的，对于那些女权主义者来说，认为强奸案可能有假这一观点自身就体现了对女性的歧视性骚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侦查人员和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害怕对假案的调查会使同事、上级、媒体、被害人的支持者及公众无情的嘲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时询问人应该向自称被害人出示他们的谈话和事实证据的矛盾。被害人陈述中的矛盾需要由她自己解释，而不是由询问人来解释。询问人永远不能因为被害人很不安或者被害人曾经受过精神创伤而接受她的陈述中自相矛盾的部分。这些矛盾都需要合理的解释。

如果在一个自称被害人的陈述中发现了矛盾，询问人可以这样说：

我已经调查性犯罪×年了，我曾经询问过很多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讲出事实的女孩子/小伙子。我知道你没有告诉我全部的事实，但是你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好人。我确信你肯定有极好的理由所以才不告诉我真相。可是我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我就没有办法帮你解决问题。我知道你有麻烦，否则你今天就不会在这儿。如果你不说出全部的事实，麻烦就会像从山坡上滚下的小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最终可以击毁你。让我们在它变大以前阻止它吧，因为现在它已经失去控制。

在这个时候，询问人让自称被害人知道他已经知道被害人没有说出全部的事实或许会有收获，你可离开几分钟，把被害人留在房间里呆一段时间，让他仔细考虑所发生的事情。当询问人再进去的时候，他会发现被害人正在哭泣，很快就会承认事实了。

如果被害人没有立刻承认，询问人应该锲而不舍，但不应该发脾气，发脾气只能使被害人加强自我防御。在整个询问过程中，询问人应该保持镇静和自信。要记住，在应对一个报假案的人时，最重要的是保持自信。如果询问人不自信，毫无疑问，报假案的人会看出这一点，反过来他们会更加确定相信真相不会被发现。

有些时候，询问人非常肯定报假案的人就是在撒谎。在这种情况下，建议侦查人员告诉询问人：他们是在对一个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调查，然后告知他们米兰达规则。

巴赞谎报假案特征指标 (THE BAFRI^①)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在假强奸报案这一领域进行的研究很少，而且我们

① 这是由巴赞·约翰 (John J. Baeze) 为犯罪侦查提出的报假案的特征标记的缩写，英文原文为 “The Baeze False Report Index”，简称 BAFRI。

也缺乏职业意识，不愿意去调查这样的案件。目前还没有用于评估可能的假案所需要的方法，甚至我们还没有去寻求这样的方法。本书作者用他们所受的教育、培训和经验列出了如下内容，希望对评估假案有所帮助：

巴赞（Baeza）谎报假案特征指标

下面所提供的是有关报假案的“红色标志”列表，即报假案特征指标（BAFRI）。每一个侦查人员、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律师在调查自称遭性犯罪攻击的案件时都应该知道这些特征指标。

列表中所描述的一个或更多的特点都是从作者所调查过的大多数案例中总结出来的^①：

1. 一个女性报案人只要求同一个女警官或是女侦查员谈话（这不包括那种曾因男警官或男侦查员对女被害人有过不正当行为的案件）。
2. 女报案人的丈夫、男友或是其他亲密朋友强迫她来报案，而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
3. 报案人的父母强迫他们来报案，而不是出自于本人的意愿。
4. 未到法定年龄（不满18岁），在宵禁之后才回家的报案人。
5. 报案人声称他们在一个很繁华的地方（或者是其他公共场所）被绑架，但却没有证人看见。
6. 报案人声称他们在白天一条繁华的街上被一个戴面具的犯罪人攻击（似是而非的犯罪行为）。
7. 报案人处在戒毒治疗阶段，宵禁过后未归。
8. 一个怀孕的妇女在父母或监护人的强迫下报案。
9. 报案人不能形容犯罪嫌疑人或不能提供犯罪细节。
10. 报案人曾经因为报假案而被起诉。
11. 报案人曾经向警察报告过一个相似的案例。
12. 报案人在调查期间搬了新家。
13. 报案人在调查期间开始提出诉讼并且想要得到一笔钱。

^① 这个列表显然只通过归纳而得出，但它对于侦查人员和犯罪心理画像专家都有巨大的价值。这个价值在于确认了需要进一步调查的范围。它们会存在于真实的案件中，但是当这些特点呈现出来的时候，需要重新审查和解释。准确、完整的调查是不可替代的。

14. 报案人在开始投诉时像电视或电影中千篇一律的被害人行为：歇斯底里、要求和女警官对话、紧张性精神分裂等。

15. 报案人在询问的关键时刻以哭泣来逃避回答重要问题。

16. 报案人有较长的精神病治疗史。

有一点必须清楚，作者只想使这个列表内容作为一个指导性的或是一个侦查辅助性的工具而已。这些指标不能 100% 地说明报案人是在报假案。对于职业侦查人员、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和法庭工作人员来说，这些特征仅仅说明被害人的报案有可能是假的。准确、完整的犯罪侦查和犯罪事实分析是不可替代的。

报假案的动机

以下提供了迫使被害人报假案的较为普遍的动机。正如在第 16 章中所讨论的“犯罪动机”，与人类行为的潜在动机相比，二者没有明显的界限。因此，一个报假案的人可能有多种动机。

报复

如果报案人对被告有仇恨，那么她有可能借报假案来发泄仇恨。典型的情况是，通常报案人和被告在以前有过关系。在关于儿童监护的案件中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如下所述）。

请思考下面的案例，发生在宾尼法尼亚的欧文布鲁克·彭森瓦娅（Overbrook, Pennsylvania），摘自雷彻（Racher, 2000）：

这是强奸案吗？还是像被告律师所说，只是一个 32 岁的妇女为复仇而做的假报案？

.....

宣布格林无罪只用了 22 分钟，提特斯·格林（Titus Green），37 岁，住在欧文布鲁克的福来德街（Flanders Street）。

律师说，格林为了他和原告这件公开的事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原告是来自西部费城的 3 个孩子的母亲。

他还说，这个女人之所以说格林强奸了她，是因为格林拒绝为她付电话费。

“这是一个报复行为。”亨利在审判过程中对民事诉讼法官加里·F. 迪维

托（Gary F. DiVito）说道。

亨利说事情发生在1999年9月1日，那个女人对格林拒绝为她付电话费非常愤怒，她报了案，并且编造了被强奸的故事。

这位妇女坚持说自己说的是真的。

她说，在她对格林提出断绝关系之后格林攻击了她。她还说，当格林见到她和另外一个男子见面时非常愤怒。

“她给出了3个不同的故事。”亨利说。格林说当他拒绝付钱、走出56号大街去上班时，那个女人警告他说：“我会让你好看的！”

“我想她确实给我好看了，因为她扰乱了我的整个家庭。”格林说。他是3个孩子的父亲。

如果被定罪的话，格林需要面对的是10年的牢狱之灾。

引人注意的需要

这一类型包括那些“为得到帮助而哭”的人，也包括有某种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或心理疾病（mental illness）的人，甚至还包括那些想从朋友、亲戚、配偶，甚至媒体获得关注的人。

请思考下面的案例，它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爱幕何斯特（Amherst, Massachusetts），摘自美联社的报道（Associated Press, 1999）：

管理人员说，当其他学生在附近集合起来抗议这类性攻击时，这名学生已经承认她捏造了在马萨诸塞大学停车场受攻击的事实。

星期三公开宣布的这个案子增加了学生对校园周边环境安全的疑虑。后来，学生会举行了一个象征性的不信任投票，认为学校的教务长应该被免职。

报假案的这名女子声称，她在11月16日被一男子裹挟并且用小刀划伤了脸颊。学生们的聚众抗议是由以前发生的3起事件引发的，其中包括两起强奸案。

学校发言人卡斯克兰（Kay Scanlan）说，周一她的律师给学校提供了一份带有这名女子签名的陈述词，称骚扰从未发生过，她脸部的伤是自己划破的。

校园警察的长官约翰拒绝透露这名女子的姓名，但是他说学校不准备要求立案。卡斯克兰形容这名女子是一个30来岁的学生，“非常悔恨”。

医学治疗

一个有传染性性病的人经常用这种方式来获得治疗的机会。当报案人患艾滋病或是怀孕时，也会有这种动机。

有利可图

这包括报案人为了更新、更换更好的房子提出诉讼。例如，被害人可以通过控告房产主（他们的保险公司）来获得巨额赔偿，称为“居住风险诉讼”。在这样一个诉讼中，被害人称房产主本应预料到对他们的攻击，并应予以防止。如果法律判定偏向被害人的话，房产主或房东就要为他们的行为作出经济赔偿。这种案件的赔偿金额可以高达数百万美元。这也是导致报假案的一个很有力的诱因。

嫖客没有给妓女付钱（“给贼的服务”）

在这样的案件中，妓女或男妓没能从嫖客或“相好”那里拿到钱，为了报复他们，就会声称她们被强奸了。

对怀孕及性病的解释

用被强奸来解释意外怀孕或性病，这在青少年中较为常见，但也可以作为成年人的动机。

托辞（宵禁后未归、不贞等）

不管是青少年或者是成人这都是一个很常见的借口。报案人很绝望地用这样一个借口来开脱她们的不恰当行为，这种情况多发生在群居的家庭或是治疗期间或处在假释期的人当中，对他们来说在宵禁之后未归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请思考下面的案例，该案发生在威斯康星州的柏林顿（Burlington, Wisconsin），摘录自克斯彻（Kertscher, 2001）：

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了发生在1993年柏林顿的一起强奸案。法律顾问说，这个男子的律师应该被允许去询问15岁的原告关于她以前所做的假报案的相关内容。

47岁的杰西·瑞得曼得（Jessie L. Redmond）曾被判处26年监禁，已经服刑8年了。周二，法庭称他必须在4个月内被释放，除非再对他提起公诉。

霍华德·艾森伯格（Howard Eisenberg）赢得了这个判决，他是马萨诸塞大学法学院（Marquette University Law School）的教务长，在瑞得曼得的原律师失去律师证以后，他接手了这个案子。那名律师通过假扮这个女孩子的律师，非法得到了她的青少年记录，从而知道这是起假强奸案。

.....

瑞得曼得在1992年12月被指控强奸幼女之前是一个柏林顿私立团体之家的法律顾问，为青少年滥用酒精和毒品问题提供法律咨询。在此两个月以前，一个控告人声称，他给一个15岁的女孩提供海洛因作为性交换。

在拉辛县巡回法院审判之前，瑞得曼得的律师迈克·桑迪（Mike Sandy）假扮做女孩的律师在未被允许的情况下获得了她的青少年记录。他发现了在对瑞得曼得提出报案的11个月以前，记录中就已经有一起假强奸报案。

.....

在对瑞得曼得的审判中，桑迪想询问女孩关于11个月以前她控诉被一个陌生人强奸的有关问题。警察确定这起案件不是真实的，区律师也起诉她蔑视法庭。但是审判法官丹尼斯驳回了这个要求，他说这样做违反了威斯康星州关于强奸案的被害人保护法，其中规定，对于性骚扰的被害人，不能询问她的性历史。

瑞得曼得说他确实没有与这个女孩发生性关系。但是在1993年4月，陪审团不知道应该对这个女孩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瑞得曼得有两次性骚扰，还有一次提供海洛因给未成年人。法官最终判处瑞得曼得26年的监禁。

2月14日，在7轮的辩护中，认定了威斯康星州关于强奸案的法律在保护性骚扰的被害人这一点上所说的：“不可询问他们的性行为，但是假强奸报案不属于性行为。”

新房子的诱惑（尤其在繁华的大都市里）

对新房子的渴望经常会成为假强奸控诉的动机，尤其在政府提供出租房屋的地区尤其普遍。有很多人都在排队等待搬进新房的机会。一些人声称她们在目前居住的公寓内遭到过强奸或是其他的攻击，可以以此来提高自己排队的名次。

儿童监护权

孩子的父母双方有时会控告对方强奸或是性虐待孩子，以此来夺回孩子的监护权。

请思考下面的案例，该案发生在佛罗里达的雷克兰得（Lakeland, Florida），节选自钱伯利斯（Chambliss, 2000）：

县治安官员说，32岁的丹尼·鲍得丁（Denley Bodkin），对她的前夫，女儿的父亲提出了假的儿童性虐待起诉。治安调查员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他并没有虐待孩子，鲍得丁报的是假案，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

谎报虐待的控诉以前是轻罪，但是1998年州立法者认为这样的人应被处以重罪。因为报假案的情况时有发生，经常针对的是争夺儿童监护权的案例。

“自从这一行为在1998年被决定列为重罪开始，这是第一例起诉（Polk）。”奇帕·瑟伯里（Chip Thullbery）说，他是州律师杰瑞·黑尔（Jerry Hill）的检察官。

瑟伯里说在这种犯罪被施以重刑之前，他不记得有人因此被起诉。

县治安官员盖瑞·海斯特（Gary Hester）说鲍得丁是第一个被起诉的人。

他说：“希望起诉可以减少假案的发生。”

治安官员马丁（Martin）说，从1月份开始，波尔克的侦查人员已经证实了97例儿童虐待的案件不属实而且报案人也已经承认他们报了假案。

县治安官员们拿了这些案件中的16例到州律师办公室去复查，可能的话就开始起诉，接着，治安调查员开始调查另外35例案件。

海斯特说，侦查人员对每一例控告都要进行调查，如果控告是假的，那么他们就浪费了很多时间和资源。

他说：“我们本应用这些资源来调查真正的案件，但假案却束缚了我们的资源，这些假案通常是来自一个前配偶，后来反目为仇，别有用心加害对方。”

14区的儿童家庭部的发言人布兰得·霍尼卡（Brenda Hornickle）说，很多时间都是浪费在调查那些最后证实是假案的案件上了。

霍尼卡说，很多时候，人们选择控告孩子被虐待来向再婚的配偶报复。

她说在波尔克镇有 50% 的儿童虐待案是假案，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假案都是恶意的。

霍尼卡说，有时候，小孩子只是哭了，但是就会有人报案说是虐待儿童。

鲍得丁说，儿童保护机构的调查员报告说从 1999 年 6 月至 10 月，州虐待登记处接到了 18 个电话，都是关于那个女孩的。

那个两岁的女孩在雷克兰得地区医疗中心（Lakeland Regional Medical Center）被 3 个医生检查后证实，她没有受虐待的迹象。

“在这些性虐待的报案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事实。”治安发言人斯特林·爱维（Sterling Ivey）说，“我们什么都没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佛罗里达的波尔克镇，近 50% 的儿童虐待报案是不真实的。

尽力掩盖再次酗酒和吸毒

这种类型包括一些戒酒、戒毒有一段时间而再一次重蹈覆辙的人，她们需要找一个借口。通常她们会说自己被陌生人强奸了，被迫喝酒或吸毒。

同意发生性关系后反悔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青少年中，其中一方事后觉得愧疚、愤怒或者为难了。为了向自己和别人揭露和解释，他们谎称自己被强奸了。

请思考下面的案例，该案发生在纽约西点军校（West Point, New York），摘录自西点女校校刊（Female West Point Cadet, 1997）：

经过了 5 天的调查询问，一名调查官员昨天建议，一名 19 岁的西点军校学员因诬告另一学员强奸而应被军校开除。

调查官员发现 19 岁的苏·金·科利尔（Su Jin Collier）违反学校规定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而后，她又一次违反了学校规定，撒谎并否认了事实。

这是调查人员在经过行政听证会后指控科利尔诬告他人后宣布的。他还建议学校应该留校察看那个男学员，因为他在校园内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而违反了校规。行政调查官建议此案如何处理有待军校校长裁定。

.....

“尽管这里有一系列告状的渠道，但均属行不通的军中言行不一的作风。”比尔曼说，“学员苏·金·科利尔在 1996 年 11 月 13 日被强奸，今天，她再

次被这种制度强奸”。

他说，卡勒来自得克萨斯州爱泊山（El Paso, Texas），二年级学员，她计划对自己被一个军中败类强奸和骚扰提起刑事诉讼。

西点军校发言人约翰·卡里罗（John Cornelio）说，很多事实导致了调查官员作出建议学校开除学员的决定。他还说，诚实这个问题对科利尔很重要。

.....

科利尔说她和那个男学员曾经有过很友好的关系，一开始非常浪漫但是与性无关。她说在5月份关系结束的时候，他开始跟踪她，接着骗她去了他的营房强奸了她。

这不是卡勒的第一次强奸控诉。

在1995年，她还是个新生的时候，卡勒说她被一个二年级的学员强奸了，尽管她承认他们以前经双方同意发生过性关系。调查发现，强奸事实不成立。

结论

假案是所有的专业部门都会遇到的，它剥夺了真正的被害人应该享有的法律资源。这种案件的控告对象可能是无辜的市民。侦查任务过重可能会导致正当的被害人案件得不到充分、准确的调查。物业开发商或是保险公司也面临着赔付巨额保险金的危险。正如格罗斯所说的（Gross, 1924, p.14）^①：

不仅报假案的被害人要曝光，被怀疑的无辜的人们也必须受到保护。

此外，关于性犯罪的相关研究常常涉及财产分配的根据和法庭专家鉴定的依据，尤其当案件事实不能被证明的时候，就必然导致偏差或折中裁定。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那些住房保险赔偿的案件中，对这种假案的涉及更少。因此，应当充分强调对这方面的更多、更好的研究。这项研究可能会为此类案件的评估创造更合适的方法，并且，其研究还会涉及对这些方法有效性的研究，如巴赞谎报假案特征指标和希勒与麦克

^① 曼哈顿的性犯罪检察官琳达·菲尔斯丁（Linda Fairstein）也同意这一观点。琳达说，假强奸案的报案时有发生，这就对正当的被害人调查十分困难，对所有的检察官来说，必须认识到谎报强奸案的现象确实存在。

道尔的研究（1995）。

参考文献

1. Aiken, M. , Burgess, A. , and Hazelwood, R (1995) "False Rape Allegations", in Burgess, A. and Hazelwood, R. (Eds.), Practical Aspects of Rape Investiga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CRC Press: New York.
2. Brown, C. , Crowley, S. , Peck, R. , and Slaughter, L. (1997) "Patterns of Genital Injury in Female Sexual Assault Victims",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March), 609 ~ 616.
3. Chambliss, J. (2000) "Authorities: Woman Filed False Reports", The Lakeland Ledger (Florida), August 10.
4. Court TV (1997) Court TV Online – Legal Documents. "Report of the Grand Jury Concerning the Tawana Brawley Investigation",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CourtTV.com/legaldocs/newsmakers/tawana/part3.html#sexual>
5. Ounleavy, S. (1999) "Cybersex Victim's Kin: She's a Liar", New York Post, July 26.
6. Fairstein, L. (1993) Sexual Violenc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
7. The Seattle Times (1997) "Female West Point Cadet Faces Expulsion Over False Rape Claim", April 30, 1997.
8. Gross, H. (192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London: Sweet and Maxwell.
9. Hibler, N. and McDowell, C. (1995) "Red Flags of False Rape Allegations", from Aiken, M. , Burgess, A. and Hazelwood, R. "False Rape Allegations", in Burgess, A. and Hazelwood, R. (Eds.), Practical Aspects of Rape Investiga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CRC Press: New York.
10. Inquirer Staff (2000) "Timony Commends Rape – Squad Reforms", Philadelphia Inquirer, December 13.
11. Kanin, E. "False Rape Allegation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23 (1), 81 ~ 92.
12. Kertscher, T. (2001) "Court Reverses Rape Case Conviction", Milwaukee Journal – Sentinel, February 20.
13. MacDonald, J. (1973) "False Accusations of Rape", Medical Aspects of Human Sexuality, (May), 170 ~ 194.

14. McDowell, C. (1985) Chicago Lawyer, June; cited online at:
<http://www.coeffic.demon.co.uk/discrim.htm>
15. Palmer, C. and Thornhill, R. (2000) A History of Rape, Cambridge: MIT Press.
16. People of the Phillippines v. Rodrigo Loteyro Aguinaldo (1999) GR No. 130784, Oct. 13, 1999.
17. Racher, D. (2000) "Cleared of Raping Mom of 3", Philadelphia Daily News, December 26.
18. Associated Press (1999) "Woman Admits Faking Attack Reported During Anti - violence Rally at Umass", December 9.

第11章 犯罪现场特征

Brent E. Turvey, M. S.

……解决那个困惑着我的问题：如果我听到的事情以及对它们的理解是正确的话，你似乎总能预知未来；但是你似乎缺乏现时的所有知识……

但丁（Dante）：《异教徒》（第五篇第6回）

只有知道了什么是过度，你才能知道什么是足够的。

布莱克·威廉（William Blake）：《天堂与地狱联姻》

在经过合格的物证分析和现场再现以及被害人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之后，犯罪心理画像者就可以专注于分析犯罪现场的特征。

犯罪现场的特征是指犯罪现场作为证据的整体和其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是由犯罪人的行为决定的被害过程、犯罪地点以及随后发生的对犯罪人有意义的一切事情表现出来的。

这是事实，特定的犯罪现场特征和被害人研究能够反映出犯罪人的个性倾向。然而，我们还是要告诫读者，不要把对某起特定的犯罪或对系列犯罪的勘查过程与对行为证据的解释混为一谈，后者被视为犯罪心理画像中的犯罪分析（crime analysis）。犯罪心理画像要形成一个报告，在透彻的犯罪分析的基础上，专门描述与侦查活动有关的或对某一犯罪事实具有责任的犯罪嫌疑人的认定特征。同样，犯罪现场特征也是一种语言，是用来表达和解释作案人与被害人的行为，并通过现场证据、被害人和证人的证言所确定。犯罪现场特征也是犯罪再现的产物之一。

犯罪心理画像者就算有其他人的帮助也不一定能够准确、肯定地确定这些特征。如果现场上找不到包含一些信息的物证，如果现场上没有行为的证据，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在我们的勘查和分析中将其虚构出来。这听起来非

常简单，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人们在获取侦查结论的狂热情绪影响下常常会忽视这一点。假设、推测、判断都不是客观事实的真相。

犯罪心理画像者不能将以下讨论的特征一成不变地、刻板地运用于犯罪心理画像中。每一起案件的勘查都是不同的。由于环境的影响、被害人与作案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现场遗留物证情况的不同，每个犯罪人留下的犯罪现场都是独一无二的。

地点类型

地点类型（location type）是指犯罪现场所处的环境类型。常见的地点类型有四种（它们常常会相互交叉），在每一种类型的地点上，我们收集到的证据其性质和范围也都不同。

在李昌钰博士 1994 年发表的著作、第 6 章“寻找物证”中^①很好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1. 室内的犯罪现场（indoor crime scene）。室内的犯罪现场是指那些处于某种与自然环境相隔绝的建筑物结构之内的现场，如房间、公寓、楼房、棚子、车库、仓库、帐篷、洞穴等。

2. 交通工具上的犯罪现场（vehicle crime scenes）。交通工具上的犯罪现场是指那些处于移动物体上的现场，如轿车、卡车、小船、船舶、火车、飞机、摩托车、飞艇等。

3. 室外的犯罪现场（outdoor crime scenes）。室外的犯罪现场是指那些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的现场，如田野、森林、峡谷、山沟、壕沟、路边、沙漠等。

4. 水下的犯罪现场（underwater crime scene）。水下的犯罪现场是指那些处于任何水面之下的现场，如湖、池塘、小溪、河流以及海洋等。

犯罪现场类型

在确定一起特定案件的犯罪现场种类时，我们不能以自己的直觉和经验为指导来进行。我们应当以现场的物证为指导，从物证中得出一个正确的现场再现结论，而不是从具有偏见的理论出发而走向死角。

^① Lee, 1994, Chapter 6, “Searching for Physical Evidence”.

在犯罪现场勘查、犯罪再现，以及犯罪心理画像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要确定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现场究竟是什么类型的现场。我们需要通过分析犯罪过程中犯罪现场与犯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犯罪现场的类型。

犯罪现场（crime scene）的定义是犯罪行为发生的地方（Lee, 1994, p.1）。但是，一起刑事犯罪能够在不止一处地点发生，这就使得一起犯罪可能会有很多的现场，这些现场在整个犯罪中分别起到不同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将要介绍的犯罪现场的种类，这些犯罪现场的种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有可能交叉。

接触地点

接触地点（point of contact）是指犯罪人最初接触或猎取被害人的确切位置。这个词是个不确定的词，因为它包括了犯罪人故意设计的遇见被害人的地点，以及犯罪人对被害人发动攻击的地点，还有犯罪人会将被害人拖至预先选好的主要现场或次要现场。

主要现场

主要现场（primary scene）是指犯罪人对被害人施加主要攻击的地点。整个犯罪的大多数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并且犯罪中的大多数物证都遗留在这里。在一起案件中，如果多个被害人分别是在不同的地点受到攻击，那么很可能对于每一个被害人都有一个主要现场。另外，主要现场也可能就是抛尸地点。

次要现场

次要现场（secondary scene）是指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地点，但是，这些相互作用并不是整个犯罪中的主要部分。如果在次要现场上发现了被害人的尸体，那么，次要现场同时也是抛尸地点。一起案件可能会有多个次要现场。从本质上来说，次要现场包括任何遗留有犯罪行为形成的证据的除主要现场之外的地点。

所有的犯罪现场都能够被描述成主要现场或次要现场。

中间现场

中间现场（intermediate scene）是指主要现场和抛尸地点之间的任何现

场，在这些现场上可能会遗留有证据。中间现场包括杀死被害人后用于将尸体运送到抛尸地点的交通工具，以及尸体被最后抛弃之前临时储存尸体的地方。中间现场是次要现场的一种类型。

抛尸地点

抛尸地点是找到尸体的现场。在一般情况下，使用这个词就暗示着被害人是在另外的地点被攻击，并在死亡前或死亡后被运送到这个地点。但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假设。一个抛尸地点可能也是主要现场，不能因为一个侦查人员的主观经验而排除这种可能性。

笔者遇到的许多犯罪心理画像者和侦查人员似乎对室外现场和在此发现的被害人尸体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感兴趣。^①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仅仅把室外现场看做是抛尸地点，但实际上这里可能同时还是主要现场。或者人们把一个室外现场推断为主要现场和抛尸地点，却忽视了附近其他的水下、室内或交通工具上的现场。对于犯罪心理画像者来说，出现这种错误可能是由于以下三种原因：

1. 该犯罪心理画像者没有亲自到过犯罪现场，这就使得他不知道现场和有关区域之间的空间关系。
2. 犯罪心理画像者没有怀疑过执法部门的推断，盲目地相信了他们关于犯罪现场和犯罪之间关系的推断。
3. 该犯罪心理画像者缺乏或者根本没有犯罪现场侦查和法庭科学方面的知识、训练和经验。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要避免事先猜测。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没有物证

^① 分析犯罪现场上发生过什么的工作为犯罪再现（crime reconstruction）。只有具备足够的训练、教育、经验的法庭科学家才有资格进行犯罪再现。那些不具备这些资格的人对犯罪现场上发生过的事情的分析就超出了他们的专业范围。这包括一些部门的执法官员。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参见第10章，“虚假报案”，第5个注脚）：一些大部门要处理非常多的案件从而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进行培训，导致了侦查人员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但缺乏正规的培训（这往往使人们怀疑那些所谓的实践经验）。相反地，较小的部门处理的案件较少，却有足够的经费来进行培训，这往往导致那些接受过较好培训的侦查人员很少或没有将他们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因此，当发生重大案件的时候，他们往往缺乏实践经验而无法应对）。真正重要的是那些人员的自身条件，而不是他们的头衔或工作单位。

的话就不要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想法，要敢于怀疑所有的侦查中的推断而不论别人是多么地相信它，还要获得足够的关于法庭科学的教育和训练。

现场的位置

我们要确定每一个犯罪现场的位置，以及它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室内和郊外的地点，我们必须确定它们的准确地址以及附近的交叉路口。对于乡下、室外或水下的现场，我们可以使用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GPS）来确定它们的经纬度。对于犯罪心理画像者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 谁经常出现在现场以及周围的区域中？
2. 他是如何到达现场所在的地区（使用车辆、飞机还是步行等）？
3. 现场上有什么东西？
4. 正常情况下现场上发生过什么活动？
5. 在现场附近的区域发生过什么犯罪行为？
6. 该现场与其他犯罪现场的相对位置如何？
7. 犯罪人是如何进入现场的（交通工具、出入口等）？
8. 犯罪人为什么选择那个现场（故意的、偶然的、为了方便等）？

9. 犯罪人必须对该地区达到怎样的熟悉程度才能够找到该犯罪现场？该现场是一个随便路过的陌生人都能够发现的吗？或者到达该现场需要对该地区有一定程度的熟悉吗？

接近方法

接近方法（method of approach）是指犯罪人接近被害人的策略方法。它常常被描述成袭击（blitz）、伏击（surprise）或者是欺骗（Coe）（Burgess and Hazelwood, 1995, pp.142 ~ 143）。这些接近方法相互间区分并不严格。

伏击

这种接近方法即伏击（surprise）的特征是指犯罪人等候一段时间来发动攻击。这有可能是犯罪人根据他们预先选定的被害人的时间规律而在一个特定的地点等候被害人（Burgess and Hazelwood, 1995, p. 143），也可能是寻找

到一个被害人之后等到其精神不集中、全神贯注于其他的事或者是睡着的时候再接近她。

这个术语只是用来描述接近的方法，而不包括攻击的方法。

这种特征的存在对于刑事案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潜伏作案”（lying in wait）是一个从重情节。所谓从重情节，是指能使谋杀案成为一级谋杀。在有些州就意味着要判死刑。^①

欺骗

这种接近方法即欺骗（con）的特征是犯罪人通过欺骗或诡计的方法来接近被害人（Burgess and Hazelwood, 1995, p.142）。这种方法可能表现为通过一个简单的计策来迅速地转移被害人的注意力，或者也可以通过一个复杂的计谋来获得被害人暂时的或长时间的信任。这个词只是用来描述接近的方法，而不包括攻击的方法。

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起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河畔市（Riverside, California）的作案人冒充警察强迫一名妓女对其进行口交的案件（California v. Hesslink, 1985）：

被害人是一名妓女，1982年11月30日上午11时左右她正在栗园路（Chestnut）和第七大街附近活动。在上午12时到下午1时之间的某一时刻，被告人驾驶着一辆蓝色的雪佛莱轿车停在了第七大街。被害人走到被告人的车前并与其攀谈，因为她认为被告人可能是她的顾客。被告人告诉被害人他正在寻找能够提供口交的妓女。被害人同意了他的要求并进了他的轿车。双方谈好的价钱是20美元。两人经过了5分钟左右的车程到达了河畔市费尔蒙特（Fairmont）公园附近高速公路下面的一条隐蔽的小路上。停车后，两人开始了交谈，在谈话过程中被害人告诉被告人她有一个6岁的女孩，并且与丈夫离了婚。

^① 例如，根据加利福尼亚刑法典第159条（California Penal Code 159）：“当利用破坏装置或爆炸手段来进行谋杀时，知道使用火器来穿透金属或障碍物、投毒、等候作案、折磨或者使用其他故意的、预先设计的方法来实现；或者是在进行或试图进行爆炸、强奸、抢劫、盗窃、故意伤害、绑架、颠覆列车以及其他在第286、288、288a或289条规定的罪行的时候发生的谋杀；或者是在行驶中的车辆上向外面的人开枪，企图杀死某人，上述这些行为都是一级谋杀。”

被告人拿出了警徽和手铐并告诉被害人他是一名警察，而且可能要逮捕她。然后，被告人将被害人上下搜身并问她是否曾经被逮捕过，她回答说没有。被害人当时很害怕被送进监狱。由于被害人一旦被送进监狱将无人照顾她的孩子，被告人开始与被害人谈判来达成一项交易。她以为被告在暗示孩子可能会从她身边被带走，被害人明白他的意思，即她的孩子可能会被送到抚养孤儿的家庭。

被告人问被害人是否能拿出 2500 美元来支付保证金，被害人回答说没有，这时被告人就说他可以降低保证金的数额。当时被害人认为被告人是想要钱，如果给他一些钱的话他就不会把她送进监狱。她从身后的口袋中掏出 50 美元递给被告人。被告人收下了这些钱。

在这之后被告人拉开了他裤子的拉链，将他的身体暴露给被害人并问她是否能再答应他的一个要求。被告人把手放在被害人的头上，将她的脸按向自己的阴茎。然后被害人对被告人进行了口交。她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被送进监狱。

在被害人对其进行口交之后，被告人和她谈论了一下治理卖淫活动的官员。他暗示还有很多其他的治理卖淫活动的官员会有兴趣和她达成交易，但是又警告她有一些官员可能会因为她拉客的行为而逮捕她。然后被告人把车开回到栗园路和大学附近。在那里被害人下了车，下车之前，被告人说他的名字叫里克·托马斯（Rick Thomas），并给了她一张能找到他的电话号码。他还对被害人说她可能会在附近看到他，如果在他路过的时候被害人正好有空的话，她还可以坐他的车一起出去转转。被告人驾车离开的时候，被害人记下了他的车牌号，并马上把它写了下来，但有一位数字没记住。

在当天的早些时候被害人报了警，但是她由于害怕自己惹上麻烦而没有把全部的事情告诉警方。后来被害人才把全部的事情经过告诉了肯·福斯警官（Ken Fouse）。她向福斯描述了被告人的外形，包括被告人的左下腹有一个深色的疤痕，以及被告人车子的特征和车牌号码。以这些信息为基础，1982 年 12 月 6 日被告人的车子被发现了。被告人被逮捕了，并和他的车子一起被送到了河畔市。福斯警官在河畔市警察局后面的停车场对被告人的车子进行了搜查，他在驾驶员的坐位底下找到了一个警徽以及一副手铐。在手铐上还有“CWH”的缩写标记。

突然袭击

根据伯吉斯和哈兹伍德的观点（1995，pp. 142 ~ 143），突然袭击的方法（blitz approach）其特征是犯罪人接近被害人时以强力制伏被害人（换言之即攻击）。犯罪人的意图是不给被害人以任何反应时间，使得他能够立即控制住局面。根据伯吉斯和哈兹伍德的观点（1995，p. 142），这种定义只是强调了其攻击的伤害性，并没有强调攻击开始的突然性。

笔者认为，突然袭击这种方法的概念必须包括攻击开始的突然性。笔者还认为，“突然袭击”这个词只是描述了一个攻击行为，并没有包括犯罪人接近被害人的方法。在闪电般的突然袭击（blitz attacks）中，犯罪人也常常会等候被害人（以出其不意的方法），特别是在那些按照某种一般或特殊的类型预先选定被害人的案件中。我们鼓励读者们对这个词的用法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必须始终按照一种理解来使用它。笔者推荐的这个词的用法是对一种袭击的描述，它主要指犯罪人迅速、残忍地对被害人实行控制、实行性攻击行为、实行惩罚，或者为了杀死被害人或使其丧失抵抗能力而迅速、残忍地对其发动致命的暴力攻击。

攻击方法

攻击方法（method of attack）是指犯罪人接近被害人之后制伏被害人的方法。它常常被描述成袭击、伏击或者是欺骗。“袭击”这个词在这里很有用，而“伏击”和“欺骗”用在这里就不适当了。后面这两个词是用来描述接近方法的，与随后发生的攻击性质和程度没有关系。

根据使用的凶器和使用的暴力性质来描述攻击方法更为合适，如下列几种：

1. 口头的杀人威胁，“按我说的做，否则我杀了你”。
2. 手持枪支，口头对其进行命令和杀人威胁，“按我说的做，否则我开枪了”。
3. 从背后发起突然袭击，用绳索勒住被害人的颈部。
4. 手持刀具，口头对其进行命令，“我的刀子已经抵住了你的肋骨，按我说的做”。

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犯罪人的接近方法可能包含了攻击方法，但是，如果它没有包含攻击，那就仅仅是个接近方法。攻击方法可能是完全独立的，应该把它当做一个独立的问题来研究。

例如，在一次潜伏的攻击中，犯罪人可能会等候几个小时，然后从公园的树丛中跳出来从后面用刀具和言语威胁控制被害人。如果犯罪人并没有马上用刀具伤害被害人，或者他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伤害被害人，这整个事件就可以被称为一次潜伏接近。如果他马上就用刀具割伤被害人，这整个事件就可以被看做是一次伏击并用刀具进行的袭击。

在另一案例中，一个犯罪人在同一个公园里利用诡计接近一名被害人。在犯罪人决定实施犯罪之前他们一起度过了几分钟的时间。诡计本身并不是攻击，它只是接近的方法。在犯罪人开始强迫被害人实施违背其意志的行为的时候，攻击就开始了。这时，犯罪人可能会使用命令、威胁、拳头或者刀具来实施强迫、控制或致命的暴力。

因此，攻击方法并不一定与最初的接近方法相一致。这一点是理解犯罪人在特定环境中对特定的被害人能够做些什么以及他喜欢做些什么等问题的关键。

使用暴力

犯罪人在整个犯罪的过程中所希望使用暴力的程度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他们潜在的需要和动机方面的信息。关于伤害的动机起源（以及产生这种暴力动机的起源），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第7章“分析伤害形态”的内容。

我们不仅要评估犯罪人在攻击方法（method of attack）中所使用的暴力，还要判断它是如何同其他的犯罪行为联系起来的，是什么时候使用的暴力，以及使用暴力的目的是什么。另外，我们还要分析犯罪人没有使用哪些暴力（如果被害人已经死亡，我们就无法向其询问有关的行为，这就无法完成这项工作。或者如果我们得不到犯罪人对事件进行的记录，例如，录音带和录像带等，我们也无法完成这项工作）。

有关使用暴力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被害人的身上可能看不见伤痕。我们必须把这一情况记录下来，并把它当做使用暴力与否问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牢记一点，被害人身上没有伤痕并不代表

犯罪人没有使用暴力手段。另外，这也不代表被害人没有实施抵抗。

控制方法

犯罪人的控制方法（method of control）是指他们在犯罪过程中用来操纵、控制、约束以及制伏被害人行为的方法，包括使用下列类型的暴力手段：

以控制为目的的暴力

1. 殴打不顺从的被害人。
2. 窒息好斗的被害人。
3. 咬好斗的被害人。
4. 用绳子将被害人的身体绑住。
5. 使用手铐。
6. 将被害人的嘴堵上来抑制口头反抗。

口头威胁进行控制、惩罚、性侵犯或致命暴力

1. “不要乱动，要不然我把你的手绑到你后面。”
2. “再那样做的话我就杀了你。”
3. “照我说的做，要不然我就把这东西塞进你的屁股。”
4. “一直走，要不然我就好好教训你。”

无声地使用物件威胁进行控制、惩罚、性侵犯或致命暴力

1. 亮出了枪支。
2. 亮出了刀具。
3. 亮出了棍棒（或其他用做暴力凶器的钝器）。
4. 已经举起来了的握紧拳头。
5. 由于其身材强壮而产生的胁迫。
6. 亮出了手铐（或者其他明显的约束）。

在描述犯罪人的控制方法时，犯罪心理画像者常被告诫要详细了解控制的具体办法，以及这些方法是怎样操作、控制、约束以及征服被害人的行为。

凶器

所谓凶器（weapon），是指取自犯罪现场的（能够利用的物体）或者是被犯罪人或被害人带到现场、用来实施暴力的物体。

并不是所有的犯罪人在犯罪中都使用凶器：有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带凶器；有的是因为他们没办法弄到凶器；有的则是他们觉得不需要使用凶器；还有的则是因为他们的感觉告诉他们自己不应该使用凶器（如犯罪人想像着他的攻击行为会得到被害人的同意，因此，这算不上犯罪行为）。

对于犯罪心理画像者来说，有关凶器的关键问题包括以下内容：

1. 凶器的特征是什么（如刀具、枪支、绳索、石头、铁铲等）？
2. 凶器的主人是谁（如被害人、犯罪人、第三方等）？
3. 凶器是怎么弄到犯罪现场的？
4. 凶器是在哪里被找到的（如在被害人身上，或在她附近，或被丢弃在现场附近，在本案的其他关联现场，没有找到，等等）？
5. 犯罪人在犯罪中的什么时候使用了凶器（如在犯罪人接近的过程中、在暴力攻击的过程中、在性攻击的过程中等）？
6. 凶器是如何被使用的（如自卫、警告、实验、强迫、控制、惩罚、性行为或致命的暴力攻击等）？

被害人的反抗

伯吉斯和哈兹伍德（1995，p. 143）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被害人反抗的三种类型，并告诫说不能只把反抗看做身体上、口头上的行为，它还应包括一些消极的反抗行为。但是，在给“被害人的反抗”下定义的时候，伯吉斯和哈兹伍德并没有列出“被害人顺从”这样一种反抗行为的极端表现。他们也没有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这些分类常常会相互交叉，以及每一种反抗方式都有可能出现在同一起犯罪中。

笔者要提醒大家一下，下面将要论述的与被害人的过错和责任无关。被害人对犯罪人的反应主要是根据她们的生活经历、经验，以及她们对外界的理解而作出的，这些可以表现出她们的个性。一个被害人的极端行为对于另一个被害人来说可能就不是极端行为。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被害人的反抗之前要好好研究一下被害人。首先应弄清他们是怎样的人，这可以使我们深入研究她们为什么会那样反抗。

被害人顺从

被害人顺从（Victim Compliance）是指被害人迅速地、毫不犹豫地服从犯

罪人命令的那种情况。这些被害人可能事先会想自己能做些什么来讨好犯罪人，然后犯罪人就会放她们走。这并不意味着整件事是双方自愿的，或者说没有犯罪行为发生。这可能是由于害怕受到伤害，或者是对即将发生的可怕事件的屈服。所以，顺从有可能是避免更大伤害的一种方法。

消极反抗

消极反抗（Passive Resistance）是指被害人以一些平静的方法来反抗犯罪人，例如，拒绝服从犯罪人的命令或者在被长期拘禁的时候拒绝吃饭、喝水。伯吉斯和哈兹伍德在《强奸案的侦查实践》（Practical Aspects of Rape investigation, 1995）中告诫我们，一定要记住，被害人的不顺从就是反抗的一种形式，并且这是被害人惟一可能采取的一种反抗形式（身体上或心理上）。

口头反抗

口头反抗（Verbal Resistance）是指被害人用言语来反抗犯罪人。它包括被害人呼叫求助、在受攻击的时候喊叫、恳求饶恕、口头表示拒绝服从命令，或与犯罪人谈判、商量，等等。例如：

1. “不要碰我。”
2. “我不会跟你走的。”
3. “你要强奸我，就先杀了我。”
4. “我不想死。”
5. “求求你，请不要伤害我。”
6. “放我走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身体反抗

身体反抗（Physical Resistance）是指被害人用身体暴力来反抗犯罪人，包括拳打、拍击、用手指抓、咬、挣扎、踢以及逃跑。

如果被害人声称进行了身体上的暴力反抗，我们应该检查一下她们的身体，以及犯罪人身上可能受伤的部位来验证。如果犯罪人身上没有伤痕并不一定意味着被害人没有进行身体暴力的反抗，也不能由此认为被害人在说谎。

案例

一名被害人在她居住的公寓楼的电梯里遭到了犯罪人的攻击。她声称用刀子刺穿了犯罪人的皮夹克，刺中了他的肋部，然后她就逃出电梯跑到了安全的地方并报了警。她非常有把握地辨认出了犯罪人，但是那个人却没有被逮捕，原因是他的腹部没有伤痕。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受伤，而且他的衣服上也没有血迹。后来，由于警方的强烈主张，他们获得了搜查令并从该人的家中找到了一件皮夹克。这件皮夹克就在被害人所说的地方的确有一处被刺破的痕迹。

性行为的特征和顺序

性行为（sexual act）是犯罪人关于性器官、性对象的所有行为。确定犯罪中性行为的特征和顺序可以使我们了解犯罪人的惯技和他们的标志性行为。我们根据物证只能部分完成这一工作（只能确定特征，往往不能确定它们的准确顺序），这项工作主要是依赖于证人和被害人的证言。

性行为是犯罪人施暴的一种扩展，性行为可以出于防御、警告、实验、强迫、控制、惩罚、性与幻想，或致人于死地的目的而实施。它包括（不仅仅局限于这些例子）如下的这些行为（读者们可以试着找出更多的这些行为与人类性行为和性迷信之间的联系）：

1. 肛交。
2. 肛门舌交。
3. 人兽性交。
4. 舔女性外阴。
5. 口交。
6. 恋物癖。
7. 鞭打。
8. 摩擦别人的身体来获得快感。
9. 封锁阴部。
10. 吻身体的任何一部分。
11. 舔身体的任何一部分。

12. 性虐待癖。
13. 手淫。
14. 恋尸癖。
15. 虐待狂。
16. 嗜粪癖。
17. 性束缚。
18. 性祭祀。
19. 吮吸身体的任何一部分。
20. 嗜尿癖。
21. 阴道性行为。
22. 窥阴癖。

预谋或准备

犯罪人的预谋程度可以通过分析他们是否准备了实施犯罪的工具来确定。

我们要问以下几个问题：

1. 犯罪人带来了什么？
2. 犯罪人使用了现场上的什么物品？
3. 犯罪人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什么？
4. 犯罪人是如何带走那些物品的？

正如上面问题所问的，查明犯罪人的准备程度还要分析其逃避侦查的防御行为（precautionary acts）以及机会性的因素（opportunistic elements）。

逃避侦查的防御行为

逃避侦查的防御行为是犯罪人在犯罪前、犯罪过程中或犯罪后进行的用来迷惑、妨碍、阻止侦查或司法工作的行为，其目的是隐藏他们的身份、他们与案件的联系或者是隐藏罪行本身不被别人发现。

下面是一些例子，当然它并不局限于这些内容：

衣服/伪装

犯罪人可能会通过乔装改扮、戴面具或穿大号的衣服来改变他们的外表。

这就隐藏了他们的身体特征，使得证人或幸存的被害人在后来的辨认中难以将其识别出来。

改变声音

犯罪人可能会使他们的声音变得低沉，提高嗓门，或伪装使用某种方言。

蒙上眼睛

这种方法能使被害人看不见犯罪人的外表特征。

选择一天中的特定时间

犯罪人可能会挑选一天中的特定时间，即犯罪现场非常黑暗的时候，使得他的外表特征不容易被看清，并且他的攻击也更容易成功。



图为一名女性被害人的残缺不全的尸体躯干。被害人裸露的身体在关节处被锋利的工具肢解，然后被放在塑料袋子里装入几个露营包中，这些包被丢弃到附近的河里相隔不远。肢解尸体的行为可能是一种逃避侦查的行为，但是它最大的可能性还是为了便于运输。脱去死者的衣服并把尸体丢在水中（次要现场）能够将死者身上沾附的与犯罪人和第一现场有关的证据洗刷掉，使我们难以判断死因

图 11 - 1

地点的选择

强奸犯罪人选择的作案地点大多是那些隐蔽的、很少有人来的并且是当地居民一般看不见的地方，这样他们就更有可能是作案成功。

选择被害人

犯罪人可能会选择陌生人作为被害人，从而降低日后被怀疑与此案有关的可能性。

戴手套作案

这可以避免在作案过程中留下指纹。

使用避孕套

这可以避免在被害人身上或现场上留下精液（由此可形成 DNA 证据）。犯罪人把避孕套带走，然后扔到其他地方。

放火

犯罪人通过放火来破坏被害人尸体、犯罪现场以及犯罪证据。这也可能是一种愤怒情绪的表达。

处理被害人的衣物

犯罪人可能将被害人的部分衣物（如衬衣、鞋子和袜子等）或者是全部衣物扔掉。这一方面能使被害人感到更加的羞辱，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没有鞋穿就拖延了她得到帮助和报警的时间。另外，这还可以起到减少物证的作用。

观察或收集被害人的身份证

犯罪人可能会检查、记录或拿走被害人的个人身份证从而了解被害人的姓名和住址。这使得犯罪人有可能在将来对被害人实施暴力，从而胁迫被害人不敢去报案，或者至少能延缓报案。

带走的物品

这是指原本是犯罪现场上的东西，当犯罪人离开现场时将其带走的物品。这可以通过对现场的认真勘查来查明。如果可能的话，要把犯罪后的现场和犯罪前的现场进行比较。寻找下列物品：

1. 新物品。
2. 丢失的物品。
3. 没有变化的物品。

做完这些工作后，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些物品是新的、丢失的、没有变化的。

为了进行这种比较，犯罪心理画像者和司法人员必须要得到犯罪发生前现场情况的记录。我们可以利用最近拍摄的有关该地点的照片、ATM自动取款机上的摄像头所拍摄的画面、监控摄像机上所拍摄的画面等，列出一份可能成为证人的名单（主要是那些熟悉现场环境的人），并对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询问。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必须机智且彻底。

伯吉斯和哈兹伍德（1995，p. 153）将被带走的物品分为三类：

证据性物品

这主要是那些犯罪人认为可能会把他与被害人或案件联系起来的物品。下面是一些不完全归纳的例子：

1. 沾附有血迹、纤维或精液的被害人的衣服。
2. 犯罪人送给被害人的礼物、贵重物品或珠宝。
3. 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合影。
4. 犯罪人写给被害人的信件。

从现场上带走这些物品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逃避侦查的防御行为。

贵重物品

主要是那些犯罪人认为非常值钱的一些物品。犯罪人从现场上带走的物品的类型不仅表明了犯罪人的技能水平和运输能力，还表明了犯罪人贫穷的程度。

下面是一些不完全的例子：

1. 信用卡。
2. 珠宝。
3. 现金。
4. 支票本。
5. 电视机。

6. 电脑设备。
7. 音响。
8. 录像机。
9. 手机。
10. 传呼机。
11. 毒品。

从现场上带走这些物品是一种以钱财为动机的行为，这说明犯罪人可能还参与过其他类型的以钱财为动机的犯罪。

有特殊意义的物品

主要指被害人的或现场上的那些对犯罪人来说有感情价值的物品。这种物品常常并不值钱，就算它很值钱，犯罪人看中的也不是这一点。这类物品被分为两类目的。要想知道这些物品的确切的值，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分析，了解犯罪人是如何得到的这些物品（背景信息），以及它与犯罪人或被害人的行为之间的联系。我们会发现这两种类型中的一些例子归为哪种类型都可以，也就是说，这两种分类会相互交叉。

战利品

这是胜利、成功和征服的象征。它与暴力、被害人的反抗、被害人被征服以及羞辱联系在一起：

1. 一件被害人被撕破的外衣。
2. 一缕被害人的头发。
3. 被害人的身份证。
4. 在犯罪过程中拍摄的被害人的照片。
5. 从现场上带走的用于伤害被害人的凶器。
6. 被害人身体的一部分。

纪念品

这是指带有一种提示或象征意义的纪念品，它代表着一次愉快的经历。它常常与某种确认的需要（reassurance-oriented needs）联系在一起，但这可能也不一定。下面是一些例子：

1. 从衣柜中拿走的被害人的内衣。

2. 被害人的学生证。
 3. 从被害人家中墙上拿走的照片，或者是从被害人个人相册中拿走的照片。
 4. 被害人佩戴的戒指、项链或者是其他一些不值钱的珠宝。
 5. 犯罪人在犯罪前选择被害人时拍摄的被害人照片。
- 从现场上带走这些物品是一种标志性的行为，它能够表明犯罪人的动机。

偶然性的因素

偶然性的因素是指犯罪中出现的犯罪人预先没计划到只是临场实现的一些因素。它可以是一个偶然性的被害人、一次偶然性的犯罪、一个偶然性的凶器或者是一个偶然性的地点，即所有没有预先计划到的并在犯罪中被利用的事物。犯罪中的偶然性因素或行为的证据并非意味着犯罪没有计划或没有事先策划。

在判断一个行为或因素（如被害人、地点等）是否是偶然性因素的时候，我们要尽力去寻找那些表明有无预先计划的行为或因素。下面是一些不完全的归纳：

1. 监视被害人的证据。
2. 为实施犯罪而事先准备好并带至现场的作案工具（如用于强奸的全套工具、撬锁工具、伪装衣物、凶器等）。
3. 被害人在受攻击前接到的一些陌生电话。
4. 深谙被害人的住址和时间规律等隐私信息。

当被害人看起来像是一个偶然性因素的时候，侦查人员常常会错误地认为这个犯罪人平常都是偶然性的犯罪（这是在对被害人的情况了解不够的时候常犯的一个错误）。他们会因此认为犯罪人不是特别危险，或者将来不太可能再犯罪。这就会产生侦查中的错误推断，从而导致侦查人员不能识别犯罪人预先计划性的行为或者是系列案件的犯罪人。下面是偶然性犯罪特征的不完全归纳：

1. 在进行另一起犯罪中发生的犯罪。
2. 犯罪发生在犯罪人非犯罪的活动中。
3. 犯罪持续的时间非常短。

4. 犯罪的过程非常匆忙，现场上散落了大量的证据。

5. 犯罪人找了一些附近的物品制伏被害人的反抗。

尸体

在所有的案件中，不论被害人是死是活，其躯体都是犯罪现场的延伸。关于这一主题最好参考迪梅奥夫妇的研究（DiMaio，1993）。

对犯罪心理画像者来说，从事有关被害人尸体研究的关键性问题有：

1. 在犯罪的哪一个过程中，尸体被置于现场现在的位置？
2. 被害人或尸体是如何进入犯罪现场的？
3. 被害人或尸体如何到达犯罪现场的最终位置？
4. 为什么尸体被遗留在那个特定现场？
5. 尸体的状况如何？
6. 对尸体的布置与现场的既成事实相符吗？
7. 有证据能够表明犯罪人是把尸体放在当前这一特殊位置上的吗？
8. 如果尸体被放在了特殊位置上，这样布置的意义是什么？
9. 这样布置对谁来说是有意义的（如犯罪人、发现尸体的任何人、被害人等）？

格洛里亚被绞死案

让我们看一下加利福尼亚奥克斯纳德 18 岁的格洛里亚·迪·拉·克鲁兹（Gloria De La Cruz）的案例。她的新任男朋友科里·鲁宾逊（Corey Robinson）被指控并认定为一级谋杀，其强奸及暴力强奸罪名成立。^① 格洛里亚和她母亲住在一起，在当地的一家乐队里唱歌。她妈妈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 1996 年 4 月 22 日晚上大概 10 时 30 分上床睡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她就失踪了。格洛里亚的家人从 4 月 24 日开始寻找她，并向警方作了通报。4 月 29 日，她母亲填写了失踪人员报告，见加利福尼亚州诉鲁宾逊案记载（California v. Robinson，2000）。

^① 认定科里·鲁宾逊犯有一级谋杀罪的证据包括：从被害人阴道内提取精液的 DNA 证据；他携带的黄色绳子与捆绑被害人尸体的黄色绳子一致；有关如果他杀了格洛里亚的话将会如何处理尸体的自我陈述，以及当发怒时曾经试图掐死格洛里亚和其他亲属的历史。

格洛里亚的母亲直到1996年5月10日才从官方那里得知女儿死亡的消息。

她冰冷的尸体是在1996年4月23日被发现的，也是在同一天她母亲报告了失踪的情况。尸体是在洛杉矶市皮克大道（Pico Boulevard）和奥尔科特大街（Alcott Street）之间的一条巷道的垃圾箱里被发现的。4月23日早上5时左右，一位住在巷子旁边的女子听见有辆汽车“相当快地”开进了巷道。她听到轮胎刹车发出的“尖叫声”，车门打开了，接着是碎石路上的脚步声。然后就听见垃圾箱的铁盖被打开的声音，紧接着又“砰”地关上，车子又很快开出了巷道。

警方到达并封锁了现场，直至负责杀人案的警探到达。洛杉矶警察局负责杀人案件的警探保罗·库特（Paul Coulter）是先期到达的警探之一。他观察了格洛里亚的尸体，像婴儿般的向右侧身躺在垃圾箱里，身上穿着女衬衣和家常裤，没穿鞋。他闻到了从垃圾箱里散发出的汽油味，而且注意到垃圾箱里曾经点过火，也找到了用来点火的火柴空盒和烧焦的纸片。

斯蒂芬妮·温特·塞梅诺（Stephanie Winter - Sermeno），是洛杉矶国立验尸中心法庭科学实验室的一名犯罪学家，大约上午10时到达犯罪现场。她也觉察到了垃圾箱附近的汽油味并注意到了几个烧焦的物品。她指挥人移动格洛里亚的尸体，然后搬到验尸室进行检查。她确定尸体是用黄色绳子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绑起来的，有一种绳子的特征。整根绳子在脖子上绕了一圈，在下巴处打了个结，然后延伸到右手腕绕了两圈打了个结，接着是把两个膝盖缠了两圈，左膝又缠了一圈，最后捆住了双腿。除掉绳子后，她又从尸体上提取了性侵犯的证据，目睹着助手从格洛里亚手指甲下面刮掉碎屑并收存好，她发现内裤裆部以及右阴唇外部有像血迹似的东西。她还注意到尸体和衣物的一些区域好像是要烧糊的样子，衬衣由于火的热气已经开始熔化，头发和手指甲也被标记出来而且已经烧焦了。

1996年4月24日，在洛杉矶国立验尸中心验尸员尤金·卡彭特博士（Dr. Eugene Carpenter）的监督下，对格洛里亚的尸体进行了解剖。他亲自目睹尸体表面和内部的每一处损伤。在他的观点看来，格洛里亚死于由于他人外力绞扼颈部血管而造成的窒息或是缺氧，血糖不能供及大脑。由他人之手进行的人工绞扼的证据包括：颈部右侧指甲痕造成的摩擦伤、咽喉右部的深度

淤伤和左部的轻微淤伤，以及脸部和眼部充血造成的眼睛轻微出血。绞扼是由人单手或双手造成的，而非黄色绳索或其他的什么绳子。

卡彭特博士还观察到死者头部右前方严重的钝器伤，就在眼睛上方，尽管伤口与“能将人击倒”并引起意识不清的外力相一致，但是没有造成骨折或者脑损伤，也不是死者的死亡原因。脑伤可能是在“死亡当天”出现的，伤情模式与“惯用左手的人用左手绞扼、用右手打击头部”的模式相符。

卡彭特博士也观测到双侧小腿前部的新近淤伤、躯干部的摩擦伤和外阴受损的痕迹，但是这些都不足以造成死亡。小腿处共有 24 处淤伤，靠近外阴顶端有 3 处。腿部的淤伤与被害人举起双腿试图避免性侵犯的结果相符。小腿处淤伤的性质和模式表明是“防御伤”，双腿抬起并拢在一起是为了保护阴部免受伤害。按照卡彭特博士的意见，腿部和外阴的淤伤是性侵犯的重要标记。外阴部的淤伤与强暴的伤势相一致，都位于骨头上就是娇嫩皮肤的同一部位，当男性耻骨撞击女性耻骨时可以形成。所有的伤害都是新近造成的，而且以卡彭特博士的观点，所有的损伤都是在一次攻击中形成的，紧随其后就是造成死亡的绞扼。

卡彭特博士还观察到 15 处到 20 处由于烧伤而引起的皮肤损伤，这与尸体经受过焚烧相一致。烧伤并不是死亡的一个原因，他观察到的烧伤也没有一处能够促成死亡。

在这一案件中，有证据表明科里·鲁宾逊使用了以控制为目的的暴力手段（control-oriented force）（剧烈击打头部的同时伴有手工勒扼），使被害人屈从和易于强奸（阴道和耻骨的损伤，阴道里的精液经鉴定与鲁宾逊的相符）。有进一步的证据显示，被害人在身体上是有反抗痕迹的（被害人腿部经过鉴定的防御性淤伤）。还有证据表明，为了掩饰罪行，鲁宾逊至少进行了以下防御行为：把被害人的尸体抛弃到第二现场；试图通过焚烧尸体来掩盖被害人的身份；试图通过焚烧尸体来毁灭身体上的转移证据；为了让证人闭嘴而杀掉被害人。绳索在这起案子中似乎是有作用的，担当着捆绑尸体以便于转移的事后工具的作用；没有什么证据能够显示绳子担当了谋杀的一个角色或是促进了性攻击。同时，也没有表明鲁宾逊使用了什么接近的手段（method of approach），他们之间的风流关系表明，他也不需要要手段来接近被害人。

言语行为/口头命令

口头命令（scripting）是指犯罪人在作案过程中使用的一种言语，同时，也是他们时常命令被害人所说的话。犯罪人的口头命令还经常用于要求被害人嘴上说些什么或行动上做些什么。这些要求涉及犯罪人经常幻想的东西——如果发生什么事，他将说些什么，被害人将回答什么（无论什么事情，在任何程度上）。因此，犯罪人的言语就是其心理需要和暴力手段的一个扩展（或者说是其心理/情绪需要的缺乏和力量不足的扩展）。

按照伯吉斯和霍姆斯特罗姆的观点（Burgess and Holmstrom, 1979），犯罪人的言语行为主要有11个主题，不仅要评价它们的内容，还要注意在整个攻击过程的口音、态度、频率等。因为这11个主题只覆盖了特定几种强奸犯的动机而忽略其他的，因此作者用黑体字增加了一些主题。以上的主题包括：

1. 作为作案手法的命令，如“不准看我的脸”。
2. 作为标记的要求或命令，如“给我扭你的屁股，我想看它动起来”。
3. 威胁，如“不准看我的脸，否则我杀了你”。
4. 表示自信的台词，如“我让你看看真正的男人是什么感觉”。
5. 对被害人私人问题的询问，如“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6. 对被害人性高潮的询问，如“这感觉好吗”？
7. 犯罪人的自我提示，如“我喜欢这感觉”。
8. 猥亵的称呼或种族歧视的外号，如“婊子”、“黑鬼”。
9. 软话，如“我不会伤害你的”。
10. 性侮辱，如“你都不配被强奸”。
11. 征服，如“我占有了你”。
12. 夺他人心爱之物的满足，如“你认为自己不会被别人占有”？
13. 有意的欺骗，如“我叫保罗，住得很近，当我离开的时候不要看我”。
14. 为了让人放心而说的真话，如“我叫保罗，我不会伤害你的”。
15. 道歉的话，如“对不起，不是我的错”。
16. 讨价还价，如“你要是这样做的话，我就让你走”。
17. 对个人的恭维，如“你看起来真可爱”。
18. 对性的恭维，如“你的乳头可真敏感”。

19. 自我贬低，如“我是个粗人”。

20. 合理化的借口，如“这不是我的错，我没打算强奸你，我不会那么做的”。

要注意，犯罪人的言语行为可能包括要求被害人重复特定短语或词语的命令语，或者是要表演特定行为的命令语，这些行为对犯罪人来说有特殊的含义。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超出用于获得顺从之外的命令性言语行为，都是标记行为。

案例

犯罪人的口头命令表明其多重标记与动机。

有个犯罪人从被害人出故障的车子那里绑走了她。他在停放于几个街区之外的一个有篷的货车里用工具折磨她，对她吼叫，让她尖叫给自己听。在该名被害人同一地点长达数小时的攻击时间里，他一边做着抚弄的动作，一边不停的道歉。最后帮她穿上了衣服，放她走了。折磨的证据表明了他有虐待狂的标记特征，而抚弄、道歉则表明为了让人放心所做的标记特征。

被害人回忆了贯穿于整个暴行的过程中犯罪人以如下顺序所说的短语：

“比尔在哪儿？”

“比尔在哪儿？”

“啊！”

“脱下你的裤子！”

“不许穿裤子！”

“我才不管哩！”

“闭嘴！你给我闭嘴！”

“闭嘴！一直走，闭嘴，要不我杀了你！”

“别胡闹！”

“进去，进去！”

“把你那该死的衣服脱掉！”

“脱掉，脱掉，马上脱掉！”

“把裤子脱掉！”

“你不喜欢光着身子吗？”

“把你那该死的靴子脱掉!”

“脱掉,脱掉!”

“让我看看。”

“你想干吗?”

“喜欢这样吗?”

“别骗我!”

“我想看看它到底有多深!”

“你喜欢光着身子吗?”

“你想我也光着吗?”

“你笑什么?”

“别撒谎了!”

“我要你把精液吃下去!”

“不要再撒谎了,我知道你在骗我!我知道你没吃下去!”

“什么?”

“好吧。”

“把手举到前面,让我能看到!”

“举高点!”

“我说高点!”

“你在干什么?想看我?”

“我想让你再深点,再深点,你的命全靠它了!”

“张开嘴!”

“我说张开嘴!”

“你撒谎!”

“小娼妇!”

“你知道该怎么做!”

“你多大了?”

“噢,那你够岁数了。”

“我要你再做一遍,你的命全靠它了!”

“你撒谎,你上次吸得非常好!”

“你想我射在你嘴里吗？”

“我要射精了！”

“咽下去！”

“闭嘴，什么也别问！”

“你身上有什么证件吗？”

“在哪儿？在车里？”

“你叫什么？”

“姓什么？”

“我要出去拿你的钱包，如果名字不一样，我就杀了你！你叫什么？”

“好了宝贝。”

“你想看我？”

“闭嘴！”

“我喜欢舔你！”

“我要你这么说，我要你说你想我弄你的屁眼儿。”

“说慢点。”

“我要你反反复复说，像你很想要的那样！”

“说！”

“说！”

“你以为这是什么？把腿抬高！再高！我让你把腿抬高！”

“你刚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你看我了！”

“别撒谎了！大家都这么说！”

“大家都是说出来后就不喜欢结果了。”

“跪下，把手放在头后面，来回晃你的乳房。”

“你的胸真好看，很适合你。”

“你想拿回内衣吗？如果你给我的话，我就收下了。”

“没关系，你要它干什么？”

“我手里有刀，我要你呆着别动，我给你割掉手上的胶带吧。”

“你想让我替你缝一下吗？如果想的话，我就缝了。”

“靴子是拉链的还是系鞋带的？”

“不，我可不想让你不穿鞋就出去。”

“给你项链，我给你戴上吧。我想再让你漂漂亮亮的。”

“现在我带你去我的房子那里吧，有问题吗？”

“我现在让你走，因为你对我太好了，而且我让你做的事你都做了。”

“全是一堆废话！”

“从这离开后你要干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这附近很差劲吗？你不属于这。”

“我要你转过去，不想让你看见脸。我会在街角把你放下，然后开车离开。我按喇叭你就开始走，拿掉头上的胶带，但如果在按喇叭之前你转过身的话，我就回来再把你装上车。”

动机

实施犯罪的目的也可以定义为一般性动机，这种动机由收集的证据予以证明。对其动机的判断包括对犯罪人犯罪时的特定目标或意图的考虑（当已查明犯罪人时）。根据奥·康内尔和索德曼（O'Connell and Soderman, 1936, p.257）的观点，犯罪有一些基本的动机类型，这也是笔者赞同的，大体如下：^①

1. 报复（愤怒）。
2. 纠纷（愤怒）。
3. 嫉妒（愤怒）。
4. 暴躁（权力武断）。
5. 获利（图财）。
6. 获民事赔偿（图财）。
7. 虐待狂。
8. 不同于虐待狂的性动机（性满足）。
9. 道德低下行为。
10. 精神病患者。
11. 正当防卫。

^① 笔者不同意道德低下（道德堕落）或心理疾病是动机类型。这些只是环境因素，并不是驱使犯罪人犯罪的原因。

更多的细节，参见第16章“犯罪动机”。

延森·旺达被强奸焚烧一案

让我们看看下面的加利福尼亚州棕榈谷延森·旺达（Wanda Jensen）的案子，她和5岁的女儿住在一起。1986年4月22日大约凌晨两点，斯科特·詹姆斯（James Scott）闯进了她的公寓，殴打、强暴了她，掐她的脖子使她失去知觉，然后放火烧房间以掩盖罪行。她在遭攻击时活了下来，但随后死于烧伤。斯科特受到了审判并被认定犯有一级谋杀。尽管被害人在被攻击时生还下来，但还是认定斯科特的一级谋杀罪名成立，这是由他的行动所决定的，就像上面描述的那样，他的意图是要致被害人死亡（California v. Scott, 1997）：

被告手上戴着袜子进入了延森的公寓，把一个螺丝刀顶在她一侧，说他想性交，如果拒绝的话就对她女儿下手。他用棒球棒打被害人，在卧室里强奸她，然后在床上打她、掐她的脖子直到失去了知觉。他把床点着后离开了。延森的女儿在隔壁的卧室睡觉，当烟雾警报响起时，她被惊醒。她来到妈妈的房间，看见起火了，就用力拉妈妈。延森已经被烧的很严重了，她抱起女儿跑到附近公寓的朋友那里，朋友叫人来帮忙。

延森的身体被烧伤了35%。一名洛杉矶治安官员这样描述了她在医院的情况：“她被严重烧伤。看起来她的睡衣从身体的右边开始着火，火势从右侧燃起非常厉害，把她的整个正面都烧着了，左边的情况要稍微好一些。她的头发被烧焦了，眉毛也被烧没了，乳房被烧起了泡。当她把手臂抬起来的时候，她的皮肤就像破布一样垂下。”尽管她当时非常痛苦，但是延森还是告诉了侦查人员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描述了攻击她的那个人情况。她告诉她的朋友，攻击者自称是“雷鲁恩（Rerun）的哥哥托尼（Tony）”。延森的阴道内还残留有精液。

被告人在放弃了他的权利之后，在两次讯问中都承认了这起案件。他供述的案件发生经过与延森所说的非常一致。他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火柴点燃了被子。当第一名侦查人员问他放火是否是为了“除掉那个女孩和毁灭证据”，被告人低下了头说“是的”。这时，被告人突然盯着侦查人员说：“他现在是托尼，是托尼控制着的詹姆斯的躯壳，他说他必须毁灭掉那个女孩，因为她是一个炸弹……”在被告人进行第二次供述之前，他在放弃权利

的卡片上签下了“托尼·艾德曼”(Tony Adman)的名字。当被问及为什么这样签名的时候,他又把它改成了他的真名。他两次都对侦查人员说他是“托尼”,而“詹姆斯只是一个傀儡”。

格伦·约翰逊(Glenn Johnson)就是那个所谓的“雷鲁恩”,他在作证的时候说就在案发前不久,被告人去过他的家。他给了被告人一些袜子,并且两人一起“吸食了一些可卡因”。被告人当时吸“高”了。约翰逊在法庭审判前曾经说过被告人向他索要过螺丝刀和手套,他给了被告人一把螺丝刀但没有给他手套,但是在法庭上他否认了这些事情。被告人告诉警方,他在犯罪前购买了一些可卡因并吸食了一些。

延森于1987年2月25日死于“脑部缺氧引起的肺炎,这都是烧伤的结果”。医学者在作证的时候指出,她的死亡是由烧伤引起的。

在这起案件中,有证据证明斯科特·詹姆斯使用了凶器(一把螺丝刀)、口头暴力(威胁要杀死她女儿),以及以控制为目的的暴力(将螺丝刀顶在她颈部;用她的棒球棍猛击她的头部;用手掐她),使被害人顺从并顺利实施强奸(阴道内精液的类型经检验与斯科特的相符)。这些证据显示斯科特的动机包括满足性欲(没有过度的杀伤或狂怒;没有性幻想的成分;作案时间很短;没有钱财的动机)。还有证据显示,斯科特事先策划了犯罪,因为他带来了凶器(螺丝刀),并试图弄到手套,他把袜子带去并套在手上,并选择了一个他知道有一个女儿的被害人家,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在犯罪过程中能控制住被害人。另外还有证据显示,斯科特为了掩饰犯罪和毁灭证据至少进行了下列反侦查措施:他点燃了被害人的房间(第一现场);烧坏了被害人的身体,销毁沾附在她身体上的物证,企图杀死被害人以灭口。但是,与他的反侦查措施相反,斯科特告诉了被害人他的一个朋友的名字(格伦·约翰逊,又名雷鲁恩)。^①

^① 笔者用“矛盾行为”(contradictory act)一词来形容犯罪人的那些可能引起警方注意以及可能在犯罪中或犯罪后被发现的行为。矛盾行为与反侦查行为正好相反,它可能显示了犯罪人智商较低、犯罪经验不足,或者是像这起案件中那样滥骂行为。里克(Reik, 1945, pp. 71~72)认为,这是“犯罪人目光短浅的行为”,他写道:“格罗斯(Gross)与沃尔芬(Wulffen)都认为犯罪侦查人员常常会忽视这些线索,因为他们往往认为犯罪人不可能傻到这种地步,但是,许多案件都证明了犯罪人确实可能这样傻。格罗斯还说道‘我也常常问自己,犯罪人在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思维是否笨到无法避免铸成大错的程度’。”

选择被害人

选择被害人（victim selection）这个术语是指犯罪人故意挑选被害人或把某人当做犯罪目标的过程。每个犯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标准，这一标准可以满足他们某种特定的需要。需要一个被害人可以是实现犯罪目的（犯罪人的动机）的第一步，也可能是其犯罪附属的一部分。在另一种情况下，一个特定的被害人可能是其犯罪的全部原因。而在另一个选择标准下她可能只是一个目标，犯罪人为了自己幻想中的对话和行为“剧本”（behavioral scripting）而挑选她们。

能够影响这一决定过程的主要因素包括如下（但其间并不相互排斥）：

可及性

这主要是指犯罪人能够接近被害人的程度。这与犯罪人的风险概念有关。

地点

这主要是指被害人相对于犯罪人的特定位置。常常与犯罪人及被害人的活动和时间规律有关，地点也与犯罪人的风险概念相关。

薄弱性

这主要是指犯罪人对使用何种方法去接近或攻击一个特定被害人的危险程度的认知。它也与犯罪人的风险概念有关。

关系

这主要是指犯罪人利用被害人与自己的关系来选择犯罪目标（如配偶、父母、家庭成员、同事、朋友、室友、医生、老师等）。

象征性标准

这主要是指被害人由于与犯罪人有某种关系而具有相同性而被选中（如配偶、父母、家庭成员、同事、朋友、室友、医生、老师等）。

幻想的标准

这主要是指被害人由于具有犯罪人认为能够满足他特定幻想的特征而被选中。这些特定的特征能够在被害人研究和犯罪人的标记行为中发现。

我们要牢记上述每一条都有可能影响犯罪人选择被害人的决定，但是也

不一定每一条都必然会产生影响。犯罪心理画像者必须确定犯罪人是根据什么标准选择被害人，而且这些标准能被行为证据所反映出来。这是把对被害人的研究和犯罪人的动机（根据犯罪人在现场对被害人施暴时的幻想，来确定被害人究竟象征着谁）进行深入比较之后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Baeza, J. , Chisum, W. J. , Chamberlin, T. M. , McGrath, M. , and Turvey, B. (2000) " Academy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Criminal Profiling Guidelines", Journal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January), 1(1).
2. Burgess, A. and Hazelwood, R. (Eds.) (1995) Practical Aspects of Rape Investiga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2nd ed. , New York: CRC Press.
3. Burgess, A. and Holmstrom, L. (1979) "Rapist's Talk: Linguistic Strategies to Control the Victim", Deviant Behavior, Vol. 1, Washington DC: Hemisphere.
4. California v. Hesslink (1985) Crim. No. 16226, May 1, 1985 (213 Cal. Rptr. 465).
5. California v. Robinson (2000) No. B 130050, Dec. 11, 2000 (102 Cal. Rptr. 2d 179).
6. California v. Scott (1997) No. S010334, July 14, 1997 (65 Cal. Rptr. 2d 240).
7. DiMaio, D. and DiMaio V. (1993) Forensic Pathology, New York: CRC Press.
8. Lee, H. (Ed.) (1994)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Taoyuan, Taiwan: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9. O'Connell, J. and Soderman, H. (1936) Moder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0. Reik, T. (1945) The Unknown Murderer, New York: Prentice – Hall.

第 12 章 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 ——错误的二分法

Brent E. Turvey, M. S.

自称发现绝对真理的人，恰好是个绝对的傻瓜。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论敌友》

我们必须强调一点，犯罪现场不可能完全是有组织力的或是无组织力的。它们很可能是介于极其整洁、有序的现场和混乱、溅污的现场这两种极端中间的某一种情形。

伯吉斯等人（Burgess et al.）（1997，p. 9）

“二分法”（Dichotomy）这个词通常是指把事物分为两种极端或相互矛盾的两个部分或观点。有组织力（organized）和无组织力（disorganized）的犯罪现场分类理论就代表了这样一种概念上的分类。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行为科学部（Behavioral Science Unit，简称BSU）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这种分类方法，并试图通过它来更加有效地进行交流和作为讲授犯罪心理画像的方法。也是对执法部门关于辅助侦查、洞察犯罪心理和进行犯罪心理画像等强烈要求所作出的反应。行为科学部的工作人员（Burgess et al.，1988，p. 121）通过多年的经验而取得的这种二分法，目的在于使那些没有受过有素训练的执法人员能够更加简洁地描述犯罪现场。同时，它也成为联邦调查局学员（他们也是为执法部门培养的）学习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时的一种很有效的教学方法。就像雷斯勒和萨特曼著作中所说的那样（Ressler and Shachtman，1992，pp. 113 ~ 114）：

掌握这些知识是一回事，而把它们传授给我们的听众，即那些需要我们的帮助来追查暴力犯罪人的警官们就是另一回事了。为了向那些警官和执法人员描述作案人的特征，我们必须使用一些术语，而这些术语不能是精神病

学的行话。如果哪个警官没有学习过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你对他说，寻找一名病态人格（psychotic personality）的作案人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必须以一种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对他们说话，这样才能帮助他们寻找那些杀人犯、强奸犯以及其他的暴力犯罪人。对于一个表现出变态人格（psychopathic personality）特征的现场，我们告诉那些警官说，像这种特定的犯罪现场是“有序的”，那么，犯罪人也是有组织力的；而另一种现场表现出混乱特征，那么，作案人也是“无组织力的人”。

这个概念非常简单。如果一个现场非常凌乱，到处都是一些物证，我们就认为它是“无组织力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意味着作案人无组织力、精神错乱。而如果一个现场上只有为数不多的物证，并且不是十分凌乱的话，我们就认为它是“有组织力的”。这种情况就意味着作案人有组织力，但有些变态。

这种分类体系运用起来非常简单，几乎不用经过思考，那些没有什么心理学知识的人员（包括大多数执法人员）非常喜欢这种方法。事实上，这种分类方法就是为他们而设计的。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的分类方法只给那些并无真正心理学知识的执法人员，一些易于接受的术语以及它们在司法精神病学上的含义。

变态的（有组织力）犯罪现场和病态的（无组织力）犯罪现场

我们在看表 12-1 的时候会发现这两种分类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表 12-1 有组织力的现场和无组织力的现场理论上的区别

变态的（有组织力的）犯罪现场的特征	病态的（无组织力的）犯罪现场的特征
有预谋的犯罪	无预谋（一时冲动型）犯罪
以陌生人为目标	以熟人或熟悉的地点为目标
被害人有人格特征	被害人失去人格特征
控制谈话	极少谈话
犯罪现场表现出绝对的控制	犯罪现场随机而且凌乱
要求被害人顺从	对被害人进行突然的暴力攻击
有拘禁或控制被害人的现象	几乎没有拘禁或控制的手段
侵害行为发生被害人死亡之前	在被害人死亡后对其进行性侵犯
掩藏尸体	将尸体丢弃在可见之处

(续表)

变态的（有组织力的）犯罪现场的特征	病态的（无组织力的）犯罪现场的特征
现场上常常见不到凶器和证据	现场上常常能见到凶器和证据
转移尸体或被害人（即攻击发生在第一现场，而被害人被丢弃在第二现场）	将被害人尸体弃之于现场（只有一个主现场）
变态的（有组织力的）作案人的特征	病态的（无组织力的）作案人的特征
智商在平均值以上	智商在平均值以下
有足够的社交能力	社交能力很差
胜任技能性工作	一般从事非技能性工作
性行为能力正常	正常性行为无能
出生排序多为家中长子	出生排序多为家中幼子
父亲有稳定的工作	父亲的工作不稳定
童年时父母管教矛盾或冲突	童年时的管教专制且严厉
犯罪时能控制情绪	犯罪中表现出焦虑的情绪
有时犯罪与酗酒有关	较少使用酒精饮料
有突如其来的情境变化和压力	很少有情境压力
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	往往独居
开着一辆车况良好的车	居住或生活在犯罪现场附近
犯罪后关注新闻媒体对案件的报道	对新闻媒体几乎不感兴趣
可能会变换工作或离开这个城市	作案后有显著的行为变化（吸毒、酗酒或迷信等）

表 12-1 中的特征是由伯吉斯等人的论著（Burgess, 1988, pp. 122 ~ 123）中改编而来，它展示了那些作者通过研究发现的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现场的理论上的区别。这种分类是归纳性的犯罪心理画像的一个摘要。^① 如果一个现场具有有组织力的特征，我们就可以推测作案人也是有组织力的。如果

^① 联邦调查局的犯罪心理画像的方法总是未能详述同行对他们办案和文献的评述。这包括同行对《联邦调查局犯罪心理画像方法》（FBI's Criminal Profiling Project）中的评论，该书研究了 36 名在押的犯罪人以及他们手下的 118 名被害人（Darkes, 1993; Turvey, 1999），根据诺布尔（Nobile, 1989）的论著，“在外界的评论人员严厉批评了这种研究的统计和研究方法之后，司法部门禁止政府出版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尽管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他们的研究方法有错误，联邦调查局还是在伯吉斯等人（1988）的论著中出版了这项研究成果。这项研究成果仍然是许多联邦调查局犯罪心理画像的概念、方法、研究模式以及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分类这个两分法的基础理论。

一个现场具有无组织力的特征，我们就可以推测作案人也是无组织力的。

读者可能会发现这个表上列出的作案人的一些特征常常出现在联邦调查局训练出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为警方和新闻媒体提供的一些案件的作案人的心理画像中。这是那些典型特征的两个重要出处之一。另一个出处就是格罗茨于1979年出版的《强奸犯罪人动机类型》（Groth, Rapist Motivational Typologies）。

这种分类系统对于犯罪心理画像的意义在于，把无组织力的作案人推断为精神错乱的人（psychotic）。这就是说，对于一个非常凌乱的现场，作案人肯定患有精神疾病，这使得他精神错乱，表现为理智和社会性功能都已丧失，并且已经部分或全部地脱离了现实世界。

与之相反的，有组织力的作案人被推断为变态的人（psychopathic）。这就是说，对于一个比较“干净”的现场，作案人肯定不是一个患有精神疾病而精神错乱的人。他们很清楚并且能够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意义。

上述这些推论是犯罪心理画像中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现场分类理论的核心。尽管它们看起来像是结论，但实际上它们只是一些推断而已。

流行和运用

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的犯罪现场分类模式一向广泛地运用于那些接受过联邦调查局犯罪心理画像训练的从事犯罪心理画像工作的人员中间，并且在这些人员给出的专家意见中常常能够见到这种理论。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一位退休的联邦调查局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格雷戈·O. 麦克格拉雷（Gregg O. McCrary）在1998年华盛顿州诉罗伯特·帕克（Washington v. Robert Parker）^①一案中作为辩护方所作的关于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现场和犯罪人的证词。

唐·雷兹（Don Raz）：关于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犯罪现场的问题，您曾经以自己的现职身份或以联邦调查局侦查人员的名义来提供过证言吗？

^① 这段证言解释了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的分类方法在（民事）房产权诉讼案件证明中的重要性。

格雷戈·麦克格拉雷：是的。我曾经多次就犯罪人有组织力或无组织力的问题提供过证言。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但是它还是常常出现在证言中。

唐·雷兹：是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您曾经提供过多少次证言？

格雷戈·麦克格拉雷：我碰到的几乎每一起杀人案件都要面对这一问题。如果你经常分析现场的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程度的话，你就能够发现犯罪人的不同之处。例如，在民事案件中这个问题主要表现为犯罪的可阻止性以及犯罪的老练程度。这一点可以用来分析一些安全措施能够阻止这些特定的犯罪人去犯罪的有效程度。所以我们经常分析一个犯罪人表现出的犯罪的有组织力程度以及老练程度。

唐·雷兹：您曾经就被害人方面的问题在法庭上作过证吗？

格雷戈·麦克格拉雷：是的。在犯罪和犯罪现场的分析中一向要研究被害人方面的情况，这是整个分析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每一起案件中都要涉及的另一方面的问题。

唐·雷兹：请原谅，在被害人方面的问题之前我忘了问您一个问题，在您作证的每一起刑事案件中您都提供了关于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方面的证言吗？

格雷戈·麦克格拉雷：我认为是的。有的时候它并不是证言中的核心部分，但是它却常常成为我提供的关于某一起犯罪和犯罪现场表现出来的老练程度的证言的一部分。例如，我们在讨论伪造或是经过伪造的现场的案件时常常会涉及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常常会讨论到犯罪人有组织力的程度，而一个有组织力的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一般会形成伪造现场。然后我们将分析这几个现场伪造的有组织力程度和老练

程度，最终我们将得出一些有关犯罪老练程度和犯罪人智力情况方面的信息。所以，有关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方面的信息常常是我们所提供的证言的基础。

唐·雷兹：

请问，在您所遇到的刑事案件中，您曾经被明确要求判断过一个现场究竟是有组织力的还是无组织力的吗？

格雷戈·麦克格拉雷：

我再次说明一下，这只是证言中的一部分。它不是 A 或 B 之间二选一的问题，不可能出现要么是有组织力的要么是无组织力的情况。我们试着把它当做一个连续性的渐变的阶梯，这才是理解这个问题的正确方式。它不像黑色和白色那样反差那么明显，我把它理解成为一条连续的渐变的带状彩色光谱。它的一端是白色的，另一端是黑色的，在两者之间有不同深浅、不同色调的各种颜色，有蓝色、绿色、介于蓝绿之间的颜色以及黄色、橘红色和红色等。某一起特定的犯罪就会在这个连续的渐变的条带上找到它的位置——它是比较有组织力的，或是非常有组织力的，或是稍微偏向于无组织力的，等等。所以，这常常是整个证言中的一部分。

唐·雷兹：

您的意思是说并不能绝对地认为一个犯罪人是有组织力或无组织力的，但他肯定是属于介于两者之间的某一点。

格雷戈·麦克格拉雷：

是的，他可能是偏有组织力的或偏无组织力的。有些人具有一些混合的特征，可能位于两者之间，这种情况比你知道的多得多。他们同时具有无组织力的特征和有组织力的特征。除了一些极其明显的有组织力的或无组织力的犯罪人，其

他的人可能都位于中间附近。

唐·雷兹：在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和出版物中至今仍认为那些位于两者之间的情况属于一种混合型吗？

格雷戈·麦克格拉雷：是的，你说对了。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退休的联邦调查局犯罪心理画像专家罗伯特·K. 雷斯勒（Robert K. Ressler）2000 年在北卡罗来纳州诉华莱士（North Carolina v. Wallace）一案中作为辩护方所作的关于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的现场和犯罪人的证词：

辩护方提交了罗伯特·K. 雷斯勒上校的证言，他是犯罪学、犯罪现场分析、系列案件犯罪人、系列案件的犯罪心理、变态犯罪心理等方面的专家。

雷斯勒上校在作证的时候涉及了一种他在分析系列案件的犯罪人时使用的分类系统，这种分类系统将犯罪和犯罪人分为有组织力型、无组织力型和混合型。这种分类方法趋向于根据犯罪人表现出来的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来进行划分。^① 有组织力的犯罪人一般都没有实质上的精神疾病，但是他们可能会表现出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无组织力的犯罪人一般都表现出患有精神疾病的某些特征。混合型的犯罪人会表现出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的一些特征。雷斯勒上校认为这起案件属于混合型，它既表现出了有组织力的特征，又表现出了无组织力的特征。在直接询问中，辩护方的律师强调了这 9 起案件中表现出来的无组织力特征，试图借此证明被告人有智力缺陷或患有精神疾病。在交叉询问中，控方也引用了雷斯勒上校的一些证言，这部分证言指出这些案件（包括以前的两起案件）表现出了有组织力的一些特征，而这就说明犯罪人没有精神疾病。

我们再来看看 2001 年华盛顿州控诉阿克利（Washington v. Ackley）一案中比较新近的证言。这部分证言探讨了侦查指导人员对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

^① 目前尚无公开的研究成果支持雷斯勒关于“这种根据犯罪人表现出来的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来进行划分”的论断。事实上，目前尚无有关这种分类方法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的公开研究报道。甚至在伯吉斯等人于 1997 年出版的《犯罪分类手册》（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Burgess et al.）的第 22 页上也承认“目前尚无系统的研究来验证这种源自犯罪心理画像的分类方法的有效性”。

的分类方法的运用：

金县（the King Country）治安部门的多恩（Doyon）侦探在阿琳·延森（Arlene Jensen）被杀案和斯蒂芬妮·迪翠克（Stephanie Dittick）被杀案中担任侦查顾问，并且以此身份在审判的过程中提供了详尽的证言。一方面，控方引用了多恩侦探的专家证言，这部分证言是关于他和他的同事们经常使用的一种凶杀案件的侦查方法。多恩侦探解释道，在凶杀案件侦查的最初阶段，将作案人区分为“有组织力的凶手”或“无组织力的凶手”会对案件的侦查很有帮助。他认为“有组织力的凶手”一般流窜作案，他们会预先策划犯罪，试图暗中监视被害人，自备凶器到犯罪现场，并在他们离开现场时带走凶器。而与之相反，“无组织力的凶手”往往盲目地进行犯罪，在犯罪过程中他们杀死被害人后并不转移尸体，很可能将凶器或者其他证据丢在犯罪现场上。多恩侦探在证言中还提到他认为杀害阿琳和斯蒂芬妮的凶手是同一个人，并且这个人属于“有组织力的凶手”。

阿克利则认为侦探提供的关于“有组织力的凶手”和“无组织力的凶手”的证言包含了一些不适当的犯罪心理画像方面的证据，这些证据专门用来暗示他有罪。阿克利认为，多恩侦探并未提供合法的专家证言，他所提供的杀害阿琳和斯蒂芬妮的凶手的特征太详细、太精确了，他所作的这个画像只有阿克利一个人能够符合。

.....

控方指出，多恩侦探关于“有组织力的凶手”和“无组织力的凶手”的证言并不是犯罪心理画像的结论，因为他的证言并不是试图根据一些特征而从人群中找出凶手，它只是讨论了那些已被确认为凶手的犯罪人的一些共同特征和行为。控方还指出，侦探提供的证言并不是专门针对阿克利并想把他确定为“有组织力的凶手”。

我们认为，多恩侦探关于“有组织力的凶手”和“无组织力的凶手”特征和惯技的证言并没有包含一些不合适的犯罪心理画像的结论。他并没有将阿克利确认为具有作案人特征的嫌疑人群中的一员，也没有暗示这些案件是他所为。多恩侦探的证言主要是为了说明这些案件具有一些共性（例如，尸体都被隐藏，每个现场上都没有十分明显的物证，这些妇女被杀害的方式相

同，等等），并且支持了控方所持的这些犯罪是同一人所为的观点。我们肯定法庭的裁决，即认为多恩探长的专家证言是正当行使了他的发言权。

从这些案件我们可以看出，联邦调查局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普遍使用这种分类方法，并且使那些曾接受过联邦调查局培训的人也使用这种方法。

错误的二分法

笔者并不同意和提倡这种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的分类方法。^① 因为这种分类方法是错误的。它是从对犯罪行为的发展性和犯罪现场再现的一种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发源出来的。有一些非常直接的意见支持这种观点。

第一，大多数犯罪现场都是介于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种情况，并不是简单的“不是这一个就是另一个”。甚至在伯吉斯等人（Burgess et al.）于 1997 年出版的《犯罪分类手册》（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Burgess et al.）的第 9 页上也都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问题。这没能阻止那些无知的、不合格的人对犯罪现场和犯罪人进行如此绝对的划分。很明显，这是《犯罪分类手册》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足之处。

第二，只有由合格的法庭科学家进行正确的分析才能够洞察犯罪现场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现场（确定犯罪现场上曾经发生过什么的过程一般被称为犯罪现场再现。那些遗留在现场上或者是未留在现场的证据都应当被看做是一系列活动的产物。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是无法通过观察这些孤立的部分而得出正确结论的。

第三，一个表现出无组织力特征的现场也可能是由于下列与精神错乱、精神障碍无关的原因造成的（这些并不是全部的原因）：

1. 报复型的犯罪人，他们并没有任何精神疾病。
2. 与家庭暴力相关的犯罪。
3. 伪装的犯罪。

^① 在笔者曾经参与的一些案件中，执法部门的人员认为犯罪心理画像只是为了确定一个犯罪现场是有组织力的还是无组织力的。很多犯罪心理画像的内容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这种误解在网站（www.corpus-delicti.com）上的犯罪画像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这种见解实则不然。

4. 被中断的犯罪。

5. 犯罪中使用了控制类物品（controlled substances）。

第四，一个表现出有组织力特征的现场并不一定说明犯罪人是变态的。精神变态是一种特殊的人格障碍。我们不能因为没有精神错乱的行为就认为犯罪人只是变态。

第五，用二分法给犯罪人贴上标签，可能无法解释犯罪人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生的变化。有些犯罪人在一段时间之后能力和技巧会有提高，现场上遗留的证据比以前少了，并且还会采取更有效的预防措施。但是，另一些犯罪人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能力和技巧会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其精神状况的恶化，或者是在犯罪过程中更多地使用了控制类物品。^①

第六，与上述第二点和第五点有关的是，这种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的分类方法不适合从犯罪惯技方面对犯罪人进行分类。它考虑到了犯罪现场上发生了什么行为，但没有考虑为什么会发生这些行为。我们必须指出，国家暴力犯罪分析中心（NCAVC）发明这种分类法的人员都懂得犯罪惯技和犯罪标记行为之间的区别，并且他们也都清楚忽视标记特征的危险性，但是，他们还是非常荒唐地创造出了这种完全不考虑这些因素的犯罪现场分类法。

第七，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的分类法有一种伦理方面的危险，它不当地使有些人用临床医学的观点来说明一个与法庭审理有关的问题，这是不应该的。在下面这段雷斯勒和萨特曼的论文（Ressler and Shachtman, 1992, pp. 3~4）中，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显：

看着犯罪现场的照片和警方的记录，我明显感觉到这起案件不是“有组织力的”凶手所为，这个凶手跟踪了被害人，在开始作案的时候非常有条不紊，并非常小心地避免在犯罪现场上留下线索。但是，从犯罪现场来看，我很明显地感觉到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无组织力的”凶手，他具有完全的、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

这段文字的作者没有对患者进行临床诊断，没有多年的医务经验，也没有根据现场照片对犯罪现场进行准确的再现，却自认为能够诊断精神疾病。

^① 在第13章“理解他们的惯技”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系列杀人犯泰德·邦迪（Ted Bundy）在一系列案件中表现出了精神状况的恶化。

在他作出这个重要的、可能会产生很多影响的医学诊断结论之前，他甚至没有亲眼见过犯罪人。这不是一个合法的司法行为。

作者的建议

犯罪心理画像专家作为事实真相的调查者，在接到一个案件和检验相关的犯罪现场时，不应当带任何的主观偏见。我们应当把各个物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作为理解犯罪行为的首要向导。因此，一个客观公正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不会去运用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的分类方法来进行犯罪现场分析。如果运用这种方法的话就很容易被这种错误的方法所误导。这种分类方法被设计用于培训那些对心理学没有一点了解的人员，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对犯罪人特征的概括。正如本章所述，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的犯罪现场分类方法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却经不起严格的推敲。正如那些违背了实际的理论一样，它们最终会对侦查工作造成损害，所以我们应当放弃使用这种分类理论。

参考文献

1. Burgess, A. , Burgess, A. , Douglas, J. , and Ressler, R. (1997) 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San Francisco: Jossey - Bass.
2. Burgess, A. , Douglas, J. , and Ressler, R. (Eds.) (1988) Sexual Homicide: Patterns and Motive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3. Darkes, J. , Otto, R. K. , Poythress, N. , and Starr, L. (1993) "APA's Expert Panel in the Congressional Review of the U. S. S. Iowa Incid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January), 8 ~ 15.
4. Groth, A. N. (1979) Men Who Rape: The Psychology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Press.
5. Nobile, P. (1989) "The Making of a Monster", Playboy, July.
6. North Caroline v. Wallace (2000) No. 241A97, May 5, 2000 (351 N. C. 481).
7. Ressler, R. and Shachtman, T. (1992) Whoever Fights Monster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8. Turvey, B. (1999) Criminal Profiling: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vidence Analysis, London: Academic Press.

9. Washington v. Ackley (2001) No. 4366 – O – I, March 5, 2001 (WL 210681).
10. Washington v. Parker (1998) No. 96 – 1 – 07511 – 2 SEA, Transcript of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Defense Witness Gregg O. McCrary, October 27, 1998.

第 13 章 理解犯罪惯技

Brent E. Turvey, M. S.

在侦查工作中，获知犯罪人的犯罪惯技并掌握如何判断犯罪人的理解力、耐心、机智、努力程度和细心程度的方法是侦查工作的永恒法宝。

康奈尔（O'Connell）和索德曼（Soderman）（1936，p.1）

许多犯罪人都具有显示他们犯罪特征的惯技，这包括他们特征性的作案手段。物证可以用来刻画这些惯技。譬如：进入现场的方式、使用的工具、侵害物的类型以及其他一些能说明问题的迹象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李（Lee）、德福瑞斯特（DeForest）和甘斯伦（Gaensslen）（1983，p.29）

犯罪惯技（MO）源于拉丁语，指可操作性方法，在此是指实施犯罪的某种方式（Gross，1924，p.478）。犯罪人的惯技^①包括故意实施犯罪中的犯罪

① 格罗斯（Gross，1924，p.478）曾论述过，一些惯犯，如盗窃犯，具有明显的行为风格或惯技，而且很少违反。韦斯顿（Weston）和韦尔斯（Wells，1974，p.110）更具体地论述过：虽然不是所有的犯罪人都有一种特定的惯技，但是，确有足够的案例证明：研究惯技是必要的。他们认为，犯罪人的犯罪惯技就是他们的标记，而这一论断却与他们先前作出的“并不是所有的犯罪人都有一种特定的惯技”这一论断相矛盾。在“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1990，p.1004）将“惯技”一词解释为“做事或行为的方法”，并解释说，警察或刑侦人员经常把惯技用于形容犯罪活动中具有个体特点的方法。这本词典也阐述了犯罪惯技的用途，反映了专家们对此的观点。而这些专家或者把犯罪惯技误作犯罪标记，或者对他们自己的调查工作缺乏热情。比如，在这本词典中是这样解释的：“犯罪行为风格如此明显地存在着差别，但仍错误地被认为是同一人所为。”

有理由相信，所有的犯罪人都有犯罪惯技，但并非所有的犯罪惯技都是非常明显的。同样有理由相信，有些犯罪有明显的行为标记，并不是所有的犯罪人都具有明显的行为标记。由于各种原因，根据遗留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并不能完全解释行为标记。另外，行为标记有时也可以被认为是惯技行为，因为一种行为可以有多种解释，对此将在第15章中详述。

选择与犯罪行为。犯罪人的犯罪惯技能反映出他们如何实施的犯罪，它不同于犯罪人的动机和犯罪标记显示（参见第15章），后者决定犯罪人为什么必须以某种方式实施他们的犯罪。

对犯罪惯技的调查和积累早已成为下列侦查工作中传统的手段（Weston and Wells, 1974, p.110; Lee et al., 1983, p.29）：

1. 通过分析犯罪惯技来串并悬案。
2. 将已知的犯罪惯技和未破案件中的犯罪惯技对比来确定犯罪嫌疑人。
3. 将被捕者的犯罪惯技和未破案件中的犯罪惯技进行常规比较。
4. 利用积累的犯罪惯技信息优势来扩大调查途径和确认犯罪嫌疑人。
5.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排序或排除。
6. 破获案件^①。

对犯罪心理画像者而言，犯罪惯技可进一步提供犯罪人的一系列信息，包括行为选择、活动过程及相应技术等，而这些正是个人特性内容或是下列内容的反映：

1. 某种特殊训练、行业、技能、专业或活动领域的情况（包括犯罪人和非犯罪人的）。
2. 有关特定被害人的情况，以判断犯罪人与其接触程度或二者先前的关系。

^① 当某一盗窃、抢劫或性侵犯的犯罪人被捕后，警察经常试图将犯罪嫌疑人与其他已备案的案件联系起来，因为只要有切实的证据，就能从中发现案件的相似性并进行彻底调查。这是一项合法的侦查手段。华盛顿特区警察局和美国其他州警察局这样破案已有历史。费尼（Feeney, 2000）曾写道：

“但也有个别警官在还没有通过确切的鉴别就宣称已知道谁是犯罪嫌疑人。甚至在对犯罪嫌疑人的指控材料还未备齐、犯罪嫌疑人还未认罪，以及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警察就能运用犯罪惯技来破案了。有这样一个案例，一名警官确信3起盗窃案是一人所为，因为他‘感觉肯定是’，尽管此人并没有承认这些盗窃，也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他的犯罪事实，而且，他所犯的案件其惯技与这3起相比也有所不同。”

依笔者看来，这就是不合法的侦查和司法活动。侦查与司法活动必须合法。即使犯罪惯技在其他案件中极其相似，也不能就根据此而完全认定犯罪嫌疑人，只有根据物证才能用来完全认定。在不同案件中相似的犯罪惯技需要深入的研究，它只能作为一种进一步侦查的线索而不能用作最终结案的确定性结论。

3. 有关犯罪现场的特征，以判断犯罪人对犯罪现场的熟悉程度。

犯罪行为侦查

侦查人员长期以来一直确信，只要了解犯罪人实施犯罪的方法和技术，就可以最好地理解犯罪人，并有最好的侦查。这也是历来要求神探们成为犯罪案件和犯罪行为的百科全书的理由，也同样要求神探们学会利用犯罪人的知识和经验来丰富自己的侦查策略。

这种刑事侦查的理论在 1809 年的法国应用得淋漓尽致。当时，政府派曾经是罪犯而后来一直担任警察情报人员的尤金·维达（Eugene Vidocq）来组建一个暗探小组。他奉命组织并领导了这个多数成员曾是犯罪人的侦探小组，其成员数目也从 4 个增加到 28 个。维达和他的侦探们凭他们认定犯罪人的多少来领取报酬。第一年他们就逮捕了 750 多人。这使得一些人认为，维达和他的侦探们是当地犯罪人的克星，他们知道犯罪人如何活动，熟知犯罪人的习惯和作案方法，并用他们的知识来为国家服务。然而这也同样导致另一些人的怀疑，维达和他的侦探们同样犯了许多罪行，并且为破案而捏造事实毁损别人。1832 年维达因被指控为了破案而教唆犯罪被政府机关开除。尽管如此，维达还是作为第一个成功的暗探头目在法国历史上享有一席之地。

不论维达是否是一名神探，还是借暗探之名继续从事犯罪活动，总之，一种犯罪侦查的模式出现了，即理解犯罪人可形成有效的侦查策略，结合其犯罪经验成功地抓捕他们。侦查人员也必须熟悉实施犯罪的各种手段、方法和他们的黑话。这就是以各种形式在世界上通用并沿用到今天的侦查理论。^①

犯罪惯技的组成

犯罪惯技是通过后天的操作经验学来的，并随着时间而进化或发展的行为。当一名犯罪人越来越有经验时，它会变得更为老练、狡猾、隐蔽。它也可能由于犯罪人的精神状况恶化或过度地吃老本而变得技不如前，变得力不

^① 当美国秘密行动组（Secret Service）于 1865 年在华盛顿特区遏制假币犯罪时，其部分成员就曾经是伪造假币的罪犯。他们利用“同行”来破案，并付给“信息费”。至今，许多执法机关仍利用这些“内线”来获得破案的线索和有关犯罪团伙、帮派的信息。

从心（Turvey，2000）。

不论哪种情况，犯罪惯技都是为达到某种目的并具有一定特征的行为。它最常用于（或未能用于）以下三种之一的目的或更多的目的^①：

1. 掩护作案人的身份（如在白天抢劫银行时戴着面具，在实施强奸时蒙住被害人的眼睛，在盗窃时戴着手套，以及为灭口杀害证人等）。
2. 成功地实施犯罪（如用东西塞住被害人的嘴，用凶器胁迫被害人，利用相关信息列出潜在被害人的名单等）。
3. 为逃跑创造便利条件（如利用偷来的车实施犯罪并在犯罪后把车处理掉，捆绑被害人以防逃跑或得到援助等）。

犯罪惯技通常包括如下一些种类，但并不局限于此 [参考了康奈尔（O'Connell）和索德曼（Soderman），1936，pp. 254 ~ 264]。

1. 作案人数。^②
2. 犯罪前的预谋程度。
3. 作案地点的选择。
4. 通往作案地点的路线。
5. 现场守候或对被害人的监视。
6. 作案时涉及的被害人（而非幻想中的被害人）。
7. 作案时使用的凶器。
8. 作案时为控制被害人使用的捆绑方式。
9. 对被害人伤害的特点和程度。
10. 杀人的方法。
11. 反侦查的特点和程度。
12. 被害人衣服的弃置地点和位置。
13. 被害人尸体的弃置地点和位置。

^① 愚昧无知的犯罪人远比脑筋聪明的犯罪人多得多。格罗斯（Gross，1924）认为，历史上就有侦查人员利用犯罪人的愚蠢破获的案件，并且不计其数。他说（1968）：“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脑子里塞满了一系列愚蠢的想法，还试图从中学习。”

^② 指习惯于几人作案，译者注。

14. 为获利或不被发现而从被害人身上或犯罪现场拿走的物品。^①
15. 进出犯罪现场的交通工具。
16. 离开犯罪现场的逃跑路线或方向。
17. 作为实施犯罪的必要手段——犯罪惯技并不同于犯罪人的动机 (motive)，后者是指实施犯罪的缘由。

一个犯罪人的作案动机也可以作为一种证据，即标记行为。这种标记行为往往是一个人的风格标志，也是一个人犯罪的动机标志。因为标记行为是出于作案人的情感需要和心理性的需要，所以，它们是犯罪的典型特征，但不是犯罪的必需特征（参见第 15 章）。

对犯罪惯技的影响

犯罪人的犯罪惯技是学来的、动态的、可塑的。因为犯罪惯技可随时间而改变，随犯罪人的“进步”或“退步”而改变。在作案中，犯罪人会认识到一些做法会更有效，在后来的犯罪中就重复这些做法，因而变得更加老练。

然而，犯罪惯技也会因为犯罪人不断恶化的精神状态 (mental state)、毒品 (controlled substance) 的影响或侥幸心理 (increased confidence) 的增强而改变。这些因素会使得犯罪人的惯技变得技不如前、易被发觉和疏忽大意。

在犯罪人从事犯罪的生涯中，他们会不断地尝试新的行为从而使犯罪惯技更为简练，这就无意间揭示出犯罪人的身份 (identity)、性格 (character) 或经历 (experience)。犯罪人为了更熟练地实施犯罪、逃避惩罚、掩盖自己的身份，还会学习一些具有共性的有效方法，当然，他们并不局限于这些方法，即我们前面罗列的方法。

训练和技巧的来源

在犯罪人被抓捕和定罪之前，他们拥有与其他人同等的学习机会。专业期刊、大学课程、教材，还有在公共图书馆可找到的各种源于媒体的教育材料，或通过互联网等都可以提供给犯罪人有用的知识，使其犯罪惯技更为精

^① 通常，各类强奸犯都从被害人身上夺走驾驶执照或其他印有照片的身份证明作为对被害人安全的公然威胁，借此达到对被害人恐吓不许报案的目的。他们往往威胁到“我记得你的长相，我知道你在哪里住，如果你报警我很快就回来，他们也帮不了你，我会记住你的”。

练。因此，犯罪心理画像者首先要知道的就是：犯罪人的惯技恰恰反映了他们对某一特定专业或特定技术的熟悉和熟练程度，将此纳入犯罪心理画像就能提供相应的侦查方向。

例如，纵火犯可能读过《科克纵火案件侦查》，^① 强奸犯可能读过《强奸案件侦查实用方法》，^② 谋杀犯可能读过《实用杀人案件侦查》，^③ 而银行抢劫犯可能订阅了安全杂志。^④

职业或专业经历

犯罪人可能曾经或正在从事某项需要专业知识或需要熟练技能的职业（电工、管道修理工、电话公司职员、计算机专业者、军人、执法人员、飞行员等）。这些专业知识和职业特征会在他们的犯罪惯技中反映出来。还会通过他们对犯罪时间、地点和被害人的选择上反映出来。例如，一名纵火犯可能是一位自愿消防员，他利用工厂内部提供的培训教材进行纵火；一个强奸犯可能是某住宅楼的保安人员，他容易猎取被害人，并知道如何躲过安全监视记录，并会使用手铐控制被害人；一个谋杀犯可能在军队里呆过，谋杀时使用军用的物品和武器；一个抢劫犯可能对其工作过的企业下手，因为他非常熟悉交接班的时间和过程、安全监视记录、贵重物品的存放地点和保安的反应时间。

犯罪经验与自信

当犯罪人越来越多地实施同种犯罪的时候，他们犯罪的手法会越来越熟练。他们下手会更有把握，能够极其平静地处理意外事件（或者准备得更充分），或者能为准备实施的犯罪活动制定相应的防御措施。这是非常重要的

① 原名为《Kirk's Fire Investigation》，德罕著（Dehaan, 1997），译者注。

② 原名为《Practical Aspects of Rape Investigation》，伯吉斯和哈兹伍德著（Burgess and Hazelwood, 1995），译者注。

③ 原名为《Practical Homicide Investigation》，格伯斯著（Geberth, 1996），译者注。

④ 作者也经常被要求向公众提供这些方面的知识和信息，这本身也会使犯罪人变得更加专业。公众得到这些材料并不成问题，关键是犯罪人若能得到这些材料而负责破案的人员反而得不到，那则令人担忧。无可否认，执法队伍人员与犯罪人同样分享这方面的信息（其他行业也一样）。因此，若认为这些材料只能提供给执法人员或相关人员是不现实的。

判断，即每一犯罪案件，什么是犯罪人事先计划好的，犯罪人带来过什么东西、通过哪些行为实现他们的犯罪计划。问题在于，犯罪心理画像者需要知道现场是否有犯罪人带来的东西，以及何种行为适合这种犯罪。接着就要考虑，犯罪人携带的工具和实施的行為是否暗示着必须实施过其他犯罪才能达到如此的熟练程度（暗示着除本案外此人是否还有犯罪前科）（Turvey, 2000）。

与刑事司法系统的接触

犯罪人仅被捕一次就能从中学会将来如何逃避执法机关的侦查。更为夸张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执法机关和犯罪人都把“蹲监狱”看成是“上大学”。这是因为缺乏犯罪经验的新手有太多的机会与已经掌握大量犯罪知识的老手们接触，结果就造成犯罪人经过短短几年的服刑就有可能超越其原有的犯罪惯技而大大提高其犯罪技能。一旦被释放他就可能运用“学到的知识”来实施以前所不能的犯罪活动。

大众媒介

有些犯罪人通过密切关注报纸和电视上的报道来了解侦查活动的进展情况。这一点非常重要，侦查人员和心理画像者应该重视有意给媒体透露某种信息，什么时候透露、如何透露，这将会对系列性案件的犯罪人下一步的行动产生影响。但是，有时提供与案件有关的信息不仅能够使犯罪人为将来的行动制定更为有效的防御措施，而且，还能使其他的犯罪人模仿特殊的系列案件并学会如何逃避侦查嫌疑。

例如，同一地区发生了5起不同的强奸案。直到DNA结论证明这些案件极有可能是一人所为时，这5起案件才被并案侦查。如果媒体以标题为“DNA使5起系列强奸案并案”对此案进行报道，那么，犯罪人就有可能改变其犯罪惯技来避免执法机关将其以后的强奸行为与这5起强奸案并案。强奸犯有可能做些临时性改变，如在今后强奸时使用避孕套或者做些永久性的改变，如切除输精管。不论哪种改变，强奸犯都会基于从媒体对这起案件或其他类似案件的报道中得到的信息来做一些明显的行为改变以防对自己不利。

犯罪人情绪

犯罪人在某一天的情绪可能影响他行为的侵害程度和他对被害人和犯罪

现场的态度。譬如，一名强奸犯在袭击被害人前一小时与他的性伴侣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那么，此时的侵犯程度就比没有这场争论的侵犯程度要严重得多，结果就使得犯罪人在现场的行为显得缺乏计划和难以控制。

未知因素

未知因素（X - factors）是指那些在犯罪中能够影响犯罪现场行为的任何不确定性因素。从犯罪人的角度来看，犯罪的成功实施依赖于与他们的幻想和期望相一致的事情。然而真实的生活情境、犯罪现场、被害人和其他外部影响（天气、旁人、时间等）并不总是与犯罪人的期望相一致。任何未知因素的出现，如正处于某种毒品作用下的被害人、意外的旁观者、被害人意外的反应（顺从、反抗或死亡等）都可能迫使犯罪人临时起意或匆忙退出，造成未完成侵害或“错误”攻击行为。

案例

在公园里，一名强奸犯从身后袭击妇女并把她拖到附近的树林里。他用胳膊卡住妇女的脖子，强奸时用裙子遮住妇女的脸以免被记住他的长相。强奸后用手掐对方的脖子直到妇女晕厥丧失意识后才离开。

被干扰或未完成的犯罪就是指那些没有达到犯罪目的，也没有展现犯罪惯技的犯罪。以上面的例子来说，被害人可能并不容易屈服，她会转身朝犯罪人腹部猛踢一脚。犯罪人也可能被她打晕，最后一瘸一拐地离开，或者被害人创造了其他途径逃跑，或者无意间被旁人发现而致使犯罪人逃走。不管怎样，这时的行为并没有包括犯罪人所有的犯罪惯技，因而是未完成的犯罪。

错误攻击行为是指那些没有事先目的、没有事先计划而使用犯罪惯技进行犯罪，从而增加了犯罪人的犯罪风险和暴露的危险。以上面的例子来说，犯罪人可能用力过大或者被害人反抗时用力过大，犯罪人本来只想让她晕倒却造成她死亡。这就使一起强奸案变成了谋杀案，增加了罪行的严重程度，使犯罪人也面临更大的暴露危险。

犯罪惯技的退化

犯罪惯技的退化（De - evolution）是指犯罪惯技在犯罪生涯中并非永远进化，并非越来越完美。不断恶化的精神状态、吸食毒品、侥幸心理的增强

都会使犯罪人的惯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得缺乏能力和技不如前。

案例

美国一个系列谋杀犯特德·本迪（Theodore Bundy）于1973年至1978年跨5个州杀害了至少30人。他刚开始犯罪时显得特别狡猾和谨慎，他装做彬彬有礼，待人友好，随机应变，常常以弱者和求助者的身份接近被害人，并让人觉得他毫无威胁。他常常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车子抛锚需要援助的汽车司机，往往假装用悬带把胳膊吊起来。他也往往选择那些未成年少女，跟踪她们，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实施犯罪。但他的犯罪惯技却在几年间大大退化。

在科罗拉多州（Colorado）他被监禁两次并逃跑之后，他去了佛罗里达州（Florida）。在那里他开始酗酒，并开始带有仪式性地处理尸体（标记行为）。譬如，每次被害人尸体都要停放好几天。有证据表明，他还常常梳洗死者的头发、为尸体化妆，而不像从前立即处理掉尸体。总之，他开始留下越来越多的证据，反侦查措施越来越少，行为越来越多地带有仪式的刻板性质。

他对被害人的选择也同样发生了改变，他选择的最后一个被害人——一位12岁的佛罗里达的女学生，完全是出于她易于得手。这与他先前的犯罪惯技，如事先跟踪被害人、选择那些20岁出头的成熟女子相差甚远（Hickey, 1991, pp. 157 ~ 162）。

了解犯罪惯技如何进化和为什么进化，或者了解它们如何退化和为什么退化（如上述案例）对于进行犯罪心理画像和制定相应的侦查策略极其关键。一名犯罪人的犯罪惯技能告诉犯罪心理画像者：犯罪人曾考虑过什么，不考虑什么，然后他们准备什么，不准备什么。这就意味着，犯罪心理画像者必须全面考虑所有可能影响犯罪行为的因素，以及这些影响因素的潜在意义。

法庭上的犯罪惯技

以下摘录的都是犯罪惯技在法庭上被提出并作为判例的刑事案件。一般情况下，当起诉方和辩护方就提出的证据是否是本案的证据而进行辩论时，物证不足，犯罪惯技就往往派上了用场。为了更好地了解实际中的应用，请回顾以下起诉的刑事案例（需要注意的是，如同其他诉讼一样，不同的州和不同的法官对同一起案件可能会有截然相反的理解）：

俄勒冈州诉马克·皮奈尔一案^①

下列摘录完全节选自俄勒冈州诉马克·皮奈尔（1991）：

1985年8月，被告通过一本为人们提供性伴侣的杂志《逍遥游》上兰迪·布朗（Randy Brown）的广告与其相识并发展为同性恋。1985年9月9日，被告又与布朗联系并安排深夜在布朗住处与其相会。被告与认识很久的一个伙伴杜恩纳德·科纳尔（Donald Cornell）由一个朋友驾车送到布朗的住处附近。两人进了布朗的房间，他们用电线和其他一些东西将布朗的手脚反绑在身后。布朗眼睛被蒙住，嘴里也被塞了东西。被告和科纳尔多次用刀威胁布朗。当布朗试图挣脱时，其中一人朝他的头部踢了一脚。在3个小时里，被告与科纳尔洗劫了布朗的房间，把抢来的东西搬到运货卡车上离开了。布朗被扔在浴室的地板上，手脚反绑，嘴里塞了东西。最后他设法求救，幸好没什么大伤。

几天之后，被告有机会使用他前妻迪克西·蒂姆斯（Dixie Timmons）的车。1985年9月19日刚过午夜，被告给本案的被害人约翰·鲁夫纳（John Ruffner）打电话。鲁夫纳的广告与布朗的广告一同出现在《逍遥游》杂志上。开着蒂姆斯的车，带着科纳尔和一个熟人维尔玛·范赞里（Velma Varzali）到了被害人在特勒廷（Tualatin）的住处。一到那里，被告把车停下，留下科纳尔和范赞里在车上，他就去找被害人。5分钟过后，科纳尔也下了车并进去。几个小时之后，被告和科纳尔回到车上，装着从被害者家里抢来的东西，回到了他们的住处。

第二天发现了鲁夫纳的尸体。他的住处被洗劫一空，尸体躺在浴室的地板上，手脚被从房间里的电器上撕扯下来的电线反绑，嘴里塞着一块围巾，脖子被绳子缠着，而且嘴里还塞着一大团纸。尸体解剖证实，鲁夫纳是死于窒息，不是因为口中的异物就是因为脖子上的绳子。他的双手有切伤而且大脑右侧有一处钝器伤。

1985年9月22日，被告和科纳尔双双被捕。被告最终被起诉的理由是：实施了6起恶性谋杀和2起“与犯另一重罪同时的谋杀”（其中包括杀害了鲁

^① 原文为：OREGON v. MARK PINNELL, 1991（译者注）。

夫纳)。被告被8个法庭的陪审团同时认定有罪。判决时，这些残忍的加重情节的谋杀案件被合并，由一号法庭进行审判。

本案中，要认定所起诉案件（如鲁夫纳被害一案）和未起诉案件（如布朗被害一案）是由一人所为，只收集重复发生同种犯罪（如谋杀、抢劫、强奸）的证据是远远不够的。两类案件必须有高度的相似性，但这相似性本身也不足以证明未起诉案件确由某（些）人所为。一种犯罪惯技只对应一名犯罪人，这就要求犯罪惯技特别明显，以致能确定案件确由某（些）人所为。也就是说，案件必须是“标记犯罪”，即犯罪惯技必须是某人特有的，具有排他性。案件中的相似性也不能孤立地考虑，必须同时考虑每起案件发生的周围环境和案件之间除共性以外的差异。

应用上述标准，对于本案，法庭认为：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未起诉案件（如布朗被害一案）和起诉案件（如鲁夫纳被害一案）确由同案犯所为。两起案件之间有高度的相似性，当把相似性放在一起考虑时极少发现区别，如同被告的“手工艺品”，有鲜明的独特性和不一般的惯技，“如同特殊的标记”。

两个被害人的住处相距不远，而且都在被告住处附近。两个被害人都是男性，而且都在《逍遥游》杂志上征求同性恋伙伴。他们的广告在同一期杂志的对页上，而且在广告中都提供了自己的电话号码。每个被害人在案发当天都与被告用电话联系过，而且对方使用的是同一张电话卡。每起案件中，打电话的人都约定在当晚后半夜见面，而且实施犯罪都从深夜持续到凌晨。鲁夫纳和布朗的手脚都被牢牢地反绑，嘴里也都被塞了东西。在每起案件中，捆绑被害人的都是从房间里的灯和电器上撕扯下来的电线，或是房间里的其他东西。捆绑时两个人的头部都被击打过。抢劫后，两人都被反绑着扔到浴室里。被告在两人的家里都逗留了好几个小时，被害人的家都被洗劫一空，大量的私人物品被拿走。两起案件相隔只有9天。在布朗一案中被害人多次被死亡威胁，而在鲁夫纳一案中被害人死亡。同时有证据证实，两起案件都由被告和同一帮手杜恩纳德·科纳尔所为。

两案的惟一的差异在于，布朗的嘴里没有纸团，脖子上也没有绳子；布朗被蒙上了双眼而鲁夫纳没有；鲁夫纳死了而布朗还活着。

加利福尼亚州诉肯尼斯·赫纳德一案^①

下面的案例是起诉肯尼斯·赫纳德（Kenneth Hernandez）对两名被害人的性侵犯案。根据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规定，起诉方如果只根据犯罪分析家^②从性犯罪数据库中得出的结论而提出了关于被告身份和罪行的证据带有偶然性，原审法院采信了这些证据形成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可撤销的。该案的犯罪分析员作证说，她对两起案件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被指控的犯罪其发生区域正是被告居住的地区。由此说明被控案件的犯罪惯技是一致的，即两案均发生在被告居所附近。检察官就向陪审团辩称，他们可以据此推断被告人实施了被控罪案（California v. Hernandez, 1997）。

下列叙述是完全从《加利福尼亚州诉肯尼斯·赫纳德一案》（1997）中摘录的：

1994年12月7日下午5时20左右，被害人莫尼卡（Monika）正通向拉乔兰（LaJolla）圣地亚哥（San Diego）加州大学的便道上跑步运动的时候遇害，她在法庭上指认，犯罪人赫纳德突然从公共地中的灌木丛里钻了出来，用头猛撞她的腹部使她摔倒。他们都摔倒在地上，犯罪人还大笑起来，莫尼卡说这笑声是“一次真正令人恶心的笑声”。据说犯罪人摸她的上身并隔着乳罩抚摸她的乳房，并用另一只手脱下她的裤子摸她的阴道。莫尼卡挣脱了这个没有带凶器的犯罪人，跑到了附近的玛兹勒酒店（Marriott），让前台接待员拨打了911。

1995年1月2日中午刚过，一个叫做简（Jane）的女子长跑锻炼后在“玫瑰谷”稍作休息。据说她停下来帮助一个妇女，她的小女儿在安抚她们的狗。当她正在拍打这只狗的时候，一个梳着马尾巴长发、戴着间有绿色、黄色和橙色条纹的黑色滑雪帽、穿着黑色滑雪外套和黑鞋的人走了过来。简意

① 原文为：CALIFORNIA v. KENNETH HERNANDEZ, 1997（译者注）。

② 有职别的犯罪分析家并不是指那些有技能、知识、经验的犯罪心理画像者（根据手中的证据分析）。一个犯罪分析家常是执法部门的文职人员（甚至是私企人员），他从事犯罪数据的绘图工作，有时也在有限的司法范围内解释或预测犯罪趋势。如道格拉斯所言（1998）：“犯罪分析家的工作现在已经不是在墙上的犯罪趋势图上用彩色作出标记这样烦琐的过程了，他们使用计算机软件只要点击几个计算机按钮就能在几秒钟内绘出通常的犯罪趋势图来。”

识到好像这个人有什么不对劲，觉得他像一个犯罪人、抢劫犯或精神失常者，因为他的穿着像是为威斯康星冬难的死者戴孝一般。这个人跟了她一段路，当她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时，这个人突然迎上前来。她挥起拳头大叫“别伤害我，别伤害我！”根据她的口述记录，这个犯罪人突然朝她左脸猛打了一拳，致使她摔倒在路边上。犯罪嫌疑人走过来扯着她的衬衣领子穿过一片空旷地往附近的灌木丛中拖，简大叫并想：“啊！天哪！我快完了，他要强奸我，强奸完后我就快死了，他要这样做么？”她被拖了将近 27 米之后，赫纳德把她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令她闭嘴并说不会伤害她，然后朝她左脸部又打了两三拳。简觉得眼前发黑，心惊胆战、浑身战栗，她想她应该对他友好一些劝阻他别这样做。她告诉赫纳德他使她想起了她的前男友，他们刚刚分手，她非常想念他以致当她碰到赫纳德时就感到非常高兴。赫纳德趴到她的身上，用屁股抵住她的胃，手搭在她的肩部，简大叫起来，她不能呼吸因为她的衬衫蒙住了她的头部，她想去吻他以便能看到他的脸。赫纳德咯咯地笑，并说：“好吧，女士，我现在就让你翻过来。”

赫纳德翻过她的身子使她腹部朝下，把她的运动裤脱到膝盖处，并脱下了她的一条裤腿，再扒下内裤。简说：“他掰开我的屁股，开始舔我，从屁股沟一直舔到阴道，我想我要崩溃了。”

赫纳德没脱衣服浑身趴在简的身上，头挨着她的左肩，在她身上摩擦他的下身。他突然停了下来，说：“好了，女士，我要走了，别嚷，别叫。”说完朝南跑了。

简爬起来开始呼救。她告诉前来营救她的人说她刚才被强奸了。简感到头疼得厉害，脖子上受了伤，脸肿了，身上有划痕、掐痕，青一块紫一块的（California v. Hernandez, 1997）。

在法庭上，州一方邀请了州的犯罪分析家凯尔恩·古德曼（Karen Goodman）来帮助认定案件中犯罪人的身份。下列陈述就详细介绍了数据库的使用以及支持犯罪分析家论断的推理过程，是从加利福尼亚上诉法院摘录的关于加利福尼亚州诉肯尼斯·赫纳德一案（1997）。

法庭举行了一场证据听证会，在听证会上犯罪分析家古德曼说，她在圣地亚哥警察部门工作了 5 年，接触过各类用于辅助司法工作的计算机系统，

从中进行犯罪嫌疑人对比、被害人画像、犯罪趋势分析等。她有理学学士学位，并在工作中不断得到培训，跟从事计算机软件编辑的人员、其他的犯罪分析家和各类侦查部门的人员学习相关知识。她解释说，计算机系统内包括各种刑事信息，“它们来自犯罪现场、被逮捕者、现场询问、传讯等”。这次用来调查本案的系统称之为“大侦探系统”（Sherlock）。古德曼还介绍了这个系统：“这是一个由犯罪分析发展而成的内部数据库。主要用于调查性犯罪，其中，我们专门收集性犯罪的数据。每起被立案的性犯罪都有大量的数据，让办公室的打字员把记录输入这一系统。这样，我们也就拥有这个系统并可随时进入它，利用它。”犯罪信息进入大侦探系统通常是在性犯罪报道后的3天至4天之内。大侦探系统在州警察部门的日常事务中每天都要使用，而且，关于性犯罪的数据库包括了每起曾侦查过、每起曾报道过的性犯罪案件。古德曼不知道那些没有立案的性犯罪是否收录其中，也不确定某些直接向圣地亚哥州州长办公室报告，并由州警察局局长负责的案件也是收录在内。大侦探系统仅包括发生在圣地亚哥州警察局权限内的犯罪案件。圣地亚哥州警察局频繁地使用大侦探系统，尤其是经常使用性犯罪的数据库。此外，大侦探系统内还存有部分谋杀案的数据，以及“惟一见证人对犯罪嫌疑人的描述”信息。古德曼认为，有时一起谋杀案往往伴随着强奸行为，这种情况就决定了在性犯罪的数据库中还有谋杀案的相关数据。

古德曼进一步解释说，犯罪分析一般是从大侦探系统的性犯罪资料中根据某些变量、特定的搜索指标等需要提取相关信息，例如，包含在大侦探系统中的变量可以是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外显特征，如身高、种族、性别；也可以是有关犯罪的特征，如日期、时间、地点、犯罪凶器；也可以是各种犯罪惯技，如“捆绑或用胶带束缚或具有明显可搜索的特征”。在本案中，她搜索了大侦探系统的性犯罪资料，但却没有在其他数据库资料中搜索。

在搜索中，古德曼准备了一张示意图，在上面显示了两条警察巡逻路线：路线125和路线114，在这两条路线上发生了犯罪案件。她进入大侦探系统搜索这两个地区的性犯罪记录，应用了一些特定的指标，如“犯罪嫌疑人不是黑人”，是“一个陌生人”，被害人与犯罪人从不相识，犯罪时间是在1994年1月到1995年6月之间。一开始她搜索出8个独立的案件。在分析每起案件

之后，她根据犯罪发生的地点、对犯罪嫌疑人的描述和犯罪惯技把范围缩小到两起在犯罪惯技上可以匹配的案件上。这两起案件正是赫纳德被起诉的案件。古德曼解释说之所以排除其他 6 起案件是因为这些案件与特殊的搜索指标并不匹配，而且其中的被害人并不是在跑步锻炼的时候遭到袭击的。例如，她排除了发生在其他地点，如不是在峡谷中而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在住所内的案件，排除了多个犯罪人、被害人是男性的案件，也排除了据报道被害人不愿追究的案件。古德曼最先接到这个案子是在 1995 年 2 月 6 日之后，是受格雷戈（Gregg）探长的委托。当时格雷戈探长正调查一起发生在峡谷中的案子，所以，她就会想到格雷戈探长处理的其他一些案子。古德曼认为从大侦探系统得出的信息表明还有另一起与之相关的案件。

在交叉询问中，古德曼证实，这两起性犯罪的比对信息源于警方的性犯罪数据库，而数据库的信息则是来源于最先的现场勘查和负责此案侦查的警察记录报告，每当犯罪记录准备好之后，其副本就呈送给古德曼的办公室。古德曼解释说，最初的数据“是由犯罪记录转换成数据信息，即概括出关键词，如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被害人的活动及双方的言语等输入数据库，从而可以帮助与性犯罪有关的侦查工作，或认定具有相同性的特殊事件、犯罪地点、犯罪时间，以及案件特征”。对袭击者的描述以及修改也都收录在数据库中，用以进行犯罪分析。古德曼认为，警察部门之外的个人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必须报案（指性犯罪），法庭也承认“或许有些人遇到性犯罪从不报案”。所以，数据库信息主要来源于警方。

古德曼承认，输入大侦探系统中的信息与事实上警官最早掌握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输入的信息可能是 911 报警电话录音中的情况，或者是告诉警官的情况，或者是告诉性犯罪侦查人员情况后经过修改的版本。”

古德曼说，大侦探系统中的性犯罪资料与其他执法机构的计算机系统没有任何联系。她认为，没有人定期检查这一系统以保证所有发生在圣地亚哥州警察局管辖内的性犯罪案件都收录在大侦探系统中。她知道，有时候某人报告的性犯罪案件是发生在很久以前，如是在 3 年之前。而这一案件只有在被警方调查之后才能被输入性犯罪记录中。她也不确定本案中发生在 12 月 7 日的侵害蒙尼卡一案的犯罪信息是何时进入的犯罪数据库的。

关于这一系统的可靠性（reliability），古德曼认为，由她的导师负责的这个系统“肯定在操作上符合程序的许可”。任何一位被委托数据处理的人员都与负责本案的侦查人员一同进行。古德曼进一步说道：“这是可信的，我敢保证所有输入大侦探系统的数据都是以年月顺序排列的，……如果乱了顺序或不在顺序之列，我们的录入员就会与性犯罪侦查部门联系以确认可能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每一个要进行性犯罪侦查的案件都会收录在这里。”

古德曼也承认，发生在这两条巡逻路线之外的案件不会包括在大侦探系统的数据中。她进一步说，她不是完全依赖这一计算机数据库来得出本案中的这两起案件具有相似性的结论，她浏览有关性犯罪的资料和警察记录是为了核实她从大侦探系统中检索出的还未派上用场的其他变量。

相反，古德曼证实，每天输入大侦探系统的性犯罪数据并不是为了诉讼的目的，而是为她、为其他的圣地亚哥州警局的犯罪分析家以及侦查人员的工作服务。在再次的交叉询问中，古德曼承认，目前还没有其他的警察机构使用大侦探系统。

最后，法庭否定了被告提出的排除古德曼证词的要求……

根据被害人的指认和犯罪分析家的专家证词，赫纳德被认定涉及6起暴力性犯罪，包括上述的两个被害人。但是，上诉法院重审了此案并撤销了原判。上诉法院认为，这些分析的方法虽然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调查工具，但却不能用在刑事审判的有罪判决（California v. Hernandez, 1997）。

加利福尼亚州诉马丁·基普一案^①

下列事实完全摘录于加利福尼亚州诉马丁·基普一案（1998）：

被害人安塔娅·霍华德（Antaya Howard）年仅19岁，在她的汽车里，人们发现了她的尸体。她被殴打并被勒死，她的尸体和衣服的状况显示这里发生了一起真实的、蓄意的暴力强奸案。案发前霍华德和被告在一起，而且在汽车里还找到了他的指纹。起诉方还提出了被告在霍华德死亡前3个月强奸并杀害了另一个年轻女子蒂弗妮·弗瑞泽尔（Tiffany Frizzell）的证据。

……

^① 原文为：CALIFORNIA v. MARTIN KIPP, 1998（译者注）。

1984年1月3日，一名停车场的管理员因霍华德非法停车而对其罚款。在此之前的12月30日也有人在汉廷顿海滩（Huntington Beach）街道上看到过这辆车停在那里。第二天，最先看到这辆车的一名女士发觉汽车内散发出一种恶臭。她报了警，警察发现了霍华德的尸体，尸体被一条毯子裹着，躺在汽车前座下面。她的外套被脱掉而且掉了一枚扣子。她的乳罩仍然扣着但被弄得皱巴巴的而且跑到了乳房上边。她的牛仔裤和内裤在脚踝附近。在牛仔裤的膝盖处、左边和后边以及霍华德尸体左上方发现了泥和灰尘。

在霍华德汽车的左右车门玻璃上和扔在前排乘客座位地板上的啤酒易拉罐上发现了几处被告的指纹。

尸体解剖医生证实霍华德是由于被勒而导致窒息死亡，而且头部的钝器伤也是促使死亡的原因。他在尸体的“左前额处、左眉处和左腿部”发现有擦伤，在左眉处、左眼皮上方、左脸胛处、左腿上、后脑勺、后背处发现了肿块。霍华德的颅骨没有骨折，但却有蛛网膜下出血。如果她不是被勒致死的话那就是死于脑出血。由于尸体腐烂，在尸体上和体内没有发现精液和精斑，但精液可能是由于自然分解而使精液和精斑不被检出。

1984年1月6日，被告因交通肇事而到拉谷纳海滩（Laguna Beach）的警察局投案自首。1984年1月10日，汉廷顿警察局的警官对被告关于霍华德被害一案进行了讯问。被告声称他不认识霍华德，但却无法解释为何自己的指纹留在霍华德的汽车里。

起诉方还提出了在1983年9月，即霍华德被杀前3个月，被告强奸并杀害另一个19岁的年轻女子蒂弗妮·弗瑞泽尔的证据。1983年9月17日，在她的长滩汽车旅馆的床上发现了她的尸体。勒她的皮带仍缠在脖子上。尸体上惟一的衣服是蒙着弗瑞泽尔的脸的一件外套。尸体被一张床罩盖着，但室内的寝具却没有任何被弄乱的迹象。在室内的电话机上发现了被告的指纹。在弗瑞泽尔的阴道内和外阴部发现了精液和精斑。1983年9月19日，在长滩（Long Beach）居民区的灌木丛中发现了装有弗瑞泽尔的衣服和其他一些个人财物的帆布包。证人洛弗德（Loveda N.）证实在被告的运货车内也曾看到过同样的帆布包，其中也装着许多同样的物品。在这个帆布包中的物品中，有一本弗瑞泽尔签着自己名字并留有被告指纹的书。1983年10月13日，被告

曾典当了弗瑞泽尔的录音机。

.....

在陪审团讨论之前，起诉方倾向于采纳上一证据，而被告方则反对采纳这一证据，即被告实施了强奸谋杀蒂弗妮·弗瑞泽尔案件的证据。起诉方认为，这一证据与证明被告就是杀害安塔娅·霍华德的凶手有关，而且当他实施犯罪行为时就有强奸和杀害的故意。被告方认为，这一证据与确定犯罪人身份和主观意图很少或者根本无关，因为两起案件的不同点多于相同点。在向法庭提交的文书中有起诉方的证据，副本中有本案先前听证会的结论，还有律师的意见，而没有别的证据。法庭认为这项证据是可以采纳的，被告方坚持认为法庭的结论是错误的。

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认为，在本案中，作为起诉被告所犯罪行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是品行恶劣的人或具有某种犯罪本性的人。然而，未被起诉案件的证据却允许在本案中提出，允许与其他事情一起用于指控本起诉案中的犯罪人，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相同的犯罪预谋与计划，以及与本案相同的犯罪故意（California v. Martin kipp, 1998）。^①

^① 通常支持起诉案件的事实却往往是未被起诉的案件，也就是说，这些案件没有记录、也没有逮捕犯罪嫌疑人。根据加利福尼亚刑事法典证据法 1101（b）部分内容，如果犯罪行为极其相似，那么为了证明犯罪人的计划、想法、预谋，起诉案件和未起诉案件（有犯罪嫌疑人，但还没有起诉的案件）的证据都可以被采纳。加利福尼亚州诉克雷格·埃沃德特（1994）一案是加利福尼亚州明确此问题的一起判例，为了证明被告犯罪的设计或计划，被告先前未被起诉的性侵犯案件的证据在后来的性犯罪案件审判中是可以采纳的。然而法庭同样认为：“只有在仅仅是为了证明犯罪人具有共同的预谋或计划，而且与起诉案件极其相似的情况下才能采纳未被起诉案件的证据。”

“极其相似”在实践中并没有严格的定义，也就是说，法庭在衡量案件的相似性时没有固定的标准。而且，根据加利福尼亚刑事法典证据法 790 部分内容，如果能证明案件具有紧密的连接性并且在犯罪中这些案件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么由同一个犯罪人在多个州实施的犯罪案件可以在一个州里审判（这可能导致一些非常不公平的因素）。

“案件具有紧密的连接性”或“在犯罪中这些案件是连接在一起的”在实践中却并没有合理的定义，也就是说法庭在证明案件的相似性时没有固定的标准。这就要借助物证来证明其相关性而犯罪心理画像此时就没什么必要了。

纽约州诉拉斐尔·多米尼彻一案^①

下列的事实摘要是从纽约州诉拉斐尔·多米尼彻一案中节录的一部分(2001):

在纽约州最高法庭审判之后,被告被判犯有三级盗窃罪、轻盗窃罪、拥有破坏自动取款机(ATM)的工具。最高法庭上诉庭(Appellate Division)认为,有理由相信未被起诉案件与起诉案件有相同的犯罪惯技。

.....

采纳未被起诉案件的证据是合理的,因为起诉案件与未被起诉案件拥有相同的明显的犯罪惯技,而且未被起诉案件证据的证明价值大大超过了本身的不确定性。在起诉案件和未起诉案件中,被告为了干扰现金提取都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手段来侵害自动取款机,进而能得到客户想提走的钱。而且这项证据也证明了被告有从一个特殊的从银行自动取款机里偷钱的癖好(preference)。

在本案中,纽约州最高法院认为起诉案件和未起诉案件中细微的差别不能成为否定未起诉案件的理由(New York v. Pafael Domenech, 2001)。

参考文献

1. Black, H. C. (Ed.) (1990) Black's Law Dictionary,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
2. Burgess, A. and HazehNood, R. (Eds.) (1995) Practical Aspects of Rape investiga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2nd ed., New York: CRC Press.
3. California v. Ewoldt (1994) No. S023804, Feb 28, 1994 (7 Cal. 4th 380). California v. Hernandez (1997) No. D024403, May 23, 1997 (63 Cal. Rptr. 2d 769).
4. California v. Kipp (1998) No. S004784, June 22, 1998 (75 Cal. Rptr. 2d 716).
5. DeHaan, J. (1997) Kirk's Fire Investigation, 4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 Hall.

^① 原文为: NEW YORK v. PAFANEL DOMENECH, 2001 (译者注)。

6. Douglass, E. (1998) "A Byte Out of Crime: Mapping Software Helps Officers Put Pieces Together",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6.
7. Feeney, F. (2000) "Police Clearances: A Poor Way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Miranda on the Police", Rutgers Law Journal, Fall.
8. Geberth, V. (1996) Practical Homicide Investigation, 3rd ed., New York: CRC Press.
9. Gross, H. (192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10. Gross, H. (1968.) Criminal Psychology, Montclair, NJ: Patterson Smith.
11. Hickey, E. (1991) Serial Murderers and Their Victims,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Publishers.
12. Lee, H., DeForest, P., and Gaensslen, R. E. (1983) Forensic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Criminalistics, New York: McGraw – Hill.
13. New York v. Domenech (2001) April 24, 2001 (2001 WL 428704; N.Y.A.D. 1 Dept., 2001).
14. O'Connell, J. and Soderman, H. (1936) Moder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5. Oregon v. Pinnell (1991) TC 85 – 1106, C88 – 0026CR; SC S35371, March 19, 1991 (806 P.2d 110).
16. Turvey, B. (2000) "Modus Operandi", Encyclopedia of Forensic Science, London: Academic press.
17. Weston, P. and Wells, K. (197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asic Perspectives,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 Hall.

第 14 章 伪造犯罪现场

Brent E. Turvey, M. S.

一名狡猾的谋杀会被巧妙地安排成意外事故，或使被害人的死亡看起来像一起自杀案件。这样的犯罪人每次都有机会伪造现场以欺骗那些不负责任的犯罪现场侦查人员。但是，系统和准确的侦查工作却能够揭露犯罪人谋杀的意图。

史文森和温德尔（Svensson and Wendel, 1974, p.293）

在上诉法庭最近的一项判决中，驳回并要求重审一起重罪谋杀案，即 1994 年在华盛顿州克拉克县（Clark）发生的一被害人在家中被人用大头棒击打致死的谋杀案（Washington v. Kunze, 1999）。上诉法庭认为，本州法庭没有进行最新的耳纹鉴定（earprint identification），这种鉴定常用来确定被告人。这种鉴定在法庭物证科学中普遍采用，该鉴定要求必须经过弗赖伊检验（Frye test）才有证据效力（Frye v. United States, 1923）。上诉法庭认为上述案件中的犯罪现场可能经过伪造，使现场看起来像入室盗窃导致的杀人现场。上诉法庭让审判法庭自行决定派两名警官（其中一名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犯罪心理画像者）去做勘查，根据他们对犯罪现场照片的观察和办案的经验进行判断。

在庫恩澤（Kunze）案件中法院的判決提醒我們，如何看待這一判決的潛在意義。它還提出了某些重要的議題，即在庫恩澤案件中法院未加以深入探討的重大問題。首先，對偽造犯罪現場的研究資料是否充分？其次，偽造犯罪現場的定義是什麼？並且有公認的依據嗎？最後，需要什麼樣的技术評估偽造犯罪現場才能使法庭采信呢？本章闡述的目的在于，說明這些問題並也為相關的新研究提供實踐基礎。希望這將給犯罪心理画像者、偵查人員和法庭物证技術人員了解、勘查和再現偽造犯罪現場提供輔助性的手段，為進一

步更好地研究这一课题打下基础。

文献综述

对伪装（simulated）或伪造（staged）犯罪现场的定义是：现场有关证据已经被犯罪嫌疑人有目的地变动，以误导警察或者误导侦查方向，这种犯罪现场叫伪装或伪造现场（simulated or staged crime scene）（Geberth, 1996, p. 20）。尽管伪造犯罪现场现象经常发生，^① 但是犯罪心理画像者、刑事侦查和法庭物证技术人员往往在出版的著作中忽视对该问题的研究。^② 最令人吃惊的是，笔者发现在很多出版的著作中除笔者有此单独论述外并无他人发表过涉及伪造犯罪现场的研究。^③

格罗斯

格罗斯博士是奥地利法学家，他早在 1924 年的著作中就写道（Gross,

① 在此提到的伪造现场经常发生的观点来自笔者在工作中涉及的伪造犯罪现场的经验，其中主要涉及各类强奸和杀人案件，这些观点也来自笔者与警察同事和物证学家对该课题研究的交谈。在此提到的经常（frequently）意味着始终如一（consistently）。在任何案件中，他们都有相同的、明显的犯罪惯技特征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② 见以下这些作者的著作：道格拉斯和穆恩（Douglas and Munn, 1992）；格伯斯（Geberth, 1996）；格罗斯（Gross, 1924）；康奈尔和索德曼（O'Connell and Sodemman, 1936）；史文森和温德尔（Svensson and Wendel, 1974）；特维（Turvey, 1999）。译者注。

③ 笔者以前曾研究过一个真实的伪造案例。尽管这样的案例分析结果对学术研究是很有实用价值的，但笔者却没有提到将案例分析成果出版发行。在伪造现场问题研究的出版物中，有两个问题需值得注意：首先，阿德尔和都伯森（Adair and Doberson）在著名的《法庭科学》杂志上写了一篇关于一起自杀吊死现场被伪造成凶杀案件现场的案例评析。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声称，在相关的法庭文献中找不到将自杀吊死现场伪造成凶杀案件现场的案例分析。但是格罗斯早在 1924 年就提到过这样的案例。其次，欧洲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通常是用使用伪装（simulated）而不是伪造（staged）术语，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术语的选择说明了阿德尔和都伯森（1999）并不知道格罗斯（1924）的研究。另有两篇文章探讨了这一问题：一篇是哈雅斯（Hayase）、马索莫托（Matsumoto）和雅玛莫托（Yamamoto, 1998）就 1 名女性和 3 名儿童被勒死的案例作了研究分析。在这个案例中这名女性被勒死，警方怀疑她是被伪造成自杀的被害者。但最终结果表明在这个案件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现场伪造痕迹。另一篇由玛拉池和朴拉克（Mallach and Pollak, 1998）撰写的案例分析。这是一个 58 岁的被害人被他 23 岁的儿子用电线勒死后伪造成自杀现场的案例。

p. 493):

只凭个人对现场的观察，无论花费了多大的心血、时间和注意力，都无法明察秋毫，特别是洞悉其中的矛盾。但只要我们着手把现场图准确清晰地画在纸上，则上述特征与矛盾就跃然纸上。

……伪造犯罪现场的“马脚”就是那些矛盾的和不可能情况，当一个人想改变事物的本来面目时必然会出现上述情况，不论作案者如何处心积虑，事先作了何种有远见的、巧妙的安排。

在此，格罗斯指出，精心的、深思熟虑的、耐心的工作在刑事侦查中犯罪再现^①和识别伪造犯罪现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特别指出，单凭目测现场是不够的，只有把自己的勘查意见写成书面报告才有用处。而且，他还根据犯罪人遗留在现场的必要的、逻辑的证据来深入讨论犯罪嫌疑人在努力营造伪造或模仿的犯罪现场时通常最容易出错的一些地方。格罗斯发现即使犯罪嫌疑人精心地伪造犯罪现场，也会出现上述错误。凭借犯罪现场中被遗留下的物品就可以从一方面推断该犯罪嫌疑人可能缺乏实际作案经验，但是本文后面的内容还将说明：情况也并非尽然如此。

在格罗斯的早期著作（1924，pp. 13 ~ 15）中，格罗斯曾告诫刑侦人员：不要被“先入为主的想法”（preconceived theories）所左右。他讨论了那些谎报被强奸、被攻击或被伤害的人甚至不惜通过自残以达到敲诈钱财、掩盖通奸导致的怀孕案件。他曾研究过伪造现场的各种可能情况，包括报假案的可能后果和侦查人员相关的责任。他论述道：

在侵财案件中，最常见的伪造犯罪现场是盗窃案和纵火案。在第一种案件中，大量财产的丢失和违背信誉常常是窃贼利用伪造现场来解脱的借口。通常，识破这些虚假的现场不是很难。对于刑事侦查人员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提醒他们自己时常要意识到窃贼常常会伪造现场。在很多案件中这一点必须要阐述清楚。不过也没有必要马上提出疑问，先稳住伪造现场的对方，然后

^① 犯罪现场再现是再现当时犯罪活动情景的一种判断（Chisum，1999）。犯罪现场再现是经过专业培训并对法庭物证科学有深刻理解后所掌握的一种技能。正如奇瑟姆（Chisum）和特维在2000年所讨论的那样，“由于各种复杂的证据和场景的变化，犯罪现场再现极需广泛法庭物证科学知识背景。如果对证据的考察和检验没有什么争议的话，那都是非常客观的。小说中的福尔摩斯称之为“一种特殊的推理能力”。

对犯罪现场的每个地方进行认真的检查。应先考虑一下，如果盗窃案属实，后果是什么，然后自问一下，如果是报假案，结果又将怎样。刑事侦查人员不应该由于被害人的地位显赫，或事出有因，或因为现场被巧妙伪装过而不进行认真的勘查。不仅要把自己伪造现场的“被害人”揭露出来，同时，被怀疑的无辜者也应该受到警方保护。

后来，格罗斯给读者提供了一些伪造犯罪现场的案例。这些案例中包括一起自杀现场经过伪造看上去像是因为图财而被杀的现场（Gross, 1924, p. 432）；一起故意杀人现场为掩盖罪行经过伪造看上去像自杀现场（p. 437）；一起因病死亡的现场为掩盖护理者的失职而伪装成自杀的现场（pp. 439 ~ 440）。这些案例不仅为教材提供案例研究，而且，还可以作为曾出现过的伪造犯罪现场实例使我们增加感性认识。

很有意思的是康奈尔和索德曼（1936）以及史文森和温德尔（1974）在各自的参考书中都提到了格罗斯（但在正文中没有直接引用其观点）。纵览当前的各版本著作几乎都不提格罗斯的观点。

康奈尔和索德曼

康奈尔和索德曼在他们的著作（1936）中为刑警提供了各种侦查方法。在第17章“谋杀案侦查”中详细论述了刑事侦查中自杀和他杀的差别（pp. 260 ~ 277），他们讨论凶手通过悬挂死者的方式来掩盖他杀痕迹，认为，“悬挂死者的痕迹和勒死他人的痕迹很相似”（p. 264）。他们尤其讨论了再现犯罪现场对确定案件事实的重要性，包括在勒死案件中利用古德弗罗的方法（Goddefroy's method）：

在勒死案件中对绳索的仔细检查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线索。比利时侦探古德弗罗（Goddefroy）对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在近几年里，欧洲对于这类不多的案件正是通过对绳索的仔细检查破获的。绳索的纤维走向一般与绳索用力拉的方向是对应的。如果一个被害人沿绳索向下滑动，那么纤维分布的方向也是直接向下的。如果是非自愿的勒杀即谋杀，谋杀者用力向上勒，那么被害绳索的部分纤维将会是直接向上走向的，原因是由于绳索与皮肤的直接接触。

康奈尔和索德曼（1936）继续探讨，在身体伤害案件中，如何从伤口和

伤害形态中发现矛盾的重要性（p. 266）：

如果在身体其他部位同时发现暴力痕迹（除了通常自杀行为所施加的部位），那就可以排除自杀中未得逞的试验伤，那就意味着他杀。

康奈尔和索德曼（1936）确实给读者提出了一些伪造犯罪现场的简短案例。这些案例就是他们所称的“伪装的犯罪现场”，其中包含一个他杀的案件被伪造成从高处摔下来的现场（pp. 269 ~ 270）和一部分入室行窃的伪造现场（pp. 322 ~ 324）。这些案例后来都是被当成趣闻来看待的，在出版发行的学术研究中都没有这方面的介绍和说明。

史文森和温德尔

他们关于各种犯罪现场勘查方法的著作主要是写给刑事侦查和法庭物证技术人员看的。史文森和温德尔（1974）主要讨论了伪造入室盗窃的现场，如何区分自杀、他杀和意外事件等问题。他们关注各种类型案件的不同物证的系统分析和比较。

在伪造入室盗窃现场的问题研究上，史文森和温德尔的观点（1974）和格罗斯的看法基本一致，他们认为：

若要成功地伪造入室盗窃现场，并能骗过警察的现场勘查，伪造者必须将现场尽可能地伪造得看上去很真实自然，否则在事件发生的顺序上就会有漏洞。

文中用大量的篇幅论述道，细致的、专注的侦探从一开始就必须认真对待每一现场。侦查人员将再现那些收集到的物证，判断事实，查明真相。因此，作为现场伪造者在改变现场物证时同样需要细心和专注。至于究竟对现场进行多少程度的改变就足以把侦查员导入歧途，这虽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却是我们想知道的课题，正如其他课题一样，它肯定视情况而变化，这确实值得探讨。

在区分自杀、他杀和意外事件问题上，史文森和温德尔的论述也与前面阐述的观点相似（1974，p. 293）：

一个聪明的作案人可以很好地安排一起意外事件，或是故意杀人案件现场看起来像一起自杀事件。这样的凶手伪造现场往往很容易欺骗那些对现场勘查不认真的刑侦人员。但是系统的、全面仔细的现场勘查就能拆穿凶手真

正的杀人意图。

侦查人员必须要搞清楚的几个问题：

1. 死者真正的死亡原因是什么？
2. 被害人本人有可能实施自残行为或采用某些手段达到自己致死的结果吗？
3. 现场有挣扎的迹象吗？
4. 作案用的凶器、工具或是物品在什么地方摆放着？

史文森和温德尔继续深入讨论有关犯罪现场再现的重要性，因为犯罪现场再现可以回答上述问题及相关问题。讨论的主题从血迹模式分析、伤口模式分析，直到移动或弄乱家具等情况进行分析。同样，这类讨论也只是作为趣闻来谈，没有正式出版过研究成果。

道格拉斯和穆恩

他们关于伪造（staging）的定义（1992）在其他资料中从没有被引用过，也不被研究者们所接受。他们将伪造定义为：为维护被害人的名誉及其家庭的名誉而实施的改变现场物证的行为。

伪造现场是指有人在警察到达现场之前有目的地改变犯罪现场。实施伪造行为的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搅乱案件侦查的逻辑方向，二是保护被害人或是被害人的家人。

本定义的问题在于，作为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的个人保护性行为本身并没有犯罪的企图或目的。被害对于“伪造”一词，在历史研究文献中一直是指：通过犯罪人的有意行为改变或呈现全新的现场环境，不仅隐藏现场证据，而且也隐藏真正的作案现场。例如，一位作案人强奸并勒死一个被害人，然后将死者尸体放进被害人的汽车里，在一条偏僻的公路尽头放火烧毁了汽车。这通常被认为是犯罪人的一种反侦查措施。^① 如果同样的作案人不是纵火烧毁了汽车而是将死者放进车里，松开刹车，然后将汽车推下悬崖，这样看上去

^① 反侦查行为（precautionary acts）是指犯罪嫌疑人为了有意识地搅乱、阻碍或挫败警方的侦查或物证的检验，以避免暴露他们的身份或与案件的关系，作案人在作案前、作案中、作案后都会采取所谓的反侦查行为（Turvey, 1999, p. 445），这一术语可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反侦查行为，如伪造犯罪现场就是其中的一种反侦查行为。

就像一起汽车意外事故。后者实施的行为就是犯罪现场伪造行为，可以看做是一种特殊的反侦查措施。

道格拉斯和穆恩列举了他们认为要考虑的因素，以帮助辨别伪造的现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问题：

1. 作案人从现场拿走了不该拿走的东西吗？
2. 现场入口的选择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3. 凶手作这样的案件有很高的危险代价吗？

红色标志（redflags）：

1. 妻子或孩子遭到致命的伤害而丈夫却没有受伤，或没有受到致命伤而逃脱。
2. 作案人首先攻击的不是对他最有威胁的人。
3. 对犯罪人威胁最大的人遭受到的伤害最小。

道格拉斯和穆恩（1992）对上述观点没有提出什么数据来证明，而是引用案例来证实。他们对伪造的纵火案件现场也提出了上述观点（pp. 255 ~ 257）。但在这一章中他们没有引用国内相关的学术观点，在其他的章节中也没有提及伪造犯罪现场的问题，而是在著作的结尾按字母顺序列出了一长串引文。（Burgess et al.，1992，pp. 357 ~ 360）

道格拉斯和穆恩讨论如何应用这些研究性的红色标记是相当有意思的，他们论述道（p. 253）：

一个作案人伪造作案现场时通常会出错，因为作案人按照他自己认为的现场方式去伪造现场。……在现场会露出明显的矛盾之处，这种矛盾之处可在法庭辩论中发现，也可以出现在各犯罪场景中。这些矛盾之处常常被作为伪造现场的“红色标记”，用来提醒侦查人员注意或防止出现错误的侦查方向。

这段论述让我们想起格罗斯（1924），他也详细讨论过：如何识别犯罪现场中的矛盾之处，并通过现场物证的记录如何判断。

格伯斯

在他专为凶杀案件侦查人员编辑的第三版《凶杀案件侦查》（1996）一书

中，他通过5个独立的案例来分析各种类型的现场伪造问题。他写道：

从事凶杀案件侦查的人员应该时刻想到犯罪现场事实上可能已经被凶手伪造过，这将会误导警察的侦查方向。

格伯斯（1996）提出10条侦查策略，这对于识别那些可能是伪造的犯罪现场会有帮助：

1. 对于已经死亡的被害人进行评估；
2. 通过对被害人的受伤类型与伤口形式来判断凶手使用的凶器类型；
3. 采用必要的法庭物证检验来确认和证实案件的真相；
4. 采用凶器检验措施，包括弹道和凶器性能测试来寻找潜在的证据；
5. 评估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有关行为；
6. 通过访问被害人的朋友和亲属对被害者进行描述；
7. 重现和评价相关事件；
8. 把现场勘查的发现与法医检验获取的证据进行比较，并与法医交流意见；
9. 用事实证据核查各方陈述的真伪；
10. 把每起死亡案件的调查都视为凶杀案件来调查。

格伯斯这些策略不仅有时是模糊不清的，它涉及的内容也多是重复的。例如，第1条和第6条基本上是一个问题（何况只有先掌握被害人的材料后才能对之加以评定，看来作者是本末倒置了）。第2条和第4条是第3条和第7条的一部分。第3条和第7条基本上是一样的。第2条是第8条的一部分。第5条和第7条是一个意思，并能通过第2条、第4条、第8条、第9条来完成。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一样，这些策略对画像工作者和侦查员并没有多大的帮助，但并不是说上述的每条策略都没有价值。而是这些策略本应该有内在的整体性，更简短或更简洁，要么更具体或更详细。

有趣的是格伯斯（1996）最后提出的结论：不断上升的伪造犯罪现场的数量肯定和媒体中大量渲染杀人案件及侦查报道有关。这些媒体包括新闻报道、犯罪案件纪实、电视转播以及电影宣传等。但他没有提出证据来说明这些伪造现场数量在不断上涨，更没有解释这些案件的产生与凶手通过媒体获

取凶杀案件的信息有必然联系。在格伯斯（1996）著作的末尾仅有3个案例。^①然而，这本书也没有提到是谁最先提出了“伪造犯罪现场”的概念，如格罗斯（1924）或康奈尔和索德曼（1936）。

特维

在本文的第一版中，特维（Turvey，1999）仅用一页来阐述伪造犯罪现场，没有详细的解释（p. 142）。本书作为第二版则用了一章对现在最流行的两本有关的伪造现场研究的著作进行介绍，这两本书分别是道格拉斯和穆恩于1992出版的书和格伯斯1996出版的书。然而这些书中所作的介绍并没有给读者提供案例，也没有对伪造现场提出什么新颖的观点。^②

文献综述概括

许多作者往往把伪造现场当做佚事而很少认真研究，因而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出版物极少。但是，格罗斯博士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对伪造现场做过论述，这些论述至今仍然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他提出：每个案件的侦查人员都要认真地检查现场的物证，并通过现场物证与被害人陈述和证人的证言加以比较确认。再现犯罪现场过程，不能先入为主下结论。^③至于什么是伪造现场

① 格伯斯（1996）认为只有3本读物可选择：第一本读物即第二版的《谋杀案侦查》，该书根本没有谈及伪造犯罪现场。从第二版与第三版相比可看出，第二版的内容结构要么太冗杂，要么太陈旧，有种让人糊涂的感觉。而第三版就值得一读了。第二个读物是格伯斯写的一篇关于伪造犯罪现场的文章（Geberth，“The Staged Crime Scene”，1996），这篇文章既没有引用什么案例，也没有什么参考书目，只是在论文的结尾处说明该文的材料出自《实用凶杀案件侦查第三辑》。这些材料不仅看起来是多余的素材，没有必要作为附加读物去看（因为它直接来自于介绍的文章）。第三本读物也是格伯斯写的一篇关于凶杀案件的侦查和审判的文章（Geberth，1996）。

② 回顾过去，正是各种因素聚集在一起才使笔者有兴趣来准备这一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在笔者处理的案件中大量的伪造现场案件；其次是自从格罗斯（1924）出版发行有关伪造现场的书籍后，现在很少有这方面的研究。后来主要由特维来根据文献回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③ 令人好奇的是，格罗斯和其他作家在他们的早期作品里的观点很少在现代的一些著作里被提及，当谈及伪造犯罪现场这个问题时这些作家基本上都不谈论其他人的观点。这给现在的学生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即这些观点的来源都归功于现代的作家，其实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的概念在文献中并没有统一的论述，只有个别的书中对其作出了不太准确的界定（Douglas and Munn, 1992），而且这一定义也没有提供根据哪些物证予以界定。最后，不言而喻的是，判断一个现场是否是伪造的现场，关键在于要根据客观的物证进行犯罪再现才能作出判断。就法庭审判而言，一个案件是否具有伪造现象则需要由司法科学家（物证技术学家、犯罪学家、法医学专家等）作出判断，因为他们有资格从事现场物证再现；另外，还可以包括那些接受过法庭科学和现场再现较高层次的专业培训的侦查人员。^① 如果让非专业人士参与现场分析，并对法庭审判提出有关建议，这将是非常危险的。

法庭上的伪造证据

如前所述，关于伪造犯罪现场问题必须听取专家证言，专家证言已经成为法庭证言中的特殊部分。近年来最有名的案件可能是由笔者参与的俄亥俄州的萨姆·舍帕德庄园诉俄亥俄州一案（Estate of Sam Sheppard v. state of Ohio）。在本案中，州一方聘用了已退休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格雷格·麦克格拉雷（Gregg O. McCrary）提供伪造现场的专家证言。尽管麦克格拉雷声称“在他的犯罪现场分析中还没有出错过”，但是本案的法官认为他的证言并不具有确切的可靠性。法官要求麦克格拉雷介绍一下伪装现场的基本情况，而不是证明舍帕德谋杀案（Sheppard murder）已经被伪造（McKnight, 2000）。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提供专家证言。要了解这个案例更多的情况，参见本书的附录二。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类专家证言的特点和他们的立论基础，就需要考察下列最近的刑事案件。下面两个案例中法庭都赞成运用有关伪造现场的专家证言：

^① 作为一名警官必须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和实践经验，而不是要求警官一开始就能具有判断现场是否伪造的能力。对伪造现场的判断能力只能通过犯罪再现活动才能得到提高。这就要求警务人员必须了解并更好地应用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批判性思维并运用科学的方法（包括假设检验）来解释犯罪现场的证据。正如科克和桑顿（Thornton, 1974）告诫我们的：“大量的经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从经验里学到多少东西。”

詹姆士·麦考坎被殴打致死一案^①

这起案件涉及起诉 50 岁的大卫·韦恩·库恩泽（David Wayne Kunze），因为他在 1994 年将詹姆士·麦考坎（James McCann）——他前妻的未婚夫殴打致死。下列事实概要是从华盛顿州起诉大卫·韦恩·库恩泽案件（1999）中摘录的：

在 1994 年 12 月 16 日凌晨，一个犯罪人 [见 1 号档案] 闯入了詹姆士·麦考坎在克拉克地区（Clark County）的家中。麦考坎睡在主卧室中。他的儿子泰勒（Tyler），13 岁，睡在另外的卧室中。犯罪人用钝器猛击麦考坎的头部，造成他死亡。犯罪人同样袭击泰勒头部，引起他头骨折断。当犯罪人离开后，泰勒爬出来到了前面的走廊，天亮以后他在那里被一个行人发现。

1 号档案：或许不止有一名犯罪人。但为了方便，我们假定只有一个。

.....

来到房间里，警察注意到犯罪人已经打开了抽屉和橱柜，但却没有翻动里面的东西。他们还发现犯罪人已经拿走了一台电视、一台录像机、立体声扬声器、“音箱”、装着麦考坎的身份证和信用卡的钱包、麦考坎的卡车和其他的各种物品。

.....

警察很快就注意到库恩泽，尽管与泰勒对犯罪人的描述不符。库恩泽与黛安娜·詹姆士（Diana James）的婚姻从 1976 年一直维系到 1994 年 4 月。在 1994 年 12 月 12 日，也就是在犯罪人进入麦考坎家的前 4 天，詹姆士告诉库恩泽她跟麦考坎正在筹划结婚的事。根据库恩泽自己以后的陈述，当时他深受打击。

.....

在重新审理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一审法庭是否错误地允许两名警官在审判中作证，即证明犯罪现场已经被伪造成盗窃案现场来驳斥库恩泽的辩护。库恩泽认为“警官的经验可能支持犯罪现场不像一起典型的盗窃现场”。然而他认为，“不像并不等于就是‘伪造’”。

^① 原文为：THE BEATING DEATH OF JAMES MCCANN, 1994（译者注）。

副警长爱尔兰·诺兰（Erin Nolan）、克拉克郡府的一名侦探作证说，她到过犯罪现场，她看到除其他的物品外，有切断的电话线和已经打开却没有翻动的抽屉和橱柜。她认为现场是不寻常的，并且“可能已经被伪造”得看起来像盗窃案件一样。罗伯特·格伯（Robert Gebo）警官、西雅图警察部门的一名侦查人员在看过现场照片后也提出了相似的意见。

根据记录，诺兰和格伯只是说，根据他们对犯罪现场或现场照片的个人观察，他们认为犯罪现场是非常规的、有可能被“伪造”。尽管他们是根据个人的知识和经验作出判断，但事实上，他们的证言非常容易让陪审团接受。我们认为，每个人的意见都有合理的知识背景，法庭也有其合理的判断，即哪些意见对陪审团有帮助，因此，法庭并没有滥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权。

尽管法庭采纳了伪造现场的证言，但对库恩泽原来的判决于1999年被推翻，因为被起诉方提出的耳纹证据并不科学。在2000年3月对库恩泽案件的第二次审理期间，先前的检察官作为辩护方的证人坚决认为原来的审判是无效的。结果法官也认为这是无效判决。截至本书出版为止，对库恩泽没有新的指控记录，他已是自由人了。

桑迪·史蒂文和默特尔·威尔森被勒死一案^①

这起案件涉及对威廉·R. 史蒂文（William R. Stevens）的起诉，因为他涉嫌两起一级谋杀和一起严重抢劫，导致他的妻子桑迪·史蒂文（Sandi Stevens）和他的岳母默特尔·威尔森（Myrtle Wilson）死亡。每起案件都被判处谋杀罪，他接受了死刑处罚（田纳西州诉史蒂文案，2001）。下列事实概要摘录自田纳西州诉史蒂文案（Tennessee v. Stevens）（2001）：

1997年12月22日在桑迪·史蒂文和默特尔·威尔森各自的卧房里发现了她们的尸体。桑迪·史蒂文的尸体全裸着躺在她的床上，在她的头部附近有几本色情杂志和一个装有她裸体照片的相册。默特尔·威尔森的尸体也是在她的床上发现的。她的睡衣已经被拉了起来，并且她的内衣裤扔在了地板上。法医认为默特尔·威尔森是死于刺伤和用手掐勒，而桑迪·史蒂文则是被捆绑后闷死的。桑迪·史蒂文的一些物品从拖车上被拿走，由此，本案被

^① 原文为：THE STRANGULATION DEATHS OF SANDI STEVENS AND MYRTLE WILSON, 2001（译者注）。

告以涉嫌抢劫罪被指控。对被告这些犯罪行为的定罪是以连续行为的刑事责任理论为基础的。在审判中，州一方有证据证明被告雇用了他 18 岁的邻居和他的雇员科瑞·米里肯（Corey Milliken）去杀死他的妻子和岳母，使现场看起来像发生了一起抢劫案。被告认为，科瑞·米里肯编造了“雇佣谋杀的想法”，事实上，他杀死桑迪·史蒂文和默特尔·威尔森是为了实施性侵犯。

大都市警察局的侦探布兰特·科科伦（Brad Corcoran），在 1997 年 12 月作为一名现场勘查人员被委托进行物证鉴定。他同瑞·雷达（Ray Radar）一同勘查了犯罪现场。科科伦作证道，他发现在主卧室床上桑迪·史蒂文的尸体旁边放着并打开的色情杂志。他还看到装有桑迪·史蒂文裸体照片的相册。他和瑞·雷达警官试图获取指纹，并且他们从犯罪现场提取了大约 30 枚新鲜的指纹，包括在杂志和照片相册上的指纹……

科科伦侦探对附近拖车下面发现的绿色帆布包的物品照片进行了鉴定；包里有一把沾有血迹的 20 厘米长的厨房或屠宰刀具；沾有血迹的白色 T 恤衫、各种珠宝、众多的药丸，并且有一架焦距为 35 毫米的照相机。

在交叉询问（cross-examination）中，科科伦侦探证实，这一犯罪现场与他曾经勘查过的其他性犯罪现场、有全裸也有局部裸体的性犯罪现场有共同之处，但他不能肯定，其他的性犯罪现场是否就像这一现场。他说道：“在我看来，整个的犯罪现场似乎被伪装过。”他解释说，圣诞树倒在一边，但是树上的玻璃球却没有一个是碎的，显示树是被放倒在那儿的而不是被击倒的。在默特尔·威尔森的房间里，钱包里的东西被扔在地板上，但这些东西好像没有被拿走或挪动。另外，在威尔森太太的房间里，一个梳妆台的抽屉已经被打开，但好像没有任何东西是被“匆忙地挪动或拿走”。在桑迪·史蒂文的房间里，洗手间的衣服已经被拿出来并且简单地扔在地板上，床上的东西看起来一直放在那里。侦探科科伦证实没有犯罪人破门而入的证据。

……

侦查人员帕特·帕斯蒂格莱（Pat Postiglione），一位大都市警察局凶杀案侦查组的警官，他也作为桑迪·史蒂文和默特尔·威尔森谋杀案侦查人员之一在法庭上作证。他曾押送科瑞·米里肯去医院进行强奸试剂检测，他解释，这是在涉及女性谋杀案件中的标准程序，特别是在本案中发现了两名女性被

害人。一名被害人是裸体的，而另一名被害人局部裸体——她的睡衣已经被拉了起来，并且她的内衣裤被扯掉。由于可能涉嫌性犯罪，所以，他们还专门请来负责性虐待案的帕蒂·古德曼（Patty Goodman）侦探，他也被叫到犯罪现场。古德曼则解释一种“待奸”（displaced）的现象，他提出，本案受害人被摆在“待奸的姿势”上，如平躺着、四脚伸开、裸体的被害人。他说桑迪·史蒂文的尸体就处在“待奸”的位置上。她裸体睡在床上，头部附近放着几本色情杂志。在她的膝盖上有血迹，但她没遭刺伤。史蒂文膝盖上的血可能来自威尔森女士，她遭受过刺伤。然而，帕特·帕斯蒂格莱侦探认为，“待奸姿势”是在性攻击中发生的，然而，一个没有被性侵犯的人也可以被“有意地”摆放在“待奸”的姿势上。他说，在本案中他不能确定是否发生过性侵犯，因为他不是最初进入现场的侦查人员。

侦探帕斯蒂格莱证实，在默特尔·威尔森的房间内，以及在床附近有搏斗的痕迹，但是，在客厅里的现场似乎已经被伪造了。圣诞树倒在一边，树上的玻璃球却一个都没有被打碎或散落在房间里。

侦查人员艾尔·格雷（Al Gray），也是一名大都市警察部门负责凶杀案件的警官，他是本案侦查的主管。他说，当他到达犯罪现场时，他徒步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他没有看到任何破门而入的迹象。他相信有人已经试图伪造犯罪现场以使它看起来像盗窃现场。他证实了在威尔森女士的房间里，抽屉被拉开，但是抽屉的物品没有被弄乱。在客厅，树被撞倒并且圣诞礼物的包装纸被拿走，但礼物却没有被拿走。橱柜里的物品被扔到地上，但还带着挂衣钩。在房内的一些地方，甚至根本没有太大混乱，如书房，整个房间就像由汽车拖动的房屋，虽有变化但基本是原貌。

艾米莉·沃德（Emily Ward）博士是戴维森县医检室（Davidson County）的一位病理学家，在犯罪现场，她检查了默特尔·威尔森和桑迪·史蒂文的尸体并进行了解剖。她认为，被害人是在1997年12月22日上午4时至上午7时之间死亡的。威尔森是因犯罪人用手闷以及胸膛的刺伤而死的。尽管刺伤“相当的浅”，但却导致大量失血。威尔森手上也有自卫的创伤。沃德医生说用做证据的刀和威尔森身上的伤口是相匹配的。

本案的被告聘请了以前的美国联邦调查局顾问格雷格·麦克格拉雷

(Gregg O. McCrary) 对本案的犯罪现场进行刑事侦查分析，涉及犯罪现场分析，被害人研究、判断哪些因素导致被害风险出现，查阅法庭相关文件，据此考虑犯罪是如何实施的。在本案中，他证实，他提供了“犯罪现场的照片和一盘录像带，以及法医的报告”(Tennessee v. Stevens, 2001)。在决定证据可采性和可靠性的听证会上，他说：

……犯罪现场杂乱无章。犯罪现场显得缺乏控制，整个现场像个垃圾场：衣服被扔到地上，钱包和药丸被废弃，物品散落一地，圣诞树被撞倒，在实施谋杀案中，所有这些都并非必需的。

麦克拉雷说“性犯罪”是一种暴力犯罪，其中，性是作为一种对被害人进行惩罚、贬低和侮辱的工具。他解释“伪造”是犯罪人对犯罪现场的故意改变，以干扰警方的侦查思路。在伪造期间，犯罪人试图通过将犯罪现场伪造得看起来像别的类型的犯罪现场而隐藏真实的犯罪动机和具体的犯罪事实。他还说“转移的血迹”(transfer blood)是指身上有血的犯罪人接触到别的物体而留下的血迹。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血迹转移的模式是非常明显的，并且与特殊的衣服或物品相关联。麦克拉雷证实犯罪现场的手印、足迹，以及头发样品是非常重要的。另外，麦克拉雷说将犯罪人的认罪与犯罪现场发现的证据结合起来也非常重要。

麦克拉雷证实基于犯罪现场的观察，很可能有数名犯罪人。首先，用不同的凶器杀死被害人：威尔森女士被刺，而史蒂文女士遭到了捆绑闷杀。其次，在史蒂文女士房间里并没有许多转移的血迹，本来认为应该有很多的，如在药丸瓶子上或在床上的色情杂志上。这些物品是犯罪人不得不接触并放在床上的，但是却没有一点的血迹转移。另外，犯罪现场的“伪造”似乎已经完成了，而扔到拖车上的物品却没有任何血迹转移。麦克拉雷证实犯罪人试图“伪造”以使犯罪现场更像一起盗窃案件的努力很不充分。他说，窃贼不需要将衣服和其他物品到处扔。

被告的辩护律师问麦克拉雷，色情杂志是否被“用于性犯罪”？他回答道，性犯罪的动机是惩罚、贬低、耻辱被害人，“色情文学放在被害人附近……哦……按照我的看法，最好被解释为一种对被害人的进一步贬低和耻辱，并且，它是性犯罪的动机”。

.....

辩护律师要求麦克格拉雷对犯罪现场作进一步的分析，包括对来自犯罪现场的物证分析来判断犯罪的动机。麦克格拉雷特别提到，他没有得到有关犯罪人的任何信息，他也没有参与过犯罪心理画像，以判断未知犯罪人的心理特征。麦克格拉雷仅对犯罪现场作了分析。他将这一犯罪现场描述成一种“无组织力的性谋杀现场（disorganized sexual homicide）”。他认为，桑迪·史蒂文是主要的攻击目标，而且是性袭击的焦点，而默特尔·威尔森仅仅是一个机会型被害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麦克格拉雷解释说，在无组织力的谋杀案件中，犯罪人认识被害人及知道被害人所在的位置，而且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没有什么人际间的接触，经常使用“闪电式袭击”或突然的暴力。犯罪现场一片狼藉。犯罪控制的程度较低。性行为往往在被害人死亡之后发生，被害人尸体上就会出现死后伤，并显示出奸尸的痕迹。他认为，在无组织力的谋杀案件中尸体会留在现场，非常容易发现，而且现场留有大量的物证。谋杀所用的凶器通常从现场获得。在无组织力的谋杀案件中，有时是突然紧张的事件刺激引发了暴力行为，而且，犯罪通常是承受突然紧张事件的犯罪人将愤怒情绪转嫁给被害人的过程。

麦克格拉雷对比了无组织力的犯罪现场与有组织力的犯罪现场，后者较典型的是“雇佣杀人”（contract killing），这样的案件中，犯罪人与被害人通常是陌生人。在犯罪发生前常常有一定的交往接触过程，如欺骗或使用诡计来引诱被害人。有组织力的犯罪现场可反映出犯罪人完全能控制现场；控制类的工具经常可见；在被害人死亡以前就有攻击行为；尸体通常被隐藏，有时尸体也固定摆放或摆出令人惊恐的状态；犯罪的凶器是经过选择的，是由犯罪人犯罪前带到现场、犯罪之后又将其带走；犯罪人对证据非常在意，他们通常会移尸。

麦克格拉雷又被问道，这种分析能否有一个其准确程度的比率估计？他回答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犯罪现场分析和犯罪心理画像结论的准确性是75%~80%。他解释道，这类分析“不是一门非常严格的科学，因为它不能像科学实验那样控制影响实验结果的所有变量”。但是此类服务日益增多的要求显示出它的有效性。麦克格拉雷证实，当

他首先进入这个部门时只有 7 个顾问，当他离开时已有了 12 个顾问，而现在却有大约 40 个顾问。他说：“证据被接受的过程本身就是说明它的有效性（validation）和可靠性。哦……它一直在被使用而且需求大大超过我们所能提供的范围。”

麦克格拉雷在听证会上所作证言的结果是审判法庭在审判中不采纳他的证词。因为证词涉及的是“犯罪人的行为方面而不是犯罪现场”。法庭认为，关于犯罪人行为方面的证言不符合田纳西州证据规则第 702 条“只有在确信无疑的情况下才能被审案法官所采纳”的规定（*Tennessee v. Stevens*, 2001）。

审判法庭允许采纳麦克格拉雷对犯罪现场的证言，包括现场的伪造情况，两个人作案的可能性，以及警方应采取的工作。但法庭不允许他提出对于犯罪动机的看法（*Tennessee v. Stevens*, 2001）^①：

麦克格拉雷提出的大部分证词涉及在犯罪现场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例如，他总结出了许多伪造的模式：各种家具物品被小心地移动、放置、损坏或破坏，或者现场被改变、故意弄得狼藉不堪以扰乱视线、迷惑警方。法庭认为这种证言具有充分的可靠性可以呈送给陪审团。然而，麦克格拉雷有关犯罪动机的证词，虽然也是基于部分物证作出的判断，但看起来有更多的臆断成分。

在陪审团退庭听证会期间，麦克格拉雷承认，就他所知，美国还没有一个法庭曾采纳犯罪心理画像的专家证言。犯罪心理画像往往是应专业部门的请求用于分析有关未知犯罪嫌疑人的种族、性别、职业、地位等信息。尽管这种高级推理活动无疑对犯罪侦查人员有很大的帮助，但其可靠性却不足以在刑事法庭上作为专家证言的基础。同样，尽管不从技术角度考虑“犯罪心理画像”的可靠性，麦克格拉雷只是根据所有的刑事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分析也没有通过审查。麦克格拉雷也同意这一看法，即人类的行为非常复杂，而谋杀犯罪行为会由多种动机因素决定，但麦克格拉雷仍然倾向于本案中的

① 麦克格拉雷就犯罪再现和法庭科学进行专家作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谈到了物证，并基于物证提出了对案情的看法。然而，他只有资格作为一位刑事犯罪侦查分析专家来作证（见第 19 章，其中讨论了这一术语的运用）。这并不是个小话题，因为大部分犯罪心理画像者还没有法庭聘书，也不是犯罪现场再现方面的专家。

谋杀犯不是被雇佣实施的犯罪行为，而是犯罪人由苦恼的事情引发了他实施性犯罪的动机。

法庭并不怀疑麦克格拉雷说他的证言是在许多年的研究和经验基础之上提出的。出于这个原因，法庭认为他的证言并不是全部基于推测。然而，法庭之所以不能采信这种分析是因为法庭采纳任何证据都必须能够进行充分的客观检验，或者是基于长期的、可靠的、科学的原则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因此，在仔细地考虑这份证言的可靠性、权威性和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决麦克格拉雷的部分证言“不能作为裁定事实的根据”。

根据这一法庭裁决（Tennessee v. Stevens, 2001），麦克格拉雷在法庭上只能就犯罪现场特征进行专家作证，不能解释超出犯罪现场特征之外的事情。至于他根据“由突发事件或巨大压力引发的性犯罪”与目前本案犯罪对比而提出的本案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动机是性攻击的证词，法庭认为，这事实上提出的是犯罪心理画像的证词，考虑到在证据领域中，这类证词是不可靠的，同时，这类证据具有以下的错误率，因而也是不可接受的：

……麦克格拉雷自己也证实，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研究显示，犯罪现场分析和犯罪心理画像结论的准确性是75%到80%。考虑到75%到80%的准确率以及犯罪心理画像的“特殊状况”，我们认为，当专家证言不可靠到足以令法庭信服时，审判法庭不能滥用自由裁量权来采信这类证词。

25 起伪造现场研究

材料和方法

作者挑选的案例是在公开和未公开的全美刑事和民事法庭判决结果的数据库中按“伪造犯罪现场”、“现场伪造”、“伪造的现场”、“伪装的现场”等关键词检索查到的。这些伪造的犯罪现场，要么是犯罪嫌疑人自己供认的，

要么是通过证人证言或现场物证所证实的。^① 为了研究方便, 在此将伪造犯罪现场 (crime scene staging) 定义为: 在犯罪发生的现场将有关的物证进行更改或伪造; 或当某处已发生犯罪, 但为了迷惑警方, 或改变警方侦查方向故意而在没有犯罪发生的地方伪造一个假的犯罪事件或犯罪现场。笔者按照前面的定义和条件筛选案例, 使用这些参数 (parameter) 对案例加以取舍。在 1980 年至 2000 年这 20 年的法庭判决中总共有 25 个伪造犯罪现场案例被筛选出来, 这 25 个案例包括 33 名罪犯和 31 名被害人。

假设这些被研究的所有 25 个 (占 100%) 案例中至少有一名犯罪嫌疑人和至少有一名和犯罪嫌疑人有家庭关系或熟人关系的被害人, 那么在这些被研究的案例就有 21 起 (占 84%) 发生在被害人住宅内外。这些统计数据和以前出版的熟人间的暴力案件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Mukherjee et al., 1983)。

① 这项研究中, 用来搜索案件的数据库是 Westlaw (www.westlaw.com), 包括民事和刑事案件。在本研究中引用的 25 个案例如下: AR v. Jones, No. CR 99-630, 2000 (340 Ark. 390, 10 S. W. 3d 449); CA v. Bolin, No. S019786, 1998 (18 Cal. 4th 297, 956 P.2d 374, 75 Cal. Rptr. 2d 412); CA v. Walker, A018776, 1983 (145 Cal. App. 3d 886, 193 Cal. Rptr. 812); CA v. Hardy and Reilly, Nos. S004607, CR 23533, 1992 (2 Cal. 4th 86, 825 P.2d 781, 5 Cal. Rptr. 2d 796); CT v. Rasmussen, No. 14227, 1992 (225 Conn. 55, 621 A.2d 728); FL v. Slocum, No. 4D99-0028 [2000 WL 561717 (Fla. App. 4 Dist.)]; GA v. Koritta, No. A92A1325, 1992 (206 Ga. App. 228, 424 S. E. 2d 799); GA v. Matula, No. S94A0969, 1994 (264 Ga. 673, 449 S. E. 2d 850); IL v. Crow, No. 5-86-0342, 1988 (168 Ill. App. 3d 744, 521 N. E. 2d 594, 118 Ill. Dec. 312); IN v. Angleton, No. 49S00-9411 - CR-1049, 1997 (686 N. E. 2d 803); KS v. Drach; No. 80, 691, 2000 [2000 WL 263249 (Kan.)]; MA v. Hunter, 1998 (426 Mass. 715, 690 N. E. 2d 815); MN v. Mills, No. C4-96-1327, 1997 (562 N. W. 2d 276); MO v. Lannert, Nos. 63563, 65387, 1994 (889 S. W. 2d 131); MS v. Whittington, No. 57308, 1988 (523 So. 2d 966); NC v. Brown, No. 188A96, 1999 (350 N. C. 193, 513 S. E. 2d 57); NC v. Coplen, No. COA99-523 [2000 WL 620932 (N. C. App.)]; NJ v. Marshall, 1996 (148 N. J. 89, 690 A. 2d 1); RI v. Hornoff, K1/94-0760 [1996 WL 936952 (R. L. Super.)]; TX v. Be#ah, No. 05-98-00782 - CR [2000 WL 567768 (Tex. App. - Dallas)]; TX v. Horinek, No. 2-96-565 - CR, 1998 (977 S. W. 2d 696); TX v. Smith, No. 14-97-01243 - CR [1999 WL 672519 (Tex. App. - Hous. (14 Dist.)]; VA v. Bailey, Record Nos. 992840, 000151 [2000 WL 432386 (Va.)]; VA v. Evans-Smith, Criminal No. 4700 [1989 WL 646332 (Va. Cir. Ct.)]; WY v. Ryan, No. 98-279, 1999 (988 P. 2d 46).

这项研究不包括那些声称自己是案件被害人，其实是用自残的方法来证明那些虚无的强奸、伤害、绑架和其他类似的欺骗性谎言的案件。虽然被害人自残案件也应该纳入伪造现场案件之列，毕竟自残人对身体的伤害实际上也是伪造现场的一种延续表现，但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真实案发现场相关物证的伪造变动情况。对自残案件的专门研究文献也是相当丰富的，有以下作品可供参考：^①

统计结果

案件数量：25 起
罪犯人数：33 人
被害人人数：31 人

讨论

犯罪人特征

表 14 - 1 列举了犯罪人的基本特点。涉及男性伪造犯罪的案件有 21 起（占案件总数的 84% ），共有 25 名男性罪犯（占罪犯总数的 75.76% ）。其中，17 起案件（68% ）中只有 1 名男性罪犯。女性涉及伪造犯罪的案件的有 4 起，占 16% ，共有 8 名女性罪犯，占总数的 24.24% 。4 起案件（16% ）全部是女性单独作案。另有 4 起案件（16% ）是男女共同作案。

表 14 - 1 犯罪人特征

案件/罪犯比		案件数量%	罪犯人数%
男性罪犯	21/25	84%	75.76%
女性罪犯	4/8	16%	24.24%
• 男性单独作案	17	68%	
• 女性单独作案	4	16%	
• 男女共同作案	4	16%	
雇用杀手作案	4/5	16%	15.15%

^① Achache, Fanton, Malicier, Miras & Schoendorff (1999); Baedeker, Freislederer, Konig & pedal (1987); Harms, Hildebrand, Hitzer & puschel (1998) and pedal (1994).

(续表)

案件/罪犯比		案件数量%	罪犯人数%
• 丈夫雇人	2/3	8%	9.09%
• 妻子雇人	2/2	8%	6.06%
罪犯供述的	11	44%	
同伙供述的	6	24%	
共同供述的	3	12%	

这些统计数据与芒克吉 (Mukherjee) 等人 1983 年发表的统计数据形成了对比。芒克吉研究了 1981 年芝加哥警察局报告的 151 起谋杀案, 每起案件都涉及一名异性被害人或一名异性犯罪人 (或嫌疑人)。在他的研究报告中, 共有 70 名男性罪犯, 占 46.36%; 有 81 名女性罪犯, 占 53.64%。在芒克吉收集的案例中, 男性和女性罪犯约各占一半, 而在现在的伪造现场犯罪研究中, 明显表明出男性作案占绝对多数。^① 联邦司法局在有关熟人暴力犯罪的纵向调查统计^②中发现, 在不同的案件类型中作案人存在着性别差异。

最近还有一项有意思的调查结果 (见表 14-1), 在被研究的案例中, 有 4 起 (占数量的 16%) 是夫妻间一方雇人杀害另一方。调查结果表明, 丈夫雇人杀害对方的数量和妻子雇人杀害丈夫的数量基本一样多。

最近的一份与侦查有关的研究发现, 有 11 起案件 (占总数的 44%) 是作案人供述的罪行, 有 6 起案件 (占总数的 24%) 是作案人的同伙或是作案人的女朋友供述的。仅有 3 起案件 (占总数的 12%) 是作案人及同伙人共同交代的。这就意味着 14 起案件 (占总数的 56%) 都有作案人供认罪行。几乎每

① 应该指出的是, 芒克吉等人 (1983) 的研究是针对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都是异性的案件, 而本章涉及的案件有 3 起都是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为同性别者。在第一起案件中, 一名男子杀害了他的商业伙伴, 而两名同为男性的目击者则将现场伪装成在他们房间外进行毒品交易形成凶杀现场 (他和他的商业伙伴事实上都是贩卖毒品的); 在第二起案件中, 一位男性杀了他的朋友并把现场伪造成自杀现场; 在第三起案件中, 女儿杀死了母亲并把现场伪造成入室盗窃现场。

② BJS 是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的缩写, 其调查题目为 “Violence by intimates: Analysis of Data on Crimes by Current or Former Spouse, Boyfriends, and Girlfriends.” (1998), 译者注。

个案件在开始讯问时，作案人或其同伙的辩解都与现场物证存在着矛盾，作案人的陈述不能自圆其说，之后才逐渐招供。当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与现场物证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犯罪现场的再现对其供述的确认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在随后的促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中也起着积极的作用。另外的 11 起案件（占总数的 44%）中，犯罪嫌疑人没有如实供述，在这些没有如实供述的案件中，最后都是通过警察和物证专家的证言，通过现场再现最终证明犯罪嫌疑人在撒谎、作案现场是伪造过的犯罪现场。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犯罪现场再现在这类案件侦破过程中的重要性。

被害人特点

表 14-2 的数据则提供了有关被害人性别及与作案人关系的特征。在涉及女性被害的 17 起案件中（占总数的 68%）有 17 位女性被害人，被害占被害人总数的 54.84%。在研究的案例中，没有一起案件涉及两位以上的女性被害人。在涉及男性被害的 11 起凶杀案件中（占总数的 44%）被害男性被害有 14 人，占被害人总数的 45.16%。其中，有两起案件涉及两位以上的男性被害人，一起同时有两个被害人，另一起同时有 3 个被害人。

表 14-2 被害人特点

被害	案件数量/被害人数	案件%	被害人%
女性被害人	17/17	68%	54.84%
男性被害人	11/14	44%	45.16%
• 男性单独被害人	8	32%	
• 女性单独被害人	14	56%	
• 男女同时被害	3	12%	
和犯罪嫌疑人有家属/朋友关系的	25/29	100%	93.55%
• 妻子	13/13	52%	41.94%
• 丈夫	4/4	16%	12.90%
• 儿子	3/4	12%	12.90%
• 朋友	2/2	8%	6.54%
• 父亲	1/1	4%	3.23%
• 母亲	1/1	4%	3.23%
• 男朋友	1/1	4%	3.23%
• 情妇	1/1	4%	3.23%
• 女友之女	1/1	4%	3.23%

(续表)

被害	案件数量/被害人数	案件%	被害人%
和犯罪嫌疑人没有亲属/朋友关系的	2/3	8%	9.68%
• 目击证人	1/2	4%	6.45%
• 商业伙伴	1/1	4%	3.23%

表 14-2 的统计结果显示, 25 起案件中有 29 名被害人 (占被害人总数的 93.55%) 与作案人有亲属关系, 或以前有婚姻关系, 或以前是朋友关系。在剩下的 3 名被害人中有 2 人与作案人是间接的亲属关系或朋友关系, 另外 1 人是商业伙伴。

在与作案人有亲属关系, 或以前有过婚姻关系, 或是朋友关系的调查中, 令人惊诧的发现是: 13 起案件 (占总案件的 54.12%) 有 13 名 (占总犯罪人数的 46.43%) 被害人是凶手的妻子, 她们被丈夫或丈夫雇用的凶手所杀害。丈夫是被害者的案件只有 4 起 (占 16.67%), 有 4 名死者 (占 14.29%), 排在第二。被害人数排在第三位的是儿子, 3 起案件 (占 12.5%) 有 4 名被害的男孩。在这些案件中, 儿子并不是最先被害的, 往往是在他们的妈妈先被杀死后才被杀掉的。^①

表 14-3 犯罪行为特点

	案件数量	案件百分比
伪造现场隐瞒凶杀性质	25	100%
多名犯罪嫌疑人	6	24%
多名被害人	4	16%
伪造犯罪		
入室行窃	13	52%
自杀	4	16%
道路抢劫	2	8%
意外溺死	1	4%
入室行窃/杀人	1	4%
毒品交易	1	4%

① 研究中有这样一起案件, 一名男性将他的女朋友与别人所生的两岁女儿杀害, 然后将女孩捆在一个汽车座上推进水池里。

(续表)

	案件数量	案件百分比
杀人	1	4%
机动车事故	1	4%
强奸杀人	1	4%
伪造现场位置		
卧室	17	68%
路旁汽车里	4	16%
客厅	2	8%
住宅外面	1	4%
游泳池	1	4%
凶器		
手枪	12	48%
步枪	4	16%
刀具	3	12%
汽车坐位	1	4%
灭火器	1	4%
铅块	1	4%
手掐	1	4%
女长筒袜	1	4%
不详	1	4%
木钉	1	4%
使用多种凶器(刀具+手枪)	1	4%
使用现场工具	11	44%
伪造现场的表现		
作案人“发现”被害人	18	72%
窗户被打开/或被损毁	12	48%
搬走贵重物品	7	28%(占16起伪造入室盗窃和抢劫案件的43.75%)
掏空抽屉	6	24%
有意安排凶器位置	6	24%(占6起伪造自杀案件的100%)
移动尸体位置	2	8%
伪造遗书	2	8%(占2起伪造勒死案的100%)
安置毒品	2	8%
自残	2	8%
• 钝器伤	1	4%
• 枪击胸膛	1	4%
割断电话线	2	8%
掐掉走廊路灯	1	4%

正如表 14-3 所表明的,有 6 起(占 24%)案件不是单独一名凶手作案,有 4 起(占 16%)案件不是一名单独的被害人。在这些案件中有两起是双重凶杀案,另有两起是三重凶杀案。值得一提的是这两起双重凶杀和一起三重凶杀案件都是丈夫作为凶手杀死其母亲和儿子(其中一起双重凶杀案实际是被雇用的两个人干的)。

在此的统计研究与联邦司法局调查研究的数据(1998)形成对比。联邦司法局的调查表明,在 1976 年至 1996 年 20 年间,由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导致的 446,360 名被害人中,许多被害人和作案人之间的确存在着上述关系。在这份研究报告中,男性被害人有 340,687 人,占 76.3%;女性被害人有 105,175 人,占 23.7%。^①

这些研究结果和芒克吉(1983)的研究报告也形成对比,该报告陈述“有一半的两性间的凶杀案,其被害人和作案人以前曾是夫妻或是朋友的关系”。

这些研究的发现对于侦查活动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给分析伪造犯罪现场提供了一个常见的假设支持:作案人为了掩盖他与被害人之间有较亲密的关系往往要伪造现场。但如果基于这些数据就认为,每起伪造现场都一定反映犯罪人试图掩盖他们与被害人的亲密关系那又错了。我们只把这种研究发现看做一种辅助侦查的手段,可以用来分析各种作案的可能性,并能有效地缩小原先的嫌疑范围。

犯罪行为特点

表 14-3 显示了所研究案例中各种伪造犯罪的行为特点。在研究的 25 起案例(占 100%)中,所有伪造现场都是用来隐匿谋杀犯罪的痕迹。正如格

^① 联邦司法局调查中的数据(1998)并不完整,大部分情况都被集中在一起(亲戚、朋友、熟人、陌生的被害人都被归为一类,共有 247,869 名被害人,占全部被害人的 55.53%)。在许多案件中并不知道谁是攻击者(有 146,414 名攻击者的身份不明,占全部犯罪人数的 32.8%),也就是说,此调查只分析了 299,956 名犯罪嫌疑人(占 67.2%)。在男性被害人中,有 20,311 人(占 4.56%)是被熟人所杀(从前或现在是亲密关系的人),其中有 13,432 人(占 3.01%)曾是丈夫或前夫,有 6,879 人(占 1.54%)曾是男朋友或“其他亲密关系的人”。在女性被害人中,有 31,260 人(占 7%)是被亲密的人所杀害,其中有 21,358 人(占 4.78%)曾是妻子或前妻,有 9,902 人(占 2.22%)曾是女朋友或“其他亲密关系的人”。

罗斯（1924）和近来研究伪造问题的阿德尔（Adair）和都伯森（Doberson）（1999）所指出的，这不仅仅是犯罪人的行为，其伪造或许是为了隐匿他们自己，它恰恰也是刑事侦查人员最熟悉的现象，是他们随后最想调查清楚的东西。

表14-3还显示出，将谋杀伪造成陌生人入室盗窃引发的杀人案是最常见的伪造形式，在所有案件中有13起，占52%。伪造成自杀案件排在第二位，有4起案件，占总数的16%。在大多数情况下，现场都伪造成死者尸体躺在卧室里（17起，占总案件数的68%）。如果想设计成并非事先故意谋划的杀人犯罪，那就不得不精心地策划，也就是说，最常见的伪造类型就是使其看起来像在家庭争吵后引发暴力导致的结果，掩盖其故意杀人的目的。正如芒克吉等人（1983）在书中一开始所阐述的那样，“犯罪学早就指出，凌晨3点钟时，一个人在中央公园比在他或她自己家的卧室里可能更安全”。

当进一步研究作案凶器时会有更多的发现。统计结果表明，在整个案例中，作案人通常情况下都使用手枪，共有12起案件，占总数的48%，使用步枪，共有4起，占总数的16%。这些统计结果与联邦司法局的统计（1998）中的报告结果是相符的，该报告说明，仅1996年，在作案人和被害人有亲密关系的谋杀案件中，65%的案件的凶器都是手枪或步枪。

令人吃惊的是，在11起案件（占44%）中，凶手使用的凶器是在作案现场随手拿到的。这意味着，只有14起案件（占56%）是凶手带着凶器进入作案现场的。这项统计结果有力地证实了有14起案件的作案人是有计划、有预谋地使用凶器；而在另外的11起案件中，作案人最初并不打算使用凶器。

伯吉斯等人（Burgess, 1992）提出了一个没有论证的观点，即冲动导致的家庭暴力案（spontaneous domestic homicide）没必要伪造现场。这类案件的作案人往往是由于近来的压力事件或是日积月累的压力一下子爆发所导致。但是，他们认为，凡伪造成家庭暴力的现场（staged domestic homicide）必定是精心准备和实施的。这种现场有较多的整理痕迹、不凌乱、缺乏真正犯罪时所必然出现的证据迹象。上述没有检验过的观点容易给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冲动的家庭暴力导致的凶杀案件不涉及现场伪造问题，伪造现场的作案人大都是精明的、狡猾的、有较好情绪控制力的人。然而，最新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上述观点，在被研究的25起案例中，有并不精明的现场伪造，也

有没有精心计划的作案。大量案件都和冲动的家庭暴力有关，伪造现场通常是作案后才突然想起实施的，并且伪造的现场常常很粗糙。

值得注意的是，勒死案件的比率较低，仅有两起，占案件总数的 8%。其中一起是一名 28 岁的男性假释犯去照顾一名有关节炎的 87 岁老妇，后来，他实施抢劫并扼死了她。这名凶手将老妇扼死在床上，从死者的钱包里偷了 5 美元，然后将现场伪造成打坏窗户、翻空抽屉的入室盗窃者杀人案的犯罪现场（Henter, 1998）。另一起案件是一名男子用女性裤袜勒死他妻子并把死者尸体放在卧室里的床上，也把现场伪造成入室盗窃者翻箱倒柜后实施的杀人犯罪（Evans - Smith, 1989）。此案曾使侦查人员对这一问题越来越感兴趣：什么情况下犯罪人会攻击一个人的脖颈，尤其是扼勒，他们发现，往往是被害人非常熟悉的犯罪人会使用这一手段。但我们的研究结果并不能支持这一说法，这需要进一步研究有亲属关系的被害人与作案人进行伤杀的行为特点。

表 14 - 3 还对作案人已经伪造过的现场表现，或曾试图伪造的现场表现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最让作者吃惊的是，在 18 起案件中（占 72%）大多是作案人最初“发现”的死者尸体。在大多数案件中，作案人都要伪装成非常震惊、悲痛，并要其他人陪他一起发现尸体以使人相信他与这起案件毫无牵连。这一发现与通常人们对这类现象的看法明显不同，通常人们觉得，实施犯罪的凶手自己尽量远离作案现场，希望别人发现死者尸体并报告，以使自己逃避作案的嫌疑。不过，这 25 起伪造现场案件中，缺乏那种复杂的造假迹象，因而它并不能说明“故意发现”尸体是有预谋的毁灭证据或转移证据的一个步骤。这一数据只是表明，在一起值得怀疑的家庭凶杀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若没有首先发现死者的尸体，这并不是值得怀疑的“红色标志”，即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犯罪嫌疑人肯定是凶手。而最初发现死者尸体的人，倒应该考虑是否有犯罪嫌疑的可能。

另一个发现是，在涉嫌家庭凶杀的案件中，伪装从犯罪现场带走贵重物品的有 7 起，占总案件数的 28%。这在伪造成入室盗窃和抢劫案的 16 起案件中也占 43.73%。一个逻辑的推理认为：作案人既然想偷窃财物，就应该从现场拿走财物，于是伪造现场就应该如此。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以前曾指出的，如果这种物品是经常使用的而被拿走，那就更说明作案人在伪造现场，而且造假的水平较低。

令侦查人员注意的是有两起案件作案人把死者尸体从第一现场挪到第二现场（secondary scene）。^① 第一起案件是一名男子用钝器杀死他的妻子，然后伪造成死者是由于车祸造成死亡的现场（MS v. Whittington, 1988）。第二起案件是一名男子和3名同伙（两男一女）用鸟枪杀死他的前妻，然后将死者尸体扔在乡间马路边，伪造成被人强奸杀害的现场（TX v. Bellah, 2000）。如果从这两起案例就得出结论说，每起案件都有第二现场那就错了。因为以这种方式去考虑现场是否伪装实在不严谨。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的是一种意识，即犯罪现场可能会被伪造，这样我们才会发现，某些犯罪现场已经是伪造过的第二现场。问题在于有个别侦查人员很少能够想到这一问题，很少有意地去观察并识别这种伪造的现场。

在表14-3中，最后讨论的是6起伪造自杀的现场（占伪造案的24%）有没有伪造遗书现象。其中两起案件伪造遗书是很明显的（占8%）。这两起案件看起来像是为了报复而自杀。其中一起是丈夫伪造妻子自杀、实为丈夫谋杀了妻子（Mliis, 1997）；另一起则是妻子谋杀丈夫，伪造成丈夫自杀的现场（MN v. Mliis, 1997；维吉尼亚诉贝利案件（VA v. Bailey, 2000）。

这一发现并不说明：伪造自杀的现场必须有遗书或自杀者都留有遗书。另外，研究还发现，伪造自杀现场有无遗书现象还取决于时间因素。也就是说，作案人常常没有时间或没有给自己留出充足的时间伪造遗书。这说明，这类凶杀案的发生并非事先预谋好的，因此只能一般地伪造一下现场。

犯罪动机

表14-4说明了作案人的犯罪动机。对犯罪动机的判断要么根据作案人的供述，要么根据作案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所研究的案例全部是由家庭暴力引发的凶杀（视为100%的话），那么，其犯罪动机要么是泄愤（anger），要么就是图财（profit）。数据表明，有15起案件（占60%）其作案动机是泄愤，另有12起案件（占48%）其作案动机是图财。仅有2起案件（占8%）是二者兼而有之，既泄愤又图财。

^① 第二现场是最初实施犯罪活动现场之外的任何留有犯罪活动证据的场所。第一现场是指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发起攻击或袭击行为的场所（参见第11章“犯罪现场特征”）。

表 14-4 犯罪动机

	案件数量	占总体案件的比例
气愤	15	60%
图财	12	48%
气愤 + 图财	2	8%
既不图利也不泄愤的	0	0%
故意伤害	8	32%
故意伤害 + 气愤	7	28%
气愤 + 或伤害	8	32%

还有一项结论出乎意料，在泄愤动机的案件中，有 7 起案件（占 46.67%）并没有出现过度施暴（overkill）的现象。^① 一般认为，过度施暴往往表明一个人在作案时有愤怒的动机。这在另外 8 起案件中出现并得到证实，占 53.33%。但是，这些数据并不说明没有过度施暴就没有泄愤动机。这些情况只是更充分地证实了这样一项证据原则，即缺乏证据并不意味着就没有证据。^② 显然，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家庭凶杀案（或亲密关系凶杀案）中过度施暴的比例关系及过度施暴的证据。

执法人员犯罪

表 14-5 显示了执法人员犯罪的统计数据。本项研究最令人痛苦的是，在伪造现场的案件中居然有 5 起案件（占 20%）涉及曾经是、甚至在作案前

① 泄愤动机是由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中所表达的愤怒情绪来证实，这种动机指向或是某一特定的人、群体、机构，或者是某一象征物。其最初的动机往往是在犯罪嫌疑人感到自己被人愚弄或被人伤害的情况下出现。图财动机则由犯罪嫌疑人趋向的物品或别人所有物的行为来证实。这类动机可在各种类型的犯罪中存在，如谋杀、盗窃、抢劫、走私、纵火、爆炸、绑架，更为多见的是白领犯罪，仅是一个名称而已（参见 16 章：犯罪动机）。过度施暴（overkill）意思是，在能将被害人置于死地之外还实施了极度的损伤或伤害（Burgess, 1992, p.354）。

② 这是事实，即缺乏证据并不意味着就没有证据（absence of evidence is not evidence of absence），这也是事实，即没有发现证据时就不能进行解释。就像一名提取指纹的勘查人员正在寻找应该存在的指纹——如果他没有找到指纹，这并不意味着指纹从来不存在，只是没有找到而已。因此，他们只能对找到的物证进行鉴定。陪审团也不能对虽然存在但没有找到的指纹进行考虑。行为证据也是这样。法庭科学家只能解释他们已经发现的事实，和没有找到的事实关系，并因此而调整他们的观点。

还是执法人员的犯罪人。这类案件多数是男性，有 4 名，占 80%，而且，大多是随着谋杀出现的伪造，同时，也不清楚为什么。

表 14 -5 执法人员犯罪

	罪犯	占执法人员犯罪嫌疑人的比例
执法人员犯罪嫌疑人	5	100%
• 男性	4	80%
• 女性	1	20%
受雇用人员 + 执法人员犯罪嫌疑人	1	4%
伪造犯罪行为		
入室盗窃	2	40%
道路抢劫	1	20%
性谋杀	1	20%
自杀	1	20%
伪造现场位置		
卧室	2	40%
路上机动车上	2	40%
客厅	1	20%
凶器使用		
手枪	3	60%
步枪	1	20%
灭火器	1	20%
使用现场工具		
伪造现场的表现	2	40%
作案人“发现”被害人	3	60%
窗户被打开或损毁的	2	40%
拿走贵重物品	1	20%
掏空抽屉	0	0%
有意安排凶器位置	1	20%
移动尸体	1	20%
伪造遗书	0	0%
安置毒品	0	0%
自残	1	20%
• 枪击胸部	1	20%
割断电话线	0	0%
毁坏走廊路灯	0	0%

有意思的是，在他们的伪造过程中，仍然缺乏伪造证据的技能，这是我们意料之外的。例如，其中 1 起案件（占 20%）执法人员为了摆脱他们与被害人

的关系嫌疑，居然轮流将被害人从第一现场挪到了第二现场。另外一起案件中（占 20%）执法人员为了伪造入室盗窃或抢劫现场，刻意地从现场拿走贵重物品。剩下的 3 起案件中（占 60%）执法犯法者首先“发现”了被害人。他们当中居然没有一人制造合乎逻辑的假象或销毁痕迹、转移证据。^①

结论

以上对伪造现场的研究应该被看做是初步的，这些研究与侦查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在文中所讨论的那样，它们可以为识别伪造现场的红色标志提供参考，同时，它们也对以前一些作者的观点提出质疑。而且，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也已明确，即有必要将过去 20 年内没有伪造的家庭暴力案与伪造的家庭暴力案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以期建立一个更有使用价值的数据库（baseline）。

格罗斯的早期著作中的观点，尽管现在的著作中很少引用，但再一次得到证实：认真地检验刑事物证、根据已发现的物证认真分析和对比被害人/证人的陈述、准确地再现犯罪现场、不要轻易地假设等。鉴于此，有必要对刑事侦查人员就刑事证据、犯罪现场再现，以及用于分析各种案件的原则进行培训。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先入为主的一些犯罪理论将阻碍我们在将来认识和侦破越来越复杂的伪造现场的犯罪案件。

参考文献

1. Achache, P., Fanton, L, Malicier, D., Miras, A., and Schoendorff, P. (1999)

^① 在得克萨斯州有一起赫日纳克杀妻案（Horinek, 1998）中，曾为福特沃斯（Fort Worth）警官的沃仁·赫日纳克（Warren Horinek）酒后杀死了他当律师的妻子伯涅（Bonnie），案件发生在卧室，伯涅因胸部遭枪击致死。当急救人员到达现场之后，他们发现她的脖子上紧紧地缠着止血带（与胸部受伤后所需的照顾不一致）。他们还发现床上有一支枪，就在她身体附近（但按实际距离她够不到）。当时，赫日纳克离开房间去关家里的狗，然后回到卧室，“接着就跳上床试图进行人工呼吸抢救”。他被急救人员从床上拉了下来。

在现场发酒疯的赫日纳克所作出的陈述前后矛盾。开始时，他说他妻子是自杀，后来又告诉侦查人员可能是有人谋杀。这些可以被看做扰乱视听，或试图制造假象，或否定他自己作案的证据。然而，考虑到他在现场的醉酒状态（intoxicated）和相互矛盾的伪造陈述，真相已不言而喻了。

- "False Rape: A Case Report", American Journal of Forensic Medicine and Pathology, 20 (4), 374 ~ 377.
2. Adair, T. W. and Dobersen, M. J. (1999) "A Case of Suicidal Hanging Staged as Homicide",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44 (6), 1307 ~ 1309.
3. Baedeker, C., Freisleder, A., Konig, H. G., and Pedal, I. (1987) "Criteria for Differentiating Self – or Other – Inflicted Injuries of Alleged or Real Victims", Arch. Kriminol. 180 (1 – 2), 13 ~ 27.
4. BJS (1998)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Violence by Intimates: Analysis of Data on Crimes by Current or Former Spouses, Boyfriends, and Girlfriends", NCJ – 167237, May, 1998.
5. Burgess, A., Burgess, A., Douglas, J., and Ressler, R. (1992) 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6. Chisum, W. J.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Crime Reconstruction", in Turvey, B. (Ed.), Criminal Profiling: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vidence Analysis, London: Academic Press.
7. Chisum, W. J. and Turvey, B. (2000) "Evidence Dynamics: Locard's Exchange Principle and Crime Reconstruction", Journal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1 (1).
8. Douglas, J. and Munn, C. (1992) "The Detection of Staging and Personation at the Crime Scene", in Burgess, A., Burgess, A., Douglas, J., and Ressler, R. (Eds) 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9. Frye v. United States, (1923) 293 F. 1013 (D. C. Cir. 1923).
10. Geberth, V. (1996) Practical Homicide Investigation, 3rd ed., New York: CRC Press.
11. Geberth, V. "The Staged Crime Scene", Law and Order, February, 1996.
12. Gross, H. (192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13. Harms, D., Hildebrand, E., Hitzer, K., and Puschel, K. (1998) "Self – Mutilating Hand and Finger Injuries Among Physicians Suspected of Insurance Fraud", Versicherungsmedizin 50(6), 232 ~ 240.
14. Hayase, T., Matsumoto, H., Yamamoto, K., and Yamamoto, Y. (1998) "Suicidal Hanging or Simulated Suicide? Once Again a Case of Kobue: A Spectacular Case i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Legal Medicine", Arch. Kriminol. 201 (3 – 4), 97 ~ 102.

15. Kirk, P. and Thornton, J. (Eds) (197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2n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6. *Massachusetts v. Hunter* (1998) (426 Mass. 715, 690 N.E.2d 815).
17. Mallach H. J. and Pollak, S. (1998) "Simulated Suicide by Hanging After Homicidal Strangulation", *Arch. Kriminol.* 202 (1-2), 17 ~ 28.
18. Mcknight, K (2000) "Expert's Opinion Challenged", *Ohio Beacon Journal*, Apr 1.
19. *Minnesota v. Mills* (1997) No. C4-96-1327 (562 N.W.2d 276).
20. *Mississippi v. Whittington* (1988) No. 57308 (523 So.2d 966).
21. Mukherjee, S., Van Winkle, B., and Zimring, F. (1983) "Intimate Violence: A Study of Inter-Ionicide 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Spring.
22. O'Connell, J. and Soderman, H. (1936) *Moder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23. Pedal. I. (1994) "Self-mutilation with a double-blade razor", *Arch. Kriminol.* 194 (1-2), 15 ~ 21.
24. Svensson, A. and Wendel, O. (1974) *Techniques of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2nd ed., New York: American Elsevier.
25. *Tennessee v. Stevens* (2001) No. M1999-02067-CCA-R3-DD, May 30, 2001 (2001 WL 579054).
26. *Texas v. Bellah* (2000) No. 05-98-00782-CR (2000 WL 567768).
27. *Texas v. Horinek* (1998) No. 2-96-S65-CR, 1998 (977 S.W.2d 696).
28. Turvey, B. (1999) *Criminal Profiling: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vidence Analysis*, 1st ed., London: Academic Press.
29. *Virginia v. Evans-Smith* (1989) Criminal No. 4700 [1989 WL 646332 (Va. Cir. Ct.)].
30. *Virginia v. Bailey* (2000) Record Nos. 992840, 000151 (2000 WL 432386).
31. *Washington v. Kunze* (1999) No. 22338-4-11 (988 P.2d 977).
32. *Washington v. Kunze* (2000) NO. 68998-9, June 06, 2000 (10 P.3d 404).

第15章 识别犯罪人标记

Brent E. Turvey, M. S.

在别人心里可能是不经意的、模糊的念头；或当人心不在焉和孤独时才出现、而当情境改变时容易消失的念头，在他们头脑中却根深蒂固。

查尔斯·伯罗克登·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Weiland》

快乐的感觉总是来源于想像。

德萨德（Marquis Desade）侯爵：《贾斯廷》

在侦查学的术语中，标记（signature）是指犯罪人为了满足某种心理上或情感方面的需要而实施某一特殊行为。^①通过对特殊的犯罪标记行为进行分析和解释，同时结合其他因素，如犯罪惯技、被害人研究等，犯罪心理画像者就可以进行并案分析、并对作案人的犯罪动机作出判断。然而，在侦查实践中对于标记行为的应用却存在着很多的混乱。

① 根据道格拉斯（Douglas）和奥尔沙卡（Olshaker）1995年的著述介绍（1995，p.69），美国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道格拉斯·约翰（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殊顾问，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部的领导，他最先提出了“标记”（signature）这一术语。用他的话讲：“最后，我提出‘标记’这一术语是为描述那种独一无二的，个人必须做的、稳定的行为特征。而且，我用它来区别传统的犯罪惯技的概念，因为惯技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改变的。”

在此，道格拉斯认为，他提出这一术语是为了帮助涉及犯罪心理画像的侦查人员通过犯罪人的行为，即往往属于惯技部分的行为，来辨别是否包含着某种犯罪人的心理需要和心理主题。笔者的研究发现，这一术语早在道格拉斯开始他在联邦调查局职业生涯之前就已经在刑事法庭上使用了。并不是他的创造，是他借用并完善了这一术语。

定义

标记（signature）用法律术语来讲，是指一种特殊的、明显的犯罪人实施犯罪的惯技。在早期的法庭审判中，犯罪惯技不能用来作为认定犯罪人身份的证据（但可作为无害错误被排除）。正如麦克阔密柯（McCormick）在1954年对证据的论述所言（California v. Haston, 1968）：

“在此（即用其他案件的犯罪惯技来认定犯罪人的身份而言）要求更多的不是某一同类犯罪是否重复出现，如：反复抢劫或盗窃。而是要求这种行为必须是特殊的、显著的，如同一个人自己的签名一样 [McCormick, Evidence (1954), p.328]”。

一个犯罪人的标记应是一种明显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属于他的性格特征，是为满足其情感的或心理上的特殊需要而出现的行为模式。为了把握犯罪人标记的概念，必须注意以下两个独立却又相互作用的方面：

第一，要注意每起犯罪的一般标记性特征。所有的标记特征都代表着犯罪人作案时要满足的情感或心理上的需要，它包括以下的动机类型，当然并不局限于这些：

1. 有利可图。
2. 泄愤或报复。
3. 证明能力/体验某种过程。
4. 权力自信/有权获得某种东西。
5. 施虐狂（sadistic）。

第二，犯罪标记必定是显著的、可作为证据的行为。标记行为是犯罪人在作案时不必实施，但如果实施就意味着这一行为要满足犯罪人的某种特殊的心理或情感需要。犯罪心理画像者必须区分犯罪惯技与标记行为的差异。比较困难的是，同一行为既是惯技的需要又是标记行为的需要。对这种行为的双重含义最好的解释或许是以下两个用于犯罪心理画像和行为证据分析的重要原则：

1. 不同的犯罪人做出相似的犯罪行为是出于不同的原因。
2. 个体犯罪行为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是犯罪人的多重动机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

由于犯罪人表达他们心理需要的方式不同，所以，甚至是最优秀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都不一定能看出犯罪惯技和犯罪标记的区别来。

譬如，在一起案件中，犯罪人在实施强奸时用被害人的衬衫蒙住她的脸，这一行为可能就是一种心理需要，能使犯罪人产生幻想（fantasy），把被害人当做另外一个人，这就是标记行为。

在另一起案件中，犯罪人在实施强奸时也用被害人的衬衫蒙住她的脸，但这一行为可能只是为了不让被害人看到他的模样，以防今后认出他来。这时这一行为就是犯罪惯技的一部分。

而在第三起案件中，犯罪行为则可能有多种因素决定。同一行为可能为同时满足上述的两种需要，因此，其行为既是犯罪惯技的一部分，也是标记行为的一部分。

为了区分出一种行为是犯罪惯技，还是标记行为，犯罪心理画像者必须设法了解各种行为模式并进行总结。他们不应该基于无关案件中各种行为的大致情况来解释犯罪行为，进而陷入一种逻辑推理的陷阱中；也不应该忽略案件事实的前后关系和犯罪人其他行为表现而仅凭其单一的行为作结论。如前几章所述，犯罪人的某一行为其含义只有放在当时的背景中才能获得正确的解释。

犯罪标记的心理动力特征

并非所有的犯罪人都是一样的。他们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爱好和不同的需要。因此，如前所述，不同的犯罪人在相似的环境下所实施的相似犯罪行为并不一定是出于完全相同甚至相似的动机，其中的原因与关于正常人的心理发展理论有直接的联系（Turvey，2000）。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约翰·玛尼博士（Dr. John Money）对行为动机独特性的解释，即许多犯罪人其内心都有一种特殊行为模式的意象（mind's eye），这种意象与他的情感活动有关。与情感有关的意象被称之为“爱景”（love map）。玛尼博士用“爱景”一词来描述一种理想的情景、个人或活动计划，

这些理想的情景、个人或活动计划能够满足犯罪人特殊的情感和心理需要。^①

爱景、需要或想像是所有人（不只是犯罪人）的心理发展所必须经历的，这是人类自然发展过程的一部分。而且，它们同时也受生物学和环境因素的影响。犯罪人标记的出现和发展必然与其性的发育和情感的发展相一致。随着爱景的发展，人格逐渐形成，行为必须去满足个人的多种需要与不断发展着的需要。对某些人来说，结果或许是在精心的抚育下、在探寻亲密关系的行为中使这种爱景得到健康的表达和发展；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持续的冷漠最终导致其犯罪行为的形式与发展。

玛尼博士的理论认为，当个人的心理发展进程偏离正常轨迹，当个人感到，想像暴力或想像其他犯罪活动能使他产生愉快的联想那必然会导致犯罪的结果。这些联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和发展，与各种特异的行为有关，犯罪个体在这种特异行为中，诸如强奸、谋杀、纵火和其他相似的系列犯罪寻找他们特殊的情感或心理需要的满足。

犯罪人的幻想行为随时间而发展，同时实现这些幻想的需要也随时间而发展。当出于暴力或掠夺性幻想而行动时，这一行动本身又会使犯罪人在意识中强化这一幻想，并会使幻想越来越离谱。行动和幻想是一个互补的过程，这一过程能促使幻想、标记行为和标记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化。

标记行为

一种特殊的标记行为模式能够明显地表示出犯罪人的特殊需要（如前所述，这里起作用的并不一定只是一种普通的需要）。因此，标记行为能够很好地反映出犯罪人潜在的人格、生活类型和经历（Turvey, 2000）。借助于犯罪

^① 玛尼（1988，p.290），将“爱景”定义为“一种成长的代表，或一种模式，在心理或在头脑中形成理想的爱人，以及在想像或现实中与爱人发生性行为的场景”。他是这样解释爱景的形成过程（1988，pp.17~18）：“人的终身与情爱的牵连始于人的8岁，一直到结婚、到成人阶段。这意味着，意象、性爱吸引及繁衍欲的唤起，就如同母语，必须在人的早年得到很好的发展。既然需要与母语有一个对应的称呼，我拟订一个名称，即爱景（love map）。”“就像学习当地社会的母语一样，孩子们也在积极地或消极地学习性的概念。纵然禁欲主义者（anti-sexualism）的戒律抑制着孩子们的爱景发展，但他们仍然继续学习并形成爱景。”



a



b



c

一对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被抛尸在偏僻的地点，他们都被强迫脱去衣服。男性被开枪打死，女性在被强奸后被开枪打死。死后的尸体被放置成性交的“场景”：女性正在给男性进行口交。还有证据表明，犯罪人在女孩死后曾与其肛交。犯罪人把被害人摆成这种姿势，目的是让人们发现他们时贬低他们的品行并诋毁他们的名誉

图 15 - 1

人明显的行为特征和可以收集到的各种物证及行为证据，就能够运用其特殊的标记行为和行为所要满足的需要来区分出不同犯罪现场的差异和不同犯罪人的差异。

标记行为表达了犯罪人的需要。这些行为能够在犯罪人、被害人、犯罪现场三者的互动中找到相应的证据。将这些犯罪标记行为集中起来研究，就能够推断犯罪人的标记方面或者行为动机（见图 15-1、图15-2）。



一起被谋杀案的女性头颅，其身体被肢解，并被放进不同的袋子扔进河里。从获得的证据观察，犯罪人用尖锐的刀具分解尸体时，如头颅与躯体的骨缝处时，面部皮肤的剥取，以及身体各部分的皮肤剥取等都非常的细心并有技巧性。做这一切所付出的时间、耐心、技能以及风险等都已超出逃避侦查的需要，显然，犯罪人的剥皮行为只是为了犯罪人自身的某种满足

图 15-2

识别犯罪标记

犯罪标记常常被错误地称为犯罪人的“名片”（calling card）或“商标”（trademark）（Keppel, 1995）。这些称谓使人误认为犯罪人的行为留给现场的是静止、刻板、永不蜕变的心理痕迹，这是一种误导的理解。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理解犯罪标记概念有一些重要的限定。许多系列案件的犯罪人或嗜血成性的犯罪人实施他们非常独特的、明显的、体现他们稳

定人格特征的犯罪行为时仍是为了表达他们个人的某种情感需要。然而，这种心理活动的特殊性、是由于人在成长进程中不同变量影响的结果，仍然不能仅据此认为，两个犯罪现场因为标记相似，其犯罪人的心理也必然相同。“相同”（identical）或“相似”（match）的术语很容易误导那些未能正确地理解犯罪心理标记概念的人。

“相似”一词有时可以作为“相同”来理解，即两事物往往具有共同的特征点。但是，就其本质来讲，即使是同一个犯罪人所为，不同的犯罪现场和现场的犯罪行为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因为不仅犯罪地点不同，而且案件的被害人肯定也不相同，不同的被害人对犯罪人的反应也不会相同，这些不同都会影响犯罪人的惯技和标记行为的表现。有时，不能准确地认定某一标记行为是否属于某特定犯罪人所为，其原因之一就是解释者自身的问题。即使犯罪人有明显的心理特征，心理画像者也不能发现是因为心理画像者永远不可能有犯罪人眼睛里看到的那些客观的、清晰的对象。画像者虽然能够收集一些强有力的物证和行为证据来表明犯罪人最有可能的想法和需要，但是，这类东西远没有达到“心理指纹”（psychological fingerprint）那种精确的程度。

在解释标记行为时有许多的变量要考虑，只有综合这些因素才能形成完整的分析。把握这一点非常重要，即标记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成为我们并案或不并案的根据。这是因为：

1. 犯罪人并不总是能在现场上留下犯罪标记（参见第13章“对犯罪惯技的影响”的部分，同样，标记行为也如此）。
2. 犯罪人可能会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来掩藏标记行为的证据（烧毁证据、带走别人不知的用于幻想的物品、伪造犯罪现场等）。
3. 犯罪人的行为证据可能会被司法人员或侦查人员丢失、忽略或损毁。

某一行为在多起案件中的简单重复出现不足以被认定为标记，而只是犯罪惯技中的一部分。通常来讲，具备了下列特征就可以认定是真正的标记行为：

1. 花费额外的时间，超出犯罪行为惯技的范围。
2. 就实施犯罪而言，属于没有必要的行为。
3. 其行为刻意表现某种情绪或情感。
4. 或许涉及某种幻想（想像）的实现。

如果某一行为符合其中的标准，那么，这一行为就是标记行为，即这一行为满足了犯罪人的心理需要（某种幻想或动机），而不仅仅是犯罪的实用需要。

当要求犯罪心理画像者对犯罪标记进行推理时，他可能还不掌握所有的案件事实，或者被一些错误的侦查假设所误导。因此，一名优秀的犯罪心理画像者应该考虑如下一些因素：

1. 是否有合理而足够的行为证据对犯罪标记作出解释（例如，现场再现是否完整准确，现场再现的原始记录是否充分，找不到伤口是否由于尸体腐烂所致，等等）。

2. 行为证据是否充分地显示了犯罪人的需要（例如，是不是有犯罪活动被打断的证据，作案人是不是有时间做完他要做的全部事情，尤其是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等等）。

3. 表明标记行为的证据是犯罪人持续性幻想升级或变化的一部分，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相对稳定的部分。

如果考虑了上述的问题，就可以肯定地解释犯罪人的特征、其标记行为的模式，根据充分的自信对已考虑的情况进行选择，开展串并案工作，确定标记性特征，进行其他推论。理解犯罪标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侦查手段，也是获知犯罪人的幻想和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怎样，即使犯罪标记的概念已被大量地研究并记录在众多文献中，仍然要根据犯罪现场的行为和人的发展的实际情况去理解和把握，需要慎之又慎。

案例

笔者曾经应辩护方之邀对一起系列谋杀案进行勘查。起诉方聘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专家来复查这一案件以便运用标记来并案和确定施虐行为的可能性。专家递交了一页半的报告来总结他的发现，其中的语言使被告方感到非常疑惑。

被告方请求笔者来复查专家提交给起诉方的材料，并考查这些材料作为报告结论的理由是否充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被告请求，对于审查和平衡这一对抗性诉讼过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报告的前三段是这样的（斜体字部分是强调的重点，并省去了一些指名

道姓的材料)：

基于你们的要求，我准备了这一简短的报告来总结我的结论，正如上面的标题概括的那样。你们也知道，我的结论是根据你们的官员提供的照片和文件而作出的。由于律师的拒绝我没能与被告见面。

在审查的材料中，我发现结论性证据是被告对两名幸存的受虐者（女性，匿名）实施性虐待，还谋杀了一名被害人（女性，匿名）。在对被杀害的女性实施性虐待的行为与对另两位实施性虐待行为具有心理同一性。

同样明显的行为也显示在谋杀现场，你们非常熟悉，不再赘述。其中包括使用钝器造成的外伤、使用钝器控制被害人、利用捆绑方式进行性奴役、给被害人插入外物……还有使其窒息。

这项报告继续列举了五项“明显行为”的例子，都是由被告人对几名尚活着的被害人实施的，这些被害人遇到的是相类似的犯罪侵害（无论如何这不等于完全相同的行为）。这项报告结论存在以下的系列问题：

“心理同一性”（Psychologically Identical）的概念

这是专门用于特指犯罪人标记的术语，正如已讨论的，考虑到犯罪事态变化的高度差异性和环境对犯罪现场和犯罪现场行为的不同影响，两起案件纵然是由同一个犯罪人策划和实施的，其物质上或心理上的反映也不会完全相同。纵览两起不同案件的犯罪人行为，无论比较其行为还是动机，都不能简单地用“同一性”的概念。

然而，上述案例中的专家并没有说犯罪人的标记是相同的。他只用了“心理同一性”，说明被告对幸存的被害人实施的性虐待行为和对谋杀的被害人实施的性虐待行为具有相同性。在此，具有“心理同一性”行为有以下两种之一的解释：

1. 同一犯罪人为了满足完全相同的需要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同类地点对同类受害者施以完全相同的行为。
2. 犯罪人为了满足大致相同的心理需要在两个不同的犯罪现场实施了相似的犯罪行为。

第二个含义就是此案专家所希望的结论，因为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两个不同的案件能够根据标记并在一起。然而，第一个含义才是这一术语真正的含

义，是司法人员和陪审团应该听取的内容，然而缺乏解释。在专家报告中也没有任何解释或讨论。

缺少犯罪再现或信息不充分

此案也没有进行谋杀犯罪现场的法庭再现。这意味着，一个有能力、有资格的刑事科学家没有运用物证来推断犯罪人和被害人的行为活动。案例中的专家仅仅依据犯罪现场的照片和一些可以得到的司法文件就对作案人的行为作出了正式的结论。

这位专家值得怀疑是否是一位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员，他没有资格从照片中解释（或再现）犯罪行为，而且，事实上他也没有试图确定或证明被害人是死前受伤还是死后又加上去的伤。这是重要的，因为在没有与犯罪人面谈的情况下，只根据犯罪人对被害人的行为就成了判断他是否施虐的主要标准。要确定犯罪现场的行为属于施虐，就必须证明犯罪人对被害人的伤害不仅是为了折磨被害人，而且是为了从中获得快感（参见第 21 章“施虐行为”）。

没有指出犯罪现场行为之间的主要区别

如果要对两起案件中犯罪人标记的相似性作出评判，那么就不仅要关注案件的相同之处，而且更要关注不同之处。作为专家必须愿意并能够解释其中的差别点。在本案中，犯罪现场行为之间最显眼、最突出的差别，或两起犯罪标记比较而言的差别在于，一起案件的被害人是两个活着的、事先自己愿意从事性交易（consensual）的被害人，而另一个则是被杀害的被害人。根据被害人面对犯罪人时的不同反馈（feedback）来判断，屈从的和不屈服的被害人引发犯罪人的心理反应是不同的。在涉及施虐的案件中更是如此，这类案件中犯罪人就是要引发被害人某种特殊的反应，笔者并不是说这些差异在具有相同的标记行为和标记特征状态下不能相容。然而，案例中的专家却根本没有谈到这类问题。

如果没有法庭科学家的犯罪现场再现，一个人就根本不能确定犯罪现场的行为。即使进行了最好的犯罪现场再现，对现场的行为结论也要有一些特殊限制性的前提，这些限制性前提能使我们结论的确定性程度有较为合适的把握。

在本案中，专家试图：

1. 使用一个过于自信的术语就来确定案件之间的联系。
2. 在没有进行犯罪现场再现，也没有亲临现场调查的情况下，仅仅依靠照片和一些报告就形成对犯罪人和被害人的结论。
3. 根据自己对犯罪现场行为的一些不确定的、道听途说的假设就得出对犯罪动机和犯罪意图的观点。

以上任何一项都能推翻报告中专家的结论。幸亏本案的法官对这项专家报告只是部分同意，而且认定其只有有限的证明力（limited testimony）。

不论结果如何，这是一次对犯罪现场行为和犯罪动机太过于自信的解释，致使犯罪心理画像在这一领域的运用遭到了损害，降低了所有专家证言的可信度；而且，还造成对刑事司法系统的损害，造成了对暴力犯罪被害人的伤害。如上所述，犯罪心理画像者应该对自己观点的自信度有一个合适的把握。

并案：法庭上的犯罪人标记

以下是在刑事案件审判中提出犯罪人标记，并作为判例的案件。如同犯罪惯技证据（modus operandi evidence）一样，当起诉方在缺乏物证的情况下要用其他犯罪案件中的证据来起诉被告时，犯罪人标记证据（offender signature evidence）也就成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手段在实践中的运用，下面回顾一些司法实践中的刑事案例（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任何司法问题，在不同的州、不同的法官对同一个基本的看法可能会有截然相反的解释）：

系列谋杀案：路易斯安那州诉纳撒尼尔·科德（1993）

在本案中，专家在法庭上就犯罪标记分析（signature crime analysis）和犯罪侦查分析（criminal investigative analysis）^① 进行作证，他们通过考查犯罪标

^① 联邦调查局为了表述他们犯罪心理画像的方法，习惯使用“犯罪侦查分析”（criminal investigative analysis）这一术语。使用这一术语至少部分上是要使他们的证言得到法庭更广泛的承认。改变犯罪心理画像的名称并没有获得什么成功，因为法庭毫不费力地认出它就是犯罪心理画像证据 [如新泽西州诉福蒂（1999），俄勒冈州诉杜恩（1999），宾夕法尼亚州诉迪斯特凡诺（2001）]。

记以确定案件之间的联系，^① 进而确认作案人的身份）结果证实纳撒尼尔·科德实施了 5 起一级谋杀罪行，最后被判处死刑。所有这些都是由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庭审理的。下列摘录完全节选自路易斯安那州诉科德案（Nathaniel Code, 1993）：

福特被谋杀案：1984 年 8 月 31 日

黛博拉·福特（Deborah Ford）是一位 25 岁的单身母亲，和两个女儿尼克（Nicki）（时年 9 岁）肖恩（Shawn）（时年 5 岁），住在什里夫波特雪松林地区（Cedar Grove area）74 号大街东 315 号。她们住的是一所较小的盒式的房屋（没有后门）。因为她家曾经被偷窃过，所以福特就让她爸爸把后门用钉子钉死，并把所有的窗户从外边都钉好防护纱窗。

1984 年 8 月 30 日，福特跟肖恩的父亲丹尼·沃尔（Danny Ware）一起带着女儿们逛商店给她们买校服。他们在大约晚上 9 时 30 分回到 74 号大街东 315 号。当时，丹尼·沃尔跟福特在外边说话，尼克回屋里取一个充填的长毛绒动物玩具准备去祖母家过夜。当尼克离开屋里的时候，她发现浴室的窗户是开着的，她关了窗户并在窗户框上竖直地放了一根木棍以免它再度被打开。窗户并没有锁，只有钉死的纱窗。只要摇晃窗户就能移开这根木棍。之后丹尼·沃尔开车带着两个女儿去了祖母家。

.....

正如她一贯的生活一样，她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睡觉。

1984 年 8 月 31 日晚上 12 时 30 分到次日早上 8 时之间的某个时间，一个作案人撬松了浴室窗户的纱窗并将其卸到窗外。他打开了窗户并用一片金属塞住以免窗户关上。当他进入房间的时候，在正对着窗户下面的浴缸上留下了一处模糊的半个脚印，而且在浴室内和窗外发现了断裂的油漆残片和灰尘。在他袭击黛博拉·福特时，家具被打坏，而且，沙发的坐垫也狼藉一片。福特在自卫时手部受了伤。

^① 并案（case linkage）或并案标记（signature linkage）是要论证在原先并无关联的两起或更多的案件中是否存在着关系的过程。其中涉及被害人学、犯罪惯技（MO）和标记行为（signature behavior），也涉及证人证言和法庭证据。

作案人从厨房里的箱式风扇上割下一段电线并用其将福特反绑。她的左手腕被电线缠得很紧，但右手腕缠得较松还有些空隙，就像一副手铐一样。而松的一头又捆到了左手腕上的电线上。福特嘴里塞着衣物。当作案人捆绑福特并往她嘴里塞东西的时候，他在沙发上刺了福特一刀，然后把她拖到地板上又刺了几刀。福特胸部被刺了9刀，左边2刀右边7刀。一些伤口很深足以刺到肺部。最后他把福特拖到房间中央，在她的脖颈处从左往右割了6刀。割断了颈静脉、颈动脉、喉管和食管，几乎深及脊柱。尽管福特胸部受了重伤，但当她喉部遭到割伤时还活着。她因过度出血而死。刑事侦查人员认为，整个犯罪过程持续了15分钟到半个小时。

.....

乔治·麦克阔密柯博士（Dr. George McCormick）是喀多人教区的验尸官（Caddo Parish Coroner）。他认为这是一起由单人作案并且有明显标记（signature）的犯罪。麦克阔密柯通知警方这是一起系列谋杀案，而且，凶手不久就又要实施犯罪。麦克阔密柯注意到四个标记特征：作案人对被害人的完全控制；作案人用刀捅伤、割伤被害人；用电线捆绑被害人；使用一种特有的打结方式捆绑。麦克阔密柯认为，作案人是右利手（right-handed）。

犯罪现场勘查在浴室窗户上、窗台上、屋内窗户下的墙上发现了3处新近的掌纹和1处指纹。发现这些痕迹的位置与某人要从屋外打开窗户的方式一致。所有的3处掌纹和指纹都与纳撒尼尔·科德（Nathaniel Code）的掌纹和指纹相匹配。

查妮被谋杀案（Chaney Homicides）：1985年7月19日

与福特在什里夫波特的家隔着几个街区，维维安·查妮（Vivian Chaney）和男友比利·乔·哈里斯（Billy Joe Harris），住在72号大街东213号。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有查妮的兄弟杰里·克尔伯特（Jerry Culbert），还有他的3个女儿，卡丽莎·克尔伯特（Carlitha Culbert）、汤米卡·查妮（Tomika Chaney）、玛拉·查妮（Mala Chaney）。维维安·查妮、卡丽莎·克尔伯特和杰里·克尔伯特的视力有损伤，汤米卡和玛拉是智障者。

1985年7月18日晚上11时30分到第二天早晨6时之间的某个时间，有人撬开了查妮家的后门，杰里·克尔伯特、比利·乔·哈里斯、卡丽莎·克

尔伯特和维维安·查妮被谋杀。每个被害人都死在单独的房间里。两个最小的女孩，10岁的汤米卡和7岁的玛拉没有受伤。

29岁的比利·乔·哈里斯在房间前面的卧室床上遇害。他头部左侧被垫住枕头销声后击中两枪，子弹穿透了枕头，胸部也被击两枪。他被击中后还依然活着，喉部被割断。他的手被鞋带反绑在身后，右手腕被牢牢拴住，左手腕打了个扣像手铐一样，脚踝也被鞋带绑在一起，手和脚被电话线捆在一起，他是穿着衣服的。

25岁的杰里·克尔伯特头部近距离遭到致命的一枪。他穿着睡衣死在卧室的床上。现场没有搏斗的痕迹，明显他是在熟睡时被害。在他身上并没有发现捆绑。

15岁的卡丽莎·克尔伯特死在起居室里。她俯卧在床上，有人用从熨斗上割下来的电线反绑了她的手背，这只熨斗是在这间房间里找到的。她的右手腕被牢牢拴住，左手腕打了个扣像手铐一样。她的左脚踝捆得比较松，好像作案人试图要捆住她的脚。她的左腿上拴了根鞋带，但没有系住。她嘴里被塞了镀银的管道带子。她穿着的短裤向外翻。

她的喉咙被割伤，尸体被轻微移动过。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差点被割掉头颅。她的身上有两大摊血迹：一摊在左腿膝盖附近，呈半圆形；另一摊在脖颈处，由于此处失血过多最终导致她死亡。

37岁的维维安·查妮的尸体倒在浴缸里。她的手被一根电话线反绑，这根电话线从前腰沿腿部向下捆住了她的脚踝。她被拴住后还艰难地走了几步。有证据证明作案人用另外的绳子套在她的脖子上牵着她走了几步。

维维安衣服背后、在臀部和衣服下边的折边处有大量的卡丽莎的血迹，证明在作案人最先割伤她女儿后，维维安曾坐在了女儿的血迹里。维维安身上有手掐的痕迹和绳子的勒痕，而且头部被重重打击过。她由于被掐扼窒息后在浴缸中被淹死。

.....

麦克阔密柯博士证实，此案是一人所为。他认为，此案是一个系列谋杀犯单独实施的。系列谋杀犯不仅重复犯罪行为，而且犯罪行为还会升级。麦克阔密柯认为，本案与黛博拉·福特谋杀案是同一个人实施的，而且，本案

中的犯罪行为升级了。这个系列谋杀犯很可能就住在附近，而且很可能就在现场围观的人群中。

犯罪现场显示了这个单独的谋杀犯与被害人之间互动的逻辑过程。麦克阔密柯推断，作案人用枪威胁着卡丽莎的生命借此要挟两个大人，命令维维安·查妮和比利·乔·哈里斯原地不动。他捆住了查妮使她只能走动，他还捆住了卡丽莎的手。在捆住了比利·乔·哈里斯之后，作案人把枪抵在枕头上销声将其打死，以免惊醒熟睡中的杰里·克尔伯特。杰里·克尔伯特在睡梦中被枪打死。接着作案人割卡丽莎的喉咙，但此时她还活着。他将维维安·查妮坐在自己女儿的血泊里，接着把她拖到浴室里，通过掐勒和水淹将其致死。当作案人回到起居室时，或者卡丽莎自己挪动或者他拖动了卡丽莎。作案人最后试图要割下卡丽莎的头颅。同时他又回到比利·乔·哈里斯那里，用刀在其脖子上捅。

侦查人员在查妮家旁边的小路上发现了塞在卡丽莎嘴里的管道带子的另一部分。犯罪现场勘查在维维安·查妮尸体的浴盆里发现了3枚新鲜的左手掌纹。麦克阔密柯推断这个右利手的谋杀犯用右手将查妮的头按到水下而用左手保持自己身体的平衡。有证据证明这些新鲜的掌纹是在浴缸上次被清洗之后留下的。这些掌纹后来与纳撒尼尔·科德的左手掌纹相匹配。

奥斯卡·华盛顿（Oscar Washington），一名国民警卫队的成员，当天凌晨2时15分左右在亨德森大街（Henderson Street）与72号大街和73号大街交错的路口附近跑步。当华盛顿沿亨德森大街向南跑时，他碰到了从邻居那里认识的纳撒尼尔·科德。他们交谈了几分钟，科德告诉华盛顿他正要去办事。华盛顿注意到科德腋下夹着一个卷起来的褐色小纸袋。华盛顿继续往前跑。科德沿亨德森大街向北，朝72号大街东走去。

大约45分钟以后，华盛顿折回来沿亨德森大街往北走。他又碰到了科德，这次是在72号大街与74号大街之间。科德身上沾着血迹，沿亨德森大街往南走。华盛顿问发生了什么事，科德说他和某人“打架了”，而且“终于占了上风”并且把事情“摆平了”。科德这时拿着一个印有薄荷口香糖条纹广告的包。科德试图将包里装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卖给华盛顿，包括华盛顿所描述的一把约20厘米长的匕首、一把手枪、信用卡、食物购物券和一些大麻。

华盛顿注意到食物购物券上抹着血迹。

.....

科德从1985年3月12日到7月初一直受雇于一个水管工。很多证人证实科德从未租借过72号大街东213号房间，也从未在这房间里修过水管。在查妮家旁边的小路上发现的管道带子和塞在卡丽莎嘴里的管道带子与后来在科德家里发现的管道带子在化学成分上相同。这些管道带子或者本来就是同一卷带子，或者是由同一家公司生产的不同卷的带子。这些带子都是水管工人和其他专业人员专门使用的，在零售店里是买不到的。

威廉·科德谋杀案（William Code Homicides）：1987年8月5日

纳撒尼尔·科德（Nathaniel Code）73岁的祖父，威廉·T. 科德（William T. Code），住在什里夫波特（Shreveport）66号大街西641号。1987年8月5日，他与一个朋友恩摩亨·威廉（Enamerteen）的两个孙子在院子里干活。在晚上8时之前，有人还看见这两个男孩，8岁的埃里克·威廉（Eric Williams）和12岁的乔·罗宾逊（Joe Robinson）跟威廉·科德正在院里干活。威廉太太（Mrs. Williams）电话里也应允他们晚上跟威廉·科德在一起，他们经常这样。

第二天上午，这两个孩子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家，威廉太太觉得有些不对劲，于是下午去了威廉·科德家。大门紧锁，门窗上钢制的防盗栏杆使她没法进去。从外边看并没有暴力入侵的痕迹。虽然当她敲门时没人应答，但她却听到里面有音乐在响。后来发现电视机是开着的。透过窗户她看到了乔·罗宾逊被捆住脚。威廉太太赶快回家，报了警并带着她的弟弟、侄女、孙女返回威廉·科德家。在用她的钥匙撬开一扇窗户的防盗栏杆之后，威廉太太和她弟弟看到了威廉·科德和两个孩子的尸体。3具尸体是在不同的房间里被发现的。

乔·罗宾逊的尸体脸朝下俯卧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他的前额遭到了猛烈的殴打，一拳就足以令他晕倒。肩膀皮下和两锁骨处都发现有淤伤。脚踝被一根白色的塑料绳捆着。绳子的两头在脚踝一侧系着，还留着空隙。同样长的绳子把他的手反绑在身后，塑料绳的一端系着一个手腕，另一端系着另一个，就像手铐一样。一条宽松的绳子缠着他的脖子，固定着口中的堵塞物使

他窒息。作案人用两倍长的绳子扼死了他。当时这个孩子只穿着一条衬裤，而且衬裤向外翻。

在一间小卧室里的成对双人床中间的地板上发现了埃里克·威廉的尸体，他脸朝下躺在地上，是从一张床上拖下来的。塑料绳缠着他的脖子使他窒息。他的手与另一个男孩的捆绑方式相同，像手铐那样捆着。绳子捆了一只脚踝，另一只没捆。现场没有搏斗的痕迹。孩子当时穿着一条短裤。

威廉·科德的尸体脸朝下躺在自己的床上，穿着一身睡衣。电话线捆着他的脚踝，这根电话线沿着腿部往上一直捆住了他的手腕。他的手像手铐一样被反绑在身后。电话线缠着他的脖子固定住口塞物，正好令他窒息。

验尸官说，威廉·科德头部一侧受到了重击足以使他死亡。脑溢血是由于头部被击打所致。胸部被捅了5刀，背部7刀，其中有长长的一刀割断了右臂上方的大动脉。有一些伤可能是致命的，然而，威廉·科德是由于这些共同伤的作用而致死。北路易斯安那州犯罪实验室的帕特·沃杰克韦兹（Pat Wojtkiewicz）通过勘查证实了在威廉·科德被杀的卧室墙上的血迹是中等血流速度喷溅形成的。

麦克阔密柯认为，这起案件也是由一人所为。两个男孩被同样的方式捆绑、被同样的方式窒息、被同样的方式杀害。作案人用房间中的物品捆绑威廉·科德。麦克阔密柯认为被害人是按照被现场侦查人员所发现的顺序一一被害。既然没有暴力入侵的痕迹，罗宾逊可能让他从前门进入。罗宾逊头上挨了重重的一拳而倒下，接着被窒息、捆绑、扼死。埃里克·威廉睡在前面的卧室，可能在睡梦中被惊醒。现场并没有搏斗的痕迹。接着埃里克·威廉就被捆绑和杀害。

麦克阔密柯认为，作案人的目标是杀害威廉·科德。因为这两个孩子身上并没有过度杀害的痕迹，也没有使用刀。相比之下，威廉·科德头部被反复击打，而且将其翻滚，前胸后背被捅了许多刀，这对于致死他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麦克阔密柯说，这一行为显示了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情感纠葛。

在威廉·科德家里没有发现钱，但是他在被害前一天才兑现了支票，总共大约在400美元到600美元之间。在现场还发现丢失了一支小口径手枪。侦查人员在距威廉·科德家大约180米的泄洪下水道里发现了一把刀和一串

钥匙。这把刀与在威廉·科德家厨房里发现的一套用具很相似，这串钥匙是威廉·科德家门上的钥匙。

.....

在发现了死者的尸体之后，纳撒尼尔·科德到负责侦查的警官那里说自己是死者的孙子。他说，当晚案发前大约 10 时 30 分到 11 时之间，威廉·科德给他打电话让他到家里去一趟，有人在房子外边徘徊。科德说他大约在凌晨 2 时，也就是在 8 月 5 日凌晨 2 时到了祖父家里。在祖父开门把他迎进家里之后，他检查了整座房子并在房子周围寻找可疑的人，之后就骑车离开了。后来他又回到房子周围检查了一番，最后就骑车回家了。

纳撒尼尔·科德同意跟警察一起到警察局做一份笔录，因为，他显然是最后见到他祖父的人。侦查人员开始怀疑科德，因为他说他在祖父家里动过吸尘器、风扇、湿度调节器和电话，而捆绑被害人的电线正是从这些物品上割下来的。科德同意警察拿走他昨天穿着的衣服和鞋。

他的指纹和掌纹印与在谋杀查妮一案的现场提取的新鲜掌纹印相匹配。科德被告知其宪法权利（constitutional rights），接受了警方讯问，警方怀疑他实施了查妮谋杀案而将其逮捕。后来，犯罪实验室的帕特·沃杰克韦兹在科德穿着的网球鞋上找到了以中等血流速度喷溅的血迹。虽然犯罪实验室能认定这血迹来自人体，但由于量很少以至于不能作进一步的血型测定。

后来，警方征得科德夫人的同意搜查了他们家。在搜查中警方发现了一些割断的电线和一些专业人员专门使用的管道带子。

如前所述，路易斯安那州递交了喀多人教区验尸官乔治·麦克阔密柯博士的专家证言。麦克阔密柯证实，这 3 起案件有犯罪标记，是由一人所为。他认为，犯罪人是以一种连续的方式实施犯罪行为，而且，在捆绑和杀害被害人的方法上具有相似性。麦克阔密柯博士坚信，用电线像手铐那样捆绑被害人、单独使用刀来捅或割被害人，以及固定被害人的方法都是标记行为（Louisiana v. Code, 1993）。

路易斯安那州也邀请了犯罪侦查分析领域的专家，联邦调查局的特殊监督顾问（Supervisory Special Agent）约翰·道格拉斯做一份专家证言。他的证言是这样陈述的（Louisiana v. Code, 1993）：

他解释了“犯罪惯技”与犯罪“仪式特点”(ritual aspects)之间的差异。犯罪惯技是习得的行为,习得的犯罪行为能够改变、能够模仿,并能根据特殊情境需要而调整。而犯罪仪式方面却是不能改变的,它与犯罪人对某些事物的内在需要有关。道格拉斯认为,这些谋杀案是由一人所为。

道格拉斯承认,这些案件在进入现场、使用的犯罪工具,以及杀害被害人的时间顺序等方面的犯罪惯技差异性很大。但是,这些案件却有一些相同的犯罪仪式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明显的手铐式的捆绑方法。道格拉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捆绑方法,他问过的犯罪执法人员也没有一个人见过这种方法。除了独特的打结方法以外,道格拉斯还指出了,犯罪人使用房间内的电器这一特征。犯罪人捆绑的方式是如此独特以至于他说:“如果你把这些案件合起来放到一个文件里,你会发现并说‘这些都发生在一个案件中,简直是同一个例子’。”他指出,薇薇安·查妮和威廉·科德就是以相同的方式捆绑的。

道格拉斯认为,犯罪人另外的一个仪式特点就是他操纵、支配、控制被害人的需要。将被害人的尸体放置在不同的房间里表现出这种仪式(ritual)。放置黛博拉·福特和卡丽莎·查妮的方式几乎是一样的。

道格拉斯还指出,在每个犯罪现场都有对被害人过度施暴的特征。譬如,被害人不仅被刺死,而且几乎被割下头颅。另外一个仪式特点是作案人主要使用刀具杀人。这些案件的仪式特点是如此相同,以至于道格拉斯谈到:“我们认为在这些案件中确认标记方面并不困难。”甚至到过3起案件现场的每个执法警官都确信这些案件是由同一人所为。

审判法庭认为,这种证词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是清楚的、令人信服的,极少有偏见而证明度高。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庭同意法庭的判决。他们同意“查妮谋杀案、福特谋杀案和威廉·科德谋杀案的仪式特点如此明显,能够得出‘它们是由同一作案人所为’这一结论”(Louisiana v. Code, 1993)。

抢劫、系列强奸和谋杀(见图15-3、图15-4):^①

琼尼·迈尔斯(Johnny Miles)因涉嫌3起抢劫强奸案和1起抢劫谋杀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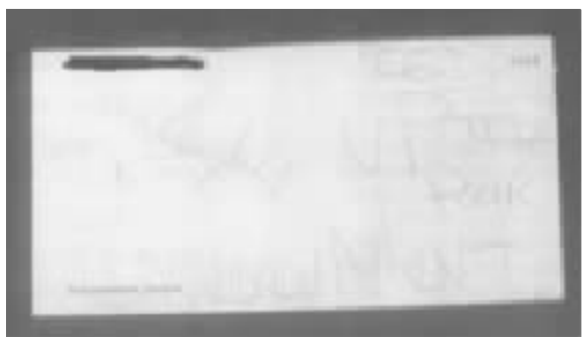
^① 加利福尼亚州诉琼尼·迈尔斯一案(California v. Johnny Miles)(1999)。



a



b



c

里亚尔多一案犯罪现场的照片。被害人在浴室和办公室中央被残忍地攻击。与别的被害人不同，她明显是进行了反击。她也是惟一的一个遭受了过多的、不仅仅是要置她于死地的暴力的被害人。尸体在一间办公室里发现，脸朝地板。毛线衫缠着脖子，双手在腰部被电话线捆绑。尸体旁边的地板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政府醒醒吧，养活穷人”

而被起诉。第一起案件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里亚尔多（Rialto）强奸案件多发区，是一起抢劫谋杀案。有证据表明，作案人对这位女被害人实施了愤怒的报复行为，发现现场时，被害人已死（她被留在现场的钝器殴打致死）。在尸体腹部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政府醒醒吧，养活穷人”（见图 15-3）。第二起和第三起案件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维特韦尔（Victorville）和圣本纳迪诺地区（San Bernardino），作案人用枪（半自动小口径枪）对白人女性实施抢劫强奸案。在这两起案件中，犯罪人对被害人表示出一种源于自信的行为（reassurance oriented behavior）。而在圣本纳迪诺案中，有意思的是犯罪人在房间里强奸一名女子时，还有一名男性被害人也被绑在屋子里。在强奸的整个过程中没有涉及枪杀的行为。第四起案件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托兰斯市（Torrance），此案用枪（左轮手枪）抢劫强奸一名白人妇女（见图 15-4）。在这起案件中，犯罪人显得非常自负：威胁、咒骂、侮辱男性和女性被害人，而

图 15-3

且在强奸行为中持枪威胁受害人。迫使女性被害人与男性被害人进行口交，与此同时他从女被害人背后对其实施暴力的性行为（Louisiana v. Miles, 1999）。



托兰斯案件的犯罪现场。犯罪人在办公室搜索贵重物品，走后一片狼藉。女性被害人在枪口下被强奸，而且犯罪人强迫她与她的男同事在他面前发生性行为。如图，被害人的皮包被翻动并扔到了地上。这一犯罪现场与维特韦尔（Victorville）和圣·本纳迪诺（San Bernardino）的犯罪现场有一定的共同性。

图 15-4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刑法第 1101（b）条，已指控罪行或未指控罪行（犯罪嫌疑人已经确定，但还没有指控的案件）的犯罪证据可以用来证明相同的犯罪计划、方案、图谋，如果这些犯罪都是非常相似的话。^① 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第 1108 条则对第 1101 条提出特殊的例外说明，即在性犯罪案件中，一个人被指控实施了性犯罪行为，起诉方应该提供被告以前的或他曾实施过其他性犯罪证据来表明这个人有被指控的性犯罪倾向。这是在认定“色狼”（sexual predators）时一个特殊的规定。问题在于，允许这种行为证据成立却没有实质性的物证予以印证，根据加利福尼亚州诉爱华德一案（1994），这样

^① 加利福尼亚州诉爱华德一案（California v. Ewoldt）（1994）。

非常容易导致偏见，故而应予以格外审慎地分析。

笔者被辩护方邀请对出现在这4起案件中的犯罪惯技和标记行为进行分析。笔者面对的问题不在于这4起案件是否是同一人所为，而在于这4起案件中的犯罪行为本身是否存在一种完全区别于其他案件的行为模式，并根据这种行为模式就能将这些案件进行“并案鉴定”（probative linkage）。^①在对每个案件中的物证和行为证据进行认真考查之后，笔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这4起案件中并不存在明显一致的（是可验证的）犯罪行为证据。当然，缺乏犯罪行为证据并不能排除一个人实施这些所有罪行的可能性。为了审判的目的，笔者在听证会上对这些案子分别提供证言。

法官在主持全部听证会后同意了以下的规则（Louisiana v. Miles, 1999）：

法庭在这之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无论关于托伦斯案件的介绍补充了什么材料，陪审团都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得出结论，即这些审理的案子与托伦斯案件是否由一人所为。

如果迈尔斯与托伦斯市案件有关，那么我认为，证据就是证人能指出犯罪人。如果这两个人来到这里指认说，就是这名犯罪人在托伦斯市案件中袭击了我，那么，他们告诉陪审团的能否证明迈尔斯也是圣本纳迪诺地区案件的作案人呢？如果这两起案件没有明显的相似性，那我们就不得不把这样的陈述搁置到一边。如果没有什么相似或惟一的标记来帮助陪审团决定是否迈尔斯在这个地区实施了犯罪的话，那么，圣本纳迪诺地区案件在此就没有鉴定的价值。

即使有少量的证明价值，那么法庭也必须权衡一下：这种鉴定的价值是不是要否定其他的相关因素，是否作为一种煽动性的证据。因为涉及其他强奸

^① 笔者用“并案侦查”（investigative linkage）和“并案鉴定”（probative linkage）的术语来讨论法庭上提到的案件问题。并案侦查（investigative linkage）是指将一起或多起已破或未破案件联系起来用来分享侦查信息资源（例如，根据犯罪行为、一般的犯罪环境或利于机会犯罪的特殊环境，犯罪惯技之间的相似性，不同的标记行为中显示的相似的标记方面）。这样并案，本身就意味案件需要进一步进行侦查。并案鉴定（probative linkage）是指将一起或多起已破的或未破的案件联系起来，这些案件有足够的推论证明是一人所为（例如，根据行为、明显的犯罪惯技和明显的标记行为，将多起案件中的证据并在一起进行鉴定），并案鉴定还可以用于物证鉴定，如DNA或指纹等。

案件，所以这一鉴定要求具有明显的煽动性。而其他强奸案件中的性行为是不同的，当时被害人正在怀孕而且染有性病。那起案件确实有很多煽动性。因为它正好发生在此案之后。

正如你所知，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当人们知道某一具有犯罪倾向的人在那时实施了这类犯罪，而那时我们这里也正好发生这类犯罪，我不能断定，能否以此来推断是一个人作了这两三起案件，或在数月之后还作了第四起案件。

因此，我认为托伦斯市案件具有极少的证明价值，并且，在此提出托伦斯市案对陪审团有很大的煽动作用。我认为，在哈里斯案件上应该排除这一证据更为合适。

在笔者作证的这起审判案例中，关键不在于证明这所有的案件是不是一个人所为，而在于本案缺乏明显的用于并案的行为证据。将这种未指控案件排除其结果会使审判更加公正。在2000年2月，琼尼·迈尔斯因实施了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里亚尔多的第一起案件而被确定有罪，并处以死刑。

俄勒冈州诉约翰·杜恩一案^①

在本案中，州一方提供了一份刑事调查分析专家的证词，这份证词显示，以前发生的一起盗窃案和现在指控的绑架案与入室盗窃案有相似之处，并提出，杜恩具有对被害人施加支配和控制的主观故意。审判法庭认为，这项证言是不能予以采纳的。上诉法院认为，这项证据带有偏见，与证明杜恩犯所指控的罪行并没有关系。下面完全摘录于俄勒冈州诉约翰·杜恩案（1999）的事实：

1997年2月，有一个人进入了尤金（Eugene）地方的一家便利店，他从后面抓住了一名正在上班的职员，用刀抵住她的喉部，逼迫她打开现金箱，但并没有马上拿钱。接着他把这位职员拖出了便利店。当她反抗时，他说：“闭嘴，不然我就像剖鱼一样给你开肠破肚。”两名顾客上前来救这位职员，这个人就放了她并逃跑了。后来这名职员和顾客认定这个人就是被告，尽管指认不是很把握。指证方力图用下列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立场，认为被告实施了这起犯罪：

^① 原文为：OREGON v. JOHN DUNN, 1999（译者注）。

第一项证据是指证方提出一起发生在 1982 年 6 月 5 日的一起小事件。那时被告 17 岁。当时一对夫妇正在胡德（Hood）河南边建立的露营场上的一辆大众汽车露营篷货车里睡觉。被告进了这辆车，他叫醒这对夫妇，用来福枪指着丈夫并告诉他老实呆着否则就让他脑袋开花。然后他命令妻子走出这辆车并跟着他。他没有偷任何东西的企图。当妻子准备离开时，丈夫抓住了来复枪。于是被告驾驶着他原先停在附近的宾得牌汽车跑了。丈夫用枪朝他逃跑的方向开了一枪。当他被捕时，他坚定地说他只是想偷那辆篷货车。他被作为青少年盗窃被指控。这一记录并不能成为目前对他任何裁决的依据。

第二类证据是他被捕后在他家里发现的一些物品。包括在他房间里发现的几把刀、一把弩弓、飞机模型和一张 13 世纪的凶器海报，并在他妻子房间里发现了一本名为《“葬礼”——一个连环杀手的“真实犯罪”故事》的书。被告的嫂子说她曾带着这本书到被告家里，回去时不小心就忘在了被告妻子的房间里。

本案中，指控方提供了西雅图警察局（the Seattle Police Department）警官罗伯特·盖博（Robert Gebo）的专家证言，他是一名犯罪侦查分析专家（Oregon v. John Dunn, 1999）。

盖博一直研究这类犯罪人实施过的犯罪特征来帮助侦查人员发现犯罪人。他肯定地证实，1982 年那起案件的特点与本次审理的被告行为相关。他认为，这两起案件都实施了过分的暴力，因为使用的凶器和与被害人的对抗是远远超出正常范围的，而且这两起案件所实施的暴力距离也非常近。盖博认为，这表明犯罪人有一种对被害人施加支配和控制的意图。盖博还证明，被告房间里的物品显示了犯罪人过着一种以支配和控制为中心、极具“幻想”的生活。在交叉询问中，盖博承认，当他描述事实具有相关性时，他的意思是说，这种相关判断只是提供给警察进行侦查时考虑，而不是依照俄勒冈州证据规则中事实关联性的法定标准进行判断。

上诉法院认为本案的事实不能满足俄勒冈州关于证据规则中事件相关性的法定标准。而且还认为，盖博警官的证据几乎是充分地说明杜恩具有犯罪倾向性，但这并不能被法庭认可，这份证言是不能被接受的。

使用犯罪倾向因素的说明可以帮助侦查人员将侦查重点放在某类具有犯罪倾向的犯罪嫌疑人身上。然而，当侦查工作结束后，犯罪倾向因素就不能

用于帮助确定警察已经抓住的犯罪嫌疑人，就是事实上的犯罪人。无论怎样，在法庭上都需要证据来证明某一特定的犯罪人与某一特定的犯罪事实的关系。正如盖博所承认的，对警察侦查有帮助的相关性并不能面对法庭的质询。

新泽西州诉史蒂文·福蒂案（2000）^①

1995年4月3日，缅因州（Maine State）的警察、34岁的维姬·加德纳（Vicki Gardner）遭到性强暴，脸部严重受伤并被勒死。史蒂文·福蒂（Steven Fortin）承认了这次罪行，因而被判处了20年的监禁。1994年8月，新泽西州阿凡纳地区（Avenel），25岁的梅丽莎·帕迪拉（Melissa Padilla）在一家快克便利店购物后，在回家路上遭到强暴，凶手重击她、抢劫她，最后将她扼死。州里聘请已退休的联邦调查局官员、犯罪心理画像者罗伊·哈兹伍德（Roy Harzelwood）来分析有关帕迪拉谋杀案与攻击加德纳的事件和材料，目的在于通过两起案件的“并案分析”来确定这两起罪行是否为同一名犯罪人所为。分析包括两起案件的犯罪惯技和标记行为（New Jersey v. Steven Fortin, 2000）。

根据哈兹伍德分析，这两起案件中，有15处相似的犯罪惯技行为。具体包括：犯罪风险高；实施犯罪时有明显的冲动性；被害人都是女性；被害人的年龄相仿；被害人都从犯罪人身边走过；被害人单身一人；袭击行为发生在擦身而过之时；犯罪地点都选在邻近或就在高速路边道上；犯罪都发生在黑暗中；袭击都没有使用凶器；用重拳伤害被害人，致使其鼻子断裂；主要拳击脸的上部，牙齿未受损伤；下身的衣服被扒下；在被害人的短裤或者裤子里发现了紧身短裤；衬衫也被扒掉、胸罩脱落；被害人体内或身上没有发现精液。然后，哈兹伍德又指出，犯罪行为中有5个发泄愤怒的相似标记行为，具体包括：咬下巴，咬侧面的左乳房，穿透并伤害至肛门，残忍的面部击打，以及从正面将被害人用手扼死。哈兹伍德的报告总结如下：

我35年来经历了美国、欧洲、加拿大和加勒比海地区（the Caribbean）大量的暴力犯罪。我还从未见过一起暴力犯罪中包含如此多的行为特征。不同的犯罪人若能实施这样两起如此高度相似的案件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根据这两起案件的犯罪惯技和仪式行为的比较结果，我认为这是同一个

^① 原文为：NEW JERSEY v. STEVEN FORTIN, 2000（译者注）。

人先是杀害了梅利莎·帕迪拉，之后又杀害了维姬·加德纳。

哈兹伍德提供了他撰写的真实犯罪记录——《人类的罪恶》（哈兹伍德和米查德，1998），为了让人们了解这类主题。其中他提出，犯罪人的标记如同指纹和 DNA 证据一样都是独特的。在这一案件中，法庭引用了新泽西州诉凯利案（1984）的判例中采取证词的标准，它包括“一般接受”的语言和“完全超出一般情况调查者的普通知识之外”的语言。辩护方曾提出要求排除哈兹伍德的证言被法庭的法官否定。因此，福蒂被判决是梅利莎·帕迪拉的主要谋杀者。

1999 年，上诉法庭则推翻了对哈兹伍德证言的认可。他们认为，并案分析（考虑并比较犯罪人的行为惯技和标记行为模式）并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证据。他们还提出，并案分析涉及行为科学的应用；同样，也应该如同科学证据一样经过检验评估。进而，他们提出，如果陪审团已经知道哈兹伍德证言的结论性内容，就应该对其提出限制性的指导，以消除专家在表述自己的意见时认为“被指控的被告是有罪的”的证言对陪审团的影响。

2000 年，新泽西州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支持上诉法院所作的决定。这里包含两个问题：第一，起诉方在提出认定犯罪的证据时，能否采用“相似犯罪的证据”，这是一个问题。第二，起诉方聘请的证人是否有资格作为一名专家，就犯罪仪式和标记特征通过并案分析认定犯罪人在缅因州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又在新泽西州进行了凶杀犯罪。州最高法院作出裁定，认为并案分析的专家证言缺乏足够的科学可信度，因而不能采用，但是，缅因州实施犯罪的证据在法庭适当限制性指导的情况下可以采用。

州最高法院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哈兹伍德用所谓的犯罪案件经验来代替有辩护力的科学事实和研究。桑顿（Thornton，1997）明确警告这是一种不合法的法庭实践。

……哈兹伍德没有就对被害人的撕咬痕迹、肛门撕裂和凶残的面部袭击的行为进行调查。综观 4000 个案例，假设有这样一个案例数据库，那么，专家的证言就很容易被检验，而且使用证言也不会引起任何目前对这份专家证言使用不当的关注。

州最高法院还指出，本案在涉及并案分析的问题上过分相信熟悉的专家，以至于影响了科学的原则。据布思（Booth）记载（2000）：

为了使有效的分析能够被接受（指法庭），欧赫恩（O'Hern）写道，这种分析必须能够进行科学的检验，法定的记录和法庭的辩论。他说，哈兹伍德的证言缺乏检验，特别是其中的并案分析只是哈兹伍德和他几位亲密的合作者才涉猎的领域。

欧赫恩解释说：“至于并案分析在科学团体内被很多人所接受，哈兹伍德在其证言中提到的其他专家要么是现在的、要么是他以前的合作者。”在这方面，没有与其水平相同的人来验证他的理论，也没有重复检验结果的方法。”

在此还记录法官朗（Long）的不同意见。她同意其他法官的意见，即哈兹伍德没有资格作为一名并案分析专家作证，因为他的证词并不可靠。无论如何她都认为，即使在一个有限制的指导下也不应该采用缅因州犯罪的事实。她写道：

我个人认为，根据高等法院和法官的意见，已经排除了哈兹伍德就并案分析作为一名专家证人，即使如此，他提出的同一性认定也有着可信度的缺陷。并案分析只是犯罪侦查中的一种手段，当发现不同案件中的犯罪惯技和仪式特征有很高的相似性时，侦查人员或许得出结论说，这可能是由同一名犯罪人所为。同一性认定是并案分析的另一种说法，当哈兹伍德作为一名侦查人员而不是作为一名仪式行为分析“专家”作证时仍不具有更多的可靠性，总之，在没有专家的情况下我不会承认缅因州犯罪的证据，我仍与高等法院一致认为哈兹伍德并不具备专家作证资格。

笔者也不赞同新泽西州诉史蒂文·福蒂一案（2000）中的专家证言，而且笔者认为，他把标记分析同刑事科学中的DNA分析相比较是一种混淆。它们完全不是一回事。前者涉及的是行为的动力特征，而后者涉及的是固定不变的分子化学。将这二者进行比较是非常不恰当的，甚至是误导。笔者非常同意朗法官的意见和理由。

参考文献

1. Booth, M. (2000) "Linkage Analysis' of Crime Profile Called Junk Science Junk Science by N. J. Court", New Jersey Law Journal, February 29.
2. California v. Ewoldt (1994) No. S023804, 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 1994 (27 Cal . Rptr. 2d 646).

3. California v. Haston (1968) Crim. No. 11710, Aug. 19, 1968 (70 Cal. Rptr. 419).
4. California v. Miles (1999) No. FSB 09438, January 6th, 1999.
5. Douglas, J. and Olshaker, M. (1995) Mindhunter, New York: Scribner.
6. Hazelwood, R. and Michaud, S. (1998) The Evil That Men Do,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7. Keppel, R. (1995) "Signature Murders: A Report of Several Related Cases",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40, (4, July), 670 ~ 674.
8. Louisiana v. Code, Jr. (1993) No. 91 - KA - 0998, Nov. 29, 1993 (627 So. 2d 1373).
9. Money, J. (1988) Lovemaps: Clinical Concepts of Sexual/Erotic Health and Pathology, Paraphilia, and Gender Transposition in Childhood, Adolescence, and Maturity,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0. New Jersey v. Fortin (1999) 318 N.J. Super. 557.
11. New Jersey v. Fortin (2000) ND. A - 95/96 - 98, Supreme Court of New Jersey, 2000 (745 A.2d 509).
12. New Jersey v. Kelly (1984) 97 NJ 178.
13. Oregon v. Dunn (1999) 10 - 97 - 02208; CA A98958, May 12, 1999 (981 P.2d 509).
14. Pennsylvania v. Distefano (1999) August 16, 2000 (2001 WL 923333).
- Thornton, J. I. (1997) "The General Assumptions and Rationale of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in Faigman, D., Kaye, D., Saks, M. and Sanders, J. (Eds) (1997)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Law and Science of Expert Testimony, Vol. 2,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
15. Turvey, B. (2000) "Offender Signature", Encyclopedia of Forensic Science, London: Academic Press.

第16章 犯罪动机

Brent E. Turvey, M. S.

考虑每件事情源于何处，组成成分，它将变成什么，改变之后又将变成什么……

马库斯·奥勒留，思想家（Marcus Aurelius, *Meditations*, XI: 17）

……动机弄不清楚，犯罪就会模糊不清。

西奥多·雷克（Theodore Reik）：《未知杀手》（1945，p. 40）

在刑事起诉中（criminal prosecution）判断犯罪动机并不是必须的而只是一种法律上的状况。但在案件的刑事侦查中，如果不判断犯罪动机那将是一种严重的缺陷。犯罪动机只能根据侦查所获得的事实进行推理才能得以确定。因此，一项胜任的、完整的侦查才能推断出犯罪动机（有时动机是非常明显的，仅需要进行略微的侦查或者根本不用侦查就可发现）。一项侦查，如果没有找到隐藏在犯罪背后的动机，那我们就通常认为它并不完整。

暂且不谈需要驱动，^① 找到隐藏在犯罪背后的动机能给我们的犯罪侦查以及之后的诉讼（或辩护）提供许多的便利：

1. 对那些有特殊动机的个体进行分析可以缩小犯罪嫌疑人的范围。
2. 动机分析可以协助我们将那些一直悬而未决的案件通过相似动机进行并案侦查。
3. 连同其他种类的证据（如工具、机会、辅助证据等），动机分析还能间接地提供与犯罪嫌疑人身份有关的情况。

^① 要理解犯罪人和他们的动机就要了解两种类型的需要驱动。第一种是人性中的阴暗面，即贪婪好色的需要。第二种是犯罪人才具有的需要，他们的需要与我们是分离的，是不一样的。

4. 连同其他相关联的证据（contextual evidence），动机分析还能够提供有关犯罪人心理状态（state of mind）的情况。

5. 连同间接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动机分析还能帮助我们判断一起犯罪是否真的发生。^①

动机定义

伦纳德（Leonard，2001）在撰写《与法律问题有关的证据特点和动机证据》一书时，提出相关的动机界定：

动机（motive）是一种心理状态。字典通常把动机定义为“促使人们以某种方式行动或决定意向活动的东西”，并把这个术语与诱因和刺激等同。威格莫（Wigmore）则把动机视为欲望和情感，或将其与感情和激情同等对待。怀特（Wright）和格雷厄姆（Graham）假定在“其他的犯罪规则（crime rule）”中使用的动机“普遍被认为是一种促使人实施某种特殊行为的心理或感情状态，一种意志活动的诱因”。在19世纪至20世纪交替时，法庭将动机定义为“一种为了达到某种确定结果而促使行动的动力（moving power）”。另一个对动机的相关定义是“一种促使人或人的心理（mind）试图纵容犯罪行为的诱因或感情状态”；并且像敌意和嫉妒这种情感也是使人产生某种特殊行为的动机源泉。

当我们从相似的角度界定动机时，我们要将动机与其他在具体案件中所争论的心理状态区分开来，如故意（intent），^②还要与某人“进行犯罪谋划”的心理过程区别开来……

① 在被告法案（Actus Reus）涉及的主题（犯罪是否发生）和动机问题上，伦纳德进一步指出（2001）：“在典型的刑事诉讼中，有大量的证据已经暗示着某种犯罪活动曾经发生……但是仍会对犯罪是否发生产生一些合法的争论。可能被害人的尸体永远也找不到，这给我们留下疑问，谋杀是否发生？也有可能尸体的情况使我们无法证明死亡原因，是自然死亡，自杀，还是其他行为导致死亡？还有很多实例由于缺乏物证和公正的证人，从而使犯罪是否发生成为一项有争议的问题。尤其是被指控乱伦和其他性犯罪，对其他犯罪说来也会有同样情况。”“在任何有争议的犯罪行为中，有证据证明被起诉人有实施犯罪的动机，在理论上就可以认为犯罪行为发生了。”

② 故意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时的意识状态，即犯罪嫌疑人对他们自己在做什么和这么做的后果的意识。动机与犯罪人普遍的欲望相关，故意则与完成一项特殊行为相关。

伦纳德（2001）进一步指出，动机不能直接得到证实。它只有犯罪人才知道，并且经常由于各种原因被刻意掩盖（有意或无意的掩盖）。然而，动机能够通过已有的或再现的犯罪现场提供的犯罪行为证据来推论。伦纳德（2001）解释如下：

从证据推论动机的存在，再从动机推论行为的产生，这个推论过程有时非常有力，有时又非常无力。在某些情况下，证据在推断某种犯罪动机方面能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且，在与其他相关心理特征相一致的情况下能为推断行为提供极大的帮助。但在其他情况下，其中一种或者两种推论都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有的动机太普遍而不能有效地推论。就像一名英国时事评论员指出的：“几乎每一个孩子都能从父母的去世中获得财产，但很少因此而被怀疑是杀害父母的凶手。”

与伦纳德（2001）提供的推断动机的基本方法相一致，欧·哈雷（O'Hara, 1970, p. 14）认为：

“动机”可以从现场中推断，与动机或心理状态相关的证据还可通过与目击者的交谈获得。同时，通过犯罪现场研究和犯罪现场再现，包括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前后的行为分析对动机判断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伦纳德（2001）或欧·哈雷（1970）的著作中未加以讨论，却是运用科学方法对动机进行判断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是如何证明虚假的动机推论，以及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如何推断出替代的或其他的动机。

为了达到这项工作的目的，我们把动机定义为在情感的、心理的、物质的需要的驱动下，通过行为得到满足的心理活动。而把目的定义为引导行为的某种目标。例如，一名妇女非常恨她的男朋友，因为他与其他女性有染并欺骗她。于是，她给他买了大额保险，然后在某天晚上乘他熟睡之际用枪将其杀害，接着，她把现场伪装成一起夜盗暴露后对事主灭口的现场。对她的犯罪动机可视为利益和复仇驱使。进一步说，她的目的就是杀害她的男友并获取保险金。所以，动机是一种普遍的需要，而意图是一个特殊的计划或目标。

标记特征和动机

标记特征（signature aspects）是犯罪人的动机主题或心理需要，它主要

通过犯罪人的标记行为来体现。这种标记特征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但也容易受到环境和幻想发展的影响。

为了解暴力犯罪人、残暴成性的犯罪人的动机，一名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格罗茨（Nicholas Groth）通过对犯罪人和被害人双方面的研究工作，得出研究结论并出版了关于 500 多个强奸犯罪人的研究结果（格罗茨，1979）。他的工作目的是为了指导治疗，他想通过对强奸犯罪人犯罪动机的分类研究来发展有效的治疗计划。在他的研究中，格罗茨发现，强奸就与其他的犯罪一样，是由复杂的、多重因素所决定的。强奸行为及其他相关的行为都能够满足犯罪人许多的心理需要（动机）（格罗茨，1979）。

兰迪·康门奥克斯（Randy Comeaux）——系列强奸犯



从前的拉斐特教区的县代理治安官，系列强奸犯，兰迪·康门奥克斯（Randy Comeaux）

图 16-1

1999 年 1 月，37 岁的欧内斯特·“兰迪”·康门奥克斯（Ernest “Randy” Comeaux）（见图 16-1），一名在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拉斐特教区（Lafayette Parish）县少年犯管理部有 20 年工作经验的调查员，承认他在拉斐特和阿卡迪亚（Acadia）共实施了 6 次强奸行为（据怀疑他至少实施了 8 次强奸行为）。被害人都是夜晚独自在家时受到袭击的。他带着滑雪用的面具和手枪，威胁被他强奸的妇女，如果敢报警就会杀害她们。他还从一些被害人那里拿走一些钱，并告诉她们以后如何避免再次被害（Woolhouse, 1999）。

康门奥克斯之所以被发现与这些强奸案有关，是因为警察在几起犯罪现场上，通过作案人遗留的烟头上唾液分泌物中提取出的皮肤黏膜细胞，最后认定康门奥克斯。一开始，他辩解由于精神错乱而无罪，后来他承认了 6 起严重的强奸案件。本地区的起诉官基思·斯塔兹（Keith Stutes）提供了以下细节（伍德浩斯，1999）：

1. 1986 年 11 月 2 日早晨 4 点半，一名拉斐特妇女被一只捂在嘴上的手惊醒，当这位妇女 8 岁的女儿走进房间时，康门奥克斯命令女孩躺在地板上。

然后他命令女孩的母亲脱去衣服，他自己也脱光衣服，并要求被害人穿上性感的内衣，最后在起居室里强奸了她。

2. 1987年10月18日，一名拉斐特妇女清早被吵醒，康门奥克斯命令她举起电话线以便能将其砍断。他在房间里搜取现金，用枪指着她并强奸了她，后来还用手电筒击打被害人的头部。

3. 1992年11月16日，一名拉斐特妇女因被枪管击打头部而醒来，康门奥克斯抢走了她的钱包并在床上强奸了她。

4. 1994年10月，一名拉斐特妇女被一只捂在嘴上的手惊醒，康门奥克斯拿着枪，告诉那个妇女他会毫不犹豫地杀掉她。随后用枪指着她并强奸了她。

5. 1995年10月31日，一名拉斐特妇女被一只捂在嘴上的手惊醒，康门奥克斯挥舞着一把枪并告诉她不准出声，然后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6. 第6起强奸发生在阿卡迪亚，1993年9月30日白天，康门奥克斯拿着枪强奸了一名刚晾晒了衣服回到家里的妇女。

康门奥克斯被判3次终身监禁，不得上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康门奥克斯声称，在15年的强奸生涯中他曾冥思过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这方面，他读过《强奸者》（Men Who Rape）（安·尼古拉斯·格罗茨，1979）。这个问题曾被各种专家讨论，包括格罗茨博士。见如下所述（Woolhouse，1999）：

星期一，当康门奥克斯因系列强奸案被指控有罪之后，他告诉法庭，他知道他的被害人想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一个有20年工作经验的执法人员会在白天帮助无数人，而在夜晚却会持枪强奸妇女？

康门奥克斯说他自己也想知道为什么。早在1990年，他在拉斐特和阿卡迪亚的咨询中心寻求过帮助，他甚至读了一本临床心理学教科书《强奸者：犯罪人心理》。根据心理学家和法庭专家的观点，这里没有简单的答案。专家说，遗传和社会因素、愤怒情绪和其他因素混合起来就会造就一个强奸犯。对系列强奸犯和性犯罪人的治疗还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方法，而且，对他们治疗是否值得仍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强奸者》一书的作者格罗茨博士说，他相信社会需要研究并了解这些人，以阻止他们再次袭击别人。“不幸的是，这种人给别人造成了很多的痛

苦。”“被害人、她们的家人，以及强奸犯自己的家庭，许多人遭受到伤害。如果有更多的帮助，如果我们生活在更开明的社会里，或许我们能免除一些痛苦。”

格罗茨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曾在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和康涅狄格（Connecticut）的监狱中研究过上百个被认定有罪的强奸犯。他认为，典型的强奸通常有三种类型：愤怒型（anger rape）、力量型（power rape）和性虐待变态型（sadistic rape）。警方认为，康门奥克斯应归为力量型强奸犯。

“在这类攻击行为中，犯罪人的欲望并不是对被害人的伤害，而是对她们的性占有。”格罗茨写道，“性行为是一种手段，是对潜在的情感匮乏的一种补偿，并借此来炫耀他的优势、力量、控制能力、权威、身份和能力。他的目标是性征服，因此必须通过暴力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

格罗茨说，这些犯罪人经常着迷于一种幻想，即被害人一开始会拒绝他的性要求，他征服她，使她最后不能拒绝他卓越的性能力，她就会接受了。

格罗茨强调，这是那些模糊了现实与幻想界限的人的反常行为。对强奸犯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对这种犯罪能力的一种验证，其中体会到一种兴奋、渴望、期待、愉悦和恐惧的综合感觉。这种类型的强奸者多数在强奸中体会不到这样的性满足，因为他们永远达不到幻想中的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再找一个被害人的原因。格罗茨说，在他对强奸犯的研究工作中发现，大多数强奸犯早期都有受过性创伤（sexual trauma）的经历，并且找不到能帮助他的人。这些创伤可能是直接的性虐待（sexual abuse）所造成，也可能是因为目击性虐待而产生的。格罗茨在《强奸者》一书中列举了一个儿子得知父亲虐待姐姐的例子。

.....

佛瑞德·柏林（Fred Berlin）巴尔的摩市（Baltimore）的约翰斯·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是性变态临床诊所的创始人。他说，记住这点很重要，即强奸就是性冲动的结果。“强奸不仅仅是推动人行为的力量，而是一种与生物驱力（biological drive）相联系的色欲力量，这就使他们非常危险。”

大约 40% 的强奸犯声称在产生强奸意图前喝过酒。格罗茨说，许多人这么做是为了封闭他们一直以来的性意图，然而，酒精仅仅减轻了他们的性压

抑（inhibition）。

格罗茨说，康门奥克斯想去理解他的强奸行为的事实显示出他的“一点良知”。但其他人说这远不够充分。一名被害人说，康门奥克斯仅仅是因为被捕才停止了强奸行为。

布伦特·E. 特维是一位法庭科学家，并且是一位犯罪心理画像专家……他推测，康门奥克斯作为一名治安调查员，每天处理许多这样的被害人之后，作为一名警官，他内心认为，其实“没有被害人，只有自愿者”。

最典型的是，康门奥克斯进入的是门和窗没有上锁的房间，他曾经告诉一名他强奸的被害人，她应该锁好她的后窗。

特维说：“犯罪人可能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rationalize）……即他并非不正常，他就是在强奸。”

这种强奸犯有着一种精神上的无能（psychopathic inability），即他们不能感知被害人的痛苦，也不打算对自己所做的行为负责任。

特维还提到，康门奥克斯的未婚妻就在当地强奸危机干预中心工作，因此，这也使他感到有间接的满足与兴奋。

特维解释说，康门奥克斯有时会在强奸过程中穿上妇女的内衣，或从她们那里偷走内衣，这是一种恋物情结（fetish），可能起源于他的童年或青春期。

格罗茨和特维都认为，这种典型的强奸并不会升级成谋杀。

……

康门奥克斯承认他堕落的暴力行为，但他同时认为自己是一个在执法工作中表现良好的人。

特维警告说，对康门奥克斯不能有太多的同情。

“现在他的全部秘密已经被揭露了”，格罗茨说，“现在他应该对他的被害人付出代价了”。

无论这是否出于一种职业要求，即更好地了解被害人比从来不了解被害人的痛苦要好，作为一名侦查人员，更好地了解自己比从来不了解自己要好。我们确信，无论康门奥克斯在审判中表现得多么悔恨，只要他还没有被捕，只要没有向他出示无可辩驳的物证，他就不会停止强奸行为。

行为-动机类型研究

大多数从事犯罪心理画像的人都采纳了格罗茨的分类方法，并以一定方式运用到侦查中去。最初，格罗茨分类方法在修改后成为《犯罪分类手册》的基础部分，这一手册是专门为了划分各种类型的犯罪人建立的一个标准化手册（伯吉斯等，1997）。之后，通过分析从格罗茨的研究到联邦调查局的暴力犯罪国家分析中心的研究工作，哈兹伍德（1995，pp. 160 ~ 170）更进一步发展了强奸者动机的分类。他把犯罪人的行为分为五个类型：

1. 证明能力型（Power reassurance）。
2. 权力自信型（Power assertive）。
3. 愤怒报复型（Anger retaliatory）。
4. 性虐待狂型（Sadistic）。
5. 机会型（Opportunistic）。

笔者发现，就犯罪动机的分类体系而言，做一些修改将有益于更多的犯罪行为的划分。尽管犯罪行为可以表现为绑架、虐待儿童、恐怖主义、性攻击、杀人或纵火，但促使所有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需要或动机基本上都是相同的。这并不是说，此处的动机分类可以涵盖各种具体的犯罪动机。但是，如果对犯罪人的种种需要进行大致的划分，可以看出这种分类方法具有很高的概括性而且非常有用。

笔者在下面将提出带有犯罪案例的实用分类方法，这是在特维 1999 出版的著作中提出的分类基础上又做的修改和扩展。笔者使用新颖的角度、独特的眼光，将过去重点从犯罪人分类转变为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由此得到众多的肯定。这种分类方法是从归纳型的标签系统转变成一种演绎型的工具。

然而，笔者要非常感谢下列同仁，感谢他们对发展这种分类方法作出的

不懈努力，并出版了相关的著作。^①

伯吉斯，A.，道格拉斯，J. 和雷斯勒，R.：《犯罪分类手册》（1997）。

伯吉斯，A.，哈兹伍德，R.：《强奸侦查的实用手册：多学科的研究》（1995）。

格罗茨，A. N.：《强奸者：犯罪人的心理研究》（1979）。^②

斯尔，M. 在大学的演讲：《犯罪现场的心理画像》（1995）。

这种分类研究是为了帮助犯罪心理画像者对犯罪行为、犯罪情境、犯罪嫌疑人需要进行归类而提供的指南。它的目的并不是成为一种诊断的工具，不要刻意地根据这种类型划分将犯罪人勉强地分为一类或另一类，贴上结论性标签；而是希望重点观察其动机——行为的类型，这样才会对侦查工作有较大的帮助。

此外，读者们还应该知道，在对犯罪行为进行类型分析时不能忽略犯罪行为发生的背景。例如，一个犯罪人在一起性攻击绑架行为过程中，会由于犯罪惯技的原因而问被害人“你男朋友在家吗”。然而，如果一个犯罪人正在与他的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时问同样的话，这就可能与他的幻想有关，而且，接着会与犯罪人标记有关。这不仅仅是犯罪人说什么或做什么的问题，而是他如何说、如何做，以及什么时候说或什么时候做的问题。

证明能力型

——又称补偿型（Compensatory）

证明能力型（Power reassurance）行为包括那些试图通过使用较柔和的手

① 作者及参考书英文原名如下（译者注）：

Burgess, A., Burgess, A., Douglas, J. and Ressler, R. (1997) *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San Francisco: Jossey - Bass.

Burgess, A., and Hazelood, R. (Eds.) (1995) *Practical Aspects of Rape Investiga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2nd ed., New York: CRC Press.

Groth, A. N. (1979) *Men Who Rape: The Psychology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Press.

Thiel, M. (1995) Lecture: “Crime Scene Profiling” given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 Haven on January 14, for course titled CJ 632: Advanced Investigation I.

② 安·尼古拉斯·格罗茨（A. Nicholas Groth）的奠基著作《强奸者》（1999）功不可没，这本书是我们理论建立的基础，而且提醒我们，人的行为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段进行侵害而恢复犯罪人自信或自我价值的行为。这些行为暗示了这部分犯罪人缺乏信心或有一种人格缺陷。这些行为本身也表示了犯罪人相信（或合理化地认为）犯罪行为是双方同意的，或者说被害人是愿意的或应受到谴责的。

接近的方法

突然袭击。

攻击的方法

言语威胁或使用凶器。

口头行为

以下为口头行为的标记：

1. 安慰被害人说不愿意伤害她们。例如，“不用担心很快就好。我不会伤害或强奸你。我不是那种人”。

2. 赞赏被害人。例如，“你很美，我打赌你有很多男朋友或女伴。你的乳房真不错。你有一张漂亮的脸蛋”。

3. 要求感情回报。例如，“你喜欢我吗？告诉我你不会离开我，告诉我你喜欢我”。

4. 自我否定（self-deprecation）。例如，“你不会爱我的，没有人会。我这么丑，你却这么漂亮，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任何人”。

5. 关心被害人的舒适状况。例如，“我在伤害你吗？需要把这个拿走吗？我压到你的头发了吗”？

6. 抱歉型。例如，“我不是那个意思，请原谅我。我知道我不是有意这么做的。希望你能一切正常”。

7. 询问被害人的性问题。例如，“你是处女吗？你跟你的男朋友或女伴做这个吗？你的男朋友或女伴跟你做这个吗”？

8. 要求被害人评价他们的性技巧——性自信。例如，“你喜欢这个吗？感觉好吗？你达到高潮了吗”？

性行为

以下为性行为的标记：

1. 与被害人进行性交前的爱抚（如接吻、吮吸乳房、舔阴等）。

2. 让被害人与之发生性关系。

3. 允许被害人与他们商量如何性交。
4. 不强迫被害人完全遵循他们的性要求。

身体行为

以下为身体行为的标记：

1. 不对被害人进行肉体上的伤害。
2. 尽可能不去威胁被害人。
3. 依靠威胁或使用凶器使被害人屈服。

犯罪惯技

1. 选择住在相同地区的被害人，经常就在犯罪人住所或工作的地方附近，那里他们会感到安全。
2. 提前就选择好几个目标。
3. 监视被害人。
4. 攻击行为大多发生在清早或深夜。
5. 袭击时，被害人独身或有个小孩。
6. 攻击持续时间短，如果被害人不反抗，持续时间会长点儿。
7. 连续攻击通常就在相同地区附近。
8. 如果被害人反抗，攻击就会停止。

标记行为

1. 攻击前后会对被害人偷窥。
2. 拿走被害人的私人物品，如内衣、戒指或照片。
3. 做攻击行为的记录。
4. 给被害人打猥亵电话。
5. 攻击后与被害人联系，如打电话要求被害人出来与其约会，给被害人家里送花，给被害人的留言机上留言，告诉被害人他们曾经拥有过快乐的时光。

具有这一类型行为的犯罪人会试图在攻击后与他们的被害人再联系。他们或许希望被害人能对他们的进一步的性爱要求作出反应。在犯罪人的想像中，他们认为被害人甚至会爱上他们并从攻击行为中得到一种享受。在犯罪人来看，这比约会还有乐趣。

引发强奸者的行为动机是他们认为被害人能从强奸中得到性爱的享受，

并且会爱上他们。这来源于强奸犯恐惧性人格缺陷。因此，一般用“人格缺陷”这一术语来形容这类强奸犯。强奸行为是犯罪人恢复他们自身疑虑的一种手段，企图从中找到性与感情上的自信。当那种自信的欲望和需要产生时，强奸就会发生。

权力自信型

——又称权力型（Entitlement）

权力自信型（Power assertive）行为是指犯罪人通过使用中度或较强的侵害手段以恢复自信或自我价值的行为。这类行为暗示着犯罪人潜在地缺乏自信和具有人格缺陷。他们通过对被害人的掌握、控制和侮辱来证明自己的权威。

接近方法

欺骗或突然袭击。

攻击方法

口头威胁、暴力胁迫、使用凶器。

言语行为

以下为言语行为的标记：

1. 在攻击过程中不愿要被害人说话或想让被害人做其他配合。
2. 给被害人性交的指令或命令，如“吸、趴下、握着、不要动、闭嘴”。
3. 犯罪人主要是为自己寻找乐趣。
4. 扮演“男子汉”。
5. 使用大量的淫秽语言，语言富有攻击性和侮辱性。
6. 贬低侮辱被害人，如“你是个妓女、荡妇，我占有了你，你现在不再那么完美了”。
7. 直白的性语言，如“我要把我的阳具插入你的阴道。我要插入你的肛门。你要吮吸我的性器”。
8. 言语威胁，如“照我说的做就不会受到伤害。闭嘴，否则杀了你。我可不想给你一个教训”。

性行为

以下为性行为的标记：

1. 犯罪人对被害人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性或其他的事。

2. 缺少性交前的爱抚兴趣。
3. 对一个被害人反复进行攻击。
4. 犯罪人对被害人进行性惩罚或侮辱。
5. 犯罪人热衷于掐、捏、咬等行为。
6. 犯罪人的目的是俘获、征服和控制。
7. 被害人仅仅是一副道具，一个满足他们性幻想的物体。

身体行为

以下为身体行为的标记：

1. 犯罪人撕开或割开被害人的衣服。
2. 犯罪人采用惩戒型权力。
3. 犯罪人采用中等、过分、残忍暴力的权力。这种权力是随着被害人抵抗的程度的增长和犯罪嫌疑人自身性能力的萎缩而增长的。

4. 犯罪人通常选择方便安全的地点突然袭击。

犯罪惯技

1. 被害人是预先选择的或是有良好攻击机会的（机会太好而不能错过）。
2. 被害人是根据其可得手性、易接近性和脆弱性而加以选择的。
3. 根据被害人而选择犯罪地点。
4. 使用凶器或改用较高程度的暴力。
5. 身体侵害最初是压倒被害人。
6. 当实施强奸时，被害人被某种方式控制住了。

犯罪人乐于作出这种行为是希望显示出他们拥有毋庸置疑的充分能力以及男子气概。实际上，他们使用这种攻击方法是为了显示他们拥有成年男性的生殖能力和活力。他们感觉自己有权力享受攻击的成果，因为他们通过攻击使自己更加强壮。

这些犯罪人会随着时间而变得更加自信，他们的自我中心倾向（egocentricity tend）会更强烈。他们会开始做那些导致暴露自己身份的事情。警方可以解释为这是犯罪人渴望被捕的迹象。事实上这些犯罪人根本就无视法律。他们实施犯罪行为时根本不惧怕被抓捕或被查清犯罪事实，因此并不采取防御措施，他们认为那是根本不必要的。

犯罪人并必然不希望要伤害被害人，却是要占有她们的性。他们通过证明

自己的力量远远超过被害人来炫耀他的优势、力量、控制能力、权威和自己的身份。因此，他们的攻击行为是为了再度加强他们膨胀的自信或自我价值。

愤怒报复型

——又称愤怒或置换型（Anger or Displaced）

愤怒报复型（Anger retaliatory）行为是指犯罪人的行为显示了犯罪人极大的愤怒，其犯罪指向或是某一特定的人，或是团体机构，或是具有某种象征的对象。这种攻击行为一般是陌生人对陌生人的攻击、家庭内的谋杀，工作关系的谋杀以及与政治事件或宗教恐怖主义（religious terrorist）相关的事件。

接近方法

闪电式的突然袭击。

攻击方法

残暴的身体伤害、极端的暴力、使用凶器、爆发性的攻击。

言语行为

以下为言语行为标记：

1. 言语霸道——根本不管被害人说些什么。
2. 不进行交谈。
3. 会因为某些事情而谴责被害人，例如，“如果不是你反抗我也不会像这样打你，你认为你这么做会走运。你认为你比我强。像你这种人真成问题，既然你不懂事，就得想办法让你明白”。

4. 其他的愤怒或敌对的语言。

性行为

以下为性行为的标记：

1. 性自私行为。
2. 性行为是暴力的，并有对身体其他部位的攻击。
3. 没有性交前的爱抚行为。
4. 试图强迫被害人去做低级下流的侮辱性动作（口交或肛交）。

身体行为

以下为身体行为的标记：

1. 撕破被害人的衣服。

2. 为其性行为特意穿的衣服，如全身军装、面部涂抹、战斗装（黄褐色或卡叽迷彩伪装材料）等。

3. 过分的或残酷的暴力，给被害人带来大量的伤害。

犯罪惯技

1. 犯罪攻击没有事先预谋，是犯罪人情绪反应的结果。

2. 犯罪攻击或是细心地策划，集中攻击特定的被害人或被害人群。

3. 攻击时间的分布毫无规律，攻击发生在任何场所、任何时间，不论白天或黑夜（只要犯罪人有性欲或有特殊类型的被害人可以接近就实施强奸）。

4. 犯罪凶器是随身携带的或取自现场的，或者事先准备与作案相关的凶器和弹药。

5. 犯罪人认识被害人，或者被害人具有犯罪人感兴趣的某种特征。

标记行为

1. 直接对被害人实施身体接触的攻击，攻击在先，然后实施其他的攻击扩展行为。

2. 攻击持续的时间较短——当犯罪人情感发泄完就结束。

3. 犯罪人故意放弃他们自己的人生以给社会、政治和别人一个教训。

4. 犯罪现场有很多表现犯罪人愤怒情绪的痕迹。

5. 在犯罪现场的间接被害人往往是由犯罪人愤怒或缺少计划而被害的，其他被害人则是由于触怒了正在气头上的犯罪人，或在“交火”（crossfire）中受伤的（犯罪人经常是无意的，但如果犯罪人是有意的，就能证明犯罪人行为是有计划的）。

愤怒报复型行为与其名称的含义一样，犯罪人实施攻击行为是由于他认为周围的人有一种长期的真实或假想的过错。攻击的被害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亲属、女朋友或同事；或者被害人的衣着、职业、身体特征对犯罪人有某种特殊的象征意义。

攻击行为的主要目的是要满足他们长期积累下来的侵害欲望。他们因为被害人的过错或假想的过错而报复被害人，而且他们的攻击行为本身有很大的跨度，从语言上侮辱性的色情描述到对多个间接被害人过度的伤害行为。

弄清楚报复型行为与变态性虐待行为的区别很重要。尽管乍看起来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动机完全不一样。报复型行为明显地缺少计划，其犯

罪的心理状态将可能与非恐怖主义者的愤怒报复行为联系起来。

性虐待狂型

——又称激怒兴奋型（Anger Excitation）

性虐待狂型（Sadistic）行为是指犯罪人通过被害人的疼痛和受苦而获得喜悦和满足的行为。性是这类行为的主要动机。然而，犯罪人对性欲的表达是通过对被害人身体侵害或折磨来表现的。

接近方法

欺骗。

攻击方法

突然攻击、身体暴力、使用凶器或爆发性的攻击。

言语行为

以下为言语行为的标记：

1. 犯罪人所说的话都是想获得被害人的信任和依赖以降低被害人的戒心。例如，“你能帮我一下吗？我迷路了。我认识你吧？你使我想起了我的一个校友”。

2. 犯罪人说一些引诱被害人离开安全区域的话。例如，“我有东西想要给你看。我来开车捎你一段吧。我可以帮你把这些笨重的家伙搬到你的房间吗？”

3. 在进行攻击时，犯罪人或许要求被害人对他们进行阿谀奉承的称呼（如先生、主人、君主等）。

4. 犯罪人在对被害人进行粗鲁的性动作或伤害时，会问：“伤着你了吗？刚才疼吗？你能感觉到吗？”

5. 通过对被害人贬低和侮辱的称谓证明被害人是没有价值的，如称被害人为“婊子、荡妇、娼妓”。

性行为

以下为性行为的标记：

1. 犯罪人广泛收集色情照片。

2. 犯罪人通过对被害人施加身体或感情上的痛苦折磨而得到性刺激。

3. 犯罪人私下里与顺从他的被害人（如妻子、女友等）进行过预演，为

攻击他人做准备。

4. 犯罪人在攻击过程中会使用性奴役器具或实施性奴役行为。
5. 犯罪人对被害人进行性折磨，包括不断重复的啃咬，在阴道或肛门里插入异物并对被害人使用性折磨器具。
6. 犯罪人偏爱在强迫口交后进行粗鲁的肛交。
7. 犯罪人热衷于将精液喷射到被害人特殊的身体部位上。
8. 犯罪人是性自私的，被害人对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承担性痛苦。
9. 犯罪人为以后的性幻想活动做现场攻击时的记录（如录像、照片、杂志、录音、绘图、日历、日记、媒体编辑等）。
10. “纪念品”或“战利品”将被保留并隐藏在秘密的、随手可得的地方（如在家里、办公室里、汽车里、储藏室里等）。

身体行为

以下为身体行为的标记。

1. 用非常残忍的暴力对被害人长时间地进行伤害性折磨。
2. 对被害人的那些特别的、对犯罪人有性意义的身体部位进行伤害（如脚、乳头、肛门、阴道、嘴等）。
3. 犯罪人性唤醒的程度决定于他愤怒的程度，进而决定了他对被害人的侵害程度（如对不顺从的被害人的反应，或者被害人太顺从了）。

惯技行为

1. 犯罪人往往选择或扮演一个个性化的职业使他们像一个权威者去活动，这样便于他们去寻找并得到被害人（如扮演执法人员、卫兵、少年管教员、教练等）。
2. 侵害是经过周密计划的：被害人的类型、选择被害人的地点、欺骗方法、攻击地点、标记行为、抛尸地点——所有这些都是事先仔细考虑好的。
3. 犯罪行为有序地运作。
4. 犯罪人通过感情上的弱点来选择和评估被害人，并通过诱骗来获取她们的信任。
5. 被害人是法律地位低下的人（如卖淫者、吸毒者、逃亡者等）。
6. 被害人是比较软弱和没有什么自尊的。
7. 被害人被欺骗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在那里犯罪人拥有大量的控制权

(如汽车、地窖、修理厂、旅馆等)。

8. 每次攻击都会增加犯罪人再次犯罪的欲望。

9. 犯罪人杀死被害人是一种防御措施。

标记行为

1. 犯罪人会带一些特别的東西到犯罪现场, 包括凶器、束缚物和其他一些性器械。

2. 性攻击行为会持续较长的时间。

3. 犯罪人擅长表现出真爱和真诚的样子。

4. 被害人对犯罪人而言是陌生的(这既是犯罪惯技又是标记行为——在为他们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更容易实施折磨和羞辱, 使她们遭受痛苦。而且警方把他们与犯罪联系起来的可能性较小)。

这种侵害行为可能是个体犯罪中最复杂的。这种行为是由随时变化的个体极度幻想而驱动的, 包括对被害人进行折磨使其痛苦, 使自己从中得到性乐趣。这种行为的目的是使被害人感到恐惧和顺从。身体攻击已经被色情化了, 其结果就是被害人必须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遭受犯罪人的侮辱和贬低, 以使犯罪人得到性兴奋和性满足。

利益型^①

——又称财物获取型 (Material Gain)

利益型 (profit) 行为的犯罪动机指向物质或个人利益。这种行为可以在各种家庭谋杀、抢劫、夜盗、杀人越货、纵火、爆炸、绑架和大多数白领犯罪中发现。由利益驱动的行为与那些有标记特征的犯罪行为不同, 他们并不需要某种心理的或情感方面的满足。

接近方法

任何方法。

攻击方法

任何方法。

言语行为

1. 犯罪人施以简单的命令以使被害人顺从并交出值钱的东西。例如,

① 原作中此处标题与前面的第5项(机会型)有所不同(译者注)。

“把钱给我！打开保险箱！把所有的珠宝都交给我！现金在哪儿？”

2. 犯罪人对物品的价值感兴趣。例如，“这是纯金的吗？这是假钻石吗？这是廉价货！”

性行为

1. 犯罪人利用被害人制作幻想或色情照片等，以此出卖以获得个人的物质利益。

2. 犯罪人为获得个人物质利益出卖被害人的性服务。

3. 犯罪人为获得个人物质利益把被害人作为“性奴隶”而卖给另一方。

身体攻击

1. 在犯罪过程中，为了控制被害人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攻击行为。

2. 实施中等的、一般的暴力。

惯技行为

1. 攻击持续时间短。

2. 为获得某种特别类型的有价值的东西，他们会有目标地搜索汽车或住所。

3. 显示出尽快完成犯罪的心态，不希望拖延时间干无关的事情。

标记行为

1. 犯罪人根据自己犯罪的方法和手段，为完成犯罪而带一些特殊的物品到犯罪现场，包括凶器、捆绑物，以及其他特殊器械。

2. 如果犯罪人实施犯罪的时间超长因此而暴露，往往是因为他们在犯罪中没有得到预期的物质回报（这必须借助于其他动机类型来进行审视和评估）。

这种利益驱动的犯罪行为或许是最简单直白的，因为犯罪活动的成功完成可以满足犯罪人的需要。这种纯利益驱动的行为也很少有情感方面的或心理上的特殊需要（如果有人因此而争辩，认为这是一种自信型行为，那么犯罪人将有其他敌对的自信型行为）。任何不是由纯利益驱动借以满足犯罪人情感和心理需要的行为都必须借助其他的动机类型来检验。

例如，如果一个窃贼在大街上攻击一名被害人，偷了钱包并迅速逃跑，这就是利益驱动犯罪的行为证据。如果同样一个窃贼，在偷钱包之前，在被害人毫无反抗的情况下，犯罪人残忍地殴打被害人，那么这就属于报复型行为，它进一步显示，犯罪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快速得到财物。

犯罪现场的心理隔离带：动机分类在侦查中的应用

行为 - 动机类型研究并不能提供一种动态的、发展中的评估分值，用以测量变化的犯罪人。它只能作为在特殊时刻、特殊环境、特殊被害人的情况下评估犯罪行为的工具。行为 - 动机类型研究不能与完全的犯罪心理画像所混淆，而且不管怎样，也不能把它们认为是犯罪人特征和标记行为（行为模式的动机主题）的全部。在一起单独的强奸案件中，如果能得到一些关于动机的可靠的参考信息，行为 - 动机类型可以对一名强奸者的心理作出一些简略的判断。

侦查人员和犯罪心理画像者经常使用动机类型和其他的犯罪人分类方法对一名强奸犯进行单一的侦查“诊断”。侦查人员和一些没有经验的犯罪心理画像者经常提交这样的报告，声称根据某种动机类型推断出的犯罪人特征似乎与这名犯罪人“相匹配”（match）。他们误把这种分类方法当做一种公式，进而替换掉完全的犯罪心理画像分析。

这种做法误导了普遍开展的侦查工作，并且不恰当地把一名未知的犯罪人放到一个归纳性的、死板的框架内。这种分类成为犯罪现场上的心理隔离带——侦查人员经常不能获取更多证据的一个障碍。

其实，行为 - 动机类型的分类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这意味着，一个单独的犯罪人可以有多种动机来驱动他的行为。这些动机都可以用来分析、理解在某一时间内犯罪人的行为方式与其需要满足之间的关系。

人的行为和人的需要是自然发展的，并不是固定和一成不变的。犯罪人的标记行为往往表达出犯罪人具有多种因素决定的需要。运用动机特征分类来“诊断”犯罪人对侦查的帮助很有限，就像放置了不适当的犯罪现场隔离带（crime scene tape）。^① 它将导致忽视其他的犯罪动机模式，导致错误的侦查思路，并最终漏掉物证和行为证据。所有的这些工作容易导致侦查人员不

^① 对一些人来说，安置犯罪现场隔离带就限定了哪里该找犯罪证据，哪里不该找犯罪证据的界限。无论侦查员还是刑事技术人员都会遇到这种问题：他们根本不再向隔离带外面去找证据了，因为他们认为犯罪现场只局限在隔离圈之内，圈外就不属于犯罪现场了，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去联系和调查相关的事件。为了避免这个陷阱，动机分类方法应该在侦查活动中用来揭示一种具有明显犯罪现场行为模式的犯罪动机，而不能作为一种僵化的、诊断性的分类方法。

法庭上的动机和目的

以下是一些在刑事案件中对犯罪动机和目的进行争辩的案例，这些案例均被作为判例。

得克萨斯州诉理查德·肖一案（1988）^①

理查德·肖（Richard Shaw）因涉嫌严重的性攻击行为而被审判，并判决有罪。他被判处67年徒刑。以下是得克萨斯州诉理查德·肖一案（1988）的摘录：

被害人说，在她丈夫离家上班之后，肖就来到她家，当时她正准备送孩子上学。被害人与肖很熟，因为他是好朋友的丈夫。被害人证实，肖以前就强奸过她，她只对肖的妻子说过，但没有报案。

被害人说她再三要求肖离开，但是遭到拒绝。最后她回到自己的卧室并关上门，这样就可以给肖的妻子打电话。然而，她听到肖正在与她的孩子说话，由于担心孩子的安全，她就从卧室里出来了。

被害人说，她让孩子们到车里去，这样就可以送孩子们上学。肖也跟着上了车。他们抵达学校，被害人的两个儿子走出了汽车。当被害人也准备下车时，肖把手放到被害人膝盖上并压住了她的腿，这样她就无法下车。

肖让她返回住所。下车后肖把她带到前门让她开门。肖嫌被害人动作太慢，就扭住她的手腕用钥匙打开门。进入房间后，肖就锁上了门。他要喝咖啡，被害人照办了。

然后，肖把咖啡杯猛拍在桌子上，站起来冲向被害人，经过一番挣扎，被害人被拖进了卧室。肖命令她脱掉衣服，她不从。肖便强行剥掉了她的衣服。当她拒绝为他口交时，肖从牛仔裤里掏出一支枪抵在她的头上，威胁她说如果不遵循他的命令就杀了她。他还拿出了刀子，告诉被害人他去过两次

^① 原文为：TEXAS v. RICHARD SHAW, 1988（译者注）。

养殖厂，知道如何不用杀人就可以把人切成碎块。肖强迫被害人进行口交、肛交、阴道性交。在进行攻击期间，肖再三命令被害人做某些事情，并打听她与丈夫性生活的情况。他还使用了假阴茎模型和 K-Y 胶管。

攻击结束后，当肖上厕所时，被害人拾起了他的枪。但她不知如何使用。肖把枪从她手里夺了回来。当肖还留在她房间里的时候，被害人给她姐姐打电话，然而，她没有提到遭强奸的事，因为她害怕肖。

当肖一离开，被害人马上给强奸急救中心打电话并寻求建议。此后，她换了床单，洗了淋浴，从学校接回了孩子。然后驾车到宠物店为她儿子明天的生日聚会买回了豚鼠笼。她又驾车到姐姐工作的地方去拜访她，她想打听姐姐从前遭强奸后是怎么做的。然而，她姐姐正忙于应付一个客户而没能与她交谈。之后，她又跑了许多地方。

最后，她去了肖的家，她要把遭肖强奸的事告诉肖的妻子。她在房前停住了，因为肖的卡车没有停在外边。然而她看见肖迅速进了房子，她变得害怕了，她穿过房子到了后院与肖的妻子交谈。她不敢把强奸的所有细节都告诉肖的妻子。因为她害怕肖会听到。而且，她还有一个儿子在身边。

返回家后，她给强奸急救中心、她的丈夫和警察打了电话。她向警察提供了被撕破的衣服、床单，她还去医院做了一次强奸检查。

在这项审判中，简·宾汉（Jane Bingham）为这起诉讼提供专家证词。^①她是 Tarrant 郡少年大学社区服务部的助理主任，也是 Tarrant 郡强奸急救中心主任。被害人应要求验证各种强奸情况，以及这些情境下的不同反应。在得克萨斯州诉理查德·肖（1988）的记载中写道：

她特别地证实，这种“熟人”、“力量型”强奸案的被害人在遭受强奸后保持平静并拖延报案时间是很正常的。另外，宾汉提出，这位“强奸嫌疑人”与“力量型强奸犯”的犯罪心理画像相匹配。她说，“力量型强奸犯”是为了威胁和控制被害人并且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实施侵害而不择手段的人。她说，这样的攻击往往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并伴随着多种侵害。虽然被害人受到

^① 记录表明，简·宾汉获得了宗教学和心理学两个学士学位，获得了一个神经学硕士学位，参加过超过 500 小时的有关性攻击的继续教育，为遭受性攻击的被害人工作了 10 年，她服务过的被害人大约有 1000 个。

了暴力威胁但一般是没有什么伤害的。她还说,“力量型强奸犯”往往在强奸过程中强制性地使用一些物品,并询问被害人的性经验和性感受。

她所描述的场景大体上与被害人对遭受强奸的证词相一致。

审判法庭采纳了这份证词,克服了许多人的反对,对陪审团也提出了许多意见。然而上诉法庭认为采纳这份证词是错误的。原因在于:(1)宾汉没有亲自了解本案中的个人情况(他仅提供了一般性的证明);(2)她的证词暗示了强奸已经发生过(这由辩护方引起了争议)。最终,她的证词被认为是一个无害的错误。^①

俄亥俄州诉泰瑞·洛厄一案(1991)^②

泰瑞·洛厄(Terry Lowe)被指控于1986年7月5日在穆雷特家中刺杀了菲莉斯·穆雷特(Phyllis Mullet),并枪杀了默里·格里芬(Murray Griffin)(俄亥俄州 Belle 中心的执行官)。

以下是俄亥俄州诉泰瑞·洛厄一案(1991)的摘录:

菲莉斯·穆雷特在 Belle 中心的家中被杀害了。穆雷特胸部被刺数刀,喉咙被割开。当被发现时,她身体上只穿着一件无领长袖运动衫。格里芬的尸体是在穆雷特家大厅的楼上发现的。格里芬死于枪伤,显然是他曾忍着伤痛试图去营救穆雷特时受伤的。

^① 这并不是一个全体都同意的决定。一名对此持争议态度的法官与其他两个人联合起来对此提出异议(得克萨斯州诉理查德·肖,1988):“像多数人说的,简·宾汉在性攻击领域是位合格的专家。如果她的证词恰当并且仅限于假设,那么她的证词是可以被接受的。然而大多数人认为,审判法庭错误地允许宾汉证明这是一起熟人强奸和力量型强奸……尽管宾汉并不能证明是否真的有强奸发生,但更多的是她能在确定一起案件的特征和肖是否是强奸犯方面提供一些办法。尽管审判法官指示陪审团,由他们来决定强奸是否发生。但是,他也偶尔推翻反对宾汉证言的提议,而且,他没有指示陪审团在维持反对结论后就对宾汉的证言不理不问。他还告诉陪审团应考虑任何证人的证词来下结论。我认为,一名陪审员应该适当地考虑宾汉关于强奸是否发生,以及肖是否是强奸犯的证言之后再下结论:肖是否有罪?”这个案件强调了专家证人所承担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责任,而且这种法庭上的证词就能决定是否是有罪。这一异议潜在地表明,这种证据能决定没有直接证据的被告有罪还是无罪。在本案中,笔者倾向于同意上述那位持争议态度的法官意见。

^② 原文为:OHIO v. TERRY LOWE, 1991(译者注)。

加利福尼亚州诉詹姆士·林克瑙格尔一案（1995）^①

1993年1月18日，乔安·林克瑙格尔（James Linkenauger）的尸体在ventura郡118号公路附近的一个峡谷中被警察发现，大约离她家有11公里。乔安·林克瑙格尔的丈夫詹姆士·林克瑙格尔（James Linkenauger）被指控杀害了他的妻子。

以下是关于加利福尼亚州诉詹姆士·林克瑙格尔一案（1995）的内容摘要：

乔安穿着长睡衣和一条被脱到膝盖的男式牛仔裤，她的汽车停在路边泥浆里，旁边有一副乳胶手套。乔安的血迹和头发留在了后备箱上，带血的手套也在后备箱上留下了印迹。

法医证实，乔安是在1993年1月17日星期天晚上或星期一早上被扼死的。脖子上有一处淤血和磨损。扼在她脖子上的力量太大了，以至于把她脖子两侧的声带都压碎了。这个力量还使得她大便失禁。法医认为，乔安死前对剧烈的疼痛有清醒的意识。这种痛苦持续了5到10分钟后她才死去。

乔安的头、嘴、胳膊上还有15处钝器伤，并使她流失了2品脱血液。有的伤与遭受拳击和与墙、地板剧烈碰撞所造成的伤痕一致。她胳膊和腿上的擦伤、挫伤和防御型伤害进一步显示她曾被拖拉过。

在乔安的汽车里发现了被告的手表，血迹涂抹并浸透了表带。侦查人员帕特里克·巴克雷和理查德·加特林于1993年1月18日在被告的住处见到了他。被告右手肿胀、发红，并有被割伤和抓伤的痕迹，左手环指有一处新伤。巴克雷还发现林克瑙格尔家里棕色的地毯上有漂白和涂抹过的污点。

被告给出了四个录音陈述以否认他杀了乔安。他的理由是：（1）星期五他见过乔安；（2）星期天他去了沼地猎鹿场过夜并且喝醉了；（3）他在雨中走回了家，洗了淋浴，10点就上床睡觉了。

.....

后来对林克瑙格尔住所的搜查显示，在房间墙上、棕色地毯、前监视门、门框、娱乐室、电视、录像机和电话上都发现了血迹。血迹还出现在厕所的下水道篦子和淋浴室的门把手上。郡犯罪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在起居室、厕所、

^① 原文为：CALIFORNIA v. JAMES LINKENAUGER, 1995（译者注）。

主卧室和厨房里发现了大量的喷溅血迹。在厨房的垃圾袋里还发现了血迹和一撮人的粪便物。血迹、棕色涂料和漂白的痕迹遍布在起居室的地毯上。

郡侦查人员在车库的干燥器上发现了一瓶漂白剂和一罐棕色涂料。在干燥器里有乔安的牛仔裤、一件小水鸭牌高领毛衣和一件男式衬衣。靠近干燥器的是一个洗衣篮，里面有一条毛巾和两双带有血污的男式短衬裤。

当被告被逮捕并因谋杀乔安而被起诉时，警方注意到他的阴囊上有一处5厘米左右的伤口，并对此拍了照。被告说那是被拉链弄伤的。然而为乔安验尸的法医说，乔安中指的指甲被折断了，医生认为被告阴囊上的伤与指甲的抓伤相一致。

在审判过程中，有证据显示乔安和詹姆士婚姻不和，此外，先前发生的攻击都得到了证实。这包括，有证人说前几年看到过乔安的脖子、脸和胳膊上经常有青肿淤血；詹姆士曾经殴打他的妻子并把她丢在停车场；在乔安被害前三两周，詹姆士控告一名男子与他的妻子有染；并且在谋杀发生的那天夜里，詹姆士声称要“打碎某人的头”（加利福尼亚州诉詹姆士·林克瑙格尔一案，1995）。

提起诉讼的法庭发现，证据倾向于被告与被害人以前的争吵印象，并且，被告有引起的威胁动机和当时的心理状态。诉讼法庭还认为，当被告被指控实施了一起暴力犯罪时，如果他以前就与被害人有某种关系，以前就对被害人有过攻击行为，那么，就应该允许法庭辩论事件前后的同一性问题、目的或动机问题。因为有一个相同的犯罪人和被害人，这意味着，允许使用先前的犯罪行为证据，而无须求助“明显的犯罪惯技”分析。

考虑到本案中的犯罪现场再现和行为要素，通过有力的现场证据和行为证据弄清案件发生的实际情况。例如，杀人犯罪中的过度施暴，包括残忍的重力击打和强力的勒杀。所有这些证据结合到一起就显示出犯罪人的愤怒动机、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着个人关系等。行为证据越是直接和可理解，法庭就越会发现它的有用性。这时，并不需要找个专家来解释。

阿拉巴马州诉克拉伦斯·西门斯一案（1999）^①

1996年，穆丽尔·奥斯丽（Murial Ausley），一名65岁的老奶奶在阿拉

^① 原文为：ALABAMA v. CLARENCE SIMMONS, 1999。

巴马州伯明翰（Alabama）被谋杀了。她住在路南边的高层公寓里。由于 60 年代患上了脑动脉瘤，所以日常生活都要她家人的照顾。手术治疗后，她的心理和感情都变得像个小孩子了（柯克仁，1999）。

以下是阿拉巴马州诉克拉伦斯（1999）一案的摘录：

1996 年 1 月 2 日中午，克拉伦斯·L. 西门斯（Clarence L. Simmons）在投票大厅南部遇到了被害人，65 岁的穆丽尔·奥斯丽，一位智力迟钝的老妇人。有证据显示，西门斯在那天之前并不认识穆丽尔·奥斯丽。杰克·尼里证实，当西门斯和穆丽尔·奥斯丽在投票大厅相遇时，西门斯激起了一场口角。西门斯拿出刀子威胁道：“把她开肠破肚。”酒保停止了争斗，西门斯和穆丽尔·奥斯丽一起离开了投票大厅。洛蕾塔·钱伯斯也是当时出现在投票大厅的人员之一。她证实她目击了整个过程，她听到西门斯告诉尼里，他已经在法律上被认定为一名精神病人。他能够“切碎并带走尼里”。

贝蒂·哈珀（Betty Harper）是一个与穆丽尔·奥斯丽都居住在高陆庄园公寓里的居民。她证实，大约是在 1996 年 1 月 2 日下午 4 时 30 分，她看到穆丽尔·奥斯丽走进高陆庄园门廊并与西门斯一起走进电梯。哈珀还证实，在 1 月 3 日凌晨，她听到大楼里传来了警报声，这证明有人从后门离开了大楼。

杰瑞·特欧斯达里（Jerry Trousedale）是高陆庄园的一名物业雇员。他证实，1 月 2 日下午是他给西门斯和穆丽尔·奥斯丽开的电梯。

阿玛·安达伍德（Alma Underwood）是高陆庄园的一名保安员。他证实，1 月 3 日，穆丽尔·奥斯丽的女儿要求进入穆丽尔·奥斯丽的房间去看望她。安达伍德发现了穆丽尔·奥斯丽的尸体并给警察打了电话。

伯明翰的警官查里斯·安达伍德（Charles Underwood），一名物证技术人员。他对犯罪现场进行了勘查。安达伍德警官说，他发现穆丽尔·奥斯丽的裸露尸体挡住了厕所的门，她被刀刺伤并被切腹取肠。安达伍德警官证实，尽管穆丽尔·奥斯丽满身是血，但她的脚底并没有血，而且厕所里也没有喷溅血迹。他还进一步表示，浴盆里充满了稀释的血液和头发。另外，厕所的水溢了出来，因为被穆丽尔·奥斯丽的肠子堵塞了。穆丽尔·奥斯丽房间里的物品并没有显示出被搅乱的迹象。在现场只发现了穆丽尔·奥斯丽的指纹。

一项搜寻工作在西门斯的公寓里展开。执法人员找到了一把刀和几件衣

服。另外，执法人员还获得了西门斯的血液样本。拉里·赫斯（Larry Huys）是一名法庭科学家。他证实，从西门斯（Simmons）的住所的一条裤子上获得的一片人体组织的DNA与穆丽尔·奥斯丽血液样本的DNA相匹配。

罗伯特·布里兹（Robert Brissie）博士是一名杰斐逊（Jefferson）郡的法医，他开展了对穆丽尔·奥斯丽尸体的检验工作。他证实，穆丽尔·奥斯丽的尸体被犯罪人从腹部的上部切开，从腹部的前面一直切到阴部，而且在腿之间有几处大面积的皮肤被切去，然后向上一直切到臀部背面。另外，穆丽尔·奥斯丽至少被刺了73刀。这些刺伤大约有4厘米深。这表明，刺杀穆丽尔·奥斯丽的刀子是有刀柄的。他证实，这些刀伤有6处一直延伸到穆丽尔·奥斯丽的脖子前部。许多伤是在穆丽尔·奥斯丽死之前造成的。根据布里兹博士的观点，这些伤可能是威胁时造成的，并不致命。有23处伤集中在胸部。这些伤中至少有5处是没能刺穿胸腔的。布里兹博士指出，这些伤显示，当时穆丽尔·奥斯丽还活着。

布里兹博士发现穆丽尔·奥斯丽手上的伤很少。这表明她几乎是没有什么反抗动作的，他还发现穆丽尔·奥斯丽脸上有轻微的擦伤和暗伤，尤其是在嘴唇周围，显示了“手指操作型”（finger type manipulation）伤害。关于穆丽尔·奥斯丽左乳房周围的伤害，布里兹博士特别指出：“你可以看到示范样式的击伤在‘左乳房周围’，这部分的伤害模式我认为是一个用手操作型伤害（manipulation injury），这与手指的痕迹相一致（R661）。”

布里兹博士还指出，更应注意的是集中在生殖器和肛门周围的切伤。他强调：“如果你观察一下耻骨区域前部和生殖器区域，你能看到这一区域的皮肤是一种不正常的位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切口一直延伸到两腿之间，并穿过阴道深入到肛门，并进入一部分直肠（R661）。”他指出：“显然在造成这些伤害时，根据这些生殖器组织我们可以得知，穆丽尔·奥斯丽的心脏还是跳动的，并且你还能看到这些切伤直达阴道区域。”

布里兹解释，由于在现场发现了大量血迹，所以他认为那些主要的刺伤是在穆丽尔·奥斯丽还活着的时候造成的。他强调，穆丽尔·奥斯丽的大多数内部组织都从体内移了出来。她的左肺部分成了两片，她的脾和肝都被切出，大多数的大小肠都已经丢失。

布里兹指出，穆丽尔·奥斯丽的尸体涂满了血液，但是她的脚底却是干净的。这是由于她的脚底没有流血，也没有从身上滴下来血，穆丽尔·奥斯丽或许被刺杀时已经躺在地上了，并且她没有任何反抗能力了。在指出穆丽尔·奥斯丽在一部分攻击中还活着之后，布里兹博士进行了陈述：“我认为所有的这些伤都很痛苦，把这些伤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极其痛苦的，大家知道，在腹部切一个约 51 厘米的切口就是非常痛苦的，何况是一个 76 厘米的切口。我想仅仅是用刀从生殖器切到肛门就是非常痛苦的了，切下后背的肌肉和脂肪并把屁股切成两半就尤其痛苦。”

伯明翰警官认出了克拉伦斯·L. 西门斯，因为有证人说穆丽尔·奥斯丽遇到的那个男人就叫做“克拉伦斯”。于是警官们就利用电脑搜索在投票大厅附近叫做“克拉伦斯”的人。根据柯克仁（Cochran）警官（1999）的调查查明：

对这个搜索查询的电脑记录显示在穆丽尔·奥斯丽被杀前几个月，“克拉伦斯·利兰·西门斯”因扰乱秩序在投票大厅被捕。西门斯，57 岁，白种男人，与目击者提供的线索基本一致。对西门斯的记录进一步表明，他 1977 年因强奸一名 74 岁的老妇人而被判过刑。侦查人员把西门斯的照片放入一排照片中出示给投票大厅和公寓前厅的目击者们。两个地方的目击者都迅速地认出了西门斯就是与穆丽尔·奥斯丽在一起的那个“大眼睛”的陌生人（柯克仁，1999）。

基于这些调查，警方获得了对西门斯房间进行搜查的搜查令。

在他的房间里，警方发现了一把刚清洗过的刀子和一条带血的牛仔裤。牛仔裤上血液的 DNA 分析与穆丽尔·奥斯丽的 DNA 相一致。克拉伦斯·利兰·西门斯被逮捕并被指控有罪。在 1997 年 9 月，陪审团宣布西门斯在性虐待中杀人，一级谋杀罪成立。

这项判决被上诉，部分原因是法庭采纳了联邦调查局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和诉讼专家托马斯·内尔（Thomas Neer）的专家证词。在提供这份证词时，内尔侦探是联邦调查局的犯罪心理画像和行为评估部门仅有的 12 名画像师之一。内尔自诩为现场勘查和被害人研究的专家。他对犯罪现场和其他证据的分析指出，这项犯罪是以性为动机的。犯罪人这么做是为了得到性的满足（阿拉巴马州诉西门斯一案，1999）。辩方认为，审判法庭在采纳这份证词时犯了错误，因为它并不可靠。

为了解释他和其他的联邦调查局犯罪心理画像专家使用“犯罪侦查分析”的合理性，内尔侦探作出了如下陈述：

犯罪侦查分析是一种从各个方面来研究侦查活动的过程。并且一些案件之所以会提供给我们是因为它们一直未被侦查或已经成为悬案。犯罪侦查过程需要我们站在被害人的角度对案件进行审视。我们研究被害人，力图分析被害的许多特点——为什么这个人会成为被害人？为什么被害发生在这个地方？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场本身，并从犯罪现场得到推论。我们依靠法医的报告和现场的照片，依靠各种毒物学的发现，我们通常注意该地区的人口统计特征，我们注意地图，因此我们在提出一项评估之前要考虑许多方面的问题。

根据阿拉巴马州刑事上诉法庭判定，内尔侦探的证言并不是犯罪心理画像的专家证言，它并不是试图将一般的系列杀人案特征用于分析一个特殊的被告特征。阿拉巴马州刑事上诉法庭发现，实际上，内尔侦探并不像过去的联邦调查局的犯罪心理画像者一样，他并没有指控西门斯犯罪，而是强调犯罪现场与被害人尸体的物理状态能够显示出在谋杀过程中都发生过什么，法庭称之为犯罪现场再现。上述法庭指出：

证明那些具有某种犯罪特征的犯罪人可能更多地实施某类犯罪行为的证词与通过犯罪现场上的物证来证明这是由具有哪种特征的犯罪人所为的证词是有很区别的。

上诉法庭还指出：

犯罪现场分析与被害人研究并非像弗赖伊案件一样依赖于一般的科学原则。这些领域由专门的知识组成。这种专门的知识将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与比较。而这种观察和比较是基于专家受过的训练、技能或经验，这些都能帮助陪审团去理解或决定事实。犯罪现场分析包括收集和分析物证。这通常被认为是专门知识的主体。

本案的法庭发现意义深刻，并且，对将来的犯罪心理画像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① 有两种情况的发生允许这种证据的介入。首先，犯罪心理画像者不

^① 在2001年科罗拉多州诉蒂莫西·马斯特斯（Colorado v. Timothy Masters）（2001）一案中也作出了类似的判决。科罗拉多州上诉法院认为，专家在性犯罪杀人案中所提供的心理画像证言并非不可接受。

能主观地去使犯罪人与画像相一致或对他们进行有罪推定。这就与本书中讨论了很多的那些自以为是犯罪心理画像者明显地区分开来。第二，法庭明智地区分了归纳统计或经验性的心理画像与犯罪动机的演绎分析。在这个案件中，笔者非常热衷于法庭的结论，而且，内尔侦探专家证言使用的情景给将来犯罪心理画像证据的使用带来了希望。在此，犯罪心理画像者的角色不是在物证不足或缺乏物证时使用的工具，而应该是法庭庭审意见的指导者。

参考文献

1. Alabama v. Simmons (1999) CR - 97 - 0768, Sept. 17, 1999 (1999 WL 722688).
2. Burgess, A., Burgess, A., Douglas, J. and Ressler, R. (1997) 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San Francisco: Jossey - Bass.
3. California v. Linkenauer (1995) No. B079219, March 7, 1995 (38 Cal. Rptr. 2nd 868).
4. Cochran, D. (1999) "Alabama v. Clarence Simmons: FBI 'Profiler' Testimony to Establish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Capital Murder", Law and Psychology Review, Spring.
5. Colorado v. Masters (2001) No. 99CA0896, March 22, 2001 (2001 WL 128653).
6. Hazelwood, R. "Analyzing the Rape and Profiling the Offender", in Burgess, A. and Hazelwood, R. (Eds.) Practical Aspects of Rape Investiga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2nd ed., New York: CRC Press.
7. Groth, A. N. (1979) Men Who Rape: The Psychology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Press.
8. Leonard, D. (2001) "Character and Motive in Evidence Law", Loyola of Los Angeles Law Review, January.
9. O'Hara, C. (1970) Fundamentals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10. Ohio v. Lowe (1991) No. 8 - 91 - 6, July 31, 1991 (Ohio App. 3 Dist.).
11. Reik, T. (1945) The Unknown Murderer, New York: Prentice - Hall.
12. Texas v. Shaw, No. 2 - 87 - 145 - CR Dec. 23, 1988 (764 S. W.2d 815).
13. Turvey, B. (1999) Criminal Profiling: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vidence

Analysi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4. Woolhouse, M. (1999) "Saliva on Cigarette Links Deputy to Several Rapes", Baton Rouge Advocate, January 20.

15. Woolhouse, M. (1999) "Ex - Deputy Pleads Guilty to Rape, Gets 3 Life Terms", Baton Rouge Advocate, March 16.

16. Woolhouse, M. (1999) "Experts: No Easy Answers in Rape Case", Baton Rouge Advocate, March 19.

第 17 章 犯罪人特征

Brent E. Turvey, M. S.

运用最严密的逻辑可能得出最错误的结论。

西奥多·里克（Theodore Reik）：《未知谋杀犯》（1945，p.34）

人们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前后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如此显著以至于人们常常将他们前后判若两人。

西奥多·里克：《未知谋杀犯》（1945，p.42）

犯罪心理画像的目的就是判断犯罪人的特征，在侦查中最初划定一个犯罪人的范围，将犯罪人从普通人群中分离并最终区别开来。从本质上讲，犯罪心理画像是在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一种专门手段。然而，只凭借犯罪心理画像本身还不能具体确认就是某个犯罪人所为。

对某些人来说，犯罪心理画像的目标看起来是犯罪侦查人员的主要任务，因而本文的论述也不值得特别的关注。人们普遍认为犯罪侦查人员通晓如何调查所有的案件，并在离奇的悬案中逐渐辨认犯罪嫌疑人。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如前所述，当犯罪侦查不知什么原因陷入僵局时，犯罪心理画像就能提供一种实用的、客观的视角，进而体现出它特殊的价值。但也不必担心犯罪心理画像会代替侦查和司法的基础工作。^①

^① 一个普遍的事实是，并非所有法律执行机关都使用基本的嫌疑排查技术或司法科学技术来处理案件。例如，费尼（Feeney，2000）引用了这样一份研究：

“决定案件能否破获的重要因素是在犯罪报告中是否提到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在 482 起‘已破获’的案件中 63% 的案件有明确犯罪嫌疑人姓名。其中大约一半是被害人或证人认识的，另外大约一半是被警察或商场保安员当场抓获确认其身份的。‘如果一个犯罪嫌疑人既不认识被害人又没有当场抓获，那么逮捕他的可能性就太小了。’”

犯罪心理画像和认定犯罪人

司法鉴定（Forensic identification）一般是指出于法庭审判（或司法）的目的将证据项目进行分类或使其个别化（individuate）的方法。根据艾门和汝丁（Inman & Rudin）的观点（1997），一项证据与其他证据具有相同（或同类）特征时，这一证据就能被作为同类特征而认定。然而，当证据具有某些

（接前页注）克若尼（Cronin）和韦勒福德（Welford）在最近的一份专门研究谋杀案件的报告中提到：“我们缺乏对破获各种类型犯罪案件（包括谋杀案件）决定性因素的研究。”他们公开了他们的研究结果，如下所述：

“近年来，执法机关侦查破案而逮捕犯罪嫌疑人的能力似乎大幅度下降。对于谋杀案件尤其是这样。”

他们的研究表明（克若尼和韦勒福德，2000，p.6）：

“当到达现场的第一名警官立即通知负责谋杀案件侦查部门、法医、犯罪实验室并尽力找寻证人、保护现场、在邻居中确认可疑的犯罪嫌疑人的时候，破案的可能性才会大幅度提高。”

同时，如果发生以下情况会提高破案的几率（克若尼和韦勒福德，2000，p.4）：

不止一名的侦查人员负责这起案件的侦查。

勘查过犯罪现场。

侦查人员在不到30分钟之内到达犯罪现场。

侦查人员收集了证人提供的信息。

侦查人员参与了法医检验（即尸体解剖）。

在犯罪现场发现了犯罪凶器。

走访过被害人的亲友和邻居。

对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枪支进行了计算机检索。

法医提取到检材，发现了子弹或准备了尸体测试图谱（body chart）。

全美许多城市的破案率都是如此惊人之低，无可否认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根据芝加哥突发事件反应和研究机构提供的一份近期关于联邦调查局（FBI）犯罪统计的研究报告（Macko，1996），在美国，普通犯罪（包括强奸和谋杀）破案率最低的城市有：Las Vegas, NV（20.7%）；Detroit, MI（21.4%）；Buffalo, NY（21.9%）和 Miami, FL（25.7%）。

霍韦兹（Horwitz）和泊韦尔（Powell）对联邦调查局（FBI）犯罪统计的一份私人研究道出了遭围攻的华盛顿特区警察局的苦衷：

“49名负责谋杀案件的侦查人员 将近占部门人员的一半 今年没有侦破一起案件，司法部门确认了从1991年到1994年100多起本应迅速破获的谋杀案件，却由于警察工作的失败而没能破获。”

综上所述，在许多案件中，由克若尼和韦勒福德描述的基本侦查工作（2000）没有能够进行，甚至有经验的警察机构都没有这样做。因此，需要启用犯罪心理画像和其他侦查措施以补充现在的执法策略，这样才能更有利地打击犯罪。

惟一特征并与总体中的其他证据明显不同时，这项证据就只能作为个别特征而认定（Kirk，1974，p. 10）。

“个体识别”（Personal identification）这一术语是指准确地认定个人，尤其是证人、被害人和犯罪人的过程。然而，可以用来具体识别具体个人的相对可靠的司法手段则为数不多，其中包括指纹分析（fingerprint analysis）、有限的零碎情节推理的多态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缩写为RFLP）和短暂的衔接重复（short tandem repeat，简称STR），还有DNA分析、牙齿学的证据，以及虽然不太可靠但却普遍使用的证人辨认。

已故的犯罪学家保罗·科克（Paul L. Kirk）博士在他开创性的论著《犯罪侦查》的先后两版中详细论述了什么是“鉴定问题”（The Problem of Identity）。他特别提到专家证词的问题，其中包括专家的偏见、能力的局限性和无知的问题。这些内容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有着很大的关系。在科克（1974）看来：

当对物证进行审核和解释时，必须弄清楚同一认定（identification）和个体识别（individuation）之间的区别，以便刑事鉴定专家完成最终的意图，即确定物证的来源。也就是说，有两类证据，已知的和未知的，必须确定其来源。一方面，刑事专家不得不承认，专家证人辨认的证据并不是绝对可靠的；另一方面，证据的来源必须明确地予以确认，在对证据进行交叉审核时，证人不能随意改变他已经作出的结论。

因此，在确定证据来源时要特别谨慎。不合格或偏见的专家证人往往会作出与事实不符的辨认结论。这是因为他认不清何为同一性，他不能正确评估他的观察结论，或者由于他整体技术水平太低致使他不能作出有意义的结论。

总而言之，证据的准确鉴定必须依赖合格的基础培训、经验、技术知识、技能，以及对证据基本特征的理解。警察或者外行，如果没有这种背景的话，是不能试着去做证据鉴定的。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鉴定人员尚且要犯错误，而且会忽略许多重要的事项，如果每个警察或外行仅仅因为他们对此有兴趣并有机会满足他们的期望就试着去做同样的鉴定工作，那么情况可想而知会有多么糟糕！

桑顿（Thornton）同意上面的观点，并进一步阐述：

在进行物证比较时，使用种类特征（class characteristics）和个别特征（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两个概念会有很大的帮助。种类特征是指可以将一类事物在总体上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那些特征。在证据比较过程中，一方面，种类特征具有重要的筛选作用，借此可以排除不符合总体共同特征的证据。种类特征不能筛选惟一性，也不能确定惟一性。另一方面，个别特征是指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能够确定事物的惟一性。我们应该认识到，孤立的个别特征并不等于惟一性。个体的惟一性只有根据个体的整体特征才能确定。比如，子弹上有划痕并不特殊，只有当子弹上的划痕是有意划出的才具有特殊性。

尽管司法个性化（forensic individuation）是一个基本的司法概念，但作者经常碰到的执法者或法律工作者却从未听说过这一概念，也不能理解这一概念的含义，更不能在案件中运用。

科克（1974，p.4）是在犯罪心理画像尚未被其他人广泛认同之前就一直主张将犯罪心理画像应用于侦查的支持者，早就提出犯罪心理画像用于司法认定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物证研究在认定犯罪人方面是一种具体的辅助手段……通过仔细研究在犯罪现场发现的一些初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物品，通常可以判断犯罪人可能从事的职业，或者可以精确地描述犯罪人的生活习惯。虽然这并不能成为证明任何人有罪的证据，但却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背景。

在此之前，格罗斯（Gross，1924，pp.478~482）就持有相似的观点，并认为，确定犯罪人特征的方法应当有根据地指导我们调查特殊的犯罪人，但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据仅靠这种方法也不能用来认定犯罪人。

近期的文献上有对此问题一致的见解，认为仅凭行为证据和犯罪心理画像并不能认定某人与某起特殊案件或系列案件相关（Burgess et al.，1992；Burgess and Hazelwood，1995；Holmes and Holmes，1996；Ingram，1998）。行为证据和犯罪心理画像可以用来推断这种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但却不能用来起诉某个人。在此，保守的原因是因为人类的行为太复杂，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不能把复杂的人类行为背后的意义简单化。

雷克（Reik，1945，pp.44~45）为犯罪心理画像者和犯罪侦查人员提出了有益的警示，以此来作为我们这里讨论的结尾：

中产阶级社会往往认为违法者与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但却惊愕地发现甚至群体谋杀者的生活节奏都与我们一样——你的邻居或许就是个杀人犯。意识心理学（conscious psychology）的自鸣得意和对犯罪侦查肤浅的心理学分析在决定某人是否犯罪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再清楚不过。

推断犯罪人特征

如同动机一样，可以通过在侦查中发现的事实来推断出犯罪人的特征。“犯罪心理画像”这一术语用来描述推断犯罪人特征的任何过程。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犯罪心理画像方法都一样。有很多方法可以用来推知犯罪人的特征，每种方法都有其特殊的考虑和可依赖的事实。在第2章“归纳犯罪心理画像”中，我们把归纳推理的方法作为犯罪心理画像过程。归纳犯罪心理画像是指描述典型的犯罪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推理的一种方法。支持归纳犯罪人特征的观点包括已知犯罪人的犯罪学研究、直觉、经验，以及一般的概括。我们进一步解释这一过程是如何客观，随后的犯罪心理画像分析将告诉我们关于画像者的信息，而不仅仅是关于正被怀疑的犯罪人的情况（也就是说，将画像与特定的犯罪人彻底联系起来）。

在第3章“演绎犯罪心理画像”中，我们解释了如何用演绎方法进行犯罪心理画像，这种方法是这份工作的核心。我们把演绎犯罪心理画像定义为在犯罪案件和一系列犯罪案件中结合物证和行为证据模式推理出一组犯罪人特征。也就是说，这种演绎的方法是描述特殊案件或一系列相关案件中的行为证据，并以描述为基础进行推理的方法。我们将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将演绎犯罪心理画像的过程称为行为证据分析。行为证据分析的目的就是描绘出犯罪人的特征，以在一定程度上辅助侦查。

推断犯罪人的特征也就是对与犯罪有关的行为提出合理的疑问。问题的第一部分是定义，即什么是犯罪人的特征（如一种虐待的动机）。问题的第二部分是讨论，哪种行为证据能够显示犯罪人的此项特征（如犯罪人能从被害人的痛苦中得到性满足）。如果犯罪现场再现包括了这些行为，那么犯罪心理画像者对犯罪人的特征就有了强有力的论据。现已证明，犯罪人的特征对侦查工作有如下多方面的帮助。

犯罪技能的证据

实施了多起特殊犯罪行为的犯罪人可能会变得对犯罪更加精通——他们干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熟练。从他们的犯罪预谋和反侦查措施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这种技能来。从下面的例子中可能会得到某种启发：

案例

一名犯罪人悄悄地爬进一所公寓的第二层，他戴着手套、面具和一个背包。他发现了一名在床上熟睡的女子，他把她惊醒并捆了起来，然后强奸了她（强奸时他脱下了手套，结束后又把手套戴上）。他使用了随身带来的避孕套。他把被害人捆着丢在一边，接着很快翻遍了整个房间。最后他拿走了她的珠宝、壁橱里的一支手枪和钱包里所有的现金。

首先，在这种既发生抢劫又发生性侵犯的案件中，分别负责抢劫案件和性侵犯案件的侦查人员都应该进行犯罪侦查。如果案件中还有谋杀行为，那么负责谋杀案件的侦查人员也应该参与案件的侦破。强奸案件中的犯罪技能证据集中体现在犯罪人的反侦查措施上，特别是犯罪人防止犯罪证据转移这一特征。通常认定强奸犯罪人的两类证据是证人对犯罪人身体特征的描述和犯罪人精液中的 DNA 分析。但是本案中的犯罪人却戴着面具和避孕套，以防这两种证据落入侦查人员手中。

抢劫案件中的犯罪技能证据也集中体现在犯罪人的反侦查措施上，尤其是犯罪人防止犯罪证据转移这一特征。通常认定抢劫犯罪人的两类证据是证人对犯罪人身体特征的描述（一般的描述和通过摄像机的记录）和犯罪人留在现场的指纹。但是本案中的犯罪人在进出现场和翻动房间物品时却始终戴着面具和手套，以防侦查人员掌握这两种证据。如果犯罪人只在行窃时采取措施防止留下物证而未能防止强奸作案时留下证据，那么，这也能够为犯罪心理画像工作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侦查人员在调查谋杀案时往往只盯着谋杀犯，在调查强奸案时往往只盯着强奸犯。因此，当眼前的案件与以往的犯罪案件存在着极大差异时，可以运用特殊的犯罪技能证据来扩大嫌疑范围。这种信息能帮助侦查人员决定如何重点搜索已知犯罪人的描述记录和犯罪惯技（MO）数据库。

这些信息同样也可用来判定犯罪人在犯罪惯技影响下的其他因素，例如：

1. 教育或技术培训的背景资料。
2. 从事过某种行业或职业的经历。
3. 从前与刑事司法系统的接触背景。
4. 媒介。
5. 犯罪人的情绪。
6. 各种其他未知因素。

熟悉被害人

在犯罪过程中，犯罪人对实施对象的选择可以使我们深入探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被害人——犯罪人关系通常可以通过许多方面予以总结，主要有如下几种，但不局限于此：

1. 陌生人。
2. 亲戚。
3. 对作案人有重要意义的人。
4. 对作案人从前有重要意义的人。
5. 情人。
6. 旧情人。
7. 朋友。
8. 从前的朋友。
9. 熟人。
10. 雇员。
11. 从前的雇员。
12. 同事。
13. 从前的同事。

首要的问题就是确定犯罪人是否是陌生人。也就是说，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是不是必须知晓被害人的一些特殊信息，如被害人的住宅、工作地点、时间安排、习惯、爱好、信仰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陌生人就必须列入嫌疑范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问题就在于确认犯罪需要了解被害人的哪些信息，以及谁能得到这些信息，也就是开始分析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可能的关系。

我们可以从情境实例中分析出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即犯罪必须涉及或要求的某种背景（这些背景可能提示犯罪人先前周密的监视、计划或幻想——但是一定要弄清事情发生的前后背景）：

1. 在犯罪中要使用被害人的姓名。
2. 犯罪人进入被害人上锁的住宅或秘密的工作区域而没有任何武力破坏的痕迹。
3. 有证据证明犯罪人过度施暴杀害被害人（犯罪人实施的暴力超过了将被害人致死所需的暴力，将被害人置于死地以防其成为证人）。
4. 被害人乐意搭乘犯罪人的车，而且没有争吵的迹象。

对这些案件前后背景的分析要依据被害人学的理论，尤其是其中有关被害人生活方式的风险训诫和情境风险度的理论（参见第8章）。在实际案例中的运用可以参见本文附录中的初始评估（threshold assessment）。

犯罪人只有熟悉被害人才能有效地实施犯罪的证据可以用来扩大侦查范围，将与被害人有某种关系的人列入其中。这种信息可以直接帮助侦查人员重点考虑某个犯罪嫌疑人，并制定相应的侦查策略。

熟悉犯罪现场

在犯罪过程中，犯罪人对犯罪现场的选择可以使我们深入探讨犯罪人与犯罪现场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犯罪人所熟悉的某种特殊的地理区域，如邻居、住宅、建筑物和工作地点。概括地说，主要有如下几种，但不局限于此：

1. 安全作业时间表。
2. 安全设施。
3. 员工交接班。
4. 贵重物品、保险箱、一般物品、工具的存放地点。
5. 犯罪现场可利用的材料。
6. 晚上摸黑穿过复杂的路段。

在实际案例中的运用可以参见本文附录中的初始评估（threshold assessment）。

我们应该更深入地理解，如果犯罪现场与被害人之间联系非常紧密（如在被害人家里，或在工作地点，或在交通工具上），那么可以从犯罪人对犯罪

现场的熟悉程度推断犯罪人对被害人的熟悉程度。

犯罪人只有熟悉犯罪现场才能有效地实施犯罪的证据用来扩大侦查范围，将有机会到过现场的人列入其中。这种信息可以直接帮助侦查人员重点考虑某个犯罪嫌疑人，并制定相应的侦查策略。

熟悉犯罪手段和工具

犯罪人和所有人一样，愿意使用他们熟悉的东西。因此，他们选择的犯罪手段和工具既反映出某种熟悉性，有些熟悉性可能是很普遍的，如开手动挡的车，又可以反映犯罪人的某种技能或特长，如他能开直升机。对犯罪人这种特征的分析需要深入考虑犯罪惯技和标记行为。这种信息同样也可以直接帮助侦查人员重点考虑某个犯罪嫌疑人，并制定相应的侦查策略。

这里并不能详尽地列举犯罪人潜在的特征，仅仅是经过证明的、对笔者的侦查工作曾有很大帮助的犯罪人特征。一定要记住：犯罪人的许多特征并不明显，也不是仅根据犯罪中明显的证据推理得出。同样，还要牢记：分析一个人的行为一定要考虑其他明显的行为，否则分析出的关于犯罪人犯罪现场行为、对象选择方面的信息数量就会大大减少，价值也会大打折扣。犯罪人的个别行为只有与其他行为综合考虑才能说明问题。

疑难特征

到目前为止，对犯罪心理画像者来说有三类犯罪人特征可以称为疑难特征（problem characteristics），即犯罪人的年龄、性别和智力水平。笔者特别强调，前两种特征，即年龄和性别，除非有确实的物证，是不能够加以推断的（一旦分析受阻就应立即停止）。而第三类特征——智力水平，是在分析中一定要略去的部分。

年龄

如果犯罪心理画像者在分析过程中出错，那么犯错最多的地方就是犯罪人的年龄。对犯罪人年龄的分析通常基于证人主观的陈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推断，或者证实犯罪行为明显是由患有意识障碍的人实施的。例如，如果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犯罪人当时处在精神异常状态，那么，犯罪心理画像者就可以认为犯罪人年龄超过了18岁（因为精神病患者一般都是成年人）。

对犯罪人年龄的判断也往往依靠犯罪心理画像者的想法、他们自身的经历，知道处于哪个年龄阶段的人可能会实施哪种行为。

结合特殊犯罪人特征的推断，记录并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实施暴力、异常犯罪的增长趋势，笔者认为，除非有确定的物证，犯罪心理画像者不要轻易推断犯罪人的年龄。

在分析下面的案例过程中，当时美国的犯罪心理画像者自信地声称这个特殊的犯罪人年龄很可能超过30岁，而且曾多次到过美国。而实际上犯罪人只是一名14岁的男孩。

案例

神户（Kobe）地区的一中学门口发现了一颗被砍下的人头，11岁的被害人口中含着一张令人不寒而栗的便条，上面写着“游戏开始了，我杀人感到非常愉快，我极度渴望看到别人去死。”当时恐怖感立即席卷了这个相对安宁的国家，而当警察宣布这一谋杀案的嫌疑犯已经被捕时，这种恐怖感一下子得到缓解，但是当证明这一犯罪嫌疑人仅仅是一名14岁的男孩时，恐怖感又一次阵阵袭来。

……主要负责此案的山下正之（Seishi Yamashita）警官介绍到，当警方讯问这名男孩时，这名少年当场承认是他实施了犯罪，随即警方就将其逮捕。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这个男孩说他用刀和锯割下了被害人长谷（Jun Hase）的脑袋。山下正之说后来警方搜查了犯罪嫌疑人的家，发现了这把刀和其他一些犯罪工具。这个男孩告诉警方他认识长谷。

警方还没有认定犯罪嫌疑人，而且他们在试图了解犯罪人杀人的动机。

神户（Kobe）是距离东京（Tokyo）483公里、有150万人口的城市。5月27日供古贺（Tomogaoka）中学的看门人在学校门口发现了长谷的头颅。同一天在长谷所在小学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残忍的行为和另人发指的便条预示着还会有杀人案发生。后来的4个星期有500多名警察参与了搜捕……

……在发现长谷头颅的前几天，在同一所学校附近出现了两只死猫——有一只断了腿。当晚NHK电视台报道警察在调查完死猫事情之后继续追查犯罪嫌疑人。在发现长谷头颅几天之后，作案人给神户新闻（Kobe Shimbun）

报纸寄了一封信。他声称，“强制的教育制度和创造这一制度的社会使我变得默默无闻，我要实施报复”。

他说他可能一周要杀三个人，并强调，“如果你们认为我是孩子气的犯罪人只能杀掉一些小孩的话，你们就大错特错了”。

侦查人员起初根据对犯罪人的描述，认为这些犯罪嫌疑人可能在发生犯罪的时间段内到过现场，杀人犯的年龄可能界于 20 岁到 40 岁之间。精神病医生根据笔迹也同样认为犯罪人就在这个年龄段之内。在发生长谷被害案之前，这个地区有两个女生遭到过袭击。许多居民害怕这些案件都是由同一人所为，虽然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Sugawara，1997）。

性别

如同推定年龄一样，犯罪心理画像者根据自己的想法、他们自身的经验，知道哪种性别的人可能会实施哪种行为，进而来推断犯罪人的性别。女性经常被错误地认为是弱者，很少实施攻击性很强的犯罪，也缺少复杂的幻想性动机（fantasy motivation）。然而这是过时的观点，往往会造成侦查偏见，导致犯罪嫌疑人漏网，因为根据性别就已经把她们排除在犯罪嫌疑范围之外了。

考虑到这些臆断的结论能导致侦查偏离正确的方向，笔者认为，除非有确定的物证（如性攻击，或者被害人证人确定的描述），犯罪心理画像者不要轻易推断犯罪嫌疑人的性别。

智力水平

智力（Intelligence）通常是指一个人获取知识并有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然而，它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主观的术语，并没有实际的侦查价值。犯罪心理画像者经常考虑的是犯罪人的技能水平。一个智商很高的犯罪人也可能实施非常愚蠢或缺乏周密计划的犯罪行为。因此，犯罪人技能低下的证据只能说明行为人缺乏犯罪经验和周密计划，而不能说明他智商不高。与此相反，一个不怎么聪明的人，根据其积累的犯罪经验，也能学到大量的犯罪技能。因此，犯罪人技能高超的证据只能说明行为人犯罪经验丰富，而不能说明他智商很高。

笔者特别强调，犯罪心理画像者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与侦查相关的犯罪人的技能水平特征上，而把对犯罪人智力水平的主观解释留给司法心理学家

和精神病学家（他们更有资格首先对犯罪人的智力水平作出判断）。

画像的书面结论

犯罪心理画像的结论应该是一份书面的、在法庭上有价值的文件，而不是在酒桌上或电话里的闲谈，这里有一些重要的原因：

第一，一份书面形式的画像结论不太可能误传给别人。如果一份非书面的画像结论在送达给需要这份信息的人之前必须其他一些人经手，那么这份结论就很可能变得面目全非。无论如何，书面的画像结论是画像者确保这份结论完整地送达给别人、没有任何改动和歪曲的惟一方法。

第二，需要这份信息的人能更方便地查阅书面的画像。书面结论可以通过照相复制、电子邮件更便利地传送，大大减少传递信息的时间。一份书面的画像能提供给侦查人员案件调查的记录。如果案件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都没有进展，那么口头结论不仅被需要这份结论的人遗忘，就连犯罪心理画像者本人也会遗忘。如果改变了案件的管辖，书面的画像结论也能随之移交。

第三，一个人在作出特殊的结论时，如果能将他的推理转化成书面的形式，那么，他的结论会包括更多的逻辑推理成分。犯罪心理画像者的思路越清晰，他就越容易形成书面结论。在通过书写而理清思路的过程中，一个人的想法可能会更集中、更全面，甚至完全改变。

第四，书面的画像结论包含了犯罪心理画像者在特定案件中所使用的方法和随后的结论。后来这些信息能够验证犯罪心理画像的结论正确与否。这同样可以作为画像者的一项反馈机制，当画像由于某种原因出错时，可以用来改善他们的技术。书面的犯罪心理画像也易于同行评估、研究。同行的评论是犯罪心理画像者提高画像精确性的另一种反馈机制。同行的评论有助于确定画像方法、技术、结论的可采性。如果没有同行评估，那么一种特殊的犯罪心理画像方法就得不到它所服务的对象的信任。一名犯罪心理画像者必须乐意把自己的工作交给同行评估。采用书面的形式可能使同行将其视为应辩的部分内容，或者将所有的画像公开出版让所有的画像者公开批评。但是，这里并不包括那些悄悄把犯罪心理画像提交给私人或执法机关，只为提高自身能力者。同行评估必须是公开的，也必须是独立的。

部分犯罪心理画像者不愿意将他们的结论写出书面报告说明他们没有注意到上述的问题，或者他们太在意上述问题而不愿留下书面资料。

犯罪心理画像是科学吗

对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不是。犯罪心理画像不是科学。大凡直接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献都认为目前犯罪心理画像更多的是受过相关培训后形成的一种推理，而非科学研究（Geberth, 1996; McCann, 1992; Holmes and Holmes, 1996; Turvey, 1999）。根据联邦证据法第 702 条的规定（Lilly, 1987），犯罪心理画像的描述只是作为一个特殊的专业领域，而不像“德伯特”标准那样（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一案，1993），此规定指导着专家作证等问题，其他州也有相似的条例。因此，那些被法庭认可其专家资格的人或许会作出非科学的专家证词，只考虑其有用性，并不作进一步的质疑。

然而，这并不能限制我们的质疑，以防止不公。

根据桑顿的观点（1997, p. 12）：

犯罪心理画像的科学传统的定义是“一个有序的知识整体，其原理能够被清楚地阐明”。尽管这一定义适合许多目的，不过，通常认为仍需要其他一些修饰词来补充这一定义。例如，附加的要求特别提到主题要经得起检验，而且要切合实际。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确实存在着与犯罪心理画像密切相关的大量知识，尽管这些知识是尚未成熟的和分散的（see Burgess et al., 1988; Hickey, 1991; Burgess et al., 1992; Burgess and Hazelwood, 1995; Holmes and Holmes, 1996; Turvey, 1999; Baeza et al., 2000）。但也应该承认，这些知识所依据的各种理论和规则并没有在作者们的著作中确切地得以阐述，这些知识当然也就不能被所有运用知识的人统一分享。也就是说，犯罪心理画像者对于画像的理论、方法、定义，或在具体案件中的运用并不总是能达成一致。这些著作中使用的一些概念只是在理论上的假设，只是归纳出的假说，它等待着检验。与之相反，演绎而来的结论则是通过认真研究并被证明是正确的和可依赖的。然而，也不能因为内部有分歧就将这一领域从司法科学中排挤出去。

剩下的问题就要讨论德伯特标准（Daubert standard）^①，因为它与推论犯罪人特征的过程相关。

犯罪心理画像和德伯特

评估犯罪心理画像在法庭上的鉴定价值的一种方法就是应用德伯特标准。最初的问题是，德伯特标准是否应该应用在这一尚未成熟的司法学科中。虽然它不是一门科学，但是，它可以被视为一门特殊的专业知识。当办案人无从下手、无法搞清事实真相时，犯罪心理画像者的意见和证言才有帮助（Lilly, 1987; Thornton, 1994）。

然而，有些法律评论员说，德伯特标准应该运用于所有的证词，而不论这些证词是否贴着科学的标签（Jonakait, 1994; Saks, 1994）。美国的最高法院对 Kumho Tire Co 诉 Carmichael 的判例（1999）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

德伯特的“监督”职责不仅适用于“科学”证词，而且适用于所有的专家证词。“702 法则”并不能区别“科学的”知识和“技术”或“其他专业性”的知识。

因此，如果认为犯罪心理画像证词（与犯罪人特征有关的观点）有助于认定案件事实，那么仍需要考虑下列德伯特标准：可证性、同行评估、错误率和通常可采性。笔者把犯罪心理画像是否适合运用德伯特标准这一问题看做是法庭审理的惟一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专家证词的可采性问题的美国 and 全世界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规则中都不尽一致。

不论怎样，德伯特标准都提出了一些犯罪心理画像应当考虑的问题。

证实和歪曲

根据桑顿的观点（1997）：“科学方法的基础，即科学方法最重要的方面，是假设的形成和可证性”。他在第 13 页中深入地论述道：

大部分司法科学家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都比较随意。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归纳并非演绎，归纳恰恰不能检验假设和修正理论。他们往往把演绎当做假设，但演绎实际上并不是假设。因此，许多人声称他们的假设是演绎的结果，但实际上却需要通过验证来检验。

^① “德伯特”一词源于一起判例，即 1993 年德伯特诉梅里尔·道药业案（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一案，1993），译者注。

犯罪心理画像者基本上采用的是同一种模式。凭笔者的经验，许多犯罪心理画像都部分地或全部地建立在猜测、假设或先验的理论基础之上（Gross, 1924, pp. 10 ~ 15 及参见本书的第 4 章）。

比如，联邦调查局的心理画像者曾在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面前作证，他们并不习惯于这样一种完整的调查，他们只根据提请调查的机构提供的案件材料进行假设、猜想。联邦调查局的特别顾问罗伯特·哈兹伍德说，“不论何时，当我们被要求为一个机构进行案件分析时，我们都假设我们在和专业人员打交道。他们提供给我们分析的材料，然后，我们对提供的材料进行研究”（The U. S. S Iowa, 1990, pp. 25 ~ 26）。

联邦调查局的心理画像者也由于下列做法而被法庭和独立的同行评估批评（Darkes et al., 1993; Homant and Kennedy, 1998; New Jersey v. Fortin, 2000 ; Turvey, 1999）：

1. 没有系统地收集犯罪人的个人经历材料以供研究。
2. 盲目地依赖犯罪人访谈，将访谈结论作为研究的数据来源。
3. 没有使用合适的对照组。
4. 盲目地依赖于执法部门的假设和意见，并将其视为事实。
5. 将侦查人员的想法视做事实。
6. 没有进一步地提出某一意见或结论的不合理之处。
7. 没有仔细地核查已确定的画像结论。
8. 在结果证实之后并没有将画像结论与实际犯罪人比较。
9. 把可疑的、应当予以验证的数据作为结论的基础。
10. 轻信明显带有倾向性的学会研究和公开发表的研究。

以下是对这类批评收集的结论：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关于犯罪人特征的推论和假设是如何依靠案件事实与相关理论检验的（通过证实或证伪），他们就将受到批评。

同行评估和出版物

由于犯罪心理画像的不可验证，以及在犯罪心理画像领域中发表资料的质量参差不齐，因此，不能说同行评估和发表出版物在决定画像方法的有效性与相关性方面起什么重要的作用。这不是检验犯罪心理画像惟一的领域。

桑顿（1994，p.480）对此中肯地评论道：“只是公开发表画像的成果并不能说明其方法的正确性。”

例如，联邦调查局很难向同行详尽地介绍其案件分析和公开发表的画像情况。其中，对联邦调查局犯罪心理画像项目的同行评估涉及对36名犯罪人和他们的118名被害人的调查项目（Darkes et al.，1993；Turvey，1999）。根据诺柏尔（Nobile）的观点：“当政府公布的数据统计和研究方法受到人们的质疑后，司法部门拒绝了这份研究。”尽管这份研究的方法归于失败，但联邦调查局还是公布了这项研究〔参见伯吉斯（Burgess）等人1998的出版物〕。这一研究仍是目前联邦调查局研究画像使用的概念、方法 and 研究模式的基础（包括本书12章讨论的“有组织力犯罪和无组织力犯罪的两分法”）。

进行研究和随后公布研究成果时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心理画像的结论、假设和理论就不具有任何价值。只有这样，不当的理论与假设被视为科学的现象才能避免。

出错率

乍看起来，这是简单、合理的要求。所有的司法鉴定方法都将经过检验，并掌握其出错率，以此决定其方法的可靠性。然而，在萨克斯看来（Saks，1994，p.429）：

鉴定科学中包含了大量的推测、印象和直觉。它自称是一种科学努力，但其本身并不能提供充足的研究数据，因为它基本的概念假设实际上几乎都并未通过经验来证明。

萨克斯（Saks，1994，p.432）进一步解释道：

毫无疑问，司法鉴定科学家由于在多数情况下具有指导作用，他们往往倾向于宣称自己的鉴定绝对可靠，并有夸大他们结论的传统倾向。在这种背景下，与自称是科学的情况相反，经验研究恰恰对它是一种威胁，而不能帮助它或界定它的本质。

桑顿（1994，pp.480~483）也有同样的论述：

作为一名从事实践工作的司法鉴定科学家，我认为这条标准是在德伯特所有阐述中最薄弱的。

……问题在于，我们对于从犯罪实验室中得出结果的错误率无法获得准确的统计，而且我们怀疑是否能得到这些数据。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甚至连

错误率的数据都得不到。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点，就请他们拨通联邦调查局犯罪实验室或其他规模较大的司法实验室的电话，问他们的结论有多少是正确的，有多少是错误的。

由于对严格的司法科学的错误率都无从知晓，那么用比目前犯罪学家在犯罪实验室里做研究都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专业化知识领域，如犯罪心理画像，就显得不甚合理。

所以，必须承认犯罪心理画像的错误率也是无从知晓的。就如同赫曼特和肯尼迪论述的（1998，pp.323～324）：

就我们确定的范围而言，没有人能试图评价犯罪现场的心理画像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的有效性。因为会遇到一些特殊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对真实的画像样本进行测评的客观标准。……甚至就在犯罪人的认定已经非常确定的情况下，对犯罪人与画像结论的匹配效果问题仍然存在大量的主观因素。

笔者同意上述观点。尽管在心理画像学界内部已经形成统一的标准，并以公开出版的《犯罪心理画像指南》为标志（Beaza et al.，2000）。但是，这些标准也只是被制定这一标准的人们采纳，而且，在解释某个人是否与犯罪心理画像推论出的犯罪人特征相匹配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大量的主观性。

复杂的争论进而被英格拉姆（Ingram，1998，p.264）说明：

只有在捉拿犯罪人和犯罪人坦白之后，才能验证和精确证明画像者的结论。

就像定罪（不论被告是否认罪）不是犯罪人有罪的实际证据一样，宣判无罪也不是犯罪人无辜的实际证据。法官和陪审团尽管代表美国法庭的利益，也常常将无辜的人宣判有罪，而将有罪的人宣判无辜。同样，在特定案件中清晰地作出关于犯罪嫌疑人精确无误的认定，这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对于犯罪心理画像的准确性和其他司法鉴定方法的可靠性的研究就不具有完整的意义。

普遍的接受度

一般来说，将犯罪心理画像视为一种合理的侦查工具，这对于司法机关和侦查机构来说没有异议。然而，对这种侦查方法的认同并不与这种方法的

有效性必然相关（它不具有有效性，如前所述，它没有被经验证明或被实践检验，只是事前的一种描述），而且，也没有专业团体专门对正确的心理画像予以奖励，对错误的心理画像予以惩罚。应用心理画像既要考虑到许多的犯罪侦查人员通常也采用一些不太严密或不可靠的侦查方法，诸如证人辨认（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心理测谎（polygraphy）、语音压力分析（voice stress analysis）和心理直觉（psychic intuition）等；还要考虑到人们对心理画像的接受也与犯罪心理画像者的一种倾向性有关，这些心理画像者对那些了解心理画像甚少的侦查人员过分肯定或夸大他们结论的可信性和确定性，并使他们完全相信或屈从。

建议

犯罪心理画像及相关技术是被作为一种运用于侦查过程并辅助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工具而出现并得到发展的。如同许多刑事方法为法庭最终目的服务、非常有效却不一定都要最终认定犯罪嫌疑人一样，^① 心理画像可以协助确定犯罪嫌疑人范围、并案、辅助制定侦查策略等工作。

这里还需要深入讨论一下犯罪心理画像的深层用途，即它可以指导审案法官判断一般的犯罪人是否可能实施某种特殊的犯罪。如果注意这样两个问题，犯罪心理画像或许可以成为审案法官的有效帮手：第一，法庭必须明白：呈递给陪审团的结论中必须清楚地阐明行为证据的局限性，正如本书对行为证据局限性的论述一样。第二，犯罪心理画像者通过给出被告是否与画像相匹配的结论，必须考虑到行为证据的局限性，不得贸然定罪。^② 犯罪心理画像者应当更加清晰地说明他们关于案件的见解，同时列举出他们推论出的犯罪

^① 桑顿（1994）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直率而发人深省的见解。他在第481页上说：“谁是最后正确和错误的仲裁者？是陪审团吗？我知道，没有人认为定罪率能检验起诉方的准确性，而无罪宣判率能检验辩护方的正确性。”实际上，笔者碰到过很多持此错误论调的专家，除非他们自己的证言没有得到法官或陪审团的承认。

^② 笔者认为，这类专家证言中倾向于贸然定罪的习惯应该通过解释犯罪心理画像的局限性来扭转，如犯罪心理画像并不能确定某个具体的人犯罪或是无辜。这一部分应该由专家来提供，因为法庭不可能对此了解太多。如果起诉方提出了此类证言，辩护方也应该有机会聘请有相似资格的专家。

人的特征和进行推论的方法。陪审团应该留有余地考虑行为证据与物证的关联性，而不是由犯罪心理画像者告诉他们该如何定案。如果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一点，陪审员就会“根据犯罪人特征而不是事实本身对被告人定罪，因为证据的力量才能使他们确信被告确实实施了指控的罪行”，即尹韦克瑞德（Imwinkelried）和曼德兹（Mendez）提出的警告（1992）。

这种对审案法官非常有用的工具应该像一名法庭科学家一样，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汽车里的毛发与被害人的毛发相一致，或者能认定被害人尸体中的黑色棉花纤维与犯罪嫌疑人衬衫中的纤维相似。有些类型证据的项目并不能根据其特征提供出类似于个别检验或测量得出的结论。如此的证言或许引起争议，但如同犯罪心理画像的证据一样，也有可靠性和局限性。同样，如果能与其他的事实证据相佐证，那么犯罪心理画像就具有更大的价值。当然，区别在于，犯罪心理画像并不总是与实体物证一样具有排除性质（exclusionary properties），它只是以犯罪人的特征作为其证据的基础。^①

虽然犯罪心理画像并不是一门科学，但它可以具有科学性（scientific），而且经得起德伯特标准的检验。用这一标准来检验犯罪心理画像是否合适这一问题具体由法院来决定。然而，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除了检验假设成立和是否歪曲事实的标准之外，德伯特标准还缺乏全面的运用。

犯罪心理画像并不是绝对可靠的，也不是专门为认定某个具体犯罪人是否实施了某起具体的犯罪而设计的。如前所述，在公开出版的文献和近期美

^① 笔者曾经作出的犯罪心理画像结论中有的也包含一些诸如年龄和种族等犯罪人的特征。然而，作出这些结论时必须有物证做支持。在一起案件中，笔者认定犯罪人是白种人，因为在被害人尸体上发现了一根红色的阴毛，而这根阴毛只能是犯罪人的。在另外的案件中，根据攻击中留下的精斑来判断性别，或者根据活着的证人的描述，他们能精确描述攻击者解剖学上的特征。

国法庭的判决中，这一观点已经达成了明显的共识。^① 作为一名法庭科学家和一名犯罪心理画像者，笔者也同意这一看法。直到更多的可靠的研究结论公开出版，犯罪心理画像者团体把同行评估和反对意见看做是财富而不是作为不利条件回避以前，犯罪心理画像者运用他们的技术一直会冒被法庭嘲讽的危险。

参考文献

1. Baeza, J. , Chisum, W. J. , Charnberlin, T. M. , McGrath, M. and Turvey, B. (2000) "Academy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Criminal Profiling Guidelines", Journal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1(1).
2. Burgess, A. , Douglas, J. and Ressler, R. (Eds.) (1988) Sexual Homicide: Patterns and Motive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3. Burgess, A. G. , Burgess A. W. , Douglas, J. and Ressler, R. (1992) 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4. Burgess, A. and Hazelwood, R. (Eds.) (1995) Practical Aspects of Rape Investigation, 2nd ed. New York: CRC Press.
5. Cardarelli. A. R and Cavanaugh, D. (1992) "Uncleared Homicid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rends and Patter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riminology, 1992.
6. Cronin, J. and Wellford, C. (2000) "Clearing Up Homicide Clearance Rates",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Journal, 2000.
7. Darkes, J. , Otto, R. K. , Poythress, N. , and Starr, L. (1993) "APA's Expert Panel in the Congressional Review of the USS Iowa Incident", American

^① 有一些专家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并作出了同样多的证明。然而，他们结论的确定性是基于经验而不是公开出版的研究或可供辩论的科学事实。就像在新泽西州诉史蒂文·福蒂一案（1999）中一样，最终还是没有被采纳。在可靠性这个问题上，我发现在新泽西州诉史蒂文·福蒂一案（1999）中的画像是十分荒谬的。犯罪心理画像者提供了他自己的回忆以及伯吉斯和哈兹伍德（1995）书中的“幻想或仪式（ritual）”一章来作为连接分析（linkage analysis）的证据，还声称与指纹或DNA具有同样的确定性。我认为这一观点的荒谬之处在于同样的书（迪普等，1995）同一章节中论述道：“应该清楚犯罪心理画像的目的不是确定某个特殊的犯罪人，而是确定某一类犯罪人。因此，一个画像结论应该不仅仅描述一个人。”笔者认为，这种不一致性是应该值得法庭花一些时间来研究的。

Psychologist, January, 8 ~ 15.

8.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1993) 113 S. Ct. 2786 (1993).

9. Depue, R., Douglas, J., Hazeiwood, R., and Ressler, R. (1995) "Criminal Investigatwe Analysis: An Overview", in Burgess, A. and Hazelwood, R. (Eds.), Practical Aspects of Rape Investigation, 2nd ed., New York: CRC Press.

10. Feeney, F. (2000) "Police Clearances: A Poor Way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Miranda on the Police ", Rutgers Law Journal, Fall.

11. Geberth, V. (1996) Practical Homicide Investigation, 3rd ed., New York: CRC Press.

12. Gross, H. (192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13. Hickey, E. (1991) Serial Murders and Their Victims,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Publishers.

14. Homant, R. J. and Kennedy, D. B. (1998)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Crime Scene Profiling: Validity Research",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25 (3), 319 ~ 343.

15. Holmes, R. and Holmes, S. (1996) Profiling Violent Crimes: An Investigative Tool,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6. Horvath, F. and Meesig, R. (1996)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rocess and the Role of Forensic Evidence: A Review of Empirical Findings",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41(6), 963 ~ 969.

17. Horwitz, S. and Powell, M. (1997) "Reports Detail Chaos in D. C. Police Department",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8, p. A01.

18. Inwinkelried, E. J. and Mendez, M. (1992) "Resurrecting California's Old Law on Character Evidence", Pacific Law Journal, April.

19. Ingram, S. (1998) "If the Profile Fits: Criminal Psychological Profiles Into Evidence in Criminal Trials", Journal of Urban and Contemporary Law, 54, 239 ~ 266.

20. Inman, K. and Rudin, N.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DNA Analysis, New York: CRC Press.

21. Jonakait, Randolph N. (1994) "Real Science and Forensic Science", Shepard's Expert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Quarterly, 1 (3, Winter), 435 ~ 455.

22. Kirk, P. (1953) Crime Investigation, New York: Interscience Publishers.

23. Kirk, P. (1974) *Crime Investigation*, 2n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4. *Kumho Tire Co. v. Carmichael* (1999) 526 U. S. 137 (1999). Lilly, G. (1987)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Evidence*, 2nd ed.,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
25. Macko, S. (1996) "Erri Report: PD's with Low Clearance Rate..." March 18.
26. McCann, J. T. (1992) "Criminal Personality Profiling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Violent Crime: Recent Advanc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10, 475 ~ 481.
27. *New Jersey v. Fortin* (1999) 318 N. J. Super. 557 (1999).
28. *New Jersey v. Fortin* (2000) No. A - 95/96 - 98, Supreme Court of New Jersey (2000).
29. Nobile, R (1989) "The Making of a Monster", *Playboy*, July.
30. Reik, T. (1945) *The Unknown Murderer*, New York: Prentice - Hall.
31. Riedel, M. and Rinehart, A. (1994) "Clearance, Missing Data, and Murd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cademy of Criminal Justice Sciences, 1994.
32. Saks, Michael J. (1994) "Implications of the Daubert Test for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Science", *Shepard's Expert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Quarterly*, 1 (3, Winter), 427 ~ 434.
33. Sugawara, S. (1997) "Japanese Arrest 14 - Year - Old in Decapitation of 11 - Year - Old",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Sunday, June 29, p. A26.
34. Thornton, J. I. (1994) "Courts of Law v. Courts of Science: A Forensic Scientist's Reaction to Daubert", *Shepard's Expert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Quarterly*, 1 (3, Winter), 475 ~ 485.
35. Thornton, J. I. (1997) "The General Assumptions and Rationale of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in Faigman, D. Kaye, D. Saks, M. and Sanders, J. (Eds.) (1997)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Law and Science of Expert Testimony*, Vol. 2,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
36. *The U. S. S. Iowa* (1990) "The U. S. S. Iowa: Guilt by Gestalt",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Harper's Magazine*, March, pp. 25 ~ 28.

第 18 章 法庭上的犯罪心理画像

Brent E. Turvey, M. S.

当一个人的自由可能部分地由物证来决定的时候，我们不无理由要求无论是为控方还是辩方作证的专家证人都应认识到自己工作的含义。

桑顿博士、科克著：《犯罪侦查》（1974）

本章的第一个目的是讨论犯罪心理画像在审判中和在法庭上的赞成与反对意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回顾一些涉及犯罪心理画像的案例，以及随之而来的法庭裁决。其中我们也要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同时对多个案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本章的第二个目的是结合心理症候群的证据（syndrome evidence）阐明演绎法的犯罪心理画像与归纳法的犯罪心理画像之间的区别。必须理解，演绎法的犯罪心理画像关注案件中特殊的行为证据，如同对物证的推断一样；而归纳法的犯罪心理画像，或称统计学的心理画像（statistical profiles）或症候群的证据，往往仅有一些根据薄弱的概括，它们在法庭面前极少或根本没有什么合理的推理。

法庭上的犯罪心理画像者

如果在未破案件的侦查过程中，犯罪心理画像者提出了一个对案件没有丝毫关系或用途的证据，那么可以说他没有发挥任何作用。^① 纵然如此，在这

^① 100 多年前，奥地利法理学家格罗斯博士就以更为显著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观点（Gross, 1924, p.3）：“侦查员的侦查工作要么在完成一半时还毫无进展；要么解决了难解之谜并出色地完成工作，这意味着成功；要么辛苦一番却毫无所获。”我们在本书的开头就引用了这句话，希望能鼓励现在的和未来的实践者们。

个领域中犯罪心理画像者要取得成功，惟一可行的措施就是确定犯罪人的特征，并随后将其拘捕，这些犯罪人被认定实施了毋庸置疑的犯罪行为，并具有先前提到的特征。或许不满足于有限的犯罪现场（犯罪侦查），或许因为他们已经参与了侦查。目前，心理画像者开始挑战数千年的法庭审判模式——法庭证言。

正如特维所指出的（2000）：

尽管刑事侦查已经使用犯罪心理画像，然而，对犯罪心理画像者来说，他们发现自己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被邀请在法庭上对刑事和民事案件提供专家法庭证言。作为犯罪心理画像专家的证言涉及许多专业知识领域（如被害人学、犯罪预谋、惯技、动机、刑事责任能力等），并与犯罪人身份的问题相关。这些身份问题包括诸如犯罪人特征、认定独特行为模式的决定因素、犯罪人通常的预谋，以及其他与特定犯罪人有关的犯罪行为特征。在一些案件中，在各种情形之下，法庭允许犯罪心理画像者的证言作为认定犯罪人的证据之一。

犯罪心理画像者最新的角色就是法庭上的专家，进而他也参与法庭审讯（forensic examiner）。

一种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法庭检验，犯罪心理画像者的证言的作用和功能就是为法庭服务。也就是说，一种意见或结论也要在法庭中接受检验，并有可能成为依法审判中的一种证言或证据。正因为如此，这些被检验的结论或许成为剥夺某些人的自由（把他们关押在监狱）甚至生命（作为判死刑）的依据。

问题

有两个相关的问题使在法庭上运用犯罪心理画像变得更为复杂。其一，全然不知犯罪心理画像和物证的性质差异；其二，许多犯罪心理画像者提供意见时热情过度，缺少约束。^① 如果在一个案件中这两个问题交错在一起，那

^① 虽然我们相信，没有一位法庭科学家或检验者让主观意见超越客观证据，或者向法庭说谎，然而，近期在世界各国仍有许多法庭科学家连续地出错和失败，这提醒我们这些现象并非不会发生（Beggs, 1998; Stinebaker, 1998; BBC News, 1998; Kalfrin, 2000; Roarke and Sowa, 2000; Hastings, 2001; Mills, 2001）。

么犯罪心理画像者就可能根据他们假设的，但缺乏证实的犯罪情形和行为提出非常自信的观点。

错觉

许多请求进行犯罪心理画像的人，包括法律执行机构、起诉主体或辩方律师等都有一种错觉（misperceptions），认为犯罪心理画像者能回答针对犯罪行为的具体问题，同时又能回避掉那些再现复杂物证的工作。加之许多自诩为犯罪心理画像者的人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就造成了这一错误认识更加混乱。这并不足以为奇，因为大多数刑事案件一般不涉及使用物证，而且即使使用了，物证也很少被认为有其内在价值。^①

认为物证不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是非常普遍的，甚至犯罪侦查人员也这样认为。然而，这种观点不能被演绎型犯罪心理画像者接受。物证及其正确的运用是推论犯罪人的特征的核心。这就对犯罪心理画像者提出了挑战，他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了解自己专业的局限，并在可能的条件下提出可靠的侦查建议。

缺乏限制措施

当犯罪心理画像者在法庭审判阶段审查材料时，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他们都事实上成为法庭审验员。也就是说，他们的观点在法庭上可能起着主导法官和陪审团的作用。然而，法庭审验者的经验常与在犯罪现场发生的实际情况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别。犯罪再现能辅助弥补这一缺点，但是犯罪再现也只能根据所遗留的信息来再现。即使在一个理想的法庭审理情景中，一定程度的差别仍是不可避免的：

^① 20多年前，科克（Kirk，1974）提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警诫，在当时就得到了认同和理解：“如今，前所未有地，物证在大多数案件的破获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警察不像从前那样依赖口供。目击证人的证词也不再是可靠的了，这是任何有经验的侦查人员和律师都知道的。只有物证才是确定无疑的，而且只有当物证被正确地提取、研究、解释的时候才是这样。”

最近发表的霍瓦斯（Horvath）和梅西格（Meesig，1996）写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起诉的案件中使用物证的不足25%，而在一些地区还不足5%。同时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目击证人的证词仍然是起诉的主要依据，而这两项证据都因最近DNA技术的发展而发现具有很大缺陷。

1. 犯罪人把他们的犯罪证据遗留在犯罪现场（然而他们会有意或无意地隐藏证据）。

2. 犯罪现场技术人员勘查、记录、提取某些证据（然而他们可能遗漏大量的或较少的证据）。

3. 刑事技术专家在犯罪实验室中检验和验证一些由勘查人员或证人提供的证据，然后写出意见和结论（然而他们可能只检验了一少部分特殊证据，也可能检验大量的证据）。

这一检验证据的过程并不包括那些现场上未被勘查到的、未被检验的、丢失的、偶尔扔掉的、遗忘的或在检验中被破坏掉的证据。因此，即使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法庭情景，与在犯罪现场实际发生的情况相比，仍可能出现上述三种情况的区别。

问题在于，任何一名法庭检验员也只能对他们已掌握的事实进行再现，而不能对未获取的证据加以推测。考虑到上述三种程度的区别，在对所发生的事实进行推论并得出结论时，就需要法庭检验员采取保守的态度，并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

不幸的是，许多法庭检验员在进行犯罪再现时，往往在细枝末节上非常确定，好像他们用摄像机记录了整个事件一样。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通常通过降低观点的确定性来加以校正。法庭检验员被警告只有根据已有的证据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能夸大自己结论的确定性。

试看下述案例中的证词和裁决：

俄亥俄州诉理查德·海恩斯一案（1988）^①

理查德·海恩斯因涉嫌谋杀道格拉斯·福弗（Douglas Fauver）而被定罪。福弗的尸体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被发现，胸部和背部被连刺9刀。

背景

海恩斯声称他去福弗家里填写职业申请表。他进一步称，他喝了几杯福弗递给他的饮料，并吃了几片福弗说是安非他明的药片。然后，根据俄亥俄州诉理查德·海恩斯一案的记载（1988）：

^① 原文为：OHIO v. RICHARD HAYNES, 1988（译者注）。

海恩斯醒来的时候是大约晚上 11 时 30 分，他发现福弗赤身裸体在他面前横坐着。然后福弗告诉海恩斯，他刚才跟他口交过并问他感觉怎么样。海恩斯走到浴室冲洗，用凉水冲自己的头以使自己清醒，他说当时药力还在起作用，使他软弱无力。他走进福弗的卧室，拿了一付内裤扔给福弗，让他穿上。海恩斯开始在卧室里翻找他丢失的地址簿和他已填好的申请表。

当海恩斯从卧室里出来的时候，福弗手持水果刀向他冲来。两个人就在厨房和卧室中间打了起来。福弗用刀砍伤了海恩斯的手腕，海恩斯抓住了福弗的头发，把他的头紧挟于腋下，并在其胸部刺了两刀。福弗向后倒下，但又接着站了起来向卧室走去。海恩斯从厨房桌子上拿了一把大刀朝福弗背部刺去。然后，海恩斯就在椅子上坐了大约两个小时，等着警察到来，因为在搏斗中有非常大的声音。但警察没有来，海恩斯就离开了房间。第二天发现了福弗的尸体。

专家及其观点

在本案中，起诉方邀请的专家是理查德·沃尔特（Richard Walter），文科硕士，一名具备从业资格的监狱心理学家。在法庭上，他不被认为是一名心理学家，而是一名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根据俄亥俄州诉理查德·海恩斯一案的记录（1988）：

沃尔特就同性恋恐惧型谋杀（homophobia murder）和愤怒报复型谋杀（anger-retaliatory murder）之间的区别进行专家作证。州方认为，这项证据表明，基于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其他一些因素，这起案件不同于控诉方从海恩斯陈述中获知的那样，即并不是在遭遇到主动型的同性恋者时由于惊恐而实施的同性恋恐惧型谋杀，而是在冷静考虑之后故意实施的愤怒报复型谋杀。海恩斯争辩道，这项证据应当排除，因为他实际上从来没有说他在遭遇到同性恋者后由于惊恐而杀掉福弗的；相反，他声称他的行为属于自卫（self-defense），由于对方使用刀，他不得已而采取自卫行为。海恩斯说，州方提出的同性恋恐惧型谋杀理论就如同先设立一个稻草人，然后对其攻击一样。这项记录同意上诉人的这一看法以及其他一些观点。

根据这项记录（理查德·海恩斯，1988），沃尔特详细具体地验证了愤怒报复型谋杀犯的特征，并发现上诉人的行为和动机与此画像相匹配。

争议

被告方认为，法庭运用沃尔特作为犯罪心理画像者提出的这一既不具有科学性，又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证据是大错特错。接着他们提出，沃尔特证据的偏颇成分大大超过了其验证的价值（俄亥俄州诉理查德·海恩斯一案，1988）。

法庭裁决

俄亥俄州地区的上诉法院决定，如果同意沃尔特作为本案专家，那么会“因为很多原因而导致混乱”。他们的根据如下（俄亥俄州诉理查德·海恩斯一案，1988）：

虽然沃尔特的证言表明，画像可以作为一种可靠的侦查工具，然而，本案所有材料并无法表明在本案中使用的心理画像的方法能够可靠地达到州方诉本案的目的。

沃尔特的证言中大部分要点（即犯罪人不是在遭遇到同性恋者时出于惊恐而实施的谋杀）在普通陪审员可理解的范围之内。^①

沃尔特证言的提出可能已经混淆了事实或误导了陪审团，因为他自己提出了虚假的稻草人式的观点。

沃尔特承认犯罪心理画像只是确定了犯罪人的类型而不是具体的犯罪人。因此，考虑到沃尔特证言的这一特点，陪审团可能已经根据典型性而不是根据案件事实本身作出了判断。

沃尔特关于愤怒报复型谋杀犯的画像过多地参考了被起诉人的个性和特征。这就是将被起诉人与深思熟虑的犯罪人（并且不是愤怒报复型谋杀犯）画像相匹配的过程。关于被告人特征的证言并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认定犯罪人）。

上诉法院并没有发现判定海恩斯犯谋杀罪的独立证据是压倒一切的（海恩斯只对一个证人承认作案，而且与已知事实相矛盾）。在这样的案件中，地

^① 上诉法院实际上认为，沃尔特的证言仅仅说明表面问题而非说明实质性问题。根据俄亥俄州诉理查德·海恩斯一案（1988）的裁决：“从被告的口供来看，法庭应该自己决定被告在发现自己遭到袭击后并没有立即杀害福弗，但有一段时间他是能冷静下来的。为此目的而使用专家证言是错误的。偏见的成分超过了验证的价值，因为这项证言倾向于将事实和问题感情化。”

区法院认为：“若允许采用沃尔特的专家证言就可能对被告（海恩斯）定罪，于是就存在一种合理怀疑。如果不排除掉这一合理怀疑，那么结论就是有害的。”

由于沃尔特的证言存在上述问题，俄亥俄州地区法院推翻了本案的有罪判定，而要求对海恩斯重新审判。

讨论

笔者对本案中俄亥俄州地区法院的结论抱有极大的热情。起诉方为了支持一个不甚明了的案情，明显将犯罪心理画像只是作为舞台上的布景，而不是说服法官和陪审团的法律证据。虽然关于犯罪情境的证言是有用的甚至是有极大帮助的，但是却超越了把海恩斯匹配到画像结论的界限，而且展示了他生活习惯的选择，所有这些只是为了证明他具有谋杀同性恋者的倾向。这一证言可以恰当地认为是推论的（关于典型犯罪人）、不可靠的、具有偏见的，法庭将它推翻是公正的。

爱达荷州诉沃尔特·查普曼一案（1991）^①

沃尔特·查普曼因涉嫌于1988年8月4日清晨在被害人MD家里对其进行强奸而被定罪。

背景

查普曼声称他的确与被害人在她家里发生了性关系，但这是双方都同意的。根据爱达荷州诉沃尔特·查普曼一案的记载（1991）：

MD睡在平摊在起居室地板上的沙发枕头中间。当查普曼进来的时候门没有锁，他叫醒了她，并与她发生了性关系。查普曼承认他与MD发生了性关系，但他的辩护律师说当时被害人是同意的。但是，查普曼对那天晚上事实的陈述与MD的陈述有很大不同。然而查普曼与MD都一致承认1988年8月3日那晚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当时他们是在爱达荷州考德威尔（Caldwell）酒吧大厅里相识，两人在一起跳了两三次舞，之后MD和一位女伴离开了酒吧。

专家及其证言

在判决听证会上，本案起诉方采用的专家证言是一位名叫马托克斯

^① 原文为：IDAHO v. WALTER CHAPMAN, 1991（译者注）。

(Mattox) 的警官提供的证言。马托克斯警官引用了提交的侦查报告, 这一侦查报告中涉及查普曼本案的罪行、前科记录、体形和喜欢的衣服风格都与强奸犯的心理画像相符(爱达荷州诉查普曼一案, 1991)。判决听证会允许马托克斯警官和法庭调查人员验证强奸犯通常的心理画像特征。然而, 法官告诉马托克斯警官, 他不能验证他的结论, 即他不能证实查普曼与心理画像的强奸犯相匹配。

争议

在随后的交叉质证中, 法庭曾决定, 辩护方要排除查普曼关于与强奸犯心理画像特征相匹配的任何证言, 然而, 抗辩律师却偶然提到了这一观点, 于是把它引入到证据中。新辩护律师认为, 先前辩护律师的这一做法再加上他的其他一些问题(如缺乏经验和审判前准备不足)造成了对被告方辩护不利。辩护方一致认为, 对被告处以的刑罚远比他应受的刑罚严厉, 而且认为, 法官也被有关强奸犯的心理画像信息和结论所误导(爱达荷州诉查普曼一案, 1991)。

法庭裁决

爱达荷州地区上诉法院认为, 这份法庭判决没有错误, 而且在审判中运用犯罪心理画像证据也是合理的, 因为一名审判法官“对他考虑的信息种类或者信息来源要做广泛的、大量的、不受限制的调查”。

讨论

笔者对本案中爱达荷州地区上诉法院的结论抱有极大的热情。因为这只是判决听证会, 而不是在陪审团面前定罪的阶段, 法官已经从调查中知道了关于心理画像的全部信息。这样偏见问题就显得毫无意义了。法官对有罪的人作出合适的判决时, 他有权回顾所需要的任何信息。如果发生在陪审团审判阶段, 这就可能变成另一种情况, 对辩护人偶然表述的观点以及起诉方邀请的两名专家证人的作证资格就可能会是另一种裁定了。一方面, 在作出有罪裁定之后才涉及心理画像和强奸犯类型(在任何范围内强奸犯类型都不是心理画像结论); 另一方面, 法官已经知晓了案卷中的所有信息, 出示给法官

的事实都无足轻重了，所以这些都不会干扰定案。^① 判决确实是非常公正的。

俄亥俄州诉丹尼斯·柔克默一案（1993）^②

丹尼斯·柔克默因涉嫌于1990年9月2日清晨强奸并过失杀害了伊冯·马斯思（Yvonne Mathis）而被定罪。

背景

柔克默声称他的确与被害人发生了粗暴的性关系，但这是双方都同意的。他进一步声称被害人的死亡完全是偶然的，而且他未曾说谎。根据俄亥俄州诉丹尼斯·柔克默一案的记载（1993）：

被告的证言是：被害人在回家路上及到家后一直是“厉声说话、心胸狭窄、废话连篇”。他试图消除她愤怒的情绪以使她高兴。两个人上了床，看了一会儿电视之后，他决定用棒球拍敲击床头板以吸引她的注意。他试图爱抚伊冯但被她推开了。他们继续谈笑，并扯掉了彼此的内衣裤。他们开始扭打而且她开始抓他，直到他躺在她的胸上她才停了下来。她向他道歉，接着两人发生了性关系。

后来，被告注意到伊冯有些不对劲。她看起来失去了知觉。他试图使她苏醒，把她带到浴室放在浴盆上用水冲。他开始惊慌失措并离开了房间。他开车到Bexley的前女友家，但是她没来开门。他接着打电话给前女友告诉她伊冯出事了。他证明她用她的三句电话拨打了911。一小组警官去了出事的房间但却走错了门。接着被告开车去了Alum Creek水库，试图将自己淹死但没有成功。被告又回到房间拨打了911。

然而，物证显示两人并不是同意性交的。尸体解剖验尸官认为死因是这样的：

从她的直肠和阴道的损伤来看，她曾忍耐但疼痛难忍，她因为行为异常导致身体疼痛而造成情绪失常（emotional disability）。对身体损伤的神经源性反射（neurogenic response）导致她出现心脏阻塞，后来又造成心脏停止跳动，

① 刑事审判中的陪审团只能对法庭上法官采纳的证据具有惟一的知情权。控辩双方收集的所有信息和证据只有一部分（通常是一小部分）能被陪审团认可。另外，法官必须清楚这一点，因为这贯穿于整个审判活动。

② 原文为：OHIO v. DENNIS ROQUEMORE, 1993（译者注）。

最终由于心脏不再跳动而死亡。

这一神经性反射称为一种“血管迷走神经反射（vasovagal response）”。由于身体突然受到冲击，通向心脏的双侧神经（迷走神经）同时兴奋，造成心脏骤停（cardiac stoppage）。

死亡原因是通过排除了其他所有原因的可能性而得出的。这种情况很少发生。验尸官也证明，如果神经反射没有发生的话，单凭被害人受的伤是不会引起死亡的。

专家及其证言

本案起诉方邀请的专家是理查德·沃尔特，文科硕士，一名具备从业资格的监狱心理学家。在法庭上他不被认为是一名心理学专家，而是一名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来作为专家证人。在资格审查过程中，沃尔特证明他曾经两次以犯罪心理画像专家的资格作证[一次是在前面提到的俄亥俄州诉理查德·海恩斯一案（1988）]，在那起案件中，他的证言作出的有罪判决被推翻了。

在本案中，沃尔特证明这一犯罪现场是“无组织力的”，根据他的证言，这意味着（俄亥俄州诉丹尼斯·柔克默一案，1993）：

这是一种没有事先计划的、冲动性的行为，在这些行为中爆发出犯罪人极大的狂暴、愤怒、紧张，接着出现了犯罪人的满足和情绪发泄，这些都使他无法控制自己。这就是我在这起特殊的案件中的发现。

根据俄亥俄州诉丹尼斯·柔克默一案的记载（1993），沃尔特是这样描述愤怒——报复型犯罪的特征的：

……我们发现了一种没有预谋的攻击，针对女被害人进行不必要的过度行为，以发泄愤怒和报复。

我们发现这种案子经常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曾对女性的责骂或奚落采取克制和自我压抑，然后突然爆发，之后就采取行动，通过报复或通过某种报仇和敌意来达到发泄的目的。

此外，我们还发现，这类案件都有明显的过度行为。这种犯罪人很难与女性达成很好的沟通，他们感到厌烦、愤怒……

我们发现：这类行为是一种闪电般的攻击，这种攻击同样没有预谋，当你遭到突然碰撞，将你突然激怒时——虽然你可能没有对攻击行为的事先预谋——但你一定会发起攻击，会使用手边的凶器，如双手或躯体，它们可以

用于打击并造成对方外伤。

我们可以见到不少钝器外伤经常是在愤怒之后发生，我们还可以在这类案件的法医检验中发现许多死后造成的伤痕。

争议

被告方对柔克默的定罪提出了上诉，并提出一些理由，包括“法庭采信了一名‘犯罪心理画像者’提出的并不可信的证言，犯了一个可驳回的错误，从而令被告丧失了正常的法律程序”（俄亥俄州诉丹尼斯·柔克默一案，1993）。

法庭裁决

俄亥俄州地区上诉法院认为，审判法院在采信沃尔特的证言这方面是错误的。虽然证言有一些相关性，但与其说有帮助，不如说有偏见。根据俄亥俄州诉丹尼斯·柔克默一案的记载（1993）：

在本案中明显地将被告人定型。专家证人只是对与“典型的”犯罪现场模式和与这种犯罪现场有关的“典型的”暴力行为作出证明。专家证人没有与被告见面，也没有对被告人鉴定，更没有对一名具体犯罪人进行心理画像。他只“对实施了某种犯罪而且确是该犯罪集团成员的那类犯罪人”画像。这种对被告人的定型就存在一些问题。

俄亥俄州地区法院认为（俄亥俄州诉丹尼斯·柔克默一案，1993）：

这种“所谓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证言”被用来证明柔克默犯了强奸罪。因此，认为柔克默符合犯罪行为的特征就胜于解释犯罪行为的特征。^①

专家证言通常包括概要性和典型性的事实而不是具体的事实，并且倾向于将被告人归为一种固定模式。

这种固定模式能使陪审团产生偏见。

专家证言只能对被告人的性格证据作证。除非被告的性格涉及案情，否则，起诉方就不能采取专家关于被告性格倾向的证言。

^① 在此的基本问题是解释典型的犯罪行为，沃尔特提到这一典型的犯罪行为或许已经发生在附近的案件中。许多犯罪再现是根据典型的、相似的犯罪行为进行，而不是根据物证来进行。依笔者来看，这是不合法的法庭做法。

尽管专家认为他的意见建立在概率学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又说，他涉及的案件不能全部都记录在案（只有大约 25%），而且对这些案件也没有进行过统计分析。“他说使用的统计数字是从其他资料，如联邦调查局的资料中引述的，但却没有阐述这些数据是如何得出结论的。”这就使他的意见本身的可靠性产生了疑问。

基于上述以及相关问题，俄亥俄州上诉法院推翻了原判决并发回重审。

讨论

笔者非常热衷于本案中俄亥俄州上诉法院的一些发现。尽管使用了与俄亥俄州诉理查德·海恩斯一案（1988）相似的证据来对抗上诉法院遭到了失败，但起诉方又聘请了相同的专家，结果定罪又被推翻。对俄亥俄州上诉法院来说，一直困扰他们的似乎是那些证言的归纳型或者说或然型的本质，以及对犯罪现场和犯罪人的证言之间的直接对比，还有那些基于行为和事实本身而不是基于案件事实和其他证据而推断出的证言。这些问题也同样困扰着笔者本人。判决最终被公正地推翻。

俄克拉荷马州诉吉米·雷·斯劳特一案（1997）^①

吉米·雷·斯劳特被指控犯有一级谋杀罪。因为涉嫌于 1991 年 7 月 2 日杀了他的前女友米勒迪·伍茨（Melody Wuertz）和他们 11 个月的孩子杰西卡（Jessica）。

背景

斯劳特是当地一家退伍军人医院的护士。他和米勒迪一直有性关系，进而导致米勒迪怀孕。他对孩子照顾非常不周，这使米勒迪十分恼火。她坚持让他为孩子付抚养费的做法激怒了斯劳特。“他曾在医院对同事说，米勒迪正‘对他步步紧逼’，如果她继续这样做的话，他只好杀了她。还有一次，他又对另外一个人说，米勒迪正在给他的工作造成麻烦，他哪天非杀了米勒迪和杰西卡。”

斯劳特进一步担心未婚爸爸的事情会破坏他作为后备役军官的身份。他那时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并不知道他和米勒迪以及与其他女性之间的事。

^① 原文为：OKLAHOMA v. JIMMIE RAY ALAUGHTER, 1997（译者注）。

根据俄克拉荷马州诉吉米·雷·斯劳特案的犯罪现场勘查（1997）笔录：

米勒迪的尸体躺在卧室的地板上，在子宫脊椎（cervical spine）处和头部有枪击的痕迹。胸部和外阴部被刺，而且在腹部和乳房上刻着警方认为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图案。在米勒迪尸体旁边发现了留有黑人头发的梳子、一些带有黑人发丝的内衣，以及一些没有用过的避孕套和手套。在米勒迪身体内外并没有发现精液。在浴室里，米勒迪的烫发卷发器还插在插座上。婴儿杰西卡的尸体在大厅过道口被发现，差几天就是她的周岁生日，她的头部被连击两枪。验尸官推断母子死亡时间大约是在7月2日上午9时30分到晚上12时15分。

起诉方认为，当时米勒迪在浴室里修整头发正准备上夜班（俄克拉荷马州城市退役军人管理局医院），被突如其来的对其腹部的枪击而瘫痪（但还没有失去知觉）倒在地上。当她的孩子被杀害时她瘫痪在地上并且还有意识。然后她被拖到浴室，在浴室里头部遭到枪击。犯罪人接着试图伪造现场以迷惑侦查人员。

斯劳特否认实施了这起犯罪案件。

专家及其意见

本案中起诉方聘请的专家是罗伯特·哈兹伍德（Robert Hazelwood），他是专门学术团体的一员，该组织由前联邦调查局专门从事行为科学的顾问们组成，他们组织在一起从事咨询和研究工作。他有资格作为性虐待领域的专家。

他的证言力图证明起诉方的意见，认为本案与塞塞利·约翰逊（Cecelia Johnson）有关联。根据俄克拉荷马州诉吉米·雷·斯劳特一案的记载（1997）：

塞塞利·约翰逊是与吉米·雷·斯劳特一起在俄克拉荷马市退伍军人医院工作的护士。就在斯劳特与米勒迪同居的那段时间，她正与丈夫办理离婚，而且没有什么自尊。在米勒迪怀孕之后，斯劳特开始与约翰逊发生性关系。起诉方认为——在法庭上已经被证据证实——斯劳特有一种能识别出脆弱女子并利用其脆弱特点为己所用的本领。他将之付诸于约翰逊身上是完全奏效的。她公开对自己的同事说，当米勒迪向斯劳特要钱抚养孩子时，她非常讨厌米勒迪。起诉方有证据证明，约翰逊开始帮助斯劳特准备谋杀行动。当斯劳特在 FT. Riley 驻扎时，她依斯劳特的指示去做，她从医院一名黑人患者那里拿来了黑人的头发和衣服，并把这些东西邮寄给斯劳特，以便他能用它们来伪造现场。

在侦查取得一定进展的时候，约翰逊和起诉方达成了控辩交易。交易的内容之一是如果她主动与警方的侦查工作配合，那么她可以免除指控。除了提供给警方她参与犯罪的信息之外，她还录下了她与斯劳特的一次电话交谈，并且在一次与斯劳特见面的时候携带了录音装置。虽然曾经自杀未遂，但最终约翰逊还是于1992年2月自杀了。

哈兹伍德被要求就妇女在一般情况下的顺从特性进行专家作证，他只为此而作证明，不允许在法庭上提到塞塞利·约翰逊。他也不允许对塞塞利·约翰逊是否是顺从型妇女提出自己的看法。

争议

辩护方认为，哈兹伍德没有资格作为所谓“顺从型”妇女特征研究领域的专家。而这正是他证言中的大部分内容。辩护方又认为，这份证言仅仅是一份犯罪心理画像证据。然而，对这份证言的科学基础却没有反对意见，因而法庭在诉讼中并没有涉及这一问题（俄克拉荷马州诉吉米·雷·斯劳特一案，1997）。

法庭裁决

俄克拉荷马州上诉法院认为，审判法院采纳哈兹伍德关于顺从型妇女特征的证言是正确的。

首先，俄克拉荷马州上诉法院坚持认为哈兹伍德是这方面的专家，理由如下（俄克拉荷马州诉吉米·雷·斯劳特一案，1997）：

尽管顺从型妇女症候群（compliant woman syndrome）不是他的专攻领域，但通过他自己的常规研究，他对这一领域非常熟悉，因为他把其视为自己专业领域内的一个常见模式。他以观察为基础，发表过论文来强调这些特征。这篇文章使他成为澳大利亚专业会议的代表，并在澳大利亚医学期刊上发表。此外，他还同时为下列机构提供咨询和相关知识：约翰斯·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学医学院、乔治敦（Georgetown）大学心理学系、纽约市科尔比（Kirby）精神病学诊断中心、弗吉尼亚州（Old Dominion）精神病院、在墨尔本、澳洲、华盛顿 D. C. 举行的性暴力国际会议、心理协会、弗吉尼亚大学护理学院、Ft. 史密斯的青少年性犯罪待遇中心、美国大学心理学院、新星大学心理学院、乔治·华盛顿大学心理学院等。他还参加国内研讨会，向精神健康专家、刑事法官和社会工作者提供自己的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

都能收到很多的反馈信息。在一个类似的研讨会上，5名与会者（或者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病学家）给他提供了一些可供研究的妇女案例。尽管他从未在法庭上做过这方面的证言，但确实在佐治亚州陪审团面前作证过。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审判法院采纳哈兹伍德提出关于顺从型妇女特征的证言是正确的。

其次，俄克拉荷马州上诉法院解释说，一名专家证人先前是否在这方面提出过证言并不能决定他能否担任这方面的专家或能否提出自己的证言，关键在于他是否具有作为一名专家所需的知识、技能、经验、培训或者教育（俄克拉荷马州诉吉米·雷·斯劳特一案，1997）。

最后，俄克拉荷马州上诉法院认为，只要不提出塞塞利·约翰逊是否与相关嫌疑心理画像相匹配的观点（即讨论的“顺从型妇女”），其心理画像的特征（profile characteristics）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

讨论

笔者对本案中俄克拉荷马州上诉法院的结论有许多复杂的感受。在法庭上面对陪审团就一名顺从型妇女进行归纳型（或统计学/平均值）的心理画像，这本身没有偏见可言，但专家不能涉及最终问题（即定罪问题）。或者说，在本案中如果专家没有超出本专业的背景作出几乎属于心理学的诊断就无可非议。

然而，这里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哈兹伍德对顺从型被害人没有提出论证性的、可证实的研究，而很大程度上是要求法庭听取他已经作出的研究结论。惟一与本案有关的一份研究发表在一本晦涩的澳洲杂志中，题目是“性虐待的女性顺从型被害人”（Dietz, Hazelwood and Warren, 1993）。关于这份研究有一些疑惑之处：

1. 这份研究仅仅包括7个案例，这很难说是全面的。
2. 哈兹伍德等人（1993）提出的“顺从型被害人”实际上是犯罪人的同谋，在案件中确实帮助犯罪人对另外的女性实施性虐待犯罪。这就使她们成为犯罪人的搭档而不是被害人。本案中也是同样的情况。
3. 研究中没有最初的控制组。
4. 没有试图对作者提出的假设进行证伪。

这就导致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即哈兹伍德的研究和结论缺乏科学性。如

果上诉方质问专家知识和证词的科学基础，作者觉得证词有可能被否决。俄克拉荷马州上诉法院也只是在上诉时打回电报，其中提到（俄克拉荷马州诉吉米·雷·斯劳特一案，1997）：

辩护律师基于哈兹伍德不具备本领域的专家资格的事实而提出反对意见。辩护律师声称，这项证言仅仅是犯罪心理画像证据，但他并没有对这项证言的科学基础问题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在上诉中我们没有必要争论这一问题。

考虑到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俄克拉荷马州上诉法院的裁决虽然是在法律范围内作出的，却是一个坏的判例，它使得将来的判决中也会运用这种证词。希望这会给辩护律师上了一课。也就是说，如果专家提出了归纳型的统计数据和研究，他们应该坚决质疑这项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弗吉尼亚州诉谢尔曼·阿里·约翰逊一案（1998）^①

16岁的谢尔曼·阿里·约翰逊作为一个成人被审判、定罪并判处死刑，因为涉嫌于1998年7月24日谋杀了霍普·丹尼斯·霍尔（Hope Denise Hall）。

背景

霍普丹·尼斯是一位22岁的母亲，并且是全球广播电视台第12频道的一位兼职助理制片人。她赤裸的尸体于1994年7月11日在她上锁的HalcunManor公寓中被发现。她身上有15处刺伤，而且喉咙有狭长的切口。她与3岁的儿子一起住在公寓中。

南安普顿矫治中心（Southampton Correctional Center）的警察于1997年1月以涉嫌强奸和谋杀霍尔女士的罪名逮捕了约翰逊，因为计算机数据库搜索发现他的DNA与在被害人的公寓里发现的精液和血迹中的DNA相匹配。而他的DNA与凶器刀子、打破的玻璃杯上发现的血迹，以及霍尔女士公寓里床单上的精液相匹配，而且在尸体内也发现了他的精液（Blackwell，1998）。

在拘捕期间，他就已经因为强奸另外两名妇女被判服刑100年。

专家及其证言

本案中起诉方聘请的专家名叫马克·沙伐瑞克（Mark Safarik），他是联邦

^① 原文为：VIRGINIA v. SHERMAINE ALI JOHNSON，1998（译者注）。

调查局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他曾获得人类生理学学士学位，而且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以前曾有3年的警探经历。根据他的职业履历，在参与本案之前他还没有在犯罪心理画像领域提供过专家证言。

起诉方聘请马克·沙伐瑞克提供专家证言，以证明约翰逊与系列强奸犯的犯罪心理画像相匹配。沙伐瑞克在审判前的听证会上论证道（Blackwell，1998）：

……他将霍尔女士案件中的行为证据与另外两起指控约翰逊的强奸案证据相比较并发现了许多相似之处。他的结论认为性侵犯攻击者与谋杀犯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根据起诉方结尾的陈述，在那两起强奸案和这起强奸中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包括（Blackwell，1998）：

……都强奸了妇女并在攻击中都使用了牛排小刀。犯罪人是被害人的熟人，实施犯罪前都要了一杯水，都从妇女的后面实施攻击，并在强奸以前要求她们脱掉衣服。

争议

在决定是否采纳沙伐瑞克证词的听证会上，辩护方认为，没有证据支持他的意见，并且这份证言是没有根据的推测（Blackwell，1998）。

法庭判决

审判法官同意了辩护方的意见。沙伐瑞克的专家证词不能被接受的根据是陪审团本身能从证词得出案件相似的结论。也就是说，法庭认为他的证言涉足了陪审团的职能。

讨论

笔者对本案审判法庭的结论抱有一些复杂的想法。笔者非常关注于本案中排除专家证言这一做法。专家关于约翰逊与强奸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画像相匹配的结论及相关的裁决范围太大了。然而，还应当承认，专家的某一领域知识是在一般的公众视野以外的，其中包括犯罪惯技分析，本案中也包括这部分内容。因此这种证言也有助于理解两起或两起以上的案件并案所依据的行为特征。

最后，在本案中采用犯罪心理画像者的证言显得很多余，因为其中的物证已经具有充分的证明力。有人可能觉得，起诉方在本案中试图使用这类证

言是为了在将来的案件中采纳犯罪心理画像证言提供一个判例。

斯彻玻诉费城警官一案（2000）^①

1998年5月7日，星期五，沃顿大学一名24岁的博士生申农·斯彻玻（Shannon Schieber）裸露的尸体在她住的中心城市公寓二层被发现。她已经被扼杀至死，并且脸朝下俯卧在床上。现场有搏斗的痕迹，而且丢失了许多物品。但是，现场却没有性袭击的迹象。

背景

斯韦斯特（Sylvester）和维基·斯彻玻（Vicki Schieber）是申农·斯彻玻的父母，他们提起诉讼，认为费城的两名警官史蒂文·伍兹（Steven Woods）和雷蒙德·斯克夫（Raymond Scherff）侵犯了民事权利并要求赔偿。根据斯彻玻诉费城警官一案的记载（2000）：

1998年5月7日凌晨2时，当申农·斯彻玻在公寓里遭到袭击尖叫求助时，一位邻居打电话报警。在接到“优先1”的紧急呼叫后，警官伍兹和斯克夫到达了斯彻玻所住的公寓大楼，当时邻居站在那里准备急救。警官们观察到她的公寓的阳台门被紧锁并且里面漆黑。他们敲斯彻玻房间的前门，没有人应答，他们也就没有进一步调查。他们并没试图进入斯彻玻的房间。

警官们并没有打电话请求援助来撞开房门或提议是否这样做。警官伍兹说，只有他听到有妇女惊叫他才应该给上级打电话。斯克夫警官说，除非他自己亲耳听到尖叫声他才能破门而入。警官们向邻居们保证斯彻玻不在家里，而且告诉他们如果听见房间里有任何另外的响动就打电话给911。他们没有采取更深入的行动，而他们应该采取另外的行动。当天下午，斯彻玻的兄弟和一位邻居闯入斯彻玻的公寓时发现她已经死了。

斯彻玻家人认为警方作出了一个低劣的调查，而且没有遵循基本的程序，那两个警察是有责任的。

专家及其证言

本案中，原告要求的证言包括弗雷德里克·金斯顿（Frederick C. Kingston）的证词，他是联邦调查局意外事件快速反应组（CIRG）的成员，

^① 原文为：SCHIEBER v. CITY OF PHILADELPHIA, 2000（译者注）。

并且专为当地警方对发生在城市中心的强奸犯进行犯罪侦查分析（或心理画像）（斯彻玻诉费城警官一案，2000）。

原告在诉讼中要求采纳专家证词大概是因为，金斯顿的画像分析中可能包括有关法庭证据的信息和观点，而且能将谋杀申农·斯彻玻的犯罪人与城市中心的强奸犯联系起来。这也能用来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即认为警方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也没有遵守合理的程序，并且将重点放到了其他犯罪嫌疑人而不是城市中心的强奸犯身上。

争议

被告方（费城）提议排除金斯顿的专家证言和报告（画像分析），基于下列原因（斯彻玻诉费城警官一案，2000）：

1. 联邦调查局的犯罪心理画像分析是不能采信，因为金斯顿是外行，他在报告中作出的结论并不是以个人知识为基础的。
2. 联邦调查局的犯罪心理画像是不公正的、有成见的，并且是推理得来的，因此不能采纳。

法庭裁决

法官认为，不论金斯顿是否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都无关紧要，因为他的意见“在决定案件事实方面并没有帮助”。这是此类证言起码的要求。根据斯彻玻诉费城警官案的记载（2000），审判否定了犯罪心理的画像分析：

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画像）首先否认了它的推测特点和陈述，这种推测特征或陈述一般只用于警察部门的侦查活动阶段，在联邦调查局报告的第一部分中。这种推论性的信息只服务于同步的警方侦查活动，而不是基于第一手的观察或对其他犯罪案件的了解，这并不在第 701 条证据规则的范围之内。由于同样的原因这项报告被认为是不能采纳的，所以金斯顿自己的证言也是如此。他的证词应该基于从警察部门获取的材料，而且，他的观点仅是推断性的，在判定死亡时间和其他实质性的事实方面是没有用处的。

在排除金斯顿的画像分析时，法官继续对联邦调查局的画像分析进行说明（斯彻玻诉费城警官一案，2000）：

……在斯彻玻被谋杀的当晚所发生的事情仅仅是从各个可能的方面对谋杀犯特征进行的推论。报告中并没有确定的结论，犯罪人仍然在逃，而且当晚犯罪人在死者家中究竟确切地实施了什么行为仍然是不清楚的。

报告没有提供死亡时间的估计，也没有对警察的行为是否不当进行评估。它只是帮助警察调查犯罪事实并捕获犯罪嫌疑人。超出这一范围而提供的证词很可能引起陪审团对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推论产生不必要的迷惑和误解，联邦调查局报告和金斯顿的证言因此而应该被排除。

法官发现，这份证言在法庭上使用则太主观、太不可靠了。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者自己也认为如此。

2001年的7月，一位联邦法官支持了斯彻玻的诉讼，认为费城警方应该为申农的死亡负责，因为警察在调查中忽视了先前的性犯罪行为，而且警察在一位邻居听见了她的尖叫后却拒绝撞开申农的房门。到笔者写作时止，这起家属起诉费城警方为其不负责任的调查而负民事责任的里程碑式的案件正准备在法庭上审理（Porter, 2001）。

讨论

笔者对本案的决定感到十分疑惑。显然，心理画像分析中有关侦查的信息对费城是不利的，法官也不应该如此坚决地将这份证言排除。这便开启了一个先河，即只要联邦调查局的画像结果符合当初操办和使用人的初衷，这个方法就是有效的；反之如果不符合上述要求，就不可靠。这令人感到权威能随心所欲地左右结论。

在任何情况下，笔者都不得不同意本案法官的意见，即排除心理画像的分析，因为这一分析源于不可靠的推论。问题在于审判过程中并没有拒绝联邦调查局已准备好的画像结论，在审判过程中联邦调查局的犯罪心理画像者仍作为专家进行作证。以笔者的经历来看，这是令人质疑的，因为联邦调查局在侦查和审判中使用的是相同的画像方法，进而作出非常相似的结论。

田纳西州诉威廉·R. 史蒂文一案（2001）^①

威廉·R. 史蒂文被起诉涉嫌两起一级谋杀和一起严重抢劫，导致他的妻子桑迪·史蒂文（Sandi Stevens）和他的岳母默特尔·威尔森（Myrtle Wilson）死亡。

背景

史蒂文和他的太太结婚大约3年了。威尔森太太死前跟他们在一起住了

^① 原文为：TENNESSEE v. WILLIAM R. STEVENS, 2001（译者注）。

大约6个月。1997年12月22日，在他们家发现了桑迪·史蒂文和默特尔·威尔森的尸体，每个人分别死在自己的房间里。根据田纳西州诉威廉·R. 史蒂文一案的记载（2001）：

桑迪·史蒂文裸体躺在她的床上，在她的头部附近有几本色情杂志和一个装有她裸体照片的相册。默特尔·威尔森的尸体也是在她的床上发现的。她的睡衣已经被拉了起来，并且她的内衣裤被扔在地板上。法医认为默特尔·威尔森是死于刺伤和用手掐勒，而桑迪·史蒂文是死于被绑扎而勒死。桑迪·史蒂文的一些物品还被扔到拖车中，似乎是抢劫因而引起了抢劫罪的指控。对被告的犯罪定罪是根据雇佣犯罪人对被雇佣者犯罪具有刑事责任的理论，在审判中州一方有证据证明被告雇佣了他的18岁的邻居和他的雇员科瑞·米里肯（Corey Milliken）杀死他的妻子和岳母，并使现场看起来像一次抢劫。

被告否认制造了这起案件。他认为是科瑞·米里肯编撰了“被雇佣谋杀的幻想”，并且在性攻击过程中杀死了桑迪·史蒂文和默特尔·威尔森。

专家及其意见

本案的被告方聘请的专家是格雷戈·麦克格拉雷（Gregg O. McCrary），他曾是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部的成员。这是麦克格拉雷第二次为被告方提供证言。他有音乐本科学位和心理学硕士学位。在确认他的专家资格之时，他对本次犯罪案件中的无组织力特征进行了论证（田纳西州诉威廉·R. 史蒂文一案，2001）：

在陪审团不在时他被请出作证，麦克格拉雷说，他曾被告方聘请进行过犯罪现场勘查，他根据犯罪现场的证据来判定犯罪的可能动机。他特别提到，他没有获得任何关于谁是嫌疑人的信息，并根据这类信息进行犯罪心理画像以决定谁是犯罪人。麦克格拉雷认为，这一犯罪现场是一种“无组织力的性谋杀”现场，桑迪·史蒂文案件的作案人主要攻击目标是性的袭击，而默特尔·威尔森仅仅是一个机会型被害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麦克格拉雷解释说，在无组织力的谋杀案件中，犯罪人认识被害人及知道被害人所在的位置，而且，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没有什么人际交往，这类犯罪经常采取“闪电式袭击”或突然的暴力。犯罪现场凌乱而无秩序。犯罪只施用了有限的控制力。性行为似乎是死后发生的，被害人有死后损伤并有奸尸的迹象。尸体裸露在现场，并留有大量的物证。他认为，无组织力的谋杀所

用的武器通常从现场随手获得。在无组织力的谋杀案件中，通常由突然紧张的事件刺激引发暴力行为，而且，犯罪通常表现为犯罪人在承受突然紧张的事件后将愤怒情绪转嫁给被害人的过程。

麦克格拉雷对无组织力的犯罪现场与有组织力的犯罪现场进行了比较分析，有组织力的犯罪如典型的“雇佣杀人”（contract killing），这类案件的犯罪人与被害人通常是陌生人，在犯罪以前会有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如采用欺骗或诡计来引诱被害人。在有组织力的犯罪现场中能反映出犯罪人完全的控制，经常可以发现对被害人控制的捆绑物；在被害人死亡之前的伤害行为；尸体通常被隐藏，有时也会故意将尸体支起并摆成某种姿势；犯罪使用的凶器一般是经过选择的，是由犯罪人犯罪前带到现场而犯罪后又带走的；犯罪人对证据的意识是非常明显的，他们通常会转移尸体。

在确认麦克格拉雷的专家资格之时，他也谈到分析的错误率问题，以及联邦调查局犯罪心理画像专家相似的分析。他着重指出，真正准确的错误率是无法获知的，但是，准确性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请求心理画像服务（田纳西州诉威廉·R. 史蒂文一案，2001）：

麦克格拉雷被问道：事先能否确认一个可能的准确率？他回答说，联邦调查局已经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作为顾问作出的犯罪现场分析和犯罪心理画像结论的准确性是75%到80%。他解释道，这类分析“不是一门非常严格的科学，能控制试验并且找到所有的成功率”，但是此类服务要求的日益增多显示出它的有效性。麦克格拉雷证实，当他首先进入联邦调查局行为科部时只有7个顾问，当他离开时已有了12个顾问，而现在却有大约40个顾问。他说：“证据在被接受的过程就说明它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哦……它一直在被使用而且需求大大超过我们能提供的能力。”

在麦克格拉雷就本案的听证会上作出证言之后，法庭决定不予采纳他的证言。法庭认为，其证词涉及的是“犯罪人的行为而不是犯罪现场”。也就是说，他只是证明了犯罪人行为（他所进行的犯罪再现是基于他的经验而不是基于犯罪现场的物证）。法庭进一步指出，他在这一领域的证言并不能作为审案事实被法庭采纳，因为其证词“不具有确凿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田纳西州诉史蒂文一案，2001）。最后，审判法庭允许他提出对犯罪现场的一般证言，包括现场的伪造情况、两个人作案的可能性，以及警方应采取的工作。但法

庭不允许他提出关于犯罪动机的看法。

但麦克格拉雷被确认具有犯罪侦查分析专家资格，或称犯罪心理画像专家的资格（田纳西州诉史蒂文一案，2001）。^① 根据田纳西州诉威廉·史蒂文一案的记载（2001）：

麦克格拉雷说，他曾接受被告方邀请对本案的犯罪现场进行过犯罪侦查分析，具体涉及：分析犯罪现场，研究被害者之所以成为被害者的风险因素，审阅一些重要的司法鉴定报告，以及勘查犯罪实施的过程。在本案中，他曾获得犯罪现场的照片和一盘录像带，还有法医检验报告。他认为，犯罪现场是凌乱而无序的。犯罪现场显示出缺乏控制，整个现场凌乱不堪——衣服被扔到地上，钱包和药丸被撒，物品散落一地，圣诞树被撞倒——在实施谋杀案中所有这些并不都是必需的。

麦克格拉雷说，“性犯罪”是一种暴力犯罪，其中，性是作为一种对被害人进行惩罚、贬低和侮辱的凶器或工具。他进一步解释“伪造”现象，伪造是犯罪人对犯罪现场的故意改变，以干扰对犯罪的侦查思路。在伪造中，犯罪人试图通过将犯罪现场伪造得看起来像别种类型的犯罪现场而隐藏真实的犯罪动机和具体的犯罪事实。他还说，“转移的血迹”（transfer blood）是指身上有血的犯罪人接触到别的物体而留下的血迹。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血迹转移的模式是非常明显的，并且可能与特殊的衣服或物品相关联。麦克格拉雷证实，犯罪现场的手印、足迹，以及头发样品是非常重要的物证。另外，麦克格拉雷说，将犯罪人的认罪与犯罪现场发现的证据结合起来非常重要。

麦克格拉雷证实，基于犯罪现场的观察，很可能有数名犯罪人。首先，被害人被用不同的凶器杀死：威尔森女士被刺，而史蒂文女士遭到了绑架勒

^① 德普等人（Depue, 1995, 115 页）清楚地论述了“犯罪侦查分析”这一术语仅仅是 FBI 对“犯罪心理画像”这一术语的替换而已。

“对非法暴力行为的犯罪侦查分析（CIA）能给警方提供各种有用的信息。以前的术语‘心理画像’、‘犯罪人画像’和现在的‘犯罪侦查分析’都是要区别于精神健康专家所使用的程序。”

上述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FBI 画像专家发现犯罪人画像和心理画像在法庭上通常不被采纳。然而名称的改变会使这一方法更易被法庭接受，此处借此名称表示心理画像而已。

杀。其次，在史蒂文女士房间里并没有许多转移的血迹，本来认为应该有很多的血迹，如在药瓶上或在床上的色情杂志上，这些物品是犯罪人不得不接触并放在床上的，但是却没有一点的血迹。另外，对犯罪现场的“伪造”、在扔到拖车上的物品中也未沾上任何血迹。因此，麦克格拉雷认为，犯罪人试图“伪造”以使犯罪现场更像一起盗窃案件的努力并不很充分。他说，窃贼不需要将衣服和其他物品向外扔。

辩护律师向麦克格拉雷咨询道：色情杂志在“性犯罪”中起着何种作用？他回答说，性犯罪的动机是对被害人进行惩罚、贬低、羞辱，“色情杂志放在被害人身边——哦——我个人的看法是，或许最好的解释是对被害人进一步的贬低和羞辱，并且，它也是产生性犯罪的动因。”

争议

被告的辩护方认为，法庭错误地限制了麦克格拉雷证言的使用。他们认为，法庭在决定证据可采信方面运用了错误的法律标准，对麦克格拉雷提出的证言进行了不合理的解释。他们认为，麦克格拉雷对犯罪现场特征的证明和对这些特征的解释超出了普通陪审员的理解范围。他们还认为，限制麦克格拉雷证言的裁决对被告不利（田纳西州诉史蒂文一案，2001）。

法庭裁决

田纳西州上诉法庭认为，审判法庭因证言不可靠而限制麦克格拉雷证言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们也清楚地确认了这部分最终不能作为证据而采纳的证言属于犯罪心理画像（田纳西州诉史蒂文一案，2001）：

麦克格拉雷承认，就他所知，美国没有一个法庭曾经采纳犯罪心理画像专家的证言。最典型的是，犯罪心理画像是应权威部门的请求而获知有关未知犯罪人的种族、性别、职业、地位等信息。尽管这种高级推理活动对犯罪侦查人员有很大的帮助，但并不可靠到足以在刑事法庭上作为专家证言的程度。同样，虽然从技术角度看，这不是“犯罪心理画像”，但是，麦克格拉雷基于所有的刑事证据对犯罪人进行的分析仍不能通过审查。尽管麦克格拉雷同意人类行为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谋杀犯罪行为是由多种动机因素决定的，但是，在本案中麦克格拉雷倾向认为谋杀犯没有被雇佣实施犯罪行为，而是犯罪人由苦恼的事情引发了实施性犯罪的动机。

法庭并不怀疑麦克格拉雷的证言是在许多年的研究和经验基础之上提出的。出于这个原因，法庭认为他的证言并不是全部基于推测。然而，法庭并不能确信这种分析是经过了非常客观的检验，或者是基于长期的、可靠的、科学的原则基础上的结论。

田纳西州上诉法庭坚决认为，麦克格拉雷试图解释的不仅仅是犯罪现场的特征，他在试图证明，他能够通过把目前犯罪现场与“典型”犯罪现场的对比来证明犯罪人的特别心理动机，即这一性侵犯的动机是由突发应激事件引发的；他试图说明，被告之所以实施或不实施犯罪是基于他个人的行为模式（田纳西州诉史蒂文一案，2001）。

对于田纳西州可接受的专家证言必须能对审案法官提供实质性的帮助。田纳西州上诉法庭认为，审判法庭在决定专家证言不足以可靠到可以为审案法官提供极大的帮助方面并没有滥用其判断力，因为充分考虑了下面的因素：

1. 以往相似的判例限制了此类证言。
2. 准确率只有 75% ~ 80%。^①
3. 专家证言“特殊的权威氛围”^②。

讨论

笔者同意本案的决定。审判法庭将麦克格拉雷证言的很多内容认为是不可靠的归纳型犯罪心理画像而将其排除是正确的。如前所述，如果俄克拉荷马州法院在审理中讨论俄克拉荷马州诉吉米·雷·斯劳特一案（1997）中提出同样问题的话，哈兹伍德在那起案件中的证言就有可能完全被否定。与那起案件一样，在涉及归纳型犯罪心理画像时讨论案件的一般特征并没有大错。但是必须彻底检验这些分析背后的科学基础，而且专家也不应该试图以绝对把握使他们的分析符合法庭要求的确定性标准。

① 笔者清楚地知道，并没有法庭规定 70%、80% 甚至 95% 就是可以接受的正确率，更何况法庭将决定的是被告的生死和自由。

② 要知道专家的科学证词也可能是非常偏见的，或者混淆事实或者误导陪审团，因为它拥有确定无疑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的权威光环。于是法官有可能抛弃他作为事实发现者的责任而采纳专家的证言。因此，接受专家证言必须经过仔细的考察。

未来法庭上的犯罪心理画像

以下的案例说明，犯罪心理画像的证言将如何在法庭上可靠地使用。这是第一起由一名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在法庭上进行犯罪心理画像作证的案件。当时法庭允许他们在刑事审判的定罪阶段给出精确的专家画像结论，而不用担心会被撤销。下面提供给读者的是本案的背景，并回顾了相关的司法问题，以及笔者的法庭结论。要注意这里虽然谈到了犯罪嫌疑人通常的特征，但是笔者并不对具体犯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美国法庭有时也称之为“终极判决”）。

1999年7月底，在春绿（spring green）附近的威斯康星州河上漂着一些粗呢包，在这些包里装着由一些塑料袋包起来的被肢解的尸块，被害人是25岁的韦沃诺·库帕咋（Mwivano Kupaza）。她的胳膊、腿、脚和头在关节处分离，犯罪人使用的是一种像解剖刀一样的锋利的剃刀。犯罪人使用类似的工具把被害人的脸、头部和脖颈处的皮肤剥掉。这种肢解方法严重地牵制了侦查工作。检验这些尸块并没有弄清楚死亡的原因。

由于过度的肢解和毁损，直到2000年2月上旬才确认了被害人的确切身份。当时彼得·库帕咋的前妻莎丽高斯（Shari Goss）确认那是韦沃诺的脸，这张脸印在Westby威斯康星州商店的传单上。有了这条线索，执法人员求助于威斯康星州犯罪实验室的指纹鉴定专家，他能够将尸体上的指纹与韦沃诺1997年10月留在麦迪逊（Madiosn）堕胎诊所表格中的指纹相比对。

威斯康星州诉彼得·库帕咋一案（2000）^①（见图18-1）

同月，另一位坦桑尼亚移民，40岁的彼得·库帕咋，被害人的堂兄，因涉嫌谋杀而被起诉。库帕咋离异，独身住在一间只有卧室的房间里，在威斯康星州从事过多种工作。他曾是州财政部的一名助手，又曾受雇于州自然资源部在地区娱乐展示会上为参观州公园展示的顾客提供服务，后来又在州劳动发展部作为一名临时雇员从事失业保险的工作。韦沃诺·库帕咋以前和她的堂兄彼得住在一起，就在麦迪逊附近。

^① 原文为：WISCONSIN V, PETER KUPAZA, 2000（译者注）。



a. 韦沃诺·库帕咋的头颅。头部、面部、脖子上的皮肤已经被犯罪人剥掉。这一行为已超出犯罪人简单地模糊被害人特征以掩盖其身份的目的



b. 准备颅面重建的韦沃诺·库帕咋本来面目的头颅



c. 颅面重建之后的韦沃诺·库帕咋头像。各个角度的照片印在传单上，分发给发现尸体的区域以帮助确认被害人

图 18 - 1

法庭于2000年6月开庭审理。起诉方把焦点集中在下面几方面：一是彼得·库帕咋向警方所做的关于韦沃诺下落的陈述，这一陈述充斥着矛盾。二是从韦沃诺的信上提取到的一枚指纹，这封信是从他们共用的邮箱里发现的（而且这封信是她被认为已经返回到坦桑尼亚之后留在信箱里的）。三是警犬在彼得·库帕咋的房间里（韦沃诺曾跟她堂兄一起住在这里）和汽车里闻到了某种特殊的人的体液气味。^①

彼得·库帕咋的前妻莎丽高斯，证明彼得非常精通刀具的使用，而且掌握屠宰动物的有关知识。在她看来，这是由于生长在坦桑尼亚的结果，在那里人们自己喂养和屠宰牲畜。她还证实，装着尸块的粗呢包与她送给前夫的包非常相似（Staff, 2000）。

州属的刑事病理学家罗伯特·亨廷顿Ⅲ（Robert Huntington Ⅲ）证明被害人的尸体曾被小心翼翼地一块一块分割。亨廷顿称这种肢解方法是“关节脱落法”（disarticulation），因为尸体是在关节处被分离。他证明犯罪人掌握着大量的解剖学知识（Staff, 2000）。

2000年6月，威斯康星州允许在威斯康星州对彼得·库帕咋诉讼一案（2000）的定罪阶段采用犯罪现场再现的专家证词和笔者提供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证词。^② 这项证词被允许使用归功于上诉法院在威斯康星州诉理查德一案（1998）中的公开观点。在理查德一案中，威斯康星州上诉法院最终裁定（因为州最高法院拒绝复审）在定罪阶段排除被告方的专家证言是一个可撤销的

① 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人们期待着能够在任何一个房间中找到人的体液遗留物，同样也希望在汽车中找到这种体液痕迹。在汽车里使用了一种生化酶鲁米那对血液显现反应，但没有有价值的发现。起诉方和警犬训练员认为，警犬的嗅觉远比鲁米那测试更灵敏。然而，狗的嗅觉要求气味在空气中传播，而鲁米诺则不必。鲁米诺测试无结果，狗对血迹的嗅觉结果证明也不准确。

同样应该注意的是，州一方没有让任何一个州属的刑事科学家来验证，因为当科学家的发现与狗的发现相矛盾时，也就与随后被告有罪的认定相冲突。后来，州属的犯罪实验室的专家成为辩护方的证人。

② 如同本书和特维（2000）著作中所述，犯罪心理画像者已经在美国法庭上基于各种事实基础提供专家证言，但在定罪阶段却运用较少，而且还不公开（例如，明确地注明是心理画像者提供的心理画像结论）。在威斯康星州诉库帕咋一案中，法医的结论与笔者的某些结论相同，只是他的结论源于医学专业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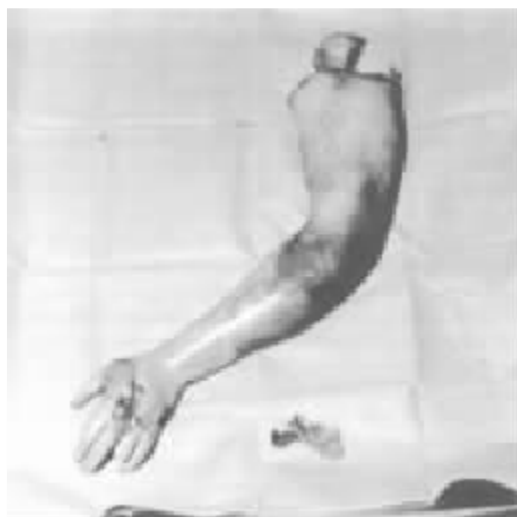
错误，由心理学家查理斯罗德（Charles Lodl）博士对理查德的犯罪心理画像通过与褒童狂的比对而提供的专家证词。同时也认为，犯罪心理画像提供的证据是陪审团通常所不知道的，必须由专家提供研究的情况和提出被告人是否具备与画像一致的性格特征，由专家在这两方面作出证明。



a. 韦沃诺·库帕咋的躯干



b. 韦沃诺·库帕咋的右臂



c. 韦沃诺·库帕咋的左臂

图 18-2

下面是笔者对被告提出的画像结论，日期是在 2000 年 5 月 30 日。这些结论是专家证词的基础，最终提交给法庭和陪审团：

检验者认为，彼得·库帕咋住在威州麦迪逊市 107 区好景公寓 1118 号的房间并不是肢解被害人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我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 房间里缺少明显的血迹或血迹分布（bloodstain patterns），在本案中通过手工肢解尸体和剥皮，血迹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如在地毯下、瓦片下、护壁板旁边等）。非常重要是在浴室里离瓷砖地板只有几厘米的护壁板边上发现了一枚单独的少量的血迹。这非常可能是在刮切足、关节或其他部位时无意中从切伤处溅落的。

2. 在这里并没有发现从被害人尸体关节处肢解下来的与人体组织或体液相关的证据（如脂肪组织、皮肤和滑膜体液）。其中任何一项都应该出现，成为本案中某种手工肢解尸体和剥皮的证据（如在地毯下、瓦片下、护壁板旁边等）。

3. 在彼得·库帕咋的一辆灰色日产轿车里，也没有发现任何如前两项所述的细微证据。

4. 在上述房间和汽车里也没有发现与处理被害人尸体时使用粗呢包相关的纤维证据。再考虑到发现尸体时被害人是裸体的这一因素，可以推知被害人是在另外的地点被杀害的。

检验者认为，这起犯罪案件包含着很多成分，这些成分若一起考虑的话，可以用来解释犯罪人的性犯罪动机。应该指出的是，如果单独考查这些成分，那么每项成分都是缺乏说服力的，但是如果它们结合起来考虑，那么这起案件就极可能是性犯罪案件。在这个问题上我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 被害人的尸体是赤裸的，但不能完全解释剥掉被害人的衣服可能是一种反侦查防御措施。

2. 被害人尸体上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她在死亡前遭受过暴力伤害，而且也明显缺乏通常提到的“过度伤害”（overkill）（如多次殴打脸部、头骨有粉碎伤、多次刺戳等）证据，从中可以推断犯罪人的愤怒情绪和双方的暴力对抗程度。

3. 被害人死亡之后，犯罪人在处理尸体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特别是有明显的证据显示，犯罪人用非常锋利的刀具从关节处将被害人尸体肢解，用非常锋利的刀具剥掉被害人脸部和大腿上的皮肤。重要的是这种认真仔细地

肢解被害人尸体的方法并不能完全解释为这是为了防止辨认出被害人身份而采取的防御措施。因为如此长的时间就增加了犯罪人被发现的风险，而且犯罪人对移除和毁坏被害人的手、指头和牙齿并不感兴趣。

4. 并没有找到被害人的双脚。脚通常易于成为犯罪人物恋的对象。被害人大部分被肢解的尸块都可以在相同的大致区域内通过一条直接的搜索线路发现。考虑到这一点，再加上本案中犯罪人处理尸体的特征，我认为被害人的脚肯定是找不到了。

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在阴道和肛门内能长时间保留性行为（包括强奸）之后典型的精液和毛发证据，而且也能估计出死亡时间段，但是在本案中并未检验性攻击行为。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尽管验尸时运用了大量的药物毒理学检验，尽管在被害人血液中发现了一些酒精成分（知道被害人并不喝酒），但却没有进行毒物筛选分析。检验者弄不清楚在验尸时为什么没有做这些检验，因为这些检验本应是再现被害人死亡过程中重要的步骤。

检验者认为，犯罪现场的证据显示犯罪人掌握一些医学知识。在这个问题上我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 被害人并不是被通常使用的砍劈工具所肢解，例如，短柄斧、切肉刀或用来剔除骨头的（如屠夫使用的）弯刀。
2. 并没有证据显示犯罪人使用了锯，例如，使用了钢锯、带锯、转向锯等。
3. 有证据显示犯罪人使出浑身解数谨慎地、精确地、精密地在被害人的头、胳膊、腿和脚的关节处下手，使用一种很像解剖刀一样的锋利的切割工具将这些身体部位切割下来。

基于这些事实，考虑到犯罪所需的时间以及需要的一种心理状态，检验者更深入地指出，这起案件的犯罪人从前有过这种关节脱落肢解尸体的经验，而且很可能有别的被害人。

2000年6月，尽管非常缺乏任何直接的物证来证明犯罪事实，但是索克地区陪审团花了9个小时最终认定彼得·库帕咋在1999年7月下旬某个时间杀害并肢解了韦沃诺·库帕咋。接着彼得·库帕咋被认定犯了一级谋杀罪而被判处终身监禁（见图18-3）。



被告席上的彼得·库帕咋正在回答
有关谋杀他堂妹韦沃诺·库帕咋的提问

图 18-3

犯罪心理画像证言在本案中的公开使用非常重要，因为它在威斯康星州开创了先例，并很可能被全美国的法庭借鉴。在任何一个案件中都十分清楚的是，犯罪心理画像者都有责任知道犯罪心理画像在法庭上能提供什么样的证言，以及这些证言会带来什么样的潜在后果。所期望的是他们能以一种细心的、有意识的、负责的态度来运用自己的法庭证言。^① 不论犯罪心理画像准确与否，它肯定不应当成为侦查和法庭审判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BBC News (1998) "Warning Over Forensic 'Cowboys'", April 30.
2. Beggs, C. (1998) "Pair Falsely Convicted Will Get \$2 Million", Associated Press, May 9.
3. Blackwell, L. (1998) "Murder Trial Verdict May Come Today", Richmond Times Dispatch, July 24.
4. Deitz, P., Hazelwood, R. and Warren, J. (1993) "Compliant Victims of the Sexual Sadist", Australian Family Physician, 22 (4, April), 474 ~ 479.
5. Depue, R., Douglas, J., Hazelwood, R. and Ressler, R. (1995) "Criminal Investigative Analysis: An Overview", in Burgess, A. and Hazelwood, R. (Eds.), Practical Aspects of Rape Investigation, 2nd ed., New York: CRC Press.
6. Edwards, C. (1998) "Behavior and the Law Reconsidered: Psychological Syndromes and Profiles",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43 (1): 141 ~ 150.

^① 法庭意见（在法庭上提出并值得法庭重视的观点）和侦查意见实际上是绝对不一样的。侦查意见和侦查推论有助于促进侦查工作，并且如果发现了新事实就可以连续地对之加以细化。法庭意见或多或少是决定性的，因为它依据的是在特定时间里对案件信息的统计数据。因此，如果对证据和证言产生怀疑就没有必要再次通过调查加以检验核实。

7. Gross, H. (192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8. Hastings, D. (2001) "Popular Forensic Scientist is Suddenly the Target of Widespread Criticism", *The Salt Lake Tribune*, Sunday, July 22.
9. Horvath, F. and Meesig, R. (1996)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rocess and the Role of Forensic Evidence: A Review of Empirical Findings",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November, 41 (6), 963 ~ 969.
10. *Idaho v. Chapman* (1991) No. 18595, Sept. 6, 1991 (816 P.2d 1023).
11. Kalfrin, V. (2000) "Deputy Coroner Accused of Faking Credentials", *APB News*, February 8.
12. Kirk, P. (1974) *Crime Investigation*, 2n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3. Mills, S. (2001) "Lawyers Allege Testimony in 91 Death is Tainted", *Chicago Tribune*, January 19.
14. *Ohio v. Haynes* (1988) No. 4310, Sept. 21, 1988 (Ohio App. 9 Dist.).
15. *Ohio v. Roquemore* (1993) No. 92AP-356, March 16, 1993 (85 Ohio App. 3d 448).
16. *Oklahoma v. Slaughter* (1997) No. F-94-1312 Dec. 17, 1997 (950 p.2d 839).
17. Porter, J. (2001) "Schiebers Toast Lawsuit Ruling", *Philadelphia Daily News*, Friday, May 11.
18. Roarke, M. and Sowa, T. "DNA to be Retested in Yates Case: Suspension of Crime Lab Scientist Could Taint Serial Killer Evidence", *Associated Press*, June 3.
19. *Schieber v. City of Philadelphia, Steven Woods, individually and as a Police Officer, and Raymond Scherff, individually and as a Police Officer* (2000) Case No. 98-5648, U. S. District Court, Eastern District of Pennsylvania, December 13.
20. Staff (2000) "Man Ordered to Stand Trial in Death of Cousin, Who Was Dismembered", *Milwaukee Journal-Sentinel*, March 3.
21. Stinebaker, J. (1998) "Evidence Tampering Alleged During Smithers Autopsy", *Houston Chronicle*, April 2.
22. *Tennessee v. Stevens* (2001) No. M1999-02067-CCA-R3-DD, May 30, 2001 (Tenn. Crim. App. 2001).
23. Thornton, John I. (1997) "The General Assumptions and Rationale of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in Faigman, D., Kaye, D., Saks, M. and Sanders, J. (Eds.)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Law and Science of Expert Testimony, Vol. 2,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

24. Turvey. B. " Criminal Profiling and the Problem of Forensic Individuation", Journal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1(2, May).

25. Wisconsin v. Richard A. P. (1998), No. 97 - 2737 - CR.

26. Wisconsin v. Kupaza(2000), Case No. 00 - CF - 26.

第 19 章 纵火和爆炸 ——行为表现

Brent E. Turvey, M. S.

从人的心态能看出残忍，从人的表情能看出嫉妒，从人的体态能看出恐惧，从一个人的衣着能看出一个人的秘密。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一种神秘的表象》

纵火者的预备程度和预备性，完全显示了他的有组织特征。我们可以借此清晰地思考纵火者可能的动机，并在侦查中对纵火者进行人格画像。

狄汉（DeHaan, 1997, p. 405）

行为证据分析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理解一个人的行为与动机和需要之间的本质联系。人类行为是内心需要的体现，表达了人们在某方面的欠缺，同时也是窥视人的意愿的窗口。在此分析一下纵火和爆炸行为。这些行为可以像其他任何犯罪行为一样进行分析。这些行为可能发生在各种情景中，可以满足犯罪人的多种需要，同时也可以被犯罪人的各种动机所驱使。这种行为不局限于某种刑事犯罪，也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被害人。在某种特定的犯罪中，采取纵火或爆炸的方法，仅仅是受犯罪人动机、犯罪意图、技能水平和可利用的物质条件的限制。^①

^① 笔者经常被问到是不是一名纵火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基本上可以这样说，虽然笔者从事的不是纵火案侦查专业，但是在处理和研究案件中却会经常碰到纵火和爆炸案件。所以，笔者虽然不是有意处理涉及系列纵火犯的案件，但这些行为与笔者处理的其他类型的暴力犯罪是相似或相同的。从根本上讲，还是要依赖具体案件。

定义

“纵火”(arson)这一术语属于刑事犯罪的范畴,像强奸、谋杀这些术语一样,用来特指某一类犯罪行为。“纵火”这一术语通常描述的是故意纵火来破坏财物或掩盖其他罪行的诈骗行为。(DeHaan, 1997, p.482)。不具备这种目的,纵火犯罪是不成立的。当然也有一些非刑事犯罪动机的纵火行为。为了避免将某种行为主观断定为有罪,笔者将在整章中使用中立的行为描述词——纵火(fire setting)。

爆炸(bomb)是指一种爆炸物由于撞击、靠近、设定时间或别的一些前置手段而引起其内部气压发生强烈变化并产生巨大声响。爆炸物(explosive)泛指任何一种伴随着能量释放能在瞬间将其由固态转化为气态的物质。爆炸物可以用来制造爆炸,而通常将爆炸定义为势能(化学或机械的)突然转变为动能,同时产生了大量的热、气体和机械压力的过程(DeHaan, 1997, p.482)。为了实施犯罪活动而把爆炸物制成炸弹,也是一种犯罪行为。

本章的中心就是讨论火或者爆炸物在刑事犯罪中的使用,以及一些必要的行为证据分析。

当涉及纵火或爆炸时,犯罪行为的再现和解释就可能显得特别困难。因为纵火、爆炸以及灭火行动本身的作用很可能毁坏一些或者大部分可辨认的与犯罪有关的物证。此时,犯罪心理画像者应该清楚: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证据,也不意味着涉及纵火或爆炸的案件就很难破获。请听克瑞(Corry)和沃特柔(Vottero)对此问题的看法(1997):

每当一连串突发的纵火案件被新闻界炒作时,身着制服的警官面对着记者闪光的照相机,总是列举出一系列破获纵火案件如何困难的借口。

而主要问题是现在或将来的侦查人员一旦接受了纵火或爆炸的案件就很难破除这一悲观论点而误以为都是难以破获的。然而我们的经验却是纵火案件不仅可以破获,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普通的纵火案件是很容易解决的。

但是,侦查人员只有投入了熟练的技能和高超的智谋之后才能轻而易举地破获案件。在这些案件中,纵火案件的侦查人员、犯罪实验室专家、犯罪心理画像者的通力合作是成功地再现犯罪现场行为和随后确定犯罪动机的基础。

如欲参考有关纵火或使用爆炸物案件侦查中使用的概念和程序的专著或

通著，笔者特别推荐给读者下列书目：

1. DeHaan, J. (1997) Kick's Fire Investigation, 4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 Hall.
2. NEPA (1998) "NEPA 921: Guide for Fire and Explosion Investigations, 1998 Edition," Technical Committee on Fire Investigations, Quincy: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3. Saferstein, R. (1998) Criminal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Science, 6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 Hall.

作为暴力手段而使用火和爆炸物

使用火或爆炸物是犯罪人使用暴力手段意愿的一种延伸，是犯罪意愿转化为犯罪行为的中介。它们伤害或毁坏蓄谋的攻击目标或被害人，遗留下可见的或可辨认的痕迹。这种痕迹能够根据它本身的特性以及它对人、对建筑物、对环境的毁坏来解释。

火和爆炸物作为犯罪人使用暴力手段意愿的延伸，可以出于与其他暴力类型相同的动机，不论是自卫的还是用以杀人，而成为犯罪人的一种武器。为了解释用火或爆炸物进行犯罪的动机起源，就像解释别的行为的动机起源一样，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在被害人学中论述的犯罪情境特征和犯罪现场特征。狄汉认为（1997，pp. 395 ~ 396）：

纵火案的动机、手段、目的和目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互关联的。……探明了某一方面就可以揭示或推导出其他方面。

被害人学

确定谁是犯罪人蓄谋伤害的被害人或哪些是犯罪人选择加害的目标非常重要。这就意味着应当确定犯罪人打算以纵火或爆炸的形式实施侵害人或目标，即谁或什么可能遭遇这些不幸和灾难。进一步也就可以确定哪些人或目标不会被火和爆炸物所殃及。纵火或爆炸的目标不仅包括个人，也包括群体、财产及一些象征物。在这种情况下，目标（target）就可以被界定为来自犯罪人心目中的袭击对象。这也就可以把目标与被害人区分开来。被蓄谋攻击的被害人是指个人、群体或机构，犯罪人打算使之遭受损失、不幸、伤痛或死

亡。被蓄谋攻击的被害人和目标可能是同一人，也可能是相似者，即不仅是一个被害人，而且可能是多个被害人。

由于纵火或爆炸案具有不可预测性、不可控制性或不确定性的特点，因此在此类案件中常常会有间接被害人（collateral victims）。犯罪人在侵害被害人时，会造成另一被害人的损失、破坏、伤害或死亡（通常因为他就在附近），这一被害人就称为“间接被害人”。“一旦点燃，火就不再服从点火者的意愿和要求了”（Geller, 1992）。

个体

个体被害人指被犯罪人由于情绪、心理或掩盖罪行等原因而圈定为袭击目标的人，也包括那些间接被害人。某些被害人也可能由于具有某种象征性（symbolic）而被犯罪人圈定为袭击目标。在这种情境中，具有象征性的人可能是持有某种观点、信仰的人、群体，乃至是别人的替身。

群体

群体是个人的结合，这些人有共同的特征，如性别、民族、肤色、宗教信仰、活动方式或共同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象征性可以是任何代表了某种观念或信仰的群体。

财物

财物可指建筑物、交通工具或别的物质。它包括那些有使用价值或证据价值的物品，以及一些象征性的物品和附属物品（由于摆放位置临近而在纵火或爆炸中无意地被损坏或毁坏的物品）。在这种情况下，象征性有时也可以是代表了某种观念、信仰、群体或个人的物品。

犯罪现场特征

在第11章中详细讨论过的普通现场与本章相同。这里只作一些小的调整，因为本章特指纵火和爆炸现场分析。

首先必须确定是哪种因素导致了犯罪现场的损坏？火，还是爆炸物？或者是二者兼有？下列一些特征也应当被考虑进去，因为它们与引火物或爆炸物的制作以及安放有关。

助燃物和爆炸物

助燃物是指任何可燃材料（包括气体、液体和固体），它常被用做点火或增加火力，以及加速火的蔓延速度。一旦确认使用了助燃材料，必须进一步确认该材料是现场原有的还是外部带来的。犯罪人使用的助燃材料可表明犯罪人的相关经验，犯罪人当时的便利条件、动机和目的（DeHaan, 1997, p.415）。

一些普通的助燃物有：

1. 汽油。
2. 煤油。
3. 打火机液体。
4. 可饮用的含酒精的液体。
5. 报纸。
6. 堆积的杂物。
7. 破布。
8. 衣服。

举例来说，狄汉（DeHaan, 1997, p.407）曾提出过，犯罪人在材料使用方面经常遵循两条原则：

（1）越简单越好。（2）就地取材。这两条原则能尽量减少纵火者带到现场的物品。某人在现场被见到的次数越少（特别是不宜携带一些箱子和零七碎八的包裹），那么他被证人注意到的次数也就越少。简单的设备比复杂的设备更容易点燃，而且简单的设备也更容易在整个火灾中或常规灭火中被焚毁或破坏掉。

犯罪活动中，使用有关爆炸物的范围可以从使用天然的或自制的混合物（在一个密封的容器内装上汽油）到使用可购买的爆炸物（炸药），甚至到使用特殊的非商业性的爆炸物（军用环-4）。如同使用助燃物一样，犯罪人使用的爆炸物的种类也反映了犯罪人的经验、能力、动机和目的。

起源点

起源点是指具体的点火地点（DeHaan, 1997, p.486），或者是指一个具体的放置爆炸物、随后即发生爆炸的地点。在所有的案件事实未完全弄清楚

之前，不能排除多个起源点。

起源点能明显地揭示犯罪人的袭击目标和被害人。

引燃引爆的方法

犯罪人对燃烧助燃物或爆炸设备运转启动或延时的选择依赖于使用爆炸物和燃料的种类、希望拖延的时间以及目标的活动规律。狄汉提到的点火方法有以下几种，但不限于此：

1. 明火（火柴、打火机等）。
2. 导火索（以任何长度都可以引燃的易燃物为材料）。
3. 闷烧物。
4. 香烟。
5. 电弧。
6. 发热的导线。
7. 化学反应（购买的或临时制造的）。
8. 黑火药与闪燃炸药（flaspower）。

根据国家消防协会 921 手册（NFPA，1998），引爆方法有以下几种，但不限于此：

1. 雷管。
2. 表面热。
3. 电弧。
4. 静电。
5. 明火。
6. 电火花。
7. 化学反应（购买的或临时制造的）。

特征和目的

可以从犯罪行为中推断出犯罪人的目的。根据欧·哈雷的观点（O'Hara，1997，p.214）：

嫌疑人的行为经常能提供一些有关犯罪目的的证据。例如，搬走有价值的物品或用次等物品将其替换的行为就反应了嫌疑人在纵火前的准备活动。行为也可能显示了被告与被烧毁的建筑物主人之间的反感或敌对关系。不尽

力灭火或在当时有条件去报警而不去报警也是重要的线索。犯罪嫌疑人的潜逃也是其有罪的一种表示。

当我们分析犯罪人纵火或使用爆炸物的目的和特征时，判断是否是故意损坏非常有帮助。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多地了解环境结构和燃料在燃点方面的情况。而这应该与使用助燃物或爆炸物的数量相比较，与袭击目标损坏的数量相比较。犯罪人使用的燃料或爆炸物越多，他们企图让袭击目标遭受的损失也就越大。

另外，当我们考虑犯罪人纵火或使用爆炸物的目的和特征时，要牢记犯罪人选择的目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意思是要找寻一些关于设施、点火器或火源的证据，即用火或爆炸物施加损坏的指向性。犯罪人意图伤害、损坏、杀死或毁坏的是一个范围较窄还是较宽的目标。窄范围的目标是用火或爆炸物给具体的目标施加一个具体的、集中的、定量的损害。宽范围的目标是用火或爆炸物企图任一种蔓延的方式来施加损害。在一些涉及宽范围目标的案件中，目标物可能就在火源附近，但犯罪人也可能设计出超越原始目标而殃及周围被害人的行动计划。

犯罪人的技能水平

在评定犯罪人的技能水平时，应当考虑爆炸物的制作方式、火源的放置位置，以及火和爆炸物的特征。关键问题包括：

1. 犯罪人成功得手、蓄意设计或制造的燃烧或爆炸技术有多高超？
2. 引燃或者引爆的效率如何？
3. 纵火或爆炸达到犯罪目的了吗？

动机方面

目前，有些研究纵火犯和爆炸犯的专家们有一种倾向，他们对犯罪人进行大量的归类，从归类中推断某个犯罪人的特征。如前所述，这并不是行为证据分析的目的和方法。

例如，联邦调查局国家暴力犯罪分析中心（NCANC）提出了六种主要的纵火者动机，而且证明这种分类对确认犯罪人特征非常有帮助。这六种动机是（Burgess et al.，1997，pp.165～166）：

1. 报复。
2. 兴奋冲动。
3. 恣意破坏。
4. 图财。
5. 掩盖罪行。
6. 过激心理。

事实上，这是对格罗茨强奸犯分类的修改（Groth, 1979），在格罗茨强奸犯分类基础上加上了与性无关的动机（第4点和第5点）和非动机的内容（第3点）。联邦调查局的国家暴力犯罪分析中心提到的“报复”和“过激”动机（顾名思义，符合自信和过于自信的动机）都和格罗茨分类中的愤怒型动机犯罪人相一致。而国家暴力犯罪分析中心提到的“兴奋冲动”动机则与格罗茨分类中的强权型犯罪人（power offender）相一致（或与自信、过于自信、虐待动机相一致。正如在定义中指出的，这并不是一个惟一的分类，因为犯罪人有许多种“兴奋冲动”）。

“恣意破坏”也不是一种犯罪人的动机。它是刑事犯罪分类的一种，或者如前所述，是各种行为的综合表现。作为动机反映的需要，比如，过分自信驱使的需要、以自信为导向的需要、兴奋冲动的需要或报复导向的需要，实际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需要。在我们理解犯罪人为什么实施犯罪之前，我们仍需要深入地进行行为分析。

行为动机类型的应用

正如前面多次提到的，笔者不赞同动机分类的归纳方法，而支持动机类型的演绎方法。笔者认为，本文中详述的分类学对于解释有关纵火和使用爆炸物的行为分类是游刃有余的，而且在下一节中要着重讨论防御性行为。

要注意，在此研究的行为动机类型将成为犯罪心理画像者的指南，它能帮助画像者根据环境、根据犯罪人内心需要来对行为进行分类。它并不是要成为一种诊断工具，把犯罪人生搬硬套到某种类型中或给他贴上某种标签。在动机类型与犯罪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区分。

同时也要认识到，研究动机类型与犯罪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正如克瑞（Corry）和沃特柔（Vottero）所论述的（1997）：

大多数成人纵火是出于报复、恶意伤害、掩盖另一罪行或欺骗的目的。而许多青少年纵火是出于报复或为了达到某种其他的“合乎逻辑”的犯罪目的。在许多案件中，纵火犯与他袭击的目标之间存在着某种直接的联系。

反侦查的纵火和爆炸

反侦查动机（precautionary - oriented）美国联邦调查局提出的犯罪掩迹性动机（concealment motivation）更具有综合性。反侦查行为（precautionary act）是犯罪人在犯罪前、犯罪中、犯罪后随时可能实施的行为，即有意迷惑、妨碍或欺骗侦查或法庭审判的行为，以达到隐匿犯罪人身份、隐瞒他与犯罪的关系或者掩盖犯罪事实的目的。出于反侦查动机的纵火和爆炸指用火或爆炸物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手段的行为，也就是用纵火或爆炸来掩盖、损坏或毁坏有证据价值的物品，此行为还包括部分或全部焚毁犯罪现场或被害人的行为。

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行为类型通常并不是很彻底，不论现场残留物多么微乎其微，法庭科学家都会充分利用这些残留物潜在的证明力来彻底审查犯罪人企图毁坏的物品。下面就是一些例子，但不限于此：

掩盖、破坏、销毁犯罪现场

1. 抢劫某公寓后纵火。
2. 为破坏绑架杀人后的血迹等烧毁房屋。
3. 为了掩盖谋杀行为，用煤气导管引燃、炸毁被害人居住的房间。

掩盖、破坏、销毁被害人尸体

1. 强奸杀人后，在森林里焚烧被害人尸体。
2. 用炸药炸毁被害人的尸体，然后将尸块藏匿在不同的地方以掩盖杀人罪证。
3. 把被害人尸体放在汽车后备箱中，焚烧汽车以掩盖杀人罪行。

掩盖、破坏、销毁能显示犯罪人与被害人关系的证据材料

1. 烧毁被害人以掩盖强奸行为。
2. 烧毁被害人的血衣。
3. 烧毁犯罪人的血衣。
4. 烧毁记录、契约、扉页、保险单。

掩盖、破坏、销毁能显示犯罪人与被害人关系的私人物品

1. 烧毁照片、录像带、计算机硬盘或别的物品，或者焚烧存有被害人与犯罪人在一起的文件记录的场所。
2. 烧毁犯罪人送给被害人的礼品。
3. 烧毁被害人送给犯罪人的礼品。

案例

下面提到一些案例，以期读者能对各种犯罪行为，包括纵火和爆炸的行为，以及一些可能的动机有一种直观的感受。再次提醒读者，这些是行为，而不是动机，是犯罪人需要的一种表达。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纵火和爆炸行为应该能更深入地理解特定案件中的犯罪人。试析以下案例：

对一名系列纵火犯的犯罪心理画像：艾伦·韦恩·潘森一案^①

艾伦·韦恩·潘森（Allen Wayne Penson）是沃尔克（Walker）县的一名失业市民。据悉，他曾因进入沃尔克县的救援大楼并焚烧该大楼和该机构的一辆汽车而被判过盗窃和纵火罪。在审判时，检察官试图证实潘森是一名纵火惯犯，不是因为凭借任何物证，而是因为他符合联邦调查局对一名纵火惯犯的犯罪心理画像。

背景

根据佐治亚州（Georgia）诉艾伦·韦恩·潘森一案的记载（1996）：

在大火开始前，有人看见一个符合潘森外貌特征的人带着一只沙土色的狗出没在救援大楼门前。潘森就住在离救援大楼约150米的地方，而且养有一只沙土色的狗。侦查人员发现遗留在现场的血迹，表明是有人破窗而入。潘森的胳膊被割破或划伤了，但他声称是由野玫瑰刺伤的。经本人同意，警察进入潘森家搜查，结果发现了一张带有血迹的笔记本纸。保安队的一名志愿者确认，那张纸是他曾经胡写乱画过的，并扔在垃圾箱里或丢在休息室里的一张桌子上。

^① 原文为：ALLEN WAYNE PENSON, 1996（译者注）。

行为问题

在审讯时，不顾辩护人的反对，检察官邀请一名纵火专家从一份题为“对纵火惯犯研究的主要发现”的文件中验证联邦调查局纵火惯犯的犯罪心理画像记录。法庭允许这位专家勾勒出系列纵火犯的犯罪心理画像，但禁止起诉方将画像用于潘森，也禁止专家断定潘森就是系列纵火犯。根据专家的观点，联邦调查局关于纵火惯犯的犯罪心理画像如下所述（佐治亚州诉艾伦·韦恩·潘森一案，1996）：

1. 白人男性，年龄在 18 岁到 27 岁之间。
2. 孤独，不合群。
3. 文化水平低。
4. 同性恋或双性恋。
5. 有过犯罪记录。
6. 健康或精神有问题。
7. 就业记录不良。
8. 酗酒或吸毒。
9. 家庭功能残缺。
10. 常常在离家 3 公里的范围里活动流窜纵火。
11. 纵火是临时起意，常常是为了报复。

在这份证词之前，其他目击者作了如下陈述（佐治亚州诉艾伦·韦恩·潘森一案，1996）：

潘森，现年 26 岁，单身，接受过 10 年教育，失业，没有汽车，去过离他家约 150 米的沃尔克县救援大楼火灾现场。陪审团也观察到潘森是名白人男性。

法庭允许检察官展示发生在同一地区的一间空房子里未侦破的火灾场景证据。这间房子是在潘森被指控在附近犯罪而又被保释之后被烧毁的。虽然此前并没指控潘森犯罪的记载，然而，审判意味着他是嫌疑犯之一。

辩护律师对判决上诉，认为法庭采纳联邦调查局系列纵火犯犯罪心理画像以及那起未指控的火灾作为证据，是可驳回的错误。原因如下所述（佐治亚州诉艾伦·韦恩·潘森一案，1996）：

1. 心理画像不能驳倒被告不在场的证据。
2. 既然州控诉方仔细广泛地调查过被告人的个人历史和人格特征，并明

显有意地把这些信息和画像联系了起来，那么法庭命令州控诉方不要将画像用于被告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3. 除了联邦调查局的犯罪心理画像以外，证明潘森制造了沃尔克县救援大楼火灾的证据并不充分。

4. 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潘森实施了空房子里的那起火灾。

法庭裁决

佐治亚州上诉法院判定，由于案件缺乏足够的证据以及起诉方用于确认潘森特征的时间太少，通过专家证词采纳联邦调查局的系列纵火犯犯罪心理画像本身就是一个站不住脚的错误。根据佐治亚州诉艾伦·韦恩·潘森一案的记载（1996）：

我们不能接受州控诉方认为的：即使系列纵火犯的犯罪心理画像证据不足，也是“强有力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证据。在重新审阅案件副本并通盘考虑州控诉方的证据之后，我们认为证据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而且，我们也不能就此得出画像证据不能用做定案的结论。

佐治亚州上诉法院进一步认为，将未定案的火灾作为本案诉讼的证据也是错误的。理由如下所述（佐治亚州诉艾伦·韦恩·潘森一案，1996）：

由于暗地里就煽动性地把潘森影射成系列纵火犯，州控诉方不顾前述威廉的三点原则，这种做法也简直太过分了。

潘森的有罪判决终于被推翻，并得以释放。

讨论

在此案中，笔者特别热衷于佐治亚州上诉法院的一些发现。通过统计数据对一些普通类型的犯罪人进行犯罪心理画像只能出于侦查的目的而使用。如果用它们来代替真实的定罪证据，那么审判的公正性就荡然无存了。这是非常可能的事。

瑞奇·梅勒妮（Melanie Richey）被谋杀案：^① 管道炸弹案

凯西·约瑟夫（Joseph Kelsey），16岁，和他的两个朋友，因涉嫌1994年6月12日奸杀15岁少女瑞奇·梅勒妮（Melanie Richey）而被判决有罪。

^① 原文为：SOUTH CAROLINA v. JOSEPH KELSEY, 1998（译者注）。

背景

瑞奇·梅勒妮是佐治亚州麦考密克县湖畔中学的学生。在校期间她就认识了加害她的凶手凯西·约瑟夫等。6月底，也就是她失踪了6周之后，一个牧民发现了她的尸体。根据南卡罗来纳州诉凯西·约瑟夫一案（South Carolina v. Joseph Kelsey, 1998）的记载：

1994年7月上旬，16岁的凯西和他17岁的朋友迈克·柯克纳（Mike Kirchner）呆在佐治玛提尼兹（Martinez）。1994年7月11日，星期一，柯克纳离家去上班，凯西、17岁的格弗瑞·佩纳（Geoffrey Payne）和17岁的杰米·里尼·李（Jamie Lynn lee “被告”）3人留在家。3名被告就开始在家里制造管道炸弹。他们开始用铜管和从鞭炮中提取的火药制造爆炸，在柯克纳家后院的树旁引爆。

被告然后决定制造更复杂的管道炸弹。为此，他们从附近的五金商店和沃尔玛特超市偷取管状材料和猎枪管。按照凯西的指导，他们制造了3枚电子引爆的钢管炸弹。其中一枚在柯克纳家后院引爆，在地上炸了一个大约10厘米深、30厘米宽的圆坑。爆炸后的弹片遗留在柯克纳房间里和附近邻家的篱笆墙里。凯西把另外两枚未引爆的炸弹放到柯克纳家里的旅行袋内。

然后，那天晚上，3名被告集中在柯克纳房间里聚会，除了3名被告以外，还有汤姆·伍兹格尔（Tom Wurtzinger）、艾普瑞·瑞兹（April Reese）、特尼·斯佩格（Tommy Spiegel）和吉·尹格赞姆（Jeey Ingram）。所有的人都喝了啤酒。大约在半夜，李和佩纳离开晚会去德士古加油站，这是青年人喜欢去“闲逛”的地方。当李和佩纳到车站后，他们发现了站在电话亭旁的瑞奇·梅勒妮。他们注意到她的脚受伤了。她是在偷偷地从家里跑出来与朋友见面时受伤的，她的脚伤得很严重。李和佩纳主动提出把瑞奇带到柯克纳房间里为她清洗包扎伤口，她同意了。

李、佩纳和瑞奇在大约深夜1时30分回到了柯克纳家。李和佩纳帮瑞奇包扎好了脚，然后3个人都参加了聚会。不一会儿，佩纳和瑞奇去了柯克纳家的后门廊。在那里佩纳一直引诱瑞奇和他发生性关系，遭到了瑞奇的拒绝。在夜里，佩纳向李好几次抱怨瑞奇的拒绝。凯西证明说，他有一次无意间听到佩纳告诉李，他非常迷恋瑞奇，以至于想杀了她。

佩纳让李把一种味道很淡的“迷幻”药片碾碎，为了使药味尝不出来，佩纳把药粉倒进了茶水中。那天晚上，瑞奇一直说肚子疼痛，佩纳把茶水递给瑞奇说是给她治肚子疼。佩纳没告诉她那杯水中含有迷幻药。凯西说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坐在录音机旁的地板上不时地换音乐。

在大约凌晨3时30分的时候，3名被告决定送瑞奇回家。当瑞奇在柯克纳房间等他们的时候，佩纳让李找点能击倒瑞奇的东西。李从柯克纳的车库取回了扳子。然后佩纳让凯西把未引爆的炸弹取来。凯西照办，从旅行袋里取回了炸弹。凯西说当时他并不知道佩纳到底打算用炸弹和扳子干什么。

3名被告和瑞奇上了李的汽车，假装送瑞奇回家。李开车，凯西在前排座位上，佩纳和瑞奇在后座。尽管瑞奇告诉了她家的方向，但李却向相反的方向行驶。瑞奇问他们去哪里，佩纳回答说开车逛一会儿。李最后开出了佐治亚州，开往南卡罗来纳州。李说当时汽车里的音乐声特别大，汽车以每小时145公里的速度行驶。

一进入南卡罗来纳州，李注意到汽车的变速器从4200转变到6000转，李低头发现瑞奇把汽车档位调到中档。李扭头看到佩纳作出了“勒死瑞奇”的动作。李继续开车，几分钟后，“听到两声急促的、空管撞击的声音”。他转过头，看到佩纳还在勒着瑞奇，李进一步证明，佩纳手中拿着扳子，凯西证明他也回头看到瑞奇身体无力、面容苍白、嘴唇发紫。

几分钟后，佩纳向前倾身告诉李把音乐声音关小点。根据李的证明，佩纳说：“伙计们，我敢肯定她不行了。”佩纳然后让李跨过斯蒂温河（Stevens Creek），把车开到“斯卡莱大桥（Scary Bridge）”上，也就是在安格甫德（Edgefiel）与麦考密克两县交界处。李把车开到大桥上，停了下来。

3名被告下了车，把瑞奇留在后座上，佩纳告诉李和凯西他要和瑞奇性交。佩纳脱下了自己的衣服和瑞奇的短裤。几分钟后，李警告佩纳有一辆汽车开过来了。被告们很快回到了李的车上开始行驶。等那辆汽车开过去以后，李掉转车头又回到大桥上。李证明，瑞奇整个过程都没有知觉，但确定“她绝对活着”。而凯西证明他当时检查过瑞奇的脉搏，确信她已经死了。李又一次从大桥上驶出，他开车沿路大约行驶了161公里。突然佩纳让他停车，3名被告把瑞奇拉出汽车，把她拖到森林中，然后上了河堤岸，最后把她放到地

上。李回到汽车上，佩纳和凯西留在瑞奇的尸体旁。

凯西证明当他站在瑞奇尸体旁时，佩纳让他把管道炸弹放到瑞奇嘴里。凯西顺从照办，佩纳然后连接导线，他们两个离开。几秒钟之后，炸弹爆炸了，后来被告们回到了柯克纳家睡觉了。

李事后承认犯有共同谋杀罪，并同意作证指控杰弗里·佩纳和凯西·乔治。他被判处10年徒刑，2000年2月他因表现良好而提前4年释放。佩纳和凯西被判处终身监禁，到2015年9月才能被假释。

爆炸物的用处

在本案中，证据显示管道炸弹是在被害人死后使用的。尽管本案中犯罪人制造几个管道炸弹是为了引爆而已，也可以说是为了刺激的目的，而且在以上行为描述过程中，也没有证据显示制造炸弹的目的是袭击别人。

上面提到，有证据显示当被告把管道炸弹放到被害人嘴里的时候，被害人还活着。管道炸弹和扳子都是可用来击倒被害人的材料，被害人是偶然间遭遇并不是事先谋划好的。

有争议的是，像以上描述的那样，诱拐和攻击的动机是性，然而犯罪人强奸并没有得逞，于是就产生了双重动机：一是报复，二是杀死被害人灭口。依然活着的被害人被带到偏远、隐蔽的第二现场（越州境线），抬到森林里，放到地上，用管道炸弹杀死。之所以选择管道炸弹是因为它能用来杀人（犯罪惯技），也因为凭借这种方式能对被害人和发现尸体的人宣泄某种愤恨之情（标记或情绪性行为）。因此，如果说拐骗和强奸没有充分计划好，然而3名被告却是认真地考虑了对被害人作为直接证人该如何处置灭口，以及如何才能甩开他们与犯罪的联系。

谋杀数人：报复性纵火^①

1997年7月20日，在阿拉巴马州（Alabama）的普瑞彻得（Prichard）一家人包括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黛安·布鲁克斯（Diane Brooks）、杰克斯·布鲁克斯（Jaquess Brooks）、约瑟夫·布鲁克斯（Joseph Brooks）和杰克拉·布鲁克斯（Jakela Brooks）在自己家里被火烧死。

^① 原文为：ALABAMA v. LINDSEY, 2000（译者注）。

背景

德韦尼·杰克逊（Dewayne Jackson）和约瑟夫·亨利的合法妻子黛安·布鲁克斯之间一直有风流韵事。谣传杰克逊和她还有过一个孩子。因此，黛安·布鲁克斯和杰克逊的女朋友拉塔莎·乔丹（LaTasha Jordan）之间就结下了不解之仇，而且两个女人都向市政当局相互告发对方〔阿拉巴马州诉林迪色案（Alabama v. Lindsey），2000〕。

1997年7月12日，即纵火案发生前一周。拉塔莎·乔丹、德韦尼·杰克逊和他们的家人带着枪和棒球棒，去了约瑟夫·亨利家。在那里杰克逊和亨利拳击相斗，亨利占了上风。打架结束后，杰克逊扬言等亨利睡着了就要杀掉他（Alabama v. Lindsey，2000）。

根据阿拉巴马州诉林迪色一案的记载（Alabama v. Lindsey，2000）：

1997年7月20日清晨，约瑟夫·亨利、黛安·布鲁克斯和布鲁克斯的3个孩子，6岁的杰克斯、5岁的约瑟夫和6个月的杰克拉被烧死在普瑞彻得的家里。在大约凌晨3时45分的时候，消防部门接到了失火的电话，接到电话后消防员到达现场时发现房子淹没在火海之中。被害人的验尸报告表明，他们死于烟呛和烧伤。调查人员、联邦烟酒局和消防队一致认为，大火是有人故意从房间前门通过点燃易燃液体烧着的。消防人员在屋子的前院里发现了一个盛着汽油的塑料牛奶罐和引火芯。

雷斯迪克·林迪色（Lacedrick Lindsey）的女朋友桑德拉·戴维斯（Sandra Davis）在听说了纵火和孩子们死亡的消息之后，很快告发了犯罪人（Alabama v. Lindsey，2000）：

桑德拉·戴维斯证明：“大约在1997年7月20日那天清晨3时，雷斯迪克·林迪色、韦伍里·林迪色（Waverly Lindsey）和德韦尼·杰克逊去她家里在她前门厅里交谈了大约半个小时，3个男人全都穿着黑衣服。”她听到雷斯迪克·林迪色告诉其他两个男人说：“一个在后面，一个在前面，一个在侧面（R.379）。”据戴维斯说，3个男人是在3时30分左右离开她家的。从她家去约瑟夫·亨利和黛安·布鲁克斯的住宅需要走5分钟，戴维斯说，在大约45分钟以后，雷斯迪克·林迪色、韦伍里·林迪色和德韦尼·杰克逊回到她家。戴维斯让他们进来，他们坐在长沙发上交谈。她听到雷斯迪克·林迪色提到

当时他在后，韦伍里在侧，杰克逊在前，还听林迪色提到了有关孩子们的事，但是当时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然后在听那天的新闻时，戴维斯知道了约瑟夫·亨利和黛安·布鲁克斯的房子失火、他们和孩子们被烧死的事。戴维斯给警察局打电话告诉他们雷斯迪克·林迪色可能与此案有关。

根据无懈可击的物证，林迪色在狱中主动供述了罪行，他承认故意纵火烧死了被害人。他因故意谋杀5人被宣判有罪。

火的用处

在本案中，有证据证明火的使用可作为德韦尼·杰克逊对约瑟夫·亨利和他家人宣泄愤怒的工具（标记或情绪性行为）。就林迪色而言，虽然他也有图财的动机，但这还不至于驱动他实施纵火行为。犯罪人不仅要烧死布鲁克斯，而且要他的家人承受和他一样的痛苦。这就充分证明了犯罪人故意杀死了包括孩子们在内的家中的每个人。只是他的自我掩护的意识太差，因为事后发现，他从拉塔莎·乔丹家里拿来的装着汽油和灯芯的塑料牛奶瓶以前就在被害人房间的前院里。这次犯罪是报复性的、反应性的、欠周密计划的。

强奸－谋杀：灭迹性纵火^①

约利欧·欧日兹（Julio Ortiz）被宣判犯有一级谋杀罪，而且试图对一名女性被害人实施性虐待。人们发现她曾被殴打，而且裸体放在公园的一块僻静地带，她的裙子盖在头上，短裤脱到脚踝上。见佛罗里达州诉欧日兹案的记载（Florida v. Ortiz, 2000）。

背景

当警察拘留欧日兹时，他承认说（Florida v. Ortiz, 2000）：

……他在现场遇到了被害人，他们两人都吸了可卡因。他称，被害人后来“发疯”！脱掉她的衣服试图攻击他。然后，他就扼住她的喉咙，扼了大约有两分钟，把她推倒在地上，他说不知什么东西砸到了她的头部。后来，欧日兹过去摇被害人的头部看看她是否有反应。见她没反应时，欧日兹走到附近的壳牌加油站买了一些汽油。回到现场后把汽油倒在被害人身上，点火烧了她。

^① 原文为：FLORIDA v. ORTIZ, 2002（译者注）。

然而，现场找不到毒品证据，说明欧日兹没有说真话，他并没有和被害人一起抽可卡因。

根据佛罗里达州诉欧日兹一案的记载（Florida v. Ortiz, 2000）：

1993年3月24日，人们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区（Miami Beach）的偏僻森林公园内发现了死者的尸体，几乎完全裸体，被烧死了。迈阿密海滩区的警察请来了法医查尔斯·万特利（Charles wetli）博士。万特利博士看到被害人胸口有残留的布头，一条小腿有白布，给他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起强奸杀人案，被害人被纵火烧死。要不是这样，他认为那就是被害人死于吸毒过量，而后被推到火里。万特利博士发现，被害人的舌部有挫伤，他认为这是由于她的颞部受击打所致。被害人的头顶也有创伤，万特利博士证明这不是由被害人摔倒所引起的。

万特利博士随后确定被害人不是被烧死或吸入烟尘窒息而死。她死亡的原因是扼死。他作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尸检时颈部的重要创伤和粉碎的甲状软骨。毒物学化验报告显示被害人没有吸毒和饮酒。

根据侦查人员的描述（Florida v. Ortiz, 2000），被害人侧身躺在地上，一只手放在身下，另外还有一块布显然是被拉到被害人头上的；另外一些布被拉到一条腿下面。

根据尸检人员报告，被害人是在死后身体被放入火中的。火是在被害人的前部点燃，她的臀部没有真正被点着。如果当时臀部穿着衣服的话，警察发现尸体时衣服应仍在那里（Florida v. Ortiz, 2000）。另外，强奸时没有造成明显的身体伤害，如肛门和阴道的撕裂等。

火的用处

在本案中，有证据显示犯罪人纵火是一种消灭罪迹的行为，意在销毁强奸和性攻击留下的物证。必须注意的是，在本案中并没有直接的强奸证据或

性攻击的物证。^① 然而，由于缺乏其他可靠的谋杀动机（如图财、报复等），拉到被害人膝下的短裤，蒙着被害人脸部的衬衫，被害人脸部的伤痕，还有故意烧毁尸体或销毁物证的纵火行为本身，都是发生过性攻击的强有力的间接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谋杀很可能是为了灭口（曾目睹犯罪人对她实施性攻击或试图进行性攻击），纵火很可能是为了销毁物证（如毛发、纤维、精液之类）。因此，纵火是一种灭迹行为。

参考文献

1. Alabama v. Lindsey (2000) CR -98 -0553, Feb. 4, 2000 (782 So.2d 327).
2. Burgess, A. , Burgess, A. , Douglas, J. , and Ressler, R. (1997) 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San Francisco: Jossey - Bass.
3. Corry, R. and Vottero, B. (1997) " A New Approach to Fire and Arson Investigation", Fire Investigation Guideline, Massachusetts State Fire Marshall.
4. DeHaan, J. (1997) Kirk's Fire Investigation, 4th ed. ,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 Hal.
5. Florida v. Ortiz (2000) No. 3D99 -2761, Aug. 23, 2000.
6. Geller, J. (1992) " Arson in Review: From Profit to Pathology ",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15 (3, September), 623 ~ 645.

① 尽管事实上在被害人身上没有发现性攻击的科学证据，但是，万特利博士仍能证明这一点（Florida v. Ortiz, 2000）：

“……他的纵火可以使人确信，他已经对被害人实施了强奸行为。根据万特利博士和一名合作者的研究发现，像本案中死去的女性被害人，在偏僻的地方被发现，衣服被脱到腿下部，阴部暴露，很可能是被勒死或性攻击的被害人。万特利博士通过观察各种被强奸杀害的女性，证实了他的假设，并认为，这起案件是其中的典型。”该研究成果发表在1983年的法医科学杂志上。

很明显这只是万特利的归纳和假设。然而与描述的一样，本案的间接证据和案发前后的现场情况，与假设相符。因此，笔者同意该观点，就像佛罗里达州地方上诉法院的判定一样。

尽管笔者同意本案中支持性攻击结论的事实和间接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但事实和间接证据在不同的个案中应有不同的衡量方法。也就是说，笔者不同意笼统的概括，如果在偏僻的地方发现一名死去的妇女，衣服被剥到小腿部，阴部暴露，那么她并不一定是遭受性攻击而被勒死的被害人。因为这也有可能是伪造现场（参见第14章）。

7. Georgia v. Penson (1996) No. A96A1248, July 11, 1996 (222 Ga. App. 253).
8. Groth, A. N. (1979) Men Who Rape: The Psychology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Press.
9. NFPA (1998) "NFPA 921: Guide for Fire and Explosion Investigations, 1998 Edition", Technical Committee on Fire Investigations, Quincy: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10. O'Hara, C. (1970) Fundamentals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11. South Carolina v. Kelsey (1998) No. 24801, July 20, 1998 (502 S. E. 2d 63).

第 20 章 心理变态行为

Brent E. Turvey, M. S.

我没有兄弟，也不是别人的兄弟；
“爱”这个词，老人们称为神圣的词，
驻留在所有人的心里，但惟独不在我心中，
我只有我自己。

莎士比亚：《亨利国王》（VI，第 5 幕，第 63 场）

他不像绝大多数人那样害怕痛苦。他不能自制。冲动驱使这个家伙实际上什么都能干得出。

哈灵顿（Harrington, 1972, p. 171）

如果犯罪心理画像者不关心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诊断和治疗，就没有资格进行犯罪心理描述。为什么他们必须关注心理变态（psychopathy）或虐待狂（sadism）的诊断呢？答案是这两种特殊的犯罪人分类是由行为决定的。也就是说，心理变态者或虐待狂的诊断依靠行为证据。犯罪心理画像者在某些情况下将重点讨论行为方式和犯罪现场特征，这些可能碰巧是一个特殊的临床诊断的一部分。打个比喻，尽管犯罪心理画像者可能不被允许烘烤法庭心理学家的“蛋糕”，他们可能用法庭心理学家能使用（至少没有忽略）的一小部分成分在厨房里显示一下。

本章的目的不是讨论心理变态者（是发疯还是坏人）的基本原因。对于犯罪心理画像者，证实心理变态者存在并实施了需要侦查的暴力犯罪这就足

够了。至于原因问题，那主要是为了研究犯罪目的而与执法无关。^①

心理变态

200多年以前，一位法国名叫菲利普·派诺（Philippe Pinel）的内科医生开始使用法语中的短语“*manie sans delire*”（意为“并非错乱的疯狂”）用于描述那种并不符合通常智力障碍特点且又不正常的人。派诺（Pinel）认为，这一术语译成英文的意思是“并不混乱的疯狂”。罗伯特·黑尔（Robert Hare）博士对此解释为“没有精神错乱的心理异常”，认为这类病人具有冷酷、缺乏克制力的特征（Hare, 1993, p.25）。这是第一次试图对我们今天经常所指的心理变态者所作的描述。这种人会乐于做那些被认为是最可怕而令人憎恶的行为，而且能意识到这些行为会给别人造成不好的后果，但是并不感到懊悔、自责，而且不愿意停止。

派诺（Pinel）认为这些人并不属于不道德（某些人的信念与公认的道德信念完全相反），而是不能辨明是非的人（他们不关心传统的关于正确或错误的解释，在做决定时并不对这些观点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也有些人认为这些病人是十分不道德的，因此也是十分罪恶的。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

1835年，英国精神病学家普利特查德（J. C. Pritchard）提出了一个术语“悖德狂”（*moral insanity*），主要用于描述这样一种异常，即以变态方式或“错乱”来表现自己特定的道德规则。而在1888年，托赤（Toch）开始用术语“劣等的精神变态”（*psychopathic inferiority*）来代替普利特查德的术语。不过托赤的术语暗含着这种紊乱是由生物学上一种禀赋所造成的，而不是由整个环境的影响造成的含义（Toch, 1979）。

在1952年的司法精神病术语修订中，克拉克利（Cleckley）所注释

^① 这是作者最新的一个观点：大部分犯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外界环境的一个产物，不是生来而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犯罪人必须来自不健康的家庭，即便富有的家境也可能制造一个精神变态者和/或一个残暴的犯罪人。这是许多学者所不愿接受的事实，这也就引起不断地探索遗传因素的影响，从来未能十分明确地解释它们仅仅说明有关而已。

(1976, pp. 10 ~ 11) 的术语“心理变态人格”(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被正式的“反社会变态人格”(sociopathic personality) 所代替, 至此, 反社会人格在文献中找到了自己的出处。

至1968年, 反社会变态人格又被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反社会类型(antisocial type) 所代替。看来, 早期关于心理变态的诊断、行为表现及背后隐藏的意义、导致整体错乱的原因都非常混乱。在主流的传统精神病学和心理健康意义上, 遇到这些相关术语的每个人都用他们的主观尺度, 并以他们自己惟一的方式去理解这些术语。甚至今天, 具备资格的临床医生和大众同样把心理变态和反社会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简称ASPD) 相混淆。例如, 黑尔(Hare, 1996) 解释道:

在心理变态和反社会人格障碍之间的区分对于心理健康和刑事司法活动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不幸的是, 这种差别不仅在许多临床医生那里, 而且在最近设计的标准手册-4 的编辑者的心目中变得模糊了……

许多心理变态者(除了那些不知何故没有进入刑事司法范围或不知何故延迟了与刑事司法活动联系的人) 都适合反社会人格障碍标准, 但是, 大多具有反社会人格特征的人却不属于心理变态者。而且, 反社会人格障碍在犯罪群体中非常普遍, 这种人格障碍在人格、态度和动机等方面的异常都极适合于从事犯罪行为。

在此, 为了防止任何混淆, 在此特对心理变态、心理变态者、反社会者定义如下:

1. 心理变态(psychopathy): 是一种人格障碍, 可根据其具有明显的系列行为特征和可推断的人格倾向性进行判断。这一定义来源于黑尔(Hare) 修订的心理变态检测表(简称PCL-R, Hare, 1991)。

2. 心理变态者(psychopath): 是一个社会破坏者(被视为心理变态者), 他们通常沉溺于自己的生存方式或者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他们对别人完全缺乏良心和同情, 他们想当然和随心所欲地做事, 不带有丝毫的内疚和懊悔(Hare, 1993)。当这类症状只能归因于心理上的、生物的和遗传的因素时, 同时还具有相关的社会压力以及早年的生活经历时, 这个术语就被应用。

3. 反社会者(sociopath): 这个术语用于描述一个与心理变态者具有相同的行为表现和可推断的人格倾向性。明显不同的是, 反社会变态者患有的综

合症完全是由社会压力和早年的经历所造成的（Hare, 1993）。

心理变态者的特征

黑尔（Hare）所指出的“具有明显的系列行为特征和可推断的人格倾向性”[可参见黑尔的心理变态检核表（修订版）（Hare, Psychopathy Checklist - Revised），1991]，内容如下：

1. 缺乏移情的冷酷无情。
2. 欺骗/控制。
3. 犯罪的多面性。
4. 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责任。
5. 油腔滑调/肤浅的控制。
6. 夸张的自负感。
7. 冲动性。
8. 缺乏懊悔和内疚。
9. 可怜的行为控制能力。
10. 早年的行为不轨。
11. 不负责任。
12. 少年犯罪。
13. 缺乏现实的长期目标。
14. 许多短期的婚姻关系。
15. 需要刺激倾向。
16. 厌烦。
17. 病态说谎。
18. 寄生的生活方式。
19. 乱交。
20. 取消附条件自由制（屡教不改）。
21. 浅薄的情感。

黑尔（Hare, 1991）关于这些标准给出了以下说明：

心理变态检核表（修订版）中列出的20项行为标准和推断出的特性被认为是心理变态临床的基本组成部分。大部分特性被作为公开的概念对待。也

就是说，评估人被提供一个特性的描述和一些行为的样本，而且被要求对这个人具有这种特性的程度作出判断……

尽管临床的判断和推论是必需的，但记分的标准也是相当确切的，只需要经过一些培训，这些记分项目并不很难。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些特性以各种程度存在着，也就是个体的心理变态者在不同程度上把这些特性显示出来。所有的心理变态者的变态程度是不等同的，所有的心理变态者的行为的程度也是不相同的。心理变态的行为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发展变化。

就像前面所述，犯罪心理画像者对犯罪人涉及的一个犯罪案件中所做的事情感兴趣，而对犯罪人关于自己的罪行陈述并不感兴趣。关于犯罪人的人格特征的信息直接来源于经过物证确定的犯罪行为，而不是来自案件发生后的若干天（月、年）对犯罪人的猜想。

关于这些特征怎样由犯罪心理画像者经物证推断并再现犯罪行为，下面是一些典型的解释，但他们不是惟一的可能。另外，这些只能从其他犯罪行为范围中推断，而且应当有充分的记录。

缺乏移情

缺乏移情（empathy）就是不能理解别人的境遇、感情或动机。这种特征可以被推断，例如，犯罪人表现出对被害者在犯罪过程中所遭受到的痛苦完全缺乏兴趣。

欺骗/控制

欺骗与控制（conning/manipulative）意味着犯罪人为了个人的利益故意进行的欺骗行为。这种特征可以从犯罪人使用骗局或“欺骗”的方法（参见第11章）达到接近被害者的过程中推断出来。

犯罪的多面性

犯罪多面性（criminal versatility）是指当一个犯罪人表现出惯技行为时，也就意味着他已具有了相当完整的犯罪能力，而不是典型的为达到某一犯罪目的才有的犯罪能力。例如，一个强奸犯还可以表现出盗窃的技能，像戴上手套、毁坏报警器、偷窃易于销赃的贵重物品等。当通过物证把一类型的犯罪人同其他犯罪行为联系起来时，这种特征就可能被推断出来。

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责任

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责任（failure to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actions）是指因为自己的境遇责备别人而不责怪自己，或者对他们的行为后果从不感到应负有责任。当在攻击过程中犯罪人责备被害人或官方时，这种特征就可能被推断出来。

油腔滑调和浅薄

油腔滑调和浅薄（glib and superficial）是指不具有一点关心或思想，而故意推脱或隐藏缺乏感情深度的行为。在一些心理变态者中，这些行为显得故作而缺乏实际内容。而在另外一些心理变态者中，它们可以显得相当真挚。这些行为的效果和心理变态者的技能有关，也和一个人能否意识到欺骗或再度获益的行为能力有关。当一个能说会道的犯罪人流露出虚假和浅薄的控制，并将其作为欺骗的一部分时，这种特征就可能被推断出来，他们采用这些方法是为了获得被害者的信任。

虚荣的自负感

虚荣的自负感（grandiose sense of self - worth）可以从一个犯罪人表现出对自己能力的炫耀中推断出来。例如，他们可能用一种不现实的、自以为是的方式说话，而且，似乎表现得对当前或以后有关部门缉拿他们的侦查工作毫不在乎（缺乏谨慎的预防行为）。

冲动

冲动（impulsivity）是指不经过深思熟虑或不考虑后果就发生的行为。当犯罪人用一种反应的方式不断地实施犯罪、没有计划、也不知什么时候应该停止时，这种特征就可能被推断出来。

缺乏懊悔和内疚

懊悔和内疚（remorse or guilt）是指具有对行为感到道德上的痛苦和后悔的特征。当犯罪人面对被害者的痛苦时没有显示出任何情感、懊恼，反而感到高兴时，这种特征就可能被推断出；再者，当犯罪人能够从事极端残忍的犯罪，然后又没有明显痛苦感受地参与正常的非暴力活动时，这种特征也能够被推断出来。

极弱的行为控制力

极弱的行为控制力（poor behavioral controls）是指对于暴力的、破坏的或反应性的行为不能控制，即便后果可能对犯罪人自己有害。当犯罪人很容易生气或灰心，并因此用口头的或身体的攻击来回应时，这种特征就可能被推断出来。

动机

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心理变态犯罪人的动机（motivation），这种动机与非心理变态犯罪人的动机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和别的犯罪人一样都容易受相同的需要和动机的影响（参见第16章）。

心理变态者和其他犯罪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用来满足他们自己需要的方式不同。这也意味着心理变态者所做的可能尤其残暴，缺乏同情心，利用他人的（指欺凌妇幼）脆弱性，而且就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无论什么时候做都缺乏自责。

心理变态者不重视他们自己以外的世界，但求满足自己的快乐，而且认为社会化的处世规则和交流是繁重的负担。

智者曾言，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场善良和邪恶之间的战争，而且邪恶永远不可能赢。然而对于达到自己目的而伤害别人却从不自责的心理变态者来说，他从不被内心世界的冲突所妨碍。有人认为，大多数心理变态者总体上缺乏为别人考虑的能力，因此他们作出的决定时也无从考虑这种信息（Cleckley, 1976, p. 343）。

这种缺乏自责、缺乏消极的感情后果被认为是一个使他们发生残酷、破坏性的行为的促进因素。这也就使得各种心理变态者在心理和感情上易于去做我们认为恐怖、残酷和道德上是错误的事情。他们对于别人的痛苦没有同情心，对于他们所造成的伤害不感到懊悔，而且经常容易冲动。因此，社会化的正常人对于心理变态者来说不过是具有两种情况之一或兼有：即快乐和满意的源泉和/或挡道的阻碍。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心理变态的犯罪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对许多人来说，当他们理解犯罪行为动机后并不感到欣慰。

并非所有的心理变态者都是犯罪人（也不是所有的犯罪人都是心理变态者）。心理变态者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中，并经常得到纵容。根据哈灵顿（Harrington）摘录的威廉姆·克拉那（Winlliam Kraner）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文章的引文（1972，p.23）：

这不是偶然事件……我们的文化方式肯定有些方面对他们（心理变态者）有所鼓励。在美国，我们看重物质利益、威望、权利和个人权势的升迁，以及积累财富以图竞争。

黑尔（Hare，1996）也写过一篇同样严厉的评述：

我们生活在一个“虚伪的社会”，一个有心理变态特征的社会——自私自利、缺乏关心别人、浅薄、形式重于实质、冷酷、控制欲等日益得到容忍甚至赞誉。从本文的主题很容易看出，心理变态者和反社会人格障碍特征的人很容易出现在那些具有反社会或犯罪价值观的群体中。最困难的是，如何识别那些藏匿于忠于社会道德规范的人群中的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特征的人。然而，心理变态者却能毫不费力地渗透到经济、政治、执法部门、政府、学术界领域和其他社会部门中。

案例分析

下面的案例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实在的感受性，涉及各种心理变态，也涉及动机可能性的犯罪案件。再一次提醒读者这些都是行为，不是动机，是犯罪嫌疑人需要的表现。从这种角度了解心理变态行为能够对具体案例中的犯罪人有更深刻的理解。试析以下案例：

一名心理变态者的画像：美国诉阿奎莉亚·巴尔奈特一案（2000）^①

阿奎莉亚·巴尔奈特（Aquila Barnette）因参与谋杀唐纳德·李·艾伦（Donald Lee Allen）和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的案件被联邦法院判决有罪。罪行包括在抢劫汽车中使用枪支导致被害人死亡，犯有导致人死亡的汽车抢劫罪；因违反《州际家庭暴力法案》使用枪支导致死亡，他被判

^① 原文为：UNITED STATES v. BARNETTE, 2000（译者注）。

死刑（United States v. Barnette, 2000）。

背景材料

阿奎莉亚·巴尔奈特（Aquila Barnette）和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小姐在1994年开始约会。在1995年3月，他们搬到维吉尼亚的Roanoke的一间公寓一起居住。在1996年4月，威廉姆斯小姐同巴尔奈特分手。她离开了他们的公寓，回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Charlotte，和他母亲住在一起（United States v. Barnette, 2000）。

巴尔奈特对于分手并不快乐，继续追求威廉姆斯小姐。根据美国诉阿奎莉亚·巴尔奈特一案的记载（United States v. Aquilia Barnette, 2000）：

威廉姆斯小姐继续住在她和巴尔奈特住过的公寓里，有一个名叫杰本明·格瑞兹（Benjamin Greene）的朋友和她住在一起，因为她害怕一个人孤独。1996年4月30日，威廉姆斯小姐叫醒格瑞兹，告诉他“他也在这儿”！“他”是指巴尔奈特。格瑞兹向窗外望去，只见巴尔奈特正用一支棒球棒猛击格瑞兹的车窗。格瑞兹试图打电话报警，但电话线已被切断。巴尔奈特看见威廉姆斯小姐在公寓里，就开始用球棒敲击窗户。随后又用脚把前门踢开一个洞，朝里面扔燃烧弹，公寓着火了。巴尔奈特在格瑞兹朝他开枪后逃离了现场，威廉姆斯小姐和格瑞兹从后窗跳出后逃离了失火的房子。威廉姆斯小姐因手和胳膊分别为二级和三级损伤入院治疗。威廉姆斯小姐向Roanoke警方确认是巴尔奈特，Roanoke警方批准逮捕他，并通知了Charlotte警察局。然而，Charlotte警方并未逮捕巴尔奈特。

1996年5月20日，巴尔奈特在Charlotte用他弟弟马里奥（Mario Vonkeith Barnette）的维吉尼亚出租车司机驾驶证购买了一枝12型猎枪。第二天他又去换了一枝半自动猎枪。他把新枪的把柄和枪管锯短，用胶条把一只手电捆在枪筒上。1996年6月21日，巴尔奈特带着枪，从他母亲的房子走到一个交叉路口。唐纳德·艾伦在午夜刚过之后把他的蓝色本田车停在了十字路口。巴尔奈特拿着枪逼近艾伦的车，命令艾伦下车。艾伦遵命做了，巴尔奈特又要求他扔下钱包。然后，巴尔奈特用枪逼着艾伦走到马路对面的排水沟。到了排水沟后，巴尔奈特朝艾伦的后背开了3枪并把他的尸体扔进排水沟。巴尔奈特拿着艾伦的钱包并开着艾伦的车前往威廉姆斯小姐的母亲家中。威廉姆斯小姐自从燃烧弹事件发生后就和她妈妈一块住了。

巴尔奈特在到达威廉姆斯夫人的房子后，潜入后院切断了家中的电话线。他曾试图通过旁边厨房的门进入屋里，但发现锁着之后，遂朝门开枪，踢开门进入。当巴尔奈特进入屋里时，威廉姆斯夫人正在屋里抱着8个月大的外孙女。

威廉姆斯夫人叫威廉姆斯小姐赶快跑，威廉姆斯小姐从前门跑出去。巴尔奈特进屋后看见威廉姆斯夫人正叫威廉姆斯小姐逃跑，遂追着威廉姆斯小姐从前门出去，一直追过马路对面。当巴尔奈特从旁边跑过时，一位邻居希尔（Hill）小姐正站在家门口，于是打电话报警。巴尔奈特看见她打电话时，从约17米远的距离，用枪指着她，叫她挂断电话，要不然开枪。希尔小姐挂断电话，返回她的公寓，再次给警察打电话。

威廉姆斯小姐在逃跑时摔倒了，他抓住她，拽着她的头发，将她拖向她妈妈的屋里。他告诉威廉姆斯小姐他早计划杀掉她和他自己。当他们返回时，威廉姆斯夫人从屋里出来，威廉姆斯小姐挣脱巴尔奈特朝她妈妈走去。巴尔奈特朝威廉姆斯小姐开了两枪。他开的第一枪距离威廉姆斯小姐3米到4米远，子弹击中威廉姆斯小姐的腰部。第二枪距离约1.5米远，击中她的后背。当巴尔奈特开这两枪时，威廉姆斯夫人距离她的女儿只有可以摸到她那样近。威廉姆斯小姐因为枪伤死了。

巴尔奈特开着艾伦的车离开了谋杀现场，驶向田纳西州的 Knoxville，在那里他为汽车换了新的汽车牌照。然后驶向北卡罗来纳州的 Charlotte，于1996年6月24日将汽车遗弃在那里的一家购物中心的露天停车场。警察在那天晚上发现了汽车，并在附近的垃圾堆里找到了巴尔奈特杀人用的猎枪。

1996年6月25日，巴尔奈特在母亲的家中向当局自首。随后，他把警察带到了艾伦被杀的现场，给他们指认弃尸的地方。他最终承认了谋杀两个人和抢劫汽车的事实（United States v. Barnette, 2000）。

行为判断

在本案的处罚阶段，政府传问了许多证人，包括斯科特·邓肯（Scott Duncan）博士。邓肯博士给出的结论是：基于三种因素，巴尔奈特在狱中将是一个潜在的危险（United States v. Barnette, 2000）：

……根据心理变态检核表，预测其未来的危险度；并将巴尔奈特与具有相似特征的人进行了仔细的分析比较。通过进行这两方面研究之后，邓肯博士认为巴尔奈特在未来仍可能具有暴力性。根据他的看法，巴尔奈特是一个

心理变态者。

邓肯博士就以下情况进行专家作证（United States v. Barnette, 2000）：

问：在你告诉我们你怎样得出这个结论之前，你能向陪审团描述一下什么是心理变态者？

答：可以。总体说来，一个心理变态者与非心理变态个体相比较明显缺乏相同水平的感觉和同情心。他们是典型的冷酷无情、凌驾于他人、工于心计、将攻击其他人的个体。生物学的研究发现，他们对心理正常者普遍感到害怕和恐惧的事情没有相同反应，而这种害怕与恐惧是构成我们所谈的懊悔和自责的两种基础情感。心理变态者是他们所做的行为没有感到自责和懊悔能力的个体。

.....

问：确信一个犯罪人是否是一名心理变态者为什么是重要的？

答：心理变态犯罪人在未来从事犯罪的可能性是没有心理变态犯罪嫌疑人的两倍。心理变态犯罪人在未来从事暴力犯罪的可能性是非心理变态犯罪人的3倍。尽管在监狱人员中仅有20%的人是典型的心理变态者，他们却对审理的50%的暴力犯罪负有责任。而且，认定某人是一个心理变态者可以帮助有关部门依据他们所犯的罪行把他们安置在一个较安全的收容所。

.....

问：那么，心理变态者看起来就和其他人都不同吗？

答：不，先生。心理变态者，大概他们最好的优点，也是心理正常者最害怕的一点就是，他们有看起来正常的能力。我们希望，在社会中我们能够把心理变态者从非心理变态者中挑出，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点……心理变态者，正如我所说的，有看起来非常正常的能力。然而，如果你知道你正在寻找什么时，就如同看见一盘水果，你会对自己说，天哪，盘里的水果看起来真好，看起来太好了！但当你接近这盘水果并挑了一个时，你会突然意识到这是仿造的水果。心理变态者就是这种情况。他们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正常，但当你知道你所寻找的是何时，你就能通过他们的行为而不是他们的外表看事情，而且，必须和认定他们是心理变态者的行为特征表现出同样的事情。

为了反驳邓肯博士关于巴尔奈特是一名心理变态者的证词以及基于心理变态检核表（修订版）进行的检测，辩方律师要求重新召回他们自己聘请的危险评估专家。联邦地方法院拒绝了他们的提案。初审巴尔奈特被判死刑，辩方律师提出了上诉。

美国第四巡回上诉法院裁定这项拒绝是可逆转的错误。初审法院应该让他们把各自的专家带到证人席上来讨论这个争论。按照 Mealey Daubert 的报告（2000）：

法官说：“当巴尔奈特提出：联邦法院作出了一个最初不合适的决定是因为他们断定修订版的心理变态检核表是可靠的科学证据，他不争辩它的相关可靠性。”“当决定是否承认依据修订版的心理变态检核表所作的证词时，法院考虑了巴尔奈特反对测试的理由：这一检核表并不是基于黑人标准（巴尔奈特是黑人）或基于中年人的标准。”

“巴尔奈特提供了由他自己的专家坎宁安（Cunningham）博士写的两篇文章来支持他的观点，但没有其他的证据。在此案裁决记录中表明，对此证据的认可并不是审判的明显错误。考虑到联邦法院的判断，我们的观点是审判的争论是充分的，而且，本案裁决并不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对证据的认可是滥用的判断。”

美国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因此撤销死刑判决，押回巴尔奈特作相近量刑的审讯。

讨论

当获得一个有资格的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提供的诊断证明时，作者并不同意在处罚阶段（尽管被告已经被发现有罪，而且罪行是无可争议的）提供这样的证词。^① 作者赞同应当基于可观察的事实，例如，根据心理变态检核表（修订版）提供的参考观察其事实行为，这样的证词才可能对决定犯罪人需要被关进监狱多长时间有利。更多的类似证词才能使法庭避免不得不依靠公民拘禁令的问题。这将在下面的案例中讨论。

如果有充分的反驳证词，作者绝对支持这个观点。初审法院的失误是不

^① 一个犯罪心理画像家应该仅仅根据他们在犯罪中所看到的个体特征作出相应的证明，而不是提供一个临床诊断证明。

允许辩方专家到证人席进行变态心理检测优缺点的辩论。不让辩方专家证人站在证人席上就不是一个好的判决。

克劳福德·威尔逊——心理变态的强奸犯（2000）^①

克劳福德·威尔逊（Crawford Wilson）可以如此形容他，即只需要他一个人就能形成犯罪的波浪。他的少年犯罪记录就包括偷车、小偷小摸和打架。他的成年犯罪记录包括重罪和因盗窃汽车入狱、重大盗窃、两次未经许可使用武器、两次入室盗窃、持械抢劫和持有盗窃工具（Minnesota v. Wilson, 2000）。

作为一个性犯罪人，威尔逊众所周知的职业始于1962年，试图强奸。在2000年明尼苏达州诉威尔逊一案中（Minnesota v. Crawford Wilson, 2000）有详细描述：

他的部分历史包括：当他17岁或18岁时即对8岁的异父妹妹进行性骚扰。在1981年搬到明尼苏达州以前，威尔逊住在伊利诺伊州。威尔逊已经承认了在伊利诺伊州他犯了5次或6次强奸罪。在1981年10月2日威尔逊从伊利诺伊州监狱被保释出来。当仍在缓刑期时间，他又于1982年2月在明尼苏达州开始强奸妇女。在1982年的半年间他强奸了11名妇女，其结果导致了威尔逊的一次监禁。他侵犯不同年龄他不认识的女性。在每次事件中，他都带着一把小刀征服和胁迫他的被害人，这些被害人要么在她自己的公寓或在公寓楼被搭话。总体说来，当威尔逊犯这些罪行时，都是喝醉的状态。在强奸这些被害人之前，他先把她们的眼睛蒙上、嘴塞上和绑起来。一些攻击方式包括多种形式的性奸入。在一些案子中，当被害者被捆起来时，他用小刀割断她的衣服，而且曾用身体攻击他的两个被害者。他通常在强奸后会留在被害者的公寓里一段时间，搜查被害者的所有财物，而后偷走现金和私人物品。

在1982年第一阶段审理中威尔逊对于5起性犯罪案服罪，被判25年监禁。在监禁期间，威尔逊又收到了4份关于他的性行为的惩罚报告。惩罚报告记录了威尔逊的不法性行为：1983年12月，他把他的阴茎暴露给一位女性来访者；在1986年10月他被发现与监狱的同室者有鸡奸行为；在1991年8

^① 原文为：MINNESOTA v. WILSON, 2000（译者注）。

月，威尔逊试图拥抱和亲吻一位女教官，告诉她，他一直幻想和她发生性关系。最后，1997年6月，威尔逊被看见裸体站在窗户前，让一位女教官看见他手淫。

按照记录，威尔逊在监禁期间和以前一样继续从事不法行为，包括口头辱骂、不服从直接的管教、行为混乱、拥有走私物品、随身携带毒品和酒精、使用麻醉剂、未经批准拥有财产、合谋走私（Minnesota v. Wilson, 2000）。

1999年8月，克劳福德·威尔逊作为一名有性心理变态人格（sexual psychopathic personality，简称为SPP）和性欲危险人物（sexually dangerous person，简称为SDP）被视为明尼苏达州的性犯罪嫌疑人计划的头号要犯。^①

行为判断

克劳福德·威尔逊对于将他确定为性心理变态人格（SPP）和一个性欲危险人物（SDP）的决定提出上诉。然而，由法院指定的检察官罗杰·C. 斯威特（Roger C. Sweet）博士评价（Minnesota v. Wilson, 2000）：

……威尔逊是一名性欲危险人物，符合 Minn. Stat, § 253B. 02, subd. 18c 的所有三个要素，基于以下几点：（1）威尔逊是一个有着充满了暴力的性犯罪和非性犯罪行为历史的职业犯罪人；（2）他的心理变态检核表（修订版）（PCL-R）检测的心理变态程度已达到了心理变态指标的临界点；（3）对他进行的 MMPI-2 和 MCMI-III 检测也表明他有暴力行为的倾向；（4）他用化学原理和心情变化对他的冲动、鲁莽的行为解释有所贡献；（5）他既没有成功地完成化学依赖，也没有完成性犯罪人处置计划；（6）心理变态和一个性变态者的性激发方式的综合使其具有更高的性犯罪率。

^① 明尼苏达州在1939年颁布了一部针对“变态人格”（psychopathic personality，简称为PP）的法律，即民事拘禁令用以提供给公共事业部处置那些可能具有性犯罪危险性的人进行民事拘禁。县检察官和总检察长用此法律可把最危险的性犯罪人安置到在 St. Peter 的明尼苏达安定医院（Minnesota, 1994）。

被确定为性心理变态人格的人在明尼苏达州被监禁需要有以下证据：一个人在性方面从事一系列的习惯性的不法行为，而且在性冲动方面极端缺乏控制能力，因此对于其他人来说是危险的。作为一个性欲危险人物在明尼苏达州被监禁则需要有以下证据：一个人从事一系列的有害的性行为，表现出强烈的性欲，有相关人格问题或其他的精神障碍，因此很可能作出有害的性行为（Minnesota v. Wilson, 2000）。

斯威特博士解释说，威尔逊在使用黑尔（Hare）的心理变态检核表（修订版）（PCL-R）检测时得到的 27 分明显高于许多研究者把一个人认定为心理变态者的临界点分值 25 分。他提出以下观点（Minnesota v. Wilson, 2000）：

……（威尔逊）表现出一种更适度的性变态者的方式，更具有一个“过分自信”和/或“恼怒报复”的强奸犯特征，强奸是他的男子特征的一种表现，强奸是他敌意和愤怒的一种表现。

明尼苏达州的上诉法院同意威尔逊实际上是一个有性心理变态人格（SPP）和个性方面有危险的人（SDP）。在他们的判决中写道，“对于有性危险的人允许实施针对性危险人物的民事拘禁计划，因为他以前曾从事过性伤害行为，而且他们目前仍存在着障碍或机能障碍使其不能充分地控制自身的性冲动，这就使他们有很大的可能即在未来从事有害的性行为”（Minnesota v. Wilson, 2000）。

讨论

这是一个关于犯罪人是否对社会继续产生危害的案例。不管他脑部是否有缺陷，他的行为都很清楚地表明，不管监禁或是被保释，他都将从事性犯罪。作者的观点是，应当根据克劳福德·威尔逊制作海报并张贴以告诫那些接近民事拘禁处理者（pro-civil commitment）。^①

利昂·詹姆士·普雷斯頓——青少年性犯罪人（2001）^②

与克劳福德·威尔逊案子的判决不同，明尼苏达州的上诉法院最近支持

① 在明尼苏达州，针对性犯罪嫌疑人的民事拘禁法是这样操作的：当一个性犯罪人犯了罪，就会被逮捕、起诉、判刑，一般被判 7 年~10 年。在他们服完刑期后须按州的规定被释放，之后的程序是他们必须进入一个医院进行心理治疗。像明尼苏达州诉 Crawford Wilson 一案（2000）先开一个听证会，以决定这名性犯罪人是否还可能继续有威胁。如果法院判决他们是这样的，将执行民事拘禁令，即将其送入州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但也有人认为民事拘禁令有不同看法，认为这种法律将一次行为视为双重危害（因此对同样的犯罪判刑两次），这是违反宪法的，市民不应该因他们可能犯罪而被惩罚。

作者坚信美国的宪法，反对民事拘禁的想法。尽管法官是法律的主体和法庭的审判者，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他们都是法院的仆人。如果犯罪人和他们的犯罪确实严重（他们中的一些确实是这样），那么这个州就应该在法律的范围内判他们的刑，法官也因此有义务判以严厉的刑罚并执行这些刑罚。

② 原文为：MINNESOTA v. PRESTON, 2001（译者注）。

对一名25岁的利昂·詹姆士·普雷斯顿（Leon James Preston）的民事拘禁令。最大的不同在于普雷斯顿是一位青少年性犯罪人，由于在他14岁到17岁之间对8名女少年进行性攻击而被判罪。按照以下次序，受害者包括（Minnesota v. Preston, 2001）：

1. 普雷斯顿的8岁堂妹。他在她家里对她进行性侵害。
2. 和他同乘一辆校车的9岁女孩。他对她大约进行过30次到45次的性侵害。
3. 在公园里一个4岁的小女孩。在同一天他对她进行过两次侵害。^①
4. 在公园里一个8岁的女孩。他至少在15个不同的场合对她进行性侵害。
5. 普雷斯顿5岁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在他的一个晚会上对她进行性侵害。
6. 普雷斯顿临时担任保姆照顾的一个9岁的邻居女孩。他在公园里、校车上，以及她的家里对她进行性侵害。
7. 家庭朋友的12岁的女儿。他在她的卧室调戏她。

普雷斯顿最后一次性侵害发生在他在 Hoffman 中心当住院病人接受治疗时。因同14岁的男病人有两次性接触被赶走；他劝说年轻的男病人对他进行口交（Minnesota v. Preston, 2001）。

行为判断

法院指定的心理学家认为，普雷斯顿是冲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和反社会的，他所做的都证明他是一位心理变态者。他们还认为，他至今也不认为

^① 这个案子是典型的普雷斯顿对幼儿的性侵害。按照明尼苏达州诉普雷斯顿案的记录（Minnesota v. Preston, 2001）：

“他第一次以让步的方式玷污女孩，然后慢慢接近她，给她提供糖，她拒绝了。按照普雷斯顿所说的，在他把块状糖放在她身边时，她开始信任他并捡起糖块。为了让她更轻松，他开始和她攀谈。这时，他开始抚弄她，开始是在她的游泳衣上面，然后他的胳膊围绕着她使她不能逃脱，一直继续给她糖块。女孩在被攻击时挣扎并企图逃跑，但普雷斯顿把她放在他的膝盖上。然后他把手伸进她的游泳衣里面并抚弄她的阴道。他发现这样太困难，于是把她抬起来，脱掉她的游泳衣并抚弄她的乳房和阴部。然后他又把游泳衣给她穿上继续抚弄。在后一次，普雷斯顿回到那个公园，又给这个女孩一些糖块，从衣服外面和在里面玩弄她。”

自己有问题，同时不相信治疗是必需和有益的。普雷斯顿竟然告诉他们：他自认为能够设计一种方法来对付他自己的性成瘾问题。心理学家感到这个计划是含糊的、不适当的、不足的、不现实的和“惊人的肤浅”（Minnesota v. Preston, 2001）。

普雷斯顿因此被视为性危险人物和性心理变态人格，并被送进明尼苏达州在 St. Peter 和 Moose Lake 地区的性犯罪治疗中心进行有计划的治疗。

他对这一判决提出上诉，理由是他能够控制他的冲动（他能够有计划地侵害、挑选被害者和等待适宜时间去犯罪），因此符合“极端缺乏控制性冲动的能力”的要求（Minnesota v. Preston, 2001）。

这个论点实在滑稽，明尼苏达州的上诉法院拒绝了普雷斯顿的申诉，同时还提出了同样有趣的回答。按照利昂·詹姆士·普雷斯顿一案的诉讼记录（Minnesota v. Leon James Preston, 2001）：

尽管挑选被害者和计划行为能够显示其控制性冲动的能力，这也否定了性心理变态人格条例规定的责任要求：犯罪人有极端缺乏控制性冲动的能力，因为挑选被害者的冲动是不可控制的，性冲动当然也是不可控制的。

讨论

本案论点是以合法的立场为框架，根据法律条例要求首先确定犯罪人是一名个性危险人物和一个性心理变态人格，而且极端缺乏控制自身性冲动的能力。这些都值得肯定。然而，作者的观点是，明尼苏达州的上诉法院在这个案子的理由似是而非。也就是说，犯罪计划并不是冲动的证据。此案的犯罪人在各种背景下物色被害人，而且在一段时期内的许多场合下侵害好几个被害人。在其犯罪中是有犯罪想法和故意心态的。

考虑到许多性犯罪人都有复杂的选择和计划行为，作者很难理解，如此一个不标准的规定怎么会制定成文并还在继续使用。

参考文献

1.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4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 Cleckley, H. (1976) Mask of Sanity, 5th ed., St. Louis: Mosby.
3. Hare, R. (1991) "Psychopathy and the DSM - IV Criteria for Antisocial

- Personality Disorder",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0 (3), p.391 ~398.
4. Hare, R. (1993) Without Conscience, New York: Pocket Books.
 5. Hare, R. (1996) "Psychopathy and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A Case of Diagnostic Confusion", Psychiatric Times, February.
 6. Harrington, A. (1972) Psychopath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7. Mealey's Daubert Reports (2000) "4th Circuit Finds No Error in Admission of Psychopathy Opinion", Mealey's Daubert Rep. 4, May 2000, Mealey Publications.
 8. Minnesota (1994) " 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Commitment Law" , State of Minnesota, Office of the Legislative Auditor, Executive Summary, February 25, 1994.
 9. Minnesota v. Preston (2001) No. C5 -00 - 1715, June 12, 2001 (629 N. W. 2d 104).
 10. Toch, H. (Ed.) (1979) Psychology of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Chapter 14.
 11. United States v. Barnette (2000) Nos. 98 -5, 98 - 11, May 2, 2000 [C. A.4 (N. C.) 2000].

第 21 章 施虐狂行为

Det. John J. Baeza (ret.) and Brent E. Turvey, M. S.

慎闻其言，审其行。

马库斯·奥里留斯·安东尼努斯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沉思录

在大众的心目中，包括在大众媒体中，人们都普遍地用“虐待狂” (sadistic) 来描述那些暴力犯罪行为。在多数情况下，它也被用来描述那些不具有特定动机和因果关系而发生的残忍行为。除了这一含糊界定之外，专家在这方面还未取得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在侦查领域，它可以用来描述系列强暴案件的动机。在犯罪学领域，它用来界定某些具有共性的犯罪类型。在临床医学领域，它可能用于描述病人的幻想症状等。^① 在某些案例中根据援引的目的不同，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往往能够准确地表达它的意义。然而，在其他案件中，对“虐待狂”这一概念的引用可能是不确切的，很容易导致对被描述事物的争论和造成错误导向，并且也不符合学术要求。这一专业概念被广泛使用，几乎等同于冷酷纵乐的虐待行为，以至于其被赋予了更多的道德色彩而非科学的客观事实。

^① 用于治疗的标准方式（这种治疗模式包括那种对确定事实虚幻反应的治疗）其严格程度并不必然弱于用在侦查或司法中判断的标准。有时治疗关注的是病人坚定不移的意志本身，病人因此而犯罪。侦查工作和法庭分析则要求必须根据事实推断出意见。同样，这种要求也就限制了审视诉讼程序中关于犯罪嫌疑人行为的分析和解释，尤其是在对犯罪行为进行判断发生争议时。

背景

“虐待狂”（sadism）这一概念源于著名的法国作家萨德·多纳蒂恩·阿方斯·弗朗科斯·德（Donatien – Alphonse – Francois de Sade）的作品，他生于1740年，1814年逝世。更多的人知道他叫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他的作品以描写性暴力而被视为性变态文学，他在作品中巧妙地描述了因身体上的痛苦而激发出的性觉醒令人印象深刻和难忘。例如，他在《贾斯廷》（Justin, 1990）一书中描述了一个和尚如何从他的被害者的痛苦与耻辱中获取性满足的性虐待行为：

他压着我的身体，压迫、戳弄并撕扯我，但这一切还不够。情急中，那恶魔扑向祭坛，在那里他无法再行祈祷，只是敲打、揉捏并撕咬它。作恶后，他又重新向我挑衅。我受害的肉体屈服了，闸门被冲垮，那淫棍猛然闯入。我从喉咙里发出尖叫……我这辈子从未受过这种罪。

那欲火中烧的畜生全力向我出击，夹杂着爱抚和不时的残暴。他把嘴巴贴紧我的嘴，像是要吮吸我发出的痛苦呻吟。

萨德在成年后因过度嫖娼、诱拐、性侵犯、同性恋鸡奸等有伤风化的行为（Seaver and Wainhouse, 1990），在法国的监狱、地牢和收容所中度过了27年的光阴。在他的许多犯罪记录中，比较有名的是在1768年，他以提供帮助为名将一个叫RoseKeller的失业纺织女工引诱到他租来的小屋中（他发现她时，她正好在路上乞讨）。但是，到了小屋之后，他命令她脱光衣服，用刀威胁她，并且还用鞭子狠抽她达数小时之久。

1801年，萨德侯爵和他的出版商因为写作和出版淫书《贾斯廷》和更为淫秽的《Juliette》而被警察局逮捕（Seaver and Wainhouse, 1990）。对萨德侯爵一案并未公开审判，为了杜绝国内丑闻，只是通过“行政处罚”的名义把他直接投入监狱。不久，他的反对派宣称他已精神失常，把他转押至夏勒顿疯人院（Charenton Asylum），并千方百计地阻止他写作以防止他再向外散毒。1814年，因为疾病恶化，萨德侯爵病死在院中。

“虐待狂”（sadism）是在1898年由克拉夫-埃宾（Krafft – Ebing, 1997, p. 20）最初将其用于专业性领域，将其作为感觉变态（paraesthesia）类型下的一种变态，即性变态。其根据如下：

它坚持将性欲和残酷结合，这种结合已经明显地进入心理的意识层面，以身体被摧残为其强烈的标记，这种性欲的冲动和残酷的表现联在一起使强烈的感情又上升一个高度……

虐待狂行为的本质取决于行为人具有的潜在倾向问题。如果有性交能力，虐待狂的冲动直接指向性交，但性交是和最初相伴随的或持续的虐待相联系的，最后甚至变成杀人犯、色情杀人狂，虐待的发生主要因为感官的性欲并不能满足圆满的性交。

从上面的界定中可以推断出，施虐狂（sadism）是指采用残忍的方式在性对象（如配偶、性伙伴或被害者）身上造成痛苦时获得自身的性满足。为了充分说明他的解释，埃宾大约引证了 15 个虐待狂案例。除一个案例有争议外，每个案例的犯罪人都通过殴打有感知生命而获得性满足。只有 25 号案件是一个例外：一位患者在看见血从女性的手指上滴下时与自己的性唤起之间产生了青春期联想，这一性幻想只是使他陷入性幻想而没有转化成行动。

虐待狂并不必然导致犯罪行为和谋杀。根据埃宾所述，当虐待行为导致杀人结果时，才能被称做“性虐杀”（lustmurder）。在这类案件中，将犯罪人确定为性虐杀时需要确定犯罪人实施了残忍的虐待行为，包括以下行为却不局限于此：如勒死、用刀刺、鞭打等（Krafft - Ebing, 1997, p.34）。事实上，这些行为只是犯罪人为了获得性满足而实施的。使用性虐杀这一术语只意味着表明犯罪人的行为首先是为了性的欲望和冲动。

尽管所有的虐待狂杀人或许都可被认定为性虐杀，但也并非所有的性虐杀都是虐待狂所为。埃宾引证的 13 个案例中只有一个案例的犯罪人实施了虐待行为。事实上，所引证的案件大多数都显示出被害者快速死亡，犯罪人在被害者死亡之后发生下列行为，例如，性奸入、吸血、内脏切除、器官移位以及断肢。由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出，埃宾所提出的“性虐杀”的类型事实上是指非特异的、故意地、以性为动机的杀人犯罪，而不仅仅是性虐待。由此可看出，埃宾提出的概念与伯吉斯、道格拉斯和雷斯勒等人（Borges, Douglas and Ressler, 1998, p.1）提出的“某些人杀人是以力量、性和残暴行为的背景”的概念没有多少区别。

施虐狂：建议运用的标准

从上述所提供的相关背景资料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本篇的目的是确定性虐待行为的判断证据，也就是在《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四版）（DSM - IV, 1994）中提出的：

性虐待狂（sexual sadism）的性欲倒错（paraphilia）主要涉及这样一种行为（真实而非模拟的），在这种行为中个体唤起性的兴奋是通过被害人心理上 and 身体上的痛苦（包括凌辱）而获得。具有这种性变态的个体通常会在性活动中产生虐待的幻想，这种幻想在其他时间则不会出现。在此类案件中，性虐待的幻想通常包括完全控制即将受到惊吓的被害人。其他一些性虐待行为则发生在那些愿意在性活动中受到痛苦与羞辱的性伙伴的身上。

在其他类型的案件中，被害人所受到的痛苦是激发性欲的根源。性虐待的行为或幻想包括那些控制被害人的行为（如强迫被害人爬行或将被害人关在笼子里），还可能包括蒙上被害人的眼睛，鞭打被害人，打被害人耳光，用鞭抽、拧、重击、火烤、电击、强暴、刀割、使窒息、拷打、断肢及杀害被害人等行为。

从上述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确定性虐待行为的基本标准，这一标准可使我们在描述相关犯罪人的行为时使用性虐待的概念。

1. 故意地实施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痛苦于一个有意识的被害人身上，使这位被害人经历痛苦与凌辱。
2. 被害人所受的痛苦应持续一段时间，借此可以判断被害人的痛苦是犯罪人故意实施的，目的是由此激发其性欲。
3. 故意实施令人痛苦的虐待行为是直接和唤起性冲动和得到性满足相关联。

有些研究者认为，恋尸癖和其他的死后虐待行为在本质上也都是虐待狂。戴兹、哈兹伍德和沃伦（Dietz, Hazelwood and Warren, 1995）就这样认为。即被提议的标准再次重申，在一个被害人失去知觉或死亡后发生的行为不符合用于描述虐待狂（sadism）的要求：

质疑的焦点在于被害人是否遭受了痛苦，所受到的痛苦是否为故意造成的，以及所遭受的痛苦是否能激起犯罪人的性欲。因此，对一个无知觉或死

亡的被害人负有责任的性行为和残忍行为不是虐待狂必须具有的证据，因为这种痛苦是被害人不能体验到的。

但是，仍有一些学者对虐待狂（sadism）与性虐待（sexual sadism）作了区分，以区别于那些已被扩大使用的含义。其提出的标准重申，区别于其他虐待行为的性虐待其本质特点就是追求性满足。从这一术语的根源，即萨德侯爵的行为及生活方式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并且在埃宾的性变态理论（Psychopathic Sexualis, Krafft - Ebing, 1997）中也作了描述。因此，使用“性虐待”一词是多余的。

在运用这一标准时人们的想法是：犯罪人或许有、或许没有性幻想，这恰恰是案件侦查或审判过程中的主要工作，即查清犯罪人行为的本质及内容。在运用这一标准时，必须具备专业的和本概念历史演变的基础知识，惟有如此，才能评价在现有资料中被描述为虐待狂的犯罪人的行为。

虐待狂与性虐杀的区分

这一分析涉及对事实进行系统的思考以得出结论。可以假定，推测是完全建立在分析基础上的一种猜测。另一假定则是这些概念虽然没有论证，但已经被人们普遍地作为真实的或事实的东西所接受。

正如我们所讨论过的，性虐杀（lustmurder）已经被界定为以性为动机的谋杀（Holmes, 1991; Krafft - Ebing, 1997），而不考虑是否具备虐待行为。这是一个广泛认可的概念，可以用于描述所有包含性因素的杀人行为，包括虐待杀人，同样也包括不含虐待行为的其他形式的杀人行为。

许多的专业文献的作者都认为虐待狂与性虐杀（或相近词）是同义词，或者当发现犯罪人在被害人死后的尸体上仍进行性虐待行为才将其视为虐待狂（Bain et al., 1988; De Burger and Holmes, 1988; Langevin, 1990; Holmes, 1991; Geberth, 1996; Simom, 1996; Birnes and Keppel, 1997; Geberth and Turco, 1997）。

对虐待狂一个典型的判断是根据这样一种假设，即对已经死亡的被害人仍有虐待行为（Birnes and Keppel, 1997）。伯瑞纳与凯伯尔在著作中认定：“如果从犯罪现场中看出，犯罪人在被害人死后仍有很长时间对其尸体进行性行为，那么，犯罪人就是一名虐待狂型杀手。”

另一个典型的推断是在格伯和特瑞考（Geberth and Turco, 1997, p. 53）的著作中提到的。作者假定，性虐杀包括让被害人忍受虐待的痛苦。这种虐待是犯罪人幻想已久的，它既出现在犯罪现场上，也保留在犯罪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狄·瑞沃（De River）认为，即使犯罪人没有看到被害人被害后所承受的痛苦，他也可以借实施犯罪唤起已久的想像，并借助这种记忆痕迹来满足其邪恶的欲望。这种犯罪主体不同于性虐杀者，他们是在杀人之前长时间地折磨被害人，为的是通过肉体的折磨与刺激“留下一种以后用来回忆的、超越犯罪现场与犯罪时间局限的想像”。因此，虐待的每一情节都是想像的展现，是将其想像变为现实的犯罪或成为幻想的产品，在每一个案件中，性虐杀都被视为性变态的施虐行为。

推断与假设都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想像也不是行为，这些区别在治疗时可能并不重要，然而，即将要讨论的，至关重要是在侦查审判工作中，任何分析与意见都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采纳。在书中的后一部分中，我将对此类区别进行完整的阐述，并且在结论中讨论这一区别所带来的影响。

在专业文献中的定义

多年以来，许多著名的研究人员都试图描述或阐明施虐犯罪人的条件，但结果却产生了混乱的局面。在此我们将回顾一些著名的或者常见的虐待狂描述，然后根据我们所提出的区分标准来讨论这些描述的准确性。

伯吉斯、格罗茨、福尔摩斯道姆和斯格瑞（Burgess, Groth, Holmstrom and Sgroi, 1975, p. 15）以这样的开头来描述虐待狂：

虐待狂以伤害孩子为乐趣，性欲望成为控制与发怒的表现，在某些时候，孩子象征着犯罪人所憎恨的任何事物，因而成为受惩罚的对象，被害者的恐慌痛苦对犯罪人来说非常重要，并且能够刺激恋童癖者，因为仅仅在这种情况下犯罪人才能获得性满足感。他的目的是伤害、贬低、玷污或者毁掉孩子。性欲望和力量都在愤怒中得以发泄。

这一概念本身有些矛盾。他所提出的犯罪人通过被害人的痛苦而获得性满足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这一概念却混入了性欲和暴力在愤怒中得以发泄的观点。当性欲与暴力在愤怒和攻击行为中发泄时，其行为最好被描述为

愤怒报复（anger – retaliatory）（见下述一般行为假定），而不是虐待狂。虐待狂的行为确实是包括愤怒与攻击而获得性满足。读者参阅此定义时很可能在分析案件的工作中混淆虐待中的愤怒报复行为。

下面是格罗茨（Groth, 1979, pp. 44 ~ 45）对虐待狂的描述：

有一种愤怒与暴力向性欲转移的现象，这使攻击本身可以引起人强烈的性欲。犯罪人发现对被害者有意识的虐待行为可以极大地满足自己，并且从被害者的痛苦、悲痛、愤怒与无助中可以享受乐趣。

……通常其被害者都是陌生人，且在年龄、外表或职业方面有着普遍的特点，他们往往是犯罪人想要惩罚或者摧毁的事或人的象征。

……犯罪人的兴奋是与被害者所受到的痛苦相伴随的。憎恨与控制成为强烈的性欲，他在虐待、贬低、羞辱被害者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甚至有时在最后杀掉他的俘虏。

同样，这一论述仍旧有些矛盾，它明确地指出犯罪人在攻击时性欲的增加需要伴随着被害者痛苦的增加，然而，他又继续强调的是，没有性欲望的愤怒报复动机只涉及伤害、惩罚和杀害被害人。读者在实际的案件工作中如遇到此类现象时，也会混淆虐待行为与愤怒报复行为。

在其他特征方面，克莱克利（Cleckley, 1988, pp. 290 ~ 291）则扩大了包括虐待成分的变态心理描述：

从更广的意义上讲，明显蓄意地给他们所爱的人以持续的羞辱和感情的痛苦，同样也使自己陷入失败和不愉快的情境，这意味着心理变态同时具有虐待狂和受虐狂。仅从这点来讲，刺激是相同的或者一致的，性欲的满足并非直接来源于情爱的享受，也来自于用鞭子抽打别人或让别人抽打自己的反常行为。

克莱克利对“虐待狂”这一术语的运用忽略了两个要求，一是从应用的角度来讲，他同样假定犯罪人的意图是引起痛苦，从而忽略了犯罪人的整体意图。进一步说，这一概念是为了消除虐待狂概念中通过被害者的痛苦而获得性满足这一条件。二是他基本上将一般的残忍行为与虐待行为视为事实上相同的行为，而忽略了两者不同的目的。同时，在克莱克利的著作中对虐待狂的论述很滑稽，读者可能无法从全文中找出确切的论述。甚至读者可能接受一种普遍的假定、但不肯定的定义，即所有的心理变态者都有虐待行为。

郎吉温（Langevin, 1990, p. 106）对虐待狂的描述则更多地包括了性虐杀的特点：

性虐待是一种反常的性行为，是指个体通过暴力控制被害人，在被害人所受到的恐怖、羞辱、贬低、伤害，甚至死亡中获得性满足。通常的虐待狂都是男人，他们通过强迫和暴力激起性欲。他们会从事神秘怪诞的性行为，除了同被害人进行性交之外，他们还可能对昏迷的被害人或者被害者的尸体产生性欲。

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个界定还是相对准确的，并且大体上也符合所提出的确定虐待狂的标准。然而，它却存在着潜在的混淆之处，因为它没有提到的对尸体的性行为或性唤醒作出进一步的限定。虽然尸体或者昏迷的被害人可能激发虐待狂的性欲，但是这种性的唤醒却不是因为受虐待而产生的，需要分别进行讨论与描述。在界定虐待行为特点的过程中，对受虐特点的讨论应当恰当地描述以适应不同的个体，避免概念混淆。

狄·伯格和福尔摩斯（De Burger and Holmes, 1988），福尔摩斯（Holmes, 1991），以及福尔摩斯和福尔摩斯（Holmes and Holmes, 1996）提出了系列杀人的分类，其中包括幻想型、使命型、纵乐型及暴力/控制型，又特别将纵乐型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因欲望而杀人，另一类是因兴奋刺激而杀人。狄·伯格和福尔摩斯（De Burger and Holmes, 1988, p. 77）这样描述因欲望而杀人和因兴奋而杀人的区别：

因欲望杀人和因兴奋刺激杀人都对被害人实施了虐待行为，然而与欲望杀人不同的是，因兴奋刺激而杀人的犯罪人并没有性的动机，而是因为渴望获得兴奋或者怪诞的经历。简言之，对这类杀人犯来说，杀人的过程与行为是一种享受。

以上的描述容易导致人们错误的认为，不是以性为动机，而是以兴奋刺激为动机的杀人行为也是虐待行为。如果因为兴奋刺激而杀人的动机不在于性，他们就不能被认定为虐待狂，虐待行为要求具备性满足的欲望。

福尔摩斯（Holmes, 1991, p. 67）对因性欲而杀人的行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解释：

这种类型的系列杀人犯是以渴望获得性满足为动机的。然而不幸的是，许多此类案件的犯罪人都同时实施虐待行为，他们的性快乐主要取决于他们

对所控制的被害人实施的折磨与肢解，乃至最终杀死被害人。

这一描述则将虐待狂与被害者的肢解与杀害直接联系在一起。在福尔摩斯所提供的案例中，被害人均是在死亡之后被肢解。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虐待行为实施于活着的被害人时，他进行的肢解才能被称为性虐待。作出这种认定必须通过现场再现来完成，而不能依据假定作出推论。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本质上来说，杀人的行为并不是一定有虐待行为（即便以性为动机），它经常是在发生性虐待行为时附带发生的。

福尔摩斯（Holmes，1997，p. 126）又将虐待狂定义为“从对另一人的惩罚中获取性满足感受”。更进一步表明性虐待是“使用暴力和残忍的手段对他人进行报复与惩罚。被害人仅是他们愤怒源泉的一个典型象征”。

像其他学者给出的定义一样，这个界定也是矛盾的。虽然它强调了导致攻击行为有性欲冲动，但是忽视了被害人所受到的痛苦，而且进一步强调非性欲的愤怒报复动机也会出现伤害、惩罚及摧残被害人的现象。如同戴兹（Dietz）等人（1995，pp. 364 ~ 367）所提出的警告，墨守这一定义的读者在实际的案件工作中可能将愤怒报复行为与虐待行为混淆。

戴兹等人（Dietz et al.，1995，pp. 165）曾指出：“性虐待就是指个体在虐待想像中出现性唤起的持续状态。”这一解释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没有对“虐待想像”进行定义。虐待想像既可以指想像中的行为，也可以指实际的行为，还可以指两者。在实际的案件中，用术语本身来定义术语并不是被普遍认为有益的方法，模糊的概念会延续至其他著作之中（Buegess et al.，1992；Dietz et al.，1996）。

幸好伯吉斯等人（Buegess et al.，1992，p. 136）进一步向读者提出了更有益且更准确的解释：犯罪人从被害人对折磨的反应中获取了最大的满足，并且又进一步解释说：犯罪人的性欲是被害人的痛苦、恐惧、不适所产生的功能（p. 227）。

或许在戴兹等人的著作中（Dietz et al.，1995，pp. 361 ~ 362）可以找到最有益且正确的翻译：

虐待行为是从他人所受到的痛苦中产生的持续的性兴奋状态……施加的痛苦意味着创造痛苦，从而在顺从、屈服、羞辱和恐惧中获取到所期待的回应。

这是一个不容易曲解的界定，很容易符合虐待狂的标准。目前，研究人员也在尽力向读者说明，虐待行为并非与刑事犯罪必然相同，包括因愤怒报复动机而残忍杀人后又碎尸等暴行在内，这类犯罪行为常常与虐待行为相混淆。

案例说明

纵览文献资料，许多被作为虐待狂的典型案例分析的大多是系列谋杀案，这类犯罪被改编成“真实故事”的小说，而且在媒体中被大肆渲染。在这部分案例说明中，我们将研究最著名的一些案件，讨论被错误地认定为虐待狂的犯罪和那些确实属于虐待狂的犯罪的异同。

非虐待狂行为

杰罗姆·布鲁道斯案件（Jerome Brudos）

布鲁道斯·杰罗姆，30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他被逮捕的几个月前，他失业了，之前他是一名电工。当局宣称布鲁道斯·杰罗姆应对实施的下述勒死被害者的行为负责（Turvey, 1994）：

1. Linda K. Slawson, 19岁，在波特兰的布鲁多家附近销售百科全书时失踪，俄勒冈州（Oregon）境内。
2. Janet S. Whitney, 23岁，1968年11月26日汽车因故障抛锚在阿尔马尼北部州际5号公路圣地亚姆车站附近后失踪，俄勒冈州境内。
3. Karen A. Sprinker, 19岁，1969年3月27日在Meier & Frank购物中心停车场失踪，俄勒冈州境内。
4. Janet Shanahan, 23岁，1969年4月23日在尤金路与马普勒路的十字路口，发现其因窒息而死在自己的后备箱中，俄勒冈州境内。
5. Linda Dawn Salee, 22岁，1969年4月23日，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Lloyd购物商城失踪，俄勒冈州境内。

布鲁道斯被逮捕后，他承认了犯罪事实，但宣称自己精神错乱应判无罪。当法庭经鉴定宣布他精神正常时，他又撤回了自己的供述。最后被认定对3起杀人案件负责，但并未为Linda K. Slawson和Janet Shanahan的死而负责和定罪。

在福尔摩斯的著作中（1997, p.67），布鲁道斯被描述为典型的性欲型杀

手（lust killer）：

精心策划的尾随跟踪，认真制定谋杀计划，对尸体的性行为（恋尸癖），肢解被害者的肢体。布鲁道斯是俄勒冈州系列杀人案的凶手。杰瑞·布鲁道斯（Jerry Brudos），一名来自俄勒冈州的系列杀手，也是这样一个犯罪人。

从 Geberth and Turco（1997，p. 55）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这是以布鲁道斯的犯罪情节为模本的一个真实犯罪小说：

布鲁道斯·杰瑞被称为性欲型杀手，在 1968 年至 1969 年发生的系列杀人案中杀害了 4 个年轻女子，被推断为性虐杀，他以异常的计划来绑架、谋杀妇女，并强迫她们穿上各种衣服摆出不同的性挑逗姿势。

他的行为被正确的定义为变态的性虐待。

在吉伯斯（Geberth，1996，pp. 437 ~ 438）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更多作出上述结论的论据信息。吉伯斯（Geberth）认为：“布鲁道斯对被害者的许多侵犯行为都具有恋物癖及恋尸癖的特点。”在每一个案件中，被害者都被带往他的汽车库，这个车库已经根据他实施虐待行为的目的进行了改造。吉伯斯仅仅提供了两个恋尸癖案例（而没有涉及犯罪人如何猎获被害者），但很有意义。吉伯斯在著作（1996，p. 437）中谈到布鲁道斯对 Karen Sprinker 的犯罪行为时写道：

（被害者）被活着带到他的修理厂。他与被害者进行了性交，然后命令被害者穿上他收集来的各种内衣，从不同的角度拍照，然后勒死被害者。但是他并没有结束愤怒。又进行了奸尸，最后割下被害者的乳房做塑料模具。

吉伯斯（1996，p. 437）又进一步描述了布鲁道斯对 Linda Salee 所实施的行为：

他把她带回停车场，在他强暴她的时候，勒死了她，又将她的尸体吊在天棚上的钩子上，并扒光了死者的衣服，然后通上了电，看这样是否可以让尸体跳舞。

不过，值得争议的是，福尔摩斯（Holmes，1991）、吉伯斯（Geberth，1996）、吉伯斯和特考（Geberth and Turco，1997）提出了标准的虐待行为界定。虽然包含在模糊的性虐杀者的类别中，但是，布鲁道斯的性欲对象是不能互动的人，甚至是已经死亡的被害者。在杀死被害者之前，他并没有拷打、折磨她们，被害者并没有因未满足他的欲望而受到恐惧的威胁。这证明他有

着与恋物癖相似的强烈恋尸欲望。

纳撒尼尔·考德案件（Nathaniel Code）

在伯吉斯等人（Burgess et al.，1992，pp. 265 ~ 267）的著作中，考德被描述为愤怒报复型犯罪人，有证据证明他因愤怒过度而杀死了被害者：

考德在3个不同的场合实施了8次杀人行为。1984年8月8日，在第一次案件中，他杀死了一个25岁的黑人妇女，向被害者刺了9刀，并且割了她的喉咙。

大约在一年后，也就是1985年7月19日，考德再一次作案，他杀了4个被害者：一个15岁的女孩、她的母亲，以及她们的两个男性朋友。考德几乎砍掉了女孩的头，她母亲因为窒息而死亡，并且尸体被挂在浴盆的旁边。考德用枪击中了其中一位男性的头部，然后将他的尸体扔在卧室中，在前面的卧室里发现了另一个男性尸体，胸部中了两枪，喉咙被割断。

最后一起案件发生在1987年8月5日。被害者是考德的祖父和两个侄子，一个6岁，一个12岁。两个男孩因为被捆住窒息死亡，考德在他祖父的胸部刺了5刀，在后背刺了7刀。

考德作案时有一种特别明显的“名片”行为。从被害者的伤口可以看出他作案的特点。他实施血腥的攻击和杀人行为，其杀人行为残忍到远远超过必要的将人杀死的程度。

考德强迫女孩的母亲亲眼目睹自己女儿的死亡过程，而将此作为其控制死亡仪式的一部分。如果被害者的反应刺激了他的凌驾感，他会再次实施超常的暴力行动，直至被害者死亡。

在3个案件中，被害者都被用电器或者在现场可以找到的电话线捆绑。考德使用类似于手铐状的捆绑方式，在手腕处做了一个圈，同样他用手铐状的结绑住被害者的脚踝，然后通过腿间将被害者的手和脚绑在一起。

正如在描述中所讨论的，考德的犯罪行为包含因为愤怒而不是为了性满足而产生的控制与掌控因素。

伯吉斯等人（Burgess et al.，1997）在著作中描述到：

在最初的性交过程中，由于结局不满意而攻击——凶手杀人时进行第一次射精——第二性过程则集中用来产生变态的权力感——杀手的愤怒集中

于攻击行为，而非为了性满足。

他们进一步讨论道：

考德的性满足……不是直接发生的，而且因攻击行为得到缓和。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通过对被害者的残忍的捆绑与肢解，通过暴力行为来代替性欲的释放。换言之，通过拷打折磨被害者而使之屈服的过程已经代替了性满足感。

上述论点似乎与伯吉斯等人（Burgess et al.，1992）的论述相一致。然而，比尼斯等人（Birnes et al.，1997）提出，考德案件从最初犯罪现场就可看出典型的虐待狂特点，并又一次指出，愤怒与狂暴也会导致犯罪人的杀人行为。如此看起来，这种分类似乎不太一致。读者如果止于此容易陷入这种将虐待行为与愤怒报复行为混淆一起的状态。

特德·邦迪案件（TED Bundy）

我们或许在文学作品中最常看到的系列杀人犯就是特德·邦迪一案（Theodore Robert Bundy，简称 Ted）。1989 年，他 43 岁时因犯罪被判处死刑。从 1974 年 1 月到 1978 年 2 月间，他杀死了至少 20 个人（他坦白地说不止 20 个）。被害人全部是 12 岁~16 岁的女性，发案地区从美国的华盛顿、俄勒冈、尤它、科罗拉多到佛罗里达。因此，特德常被作为典型的变态性虐待狂案例。

“特德·邦迪，不仅是系列杀人犯，而且还是系列变态强奸犯”（Holmes，1991，p.81）。

“特德·邦迪远不同于系列杀人世界中的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他是一个残忍成性、心理变态的性虐待狂”（Ressler 和 Schactman，1992，p.63）。

“从临床病理学角度而言，特德·邦迪是名性变态者，因为他喜欢通过谋杀女性来表达他的变态性幻想。”

西蒙（Simon，1996）概括性地描述了邦迪的犯罪行为：

他手里提着一个编织袋，将被害的妇女带进汽车中，或者带到偏僻的地方，然后用手提编织袋中的撬棍打她们。当她们处于昏迷或半昏迷状态时，他就实施残酷的强奸行为，包括肛交。邦迪用牙齿咬她们身体各处，有时咬下她们的乳头，或者在她们的臀部留下牙齿印痕。他将她们勒死后，烧毁尸

体，割下头颅，锯下双手。他将尸体藏在比较隐蔽的地方，几天后又回来奸尸，如向被割下的头颅的口中射精。

比尼斯等人（1997）对邦迪的幻想和动机作出了以下评论：

他仅仅想攻击那些他不相识的女性，并且希望与她们相遇后就让她们的昏迷或死亡。他是一个恋尸癖，因为他幻想将被害人弄得半死不活，就可以完全控制她们的身体。就是这个幻想使得他产生了这种杀人动机。

然后是：

邦迪的目的是在尸体上花费时间，而不能让她们活着（她们活着对于他是一种危险）。这就是他立刻将被害妇女打昏，然后将她们运往抛尸地点，将她们杀死以便从尸体上体验性快感的原因。

在文献中有大量描述邦迪的恋尸行为，以及与幻想相关的行为。但是，没有一种相关行为的描述能够说明他是个虐待狂。下面几个行为表现值得我们探讨。

第一，在与联邦调查局的侦探比尔（Bill Hagmaier）谈话时，邦迪说他在1974年7月14日在沙漫湖绑架了贾妮丝·奥特和德尼丝·纳史路特（Janice Ott and Denise Naslund），强迫她们其中一个亲眼看着另一个被杀死（Geberth, 1996, p. 751）。将这个行为和随后的恋尸行为联系起来，不能充分反映出这个虐待狂的目的。邦迪最喜欢的感觉是与昏迷或者死亡的被害人在一起，因此，一个被害人看着另一个被杀死的事实是附属于邦迪最主要目的而存在的。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出他的叙述是真实可信的。

第二，邦迪于1978年1月15日在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西（Tallahassee）举行的妇女联谊会上杀死了两名妇女，在她们的尸体上留下了邦迪牙齿的咬痕（Geberth, 1996, p. 753）。一些人认为杀人过程中包含有虐待行为。然而，文中没有提及被害人身上的牙齿咬痕是在活着的时候还是昏迷的时候或者死亡之后留下的，或是在暴怒的情况下发生的，这需要作出判断。如果咬的行为发生在埋藏死者之前，那它绝对不可能有虐待的目的。

最后，正如格伯斯（Geberth, 1996, p. 752）所引述的邦迪自我陈述，从字面上看，这可能是被一些人当做虐待幻想的证明：

你可以感觉到留在她们身体的最后一丝呼吸。当你目视她们的眼睛时，你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的人就是上帝！然后你占有她们，她们将成为你生命

的一部分，你杀死她们或抛尸的地方对于你来说是神圣的，你总是被她们拉回到她们身边。

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上述内容中没有提及性唤起和性满足，也没有讨论延长被害人的痛苦。这段陈述仅仅包括暴力和控制，没有提及虐待的需要。

强奸犯杰克案件（Jack）

或许任何时候我们提起最臭名昭著而且令人毛骨悚然的系列杀人犯就是自称“强奸犯杰克”的人。他从1988年的8月31日到同年11月9日在伦敦东部的白教堂地区杀死了至少5名妇女。

根据埃克特（Eckert，1981）的报道：

每个被害的街头卖淫女都是因为喝了大量的酒而处于醉酒状态后被杀害的。除一人外其他的人都是被勒死的，她们都被割断喉咙，尸体遭到毁坏。没有被碎尸的被害妇女被勒死，但没有遭到污辱，因为就在恋尸碎尸之前，作案人受到惊吓而被打断。最后一个被害妇女死在室内。几乎所有的作案时间都发生在深夜或者凌晨。

这个杀人犯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认定，结果也就未能将其逮捕归案。

至少一本极为具有参考价值的书将这些犯罪行为定义为虐待狂，“他的两次攻击行为具有仪式性、强迫性、极度虐待性，大多数的行为与强奸犯杰克的行为相仿”（Buegess et al.，1992，p.230）。

然而，研究者埃克特（Eckert，1989）和特维（Turvey，1999）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这是明显的非虐待性犯罪人，他只是要表明某种愤怒报复和恢复自信的表现。

根据特维（Turvey，1999，p.330）的论述：“在这类案件中有许多消极愤怒的证据表现，有许多行为对这部分犯罪人来说是缺乏的。”主要包括：

1. 缺少对被害人的性侵犯。
2. 被害妇女在很短的时间里在街道上被制伏、杀害、碎尸，直到最后一位在屋内被发现的妇女。
3. 缺乏证据证明对于活着的、意识清醒的被害人进行过残害。
4. 通过使用暴力和对尸体的肢解、展示尸体来污辱女性以显示他的性力

量。这种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体验，而不是一种仪式性的行为（他对死者身体的各个器官做不同的事情，而不是每次都做同样的事情）。

5. 在公众和执法面前造成害怕、恐惧或惊慌，据此展示他的力量和对司法机构的鄙视。

6. 让其他人看见或听见他的罪行，让被害人被发现并展示他的“成果”。

虐待狂

内文斯·G. C. 希思案件（Neville G. C. Heath）

克莱克利（Cleckley, 1988, pp.291 ~ 293）列举了一个心理变态者内文斯·G. C. 希思（Neville G. C. Heath）的例子。希思在1946年被捕时是一名年仅29岁的前皇家空军军官，他曾于1941年被海事法庭指控诈骗，因其已出逃而缺席审判。他曾被描述为一个颇具人格魅力、谦和真诚、讨女人喜欢的人，极易给人留下拥有财富又富有智慧的好印象。

1946年6月21日，星期五，32岁的电影明星玛杰里·加德纳（Margery Gardner）的尸体被发现在伦敦诺丁山贝姆桥庭旅馆的4号房间里。她的脚踝被手帕绑了起来。此外，她的乳头被咬掉，在她的背部、胸部、胃部和面部有许多抽打的痕迹。法庭病理学家基思·辛普森（Keith Simpson）博士认为，她是因窒息而死亡的，可能是口被物品塞住，或者她的面部可能被压在枕头下面。发现尸体房间的登记人为希思夫妇。

1946年7月6日，21岁的皇家海军女兵多琳·马歇尔（Doreen Marshall）被发现死在 Branksome 峡谷。她死在杜鹃花丛中，全身赤裸，除了左脚上穿了一只鞋，她的衣服被放在自己身上。在她死以前，希思将她的双手绑上，因为她的手上留有抵抗刀划伤的痕迹，这表明她生前曾经试图反抗过。她的喉咙被割破，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希思仅被起诉谋杀了玛杰里·加德纳，多琳·马歇尔被谋杀的案件因为缺少证据没有被起诉。尽管他的律师提出他有精神病的理由，但是陪审团仍于1946年9月24日宣判他有罪。一个月后，他被判处绞刑。

根据克莱克利（Cleckley, 1988, p.292）的介绍：

每个被害的妇女都被折磨了3周，最后被希思残忍地杀害。在两起案件中，从尸体被毁坏的程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希思的性虐待程度。一个女孩

的一个乳头被从胸部完全咬掉，另一个几乎也是如此。从两具尸体的解剖情况来看，在一个被害者尸体上，某种工具（或许是棍子）被插入阴道，将其捅裂，造成内脏的损坏。另一个被害者尸体上，显然是将木棍插入阴道后用很大的力量向上插入了内脏，而且用力搅拌。一具尸体曾被金属包头的鞭子抽打过……一个女人的腹部被大大地撕开，肠子令人作呕地散在她身体外面。一个很深的伤口从生殖器一直延伸到她的乳房……

被害者被紧紧地绑着并被堵着嘴。解剖分析显示，希思想让被害女性更长时间地活着，以体验他恶毒的伤害带来的巨大痛苦。他嗜好血腥，特别是当被害者还清醒地能够感受这些的时候。很明显，他在被害人死后还继续可怕地拖延碎尸的过程，从中寻找荒谬的性满足。

在这一案例的介绍中，希思的许多行为都可论证为虐待狂行为。这些行为包括抽打被害者、捆绑他们的肢体、堵住他们的嘴、死前将东西插入阴道（带有暴力转动）、死前用刀伤害她们，以及死前撕咬被害者的乳房。然而，虐待狂做的所有事情并非都是属于虐待性质。犯罪人在被害者死后的一些行为（如切割或碎尸）虽然可能是出于性的动机，但不属于引起被害者痛苦的行为，因此也就不能被描述为虐待狂行为。

保罗案件（Paul）

在伯吉斯等人（Burgess et al., 1978, p.16）的著作中曾列举了一个名叫保罗虐待狂的犯罪案件。保罗（Paul），单身，19岁，白人男性，他被指控犯了4起强奸，但最后他承认有20多起案件。根据他的供述，他有选择地物色看起来无知的女孩，年龄在12岁左右，用刀将她胁迫至树林里。他的供述如下：

我给她一个选择：要么强奸她，要么剪掉她的头发。我用皮带将她的双手捆到背后，把刀尖放在她两个眼睛之间，并且威胁要杀了她。然后我脱掉衣服让她舔我的身体并且抽打我，因为我知道她不会愿意去做这些。我兴奋得颤抖，我要让她害怕——她的惊吓和痛苦给我快乐。为了让女孩不断地痛叫我就用香烟烫她的肩膀和臀部，并且放到她嘴里，有时我痛打她并用我的穿着工作靴的脚踩她的手……甚至直到现在，当我想到女孩被痛打或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场面时我就性勃起。

上述的犯罪行为就可以认定是虐待狂行为。攻击和暴力是为了提高性欲

望，然而并没有杀人。正如讨论的那样，虐待狂行为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凶杀。

通常的行为界定

在审视各种相关资料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很多学者总是认定虐待行为有其稳定的特征而无视它们的背景。这也是根据他们自己办案中的经验，或更多地根据某些假定的行为，即扩大被害人痛苦的行为，假定犯罪人的动机和意图就是造成被害人痛苦并以此来获得性满足。

当对犯罪人行为模式进行动机分析时，这种一般假设中的任何一个或其他假定都存在着潜在的不准确性。如同已经讨论的，除非是对活着的、清醒的被害人实施故意的行为以达到性满足，其他情况不能称之为虐待狂。虐待狂的犯罪并非一开始就让被害人死亡。一般的观点认为，虐待惟一的动机主要表现为碎尸欲望，以此类推便失去了本行为的特点，也就失去了本来动机的意义（Turvey, 1999, p. 171）。

对于侦查或法庭目的而言，从对尸体的行为证据推断出犯罪动机、犯罪行为模式必然涉及刑事司法检验领域，这是被认为非常专业的领域。刑事司法检验是对上述可能性的检验。直到进行了恰当的刑事检验和分析，犯罪行为的前后背景被犯罪再现而明朗，那些可能性才能被可靠地引用。

更确切地说，刑事司法检验只能建立这样一种结论的基础上，即结论来自某一犯罪的物质和行为证据的基础上。分析下列案例：

强奸

一般“强奸”（rape）的概念并不指一种特别的行为，而是一种刑事分类，即涵盖多种形式行为的犯罪。它取决于地区的法律，可以包括用外物强行插入被害者的阴道、强行将阴茎插入被害者的嘴或强行将手指插入被害者肛门等。于是，当仅仅作为犯罪行为描述时，这个词就限制了行为的意义。

许多学者（Knight, Lee, Prentky and Rosenburg, Hazelwood, Reboussin, Warren and Wright, Turvey）基于格罗茨（Groth）1979年开始的研究和继续的深入，根据强奸行为所要达到的心理需要将其分为四种类型：

1. 恢复自信型（补偿性）：犯罪人通过性攻击行为以恢复他们对自己理想状态的疑惑。

2. 力量确认型（开拓性）：攻击但并非欲至于死地，行为不表现男性的外在困惑，而为弥补犯罪人内在疑惑和恐惧。

3. 愤怒报复型（错位性）：高度的生理和心理的性攻击行为发泄累积的愤怒。

4. 愤怒兴奋型（虐待狂性）：犯罪人的攻击行为是为了引起被害人痛苦以使犯罪人获得性满足。

然而，戴兹等人（Dietz et al.，1995，p. 362）关于强奸中的虐待狂表现有如下讨论：

强奸犯导致被害者的痛苦，但是，只有性虐待狂故意造成这种痛苦，无论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目的是以此提高他们自己的性高潮水平。

如果某一特殊的强奸行为（即某种强行插入）表现为用来折磨和不断羞辱被害人，并专门给其造成痛苦以满足犯罪人的性需要，那么就可以合情合理地把它列为虐待狂。若没有这些行为，就可能存在其他心理需要。因此，法医就要分析某一具体案件中的行为方式，并根据这些方式的前后关系形成对其个人行为特点的观点。

肛奸

“肛奸”（anal assault）一词通常是指对肛门的生理攻击。一些检验者认为，有这种行为也属虐待狂，因为它在性活动中给被害人造成了痛苦。这种解释的前提是假定犯罪人是故意给被害人造成痛苦的。

确实有一些犯罪人将物体插入被害者的直肠是为了目睹随后的痛苦以达到自己的性满足，这可以被准确地界定为虐待狂行为。然而，一些犯罪人强行将物体插入被害人身上包括肛门在内的孔穴是为了满足对其生前发泄愤怒的动机或死后的性幻想。

案例

克拉夫－埃宾（Krafft－Ebing，1997）列举了 216 号性谋杀案件：

一名 19 岁的称为 K 的男性劳工杀害了一个 10 岁名叫安娜（Anna）的女孩……她的尸体被发现在离主路大约 50 步远的杂树林里，脸朝地面，嘴被苔藓堵着，并发现肛门有受到攻击的迹象……

K 被捕了，起初他否认事实，但是后来全部招供了。他勒死了那个孩子，

当她不再踢闹和反抗以后，便肛奸了她。

在这起肛奸案件中，也可用另一个术语，即鸡奸（sodomy）。本案中鸡奸发生在安娜丧失知觉以后，甚至是发生在她死了以后。所以，本案不符合虐待狂的情况，这起案件中的肛门强奸行为一般被认为是出于找到自信的动机。

勒杀

用手和用绳子勒杀（strangulation）都是通过压迫颈部的动脉以限制被害者脑血氧供应。确实，一些犯罪人这样做是为了使被害者间断地丧失和恢复知觉以从被害者间歇的痛苦反应达到性满足。这可以准确地定为虐待狂行为。然而，他们在犯罪行为中采用勒杀并不是为了性幻想，而是为了达到犯罪功能。用手和用绳子勒杀可能分别出于征服、控制、惩罚或杀害被害者的虐待狂动机。

案例

克拉夫-埃宾（Krafft-Ebing, 1997）列举了18号性谋杀案件：一名26岁的名叫韦彻（Vacher）的流浪汉被发现“犯有11起性虐待狂谋杀，其中包括勒杀、割断喉咙、剖腹和碎尸，特别是攻击生殖器，最终在尸体上发泄性欲”。

在这个案例中，受虐狂有各种犯罪表现。荒谬的是，这些行为主要是在被害者死后实施的。勒杀是韦彻的杀人方法，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杀害被害者不是功能性的。

也就是说，犯罪人不能在活着的、有知觉的被害者身上实现其首选的行为（死后碎尸）。既然性满足不与死前的伤害活动有关，那么，这起案件中的行为像克拉夫-埃宾（Krafft-Ebing, 1997）论述的那样，不符合虐待狂的标准。

撕咬

布列坦（Brittain, 1970）就撕咬（biting）这个题目发表过许多文章，然而他并没有给虐待狂一个专门的操作性界定。他规定的撕咬行为如下：

可能发现的咬痕一般在被害者的胸部和颈部，但是并不局限于这些部位，并且可以轻重不同。它们可以发生在同性恋或异性恋虐待狂杀人案中。

应注意的是，这个模糊的行为论述代表了布列坦（Brittain）关于虐待狂

问题研究的全部方式。他列举了可能是虐待狂的行为，但并没有肯定地专门界定虐待狂的特征。

一些犯罪人咬他们的被害人，在皮肤表面和其皮下组织留下可以看见和识别的咬痕。格伯斯（Geberth, 1996, pp. 636 ~ 639）曾论述造成咬痕的三种可能动机：

1. 虐待性的快乐，通常会呈现淤斑或“吮痕”。
2. 惩罚或愤怒，通常会表现对儿童的虐待。
3. 防御行为，可以出现在被害者和犯罪人双方身体搏斗的迹象中。

因此，即使撕咬在虐待行为中发生，虐待也不必然发生撕咬。任何具有撕咬行为的虐待狂动机必须经过痕迹检验证明，而不能是假设的。

杀害被害人

一些犯罪人会杀害被害人（killing the victim），然而，杀人行为本身并不是虐待狂的证据。首先，必须有被害人遭受痛苦，即使那样，被害人的痛苦也有可能是犯罪人的另一目的。其次，还必须有犯罪人从被害人痛苦上得到性满足的证据。虐待狂者只要希望他们的被害人尽可能地活着并清醒，以便继续使其痛苦而获得性满足。被害人死亡发生得越早，虐待狂行为发生的机会就会越小。

在一个被害人面前杀害另一被害人

上述案例中曾提到，一些犯罪人会杀害他们的被害人，然而，杀人行为本身并不是虐待狂的证据。但是如果在另一个人面前杀人（killing a victim in front of another victim），这种行为虽不是固有的虐待狂特征，但有虐待的可能。杀人有可能是出于预防性的目的，为了灭口。在这种案件中，让被害人活着、清醒着，使其痛苦或伤害他（她）都是犯罪人的次要动机。另一种可能性是，在活人面前杀人是出于报复动机，而活人并不一定是犯罪人报仇的目标。

死后碎尸

死后肢解被害人尸体（Postmortem Mutilation）也许是最容易被错误地认定为虐待狂的一种行为。如已经讨论的那样，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将性暴力杀人和虐待狂相混淆。比如，一个临床医生西蒙（Simon, 1996）将虐待狂行为描述如下：

系列性暴力杀人犯都属于虐待狂，有时还是恋尸狂，即二者兼而有之。他们让被害人受伤并感到害怕，他们在活着的人或死后的尸体上投入其全部力量而获得性高潮。

除了作出一个不准确的概括，这一描述不能用来理解系列杀人案件。这个论述将虐待狂行为包括在死亡后、没有反应的被害人身上投入力量的情况。如已讨论的那样，无知觉或已经死亡的被害人并不能给虐待狂典型的性唤起所要求的痛苦反馈（如哭、叫、求饶、哀诉、挣扎等）。因此，死后活动（如恋尸狂）或对没有知觉的被害人实施犯罪并不能准确地描述为虐待狂。

案例

贝恩等人（Bain et al., 1988）的著作中列举了一个称之为虐待狂的A先生，他杀害了一个女人并与她的尸体发生性关系，然后，割下其外阴准备吃掉，这时他被第三者打断并从犯罪现场逃跑了的案例。

贝恩等人（Bain et al., 1988）列举的此案犯罪行为并不符合虐待狂要求的情况。

案例

福尔摩斯（Holmes, 1991, p. 124）将虐尸狂定义为“对与尸体性交感兴趣；虐尸狂之所以杀人是为了与尸体性交”。

这个术词是一个悖论（Oxymoron），因为没有别的更好的词语。死者不能感受痛苦，而虐待狂要求死者痛苦。因此，这个词不仅是不恰当的，而且还是错误的。

犯罪后访谈中的“虐待”倾向表达

很多学者解释虐待狂的犯罪行为是基于对犯罪后的犯罪人访谈调查。除了临床和对性犯罪人的访谈经历之外，还有一些现实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不能轻信对犯罪人的访谈没有结果的现象。亚伯（Abel, 1990）曾提到过一起案例说明此意，此案犯罪人有可能获得假释：

他对性犯罪的次数以及他在攻击过程中采取的强制与暴力程度上的坦白和诚实就会导致如同审问发现新的犯罪一样，从而可能严重影响犯罪人离开监狱的机会，并可能延长对他的监禁。

然而，即使在不可能假释的案件中，同样有犯罪人欺骗访谈者、篡改其

犯罪行为的特点与程度的虚假现象。它们包括如下方面：

1. 犯罪人仍然希望获得申诉与受理的机会，为了适应他们的特别需要而改变犯罪活动细节。
2. 犯罪人可能对他们在被害人身上行为的某些方面感到尴尬（例如，他们可能不愿意承认更愿意同死尸性交，于是可能说这些活动是在死以前发生的）。
3. 犯罪人可能希望被认为比实际的犯罪活动提示的更加聪明和有能力（例如，一个犯罪人可能承认是虐待狂，或提供他们犯罪或幻想中的虐待狂情况，因为他们听说虐待狂者是最聪明的犯罪人）。
4. 犯罪人可能希望被认为是比实际犯罪行为所提示的更强悍和/或更厉害和/或更熟练，以实现他们的自我或犯罪尊严（例如，一个犯罪人可能承认其并没有犯下的罪行，或提供他们可被认为是虐待狂幻想者或关于他们犯罪的其他情况，为了通过这些使自己在监狱中或在大众当中被认为是更厉害的）。

结论

在对这个问题的有关出版物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之后，笔者得出了关于法庭调查的几个结论：

首先，也可能是最重要的，“虐待狂”一词并不是侦查员、犯罪学家或医学界在文献记载中一直采用的。此外，它经常被含糊地界定和广泛地使用。

其次，在文献中通常有两种错误的解释：

1. 将以惩罚和泄愤为动机的行为曲解成虐待狂行为。
2. 将死后奸尸或毁损尸体的行为曲解成虐待狂行为。

第二种错误解释可能是根据一些验尸者的假定，即犯罪人毁尸总是发生在被害人死亡之前。这种在文献中大量出现的假设是因为在法庭结论形成之前缺乏适当的、客观的犯罪再现。也就是说，验尸者可能仅为了形成犯罪人是虐待狂的观点，在缺乏物证确定的情况下假设其行为性质，这一做法是站不住脚的。

再次，有一些学者（De Burger et al., 1988; Geberth, 1991, 1996; Geberth et al., 1997; Holmes, 1991, 1996）一直把小说化的材料和媒体炒作

当做“真实的犯罪”进行犯罪行为的研究。这样的做法破坏了研究的可信性，引出研究可靠性和客观性的问题。最要不得的是，在专业领域内把一些炒作的故事当做“真实的犯罪”来研究。

最后，笔者发现，对于那些被描述为虐待狂或性虐杀的犯罪人有大量的道德描述。一些作者在专业中使用大量的道德语言去研究犯罪人，以下就是频繁使用的相关词语：

1. 坏的。
2. 冷血的。
3. 疯狂的。
4. 罪恶的。
5. 凶暴的。
6. 变态的。

这些主观词汇和道德定位形成了情感争论的基础，但按照逻辑不该用这些词汇。它们的意义还在于学术上过于主观。因此，如果他们让读者进入作者个人的信仰系统并加以使用的话，则给研究者和他们对犯罪人个体动机的理解造成切实的障碍。这些词汇的使用不能促进客观研究事业的发展。

案例

下列一些案例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包括虐待狂行为的多种刑事犯罪以及动机可能的实用认识，将再一次提醒读者们这些是行为，而不是动机，并且是犯罪人需要的表达。从这些观点考查虐待狂行为可以提供对具体案件中犯罪人的更透彻的理解。试析下列案例：

理查德·巴克案件：儿童猥亵虐待狂/凶杀案

理查德·巴克（Richard Back）在1987年春天的几个月时间里，强奸了一个4岁的男孩，强奸并杀害了被害者两岁的弟弟，他还对死者的双胞胎哥哥进行性骚扰，但从没有被指控。根据俄亥俄州诉巴克一案的记载（Ohio v. Back, 2001），俄亥俄州的上诉法庭对其的判决：

对3个兄弟进行性虐待，在照顾他们的几个月时间里，在大量场合强迫他们与其口交，他还切断他们的空气供应使其屈服，并以此达到性唤起。就是这个活动导致双胞胎中的弟弟死亡。

在巴克服刑将临期满时，州法院宣布他是一个流氓成性的犯罪人，并送至治疗所关押。他进行了上诉，上诉法院维持原判。根据俄亥俄州上诉法院对巴克的判决：

犯罪报告清楚地指出，巴克是个虐待狂，他从伤害被害人并看到其恐惧而获得性满足。虽然报告说，他的一个被害人不是在其获得性满足的过程中死亡的，但他承认，在他切断年幼的被害者的空气供应的时候频繁出现性欲望。这个将攻击和性唤起相结合的行为将巴克置于最危险的人物之列，即虐待狂犯罪人。

讨论

在这起案件中，作为虐待狂的行为和动机因素都明显表现出来。被害者是有意识的，他们感觉到痛苦（重复），并且当这些痛苦发生时，犯罪人感到性唤起并获得满足。“虐待狂”这个词在这里用得十分恰当，没有一点夸张或假设。

赫伯特·詹姆士·科德林顿案件：证明能力型动机的对儿童强奸/防御性杀人案

赫伯特·詹姆士·科德林顿（Herbert James Coddington）是南部塔霍湖人，他在1987年杀害了两个女人，并在犯罪激情中强奸了另外两个人。三流赌徒科德林顿假装是一个反毒品电视节目制作人，通过里诺市（Reno）的模特中介处招募其被害人。他引诱这些特别的被害人到他的南部塔霍湖的移动房子里，在那里他勒死梅贝尔（Maybelle，又称“妈妈”马丁，69岁，展示橱窗和模特的学校业主），还有她的朋友桃乐斯（Dorothy，又称“多蒂”沃尔什，73岁）。然后，他猥亵了两名女孩（阿莱西娅T和莫尼卡B，年龄分别为14岁和12岁），并将她们在他卧室的隔音围墙里关了两天，直到警察根据被害者的活动情况找到科德林顿（Cooper，2000）。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诉赫伯特·詹姆士·科德林顿一案的记载（California v. Herbert James Coddington，2000）：

1987年5月16日，星期六，“妈妈”马丁告诉她儿子，她要开车带两个女孩到南部塔霍湖拍摄一个反毒品的广告，她的朋友“多蒂”沃尔什也跟着去。马丁有一辆1984年产的克莱斯勒第15代汽车。她先带上了阿莱西娅和莫尼卡，然后捎上了“多蒂”沃尔什。她们开着车到纳盖特停车场停下了车，

然后到一家餐馆等着。当被告人赶到以后，5个人一同开着梅贝尔的车到他的拖车去了。犯罪人让姑娘们进去换短裤并化妆。

两个女孩和马丁与沃尔什一起跟随被告进了一间有木头墙的房间，墙上有模特的图片。房间里有一张床，但是没有镜子。当女孩进房间以后，被告猛击马丁和沃尔什，并把她们扔到房间里，随后关上了门。他跑向阿莱西娅并用一个黑色的宽约17厘米、厚约7厘米的黑糊糊的矩形物体猛击她的下巴。随后他开始殴打马丁和沃尔什的下颌和脸部。他让所有的4个女性都不能出声，并让马丁和沃尔什躺在地上以便能将其捆住。在马丁躺倒以前，被告威胁说如果她不躺下，就将一个女孩杀死。然后他用绳子将4名女人的双手捆到背后并绑住和勒她们的脚。沃尔什乞求他不要杀死她。马丁对被告说：“对我们来，不要伤害女孩”。一个女人对被告说，她可以给他想要的所有的钱！而被告回答说：“我知道你会的。”阿莱西娅将自己口袋里的钱给了他。被告把一个枕头套套在了马丁的头上并把绳子系在她脖子上。她请求他将绳子松一点，说自己已经无法呼吸。她开始窒息，并从坐的地方侧向跌倒了。

被告然后命令阿莱西娅和莫尼卡躺在老女人的腿上。他用绳子把她们的双手系在背后和她们的脚捆在一起，然后他把阿莱西娅放到床上，把莫尼卡放到床边的地上。他用一件夹克衫盖住阿莱西娅的脸，用一条短裤盖住莫尼卡的头。阿莱西娅只能看见地毯。她听到沃尔什呕吐的声音。莫尼卡听到清嗓的杂音。阿莱西娅随后听到拖拉身体的声音，大约15分钟以后她听到塑料袋的声音。莫尼卡也听到拖拉塑料袋的声音，并猜测马丁和沃尔什已经不在房间里了。

然后被告回到房间。他解开女孩身上的绳子并将她们的手重新用皮带系在了前面。他用一个滑雪面具盖住阿莱西娅的眼睛，并用一个枕头套蒙住她的头，把一根绳子系在她的脖子上。阿莱西娅可以看见门右边地毯上的红色物质，她问他在那里做了些什么，被告回答说撒了些防冻液并正打算清洗掉。莫尼卡可以看见他擦洗地毯上一些暗褐色的东西。被告头上戴着一个塑料袋，他的头发是黑色的并且湿了。

被告告诉阿莱西娅和莫尼卡说：“我并不需要你们，我要妈姆，我能因为得到她而收受钱，我还要能因得到多蒂而再拿到一些。”被告允许女孩松开手

腕上的绳子和眼罩。他说，他可能用女孩作人质进行敲诈勒索。当莫尼卡问他何时准备杀死她们的时候，他拿出一把带有消音器的手枪，并说，如果他想杀掉她们的话早就做了。阿莱西娅看到进房间的门上有小孔。被告给她们水，把她们带回房间后用枕头套套住她们的头，之后拿来一些水果。然后，被告拿来一些杂志。阿莱西娅从一个本上撕下一个“Herb Coddington”的地址标签装到了她的手提箱里。后来她把它交给了联邦侦查人员。

第二天早上女孩醒来以后，被告拿来了鸡蛋和草莓，并给女孩吃了维生素片。他允许她们进入拖车的起居室。被告身着阿莱西娅认为的套领毛衣，盖住了他的嘴和耳朵的一部分，还戴着滑雪帽，盖住了他的头发，她可以看见头发是橘黄色的。莫尼卡认为他戴着编织的帽子和滑雪面具，她也看见橘黄色的头发露了出来。女孩看过电视以后，被告说他要出去工作了。他把她们带回到另一间屋子里并让她们换衣服，并说可以出去工作。她们听到他在外面工作时重重的喘气声。他说他要去淋浴，她们也听到了淋浴声。然后，他让女孩回到客厅并制作录像带。她们又被带回另一间屋子。她们拒绝淋浴，但是当阿莱西娅在浴室刷牙的时候，她看到水池里胡须般的褐色毛发。

被告告诉女孩，她们要和一个18岁被绑架的男孩（他的朋友）一起制作卖到欧洲去的录像带。他告诉她们说：她们必须脱掉衣服。他蒙住她们的眼睛，但是阿莱西娅仍可以从眼罩下面看到外面一点，她问被告是否要强奸她们，他回答说：“不！”并补充说，如果那个男孩伤害她们的话他就伤害那个男孩。然后，女孩被放在床上，手被捆着。被告随后爬到床上开始对莫尼卡小声说话。他用正常的音量，拿着麦克风，假装对并不存在的男孩说让他温柔一些，并让女孩放松。然后他用男孩般动人的声音小声对莫尼卡说，他也害怕但是并不认为她们会被杀死，谎称那个男孩有枪。被告脱掉了莫尼卡的衣服并亲吻她的全身，包括她的阴部。阿莱西娅听见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声音。当她问莫尼卡是否好的时候，莫尼卡回答说：“是的。”大约半个小时以后莫尼卡说“停”，并要求穿上衣服，被告同意了。

被告然后脱掉阿莱西娅的衣服，用一个年轻男孩的声音说，他很抱歉，他不想这么做，他也希望她们不被杀掉。他用手抚摩阿莱西娅全身并亲吻她的嘴唇、乳房和阴道外边。20分钟以后她说“停”。她听到被告从一定距离

以外发出的声音，但是床上依然很沉，像是有人脚踩在上面。

女孩被允许穿上衣服并进到客厅里。只有被告在这里。被告说录像带要重新做，它“值不了两分钱”，没有人会买。他保证如果再做5分钟或10分钟的话就会让女孩回家。他把她们带回房间，再次蒙住她们的眼睛。阿莱西娅被放到地上，莫尼卡被放在床上，但是她们还可以拉着手。莫尼卡听到带有欧洲或英国口音的声音，说录像带不好，还听到被告回答说再试试。另一个声音说他必须再做一个。

被告脱掉莫尼卡的衣服，把一支手指放进她的阴道。她感到疼痛并一再要求他停止。被害人假装成一个男孩的声音向被告大喊，被告说“停”。他问莫尼卡是否要用嘴亲他，当她回答说“不”的时候，他说必须要这样做。然后，他假装一个男孩，拿起她的手指吸吮，说就是这么做的。然后被告把阴茎放进了她的嘴里。她说她要呕吐，他回答说：“你为什么这么说？现在，你把所有的事情都破坏了。”他告诉她必须还要做，她说她不行了，于是被告允许她穿上了衣服。

然后被告把阿莱西娅放到床上，并告诉她由于莫尼卡没有做好，她就必须做的更好。她一再说“不”，但是他脱掉她的衣服并把手指插到她的阴道里。她尖叫起来，要求停止，被告随后说：“要不用手指，你就必须和她性交。”她尖叫起来，说他曾经保证过不会强奸她，但是被告回到床上，把阿莱西娅的双腿架在他的肩上，将阴茎插入到她的阴道里。她感到非常疼，对他说“不适应”，再次要求他停止。他停来说：“不适应，你就必须再次用手指。”被告然后把手指插入到她的阴道里，引起她剧烈的疼痛和出血。阿莱西娅可以看见一个红灯在房间的一角，认为那就是正在录像的摄像机。

随后女孩被允许看电视。当她们要求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被告告诉她们说，她们可以录下声音，他把录音放到给父母的电话边上。他让她们上床，她们后来就睡着了。5月18日，星期一早晨，被告对女孩说他要在一个地方放了她们并叫警察来，于是，她们被带到里诺城。他教她们说自己被绑架并被带到 Sacramento 的一个蓝色的两层的房子里，并警告她们，如果她们不遵从那些指令，她们的家庭就很危险。然而他并没有释放她们。

被害人晚上被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和南部塔霍湖警察营救出来，他们根据

证人对年轻模特的描述进行人物素描后确定是科德林顿。开始营救时，两个联邦调查局官员打算到他的拖车里访谈科德林顿。而他拒绝让他们进去（那时拖车已经被执法官员包围并监视）。他告诉他们，他宁愿通过电话接受访谈。当在电话里与联邦调查局官员谈话时，警察已经在外面把他们包围了，科德林顿说两个女孩在里面和他在一起，还说他要去医院（California v. Coddington, 2000）。

讨论

在这起案件中，科德林顿的行为最终被定为虐待狂（California v. Coddington, 2000）。科德林顿残酷的、有计划的和恐怖的幻想是出于被接受和建立自信的目的。也就是说，他捆绑被害者只是防御性行为。与被害者发生包括亲吻、抚弄的性行为和其他假的性前爱抚时，被害者并没有被拷打。当被害者表示讨厌那些性活动的时候，他就停止了。他甚至努力隐藏杀害她们的极度暴力。这并不是说他是个有良知的好人，而是说并没有证据表明科德林顿因为被害者痛苦或表现出害怕而变得更加兴奋或产生性唤起。

在笔者看来，“虐待狂”一词用于描述这起犯罪是不准确和错误的。这起犯罪本身确是十分恐怖的，但是否属于虐待狂，无须作者更多的解释。

参考文献

1. Abel, G. and Rouleau, J. (1990)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Sexual Assault", in Marshall, W. L., Laws, D., and Barbaree, H. (Eds)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Issues, Theories and Treatment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Press.
2. Bain, J., Dickey, R., Hucker, S., Langevin, R., Wortzman, S. and Wright, R (1988) "Sexual Sadism: Brain, Blood, and Behavior",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528, 163 ~ 171.
3. Birnes, W. and Keppel, R. (1997) Signature Killers: Interpreting the Calling Cards of the Serial Murderer, New York: Pocket Books.
4. Bradford, J. M. W. and Gratzer, T. (1995) "Offender and Offense Characteristics of Sexual Sadists: A Comparative Study",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40 (3), 450 ~ 455.
5. Brittain, R. (1970) "The Sadistic Murderer", Medicine, Science and the Law, 10, 198 ~ 207.

6. Burgess, A. W. , Burgess, A. G. , Douglas, J. and Ressler, R. (1992) *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7. Burgess, A. , Douglas, J. and Ressler, R. (1988) *Sexual Homicide: Patterns and Motive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8. Burgess, A. , Groth, A. N. , Holmstrom, L. and Sgroi, S. (1978) *Sexual Assaul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9. California v. Coddington (2000) July 3, 2000 (97 Cal. Rptr. 2d 528).
10. Cleckley, H. (1988) *The Mask of Sanity*, 5th ed. , Augusta: C. V. Mosby.
11. Cooper, C. (2000) " Killer's Death Sentence Upheld by High Court", The Sacramento Bee, July 4.
12. De Burger, J. and Holmes, R. (1988) *Serial Murder*,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3. De Sade, M. " Justine", in Seaver, R. and Wainhouse, A. (Eds.) (1990) *The Marquis de Sade: Justine, Philosophy in the Bedroom,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Grove Press.
14. DSM – IV (1994)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4th ed. ,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5. Dietz, P. (1986) " Mass, Serial and Sensational Homicides", *Bulleti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62 (5), 477 ~ 491.
16. Dietz, P. , Hazelwood, R. , and Warren, J. (1990) " The Sexually Sadistic Criminal and His Offense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18 (2), 163 ~ 178.
17. Dietz, P. , Hazelwood, R. , and Warren, J. (1995) " The Criminal Sexual Sadist", in Burgess, A. W. and Hazelwood, R. (Eds.), *Practical Aspects of Rape Investiga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2nd ed. New York: CRC Press.
18. Dietz, P, Hazelwood, R. and Warren, J. (1996) "The Sexually Sadistic Serial Killer",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41 (6), 970 ~ 974.
19. Eckert, W. G. (1981) " The Whitechapel Murders: The Case of Jack the Ripper",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orensic Medicine and Pathology*, 2 (1), 53 ~ 60.
20. Eckert, W. G. (1989) "The Ripper Project: Modern Science Solving Mysteries of Histor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orensic Medicine and Pathology*, 10 (2),

164 ~ 171.

21. Feister, S. and Gay, M. (1995) "Sad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in Livesly, W. J., (Ed.), The DSM – IV Personality Disorder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2. Geberth, V. (1991) "Lust Murder: The Psychodynamics of the Killer and the Psychosexual Aspects of the Crime", Law and Order, (June), 70 ~ 74.
23. Geberth, V. (1996) Practical Homicide Investigation, 3rd ed., New York: CRC Press.
24. Geberth, V. and Turco, R. (1997)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Sexual Sadism, Malignant Narcissism, and Serial Murder,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42 (1), 49 ~ 60.
25. Groth, A. N. (1979) Men Who Rape: The Psychology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Press.
26. Hazelwood, R., Reboussin, R., Warren, J. and Wright, J. (1991) "Prediction of Rapist Type and Violence from Verbal, Physical, and Sexual Scale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6 (1), 55 ~ 67.
27. Holmes, R. (1991) Sex Crimes,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28. Holmes, R. and Holmes, S. (1996) Profiling Violent Crimes: An Investigative Tool, 2nd ed.,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9. Knight, R. A., Lee, A., Prentky, R. A. and Rosenburg, R. (1988) "Validating the Components of a Taxonomic System for Rapists: a Path Analytic Approach", Bulletin of the America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Law, 16 (2), 169 ~ 185.
30. Krafft – Ebing, R. (1997) Psychopathia Sexualis, London: Velvet Publications.
31. Langevin, R. (1990) "Sexual Anomalies and the Brain", in Marshall, W. L., Laws, D., and Barbaree, H. (Eds.),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Issues, Theories, and Treatment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Press.
32. Ohio v. Back (2001) No. 18485, July 27, 2001 (Ohio App. 2 Dist., 2001).
33. Ressler, R. and Schachtman, T. (1992) Whoever Fights Monster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34. Seaver, R. and Wainhouse, A. (Eds.) (1990) The Marquis de Sade: Justine, Philosophy in the Bedroom,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Grove Press.
35. Simon, R. (1996) Bad Men Do What Good Men Dream: A Forensic

Psychiatrist Illuminates the Darker Side of Human Behavio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36. Turvey, B. (1999) Criminal Profiling: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vidence Analysis, London: Academic Press.

37. Turvey, B. (1994) [Interview with Jerome H. Brudos] Author's Notes, Unpublished, Oregon State Penitentiary, June 7, 1994.

第 22 章 弑亲案件

Brent E. Turvey, M. S.

我盼望着他（她）们出错，这样我就可以抽打他（她）们……我每抽一鞭心里就想道：现在你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威廉姆·福克纳（William Faulker）：《我临死时》

一贯欺侮孤寡是精神变态者的标志。

黑尔（Hare, 1993, p.145）（在对殴打妻子的男性的研究中发现，他们之中 25% 患有精神疾病）

众所周知，弑亲案件（domestic homicide）在美国较普遍地存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一定比例的弑亲案件。弑亲案件是指家庭成员、有亲属关系或伴侣关系的人之间发生杀害的案件。通常是由于家庭暴力的日积月累及长期的争吵或虐待发展至极所致。联邦调查局的统计数据表明，女性被害人中由于弑亲案件而导致死亡的数目超过半数（BJS, 1996），并且通常还将导致行凶者本身或更多人的死亡。^①

然而，不广为人知的是，有许多家庭虐待或遗弃造成的死亡并未被统计到弑亲案件中，这些死亡常常由于父母之间的不和进而波及子女，表现为虐待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执法部门处理此类弑亲案件和其他类似的犯罪时通常是失败的（Johnson, Lutz and Websdale, 2000），其原因很多，而发生在亲人、子女及父母之间的杀害案件的确是一个严重且残酷的事实。而且，实际

^① 据 1994 年一项来自佛罗里达的研究表明，38% 的弑亲案件造成多人丧生，通常是配偶间的杀害与自杀或子女谋杀（被杀）的混合。据 1995 年至 1996 年一项来自旧金山的研究表明，实施弑亲案件的男性中，有 43% 是杀害了其妻子后自杀（Hallinan, 1997）。

情况比已知的更糟糕。^①

危险度

弑亲案件的被害危险率取决于虐待过程的发展程度，虐待也是发生相关行为的动力特征。约翰逊等人（Johnson et al.，2000）的研究表明，有很多情况可增加一个人遭受弑亲案件的危险率，就女性被害者而言，高危因素如下：

1. 家庭暴力的历史。
 - 暴力的升级
 - 曾有过谋杀的动机（如扼喉）
 - 强奸及性暴力
 - 对宠物的暴力
 - 孕期暴力
2. 逃避暴力关系。
 - 婚姻关系的疏远
3. 过度的占有欲。
 - 极度妒忌
 - 暗中监视
 - 对关系的强迫症
 - 自杀企图或威胁
4. 警方介入的历史。
5. 罪犯的犯罪史。
6. 曾扬言要杀人。
7. 酗酒、吸毒。
8. 一方曾要求给予保护。
9. 对外遇（背叛）的激情反应。

^① 约翰逊等人（Johnson et al.，2000）的研究表明，在佛罗里达州 FDLE 统计的 1994 年的弑亲案件是 230 例，实际上后来证实是 319 例，比官方统计的多 1/3。1995 年 FDLE 统计的弑亲案件是 195 例，实际上后来证实是 295 例。关于统计错误的另一种解释是，执法部门没有把同居的未婚男女之间的杀害案计算在内。

10. 子女监护争议。
 - 曾有过杀害或绑架孩子的企图
 - 残酷虐待子女
 - 对儿童有过性虐待
11. 有犯罪倾向的精神疾病（妄想及偏执狂、精神错乱、抑郁）。
 - 儿童时代严重受虐
12. 做过人质。
13. 孩子是她的而并不是他的。
14. 环境出现变化。
 - 失业
15. 她的恐惧。

基于事实及案例中被害人的感受，这些研究能够使法院人员在面对以上各种因素之一时提高警惕性，这远远比研究哪一种危险率更高或死亡率更高重要得多。

犯罪心理画像者在所有被害行为学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寻找并思考这些因素。以上任何一项或多项因素的出现（第13项和第14项除外）足以使一个人置于弑亲案件的高危境地。

对于犯罪心理画像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怎样发觉并解释在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虐待动机，什么是其确切的动机，进而评估所涉及的危险程度。根据米尔（Mills, 1999）的研究，亲密关系中的情感虐待动机的描述可以通过以下的分类方式（类型学）。特别注意的是，以下任何一种行为动机类型都不能排除虐待的动机。米尔甚至认为，“被害人”一词已成了性别词汇中的“女人”的代名词：^①

1. 抛弃（rejection），包括找茬、惩罚或审查被害人，拒绝帮助她们，在日常生活中蔑视她们的意见。
2. 凌辱（degradation），包括口头辱骂被害人和身体上的凌辱。

^① 有大量的相关资料都是以家庭暴力中女性被害者为主题的。作者认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女性是家庭暴力的被害人，但是，男性也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被害人。考虑到这一点，“被害”一词更适于用于客观的行为动机类型。

3. 恐吓 (terrorization), 包括使被害人本人或其最亲爱的人面临受伤害的威胁, 通过玩弄被害人的恐惧来惩罚她们, 这种情况还可包括给被害人设定一个不符合现实的目标并使之面临如果达不到就会受到损失或伤害的威胁。

4. 使之社会孤立 (social isolation), 包括阻止被害人参加一般性正常的社交活动及与他人交往。

5. 负向社会化 (missocialization), 包括通过鼓动被害人进行犯罪活动或做坏事、产生过失, 从而摧毁被害人。

6. 操纵 (exploitation), 包括操纵被害人使之遮掩虐待者及施虐行为方式。

7. 情感怠慢 (emotional unresponsiveness), 包括对被害人态度冷漠、毫不关心, 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与被害人有所交流, 这种情况还包括对被害人不表示好感、关怀和爱。

8. 严密禁锢 (close confinement), 包括限制被害人的活动, 甚至达到监狱里监禁的程度。

故意

法院审理这类案件时发现,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弑亲案件往往发生于情感爆发之时。例如, 恋人间的谋杀案件可能发生在其中的一方对后来有伤害行为的一方坦承自己另有恋情之后。这样的杀害起因被辨明后, 此案将由谋杀降级为非故意杀害 (Smith, 2000)。由此可见, 犯罪心理画像者或许应使自己在侦查弑亲案件时考虑作案人的故意问题。检查犯罪现场及有关侵害时, 也可以得到对故意这一动机问题的启示和理解。

如史密斯 (Smith, 2000) 所述:

任何案例中谋杀的程度取决于被告的故意、目的或设计, 正是因为 (我们) 辨别作案人是否有主观恶意的因素, 才能把谋杀和过失杀人相区别。因此, 一方面, 谋杀被普遍看做是一个人被另一个对其怀有蓄意怨恨的人的杀害; 另一方面, 如果一个杀人犯在一种充足的、合理的力量促使下因为激动而杀人, 且这种杀人属一时冲动, 若一段时间过后, 情感平和、理智恢复后, 他不会用杀人这种恶毒、残忍、毫无理智的办法处理事情, 这样的杀人犯, 无论他怀有的蓄意怨恨是显现的, 还是潜在的, 甚至是有强烈故意的, 都被

看做是定罪较轻的故意杀人罪。

但是，并非所有的弑亲案件都出自于失控的突发式暴力行为。许多犯罪嫌疑人长期对配偶的施虐，施虐者非常精心地计划并选择他们的行动方式：

1. 他们可以在时间和地点上进行选择，从而实施对身体的暴虐行为。他们很可能在其私有领地的住宅内对其伴侣和（或）子女实施身体暴虐，而不是在公众场合。

2. 他们可以在施虐的对象上进行选择，他们只对伴侣和（或）子女实施身体暴虐，而不会针对他们的老板或同事。

3. 他们会特别注意伤害被害人身体的部位。他们经常伤害的是那些能够被衣服盖住的部位。或者，如果他们不想让被害人离家外出，他们所选择的伤害部位可能是那些所有人都能看到的部位，这样，如果被害人离家外出，就会面临向别人解释这些伤口的尴尬。

4. 他们可以考虑对被害人施虐的时间长短及严重程度。因为他们还会顾及到这种伤害不至于影响家务劳动或其他的他们期望做的事情。

这类已经谋算好了的行为模式证明其犯罪时并未失控。虽然表面上是情绪性的，但行为是清晰的、蓄意的，甚至那些包含愤怒或本身目的就是发泄愤怒的犯罪可能是精心策划或仔细思考过的。

为了区分这些案件的性质，犯罪心理画像者必须全面地判断每个犯罪是属于情感驱动，还是策划者的蓄意谋害，或是两者的混合。

印地安纳州诉代顿·埃文斯一案（2000）^①

玛丽安·艾伦（Marianne Allen）最近结束了她与代顿·杜南·埃文斯（Dayton Duane Evans）之间的长期同居关系，埃文斯是玛丽安·艾伦的3个孩子之中一个孩子的父亲。她开始与詹姆士·哈里斯（James Harris）约会。根据印地安纳州诉代顿·埃文斯案件的记载（Indiana v. Dayton Evans, 2000）：

……1995年6月24日，玛丽安和她的新男友詹姆士一起躺在玛丽安家里的床上。他们醒来时发现玛丽安以前的男友埃文斯（即被告）一手拿着一把刀正监视着他们。被告问：“就是这个原因使你不让我回来？”当被告用刀刺向玛丽安时，詹姆士用一条盖被掩护了她。接下来是在被告和詹姆士之间发

^① 原文为：INDIANA v. DAYTON EVANS, 2000（译者注）。

生了一场格斗，二人从卧室打到客厅，在楼梯下结束。当时，被告在詹姆士身上行刺数刀后将他杀死。

埃文斯自称，“目击了玛丽安与哈里斯发生性关系并进行了拍照”。他进一步声称，在犯罪过程中，他“体味着同居5年中所有的一切，包括全部的爱与愤怒”（Indiana v. Evans, 2000）。州法院审理时有争议的是有事实表明埃文斯曾策划过，且这种犯罪不能被说成是一时感情冲动而导致的犯罪主要基于以下事实（Indiana v. Evans, 2000）：

1. 在登上她家的楼梯后，意识到她和另一个人在她的床上（他听到了音乐声和呻吟），埃文斯走下楼梯拿了刀。

2. 在又一次上楼之前，埃文斯切断了电话线。

3. 埃文斯承认，进入房间之前，他在门外站了一分半钟。

他被指控为有预谋的并且是故意的蓄意谋杀，定罪后驳回了他的上诉。

恋人间的谋杀

恋人间的谋杀是指现在或从前有过亲密关系的一方杀害另一方。侵害人与被害人不一定同居过，但必须是被卷入某种很深的个人关系。通常它是一种性关系或一种情感关系，其动机是不可抑制的愤怒/报仇、利益，或是两种动机的混合。这里将引用数个恋人间的谋杀案例。引用多起这类案例的原因很简单，这种谋杀的发生率很高。

为了能够对恋人间的谋杀案件所涉及的广泛性和可能性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参考以下案例：

恋人及同事关系的谋杀

俄亥俄州诉杰瑞·哈斯勒一案（2000）^①

1995年11月19日，杰瑞·哈斯勒（Jerry F. Hessler）枪杀了3个成年人和一名4个月大的女孩，并打伤了另外两个人。在这一年前，他被银行解雇了，遭受解雇之前，曾被上述被害者之一控告为性骚扰。另一被杀害者是其前女友的父亲。此杀害事件的经过持续了3个小时，延及约121公里（Ohio

^① 原文为：OHIO v. JERRY HESSLER, 2000（译者注）。

v. Hessler, 2000)。

背景

据俄亥俄州诉杰瑞·哈斯勒一案 (Ohio v. Jerry Hessler, 2000) 的记载:

哈斯勒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哥伦布市 (Columbus) 的摩蒙 (Mormon) 教堂认识了朱蒂 (Judy Stanton), 两人交往数年后开始谈婚论嫁。1980 年, 哈斯勒离开其居住地前去进行卫国培训, 回来后发现朱蒂和他的朋友道格 (Doug Stanton) 约会, 事实上, 朱蒂和道格已经决定结婚了。这一消息使哈斯勒的情感极度受挫。不顾他们已经搬出哥伦布市的事实, 哈斯勒跟踪他们, 并给朱蒂寄包裹和卡片。

在与朱蒂关系破裂后的一段时间里, 哈斯勒数次进入精神病医院。他被诊断为严重的抑郁症、临界状态的个性失调、严重情感紊乱、严重抑郁、依赖性及混有癔病、依赖性和被动——攻击特点的性格紊乱。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哈斯勒遇到了劳安 (Laurar Griffin), 两人的相遇也是在摩蒙教堂, 他们成了朋友。不幸的是, 她后来开始了与摩蒙教堂里的大卫 (David Stacey) 约会, 而大卫也是哈斯勒的好朋友。哈斯勒与劳安的关系开始破裂, 哈斯勒开始偷偷跟踪并骚扰他们俩人。1988 年, 劳安和大卫双双离开了哥伦布市前往夏威夷 (Hawaii), 原因是劳安对哈斯勒产生了恐惧。像对朱蒂和道格一样, 他跟踪他们到了夏威夷, 并继续骚扰他们。

后来, 又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只是这次的情况更糟。根据俄亥俄州诉杰瑞·哈斯勒案件 (Ohio v. Jerry Hessler, 2000) 的记载:

1991 年, 上诉人作为客户服务代表受聘于哥伦布斯一家银行, 在工作中结识了 1993 年进入这家银行工作的特蕾西 (Tracey Myers), 她很快就成了上诉人的爱恋对象。上诉人对他母亲说他终于找到了可以替代朱蒂的人。起初, 特蕾西接受了上诉人的求爱, 但后来她提出离开他, 她已移情别恋于这家银行的另一个职员布莱恩 (Brian Stevens), 并于 1995 年和布莱恩结婚。上诉人继续不断地送给特蕾西小礼物和表示多余的关心。特蕾西向银行主管抱怨此事, 该银行已遇到过艾米·道格 (Amy Wells) ——已与道格 (Doug Wells) 结婚的职员同样的投诉。

主管召见了上诉人。1994 年, 上诉人签署了一份材料, 声明他不再与特

蕾西接触，并同意如果再这样做，银行可以此作为理由解雇他。后来他违犯了他所签署的规定，他的主管马克（Mark Campolito）在银行经理（Kim Ogilbee和 Mary Freeh）的支持下，于1994年10月解雇了他。

像和朱蒂（Judy Stanton）分手后一样，上诉人因失业又一次极度受挫。他被解雇后，开始破坏他母亲的房屋并辱骂她，他母亲对他的行为非常恐惧，以至于搬出去和她母亲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在上诉人最小的弟弟回家去取一些帐篷工具时，上诉人持枪追赶弟弟。1995年春天，这些事促使上诉人的家人与警方、律师、哥伦比亚的检察院进行了联系，包括社区健康服务人员，目的是对上诉人给予帮助。

1995年5月，上诉人被强迫送进精神病医院做脑电图检查，其记录显示，上诉人被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失常、受虐类型、一种可能的周期性发作的失常及从属型人格。1995年7月20日，上诉人症状平稳，被释放出来。1995年8月以后，上诉人不再进行精神卫生方面的指导并停止了医学治疗。

11月19日，哈斯勒去了他母亲的住所，拥抱她并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那天，在去他母亲那里以后，他带了几枝半自动手枪，穿了防弹衣，并带了4个装满汽油的塑料罐，去了布莱恩和特蕾西的家。布莱恩在他家的走廊上发现了哈斯勒，史蒂文（即布莱恩）警告他让他离开并说要报警，然后，史蒂文回到屋里并锁了门。

哈斯勒开始从门外向里开枪，布莱恩和特蕾西的朋友鲁思（Ruth Canter）的腿部受了伤，但鲁思设法躲进楼上的小屋里使自己在场袭击中逃生。当枪击停止时，她听见哈斯勒离去，她下楼发现布莱恩、特蕾西和他们的女婴阿曼达（Amanda）躺在地上，濒临死亡。他们7岁的儿子里德（Reid）没有受伤。前门已被踢坏，脱离了门框，汽油罐落在了客厅里。

布莱恩的肚子上被打了一枪；特蕾西至少被枪击5次，头上和肚子上有致命的枪伤；她还在抱着她的被连续枪击2次的女婴。虽然警方到达时他们还活着，但最终3人都死亡了。

以下概述了接下来所发生事情（最高法院记载，2000）：

晚上7时，哈斯勒从他的住所前往Griffin的住所，他在另一处即Clintonville枪击了在1994年10月解雇他的银行主管马克（Mark Campolito）。

然后，他离开 Columbus 地区向北前往 Ashland，在那里，他向朱蒂（Judy）和道格（Doug Stanton）的家里进行了 7 次枪击，斯坦顿（Stanton）夫妇分别是哈斯勒的前女友和朋友，他们在哈斯勒前去进行卫国培训时开始的约会。斯坦顿在哈斯勒枪击他家时也对哈斯勒开了枪，哈斯勒当时穿着防弹服，只受了轻伤。

当 Ashland 的警察控制住哈斯勒的行动时，已大约是在晚上 10 时 30 分，警察们在他的汽车里发现一枝已装备好的口径为 9mm 的半自动手枪和 300 多发备用子弹，他们还发现 11 包火柴和 3 个塑料汽油罐。

最后，警方在哈斯勒的车中抓获他时，发现他身上有 280 粒铅弹、55 粒全金属弹套和 40 粒空心子弹。在他的车里还发现有地址通讯簿、双筒望远镜、刀、大锤、防水防震耳塞和 11 包火柴，还发现列有以下名单和地址的一小片纸，他们是：Kim Ogilbee、Thane Griffin、Mark Campolito、Mary Freeh、Tracey Stevens、Doug 和 Amy Wells（Ohio v. Hessler, 2000）。

根据被害人的数量及作案人有明确的故意和行凶计划，哈斯勒被指控为多重恶性谋杀罪并被判处死刑。

讨论

这起案件是将狂暴情绪和愤怒直接指向恋人、同事和工作上级并对他们施暴的情况。进行连续的枪击以及所涉及的武器、弹药数量表明，哈斯勒故意对所列出的被害人名单上的人们制造大量的杀伤，他感觉这些人都曾得罪过他。防弹服表明他想在战斗中存活足够长的时间，以使他能够杀完所有想杀的人。但是，他在警方面前表现出的平静及他去看望他的母亲时的情况似乎说明他做好了死亡的准备。汽油是让人迷惑的东西，也许他想焚烧被害人的家并且在他们逃跑时对他们开枪，也许他想在他们都死了以后烧掉他们的家。他准备了比完成这些所需要的还要多的火柴。不管怎样，他把汽油落在了被害人的家里，除此以外，并没有拿它做什么，这看起来似乎他拿汽油没有目的（这里也存在他曾想用汽油但被阻止了的可能性）。

这类案件说明，即便是那些精神病患者在恰逢某种环境时也能形成一定程度的杀人故意，然后进行策划并施展一定的技能和谋略去谋杀他人。

恋人间的谋杀

佛罗里达州诉佛洛伊德·罗伯茨顿一案（2000）^①

佛洛伊德·罗伯茨顿（Floyd Roberston）因其1996年9月16日枪击其女友玛丽亚（Maria Nelson）而被指控犯有二级谋杀罪。当玛丽亚要求罗伯茨顿从她的住所搬出去后，他用一枝40鲁格手枪枪击了她。罗伯茨顿以前是军队枪支爱好者，并且对毒蛇有很大的兴趣。

背景

据佛罗里达州诉佛洛伊德·罗伯茨顿一案（Florida v. Floyd Robertson, 2000）的记载：

当警方到达现场时发现，罗伯茨顿的女友正在卧室里奄奄一息，胸部有伤。罗伯茨顿声称，他本想从卧室的壁橱里取出这枝40鲁格手枪擦洗它，枪意外走火击中了她。在审问中，法庭准许原告对被告进行间接测试，尽管被告方反对原告的提问，因为该问题与本案的审理无直接关系。该问题是“被告是否曾经用武器威胁过他人”，被告的回答是“否”，法庭准许被告的前妻作为提供反驳他的陈述的证词的证人，尽管被告方提出反对。他的前妻声称，6年前，被告在生她的气时，对着她和他们的女儿挥舞一枝已上好子弹的AK-47手枪。

陪审团不认为这是一起偶然事件，并确定了罗伯茨顿枪杀女友的罪行，这是由于此案中的一些无可争议的与事实相矛盾的地方，而不是由于前妻的证词。与事实相矛盾的地方开始于警方刚一到达现场的时刻，当时发现玛丽亚躺在她的床上，处于半清醒状态。侦查人员脱掉她的衬衫，看看他是否能给她医疗上的救助。当时没有迹象表明罗伯茨顿曾试图给女友任何医疗上的救助，尽管他曾经当过医生。另外，根据佛罗里达州诉罗伯茨顿·佛洛伊德案件（Florida v. Floyd Robertson, 2000）的记载：

现场的侦查人员证实，他没有发现任何擦洗用具，并且枪的扳机如不扣动是不可能发射的。医务检查人员证实，被告对警方所说的枪是意外走火，不符合子弹的飞行角度或床的角度，在拨911报警后，被告把枪移走了，他

^① 原文为：FLORIDA v. FLOYD ROBERTSON, 2000（译者注）。

说，他不想让枪在警方到来时搁在被害人旁边的地上。

.....

后来，被告声称，他开始拿出枪来是想让玛丽亚看看它，这与他先前所说的“是要擦洗它”不相符，回顾所做的记录，被告还有别的一些言辞自相矛盾。例如，被告声称，在玛丽亚被击中后，他将她抱起，看见伤口在出血，但是，当警察到达现场时并没有迹象表明被告曾给予过医疗救助，尽管他曾是急救医生和血液透析师。在被告的手上和衣服上并没有血，虽然房间里配备了家用医护器具，但被告没有用毛巾或器具给玛丽亚止血。

但是，佛罗里达州（Florida）的上诉法院发现，关于对与罗伯茨顿和前妻的那件小事有关证词的承认是一个可逆转的错误，因为他的人品并没有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他们发现，并没有提供关于罗伯茨顿人品好或没有暴力行为的证词，他声称枪击是由于意外并不意味他的人格如何（Florida v. Floyd Robertson, 2000）。^①

讨论

由于事件中除了开枪者并无直接目击者，这起案件的判断整体是靠建立事情的发展过程、环境和罗伯茨顿的证言可靠性（前后过程中）进行。罗伯茨顿曾试图对警方隐瞒他与 Nelson 夫人之间的一次争论的记录，他的陈述中有许多破绽，证词表明，他曾撒谎说他在过去没有用武器威胁他人（恐怖行为），这正是犯罪心理画像者建立被害行为学、事情的来龙去脉及危险率所需要的那一类背景信息。

遗憾的是，法庭常常不准许陪审团听取这类被认为是带有成见的信息。

^① 持异议的法官特别反感陪审团的二级谋杀判决，判决基于事实及法庭审问时适时准许被告的前妻反驳被告的证词。作者在此案中对法律的诠释比对普遍意义上的诠释更热衷。根据 Florida v. Floyd Robertson（2000）的记载：

“被告清楚地声明枪击是意外事件后，在接受测试中声称他从未用武器威胁过他周围的人，基于这个陈述，被告前妻被请出来做了反驳被告的证词，法庭审问强调：‘如果你的当事人在证词上撒谎，他有证据证明你的当事人撒谎，他就有权表示出来。这就是证词的危险性。’前妻随后说被告曾用枪威胁过她。在我看来，被告在气愤之时用枪威吓另一个女人是与案件有关的和实用的信息，如果它是相关的，其他犯罪迹象或行为证据显示相关则是可接受的。”

家庭子女被杀案

家庭子女被杀案是指孩子的监护人杀害孩子的情况。作者经常被要求调查子女被谋杀案件，尤其是在警方集中注意力于陌生犯罪嫌疑人作案和未能在被害人家里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在所有的子女被杀案中有一条非常简单的原则：首先要调查和排除家庭成员作案的可能，然后是朋友、邻居；如果有足够人手，其余的侦查人员应同时调查陌生人犯罪的可能性（当地在册的性骚扰者、近期假释的儿童骚扰者等）。

根据1995年加拿大矫正服务中心（Correctional Service, 1995）的研究：

那些在1周岁前（所谓婴儿期）被杀害的孩子绝大多数是被家庭成员所杀害的，通常凶手都是他们的父母（约占这类被害人的3/4），凶手是父亲或是母亲的几率各占50%。这些被害孩子的极少数是被熟人杀害的（如保姆或朋友），更少的一部分是被陌生人所杀。

这些信息对于犯罪心理画像者在子女被杀案件中确定优先调查对象是有用的，但它也不是绝对的。像这样的一种数字并不是证据，它仅仅指出了进行调查的方向，顺这种方向开展工作不是一定会有成果。必须进行调查，数字不能替代彻底的调查。

为了更好地理解家庭子女被杀案所涉及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试析以下案例：

玛丽·诺亚案件（Marie Noe）

1999年，宾夕法尼亚州Kensington的70岁的玛丽·诺亚（Marie Noe）承认犯有二级谋杀的8条罪状。她从1949年开始到1968年之间的19年里，将她的10个孩子中的8个孩子窒息致死。她是一个家庭主妇，也是一家工厂的非全日制工人。几十年中，她一直声称：她的孩子们死于摇篮里，现在的名词是婴儿期猝死症，她的另两个孩子也死了，一个是死胎，一个死于出生后6小时。

每次作案都是她单独与孩子们在家时，她说他们在睡眠中死亡。

1998年4月，一篇题为“从摇篮到坟墓”的文章（Fried, 1998）引发宾夕法尼亚州的警方重新进行对诺亚所生10个孩子之死的长达30年的积案调

查。她在文章发表后的一天供认了罪行。据弗里德（Fried，1998）所记载的诺亚的供认如下：

在对诺亚的引人注目采访中，她坦率地将保守了几十年的秘密说了出来。她说，她用一个枕头将她的孩子们窒息致死，她仅仅能特别地回忆起4个孩子的死亡情况：前3个孩子——1949年出生的理查德（Richard）、1951年出生的伊丽莎白（Elizabeth）、1952年出生的杰奎琳（Jacqueline）以及第5个孩子1958年出生的康士坦（Constance）。她说她不记得1955年对亚瑟（Arthur Jr）做了些什么，这个孩子正好在她被强奸后9个月那天出生。她说，她曾被一个陌生人强奸后被用她丈夫的领带绑在卧室的壁橱里。她也回忆不起来她是如何将Mary Lee（1962年）、Cathe（1966年）和Little Artie（1968年）致死的，他们3人的死亡在20世纪60年代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但她并不否认是她所为。

在她的供罪中，她声称她知道她这样做是错的，并希望被警方发现，她肯定自己患有精神疾病。目前，她被囚禁在家里，服刑于监狱外，因为她是有病的77岁丈夫亚瑟·诺亚（Arthur Noe）的惟一照看人。她用拐杖行走，腰间戴着电子监视装置。

伊冯·N. 帕多案件（Yvonne N. Padoron）

22岁的伊冯·N. 帕多（Yvonne N. Padoron）接受控辩，供认犯有伤害孩子罪。起初，她因于1994年10月13日将她21个月的女儿杰西卡（Jessica）窒息致死而被指控为重罪谋杀。她患有孟乔森综合病征（Munchausen），这种患者需要严加关注和同情，因其妄想通过伤害被他们看管的人来寻求关注和治疗。她承认以前曾两次试图将女儿窒息致死，其中一次是当杰西卡还在医院里时（Liebrum，1996）。

塔比瑟·沃尔龙德案件（Tabitha Walrond）

塔比瑟·沃尔龙德（Tabitha Walrond），21岁，在纽约的Bronx区被指控犯有因忽视造成的杀人罪。她的7周大的儿子Tyler因营养不良死于1997年8月27日。

根据她的法庭陈述，她19岁时生下她的儿子，并每天用母乳喂养他，因为（Whyte，1999）：

她听说母乳喂养孩子是最好的方法。她在准备生产的过程中去学习了相关的基本知识。但她从未听说过，她在15岁时曾做过的乳房外科手术会使婴儿在接受母乳喂养时面临营养不良的危险。

后来，她没有给儿子治疗，尽管她有权进入合法的医疗救助计划。据原告所述，她是有意忽略这些，并故意让儿子挨饿，以报复她的前男友，即这个孩子的父亲，因为他离开她去找了另一个女人。

迈克尔和凯思琳·金特里案件（Michael and Kathleen Gentry）

56岁的迈克尔（Michael H. Gentry）和他的妻子46岁的凯思琳（Kathleen）在加州的Van Nuys被指控于1996年使他们15岁的有残疾的女儿琳瑟（Lindsay）挨饿致死，该夫妇分别被指控为杀人凶手。琳瑟（Lindsay）死于1996年2月6日，当时体重为20千克，身高约140厘米，患有所谓肌肉营养不良的先天异常。但是，一直争议的是多年来营养不良与父母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才是孩子的死因（Gibbons, 2000）。

丹尼斯和洛里·尼克松案件（Dennis and Lorie Nixon）

丹尼斯和洛里·尼克松（Dennis and Lorie Nixon）是宾夕法尼亚州Hollidaysburg的教堂聚会信徒成员，他们被指控因拒绝给他们16岁的女儿进行医院治疗使她死亡。香农·尼克松（Shannon Nixon）死于糖尿病中毒，她的血糖浓度上升12倍，本来是可以治愈的。但其父母通过祈祷来代替医疗，终致香农昏迷，而后死亡。她的父母被指控有过失使孩子的健康幸福陷入险境的杀人罪（Gibb, 2001）。

德里克·赫尔尼克案件（Derrick Helmick）

德里克·赫尔尼克（Derrick Helmick）被指控犯有一级谋杀罪。他于2000年5月30日在弗吉尼亚州的弗吉尼亚海滩一围栏里猛击他的9周大的女儿道恩·玛丽·赫尔尼克（Dawn Marie Helmick）的头部，将她致死。据医疗诊断，她遭受了大面积的脑伤而被送往医院，但最终死于2000年6月2日。赫尔尼克是一个鳏夫，他36岁的妻子在几周前的5月18日死于心脏病。

原告称，赫尔尼克杀死他的女儿是想逃避以后的抚养责任，然后与一个在俄亥俄州（Ohio）的年轻女人同居（Frank, 2001）。

莫尼卡·伯杰案件（Monica Berger）

莫尼卡·伯杰（Monica Berger），41岁，因其于2001年7月6日刺死她两岁的儿子约瑟夫（Joseph），在肯德基的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被捕。据杰弗逊县副验尸琳达（Linda Knopf）所述，约瑟夫是被用大刀在躯干部位砍了数次致死的（相关新闻，2001a）。伯杰夫人是孩子的单亲家长，她是印地安纳波里斯天主教大教主的侄女。谋杀时，她刚刚从印地安纳的杰斯坡搬进路易斯维尔，正在寻求同她的丈夫离婚。被捕后，她被从监狱转进精神诊断机构，进行精神病方面的评估。

杰罗尔德和伊·拉赫布案件（Jerrold and Eve Rahtbun）

33岁的杰罗尔德·拉赫布（Jerrold Rahtbun）和他29岁的妻子伊（Eve）供认，犯有用手铐铐住他们8岁的女儿进行折磨的罪行。他们承认将大女儿用手铐吊起并用钉子刺她以惩罚她，他们让她4岁的妹妹帮他们进行这种惩罚。由于8岁的女儿曾让猫出了家门所以被逼吃猫粪（相关新闻，2001b）。虽然这个案子没有导致杀人，但它极易导致且包含了杀人的成分，因为它是极度的虐待。

安德里亚·亚特案件（Andrea Yates）

得克萨斯州休斯敦（Houston）的36岁的安德里亚·亚特（Andrea Yates）承认，他于2001年6月20日溺死了她的女婴和4个年幼的儿子。在杀死了所有的孩子后，她叫警察到她家。警察发现2岁的卢克（Luke）、3岁的保罗（Paul）、5岁的约翰（John）和6个月的玛丽（Mary）的尸体上面盖着单子被放在一间屋子里的床上，7岁的诺亚（Noah）在浴缸里。她的丈夫是拉塞尔·亚特（Russell Yates），一名计算机工程师，在约翰逊航天中心工作，参与航天火箭计划。谋杀发生时他不在家（Sabo，2001）。

亚特夫人曾经患抑郁症，而且发案时正在接受治疗。另外，她的父亲也于近期亡故（Sabo，2001）。根据警方提供的她的供词（Flock，2001）：

她的大儿子、7岁的诺亚进到浴室后看见她正在溺死他6个月大的妹妹玛丽，于是他想逃跑，但被她拽回浴室也将他溺死。

她已被指控犯有重级谋杀罪，并判处死刑，后转进精神诊断机构接受精神方面的评估和治疗。

罗宾·帕克案件（Robin Parker）

2001年6月26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33岁的罗宾·帕克（Robin Parker）和她的3个孩子（两个女孩和1个男孩）被她的未婚夫斯蒂文·威廉斯（Steven Williams）发现死在自家的车库地上。这些孩子是：10岁的卡塔亚（Cartara Quantae Williams）、6月27日将满3岁的修特娜（Shonteona Marie Williams）和11个月大的男孩奎森（Quasean Devon Williams）。威廉斯是两个最小孩子的父亲，他下班回家时在车库里发现了尸体，车库里充满燃气废气，并且汽车仍开启着。验尸官确认，他们4个人都死于一氧化碳中毒（Coroner, 2001）。

杀害发生时，帕克是学校的一名看管员，正在接受因在一家公寓做综合经理时偷盗9000多美元之事的调查。她还曾因盗用金钱、伪造钞票被判重罪，以及因3项恶劣行为而被指控犯有轻罪。一项调查表明，她曾因有严重的财务问题，她家的水管被关闭（Coroner, 2001）。

家庭老人被杀案

老人被杀案是指老人的护理人（通常是一个家庭成员、私人护理人员等）杀害其所应护理的老人。老人是指65岁或65岁以上的人，由于体力和脑力所限不能正常进行日常活动。护理人是指对老人进行照顾、看护、控制或托管的人（Powers, 2001）。

犯罪心理画像者应接受的告诫是，在一位老人被害的行为研究方面要特别细心地调查，因为他们不愿报告以前所受的虐待，这也许是由于他们认为受到不好的待遇是正常的，认为法律不能帮助他们，或许是由于事实上他们太孤立，接触不到人群，以至于没有机会求助。对于不能报告受虐的最常见原因也许是事实上90%虐待老人的人是被害人的家属（Korpus, 2001）。根据科尔普照斯（Korpus, 2001）所述：

被害人出于害怕尴尬、羞耻、缺乏第三方的支持，他们特别不愿因为家事而求助于刑事司法系统的帮助。

根据波尔（Powers, 2001）所述，老人被害最常见的5个动机是：

1. 杀害他们是为了甩掉包袱。

2. 为了钱财而杀害他们。
3. 出于对年老者的憎恨而杀害他们。
4. 为报仇而杀害他们。
5. 性攻击中的杀害。

根据波尔（Powers，2001）所述，关于老人被杀案，以下情况的发生可作为前兆并应引起警觉，但不局限于这些情况：

1. 意外死亡，且被害人是被一个有着较明显的情感压力的人所照顾。
2. 一个比老人年轻得多，或以前完全不认识的人对被害人有着不同寻常的兴趣，特别是当这种兴趣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建立起来的时候。
3. 被害人孤立于家庭、朋友、社交活动、宗教活动之外。
4. 在看护中不同寻常的高死亡率。
5. 健康的意外变化，而以前没有明显的症状。
6. 改变被害人意愿、代理权、信用及委托材料，特别是与被害人以前所表示的愿望相反时。
7. 被害人资产上出现大宗的或不同寻常的开支。

为了更好地理解家庭老人被杀案所涉及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可试析以下案例：

基恩·A. 布莱克案件（Keon A. Black）

密苏里富尔顿（Fulton）的29岁的基恩·A. 布莱克（Keon A. Black）供认了，他谋杀其73岁的外祖母玛耶·简·布莱克（Mayme Jane Black）的罪行。1989年5月28日，玛耶被发现死在她家里的椅子上，因身受刺伤而死亡。虽然当时基恩接受了询问，但他否认了与此案的关系，此案一度被搁置。后来根据布莱克（即基恩）的供认，他曾经整天赌博和抽“快克”烟，他杀害她是因为她拒绝给他钱买更多的“快克”烟（杰弗逊城市新闻-论坛，1999）：

布莱克说，他的外祖母向他要一杯水，她喝完水后，他把杯子放回厨房，拿了一把刀并回到房间里。他向她要钱，她拒绝了。

“起初我试着用刀吓唬她，但没有作用。”然后，他补充说，“我失去了人性，我想，我，我不知道……我几乎疯了。自从那以后，一切似乎还在发生，你知道，自从那天后，我一直没好过。”

布莱克承认他从他外祖母的钱包里取走了钱，擦掉了他的手印，锁上了门，并将他用过的刀扔掉了。警方于1989年找到了这个凶器。

他说，第二天，他母亲送他到他外祖母的房里去看她。他报告给家里人说，他无法唤醒她，于是，家里的人都跑进她的房间，发现了她的尸体。布莱克声称是因为“快克”烟致使他进行了谋杀。

布莱克的罪行于1996年被揭露，当时他由于被指控拥有毒品而被囚禁，在狱中他承认了对他（外）祖母的谋杀。他被指控犯有二级谋杀罪，因为原告认为，他们不能确定罪行是有预谋的。

玛丽·拜尔案件（Mary Bayer）

佛罗里达 Volusia 县的玛丽·拜尔（Mary Bayer）被指控犯有非故意杀害其89岁的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 Witham）的罪行，并被判处15年徒刑。据佛罗里达州诉玛丽·拜尔案的记载（Florida v. Mary Bayer, 2001）：

玛格丽特自1992年起与拜尔和拜尔的儿子一起居住，拜尔是玛格丽特惟一的照顾人。拜尔和其儿子从外面吃完午饭回到家里发现玛格丽特死了。玛格丽特的健康状况在两个月内每况愈下，去世时89岁，体重刚刚28.5千克。她死于营养不良、肺炎和因无法治疗的褥疮而导致的细菌进入血液的败血病。插入她胃里的食管被感染了，死前蛆虫已经侵害了她的身体。她两个多星期没洗澡了，脏物和粪便包裹了她的身体。长期的尿和粪便的接触所引起的成年人的皮疹造成那些部位大面积的皮肤腐烂，并发生感染。她的背部覆盖着很大的、开放性的褥疮，通过它们可以看到她的脊柱。在她身体的其他部位也有稍轻一些的褥疮，医疗表明，至少超过1个多月都没有治疗了，这些症状的发生本来是可以给她变换位置而避免的。

陪审团认为，玛格丽特的死是由于拜尔应受到谴责的疏忽所造成的。这一案例的犯罪动机并未被勾画出来，但很可能是拜尔想摆脱负担并处理被害人的财产两种愿望的结果。

松本则勇纪案件（Noriyuki Matsumoto）

日本兵库县加古川市21岁的松本则勇纪（Noriyuki Matsumoto）于2001年6月13日闯入他年迈的外祖父母家并进行抢劫。根据新闻周刊Shimbun（2001）所述：

松本 81 岁的外祖母 (Setsue Matsumoto) 的尸体发现被翻倒在一个空浴缸里, 手被铐起来, 腿被胶带绑在一起。她的脸朝下并被胶带盖住, 警方认为, Setsue 是被慢慢窒息致死的。松本用一根铁棒连续猛击并打碎了他 83 岁的外祖父松本寿行的头。

松本没有工作, 他的外祖父母供给他奢华的生活。他与他的外祖父母共同生活了几年, 2001 年 2 月, 他搬了出去。

他声称仅仅是因为他的抢劫受到他的外祖父母的阻拦才杀了他 81 岁的外祖母和他 83 岁的外祖父松本寿行, 而事先他并没有计划杀害他们。这种说法与警方发现的迹象和情况有所矛盾。根据侦查人员所述, 他在杀人后曾试图伪造成外贼入侵的现场。

参考文献

1. Associated Press (2001a) "Niece of Catholic Archbishop Arrested in Stabbing Death of Son", July 6.
2. Associated Press (2001b) "Longview Parents Sentenced for Child Abuse", July 6.
3. BJ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1996) "Female Victims of Violent Crime", December.
4. Coroner (2001) "Coroner Says Mother Killed Herself and Her Children", The Atlanta Journal - Constitution, June 29.
5. Correctional Service of Canada (1995) "A Profile of Homicide Offenders in Canada", Number B - 12, Research Division, Correc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rectional Service of Canada.
6. Divided Supreme Court (2000) "Divided Supreme Court Upholds Death Sentence in Bank One Killing Spree Case", The Supreme Court of Ohio, Communications Office - Opinions and Case Summaries, September 27.
7. Flock, J. (2000) "Chilling Details of the Houston Child Killings", CNN, June 22.
8. Florida v. Bayer (2001) No. 5D00 - 755, May 11, 2001 (Fla. App. 5 Dist., 2001).
9. Florida v. Robertson (2000) No. 3D98 - 2383, April 12, 2000 (Fla. App. 3

Dist.).

10. Frank, J. (2001) "Father Who Killed Daughter Gets Life Sentence", The Virginian – Pilot, May 29.

11. Fried, S. (1998) "Don't Tell My Husband", Philadelphia Magazine, September.

12. Gibb, T. (2001) "Prayerful Parents in Prison for Death", Post – Gazette, June 01.

13. Gibbons, S. (2000) "Parents Convicted in Starvation Death of Their Daughter", 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r, Los Angeles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June 6.

14. Hallinan, T. (1997) "Domestic Terror: Family & Domestic Violence Homicide Cases in San Francisco 1993 ~ 1994", San Francisco Family Violence Project, San Francisco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March 31.

15. Hare, R. (1993) Without Conscience, New York: Pocket Books.

16. Indiana v. Evans (2000) No. 45500 – 9809 – CR – 00508, May 4, 2000 (727 N. E. 2ed 1072).

17. Jefferson City News Tribune (1999) "Callaway County man Admits He Killed His Grandmother", September 21.

18. Johnson, J. , Lutz, V. and Websdale, N. (panelists) (2000) "Death By Intimacy: Risk Factors For Domestic Violence", Symposium Speech, Pace Law Review, Spring.

19. Korpus, K. (2001) "Extinguishing Inheritance Rights: California Breaks New Ground in the Fight Against Elder Abuse but Fails to Build an Effective Foundation", Hastings Law Journal, January.

20. Liebrum, J. (1996) "Mother Who Killed Tot is Sentenced", Houston Chronicle, January 4.

21. Mills, L. (1999) "Killing Her Softly: Intimate Abuse and the Violence of State Intervention", Harvard Law Review, December.

22. Ohio v. Hessler (2000) Nos. 96 – 2819, 97 – 52, Sept. 27, 2000 (734 N. E. 2ed 1237).

23. Powers, S. (2001) "Elder & Dependent Adult Homicide: Prevention, Investigation & Prosecution", Los Angeles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April.

24. Sabo, T. (2001) "Judge Reviews Yates Mental Evaluation", CNN, August 7.

25. Shimbun, S. (2001) "Police Say Man Intended to Kill Grandparents", Mainichi Newspapers, June 22.
26. Smith, J. (2000) "Spouse's Confession of Adultery as Affecting Degree of Homicide Involved in Killing Spouse or His or Her Paramour", American Law Reports, June 2000 (93 A. L. R. 3rd 925).
27. Task Force (1997) "Florida Governor's Task Force on Domestic and Sexual Violence", Florida Mortality Review Project, p. 45, table 12.
28. Whyte, A. (1999) "Young Mother Convicted of Criminally Negligent Homicide in Her Baby's Death", WSWS, May 22.

第23章 性窒息

Michael McGrath, M. D. and Brent E. Turvey, M. S.

人类采用各种各样平常或奇异的方式尝试着性刺激。人们的性欲望和活动所包括的有些事情可能是一般人闻所未闻的。比如，恋无肢躯干癖（amputemophilia），即对截去四肢的躯体有着性欲的怪癖（Money, Jobaris and Furth, 1977）。人的性行为不仅可以在人类社会之中发生，还可能为了追求快感而穿越物种的界限（Ellis, 1936）。一些性行为通常是被认为是有生命危险的（如施虐受虐的性行为或与马匹发生性行为），其中，性窒息具有明显的潜在危险，可导致致命后果。

各种自淫行为都被视为可能引起内在危险的行为，诸如用电（Tan and Chao, 1983; Brokenshire et al., 1984）、使用真空吸尘器（Imami and Kemal, 1988）和将物体插入直肠（Byard, Eitzen and James, 2000）。然而，自淫窒息对于初体验者表现了最明显的死亡危险。虽然窒息可以通过使用各种机械工具降低脑部血氧浓度来实现（Ikeda et al., 1988; Minyard, 1985; Leadbetter, 1988; McLennan, O'Halloran and Dietz, et al., 1993），但本章主要讲述通过颈部压缩导致的窒息。非窒息性自淫死亡和不是由绳子或咽喉部周围的压缩而导致的窒息死亡一般是不证自明的（由于使用奇怪而复杂的工具），并且一般不表现出重大的侦查疑难。

性窒息的问题

性窒息（sexual asphyxia）既可以是一种自淫活动，也可以是在两个或更多人之间自愿的交互性行为。非双方同意的性窒息是指在限制别人的氧气来源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需要（性的或其他的），是一种故意的犯罪行为。双方自愿的性窒息活动导致死亡属于意外事故，而不属于谋杀。有的时候上述四

种情况很难判断，因为幸存的性窒息活动参与者可能不信任警方，不帮助警方了解自愿的和谋杀的区别，这时要确定性窒息的性质就比较困难。有时现场被善意的亲戚或其他重要的人员改变，他们挪动了色情犯罪的证据或男性受害者周围女性的衣服，或者为了遮丑或保持死者的尊严而改变现场。

自淫性窒息（autoerotic asphyxia）是为了引起更大的性快感而故意造成缺氧状态的行为。有时它可能被误断成谋杀或自杀。了解性窒息的特点、死亡现场的行为标志以及如何把它与自杀或谋杀区别开来是侦查员和犯罪心理画像者的职责所在。不幸的是，一些文献在论述时却带上了个人道德评价的口吻，即使是很微妙的。例如，福尔摩斯（Holmes，1991）在他的书中把性窒息列为“性犯罪”。

判断错误可引起心理的、民事的和刑事上的不同反应。首先得知死亡是意外事故而非自杀，可使家属在亲密的人死亡的悲痛之中找到一丝安慰。其次，保险政策也可能拒绝为自杀而支付保险费（取决于保险政策的某些具体条款和时间框架），从而增加丧失亲人的家庭负担。此外，保险公司可能会为意外事故负担比其他原因的死亡更多的费用。最后一点，把一起意外事故当做凶杀来侦查，会浪费执法资源，更糟的是，一个无辜的人可能会为此被控告有罪。

公开讨论自淫性窒息行为是有问题的，因为对有关信息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至少导致了一人死亡（O'Halloran and Lovell，1998）。

性窒息的特征

性窒息起源的时间和方式还不甚清楚。人们早就知道在绞刑的时候男子的阴茎会勃起（可以射精，也可以没有）。绞刑吏把这个现象告诉大家，当众行刑也让老百姓亲眼目睹了此现象的发生。在17世纪就有关于性窒息的历史记载，当时作为一种治疗阳痿的方法（无疑它利用了死亡前期可以引起勃起功能的现象）。性窒息引起死亡的记录最早可追溯到1791年（Dietz，1979）。

狄鲍瑟曼（DeBoisemont，1856）在1856年的医学文献中首先报道了性窒息。在绞刑中的勃起现象在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Billy Budd》（1988）和贝克特·塞缪尔（Samuel Beckett，1954）的《等待戈多》中都有所记录，而关于帮助性窒息的描述出现于萨德侯爵（Marguis de Sade，

1965) 撰写的《贾斯廷》(Justine) 中。瑞斯尼克 (Resnik, 1972) 报告说, 有目的的性窒息可以在爱斯基摩、凯尔特人和肖松尼 - 班诺克族印第安人以及一些南美部落的儿童身上发现 (可能与性有关)。关于此种行为的心理动力或发展起源理论 (Resnik, 1972; Rosenblum and Faber, 1979; Friedrich and Gerber, 1994) 并没有为侦查提供帮助。哈兹伍德和戴兹 (Hazelwood and Dietz, 1983) 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 即大多数有性窒息行为的人是偶然习得或从别人那里学来的。

此种行为一定会提供出一些增强性欲的作用, 否则它就不会反复发生。一般认为, 缺氧可以导致头昏眼花, 再配合以性刺激的时候可以使主观感到更大的性快感 (Resnik, 1972)。在性窒息中有明显的幻想因素, 虽然有时会发生死亡, 但是, 死亡并不是幻想中的内容 (Litman and Swearington, 1972)。受虐狂完整地体现了幻想的作用。性窒息有过很多名称, 包括“短暂死亡” (le petit mort)、恋晕癖 (asphyxiophilia) 和考茨瓦氏症 (Koczwarmism)。^① 它在《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四版) (DSM - IV - TR) 中被列在“性倒错”一节的性受虐狂当中, 称为“恋低血氧癖” (hypoxiphilia)。

人口统计学

性窒息在人群中的真正存在范围并不被知道, 暴露出的案件大多数是由于参与者的死亡, 尽管有少数参与者幸存的记录 (Rosenblum and Faber, 1979; Money et al., 1991; Wesselius, 1983)。进行性窒息行为而没有死亡的情况几乎不能为人所知。美国心理学会 2000 年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四版) (DSM - IV - TR, APA, 2000, p. 573) 总结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材料, 提出了“每年报告的每 100 万人当中因恋低血氧癖 (hypoxiphilia) 而导致死亡的人数大约为 1 人到 2 人”。根据各方报道, 自

^① “Le petit mort” 一词意为“短暂死亡” (the little death); “asphyxiophilia” 一词中的“philia” 来自希腊短语“癖好” (love of) 和“没有” (not) 或“微弱” (lack of) 的脉搏 (sphyzein, 即 to throb), 此词的意思为“没有脉搏的爱”; “Koczwarmism” 是指 18 世纪欧洲的疯狂的重低音歌手考茨瓦氏 (Koczwara), 他也是一个性受虐狂。1791 年, 他和一个妓女尝试了性窒息后死亡。

淫窒息死亡率从每年 250 人（Wesselius, 1983）到“保守估计”500 人至 1000 人（Burgess and Hazelwood, 1983）高低不等。

最近，资料反映出一种观点，即自淫窒息是一种青年男性的活动（Resnik, 1972; Adelson, 1974），而女性自淫窒息的喜好者极其少见或根本没有。然而，一些论文改变了法律界的看法，他们认为，女性自淫窒息不像想像的那么少见（Danto, 1980; Byard and Bramwell, 1988; Byard et al., 1990），在女性自淫窒息行为当中，区别性暴力谋杀和自杀时可能比男性自淫窒息更为困难。

哈兹伍德和戴兹（Hazelwood and Dietz, 1983）对 157 例怀疑自淫窒息死亡者进行了研究，给出了下列细目分类：132 名（84.1%）为典型的窒息死亡；18 名（11.5%）为非典型的；5 名（3.2%）为有同伙的窒息；2 名（1.3%）为自淫自杀。乌娃（Uva, 1995）考察了美国的自淫窒息死亡案例。他报告说，性窒息死亡的意外案例在增加。事实上，可能只是报告的和/或辨认出为这类死亡的数字在增加。大多数案例中有年轻的男性，但是其年龄范围很大。布兰查德和哈克（Blanchard and Hucker, 1991）对在加拿大 117 名自淫死亡的男性进行了研究后得出结论：年龄范围为 10 岁到 56 岁，平均为 26 岁，1/3 的人为 19 岁以下。贝赫仁德和莫得温（Behrendt and Modvig, 1994）对在丹麦的 46 名自淫死亡男性的研究得出结果，年龄范围为 10 岁到 71 岁，平均年龄为 31 岁，64% 的样本年龄在 29 岁以下。还有一项研究（Sheehan and Garfinkel, 1987）报告，1975 年到 1985 年中有 31% 上吊死亡的青少年都是由于自淫窒息。

死亡现场所见

死亡现场各种各样，但是，至少形成了一种值得肯定的观点，即在自淫窒息死亡的现场，侦查员应该发现重复追求性刺激活动的证据，这应该是一种未见到死亡后果的证据。如色情杂志、镜子以及其他幻想目标可以帮助判断是否属于自淫窒息死亡，例如，在脖子和绳子之间发现衬垫，就必须找到试图从机械装置（即使只有得以站立从而减轻绳子的张力）逃脱的证据。死亡现场发现精液本身并不能作为死者手淫或曾达到性高潮的证据。在地上、死者内裤或腿上的精液可能是由于性活动，也有可能是死后发生尸僵的结果

(Spitz and Fisher, 1993), 并且, 多数自杀者并不是裸体或部分裸体的, 而很多自淫死亡者也是如此。另外, 非裸体或部分裸露也并不能排除自淫死亡的可能性。

很多学者提出了判定死亡是否为自淫死亡的标准。哈兹伍德和戴兹(Hazelwood and Dietz, 1983)提出了自淫死亡现场的12条特征, 但并非所有现场都具备这12条特征。特维(Turvey, 2000)对此进行了详述:

1. 地点(location): 可以预料的隐蔽隔离区域(如上锁的卧室、浴室、地下室、阁楼、车库、车间、汽车旅馆单间或树林等)。

2. 体位(Body position): 在上吊窒息死亡中, 死者的身体可能部分撑在地上, 或者死者看起来可以简单地站立以躲避勒死的姿势。

3. 高风险因素(high-risk element): 这些是在自淫活动中提高生理或心理快感的项目。它们能提高自淫死亡的危险。

4. 自救装置(self-mechanism): 这是指提供的一些使受害者可以自觉地停止高风险因素后果的装置(如在关于逃脱装置的资料中记载的受害者颈部绳子的活结、蒙在受害者面部的塑料袋上能轻易打孔、在受害者可以触到的地方的水压按钮、解锁钥匙或简单地站立即可完全躲避窒息等)。

5. 捆绑物(bondage): 这是指用一些专门材料或设施将受害者身体控制起来。这些措施对受害者具有心理幻想的意义。这些特点会使侦查员认为是谋杀, 其实并不是。在自淫死亡的案件中, 确定受害者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能否自行将自身捆绑是十分重要的(如在关于捆绑的资料中记载有手铐、皮绳、腕部捆绑和精细的捆绑纽扣形态等)。

6. 性受虐行为(masochistic behavior): 它给身体的性区域或其他部位带来心理(羞耻)或身体上的痛苦。不能仅看到当前的作用, 医治好的伤害有时也可以恰当地反映此种行为的历史(如像关于性受虐狂的文献记载的, 脚踝之间的平压机、生殖器束缚、球形口塞、乳头夹、异性服装、悬吊装置等)。

7. 衣着(clothing): 受害者可能衣着迷信服装或穿上一件或多件女性服装, 有时全身裸露。衣着在自淫死亡案件中并不总是有用的标志, 自淫死亡的受害者可以是衣着完好的, 也可以是全裸或部分裸体的。

8. 防御措施(protective measures): 受害者一般不希望在自淫行为中的

持续伤害被别人看到。外伤往往发生在衣服覆盖的地方，或者他们在皮肤和控制装置和/或绳子之间放上柔软的保护性材料以防止磨损和擦伤（如在受害者颈部的绳子下衬托的毛巾、受害者扼腕的绳索由衣袖衬托等）。

9. 性随身用品或道具（sexual paraphernalia and props）：这些在受害者身上或附近可以找到，可帮助犯罪嫌疑人性幻想（振动器、假阴茎、镜子、色情书籍、日记、照片、电影、女性内衣、记录事件的方法等，放置好的录音带、录像带、照相机等）。

10. 手淫行为（masturbatory activity）：现场没有精液并不能排除自淫死亡。受害者在死亡发生的时候也可以没有手淫。虽然手淫证据的发现强烈支持自淫死亡的判断，但是，精液、绵纸、毛巾和手上与性区域的润滑剂也可以支持自淫死亡的判断。

11. 以前自淫行为的证据（evidence of prior autoerotic activity）：这包括发现死亡之前的相似行为证据，如永久固定的保护填充物、事先掏好了“逃生”孔的塑料袋、很多不同时期的色情文学、大量收集的色情小说、复杂的高风险因素（非常复杂的绳子扣）、复杂的逃生装置、已治愈的外伤、重复放置绳子所致的柱子上的磨损槽、自制的以前自淫行为的录像带、以前自淫行为的见证人证词等。

12. 没有明显的自杀动机（no apparent suicidal intent）：受害者对自己将来的生活有所规划。缺乏自杀预兆并不是确定为自淫事件所必需的。如果发现受害者的遗书，需要确定它是在死亡之前不久所书写的，而且不是道具（部分地反映受害者性受虐狂幻想，如受害者计划拜访好友，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出门旅行，没有抑郁史，最近还付过月账单，告诉朋友期待着某件事情等）。

笔者建议下列死亡现场的发现对于确定为自淫窒息死亡是必须的：

1. 希望有隐私。
2. 没有可信的自杀动机证据。
3. 现场没有其他人活动的证据。
4. 有导致缺氧的装置。
5. 此装置包括逃生设置，即使是简单地得以站立即可。
6. 受害者自行将其捆绑。

可以有第7个标准，即重复行为的证据。尽管这是一条非常有用的证据，但是缺乏这一证据也不能排除自淫死亡。原因有二：一是犯罪嫌疑人可以是第一次（也是要他命的一次）尝试此种行为；二是行为者可能并不在他或她经常行为的场所。因此，即使行为是重复发生的，地点也不一定能显示出证据。例如，受害者可能被发现在他或她所临时居住的旅馆中吊死。

受害者的朋友与家属也可能影响死亡现场发现。当朋友或亲属发现自己的亲人死于自淫窒息，他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清洁现场。他们可能移动或掩藏一些令人尴尬的东西（色情文学、女性服装、性用具等），在通知警方之前试图保护亲人的荣誉。这并不是具有犯罪动机的犯罪行为，也不应被当做犯罪来对待。然而，侦查员必须注意此种干预可能发生，并且必须有应对的思想准备。如果怀疑是自淫死亡，但是没有应该的发现，那么就要询问发现尸体的人是否改变了现场。

尸检发现

尸检发现是各种各样的，取决于死亡的具体方法和模式。即使死亡原因是自淫窒息，也会由于绳子或一些其他导致缺氧的设施的使用而使死亡方式不同。甚至在由于绳子导致的性窒息当中，绳子的实际模式也会影响尸检发现。从天花板的柱子上吊的尸检发现也和倒下或其他姿势下绳子导致缺氧的尸检发现不同。众所周知，结膜与面部的淤斑通常被认为是由于组织缺氧所导致，其实是流体动力学的结果而并非缺氧本身（ElyandHirsch, 2000）。颈部的压缩阻止头部的静脉回流，但一般不至于完全阻断大脑的动脉血供。这会导致血管压力增加，毛细血管血液开始“渗漏”。

完全的上吊导致受害者面色苍白，而不完全的悬吊导致深灰、紫色和巨人观状（Spitz and Fisher, 1993）。须知很低的颈部压力便可导致失去知觉（Spitz and Fisher, 1993）。在斯皮茨和费希尔（Spitz and Fisher, 1993）的《死亡的法医调查》（第三版）中对窒息死亡发现有精彩的描述。

死因心理剖析中的发现

如果缺乏一贯的自杀行为历史，包括近期或慢性的抑郁，同事认为死者很可能是自杀等。即使从心理上分析，性窒息的潜在动力在某种程度上肯定

是基于死亡的愿望，这在很多活动上都是如此（如跳伞运动），但是这并不能与有意的自杀行为相等同。把性窒息认为是自杀行为的衍生是错误的。它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行为，在某一特定时间更是试图得到性满足而不是出于其他原因。

在一些怀疑为谋杀或自杀的案件中，进行被害评估是非常有用的。花一些时间去知道和理解受害者有助于疑难案件的判断。心理信息在疑难死亡案件侦查中非常有用（Jobes et al., 1986），然而，死因心理剖析还是经常被忽略。本书第9章对此进行了有益的讨论。

在疑难死亡案件侦查中，过分依赖一种信息是错误的。亲属（如母亲）看到的死者是一个样子，而爱人看到的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同事等还可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从不同途径得来的信息越多，就越可能使侦查员得到关于死者的更清晰的图画。一个人通过性窒息活动来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事情也曾听说过，针对明显的性窒息死亡也要考虑死亡现场的变量和心理健康史来确定是否为自杀（Frazer and Rosenberg, 1983）。

女性性窒息

虽然性窒息大多为男性所为，但是在女性中也可以发生。戈思克和乔姆帕利克（Gosink and Jumbelic, 2000）提出性窒息的男女比例大约为 50 : 1（可能准确），而没有引证。伯亚特等人（Byard et al., 1990）也给过相同的数字。

女性性窒息受害者通常为裸体，没有额外或精细的设备/道具。死亡现场裸体女性的简单呈现说明女性自淫死亡会大大地被低估和/或误断，尤其当自淫死亡的女性受害者为自捆和出现性受虐狂行为时更加说明了这点。这个场景很容易使侦查员认为是性暴力杀人，认为是色情狂所为。

丹统（Danto, 1980）报告了一起案件，一个 21 岁的黑人女性在她的浴室裸体死亡，其后被他的男朋友和另一个男人发现。她身向浴缸倾斜，头淹没在浴缸里。在她头部的一侧有磨损，腕部和颈部被类似的绳子捆绑。此外，在受害者的屁股下面还发现一个粗重的铁栓。这个案件在一年多后被确定为自淫死亡。当时用铁栓当假阴茎，受害者因颈部压缩和头部撞击而昏倒，随后被淹死。另一起报道（Byard and Bramwell, 1988）是：一位 19 岁白人女性

被发现死于自己家的卧室里。她躺在床上，颈部和踝部被绳子捆绑，身着女童裤，一把梳子的柄被插入阴道。这些案例说明，女性自淫死亡现场与男性自淫死亡现场表现有所不同。

有3位学者（Byard, Hucker and Hazelwood, 1990）作了一个男性与女性自淫死亡现场的比较研究。男性的年龄范围为9岁到80岁，女性为19岁到68岁。他们认为，在男性自淫死亡现场可出现色情文学、怪异的服装和设备等为引起真实的或佯装痛苦的道具和物神崇拜证据，而在女性自淫死亡现场则没有。不过这种情况也并非绝对，另有两位学者（Gosink and Jumbelic, 2000）描述了一些不典型的女性自淫死亡现场，那里包括色情与奴役杂志、录像带、色情照片、胸部的绳子和可以允许看到自己的镜子，还有颈部的绳子等。尽管有上述的反例，但大多数女性自淫死亡现场仍然是缺乏男性自淫死亡现场的特征。有一项对8起死亡案件中的9位女性的自淫活动的研究（Byard et al., 1993）的结果显示，大多数女性并不使用道具或身着怪异的服装（5名女性全裸）。这项研究的作者指出，这8个案例当中的4名受害者在调查的开始阶段都被侦查员搞错了。

性窒息意外死亡与其他死因的区别

侦查员或犯罪心理画像者在面临疑难死亡案件而可能需要评价时，应该尽力作出正确的选择。自淫死亡并不常见，但也有发生。自淫行为这一概念本身（先不管窒息的问题）在某些人心目中就属于道德败坏，于是会妨碍现场评价。当面临一个可能为自淫死亡的现场时，可以用上面提出的标准来作出一个基本的评价。接下来就是受害者心理评价（深度随需要而有所差异）。尸检发现应该与怀疑为自淫死亡的类型相一致。谋杀或自杀被伪装成自淫死亡虽然不常见，但是，其可能性也应予考虑。下列因素可帮助判定是否属于自淫窒息死亡：

1. 有无合理的隐私期望？
2. 门窗是否从里面锁上？
3. 他或她可能自己将捆绑物绑在自己身上吗？
4. 如果窒息没有采用绳子的方式，那么受害者是否可能自行实施？
5. 捆绑物上是否有衬垫以防留下可见到的痕迹？

6. 是否有幻想的证据或物神崇拜行为？
7. 是否有曾发生过类似行为的证据？
8. 是否有受害者自杀的证据？
9. 有没有与死亡现场发现相一致的外伤，是否可归咎于受害者的行为或受害者失去知觉后不注意的运动？

上述问题通常会涉及家属要求人寿保险单和死亡得益。例如，可能有一些有关意外死亡条款、弃权证书和其他关系利益的规定（Achampong, 1987）：

如果保户遇到某一保险公司涵盖的业务要求，意外死亡得益就可能被人寿保险列入基本死亡得益之中。意外死亡得益将被提供与单据面值相等的数目，因此在意外死亡得益中可得到“双倍赔偿”。

这意味着自淫死亡的意外死亡者家属可能有很大的财产动机。在要求遭到拒绝时有权让法庭或保险公司了解情况以获得死亡得益。与此相反，保险公司可能因拒绝死亡赔偿而出席法庭诉讼，要求自主地了解案情，并要求自行解决。随后，犯罪心理画像者就被请来参与办理这些案件，在事先了解有关的一些事情的前提下，为客户检查受害者到底是属于意外还是故意的死亡，甚至可能为法院做这些事情。

案件

犯罪心理画像者必须努力了解并区别哪些是自淫死亡现场。试析下列案例和各种死亡现场：

性谋杀而非性窒息：认定塔丽·乔·库珀（Jo Talley Cooper）被谋杀案^①

1987年2月25日下午，诺曼的特雷西·库珀（Tracy Cooper）到家时发现他妻子塔丽·乔·库珀（Jo Talley Cooper）死在了客厅的地板上。她全身赤裸，皮带从她的脖子一直绑到后面，并且捆住了她的双手。她的嘴被管子胶带堵上，阴道里插着她7个月小孩的玩具，小孩在他的房间的婴儿床里，没有受伤。

^① 原文为：OKLAHOMA v. FRANK WELCH, 2000（译者注）。

根据俄克拉何马州诉弗兰克·韦尔奇一案（Oklahoma v. Frank Welch, 2000）的记载，死亡现场情况如下：

凶手韦尔奇（Mr. Welch）扮成诺曼有线电视公司的工人安全地进入了库珀的家，因为并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库珀的狗也安全地在车库里，狗是在修理工需要进后院工作的时候被库珀带到车库里的。从安全门进来以后，犯罪嫌疑人用皮带将库珀夫人绑了起来，拉紧绑在脖子上的皮带将其勒死。犯罪嫌疑人然后强奸了库珀，将一个玩具插入了她的阴道作标记，随后离开。验尸官对库珀的肛门涂片检查发现精液，并发现在她死前或死亡当时肛门有猛烈而迅速的撕裂。验尸官检查还发现库珀临死前还有阴道撕裂，与在她阴道里发现的塑料玩具的插入相一致。验尸官还证明库珀夫人有了大约12周的身孕。

此案的杀人犯一直没有落网，直至10年以后一个叫杜南·韦尔奇（Duane Welch）的人在另一个乡郡实施了一起相似的犯罪之后，警方通过DNA检查证实与此案相一致，才得以侦破。

韦尔奇承认谋杀了黛布拉·史蒂文斯（Debra Stevens），因为她知道他与库珀的死有关并曾经向他勒索。但是，关于库珀的死，他声称那是粗暴而具实验性的短期性关系的结果。根据俄克拉何马州诉弗兰克·韦尔奇一案（2000）的记载：

韦尔奇声称他为诺曼有线电视工作期间，曾为库珀家服务。他承认和她很快发生了性关系并曾在3个不同的地方进行过性行为。他说，在她死的那天如约去了库珀夫人的家。她要求进行肛交，自己同意了。肛交以后，犯罪嫌疑人问她是否愿意尝试他曾在杂志上看到的那样的性窒息。他说，她同意了之后使用皮带系住了她的脖子和双手。然后，他拉紧她脖子上的皮带并开始从库珀身后与之性交。他承认自己在库珀倒下以后没有立即停止，因为他并没有发觉她已经十分痛苦。当他把她翻过来的时候，她已经停止了呼吸和脉搏。因为他认为自己已是犯了重罪，于是感到十分恐慌并决定把现场伪装成受到了他人的攻击。他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往她的脖子上系上了更多的皮带，如何用胶带蒙住她的嘴，因为他不喜欢看到血，于是用厨房的毛巾擦拭自己，然后把塑料玩具插到库珀夫人的阴道里，随后离开库珀的家。

然而，两起杀人之间有相似之处。这两起案件的相似之处作为审判的证

据，在两起犯罪的同一认定上发挥了作用，DNA 仅证实了曾发生过性行为。相似之处包括：

1. 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
2. 两个受害者的家都与一片空地相临。
3. 家中的狗都被锁在了屋子里，而不在它们通常应该在的地方。
4. 两起谋杀都发生在犯罪嫌疑人在克利夫兰市（Cleveland）区法院出庭之后的一天。
5. 两名受害者都是白人女性，她们都被强奸，并在白天于自己的家中被勒死。
6. 抽屉被拉开，尽管什么东西也没有丢，但还是像抢劫的现场。
7. 两个女人都被堵上了嘴。
8. 两个受害者都裸体，四肢伸展、仰面朝天地躺着。
9. 两个人都被相似的绳子系在脖子上，打的结为环形，其余的绳子从环形结中穿过。

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检察官曾让一名被称为性窒息死亡的专家的警探（这个警探有 16 年的执法经验并在窒息死亡方面接受过“专门训练”）作专家证言，法庭同意其作为专家证人。他驳斥了各种反对意见，说明库珀夫人的伤是别人故意造成的，而不是意外，也不是自己造成或自淫行为的结果。

最终，陪审团拒绝了韦尔奇自己对事件的说法，所谓“死亡是双方自愿的性行为的结果”是错误的。他犯了一级谋杀罪。他的罪名和法院对此案的判决得到了上诉法院的支持。

自淫窒息：理查德·肯尼迪（Richard Kennedy）的意外死亡^①

1984 年 10 月 24 日，开业的整形外科医生理查德·肯尼迪（Richard Kennedy）死在他家的地下浴室淋浴处。他死于自淫窒息。他的妻子桑德拉·肯尼迪（Sandra Kennedy）曾为他上了 5 万美元的人寿保险，保险公司支付了这笔款项。然而，另外 5 万美元的意外死亡得益险被拒绝了。

根据华盛顿国家保险公司诉桑德拉·肯尼迪（Sandra v. Kennedy, 1987）

^① 原文为：SANDRA v. KENNEDY, 1987（译者注）。

的记载，死亡现场情况如下：

1984年10月24日下午，开业的整形外科医生肯尼迪在他家的地下浴室淋浴处进行自淫活动。在此之前，他把一条绳子系在自己的脖子上以降低脑的血氧供应，旨在短暂地达到无意识状态以提高手淫时的性快感。结果肯尼迪被勒死了。他死时赤身裸体，只穿着一双袜子，吊在一根系在淋浴龙头上的绳子上。在淋浴旁边的墙上贴着很多各种动物下体和裸体男性的图片。侦查当局开始怀疑是自杀，但在进一步调查以后得出，肯尼迪的死是意外。

保险公司同意这起死亡是属于意外。但是，他们认为一个有理智的人是可以预见到后果的。他们感到肯尼迪自愿将自己暴露在已知和不必要的死亡危险当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应该支付保险金。

法院不予赞同，他们认为：

虽然肯尼迪的行为是奇异和不正常的，但我们同意陪审团关于肯尼迪的死没有很大的可预见性或必然结果的证据。他单独地参与这种行为仅仅是为了获得性满足。所有事件周围的环境条件都显示肯尼迪本想活着并不受伤。陪审团合理地指出，肯尼迪周围的图片表示他以前也做过相同的活动。此事件并没有抑郁或自杀倾向的证据。他是一个健康的45岁的外科医生，没有理由伤害自己。冒受伤或死亡的危险，这个行为是愚蠢的，但是并非肯尼迪事先知道或应该知道它可能导致死亡。

他们认为，死亡并不是此行为正常的或可预期的结果。他们还指出，保险公司本可以在保单中提到此种行为以进行保护。随后他们作出判决，此事件为意外事故，保险公司应支付给桑德拉关于肯尼迪意外死亡的得益金。

自淫窒息：蒂莫西·E. 帕克（Timothy E. Parker）的意外死亡^①

1990年11月27日，蒂莫西·E. 帕克（Timothy E. Parker）死在他在费耶特维尔（Fayetteville AR）市内的公寓里。他的母亲玛丽·费耶·帕克（Mary Faye Parker）从她的工作地点给他投了1万美元的人寿保险，保险公司支付了这笔款项。但是，另外1万美元的意外死亡得益被拒绝了。

^① 原文为：DANAHER COOPERATION ET AL. v. MARY FAYE PARKER, 1994（译者注）。

根据 Danaher 公司诉玛丽·费耶·帕克一案（Danaher Cooperation et al. v. Mary Faye Parker）的记载，特别是警察局的报告中关于帕克被发现时的描述，死亡现场情况如下：

帕克（Parker）的脖子被淋浴门框上的一张床单包着。

一张绿色的床单系在顶上的横梁上（淋浴的门上），床单下摆包在死者的脖子上并安全地盖住了脸。一旦床单被移动，身体就被带出浴室并倒在尸体袋上。死者穿着蓝色衬衫和红色短裤。死者将两个软球放在他的衬衫里面的胸前，好像是女性的乳房。尸体的腹股沟区有个大突起。将其取出后，发现这些东西是多样混杂的衣物……

帕克被发现的样子也提示其死亡是由自己导致的与自淫刺激相关的缺氧造成的。各方均赞同帕克死于自淫窒息的说法。

警方和验尸官都确定了帕克的死是意外，这是由死亡方式而得出的死亡证明。而保险公司不同意这一说法，而且保单上并没有注明真正定义“意外”一词。玛丽·帕克（Mary parker）接到了保险公司给她的一封信，拒绝了她的赔偿请求，有一部分是这样写的：

费耶特维尔警察局的侦查报告、法医报告都揭示了死亡是故意的，他精心策划将床单系在脖子上以阻断血液/气流。虽然死者可能不是成心想自杀，但这个预先准备的故意行为对于一个谨慎的人来说是过于危险而不应不知道的。因此，这起死亡不符合伤害定义的意外。

在判决中，法院认为，帕克的自淫行为是愚蠢而危险的。但是，法院也认识到，关于自淫窒息的研究表明它是“在先前的几年中曾重复发生的行为方式，其目的并不是死亡”（Danaher Corporation et al. v. Parker, 1994）。他们也相信“人们通常会认为”帕克的死是意外。随后他们作出判决，支持玛丽·帕克获意外死亡得益金。

参考文献

1. Adelson, L. (1974) The Pathology of Homicide,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2. Achampong, F. (1987) "Death From Autoerotic Asphyxiation and the Double Indemnity Clause in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The Latest Round in Accidental Death

- Litigation", Akron Law Review, Fall.
3. APA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4th ed. , Text Revis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4. Beckett, S. (1954) Waiting for Godot, New York: Grove Press.
 5. Behrendt, N. and Modvig, J. (1995) " The Legal Paraphiliac Syndrome. Accidental Autoerotic Deaths in Denmark 1933 – 1990 ", American Journal of Forensic Medicine and Pathology, 16 (3; September), 232 ~ 237.
 6. Blanchard, R. and Hucker, S. (1991) " Age, Transvestism, Bondage and Concurrent Paraphilic Activities in 117 Fatal Cases of Autoerotic Asphyxia ",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9 (September), 371 ~ 357.
 7. Brokenshire, B. , Cairns, F. , Koelmyer, T. and Smeeton, W. (1984) " Deaths from Electricity ", New Zealand Medical Journal, 1997, 139 ~ 142.
 8. Byard, R. and Botterill, P. (1998) " Autoerotic Asphyxial Death – Accident or Suicide? " American Journal of Forensic Medicine and Pathology, 19 (4), 377 ~ 380.
 9. Byard, R. and Bramwell, N. (1988) " Autoerotic Death in Females: An Underdiagnosed Syndrome? " American Journal of Forensic Medicine and Pathology, 9 (3), 252 ~ 254.
 10. Byard, R. , Hucker, S. and Hazelwood, R. (1990) " A Comparison of Typical Death Scene Features in Cases of Fatal Male and Female Autoerotic Asphyxia with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48, 113 ~ 121.
 11. Byard, R. , Eitzen, D. and James, R. (2000) " Unusual Fatal Mechanisms in Nonasphyxial Autoerotic Death ", American Journal of Forensic Medicine and Pathology, 21 (1), 65 ~ 68.
 12. Burgess, A. and Hazelwood, R. (1983) " Autoerotic Asphyxial Deaths and Social Network Response ",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3 (1), 166 ~ 170.
 13. Danaher Corporation et al. v. Parker (1994) No. 93 – 5180, April 12, 1994 (851 F. Supp. 1287).
 14. Danto, B. (1990) " A Case of Female Autoerotic Death ", American Journal of Forensic Medicine and Pathology, 1 (2), 117 ~ 121.
 15. DeBoisemont, A. (1856) Du Suicide et de la Folie Suicide, Paris: Germer

Baillere, as cited in Uva (1995).

16. De Sade, M. (1965) *Justine, Philosophy in the Bedroom,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Grove Press.

17. Dietz, P. (1979) "Kotzwarraism: Sexual Induction of Cerebral Hypox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annual meeting, Baltimore Maryland, November, 1979, as cited in Hazelwood, R., Burgess, A. and Groth, A. (1981) "Death During Dangerous Autoerotic Practice",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5, 129 ~ 133.

18. Ellis, H. (1936)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II,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 Ely, S. and Hirsch, C. (2000) "Asphyxial Deaths and Petechiae: A Review",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45 (6), 1274 ~ 1277.

20. Friedrich, W. and Gerber, P. (1994) "Autoerotic Asphyxia: The Development of a Paraphilia",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33 (7), 970 ~ 974.

21. Frazer, M. and Rosenberg, S. (1983) "A Case of Suicidal Ligature Strangu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Forensic Medicine and Pathology*, 4 (4), 351 ~ 354.

22. Gosink, P. D. and Jumbelic, M. I. (2000) "Autoerotic Asphyxiation in a Female", *American Journal of Forensic Medicine and Pathology*, 21 (2; June), 114 ~ 118.

23. Hazelwood, R. and Dietz, P. (1983) *Autoerotic Fatalities*, Lexington, KY; DC Health (Lexington Books).

24. Holmes, R. (1991) *Sex Crim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5. Ikeda, N., Harada, A., Umetsu, K. and Suzuki, T. (1988) "A Case of Fatal Suffocation During Autoerotic Practice", *Medicine, Science and the Law*, 28, 131 ~ 134.

26. Imami, R. and Kemal, M. (1988) "Vacuum Cleaner Use in Autoerotic Death", *American Journal of Forensic Medicine and Pathology*, 9 (3), 246 ~ 248.

27. Jobs, D., Berman, A. and Josselson, A. (1986)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Autopsies on Medical Examiner's Determination of Manner of Death",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31 (1), 177 ~ 189.

28. Leadbetter, S. (1988) "Dental Anesthetic Death", *American Journal of*

- Forensic Medicine and Pathology, 9 (1), 60 ~ 63.
29. Litman, R. and Swearington, C. (1972) "Bondage and Suicid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7, 80 ~ 85.
 30. McLennan, B., Sekula - Perlman, A., Lippstone, M. and Callery, R. (1998) "Propane Associated Autoerotic Fatali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Forensic Medicine and Pathology, 19 (4), 381 ~ 386.
 31. Melville, H. (1988) Billy Budd, New York: Tor.
 32. Miller, E. and Milbrath, S. (1983) "Medical - Legal Ramifications of Autoerotic Asphyxial Death",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11 (1), 57 ~ 68.
 33. Minyard, F. (1985) "Wrapped to Death", American Journal of Forensic Medicine and Pathology, 6 (2), 151 ~ 152.
 34. Money, J., Jobaris, R. and Furth, G. (1977) "Amepotemnophilia: Two Cases of Self - Demand Amputation as a Paraphilia",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13 (2), 115 ~ 125.
 35. Money, J., Wainwright, G. and Hingsburger, D. (1991) The Breathless Orgasm; A Lovemap Biography of Asphyxiophilia,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36. O'Halloran, R. and Dietz, P (1993) "Autoerotic Fatalities with Power Hydraulics",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38 (2), 359 ~ 364.
 37. O'Halloran, R. and Lovell, F. (1988) "Autoerotic Asphyxial Death Following Television Braodcast",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33 (6), 1491 ~ 1492.
 38. Oklahoma v. Welch (2000) No. F - 98 - 379, April 10, 2000 (2 P.3rd 356).
 39. Resnik, H. (1972) "Eroticized Repetitive hangings: A Form of Self - Destructive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26, 4 ~ 21.
 40. Rosenblum, S. and Faber, M. (1979) "The Adolescent Sexual Asphyxia Syndrom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Psychiatry, 17, 546 ~ 558.
 41. Sheehan, W. and Garfinkel, B. (1988) "Case Study: Adolescent Auroerotic Death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27 (3), 367 ~ 370.
 42. Spitz, W. and Fisher (1993) Medicolegal Investigation of Death, 3rd ed.,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43. Tan, C. and Chao, T. (1983) "A Case of Fatal Electrocution During an Unusual Autoerotic Practice", Medicine Science and the Law, 23 (2), 92 ~ 95.

44. Turvey, B. "Autoerotic Death", in Knupfer, G., Saukko, R and Seigal, J. (Eds.) (2000) Encyclopedia of Forensic Science, London: Academic Press.
45. Uva, J. (1995) "Review: Autoerotic Asphyxi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40 (4), 574 ~581.
46. Washington National Insurance Company v. Kennedy (1987) No. 86 – 0795, Opinion Released Jan. 13, 1987 (136 Wis.2nd 425).
47. Wesselius, C. (1983) "A Male with Autoerotic Asphyxia Syndrome", American Journal of Forensic Medicine and Pathology, 4 (4), 341 ~345.

第24章 追踪骚扰

Wayne Petherick

1989年，美国的罗伯特·巴顿（Robert Bardo）为获取电视剧《我的姐姐莎姆》的年轻的女演员丽贝卡·萨弗尔（Rebecca Schaeffer）的地址而付给了一名私人侦探250美元。于是，“追踪骚扰”（stalking）这个概念很快就在公众意识中确立起来。巴顿数次想接近丽贝卡·萨弗尔，但都不太成功，他还按照计划拜访她的家，也遭到了拒绝。一天在吃过早餐之后，他到了她的住所，用一枝0.357口径的左轮手枪向她的胸部开了一枪（Dempsey, 1996）。她死在了家前门。此后不久，加州通过了美国的第一部《反骚扰法》，此后很多其他州也予以采用。这起案件被称为“促进对付追踪骚扰立法的催化剂”（Fremouw, Westrup and Pennypacker, 1997; Emerson, Ferris and Brooks Gardner, 1998）。

毋庸置疑，追踪骚扰行为本身已经存在很多个世纪了，但将其视为犯罪现象是20世纪的事情。追踪骚扰行为只到现在才将其作为一种犯罪类型，这是因为一些人认为，跟踪别人是一件新鲜并令人刺激兴奋的事。^①

“追踪”（stalking）一词的原意是猎手在捕杀猎物的时候使用假马（“掩护马”）掩盖自己狩猎的一种方法。而现在，这个词已融进了更多的内涵，尤其含指一个人（骚扰者）故意威胁和纠缠另一个人（被骚扰者）。

正如一些学者（Mullen、Pathe and Purcell, 2000）讨论的那样，追踪骚扰本身早在它的方式、本质和原因被清楚定义以前就是一个社会问题。这一点在立法的修订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最初对这种复杂行为提起诉讼时并无现成的法律依据。当时，我们不应该将这样的行为列为非法而横加指责，

^① 20世纪80年代，一些杂志上提到妇女被跟踪的案件，她们为书信和电话烦恼，还收到莫名其妙的礼物，然而，那时人们很少用“追踪骚扰”这个词来概括这种现象。

相反，我们应该承认在更加完善立法工作中的不足。

由于追踪骚扰经常包含一些起因和动因不明的侵扰方式，所以，对于侦查员来说，追踪骚扰案件常表现出独特的问题。通常侦查员并不具备行为科学的背景，而行为科学家又没有侦查经验的背景。实际上，两种能力有机结合在一起就能胜任追踪骚扰案件的侦办。追踪骚扰案件还表现出一个难题，追踪骚扰行为不像其他犯罪那样好干预（警察只能警告而不能逮捕追踪骚扰者）。因为并非所有案件都需要经过刑事诉讼，通常只需告知当事人的行为是违法的便足以使他收敛或停止。

我们需要经过心理健康和侦查双重培训和教育的专门侦探，这个问题尤显突出。本文认为，办理追踪骚扰案件不仅需要专门侦探，而且更需要心理画像师的参与。下面将讨论追踪骚扰和对它的侦查问题，将给出一个推论的犯罪心理画像模式，目前看来，它能够提供对追踪骚扰者最好的心理刻画。

什么是追踪骚扰

梅勒和戈达德（Meloy and Gothard, 1995, p.258）把“追踪骚扰”定义为“对另一个人任性的、恶意的和重复的跟踪与纠缠，乃至威胁到了他或她的安全”。追踪骚扰的典型行为是在两种场合以上对别人进行尾随，在其周围徘徊或使别人感到烦扰。应该承认，尽管对此有不同认识的州在立法上有很大的差异。梅勒（Meloy, 1998）认为，仍有三个共同特点：

1. 有实施追踪骚扰的行为方式。
2. 有潜在的或明显的威胁。
3. 有令人恐惧的理由。

从历史观点上说，追踪骚扰行为更多地被认为是完全正常、典型和可接受的，并且人们还认为，持续地追求另一个人的时间长短是可以用来“证明他们的爱”。然而这是过去的观点了，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现实中持续的尾随和大量的侵扰是一种文化禁忌，并且在很多州被刑法所禁止。

最近法律的讨论集中在某种过度追求行为的定罪问题，学者提出，大量无害的行为正在成为法律关注的问题（这方面的讨论见 Dennison and Thomson, 2000; D'Arcy, 2000; Keenahan and Barlow, 1997）。认识到追踪骚扰的法律特征十分必要，但并非指个别案例，因为它们不符合严格的标准而

不属于追踪骚扰。因此一个矛盾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法律必须既足以确保对真正追踪骚扰案件的适当的诉讼能力，还要特别保证“真心的追求者”不被列入追踪骚扰之列。

基恩纳罕和巴洛（Keennahan and Barlow, 1997）曾讨论这个概念的法律准确性将如何影响个案中的执法问题。例如，一个真心的追求者一个月内每天送一打玫瑰花可能是真实地表达他的爱，即使他确实没有恶意，但也可能引起接受者的巨大痛苦。为了便于讨论，设想接受者清楚地表示了这个感情是她不需要的。在某些州的立法规定中，这种行为也将构成追踪骚扰，即便追求者并无恶意。按他们的说法，过度的行为就可以称为追踪骚扰。这一观点显然值得商榷。

追踪骚扰和加害

在衡量追踪骚扰的影响程度时，有一个明显的困难就是，如何衡量客观伤害和心理伤害之间的区别。客观伤害包括身体上的性攻击，还有财产的损害等，这些伤害明显而容易识别；心理伤害则包括导致的失眠、旷工、社会活动的退缩等。后一种伤害可能不易被被害者识别为追踪骚扰所致，即生理不适是由于心理所引起的。笔者的经验是，那些受到追踪骚扰的被害者不会认为是因为骚扰而引起受寒、流感和胃肠功能紊乱，即使他们称有很多烦恼是由于受到了侵扰。

有一个有趣的案例，美国的加里市（Gary Dellapenta）的一个50岁的退休保安，在被情侣抛弃后，开始在网上攻击对方。攻击行为表现为给新闻组发送带有被害者个人材料（包括她的家庭安全系统）的“强奸和团伙犯罪”的诽谤。据多方消息（LA Times, “计算机追踪骚扰案——一种新的犯罪”，1999年1月23日，星期六），被害者由于“遭到了网上追踪骚扰者的巨大的惊吓，她失去了工作，体重从上个春天的59千克下降到现在的43千克，并且很多天卧床不起”。

这个案例说明，追踪骚扰行为可以对被害者造成严重的伤害。同时，此案也说明犯罪心理画像可以就此发挥作用，因为在追踪骚扰进行的时候犯罪人情况不明。犯罪心理画像也许可以提供关于通过犯罪人行为表现的动机、威胁和被害者情况等一些资料。

在另一起案件中（作者的案例材料），一名年轻的女性被从前的一个朋友侵扰，于是抱怨一切人都不可信任，虽然她很清楚追踪骚扰她的人是谁。这说明焦虑可使被害者由最初对环境刺激产生生理反映到表现出一种可观察到的超警觉形式。在这个案件中，社会和生理影响是多方面的，无疑这些影响对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有几位学者（Blaauw, Winkel and Arensman, 2000）曾对 246 名追踪骚扰者至少一个月的追踪骚扰行为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所有案例中，被害者都表现出负性反应，其反应超过一般人群的水平。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追踪骚扰所导致的精神影响与精神病门诊病人样本相比，比一般人群有更多的一致性。追踪骚扰被害者表现出躯体症状（somatic symptom）的评估分数为 11.2（一般人群与精神病样本群的分数分别为 6.6、11.7），表现出焦虑和失眠（anxiety and insomnia）的分数为 12.8（一般人群与精神病样本群的分数分别是 6.6 和 12.6），社会功能紊乱（social dysfunction）的分数是 10.5（一般人群与精神病样本群的分数分别是 6.9 和 11.9），严重的抑郁（severe depression）的分数是 7.3（一般人群与精神病样本群的分数分别是 1.6 和 9.5）。

在莫尼可（Monico）所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中表现出相似的结论，即追踪骚扰行为对被害者的生活有着明显的影响，98% 的人为此烦恼或愤怒，81% 的人表示不安，87% 的人表示担忧。帕塞和穆勒（Pathe and Mullen, 1997）对 100 名追踪骚扰被害者进行了研究，除了 6 人以外，其他人的社会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53% 的人换工作或停止工作，39% 的人搬了家；83% 的案例中报告有焦虑水平的增加，55% 的案例中报告被追踪骚扰者有干扰性的回忆。

澳大利亚进行了惟一的大规模被害者调查，澳洲统计局（McLennan, 1996）发现有 100 万女性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候受到过追踪骚扰（这是个相当大的数目，澳洲现在的总人口不足 2000 万）。进一步的数字表明，有 16.57 万个女性在调查前的 12 个月中曾被追踪骚扰。在美国，联邦司法协会（1997）对 8000 名男性和 8000 名女性进行了电话访谈，发现有 8% 的女性和 2% 的男性在他们的一生中曾被追踪骚扰。以上两个调查都严格采用了追踪骚扰的法律定义，尽管两项研究在方法上都存在问题，但它们却是现存惟一的

大规模研究。

类似结果表明，追踪骚扰不仅对被害者的人身安全产生了重大威胁，而且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也有严重影响。如此看来，对追踪骚扰行为的看法一定要有所变化，并且要了解如何对它进行调查。从以上分析看来，如有专门的犯罪心理学工作者的参加，案件就可能在刑事司法系统之外得到良好的解决，这样一来也就减轻了刑事司法系统已经负担不下的重负。

对追踪骚扰的侦查

刑事侦查是发现、收集、准备、识别和拿出证据以确定发生的事件与该由谁负责的过程（Bennett and Hess, 2001）。一些追踪骚扰案件中的侦查比其他案件要容易，“简单性”几乎完全取决于案件自身的变化过程。例如，在涉及熟人之间报复性案件中，发现追踪骚扰者就比发现那些认为自己有权利追求和袭扰（所谓的权利犯罪）被害者的骚扰者更容易。

严格地讲，对追踪骚扰的侦查与对其他类型犯罪的侦查并无根本的差别。侦查员仍然要采录口供、访谈被害者和见证人、跟踪线索、收集和解释物证。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并非必须采取上述所有的侦查措施，但公共机关（警察和其他政府侦查人员）与私家机关（私人侦探、专门侦查员和咨询师）在侦查目标上仍然存在着差别。

狄普塞（Dempsey, 1996, p.3）认为，在公共案件与私人案件背后同时具有如下目的（不局限于此）：

1. 决定是否有足够的现实证据以支持或排除每个诉讼理由。
2. 积累必要的现实证据以在法庭上证明或排除案情或形成解决的基础。
3. 发现补充证据的线索。

此外，以下也是必需的：

1. 认定案件的被害者，并查找系列案件的其他被害者。
2. 要告诉被害人，物证的价值和特征知识，使其能以适当的方式收集和证明曾发生过的追踪骚扰。

在侦查过程中得来的情报可以用来进行威胁控制（threat management）。这包括，对追踪骚扰人的行为方式的评估，给被害者提供减低追踪骚扰行为的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的建议。例如，被害者报告说，追踪骚扰者在电话中要求身

体接触。相关工作人员就要将威胁控制术传授给被害人如何巧妙地对付这种追踪骚扰。为了这种预防实践，作者也借用由克拉克（Clarke，1997）提出的犯罪情景预防的16项技术，并对之加以改进以适应情况，这在接下来的章节将深入讨论。

追踪骚扰和演绎心理画像

本书并不想扩大犯罪心理画像的范围，但有必要说明归纳心理画像法和演绎心理画像法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这一部分讲述犯罪嫌疑人心理画像两种类型的逻辑应用的主要观点，并提供一个心理画像在追踪骚扰与其他追求行为侦查中如何应用的梗概。（如想全面地理解，请参阅第1章至第3章）

演绎（deductive）论证在于其前提是正确的时候，演绎出的结论也同样正确（Turvey，1999）。根据泼里斯（Preece，1998）的观点，这就是演绎论据具有的能使科学家感兴趣的特征。演绎论据可以进行彻底的分析，这样侦查员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必须确定前提的正确性。理想情况下，这可以降低错误，促使之作出更全面综合的决定而不给先入为主的偏见留有余地。

归纳（inductive）论证则是建立在统计和精确的数据基础上的（Turvey，1999）。在此情况下，结论是建立在或然性基础上的，如果前提是正确的，结论则很可能是正确的（Bevel and Gardiner，1997）。两种论证表面上看起来相像，尽管在反馈过程中提供的信息质量有很大的差异。同时，归纳心理画像扩充的归纳逻辑，并不要求分析者在作出结论之前确定任何前提的正确性，这就给偏见和成见进入分析过程提供了空间。

从演绎行为证据分析观点来看，进行心理画像的过程包括四个阶段（Turvey，1999）：第一阶段就是刑事疑点分析（equivocal forensic analysis，简称EFA），目的是确定相关证据，并找出在侦查的开始阶段不能确定的其他证据。这个阶段能够帮助心理画像者摆脱预先的侦查偏见，这些偏见往往产生于侦查员所受的教育、训练和经验，而不是靠证据及根据证据而形成的理论。

关于追踪骚扰，刑事疑点分析首先要评定所有相关信息的可靠程度，包括这些信息是否确实来源于同一个人或地点，以及与追踪骚扰相关的其他报告和其他可能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证据。例如，在一个案件中，我们得到了大量的电子邮件信息，它们携带的网络协议地址提示邮件是来源于两个

不同的国家，而从信息的其他方面又明显说明它们是出自同一个人或两个合谋的人。这个结论使我们能“撒下大网”以确定犯罪嫌疑人。用这个信息，后来发现是两个犯罪嫌疑人一起从各自的国家发送电子邮件，意图是想引起被害者的恐惧，但是，通过两个电子邮件账户发送信件，两个犯罪嫌疑人愚蠢地把要给出的信息量加倍增多了。

犯罪心理画像的第二个阶段是被害人研究。研究被害人整体的和全部的资料：身高、体重、性别、年龄、爱好、工作以及其他任何可能使这个人成为被害人的因素（Turvey，1999）。被害人研究本来应该包括被害人的一切信息清单，而不应该限制对它们的分析。下面的案例强调要彻底地研究被害人资料：

案例

一个学生在1998年找我，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被一个不知道的人追踪骚扰。我安排了一次会面并作了第一次访谈。在这次访谈中得知，这个人收到的大量信息不只是那个追踪骚扰者发来的，还有第二个人发来的（也与此次追踪骚扰事件有关）。被害人认为，追踪骚扰是和前几年她的一件风流事件有关。她说，只有两个人知道她那次和有妇之夫之间发生的轻率行为。她自己声明，只发生过一次，而那位追踪骚扰者发来的信息却说是多次。后来查明，她的男友曾因迁怒于她的不忠而将她逐出家门。她认为，她惟一的选择就是把她的众多男朋友中的一个从他的妻子那里分离开，这样她才能和他周旋并重获经济上的稳定。追踪骚扰的上演是为了让他男友的妻子知道那件风流韵事，这样可以一并解除婚姻关系。这样她就可以直接介入了。

上面这个案例是一个虚假报案，它说明需要对被害人进行全面的背景调查（上述案例中，在真相大白以前，从她的所有意图和目的来看，仍不失为一个被害人）。进行全面的被害人背景调查可以节省宝贵的时间和资源，可以使其在警方面前经常诉说令人头痛的抱怨随之减少。作为侦查机关，经常忽略或掩盖被害人在案件中的角色作用，忽略了被害人在犯罪案件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这一阶段也要确定被害人所面临的风险水平和犯罪嫌疑人为了追踪骚扰被害人所打算承担的风险水平（Turvey，1999）。因此，在犯罪嫌疑人不明的案件中，非常低的被害风险水平提示犯罪嫌疑人案前精心策划指向被害者的

追踪骚扰行为。在有多名被害者的案件中（在追踪骚扰案件中此类案件不像在其他案件中多见，但是也可能发生），确定被害者的行为方式可以使侦查员获悉一个对众多被害者都可能发生的地点或位置。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信息，通过这一点可能获悉被当做被害者来调查的人其活动的时、空资料。尽管这种清单事实上可以列很多，但通常有健身房、影视俱乐部、娱乐村、加油站或购物中心等对于所有被害者都很平常的场所。

犯罪现场特征分析是心理画像过程中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分析可使侦查员获悉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行为、被害者、犯罪场所相关的特殊犯罪场所的信息（Turvey, 1999）。确定犯罪现场的次序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告诉侦查员他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的证据或发现犯罪嫌疑人活动的其他证据。例如，如果可以确定给被害者的许多信件出自同一个犯罪嫌疑人，我们就可以推断信纸、信封和书写工具可能还能在同一场所找到，查找这些现场可以确定犯罪嫌疑人同一些信息的联系。

最后一个阶段是根据前几个阶段收集和分析的证据而提出一个犯罪嫌疑人特征的现实的心理画像。事情经常是这样的，一旦完成了这个阶段，侦查员就认为他们大功告成，接下来他们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推测符合画像的人出现，这种观点是危险和错误的。一个心理画像，如同其他侦查工具一样，随着掌握的新材料的增多或现有材料倾向于另一种假定时，应该随机应变。

一旦上述几个阶段都已完成，就要根据有关犯罪嫌疑人的信息进行威胁控制（threat management）。如前所述，这包括克拉克（Clarke, 1997）提出的16项针对追踪骚扰案件的应用技术。在此使用“威胁控制”而不用“犯罪预防”（crime prevention）是必要的，因为“犯罪预防”在语义上容易给被害者以错误的安全感，并使之下意识地满足。威胁控制提出“威胁是存在的，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是可控制”的这个设想，因此这个词更适合目的。应该持续提醒被害者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要负主要责任（Meloy, 1997）。

这16项技术分四大类来讨论（见表24-1）。应当指出的是，在此列出的这些技术只是用于说明怎样减少犯罪的努力，事实上，犯罪的机会也并不是按照这些工作规则进行的。不过，根据笔者的经验来看，列出的这些技术只是就原则上的分类的还适用于追踪骚扰威胁控制。

表 24-1 16 项减少威胁机会的技术

增加警觉度	增加被发现的风险度	降低预期的回报	拒绝借口
加强目标保护	进出盘查	移动目标	建立规则
控制入口处	正式监控	确认财产	激起良知
使犯罪嫌疑人放弃作案打算	雇人监控	降低诱惑	控制放任
利于控制	自然监控	拒绝小惠	使其服从

注：摘自 Clarke 和 Homel (1997)

必须不断地强化，使被害人（包括其他应用此项技术的人）坚持听取建议。例如，被害人可能报告说，有两次没有接追踪骚扰者的电话，但骚扰者还是继续骚扰。显然两次努力对于很多案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被害人应该确定信心认为他们听取建议采取的做法是对的。另外，如果追踪骚扰者找到了对付这些方法的招数，那么显然就要修改应对的方法。

增加警觉度（increasing perceived effort）的目的是使追踪骚扰者对进行他们的骚扰感到费力。加强目标保护可以增加被害人和他们住所的整体安全性（有时只需修好一些现有的、但已失效的安全设置就可以）。如果被害人搬家，或者由于追踪骚扰者的行为而必须搬家，就要建议他们选择那些通过电话控制访问，或有编码保护以及设置进门警报条件的。

增加风险察觉（increasing perceived risks）包括进出盘查、正式监控、雇人监控和自然监控，后二者可能在追踪骚扰案件中有更大的作用，尤其要预先通知朋友、家人、邻居和同事有骚扰和骚扰的情况。这不仅增加对追踪骚扰行为做见证的人数，还给被害人提供整体安全感。

降低预期回报（reducing anticipated rewards）其目的是降低现实的或潜在的能够强化追踪骚扰行为的因素。它包括帮助被害人应付追踪骚扰者的污言秽语，使被害人不过分反应，从而不会增强骚扰者骚扰的效果。最好让被害人认清何种反应会使骚扰者变本加厉。例如，如果一个骚扰者打了 10 次电话并要求被害人回电话，而被害人支吾着直到第 10 次才默许的话，这就给了一个十分明确的信息，即使骚扰者认为坚持会有所回报。被害人每次这样的反应都会成为对追踪骚扰行为的间断正强化，从而会使骚扰者随后的追踪骚扰行为频率增加（Meloy, 1998）。

拒绝借口（removing excuses）包括建立规则、激起良知、控制放任和使

其服从等。下面用案例来说明前三类方法的使用：

建立规则

这个案例中，由于被害者的含糊回答，使已经结束而没有挽回余地的追踪骚扰者重现希望，其追求行为又得到加强。经过坚持和“佯装的无知”，骚扰者能通过反复的要求、佯装从没得到“不”的回答而使被害人顺从他的要求。在报告这个案例之前，骚扰还采用了身体暴力和武器。威胁控制的第一步是给骚扰者去一封信，明确拒绝关系，告之关系已经结束的事实。之后，用确定的语言告之，不要再和被害人有直接接触。

激发良知

在上面的案例中，追踪骚扰者坚持追求行为，尽管被害人已经明确声明和骚扰者不再有关系。在骚扰者一次试图进入被害人的家以后，我接到了求助并立即到了被害人的家。我带了一本昆士兰州刑法代码（queensland criminal code）359A 节的印刷品，它概括了追踪骚扰犯罪。我们一段一段地研究代码，辛苦工作，把骚扰者的行为与条例一一对应，然后通知他可能遭到法律最大的惩罚。于是他迅速地离开了，并且再也没有听说过他。

控制放任

曾有一名被害人报告说，她的前男友的追踪骚扰行为总与他饮酒有关。于是，我让她告诉其前男友：饮酒以后无论如何不要与她接触。我了解到，她前男友想成为一名警官，于是让她告诉他：如果再持续与自己接触，那么就会告诉警方，这可能毁掉他成为一名警官的机会。这样一来，接触迅速停止了。

应该承认，在一些案件中上述方法可能并不能停止骚扰者接触被害人，但是，上述建议仍可以对一些情况有效，理由是：其一，可提供一个有效的出发点，它可能会阻止许多追踪骚扰行为，或彻底停止骚扰。其二，它可以使被害人找回自己失去的控制影响力。其三，它可以使侦查员获悉犯罪嫌疑人打算对被害人进行骚扰的时间长短。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在某些案件中不宜使用上述方法。此外，在某些案件中不奏效的方法在另一些案件中可能卓有成效。这意味着，在案件调查之前要先了解案件的特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切忌盲目介入。

不幸的是，有许多追踪骚扰案件都被简单地相同对待，侦查员在侦查目

的和威胁控制方面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例如，梅勒（Meloy，1998，p. 8）的精彩论述：“对骚扰及其行为的普遍性研究、对威胁和他们之间行为关系的把握并不一定对所有个案或威胁控制有用，尽管骚扰人能准确地归入某一类别。”当然，普遍性研究的参照组是指广大公众。

还必须考虑文化差异，群体研究必须在某种文化背景中应用。例如，澳洲统计局研究发现，女性更多的是被陌生人追踪骚扰（McLennan，1996；Mullen et al.，2000）。而美国司法局研究发现，女性更多的是被以前的熟人或从前的密友追踪骚扰（Tjaden and Thoennes，1998；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1997）。如果用归纳的方法进行心理画像或威胁控制分析的话，就需要知道统计数据的出处和它适用的目标群体。正如梅勒（Meloy，1997）所说，并没有一个标准的追踪骚扰者心理图像，只有因各种各样原因而实施骚扰的人。

如果总体的和具体的区别都被忽略了，有时被害者会被置身于更大的危险之中。虽然大家公认，有一般的“规律”可以在威胁控制中遵循，但不能脱离具体的行为去使用。演绎方法的优点在于，它限制了对相似的犯罪统计和数据的依赖，从而能根据案件自身的特点予以具体分析。

除了用威胁控制技术之外，心理画像在追踪骚扰案件中还有其他用途。心理画像（理想情况下）可以贯穿案件的全部调查过程。有人认为，心理画像只是对于那种带有精神病态（Pinnizzotto，1984）、心理或人格障碍的骚扰者有用（Pinnizzotto and Finkel，1990），但笔者的观点是，心理画像的用途可以大大超过这些标准。由于被害者在任何刑事案件中都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对被害者的心理画像就非常有用，它可以让人们认识到，为什么犯罪嫌疑人选择了这个人作为追踪骚扰对象，犯罪嫌疑人在选择这个被害者作为猎物时情愿承担什么样的风险水平。对于被害者进行心理画像的侦查方法可以提供一些其他侦查手段得不到的有用信息。

然而，还有很多关于追踪骚扰的研究没有展开，骚扰中的幻想作用就是其一。事实上，这是很基础性的内容。例如，骚扰者是否存在着真实的幻想过程，如果存在，是否在某些特定的案件中经常出现（如当被害者是陌生人的时候）？这些幻想过程是否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收集了与幻想相关的材料（如妇女的内衣和鞋等）？这些问题在访谈中（如寻找犯罪嫌疑人时）或搜索过程中（如犯罪嫌疑人已经确定但需要更多的证据时）就应该建议警方查找

相关证据类型。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曾多次错误地认为，一旦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心理画像者的工作也就结束了。这是由于忘记了逮捕以后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例如，讯问必须进行，要记录口供，出庭和听取最终的判决。心理画像者可以在一些阶段中或全部阶段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在讯问中。在完成了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画像之后，还可以用其中的信息制定最好的讯问策略，并对所谓的“热点”问题或者犯罪嫌疑人的敏感问题提出研究结论。心理画像者还可以用在审判阶段，为法庭提供物证特征，以及追踪骚扰行为中的心理问题，诸如骚扰者对被害者的选择（这将取决于心理画像者的专业背景）。

在概括了追踪骚扰案件中心理画像的众多益处和用途之后，必须讨论的问题就是哪些案件不需要进行心理画像，或者说是进行心理画像。一些被害人可能找到警察或咨询师，征求如何应付以前的密友追踪骚扰自己的基本建议。这些案件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那些复杂的案件，但它们却具有不适合心理画像技术的特点（尽管威胁控制技术仍然可以使用）。此外，在犯罪嫌疑人已经确定的案件中可能不需要心理画像，因为已经没有那么多的信息必须从冗长的心理画像过程中得出。心理画像在十分简单的追踪骚扰案件中也不必使用。对侦查员来说，认识上述各种案情的法律区别点对于侦查判断和决定十分重要。

结论

追踪骚扰是侵扰他人生活让其产生不良反应的一种犯罪，这类行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可给被害人造成创伤。作为犯罪，它不仅对被害人，而且对侦查员也表现出独特的问题。尤其是在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身份不明或有意掩藏真实的身份时，遇到这类案件时，心理画像就可以提供侦查线索，以利于缩小侦查范围，使侦查员得以摸排犯罪嫌疑人或重点侦查的犯罪嫌疑人。

在侦查中进行心理画像可以确定侦查重点，并且可以提供可能的威胁控制方法。最终的结果是，由于全面的分析（心理画像）使得在案件中可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更为有据。本章还进一步讨论了演绎心理画像模式，由于假设和其特点，为其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成功保证。

很明显，演绎心理画像在追踪骚扰案件的侦查中具有很大的应用范围。

为了发挥最大的潜力，需要对追踪骚扰案件的行为和特点进行更全面的理解。这是一个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领域，它的未来将是极其有趣的。

参考文献

1. Bennett, W. W. and Hess, K. W. (2001) Criminal Investigation, 6th ed., Belmont: Wadsworth.
2. Bevel, T. and Gardiner, R. M. (1997) Bloodstain Pattern Analysis: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Crime Scene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CRC Press.
3. Blauuw, E., Winkel, F. W. and Arensman, E. (2000) "The Toll of Stal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tures of Stalking and Psychopathology of Victims", Presented at the Stalking: Criminal Justice Responses Conference conveyed by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December 7 – 8, 2000.
4. Clarke, R. V. (1997).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Successful Case Studies, 2nd ed., New York: Harrow and Heston.
5. Clarke, R. V. and Homel, R. (1997) "A Revised Classification of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Techniques", in Lab, S. P. (Ed.), Crime Prevention at a Crossroads, Cincinnati, OH: Anderson Publishing Co.
6. D'Arcy, M. (2000) "Stalking, Sexual Assault, Domestic Violence: What's in a Name?"
7. Presented at the Stalking: Criminal Justice Responses Conference conveyed by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December 7 – 8, 2000.
8. Dempsey, J. S.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and Private Investigations, Minneapolis: West Publishing Co.
9. Dennison, S. and Thompson, D. (2000) "Is This Stalk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Legal and Community Definitions of Stalking", Presented at the Stalking: Criminal Justice Responses Conference conveyed by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December 7 – 8, 2000.
10. Emerson, R. M., Ferris, K. O. and Brooks – Gardner, C. (1998) "On Being Stalked", Social Problems, 45 (3), 289 ~ 315.
11. Fremouw, W. J., Westrup, D. and Pennypacker, J. (1997) "Stalking on Campus: The Prevalence and Strategies for Coping with Stalking",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42(2), 666 ~ 669.

12. Keenahan, D. and Barlow, A. (1997) Stalking: A Paradoxical Crime of the Nine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isk, Security and Crime Prevention*, 2 (4), 291 ~ 300.
13. McLennan, W. (1996) "Women's Safety: Australia, Canberra: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S Catalogue No. 4128.0.
14. Meloy, J. R. (1997) "The Clinical Risk Management of Stalking: Someone is Watching Over M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51 (2), 174 ~ 184.
15. Meloy, J. R. (1998) "The Psychology of Stalking", in Meloy, J. R. (Ed.), *The Psychology of Stalking: Clinical and Forensic Perspective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6. Meloy, J. R. and Gothard, S. (1995)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omparison of Obsessional Followers and Offenders with Mental Disord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2, 258 ~ 263.
17. Monico, J. A. (1998) "The Effects of Stalking Victimization and Victim's Responses to the Crime", Unpublished Thesis,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ond University, Australia.
18. Mullen, P. E., Pathé, M. and Purcell, R. (2000) *Stalkers and Their Victim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1997) *The Crime of Stalking: How Big is the Problem?* Washingt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 Pathé, M. and Mullen, P. E. (1997) "The Impact of Stalkers on Their Victim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70, 12 ~ 17.
21. Pinnizzotto, A. J. (1984) "Forensic Psychology: Criminal Personality Profiling", *Journal of Police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12 (1), 32 ~ 40.
22. Pinnizzotto, A. J. and Finkel, N. J. (1990) "Criminal Personality Profiling: An Outcome and Process Stud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4 (3), 215 ~ 233.
23. Preece, R. (1998) *Starting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to Academic Research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London: Pinter.
24. Tjaden, P. and Thoennes, N. (1998) *Stalking in America: Findings from the Nation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urve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and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5. Turvey, B. (1999) *Criminal Profiling: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vidence Analysis*. London: Academic Press.

第25章 系列杀人

Brent E. Turvey, M. S.

一种力量的感觉，我不知道，易冲动的，我害怕，只是……

我觉得异乎寻常……那种感觉奔涌而出，刺激超乎想像。随便你怎样称呼那种感觉。

我没什么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喜欢那么做。

我没法解释这一切。

《系列谋杀犯，乔·罗伊·梅斯尼（Joe Roy Metheny），刑前自白》

马里兰州诉梅斯尼案件（Maryland v. Metheny, 2000）

到底是什么？什么是那无名的、难以了解的神秘的事？什么是那骗人的、隐藏的主宰？或是残酷的君王在控制着我？使我破坏自然的爱和渴望，我始终有种冲动……

它是通过它的不确定在前面掩盖了无情的空旷和浩瀚的宇宙吗？并因此用毁灭的想法在后面刺伤了我们……你在暴躁的捕捉中感到惊诧？

摘自赫尔曼·梅尔维尔：《白鲸》（Herman Melville, Moby Dick）

有件事是令人烦恼的，不论在哪种文化形态下，人们总是特别关注暴力，尤其是血腥的系列犯罪。那些远离社会的学院派学者仍在以此为主题写书，而详细地描述强奸和谋杀的文章也充斥在新闻中，公众媒体仍然通过渲染这些事件来刺激我们的感官，而我们还要痛快地付账。似乎我们通过了解这些近乎传奇的人和事获得了精神上的快乐和刺激，但事实上这些人真的存在。我们当中一些愤世嫉俗者已经开始认识到社会某种不公平的机遇是可怕的，然而，社会认可的价值观又对此非常容忍甚至鼓励。这是一种物欲的放纵和病态的价值观，除了它们带来的快乐以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价值。

我们将别人客体化，进而忽视别人的痛苦而只关注我们自己，轻视别人而使自己显得更有分量，我们排斥别人的需要，通过案例告诉人们社会和文化的孤立，由于对亲近病态的恐惧使我们在感情上彼此疏远。面对这一切，我们曾有令人惊骇的控制力假装这不是事实，假装我们并没有因为别人的遭遇而感到兴奋，宣称这不是我们所谓的价值。面对这一切，我们也曾愤怒地质问，这些犯罪嫌疑人从何而来？是什么创造了他们？是什么使他们成为这样的？

毋庸置疑的答案是：他们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是他们。这是我们的自大、拒绝和缺少亲情而造成的必然结果，是我们的文化聚集。霍尔德·高尔费德（Holden Caulfields）^① 是一个惯例，而不是特例。

术语和解释

由于犯罪行为直接导致法律的适用过程，作为司法部门总是倾向于区分侦查的重点，系列强奸犯罪和系列杀人犯罪都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被区别对待。本书作者在3年前的第一版中就曾指出，这是一个错误。

杀人、强奸以及性攻击行为的动机都是相同的。惟一显著的例外是，如果犯罪嫌疑人使用纵火和爆炸物，那么，其杀人行为的动机可能被视为反侦查的需要。但作者发现，出现过这种方式的强奸案件或性攻击案件均未被视为反侦查问题。

侦查人员及心理画像者相似，要做好工作必须记住以下两个重点，即将系列强奸和系列杀人置于相同的位置上：

1. 杀人行为本身不一定是目的，它是犯罪人表达需要的一种表现。一个系列杀人案件很可能包括性的含义，其动机是性，犯罪是性需要的行为表现，而杀人的目的则是反侦查的行为。系列杀人案中有幸存者，他（她）们可能成功地躲过犯罪人的控制、监禁，甚至被犯罪人放出来。

2. 强奸行为本身也不一定是目的，它可能是犯罪人其他需要的表达，而不是单纯的性需要。不管是偶然的还是蓄意的，系列强奸案也同样包括被犯

^① 霍尔德·高尔费德（Holden Caulfields）是美国作家塞林格·杰（罗姆）·戴（维）（J. D. Salinger）最著名的作品《麦田守望者》（1951年）中的主人公的名字，其作品常常描述烦恼而敏感的青年人（译者注）。

罪人杀死的被害者。强奸与性攻击行为本身包含大量的暴力行为，在一定环境下很容易导致凶杀。

在本章余下的篇幅中，我们将具体阐述侦查系列杀人案的策略。然而，我们应该明白，系列强奸案和系列杀人案这两种行为同时表现为系列案件，系列强奸案经常被暗含在系列杀人案中，所以，侦查的策略非常相似，尽管并不等同。

系列犯罪

根据罗伯特·K. 雷斯勒（Robert. K. Ressler）的解释（1992，p. 29），“系列杀手”是他创造的，用以描述那些被自己的幻想所迷惑，在一次犯罪未尽兴的情况下连续犯罪的嫌疑犯。这类犯罪也被称做“红色标志案”。这是由于执法的经济规则所决定，即他们要根据每天面对的案件数量来决定有限的警力资源如何分配，“系列杀手”往往是警察在资源分配上排居首位的案件。

以下相似的术语通常也被视为相同含义的术语，事实上并不相同。

1. 系列杀人（killings）。
2. 系列谋杀（murders）。
3. 系列他杀（homicides）。

由于从事侦查案件的人员个体差异，因此，对这些术语也没有通用并且标准化的解释。这些术语在文献中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只要我们在使用它们时能够准确定义，就不会产生问题。^①

在此，作者更喜欢用“系列他杀”（serial homicide）和“系列谋杀”（serial murder）这两个术语，因为它们对法律所约束的行为表述得最为准确，而且感觉成分最少。我们将用这些有用的术语解释来分配资源，但由于这一

^① 福克斯和莱文（Fox and Levin，1998）提出了他们对于一般系列杀人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动机相同的，可以用于描述不同类型的杀人犯罪行为。

“系列杀手（the serial killer）是一位20多岁或30多岁的典型白人男子，他的目标是在他工作或住处附近猎取陌生的被害人。这些杀手有着病态的社会倾向，他们往往通过暴力手段杀人来满足个人的需要。统计图形展示了系列杀人犯的相似特征，聚集杀人犯（the mass murder）一般所杀对象均是他认识之人，蓄意并有策划过程。他杀人时最常用的方式是使用枪支。系列杀人与聚集杀人的重要区别点是次数的不同，尽管这两类杀人犯罪在动机上有着相似性，都可以在相同的动机类型范围内来理解他们——权利、报复、忠诚、利益和恐怖。”

定义又过于笼统，因而对于学术研究却是无用的。虽然以下不是惟一的描述，但我们可用此来描述案件的类型，而不是描述犯罪人的类型。

1. 系列他杀/谋杀（serial homicide/murder）：两起以上涉及杀人行为的相关联的案件。
2. 系列纵火（serial arson）：两起以上涉及纵火行为的相关联的案件。
3. 系列爆炸（serial bombing）：两起以上使用爆破手段的相关联的案件。
4. 系列抢劫、强奸（serial rape）：两起以上含有强奸或性攻击行为的相关联的案件。

作者没有陷入使用“狂热”、“狂杀”或任何犯罪的语义当中。这些术语对办案效果没有任何帮助，其解释非常主观，不适当的笼统解释对于研究的目的来说也是毫无作用的。^①

尊重被害人

在涉及那些有被害人生还的案件中，这些被害人总有“再次被害”（re-victimizing）的潜在可能性。我们用这个词来描述那些对被害人不敬的习惯，因为：

1. 在我们仁慈的刑事审判制度中，许多侦查员在对性犯罪的侦查中，通过一次次询问再现这些事件是不必要的。每个人都希望有机会获得被害人故事的第一手资料。但坦白地说，通过这种零星的强烈刺激的办法从被害人那里引出事实的真相是多余的，也可以说是不尊重对方的做法。
2. 以冷漠或者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上面所提到的情况，这对被害人来说是伤害并且是痛苦的。

对于性犯罪的被害人，要想正确培养他们的怨恨，没有比用平常心对待

^① 作者在一项涉及滥杀的研究中将“滥杀（mass killings）”定义为“在单独的一个案件中，在一个或更多的地方杀死3名以上的被害人”（Turvey, 2001）。研究还指出：“这一定义以被害人的数量为基础形成样本，其样本之间仍有很大的不同，大概对实际的研究太多了以至于作为一组来考虑。显而易见，犯罪学家所作的滥杀的研究相当狭窄。从这种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归纳法的心理画像或一般的犯罪心理画像，仅仅用于特殊类型的案例侦查（先作假设，如犯罪嫌疑人的年龄和动机），这种根据一般的情况进行的分析并不适用于侦查过程。”

他们或者善于倾听他们说什么更为有效的。每个被害人都应该被关注，应该被尊重，在他们能够充分合作前，应该给他们所需要的时间。因此，作者建议，对每一个被害者都应该安排一个单独的警察或专职的警员作为固定联系人，与之交流情况。

评估系列行为的策略

为了协助侦查人员形成完整的侦查策略，成功地认定并逮捕系列犯罪嫌疑人，同时为了及时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动机和意图，作者建议，考虑以下的行为策略。

被害人的选择

如果能够明白一个系列犯罪嫌疑人如何选择、为什么选择一个特定的被害者，我们就能够建立起一个被害者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地说，如果能够明白犯罪嫌疑人选择被害者的全部方式，我们就有很好的机会预测犯罪嫌疑人下一步即将选择什么样的被害者。

在确定犯罪嫌疑人可能如何选择被害者时，为了排除其他可能性，侦查员必须询问以下特定的关于行为证据的问题：

1. 被害者被伤害是偶然的还是有预谋的？

2. 如果是有预谋的，什么是犯罪嫌疑人选择的标准呢？

(1) 发生地的类型（如户内、户外、公寓社区、停车场、小树林、超级市场或者其他地方）。

(2) 职业（如妓女、无家可归者、色情舞女、学生、银行家、老师等）。

(3) 弱点（如喝醉、疲劳、心烦等）。

(4) 外形特征（如身高、体重、头发的颜色和样式、衣着等）。

(5) 爱好（如慢跑、徒步旅行、驾驶、逛街、睡觉、上网等）。

3. 如果被害者是被预先选定的，犯罪嫌疑人对被害者的行踪应该怎样进行预先观察呢？调查者和侦查人员在对那些与系列犯罪有关联的犯罪嫌疑人预先观察时又应该采取什么手段进行监控呢？

4. 如果被害者不可能被预先选定或预先观察，那么犯罪嫌疑人是否必须每天工作之余寻找他们？或者犯罪嫌疑人是否会游荡地寻找潜在的被害者呢？

5. 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主动出去寻找目标,被害者也没有被提前选定或者预先被观察,那么犯罪嫌疑人可能在日常的活动中选定被害者。这意味着再现被害者的生活方式、习惯和日常生活或许可以直接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生活方式、习惯和日常生活等特征。

犯罪嫌疑人离开时的策略

实施侵害之后,犯罪嫌疑人如何选择离开活着的被害者,这是我们了解犯罪动机和意图(以及他们的技能水平)的重要内容。由此或许可以得到以下信息:犯罪嫌疑人在犯罪之后想逃往何处,他个人的日程表,他需要多长时间逃离,以及他们是否关心这些被害者在将来的某一天会认出他们等问题。这些都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用的信息。当然,这些只是其中一部分办法,它们将因为犯罪嫌疑人个体的不同和犯罪环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答案。

犯罪嫌疑人可能会:

1. 留下清醒的被害者。
2. 留下昏迷的被害者(可能因暴力性质不同)。
3. 留下衣着完好的被害者。
4. 留下半裸或全裸的被害者(把衣服扔在现场、现场附近或带走)。
5. 对被害者不实施捆绑。
6. 捆绑被害者(属于使用暴力控制的种类)。
7. 留下可自由活动的被害者。
8. 使被害者失去活动能力、不能行动或需要医治(暴力性质)。
9. 将被害者留在现场或附近。
10. 使被害者远离现场。
11. 在攻击后,将被害者带到偏远地方以防他们逃跑。
12. 将被害者带到犯罪嫌疑人自己想去的(办公室、家里或朋友的房子里等)。
13. 对被害者进行肉体恐吓,例如,“别跟着我,否则杀了你”或“不许报警,否则我割断你的喉咙”。
14. 进行恐吓暗示,例如,“别跟着我,否则……”或“别告诉任何人,否则一定让你后悔”。

15. 命令被害人，例如，“别跟着我”或“从‘1’数到‘500’！然后离开这里”。

16. 提出合理化建议，例如，“你不应该自己单独来到这里”，“我本来可以对你做很多更坏的事。”或“你活该”！

17. 道歉，例如，“很抱歉”，“这不是我的错”或“我真的没想伤害你”。

现场处理

犯罪嫌疑人选择如何将死亡的被害人处理掉也同样反映了他们的犯罪动机和犯罪意图（有时可以反映他们的技能水平）。犯罪侦查人员必须尽力确定被害人尸体、证据和现场的联系。下面所列关于现场处理方面的问题，如果能得到答案，将有助于对犯罪的侦查工作：

1. 犯罪嫌疑人是否希望别人能够发现被害人尸体？
2. 犯罪嫌疑人希望被害人的尸体在何处被发现？
3. 犯罪嫌疑人希望被害人的尸体在何时被发现？
4. 犯罪嫌疑人希望被害人的尸体被什么人发现？

现场的方便性

这是指犯罪嫌疑人会选择对他自己来说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到达并且方便的地点为弃尸现场。犯罪嫌疑人将考虑时间的紧迫性，其自身的能力和体力能够将被害人尸体运送的距离，并且希望尸体不被发现。

自责

这是指犯罪现场的一些证据使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的死亡感到内疚。这可以从一些犯罪嫌疑人试图掩饰凶杀的行为中看到这一点，例如，洗掉被害人的血衣，换上干净的衣服；将被害人摆成一个自然状态，例如，就像睡着了，坐在椅子上或坐在车里。

预先选择

这是指犯罪嫌疑人会预先选择最终实施犯罪的地点，因为他们认为那个地方适合他们对被害人下手。在户外案件中，现场可能就是一块别人视力和听力所不能及、清静并远离行人的空地，或者是室内的某个地点，但犯罪嫌疑人必须有能力将被害人转移到这里。

反侦查表现

这是指犯罪嫌疑人努力破坏证据或用其他方法干扰侦查。犯罪嫌疑人还

可以毁坏尸体使之无法识别，例如，把它沉到水里洗掉证据，或将其放到遥远的、难以达到的地方，或者将其深深埋起来以阻止被发现。

制造假象

这是指犯罪嫌疑人图谋误导侦查，例如，犯罪嫌疑人可能把手枪放在被害人手里，或制造绳子勒死的现场假象以使案件看起来像是自杀。

现场摆放

这是指犯罪嫌疑人将在现场如何摆放尸体和一些东西作为一种仪式行为或为了实现某种幻想的表现。犯罪嫌疑人有时把尸体展示在公共场所，有时把被害人死后摆成羞辱的性姿势，有时抛尸地点是出于犯罪嫌疑人特别的仪式行为。案件中的尸体或现场被犯罪嫌疑人摆放的问题在于谁会看到如此安排——犯罪嫌疑人、执法人员还是其他到现场的人？

破案

在大多数关于系列杀人和强奸侦查的著作里几乎没有讲到案件是如何侦破的。Keppel（1989，p.4）提出了下列关于案件如何侦破的最贴切的注释：

成功的系列杀人案的侦查取决于所谓的侦破可能性因素的结合。它们有：

1. 访谈质量：警察对所有证人的访谈质量。
2. 最初作案地点：导致谋杀发生的最初作案环境。
3. 物证环境：判断能够找到凶手或其他谋杀物证的环境，尤其是每起案件中利于侦破的因素。
4. 勘查质量：对犯罪现场勘查的质量。
5. 对物证科学分析的质量：从凶手和其所属的物品中获取的证据与被害者和凶杀现场获取的物证进行的比较分析。

这并不是案件如何侦破的清单，而是成功拘捕和起诉系列杀人凶手的决定因素，它强调质量和彻底性，因此对案件侦破很有帮助。但是它并没有给我们所需要的全部。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侦破系列杀人案件的一般机制，也就是说，需要一个能使侦查人员确定犯罪嫌疑人的通常方法。

正如我们所讨论过的，利用犯罪心理画像者和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并没有典型地破过案。在侦查阶段，它为确定侦查方向和判定犯罪嫌疑人提供信息。在系列杀人案件侦查中，通常通过下列机制发现犯罪嫌疑人：

1. 供述。
2. 另一案犯对系列杀人犯的告发。
3. 犯罪嫌疑人的配偶、家人、朋友、同事或邻居主动提供的犯罪嫌疑人异常、可疑或犯罪活动的证据。
4. 被证人作证或识别认定的犯罪嫌疑人。
5. 躲过或逃脱犯罪侵害的人指认犯罪嫌疑人。
6. 曾被犯罪嫌疑人攻击但随后被放掉的被害者指认。
7. 曾被犯罪嫌疑人攻击但随后逃脱的被害者指认。
8. 因常规检查而被发现的犯罪嫌疑人（过期的车牌照、交通违规、停车违规等）。
9. 犯罪嫌疑人因为其他一般的犯罪、非暴力的犯罪而被逮捕（如盗窃、扒窃、流氓、伤害等），然后将其个人的身体特征与那些未破的案件材料进行并案分析而侦破，如指纹、身份证照片或 DNA 等。
10. 利用数据库的信息，诸如枪支登记、驾驶证、指纹或 DNA 等证据将已知的犯罪嫌疑人 与系列杀人联系起来而破案。
11. 成功的侦查工作需要对所有线索穷追不舍，对所有问题进行调查以得出结论，和其他的执法机关分享信息 及合作，排查物证以确定最终可能。

这些机制能够发挥最大作用以侦破案件，这需要一个警觉的、受过良好教育以及反应迅速的执法群体。演绎型犯罪心理画像过程作为一种侦查哲学来应用时，案件才能得以侦破。

借助媒体

前面已经指出，使用公众手段甄别疑难凶杀案件信息对于争取见证人、家庭成员和以前被害者提供识别犯罪嫌疑人的关键信息是一个有效的手段。媒体是社会侦查的“生命线”。如果我们要使社会与我们一起侦破案件，那么我们就必须提供给社会充足的信息。

犯罪心理画像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建设性部分。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媒体是把“双刃剑”。我们要求侦探给公众足够的信息以使他们成为侦查工作的有效延伸。然而，侦查人员也有同样重要的责任将足够的专门资料隐瞒：

1. 防止犯罪嫌疑人知道侦查工作的全部，并在获知破案信息后改变他的

犯罪惯技，使侦查人员丧失并案的机会和能力。

2. 认真审查那些相似点及虚假供述者。侦查人员还应该密切关注系列杀人案件的媒体传播面及媒体对案件侦破进度的跟踪报道，以决定哪些案件资料需要公布以及何时公布。然后，根据这些已经公布的犯罪嫌疑人信息来监控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惯技的变化，不论犯罪手法有多么细微的变化或变化得多么离谱，只要犯罪嫌疑人注意到新闻动向，并在获悉后作出反应，那么侦探们应该首先知道。

案例

在笔者看来，对系列谋杀犯的研究是以种族主义或种族为中心的。事实上，新闻报道的来源极少覆盖非白人的系列杀人和系列强奸案件，而这些新闻报道往往是系列杀人研究的主要来源（Fox and Levin, 1998）。除了种族因素，案件的选择也受新闻轰动性的影响。根据福克斯和莱温（Fox and Levin）的论述（1998）：

虽然最为人知晓和典型的系列杀人犯是杀害陌生人以满足性幻想，属于渴望权力的虐待狂，但系列杀人的动机和方式仍是完全不同的。譬如，一个为了“扮演上帝”用毒药杀死病人的护士被我们列为系列杀人犯，一个错乱的男子杀害妓女以惩罚她们的罪过，一队武装抢劫者从钱柜里抢钱后杀害商店的店员，邪教成员成排成行地死去以作为一种仪式的开始。

下列案例（这里列出了多种系列杀人案件）用以给读者对各种各样实际的系列杀人犯罪的实用理解，并且告诉读者各种动机的可能性。读者们将再次被提醒，强奸和杀人是行为，而不是动机，它表达了犯罪嫌疑人的需要。从这一观点出发才能加深在案件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理解。

加利福尼亚州 洛杉矶——大卫·卡彭特案件（Los Angeles, California——David Carpenter）^①

大卫·卡彭特（David Carpenter）是个“路边杀手”，在1980年到1981年期间频繁威胁着加州人。在十多个月的时间里，卡彭特在 Santa Crus 和

^① 原文为：CALIFORNIA v. DAVID JOSEPH CARPENTER, 1999（译者注）。

Marin Counties（地名）攻击偏远小路上的步行者，用0.38cm口径的罗斯左轮手枪枪杀了7个人，并强奸了其中两个人。后来卡彭特被判了死刑。加利福尼亚州诉卡彭特·大卫一案（California v. David Joseph Carpenter, 1999）记载其犯罪如下：

1980年10月11日，Moreland和Richard Stower（受害人名）在Point Reyes（地名）国家海滨的一片茂密的树林里靠近人行道的地方被子弹击中了头部。步行者报告说在那天大约下午1时到2时听到枪声。在1980年11月29日发现死者的尸体脸朝地，相互挨着。

1980年10月13日，Anne Alderson在Mount Tamalpais（受害人名）在靠近人行道的地方被近距离枪杀，致命的子弹击中了头部。附近旅馆的看守最后看见她活着是在那天大约下午5时30分。两天后发现了她穿着衣服的尸体，其阴道里有精液，这意味着她在死亡前后曾发生过性活动。

1980年11月28日，Diane O'Connell和shauna May（受害人名）在Point Reyes（地名）国家海滨被子弹击中了头部。附近的步行者在那天大约下午3时10分听到枪声，在10分钟以后接连听到更多的枪声。第二天，她们赤裸的尸体脸朝下挨着倒在地上，离Moreland和Stowers（受害人名）的尸体距离将近200码。一双内裤被塞在O'Connell口鼻之中，在她胳膊上缠有带血的连裤袜。物证提示O'Connell可能是被紧紧的绳子或电线勒死的。在她体内没有发现精液。然而，May的阴道和直肠里有精液，提示在死亡前后发生过性交。在May的左腕子上发现有绳子的痕迹。

1981年3月29日，Steven Haertle和Ellen Hansen（受害人名）在Santa Cruz Mountains（地名）的人行道上遇到一名持枪歹徒。那个歹徒说他要强奸Hansen，然后开了两枪，杀死了Hansen。Haertle活了下来并将事件说明，证人看到犯罪嫌疑人开一辆红色的菲亚特轿车离开现场。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卡彭特（犯罪嫌疑人）开着他的红色菲亚特（他的两辆车中的一辆）到Martin Country（地名）的一个朋友家，借用了她的车，把菲亚特轿车在她家放了4天。

1981年5月2日，Heather Scaggs（受害人名）让卡彭特开车送她到Santa Cruz（地名），想从她的朋友那里买一辆车。她和卡彭特在加利福尼亚海达德市的（Hayward）贸易学校曾是同学。Scaggs（受害人名）那天早上离开家以后就没有人再看见过她。1981年5月24日，过路人在Santa Cruz Country

(地名) 距离道路 136 码的国家公园的山中树林里发现一具裸露并腐烂的尸体, 距离 Henry Cowell (地名) 国家公园 19 公里到 24 公里。牙齿记录表明这就是 Heather Scaggs (受害人名) 的尸体。她被近距离一枪击中面部。检查发现她阴道里有精液, 表明曾受到性攻击 (California v. Carpenter, 1999)。由于卡彭特是最后看见她活着的人, 于是成为了犯罪嫌疑人。

卡彭特最后被弹道学的证据证明为凶手 (子弹是从他向一个女性朋友那里买来的枪里射出的)。此外, 证人辨认出他就是那个在小路上的持枪歹徒, 并且辨认出那辆在那小路上看到的车 (红色菲亚特)。精液的证据也证明与一名被害者内裤上精斑相一致 (California v. Carpenter, 1999)。

这起案件中的犯罪动机是一种与虐待紧密相连的过度自信力量型动机 (power assertive) (详见第 16 章)。

马里兰州 巴尔的摩——梅斯尼·乔·罗伊案件 (Baltimore, Maryland——Joe Roy Metneny)^①

梅斯尼 (Joe Roy Metneny), 45 岁, 在一个公司 (Joe Stein and Son Pallet 公司名) 里当一名叉车司机, 他住在巴尔的摩市西南面公司的一辆拖车里, 他承认杀害了 10 个人。1996 年, 他因谋杀 Kimberly Spicer (受害人名) 而被捕, 并向警方承认还杀害了另外 9 个人。然而, 迄今为止, 侦查人员只掌握已指控的谋杀 3 个女人的证据: Catherine Magaziner (女受害人之一), 45 岁; Toni Lynn Ingrassia (女受害人之二), 28 岁; Kimberly Lynn Spicer (女受害人之三), 26 岁 (Kunkle, 2000)。

根据 2000 年马里兰州诉梅斯尼·乔·罗伊一案 (Maryland v. Joe Roy Metneny, 2000) 的记载, 梅斯尼的供述情况如下:

他用了一个小时将玛格齐娜 (Magaziner) 夫人拉到他的拖车里, 用手和绳子勒死她。彭宁顿 (Pennington) 侦探问他: “你怎么勒死她的? 你是用手还是……” 梅斯尼回答: “用手。” 彭宁顿侦探又问: “你还用别的什么吗?” 梅斯尼回答: “我用一条绳子。我拿着绳子的一头勒她, 她……昏了过去, 我就用一根绳子绕在她脖子上, 嗯, 是一根松紧绳, 并且杀死了她。” 被告谈及以后的事: “把她拖进树林并埋了起来。” 几个月以后, 他回到尸体埋藏的地

① 原文为: MARYLAND v. JOE ROY METNENY, 2000 (译者注)。

方并转移了她的头骨。

当问到他是什么时候勒死被害者的时候，被告开始说：“大约是在1994年7月3日。”彭宁顿侦探问：“你为什么选择7月3日？”被告回答：“因为我知道7月4日在那个范围，可能是……可能是那两天……那是，那是7月的头两个星期，我想是那样。”

被告提供的识别信息包括他认为被害者姓凯思（Cathy），身高大约为167厘米至170厘米，体重约54千克至59千克，深色头发，缺两颗上前牙，她穿着短夹克、白色网球鞋和袜子、白色套领毛线衫并带着一个钱包。梅斯尼还告诉彭宁顿侦探玛格齐娜夫人在被杀害的时候衣着不整。彭宁顿侦探问道：“那衣服呢？”被告说：“我想我把衣服和钱包一起埋了起来。”被告重申他以前带侦探们去过埋衣服和钱包的地方。侦探又问：“你说她穿什么颜色的鞋？”被告回答：“我觉得是白色的网球鞋。”侦探说道：“白色的网球鞋吗？（停顿）你是否……是否在埋了她的或……以后又重埋了……她的衣服？”被告回答：“是的。”

在这次讯问中，被告解释了他埋了衣服和钱包是什么意思。他说道：“我埋了它们但是埋得很浅，就像在它们上面盖了一层浮土一样。”

……被告说在1994年7月杀害了她，之后将尸体埋藏，但他曾试图帮助那个女人苏醒。并且，被告说杀害被害者的时间是在1994年7月3日，后改口说是1997年元月3日，又改口说是1994年7月3日。当问到为什么他杀害那个女孩的时候，他回答说：“一种力量的感觉，我不知道，易冲动的，我害怕，只是……我觉得异乎寻常……那种感觉奔涌而出，刺激超乎想像，随便你怎样称呼那种感觉。我没什么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喜欢那么做（停顿），我没法形容这一切。”被告对抢劫的证据陈述如下：当被告遇到被害者的时候，她衣着完好并拿着一个钱包；在他和她发生性交的时候，她穿着一些衣服；他勒死她以后，把裸体的尸体埋了起来；最后，他说在埋藏尸体以后，他在另一个地方埋了她的衣服和钱包。

12月18日，梅斯尼带侦查员找到了尸骨，后来经法庭牙医专家鉴定，证明就是玛格齐娜的。此外，对玛格齐娜尸体的法医检验也表明，她可能由于勒杀或休克导致窒息而死亡。这增加了梅斯尼对杀害其他被害者的供认的可

信度。

由于可用的行为信息有限，侦查员不可能确切地指出梅斯尼的犯罪动机。

新泽西州 纽华克——罗杰·霍伊特、拉里·梅奥和安德烈·托雷斯案件（Newark, New Jersey——Roger Hoyte, Larry Mayo & Andres Torres）^①

在1995年10月21日到11月8日期间，3名纽华克（Newark）的出租车司机在他们的驾驶室内被枪杀。在每起案件中，受害者都是被0.22口径的手枪近距离平射致死的。并且每个被害者的鞋在发现尸体的时候都不在现场。这些杀人事件被当做系列杀人而被媒体广为报道。警方受媒体的压力而努力侦查，他们分析认为，拿走被害者的鞋是犯罪嫌疑人满足幻想意义的奇异的仪式行为。

根据新泽西诉托雷斯·安德烈一案（New Jersey v. Andres Torres, 2000）的记载：

这些杀人案件的侦查一直没有头绪，直到1995年11月16日，一名证人（Tamika McGriff），即检举人给艾塞克斯（Essex）州长的制止犯罪热线打电话，说她能确定凶手是谁，此案才得以侦破。在随后对杀人案件检举者访谈时，证人叙述了霍伊特（Hoyte）和其他2名被告等3个人在前一天晚上看电视新闻广播的时候的原话。当电视评论员说到“系列杀人”时，霍伊特大叫：“这可能是我们！我们制造了新闻！”新闻报道提到“鞋子丢失被怀疑有某种奇异的仪式行为”时，这激起了霍伊特的情绪，霍伊特立即说道：“我们拿走鞋子是因为指纹的原因。”霍伊特描述了被告如何拉着他们的脚把司机从出租车上拉下来，因为“他们不能开着有尸体的汽车……”霍伊特解释说，他们拿走被害者的鞋是为了使警察取不到他们的指纹。这时，其他被告愤怒地打断霍伊特生动的犯罪描述，命令他“住嘴”，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证人还叙述了被告先前责难的话。杀了第二个人以后，霍伊特曾询问证人的鞋码，并拿出一双鞋让证人看。据证人说，当时被告还向霍伊特抗议道：“别给她看活人的鞋。”在第三起杀人发生后不久，被告对证人泄露说，霍伊

^① 原文为：NEW JERSEY v. ANDRES TORRES, 2000（译者注）。

特“捕获了一个人，挣得了他的车资”。证人问其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霍伊特杀害了一个出租车司机。证人还间接提到先前的杀人事件，当时，其他2名被告和霍伊特在“玩枪”，“把枪扔来扔去”。在审判的时候，证人认出了凶手被捕后发现的武器，“看起来像”她曾经在霍伊特和被告那里看到的那枝枪。

由于这些线索，警方获得了搜捕令，并在托雷斯·安德烈（Andres Torres）卧室的一个皮文件包里发现了第一名被杀者的身份证，于是，他供认自己参与了这起杀人案。

这一案例并不是什么奇异的系列杀人案，这类犯罪事实就是图财害命。杀人是为了灭口（反侦查行为），处理尸体和拿走鞋则是有计划地隐藏证据，或转移罪证（反侦查行为）。

南非 岗坦——大卫·门格瓦案件^①

在1996年到1998年之间，这个34岁的北方农业局的雇员门格瓦在Giyani（地名）袭击了数对在“情侣路”上停留的夫妇，导致至少有8人死亡。他相信自己是上帝派来的神的特使，并且带着一本圣经，其中有关性行为的段落下方都画了横线，他把目标放在有车的男性身上。据幸存的5名妇女介绍，在靠近车辆和开火之前，他不说任何话或者没有任何接触。其中一名男性受害者中了14枪。至少有3个被害者是警察和他们的女朋友。

按照新闻报道（Gauteng Sunday Time, 1998）：

门格瓦（Mr. Mmbengwa）在“7日猎捕”行动中被特别行动队抓捕，他是在一个星期二在其租借的Kagiso镇西边界的小木屋被抓获的。行动组曾使用了由Myburgh（一位警察心理学家）提供的精神病人的心理画像去认定和追捕门格瓦。

关于门格瓦精神方面的心理画像不能被说成是超越必要的侦查工作的首要侦查手段，因为如果精神方面的心理画像提到的是一个未知的犯罪嫌疑人，那将对侦查工作起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犯罪嫌疑犯的范围。如果精神方面的心理画像提到的是一个已知的犯罪嫌疑人，那么，犯罪嫌疑人可能早被先于心理学家的侦查人员所注意。因此，如果一个精神方

^① 原文为：SOUTH AFRICA v. DAVID MMBENGWA, 1998（译者注）。

面的心理画像提到的是一个已知的人，那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心理画像，而是一个评估。

本案的动机是认为杀人是上帝的安排，在其走火入魔的信念刺激下产生的愤怒报复行为。

伊朗 德黑兰——阿里案件（Tehran, Iran—Ali Reza Khoshruy Kuran Kordiyeh）

在 1997 年的 8 月，来自伊朗德黑兰的这位 28 岁的男人因绑架、强奸和谋杀 9 名年龄在 10 岁到 47 岁之间的少女和妇女，其中包括一位母亲和女儿，被判处死刑。他伪装成一名无照出租汽车司机，从那些寻求他服务的人员中选择他的被害者。当他对她们实施完犯罪之后，他便烧毁她们的身体以致使她们不能被辨认。他因此在媒体中以“德黑兰的吸血鬼”而闻名。他在 4 个月中杀害了这些被害者。

警方最初在商场看到 Kordiyeh（犯罪嫌疑人）行动可疑使其将其抓获。后来，他承认了犯罪行为。Maryam Bakhti（受害人名），29 岁，几乎成为 Kordiyeh 的被害者，她在法庭指认了他（CNN，1997）。

埃及 开罗——阿伊达案件（Cairo, Egypt—Aida Nur el – Din）

1997 年 8 月，这位 42 岁的女护士承认在亚历山大（Alexandria）大学 EL – Mairy 医院杀害了 18 名病人，因为他们大喊大叫并打扰她的工作。她通过注射从医院药房偷来的药品杀死了他们。当她被检察官带到了起诉办公室时，她承认了罪行，并试图从三楼的窗户跳下自杀。

当时，医院的主管发现在几个月内许多重点护理组的病人都突然死亡了，阿伊达（Aida Nur el – Din）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医院主管报告给检察官并开展调查，最后疑点全部集中在她身上（Miami Herald，1997）。

参考文献

1. California v. Carpenter(1999) No. S006547, Nov. 29, 1999 (90 Cal. Rptr. 2nd 607).
2. CNN (1997) "Iranian Murderer Publicly Whipped and Hanged", August 13.
3. Fox, J. A. and Levin, J. (1998) "Multiple Homicide: Patterns of Serial and

Mass Murder", Crime and Justice 23, 407.

4. Gauteng Sunday Times (1998) "Accused Killer' Believed He Was on Divine Mission'", July 19.

5. Keppel, R. (1989) Serial Murder: Future Implications for Police Investigators, Cincinnati: Anderson Publishing Co.

6. Kunkle, F. (2000) "Md. High Court Lets Serial Killer Live", Washington Post, July 25, p. 804.

7. Maryland v. Metheny (2000) July 24, 2000 (755 A.2nd 1088).

8. Miami Herald (1997) "Nurse confesses to killing 18 patients", August 17.

9. New Jersey v. Torres (2000) Feb. 10, 2000 (744 A.2nd 699).

10. Ressler, R. (1992) Whoever Fights Monster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1. Turvey, B. (2001) "Mass Killings: A Study of 5 cases", Journal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2 (1, June).

第 26 章 系列强奸

Brent E. Turvey, M. S.

强奸本身包含着许多内容，也许它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也许是一种用于折磨人并使人痛苦的手段，也许是某些人用来证明自己男性力量的一种方式，或许还是一种获得性欲满足的方法。有许多男人发生过强奸，他们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做过特别离谱的事。

贝克·凯瑟琳（Katherine Baker, 1997）

系列强奸犯（serial rapist）是指那些有两次或两次以上涉及强奸或性攻击行为的人。根据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系列强奸犯往往是成功的犯罪人，因为警方在他们实施多次犯罪后仍然很难及时地将他们的案件串并起来，因而不能认定他们的罪行并逮捕他们。然而，他们的犯罪不局限于强奸罪或一般意义上的性犯罪。犯罪人不一定是某一类型犯罪的行家，他们实施的犯罪范围可能相当广泛。

在匆忙的侦查中，人们很容易认为强奸犯仅仅实施了强奸行为，而忽视他们可能还是其他案件的实施者。在西蒙的著作中曾提到一起因为忽视这方面问题而引起危害的案例（Simon, 1997）：

20 世纪 80 年代末，亚利桑那州（Arizona）的图克逊（Tucson）曾被笼罩在一个被称为“黄金时段强奸犯”的系列强奸犯所带来的恐怖气氛中。因为这个强奸犯会在晚间新闻时间闯入受害人家里进行强奸、抢劫并蹂躏全家人。这个强奸犯在好几年间逃过了抓捕，直到有一个线人将他告发，才使他被捕。遗憾的是，警方仅仅关注那些先前有过性侵犯行为的人群，并在他们中寻找该犯罪嫌疑犯。这名犯罪嫌疑人被捕后，发现他没有性侵犯行为的历史记录，却曾有过其他几种严重犯罪行为，并受到多次相关的指控，包括毒品、盗窃及抢劫。这一案例说明，把视点聚焦在犯罪人所犯的最严重罪行上，

就可能忽视他或她实施的其他罪行较轻的各类犯罪事实，这同样会阻碍警方为逮捕一个最危险的犯罪嫌疑人所做的努力。

为了在某种意义上减轻此类犯罪的伤害，有必要探讨强奸犯为什么进行强奸这一问题。

强奸犯的动机

强奸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中，也不可能是天然发生的。它是一种可以看得到的极端的行为表达形式，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在行为发生之前经过预谋的。任何性犯罪发生之前，强奸犯一定存在以下四个预备条件（Hamill, 2001）：

1. 他们一定存在着某种实施犯罪动机。
2. 他们一定有犯罪前的准备，这种准备是为了使他们克服自身的压抑（使他们产生实施性犯罪的信心）。
3. 他们必须能克服外部环境的限制并可以接近被害人。
4. 他们在对被害人实施性行为的过程中必须有能力对付被害人的反抗。

每起性犯罪的发生都表明，犯罪的完成必须具备这些条件，而且，强奸犯必须具有强烈的动机，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推动他进行这些犯罪准备。所有的强奸犯其动机都有所不同，但是，强奸犯罪的动机又有某些共性特征，以下将讨论这些共性特征（详细分析参见第16章）：

贝克·凯瑟琳（Katharine K. Baker, J. D.），法学博士，芝加哥—肯特法学院法律专业副教授，在她的关于强奸犯行为和动机的研究中，她去掉了某些用于解释犯罪行为的随波逐流的观点及陈词滥调。在表述她自己的强奸动机类型学的观点中，结合格罗茨的类型说，富有哲理地论述道（Baker, 1997）：

对于“为什么强奸”这一问题的答案事实上随不同的情况而定，强奸犯并非都是出于同一理由进行强奸。我们通过对“为什么强奸”进行深入研究后已掌握了基本情况——陪审团也关心这类问题，他们也需要深入了解“为什么强奸”的问题。

这种观点得到了汉密尔（Hamill, 2001）的赞同，汉密尔讨论强奸行为的动机时说：

我们都体验过这样一种需要，即需要能够充分控制我们生活的那种感觉。许多对儿童的骚扰者，当他们利用引诱和怂恿的计谋去说服孩子发生性行为时，就会感到自己的能力。这被称做“权力型强奸犯”，他们利用性暴力行为感受对被害人，广义地说是对被害人的生命进行控制的感觉。第二类性虐待的主要动力是出自于想在感情上和另一个人建立更高亲密度的愿望。一些骚扰儿童者，甚至一些跟踪妇女的人，主要动机是出自于渴望有亲密的个人关系。第三类性侵犯是为了发泄愤怒。一些强奸犯把性攻击作为他们发泄愤怒和受挫感的一种方式。有相当一些露阴癖者通过让陌生人感到震惊，以求发泄不满。第四类强奸动机是渴望获胜的感觉。一些性侵犯者，不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如果他们感到在性方面的知识和体验比同龄（同类）的人缺乏时，他们就会选择“减小障碍”的对象，从而与年纪较小的孩子发生关系。第五类性侵犯者进行侵犯行为时是为了满足性方面的好奇心，这种情况特别常见于未成年人。

当然，一些强奸犯进行性侵犯主要是为了体验性快感，他们之中很多人所犯的强奸罪或对孩子的性虐待都表明了他们的性嗜好（倾向）。

本文作者对贝克（Baker）的强奸动机类型说极有兴趣。贝克虽然在精确的分类中没有过多的表述，但是，她对强奸犯与被害人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过去，强奸行为的动机一直被视为是很难说得清的问题。贝克的类型说则分出了七种强奸动机，类型如下（Baker, 1997）：^①

性和做爱（sexing and lovemaking）：这类强奸者的强奸行为反映了他们混乱的性取向和试图体验亲密行为。这种体验可能成为强迫性的，因为许多男孩受到的教育是力量、占有和暴力可唤醒女人，如贝克（1997）所述：

为什么强奸总发生在晚上，因为这些男人或许想寻求性的体验，他们或许想与人分享性快感和亲密行为，这就是他们的动机和所想要得到的。对于

^① 虽然贝克在1997的著述中没有展开讨论，但当时作者已经提出这一观点：将女人视为物件、无所谓的、男人的财产。笔者认为，贝克的类型说可用于任何一种性犯罪的分析，从而可以忽略被害人的性别，这正是作者的观点。任何人都可以是低贱的，任何人都可以在性方面被忽略，任何人都可以被看做是财产，尽管作者也认为，女人在这些方面被害的几率要比男人高得多。

他们来说，性或做爱能代表或帮助他们达到目的。但事实上，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寻求什么，这种抽象的目的也被具体为做爱。因为，让他们理解性爱、性欲、性快感和亲密行为必须有相互理解式的沟通是极为困难的，特别是当一个人还很年轻且没有经验时。

性和商店扒手（sexing and shoplifting）：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性被看做是可以用来买卖或进行交易的商品文化（甚至是世界）中，一些侵犯者就是这样看待女人的。当某些东西被贬值或被贱待时，很容易被看做是商品，被购买或是被偷走，如贝克（1997）所述：

大多数男人受此教育：性欲如同食欲，当饥饿存在时就要满足。女人就是糖块。当然，食物不是免费的，性也不是免费的，由于男人可以买，那么，性本身也就不必经过同意，花钱即可得到它。现实社会中已形成的这种看法强奸犯在道德上所受到的谴责比其他暴力犯罪嫌疑人所受到谴责少得多。因此，（强奸）不足为奇！一项研究发现，39%被指控的强奸犯都是在抢劫的过程中被发现的。很多男人承认，他们强奸是因为看见她正好就在那儿，反正已经犯了非法侵入罪和非法占有罪——为什么不可以再多加一条呢（再多加一条强奸罪也无所谓）？

结伙（uniting）：这种动机主要用于描述群体或团伙实施的强奸行为。它涉及的动机往往是这一团伙要向外界表明哪些需要，或者以此来表达自己从属于某一团伙的感觉，如贝克（1997）所述：

男人们通常通过强奸女人来向别的男人表示他们的力量、杀伤力和男子汉气概。对于这些男人，有一个观看的人是重要的，性交是有助于他们显示自己力量的工具。

分歧（dividing）：这种动机涉及这样一种看法：男人如果感觉到女人是别的男人的财产，那么，强奸别人的女人可以证明他有力量战胜别的男人，如贝克（1997）所述：

这种利用强奸去侮辱和贬低其他男人的做法在出于种族的原因时具有特别的作用。克利弗·埃尔德瑞格（Eldridge Cleaver）描述得最贴切：“强奸是一种造反行为。蔑视和践踏白人的法律和价值观，以及玷污他们的女人，这些使我愉悦——我感到（玷污他们的女人时）我正在报仇。”像克利弗（Cleaver）自己承认的那样，他最初强奸黑种女人只为练习，但使他系列强奸

白种女人的动机则是他想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白种男人。

权力（power）：这种强奸动机用来表明：犯罪人具有凌驾于一个特定被害人之上的权力。它可以解释许多监狱里的强奸和婚姻中的强奸动机的来龙去脉，如贝克（1997）所述：

这种动机可以解释许多种类型的强奸。例如，监狱里的强奸犯或许会用强奸行为建立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监内霸主权，通过占有他的被害人，他可以提升自己的位置。他还可以因此在监狱里的小群体内树立权威，因为，正像那些与别人分享或向别人展示强奸行为的人们一样，他发出的信息是：“因为我强奸了，我就有资格得到你（你们）的尊重。”

与前述的多种强奸动机不同，因权力而强奸的强奸犯只为建立控制特定被害人的权力而进行强奸。确定目标/被害人是重要的。因权力而强奸的人有控制他们选择的特定被害人的愿望，他们的强奸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

丈夫对妻子的强奸是为了表明自己能够控制不服从他的命令的妻子，他的妻子也许不想进行性活动，或者她也许仅仅是使他生气了。他用强奸的方式去控制她，使她从属于他。通常，丈夫同样以非性攻击的方式攻击他的妻子：他可能用拳打，把她扔到楼下；他可能向她开枪；他可能掐住她的喉咙；有时他会用强奸的方法。与监狱里的男人不同，做丈夫的男人在他的火药库里有很多武器，他的阴茎仅仅是其中之一。但是，与监狱里的男人相同的是，他也利用他的阴茎去建立控制他的被害人的权力。

愤怒（anger）：愤怒中的强奸犯会攻击被害人全身所有的部位，且重复这些行为，包括与性侮辱无关的行为，他对被害人使用的暴力比实际需要的多得多。

性虐待狂（sadism）：与格罗茨（Groth，1979）的论述相同，贝克（1997）的争辩也有着同样的错误，即性虐待是愤怒的产物，天长日久后变为性方面的攻击，这种行为是从愤怒发展起来的（关于性虐待的解释参看第21章“虐待狂行为”）。

在贝克讨论的强奸动机类型总结中，她（1997）提供了如下提示：

70%的强奸被害人报告说没有形成身体上的伤害，另有24%的性被害人报告说只有很小的身体损伤。绝大多数的强奸被害人不是愤怒的、性虐待狂

的牺牲品。这并不意味着绝大多数被害人不是被强奸的，也并不表示强奸被害人编造了事实，同样并不表示对在她们身上发生的事无所谓。如果这样认为将是对多数人的信念的误解。强奸犯就是疯狂的男人，为性欲而虐待所猎取的对象，或因为憎恨女人而实施强奸。

这是一种非常有用且受欢迎的见解。^①

抓捕系列强奸犯

正如“系列杀人”一章中所讨论的一样，大多数关于以系列强奸调查为主题的内容较少或没有注意到表明这些案件是如何被破获的。经过实践总结，在一系列调查中，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通常经过如下手法得以揭露：

1. 供认。
2. 另一犯罪人对系列犯罪人的告发。
3. 犯罪人的配偶、家人、朋友、同事或邻居前去报告犯罪嫌疑人的异常、可疑或犯罪活动的证据。
4. 被证人作证或识别而认定的犯罪嫌疑人。
5. 躲过或逃脱犯罪侵害的人指认犯罪嫌疑人。
6. 曾被犯罪嫌疑人侵犯但随后被放走的被害人指认。
7. 曾被犯罪嫌疑人侵犯但随后逃跑的被害人指认。
8. 因常规检查而被发现的犯罪嫌疑人（过期的车牌、交通违规、停车违规等）。
9. 犯罪嫌疑人因为其他的一般犯罪、而非暴力犯罪被捕（如盗窃、扒窃、流氓、伤害等），然后将其能证明个人的身份的物证等与那些未破的案件材料进行并案分析，如指纹、身份证照片和 DNA 而破案。
10. 利用数据库的信息，诸如枪支登记、驾驶证、指纹或 DNA 等证据将已知的犯罪嫌疑人于系列案犯联系起来而破案。
11. 出色的侦查工作，包括跟踪所有的细节，对全部线索进行调查，与其他执法机构互通信息并进行合作，查验物证，尽量做到水落石出。

^① 这段摘录的确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即强奸的虚假报案仍是少数。关于这个话题的详细内容参看第10章“虚假报案”。

以上所列的内容完全依据本书作者关于 126 例已破的系列强奸案的研究而来。以下所述案例也出自这些材料。^①

案例

达瑞尔·T. 肯普（Darryl Thomas Kemp）系列强奸杀人案

达瑞尔·T. 肯普（Darryl Thomas Kemp）经过法庭的审判最终被指控犯有以下罪状：1957 年 6 月 10 日谋杀希普森案（Marjorie Hipperson），1959 年 7 月 15 日强奸并绑架谢尔顿·依·海伦案（E. Helen Shelton），以及 1959 年 5 月 12 日强奸谢尔曼·丽拉案（Lelah D. Sherman）。他以患有精神病为由拒不认罪。

关于谋杀希普森案（Marjorie Hipperson），见加利福尼亚州诉肯普案一案的记载（California v. Darryl Thomas Kemp, 1961）：

希普森小姐于 1957 年 6 月 10 日早上被人发现已被强奸和谋杀。在她死亡之前，她在洛杉矶的一公寓里居住，在附近的医院里从事护士工作，与医院的实习医生戴克（Deike）博士订了婚。1957 年 6 月 10 日晚上，医院的员工们办了一个聚会，并给戴克博士和希普森小姐送礼物。大约晚上 11 时 30 分，希普森小姐离开了医院，独自开车回家，戴克博士因为那天晚上在医院值班，所以不能陪她。第二天早上，希普森小姐没去上班，戴克博士就去了她的公寓看看是怎么回事。他发现公寓的前门从里面被挂链锁上了（没有后门），一面后窗的纱窗被摘掉，窗户开着。他从窗户进到公寓里，发现希普森小姐的尸体躺在她卧室的床上。她面朝天躺着，睡袍揉成一团环绕着她的上身，一只长袜包裹了她的脖颈，另一只包裹了一只手腕，她的脸旁边有一条浴巾。她的嘴是青肿的，她身体的不同部位还有一些地方是青肿的。接下来的调查表明，她被强奸了，因窒息而死。很显然，浴巾被用来塞进嘴里，她手腕上的长袜被用来捆绑她的手。指纹专家的调查发现，在床旁边的墙上有一个手

^① 这些案例（以及在本书中其他地方引用的强奸案例）都为读者提供了侦破各类系列强奸的实用知识以及可能具有的动机。这些再次提醒读者，强奸和杀人是一种行为，而不是动机，它是犯罪人的需要体现。以此视角看待这些案例，就会更加透彻地理解所列举案例中的犯罪人。

掌的部分掌纹印，在窗户框上有另一个手掌印，显然是犯罪嫌疑人从窗户进入时留下的。墙上的手掌印与被害人臀部的直接距离约为46厘米，窗户框上的手掌印显示留下手印时手指是面向房间里的。

.....

医学尸体检验证明被害人是被掐住窒息致死的。阴道的内伤、精液和精子的情况表明，阴茎是强行进入阴道的。

住在希普森小姐旁边公寓的玛丽·韦伯（Marie Weber）小姐提供的证据表明，被告人熟悉希普森小姐所住的公寓。韦伯小姐说，1956年的某一天，有一张手写的纸条从她公寓的门底下递进来，上面用印刷体写着，他曾看到她裸露的身体，并且建议他们可以在一起相互满足——被告人被捕后，他笔迹的样本被获得，笔迹鉴定专家证实，纸条上的字迹出自于该被控诉人的手笔。

关于谢尔曼·丽拉（Lelah D. Sherman）被强奸一案，见加利福尼亚州诉肯普案一案的记载（California v. Darryl Thomas Kemp, 1961）：

谢尔曼（Sherman）女士的陈述是：1959年5月12日，她在洛杉矶的一个公园里写生。大约下午3时45分，她开始步行前往汽车站，这时在她旁边有一辆车缓缓跟着她，车里的被告人主动和她打招呼，并主动提出可以让她搭车。她上了他的车后，他将车启动并掉头向山上开去，谢尔曼女士对此提出抗议，他却告诉她，他想让她看一处景色，那里有非常好的写生素材。当他们到达山的高处时，被告人停车并让谢尔曼女士下车。被告人给她指了一条小路，告诉她风景就在那个方向。当她沿着那个方向走了一小段后，他止住她并将她推倒，然后他告诉她，反抗是徒劳的，最好还是服从他，否则他会把她从这个险峰扔到山下。山谷很深，她非常害怕，他用暴力将她按倒在地，她试图反抗，但是他用一只手按住她，另一只手解开她的裤带并脱掉她的内裤，他脱掉了裤子与她性交。这一切都结束后，她非常害怕，不知道她怎样离开这里。她从地上起来，穿好衣服，开始沿路行走。被告提出可以让她搭他的车，送她到公共汽车站，因为他们处在很高的山上，所以她又回到了他的车里。在下山途中，被告人问她是否喜欢跳舞，她想诱捕他，所以，她说她非常喜欢跳舞，并且安排下星期六晚上在好莱坞和万恩的药店与他见面。当他们到达Vermont大街和Sunset时，她请求下车，被告人停了车，她跳

下车去，跑到一家餐馆，立即打电话给警方。警方赶到后，她告诉了他们她被强奸的事和关于下个星期六晚上的安排。按照警方的建议，她按时如约前往，但被告人没有出现。

关于绑架谢尔顿·依·海伦（E. Helen Shelton）案件，见加利福尼亚州诉肯普案一案的记载（California v. Darryl Thomas Kemp, 1961）：

谢尔顿（Shelton）女士也是一名护士，她的陈述是：1959年7月15日下午5时20分，她正开车经过格里菲姿公园一个僻静的地方时，被告开着一辆绿色的吉普车超过了她并强行让她停车。被告人向谢尔顿女士的车走近并主动和她打招呼，介绍自己是公园管理员，告诉她这条路不通，她得拐弯，这样说着，他就靠近了她的车。她的两个车门都锁着，但靠着司机那边的车窗开着。被告人把手从车窗伸进车里并打开车门。他抓住她的头发把她从车里拽到外面的地上，然后在地上打她的头，并说：“我要杀了你，你就要死了。”他连续殴打她，直到她浑身毫无气力。他把她拽到非常偏僻的地方将她摔倒在地，然后踢她。他扯掉她的一只袜子试图缠住她的脖子时说：“噢，混蛋，它太短了，不够长。”然后他扯下他的一部分衣服并用十分清楚的语言告诉她：他要强奸她！他一直打她并威胁要杀了她。在她被打得失去知觉前，她听见他说：“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就像我对希普森（Hipperson）那样。”被告人随后用一块石头打当事人并勒住她直到她失去知觉。真正进行强奸时，她一点知觉都没有。当她醒来时，她的阴部剧烈疼痛，这时，被告已经跑了。她艰难地沿路爬行。

.....

警方证明，他们到达时她浑身青肿并流着血，她告诉他们她被强奸了。他们把她送进医院。一些污物被取走以进行检查。她的确被强奸了，在她的阴部有精液和精子，她还受到了严重及野蛮的殴打。她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直到审判时.....

此案的侦破是由于谢尔顿女士向警方详细描述了侵犯她的人所驾驶的轻便小货车，于是警方从这方面展开行动。同一天晚上的晚些时候，洛杉矶的一名警官看见了一辆车，它与谢尔顿女士描述的那辆车十分相像，于是追了3个街区之远，终于将它擒获。在这辆由肯普驾驶的汽车里装有他的个人物品，包括一件衬衫和一件外罩，它们与谢尔顿女士描述的侵犯她的人所穿的衣服

相似。警方在那儿逮捕了肯普。最终，他伤害过的每一个被害人及他在谋杀现场留下的指纹都认定，他就是那个犯罪人。

两个由法院指定的司法精神病学家确定，肯普是一个性精神病患者，然而，他们也确定，无论他在犯罪时，还是在他们对他进行测试时，从法律角度看，他都是神志正常的（California v. Kemp, 1961）。

这个案例涉及了愤怒－报复型（anger－retaliatory）动机的侵犯行为，这种行为包含着危险极大的惯技和标记。首先，惯技包含用捆绑的方式控制被害人，这种控制方法本身非常危险，如果用力过猛很容易杀死被害人。其次，标记特征行为包含多余的杀害，也就是说，犯罪时使用了比实际需要用的还要多一些的暴力，正如每一个被害人所承受的严重殴打这种迹象表明的一样。结合多余的杀害和用捆绑的方式这两种需要，我们惊奇地发现，多数被害人没有死。因此，第一个被害人也可能并不是他有意杀死的。事实上，他在户外开始进行强奸活动时就不再使用塞嘴的东西，从这些事实中也可看出，肯普无意杀死活着的见证人。

伯尔德斯·特伦斯（Terrance Bolds）系列强奸和入室盗窃案

伯尔德斯·特伦斯（Terrance Bolds）经过法庭审判并最终被指控以下罪行：入室盗窃、鸡奸和暴力强奸罪。在他的犯罪过程中，有4个不同的被害人，其中包括一名已做了妈妈的孕妇。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997年的夏天。

关于1997年8月21日对P. M. 的强奸案，见密苏里州诉伯尔德斯·特伦斯一案（Missouri v. Terrance Bolds, 2000）的记载：

1997年8月21日，大约早上6时20分，伯尔德斯（Bolds）持一把左轮手枪进入已有两个月身孕、与3岁的儿子住在一起的P. M. 家。被告让她不要喊叫，并将她逼到起居室，用枪对着她，强迫她脱掉衣服和他进行口交。他离开之前告诉她：“你最好不要报告警方，否则我会回来杀掉你和你的儿子。”接下来，被告拿走了她的电话、汽车钥匙、一张印有她儿子相片的唱片、劳力士自动手表、自动取款机的取款卡、信用卡和一张看病的收据。

关于1997年8月23日对J. J. 的强奸案，见密苏里州诉伯尔德斯·特伦斯一案（Missouri v. Terrance Bolds, 2000）的记载：

大约早上4时，伯尔德斯（Bolds）进入了J. J. 的公寓，他是通过她4岁儿子的卧室窗户进入的。被告用枪强迫被害人脱掉衣服，并放上唱片为他

跳舞。过了一会儿，被告强迫她与他进行口交，并多次强奸了她。后来，被告将她绑在浴缸里，把她的两个手腕绑在一起，让她的脸面朝下，并将她的脚踝和手腕绑在一起，接着，被告在她嘴里放了一个鸡蛋，用她的紧身短衬裤塞住她的嘴，然后离开。被告还拿走了她的伊利诺伊身份证、一个维多利亚塞克瑞特包、一个阿迪达斯包和一个 Dooney - Baker 包。

关于 1997 年 8 月 26 日对 W. T. 的强奸案，见密苏里州诉伯尔德斯·特伦斯一案（Missouri v. Terrance Bolds, 2000）的记载：

伯尔德斯（Bolds）在房间里袭击 W. T.，被告用枪对着她，强摘下她手指上的两枚戒指，然后对她进行了数次强奸，包括阴部性交和肛交，他还强迫她与他口交，在袭击过程中，被告一直用枪对着她的头。

关于 1997 年 8 月 29 日对 R. F. 的强奸案，见密苏里州诉伯尔德斯·特伦斯一案（Missouri v. Terrance Bolds, 2000）的记载：

……大约早上 5 时，被告右手持枪进入了 R. F. 的卧室，他想让她和他进行口交。当被害人不配合时，被告强行将他的阴茎插进她的嘴里。在被告把枪从右手换到左手后，她试图从被告手里夺过手枪，接着是一场搏斗，被告对她说：“贱货，你就要死了。”然后连续殴打并咬她，她摘掉了被告的滑雪面具并夺过了他的手枪，试着向被告开枪，但是，子弹瞎火枪没打响。被告拿过手枪并让她转过身去，他准备向她开枪，枪又没打响，然后他跑走了。

在搏斗中，她听见她 10 岁的儿子在周围走动，她喊叫着对他说有个陌生人进了房间并让他报警，遗憾的是，她儿子的电话坏了。被告跑走后，她报了警。当她正打电话报警时，被告回来了并试图打开她卧室的门，他未能打开门，于是，他向门里开了两枪，子弹的碎片打中了她的大腿。在她的脸上和手上还有抓痕，在她身上的 5 处不同部位有咬痕。她的汽车钥匙、大水罐和 CD 盘都不见了，孩子们卧室的窗户被打碎了。

在审判中，伯尔德斯（Bolds）以前的女朋友在陈述她离开他的原因时说道（Missouri v. Bolds, 2000）：

……他过去常常打我，并且他的确是在恐吓我，他经常威胁我。我离开他时已经怀孕了。我怀孕大约 1 个月时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粗暴，你知道，我只好离开他，因为他随时都想性交，并且，他夜里还想出去，你知道，夜里出去然后早上回来，早上该去上班的时间回来。有时，他半夜回来就想性

交，之后他又出去，早上再回来，他还开我的车，你知道，他还想要我的车，然后夜里出去。

此案属于权力自信型动机和利益型动机驱使的犯罪行为。这些行为意味着能够满足伯尔德斯的性需要，而这种需要是通过身体上和口头上的凌辱及恐吓进行的，通过控制被害人进行的。犯罪惯技表明，他有多种反侦查的行为计划及大量入室盗窃的犯罪经验。然而，这种强奸不具有性虐待性质。

塞拉·史蒂文（Steven Sera）系列强奸及使用药物案（Rohypnal）^①

39岁的塞拉·史蒂文（Steven Sera）是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某公司（the ChandlerLumber Company）的所有者。他因为对阿肯色州（Arkansas）的两位被害人进行与性侵害有关的强奸、绑架而受审。此案例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曾使用药物致被害人失去知觉，以便在被害人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对其实行性攻击并录像。

塞拉声称，这些事情实际上都是双方同意的，他的罪行仅仅是因为给他和性伙伴们录像这一糟糕的做法，这些性伙伴是：32岁的得克萨斯州的哈特威女士（Melanie Hataway）、26岁的阿肯色州的海格德女士（Jackie Haygood）、18岁的小姨子科尔曼小姐（Patty Coleman），当时，她还只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他声称，她们同意被录像。这些被害人都一一承认她们与塞拉先前存在着某种关系，有一些是性关系，但她们没有同意在她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这些录像。她们每个人都声称，她们一定是被下了药的，然后被强奸了。在这次审讯中，还有另两名新增加的被害人也有类似的证词。

此案的曝光是由于塞拉的妻子南希·塞拉（Nancy Sera）发现了他的录像带。这些录像带里记录了他与毫无知觉的裸体女人们在她们家里进行性行为的事实。据警方说，录像带表明，塞拉与来自几个不同州的女人发生了性关系，包括得克萨斯州和阿肯色州。南希·塞拉报告说，她与塞拉在这之前已有8年半的婚史，在他被捕时，她已怀上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根据阿肯色州诉塞拉·史蒂文一案（Arkansas v. Steven Anthony Sera,

^① 原文为：ARKANSAS v. STEVEN ANTHONY SERA, 2000（译者注）。

2000) 提供的记录:

南希 (Nancy) 陈述道: 直到 1996 年中期, 她才确信她和塞拉已有了一个稳固的婚姻, 于是她于 1996 年 7 月怀上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她说, 塞拉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但是, 1997 年年初, 她怀疑塞拉有了婚外恋, 并在哈特威女士 (Hataway) 的事件中得到了确认。据南希说, 1996 年 12 月, 一个男人来到他们家门口, 塞拉假装是他自己的兄弟和这个男人说话, 这时, 她认出了在门口的这个男人是多尔蒂·弗莱德 (Fred Daugherty), 多尔蒂后来成了南希的离婚律师。据南希说, 她在与塞拉分居后的 1997 年 6 月中旬的一天发现了这些录像带。塞拉的供词与南希的相矛盾, 塞拉争辩说, 南希实际发现录像带的时间比她说的时间早得多。南希解释说, 它是想拿摄像机才回到他们家的 (那时她住在公寓里), 那台摄像机是塞拉为录制家里即将来临的纪念活动而买的。南希还有家里的钥匙, 所以她进了家。她回到公寓后, 在检查相机里的录像带时看到了里面录有塞拉和 3 个女人的事, 这 3 个女人中的一个南希的妹妹帕蒂 (Patty Colema)。南希打电话告知她的离婚律师, 她的律师让她把录像带交给多尔蒂, 多尔蒂随后在一家录像店铺里, 将录像带中的内容复制到一些 VHS 带子上, 他在这家店铺里做了很多他的工作项目。

南希还说道, 有一次, 在一次旅行后, 她清除塞拉箱子里的物品时, 发现了一个标有 “Rohypnol” 的瓶子, 然后她将这个里面装有几粒药丸的瓶子藏了起来。当塞拉寻找这个瓶子而找不到时, 他非常心烦意乱。在对塞拉的调查过程中, 南希最终将这个瓶子交给了多尔蒂。

南希就录像带的事情质问过塞拉, 她告诉他, 她已经把录像带交给了警方。他则告诉她, 如果她不把录像带拿回来, 他就将进监狱。然后, 他带着他们的女儿离开了城镇一些天。过了些日子, 南希和多尔蒂回到塞拉和南希的家里, 并且, 多尔蒂搜查了房间, 还从塞拉的刮胡子用具盒里取出了几包药。

在审讯中, 塞拉承认, 他确实与帕蒂 (Patty Colema) 发生过若干次性关系, 他们相互都同意将这些情节进行录像。他还声称, 他和帕蒂还相互为对方拍了一些照片, 南希发现后将它们用火烧掉了。他肯定地说, 他的妻子南

希是知道他和她妹妹之间的关系的。

至于他的性格，从塞拉对被害人的操纵及掩饰，到他在妻子面前隐藏他与其他女人之间的一些事所编织的欺骗网等事情看，这些都提示他有一种精神上变态的模式。例如，在 Wrolstad（1997）中所讨论的：

很多采访和法庭材料表明，他是一个时而可爱、时而傲慢的销售员，他成功地掩盖了一连串的导火索（犯罪现象）；他在体重和年龄上的虚荣使他在他的两次强奸被捕获之间仍在寻求进行第二轮的吸脂及外科整形手术；他的计谋非常鲁莽大胆，据说，当他将第四个被害人带进一家小旅馆时，他毫无防备地受到了他以前的一个女友的阻拦。

一名来自霍夫曼 - 拉罗曼（Hoffman - LaRoche）医药公司制造 Rohypnol（药名）的专家曾向法庭证实了其药理作用。他证实，Rohypnol 属于苯二氮草类的药物，这类药含安定（安定药苯甲二氮草），它对人体产生的药效包括催眠、熟睡、全身肌肉放松及丧失记忆。他还描述了他所做的试验，即检查在尿样中 Rohypnol 代谢物的含量，从而确定人是否摄取了它以及是何时摄取的。他在受害人之一海格德女士（Jackie Haygood）的尿样中确实发现了那些代谢物。他进一步证实，在看过塞拉与若干毫无知觉的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录像带之后，他相信这些女人有可能是受到了 Rohypnol 的影响，但是，他不能排除其他药物也存在。

陪审团最终不相信塞拉对事件的描述，最后，他被指控犯有对阿肯色州两个被害人的性攻击，还有多项强奸和绑架罪。塞拉对这个指控提起的上诉也被驳回。在此案中，还有在其他州发生的另外两个悬而未决的指控案。

房产者的责任

当暴力犯罪中的被害人遭受过袭击后，她们随后可能准备法律材料起诉房产者在保证房屋安全方面的疏忽。所述的基本理由是，对上述房屋应提供足够安全的保障，并承担防止任何可预见性危险的责任。如果可预见的危险没有适当地被重视，并且这种危险降临到一个被害人身上从而对其造成了伤害，上述房产者应负有责任，并且应在经济上承担责任。

对此学者的看法是：此问题较复杂，或许这种标准是不合情理的，即受

过强奸和性攻击的被害人的期望远远超出现实（Bublick, 1999）：

法院认为，不管妇女是否在她们所熟悉的地区活动，不管她们是否意识到附近地方曾发生过强奸案，也不管能否获得各个区域和地方的有关安全方面的实际信息，都应该预见到遇到强奸案件的这种可能性。法院认为，妇女们在活动时应该明白，强奸犯罪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时间或任何一个地点，在这一前提下，法官才能考虑房主的责任范围。法院认为，在民事责任的背景下并不存在着这种责任问题，因为这些责任并不属于明显的公共政策因素，进而不需要法律以第三责任险来限定。法院目前并不认为公民可以时时处处对自己不负责任，一个公民应普遍地理智地关注自我保护而不被强奸，一个聪明的女人必须保持连续不断的警惕性，否则就会发生危险，因为她没有做到充分的自我保护。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同时也为这类案例的犯罪心理画像提供参考，可进一步考虑以下案例中的责任问题。

案例

系列强奸犯马修斯·罗尼（Ronnie Matthews）^①

纽约州曼哈顿市的帕瑞斯·芳迪萨（Fundisha Price）就是一个这样的被害人。她在自己公寓住宅的电梯里被强奸后，就对纽约城市住房管理局（NYCHA）提出起诉。根据帕瑞斯·芳迪萨诉纽约城市住房管理局一案的记载（Fundisha Price v. NYCHA, 1998）：

1987年12月12日下午，当她在其居住的公寓楼前厅等电梯时，被告——自称为公寓楼所有者的人称她为“闯入者”将其硬推到电梯中，在尖刀威胁下，她遭到了抢劫和性攻击。公寓楼的前门没有装锁。原告的母亲以个人身份并代表其女儿试图把损害归于被告在保证公寓楼充分安全上的粗心大意和失责。在一个专门的裁决中，陪审团断定，被告确有粗心大意之处，但又断定被告的粗心大意不是原告被侵害的直接原因。

法庭上的争论点是适当的安全措施可不可以阻止一个特定的犯罪人。如

^① 原文为：FUNDISHA PRICE v. NYCHA, 1998（译者注）。

果犯罪人不能被有效的安全措施阻止，那么因犯罪而来的伤害就可能不是房产主承担的责任范围。

为明确争论点，纽约城市住房管理局雇了一位退休的联邦调查局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及资深的犯罪行为分析专家斯莫瑞克·彼得（Peter Smerick）。^①他证明，装锁是最低水平的安全措施，楼内的通讯装置也不能阻止本案中的强奸犯马修斯·罗尼（Ronnie Matthews）。斯莫瑞克的结论是以马修斯的行为、口供、在对帕瑞斯·芳迪萨（Fundisha Price）攻击时凶器——刀的使用和他的另几个被害人情况为依据的。为了作出马修斯不可能被阻止的结论，斯莫瑞克同样也考虑到了他连续作案的本性（Price v. Nycha, 1998）。

在此例民事案件中，陪审团判定，纽约城市住房管理局确实疏忽大意，但对此案不负有责任，因为系列强奸犯仍然可以通过已经锁上的门进入。纽约上诉法庭批准了本案的裁决，主要是鉴于初审法庭正确地认定犯罪行为专家关于这种犯罪人的犯罪预谋和狡诈的犯罪行为的证言。

系列强奸犯切斯奈特·艾伦（Alan Chesnutt）^②

华盛顿州埃特蒙德市（Edmonds）的莫尔豪斯·马德琳娜（Madeline Morehouse）在她家中被强奸，对此，她控告附近的建筑工地承包者和其工作用的梯子的主人玩忽职守的过失，因为他们的梯子被强奸犯用做进入她家的工具。

根据莫尔豪斯·马德琳娜诉晚安兄弟建筑公司案（Madeline Morehouse v. Goodnight Brother Construction et al., 1995）的记载：

① 根据《犯罪分类手册》的介绍，斯莫瑞克·彼得（Peter Smerick）持有政治学文科学士和教育技术学理科硕士学位。他曾在越战中当战斗摄影师，之后继续以他的摄影专长为陆军、海军情报部门，并最终为联邦调查局服务。那时他被分配到犯罪研究室，并于1985年成为法庭科学讲师。1988年他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国家暴力犯罪分析中心的犯罪侦查分析家（犯罪心理画像家）。在他参与得克萨斯州韦科（Waco，得州的一个城市）事件后，于1993年辞去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之后，他不怕失业，公开承认他在此案中心理画像的改变之处。关于联邦调查局退休的犯罪心理画像家斯莫瑞克·彼得的情况可参见第28章“伦理学和犯罪心理画像家”以及关于联邦调查局参与得克萨斯州韦科事件的论述。

② 原文为：MADELINE MOREHOUSE v. GOODNIGHT BROTHER CONSTRUCTION ET AL., 1995（译者注）。

莫尔豪斯在她家中被斯奈特·艾伦（Alan Chesnutt）（一直在特蒙德市实施系列强奸）袭击。斯奈特已多次在附近地区犯强奸罪。他最终在莫尔豪斯家被抓获。在这次袭击中，莫尔豪斯遭受了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斯奈特是利用从附近的建筑工地弄来的梯子通过二层楼的窗户进入莫尔豪斯家中的。因此，莫尔豪斯·马德琳娜将建筑工地的承包者和梯子的主人作为被告告上法庭。

法庭认为：一个可移动的梯子是太平常了，以致很难事先考虑到它可能在犯罪行为中被用于针对任何个人或财产的特殊情况。第一，斯奈特原本是想站在垃圾箱上进入被害人所在的二层公寓的。第二，斯奈特也可以拿自己的梯子或偷一个其他的梯子，或者，他可以利用其他手段来进入房间。结合他的其他犯罪情况，证明该犯早有预谋而且足智多谋，无论有没有梯子他都会设法进入被害者的房间。因此，不可能形成一个合理的论点，即如果没有梯子，斯奈特就会受到阻拦因而不能进入被害人家中并无法施行强奸。于是法庭驳回了控告。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个案例中，是被害人自己抓获了系列强奸罪犯（强奸惯犯）的。

参考材料

1. Arkansas v. Sera (2000) No. CR 98 - 1222, May 25, 2000 [2000 WL 675546 (Ark.)].
2. Baker, K. (1997) "Once a Rapist? Motivational Evidence and Relevancy in Rape Law", Harvard Law Review, January.
3. Bublick, E. (1999) "Citizen No - Duty Rules: Rape Victims and Comparative Fault", Columbia Law Review, October.
4. California v. Kemp (1961) Ct. 6632, March 29, 1961 (11 Cal. Rptr. 361).
5. Price v. NYCHA (1998) 1 No. 129, November 24, 1998 (92 N. Y. 2nd 553, 706 N. E. 2nd 1167, 684 N. Y. S. 2nd 143).
6. Groth, A. N. (1979) Men Who Rape: The Psychology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Press.
7. Hamill, R. (2001) "Recidivism of Sex Offenders: What You Need to Know", Criminal Justice, Winter.

8. Morehouse v. Goodnight Brothers Construction et al. , (1995) No. 34318 -1 -1, April 24, 1995 (892 R.2nd 1112).
9. Missouri v. Bolds (2000) No. ED 75483, Feb. 7, 2000 (11 S. W.3rd 633).
10. Simon, L. (1997) “The Myth of Sex Offender Specializ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Symposium: The Treatment of Sex Offenders, New England Journal on Criminal and Civil Confinement, Summer.
11. Wrolstad, M. (1997) “Wife’s Discovery of Sex Tapes Leads to Serial Rape Case”, The Dallas Morning News, November 16, p. A -29.

第 27 章 网络模式：因特网上的犯罪行为

Eoghan Casey, M. A.

每种新技术都能充当犯罪行为的工具，这是相当普通的事实，因特网也不例外。然而，网络这种新技术的特殊性在于，其运作的速度和无穷的容量使得地球正在变成地球村。在某种意义上，地球已经成为人类大脑皮层的缩影：数以亿计的神经细胞正随意地或是协调地形成细胞突起的冲动，不受干涉地完成多个任务——额叶成为网络系统的网站，大脑两半球类似聊天室，颞叶成为网络论坛，枕叶则忙于发送电子邮件。

梅洛伊（Meloy, 1998）

这几乎没有什么使人惊奇的，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使用变得越来越普遍，侦查人员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有关证人、被害人和犯罪的数字形式的证据（Casey, 2000）。甚至像杀人和强奸这样传统类型的犯罪也能直接或附带地涉及数字证据。简单的案例如 26 岁的瓦莱丽·威尔逊（Valerie Wilson）被杀害案件中，在她自己的电脑中保存着详细的私人日记，这种日记对被害人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可以较深入地了解她的生活，以及提供包括其他几起系列凶杀案的被害人在内的来往人员的情况。尽管凶手为了毁灭证据而在物质形式上销毁了磁盘，但威尔逊的日记内容还是被恢复了（Loknapatawpha, 2000）。在被害人和攻击者之间相互交换的电子邮件也能帮助侦查人员确定凶杀的动机（McLean, 2001）。鉴于数字证据的普遍存在和有助于犯罪侦查，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有必要

学习如何从行为学的角度辨认和解释数字证据。^①

当涉及网络，如登录因特网的时候，它所包含的大量信息都与个人行为有关，因此，犯罪心理画像者能够因此而有所作为。因特网记录了大量的个人行为和信息，同时也创建了有关他们的思想、选择、兴趣和欲望的“仓库”。侦查人员和犯罪人同样可以发现，这种行为的档案文件对于更多地了解某一特定人来说非常有用。同样，因特网也以多种方法使犯罪人免于被拘捕，因为获取特定犯罪人罪行的数字证据非常困难。当涉及因特网犯罪时，犯罪心理画像提供的对犯罪类型的评估价值是无法衡量的，它能使侦查人员将同一人所犯的案子联系起来，缩小对象的范围，查找隐藏的证据来源，获取对犯罪人动机的洞察，并能更有效地与犯罪人面谈。画像专家可能给侦查方向提供的例证有：

1. 告诉从事隐秘的因特网侦查工作人员，犯罪人是通过何种特定的因特网在线聊天室撒网罗被害人以满足其扭曲幻想的。这样的导向不仅可以告诉侦查人员该去哪儿监视，还使侦查员能够假扮成可以吸引犯罪人注意的那类被害人。同样，提供有关犯罪人的接近、攻击和控制方法的相关信息，也有助于侦查人员同犯罪人打交道，或者给潜在被害人提供保护性建议。

2. 提供建议以说明发现附加证据的可能性或实际位置，将有助于解决围绕着犯罪事件的一系列逻辑混乱。例如，当一名少年告诉朋友，她要求和在网上认识的人见面后对方却失踪了的时候，一个犯罪分析专家会指出，被害人电脑中不见了的电子邮件很不寻常，而且，为了解邮件活动应彻底地检查硬盘和服务器的。

3. 提供与犯罪行为有关的惯技（MO）、标记（signature）或表明反侦查行为的重要相关信息。例如，对犯罪人喜欢采用的接近被害人的步骤进行描述性说明，有助于侦查人员识别出其他案件中的类似行为，帮助或保护其他

^① 了解这点很重要：有些数字本应存在却被破坏，然而，已被“删除”的数据实际上仍然能保存在磁盘的某一部分，技术娴熟的人能把该数据隐藏在不使用的磁盘区域或是其他数字对象中。有一种专用的软件能使访问磁盘的全部内容和搜索特定式样的文件变得相对容易。然而，如果一名侦查人员不熟悉数据恢复技术，那么，对形成一个心理画像至关重要的证据也许就会丢失。

潜在被害人。同样，对犯罪嫌疑人如何，以及为何要隐瞒身份的解释，能引导侦查人员识别出犯罪嫌疑人没有成功隐藏的信息，或者帮助侦查人员缩小嫌疑范围（例如，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本来非常熟悉却要隐瞒身份是为了避免被害人认出）。

4. 分析符合犯罪嫌疑人特征的在线信息，如年龄、经历、婚姻状况、地理位置、职业、自我形象和兴趣等。

5. 得以洞察犯罪嫌疑人行为和动机心理、性幻想、内心冲突或性冲突的状态。例如，在一个网游色魔（traveler）^①的案例中，心理画像专家检查了犯罪嫌疑人的在线活动，得出的结论是犯罪分子认为自己与年轻的被害人之间是真诚的自愿关系。“他并不把自己的行为看做是犯罪行为或者是糟蹋别人（exploitative）。他觉得只是在抓紧时间做对被害人有益处的事情。其动机并非是要伤害被害人的身体，而是想被她们所爱慕和赞美。他在某种程度上分不清自己和他们之间身份的区别，想给孩子们一种天真烂漫的影响。在对其讯问时采用理解其行为的方式将会成功地得到犯罪嫌疑人大量的信息。”

本章中将讨论到计算机和网络给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在演绎式的犯罪心理画像过程中对包括数字证据在内的实践提供指导。

犯罪与因特网^②

杀人犯、色魔（sexual predators）、敲诈者、小偷、间谍以及其他许多类型的犯罪分子已经开始使用因特网实施犯罪。鲁宾逊·E. 约翰（John E. Robinson）利用因特网诱骗被害人与其会面，在见面后择其性别实施侵害，同时杀害其余的人（Kansas City Star, 2001）。警方搜查鲁宾逊的家时查封了5台电脑。2000年，斯戴克豪斯·劳伦斯（Lawrence Stackhouse）发现了15岁的斯特瑞克兰德·戴安娜（Diana Strickland）在网上的个人简介，便用因特网

^① 在网上猎获被害人，然后前往与之见面的劫色者（sexual predators）通常被称为网游劫色者（traveler）。

^② 本部分由麦克格拉斯和凯西著述之时修改（McGrath and Casey, 2002）。

和她联系，然后诱骗^①她，后来戴安娜和女友同意来到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家，在另一女友叫来警察之前一直折磨了她们4天（Psychiatric News, 2000）。同样也是在2000年，电子邮件和美国在线服务公司（American On-Line，简称AOL）的即时通讯提供了证明米勒·莎丽（Sharee Miller）犯有共谋杀害丈夫、并在网上诱使她所教唆杀人的凶手自杀等强有力罪证。米勒谨慎地控制了凶手对她丈夫的感觉，竟然伪装成丈夫的身份向凶手发送攻击性信息（Court TV, 2001）。

因特网有很多原因能够吸引犯罪分子。网络给犯罪分子提供了更多的接近被害人的机会，把他们的触角从有限的地理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加之因特网中容纳了大量的潜在被害人的信息，便于色魔能找出特定类型的被害人。“一个犯罪分子可能通过网络寻找的潜在被害人是经常去做礼拜的人或是参与在线讨论《圣经》的人。另一个犯罪分子可能要找的潜在被害人则是被个人网页或美国在线服务公司用户的自行筛选过的特定年龄的人。色魔们会埋伏在USE-NET新闻组中，向药物滥用的‘牺牲品’（如交替性药物滥用康复者，alt. Abuse-recovery）献殷勤，也许会选择有吸引力的地理位置接近潜在被害人的某个特定在线位置”（McGrath and Casey, 2002）。此外，通过给犯罪分子长期的接触被害人的机会（而非简短的接触），因特网使犯罪嫌疑人获得了对被害人的控制或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并且可能会在真实的物质世界中安排会面。

因特网同样也使犯罪分子能在几个层次上监控潜在的或现有的被害人。比如，从参加论坛并与其他讨论者熟识起来，到在网上搜索个人的相关信息，直到进入某一潜在被害人个人电脑获取额外信息等。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测定某人何时进入电脑空间是完全可能的。例如，像ICQ（网上寻呼机，它支持在Internet上聊天、发送消息和文件等）和AOL（美国在线服务公司）的即时消息等服务就能被设定，某特定人一旦与因特网连接就在犯罪分子的计算机中发出报警音。同样，许多连接到因特网的计算机也能提供有关机主或使

^① “诱骗”（grooming）是一个术语，用来描述劫色者（sexual predators）对被害人进行控制的过程。“劫色者（predators）企图与被害人建立起一种使之既信赖又害怕的关系，而最终目的是没有什么强烈抵抗就能进行性接触”（Johnson, 1997）。

用者的信息。^① 很多人在设定计算机时用的是真名，这就向在网上访问其个人电脑的任何人都有效地透漏了自己真实的身份。

除了上述描述的搜集计算机的信息以外，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入侵到因特网上的电脑中搜查机主的硬盘。例如，色魔（sexual predators）或在线的网虫可能会在给潜在被害人发送有趣的电脑动画的同时，却在邮件附件中暗中放置了特洛伊木马的程序（如 Back Orifice、Netbus、Subseven 等），甚至完全取得对被害人电脑的远程控制。除了进入计算机的硬盘以外，犯罪人还能监控被害人的键盘和显示器。

虽然作案人通过被害人在线时暗中监视他/她会增加自己被发现或被逮捕的风险，但这也给犯罪分子更多的信息和与被害人更深的接触，能刺激其窥探的幻想，满足其对被害人的权力控制感的需要。这样的监视在真实世界中也有可能（例如，在某地徘徊、跟踪，或是透过卧室的窗户窥视等），但对犯罪人来说都是高风险的行动；与此相反，在网上监视某人就属于相对低风险的活动了。很少被害人具有测定犯罪人监视其网上活动的技术技巧，犯罪人甚至是使用木马程序进入其电脑时也很难发觉。

此外，因特网也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很多改变或隐瞒身份的机会。一旦犯罪人决定把某一特定人作为目标，他/她就必须确定是否要隐藏身份，为达到预期效果而改变在网上扮演的角色，或者是公开地展现自己。作出这样的决定依赖于犯罪人觉察到的风险大小和自己的技巧水平。如果色魔认为自己不是在做坏事，或者感到受因特网的物理隔离保护的话，他就可能不会掩饰身份。而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并懂得网络不会提供永久保护的色魔，则会努力隐瞒自己的身份和方位。此外，还有些色魔可能不想向现实世界中认识自己的人透露身份，并有能力有效地掩饰网上的行踪。

犯罪分子也可能利用因特网扮演其他人。例如，已被宣判有罪的计算机

^① 例如，盾牌网站 Shields Up(<http://grc.com/>)能探测到访客的计算机并显示暴露在网上的信息。同样，Unix 中的 finger 命令（<http://www.emailman.com/finger/finger.html>）也能查询到 Unix 系统用户的信息。例如，试一下“finger@unix - shells.com”，不必在符号@的左端指定用户名就能列出所有连接到 unix - shells.com 系统的用户，finger@unix - shells.com 指令就会显示正试图连接到 unix - shells.com 服务器的特定用户的 IP 地址。

流氓德勒彭特（Dellapenta）曾伪装成某被害人的身份，把个人地址张贴在网上，使好多人去被害人的家里强奸她，以此满足他的幻想。有意思的是，被害人的家里并没有网络接口，最初也不知道德勒彭特以她的名义在网上公布了地址（Newsweek International, 1999）。在另一起案子中，35岁的罗梅洛·理查德（Richard Romero）将自己伪装成15岁少年并自称名叫基利（Kyle），骗取了另一个少年的信任。罗梅洛最后被判犯有绑架、偷运未成年人跨州从事色情犯罪，还因为让佛罗里达的同伙销毁证据被判妨害司法公正罪（U. S. v. Romero）。最近一起相关案件的被告人洛克伍德·肯尼（Kenny Lockwood）已供认，他在网上假扮名叫“凯莉”（Kelly）的女子，引诱得克萨斯州20岁的学生库贾沃·克里（Kerry Kujawa）并将其杀害。杀了库贾沃后为了不引起怀疑，洛克伍德还用“凯莉”的名字给库贾沃的父母发电子邮件说是他们的儿子，还说自己很好（Dallas Morning News, 2000）。

犯罪人具有的寻找被害人、收集信息、潜伏在网上、隐瞒或改变身份以及和其他犯罪人沟通的能力使因特网成了这些人犯罪的沃土。然而，有时犯罪人也明显地表现出缺少技术遮掩，这一现象令人吃惊。有些犯罪人显然不懂追踪他们的位置是很容易的事，因此他们没有明显地掩饰自己在网上的基本信息。有的人最初没有掩饰身份，只有在意识到处于危险中时才这么做。因此，我们就有可能利用网络的自动存档能力从其开始掩盖行为之前着手发现某个人的信息。许多人用近乎奇特的字眼、短语、昵称或电子邮件署名，非常抢眼。搜索一下其他像这样“抢眼”的东西就能确定犯罪人的身份，如同通过言语分析便能够认定可疑文件的作者是谁一样。

犯罪心理画像与因特网

过去对在因特网上的犯罪人进行犯罪心理画像时所根据的基础资料都是归纳而来的，最初的研究集中在计算机犯罪方面，尤其是对电脑黑客（hackers）的研究较多。^① 电脑黑客已经被套上了这样的模版：白人，中产阶级，年龄介于12岁到28岁之间、强迫性的反社会男子，有自卑情结，可能还有被动的身体虐待和性虐待历史（Rogers, 1999）。其他的尝试也是应用来

^① 电脑黑客也以解密高手著称而被大家熟知。

自媒体报道、犯罪人访谈和趣闻轶事般的观察报告等资料来建立统计学上的描绘。尽管这样的心理画像大致介绍了过去的犯罪人，或许也对诊断和治疗关联性心理异常有帮助，但对侦查几乎没什么效用。事实上，这样归纳式的犯罪心理画像会误导侦查人员，使他们给犯罪人过早地下出错误的结论。

另一种研究范例是计算机犯罪对照矩阵（the Computer Crime Adversarial Matrix）（Icove et al., 1995），首先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展起来，是指把归纳式的犯罪心理画像（criminal profiles）应用到各种电脑犯罪的分析中，包括欺骗行为、间谍活动、电脑入侵、数据窃取以及恶意破坏等。矩阵使用过去的案例，对电脑解密高手（包括团伙和个人）、电脑犯罪嫌疑人（从事间谍及欺骗/诬蔑等活动）、恶意破坏者（包括外来者和知情人）得出一般性结论。这些结论分四个方面的特征：组织方面、操作方面、行为方面和资源方面（见表 27-1）。

表 27-1 计算机犯罪对照矩阵（Icove, 1995）

组织特征 犯罪人的 类型	组织性	征募/吸引	国际联络
团伙	有反主流文化倾向、无组织结构的松散团伙	解密高手 被同伙所吸引	与世界各地的相似团伙进行交流与联络
个人	没有组织，这类人是真正的孤独者	被智力挑战所吸引	订阅解密杂志，通过电子布告牌相互联系
间谍	由敌方的情报机构扶持	犯罪人 大多数情况下是为钱，也有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还可能是要引人注意	利用计算机网络入侵世界各地的目标主机
欺骗/滥用者	或许通过犯罪组织进行犯罪，或许独自一人	原因可能为钱，为权	利用电信服务在国际间洗钱或转移资金
外来者	独自一人或参与小团体，可能会很年轻	恶意破坏者 原因可能为报复，为智力挑战，为钱	利用计算机网络和电话系统入侵目标计算机

(续表)

组织特征 犯罪人的 类型	组织性	征募/吸引	国际联络
知情人	经常是雇员或前雇员	原因可能为报复, 为了 权力, 或为智力挑战, 或是心存不满	无
操作特征 犯罪人的类型	策划	专门的技术水平	使用的策略/方法
团伙	可能有详细的计划	解密高手 高水平	经由计算机网络进入目 标计算机, 同其他黑客 交流
个人	在尝试攻击前先研究网 络	从中等到高水平都有, 通 过摸索不断积累经验	使用网络, 但更喜欢用 追踪和试错法, 而不是 通过细心研究和规划, 使用 BBS 与其他系统 交流
间谍	有解密高手的一些特征	犯罪人 高水平	可能通过与解密高手接 触来处理信息和搜集数 据
欺骗/滥用者	犯罪之前有详细的计划	从中等到高水平都有, 欺 诈比编计算机程序更 有经验	可能更多地使用传统的 入侵方法, 如搭线窃听 和设置陷阱, 通过原始 方式入侵系统
外来者	没有太多的策划, 多为 机遇性犯罪	恶意破坏者 各种水平都有	盲目乱窜, 直到有机可 乘
知情人	多有详细策划和实施办 法	各种水平都有, 但经验 丰富	使用陷阱程序和木马程 序进入内部系统, 修改 数据

(续表)

行为特征 犯罪人的 类型	动机	人格特征	潜在弱点
团伙	智力挑战, 同类人间的玩笑, 为了支持某项事业	解密高手 高智商的人, 有反主流文化的倾向	不认为所作的攻击是犯罪行为, 随意谈论自己的行动
个人	智力挑战、解决问题、权力、金钱、为了支持某项事业	中等高智商	可能保留记录或其他有关行动的文件
间谍	为钱或有攻击系统的机会	犯罪人 可能是为某组织工作的解密高手或独自所为	贪婪地想获得更多信息而变得粗心
欺骗/滥用者	为钱或是其他个人利益, 为权力	某些人格特征接近于诈骗犯罪人	变得贪婪, 易犯错
外来者	为智力挑战, 为金钱, 为权力	恶意破坏者 和解密高手的特征相同	可能会变得明目张胆, 易犯错
知情人	为报复某部门, 或为解决问题, 或为钱	通常有一定的计算机技能	可能会在计算机日志中留下索引记录
资源特征 犯罪人的类型	训练技能	所需的最低装备	支持
团伙	进行过高水平的非正式训练	解密高手 带调制解调器的基本计算机设备	受到同伴支持
个人	通过摸索积累经验	带调制解调器的基本计算机设备	有 BBS 支持, 还有各种信息交换的支撑
间谍	各种技能水平都有	犯罪人 带调制解调器的基本计算机设备, 有些情况下还要用更复杂的设备	暗中有雇主或情报部门支持
欺骗/滥用者	有一定的编程经验	带调制解调器的计算机 或者有进入目标主机的机会	有团伙支持, 可能还有犯罪集团的支持

(续表)

行为特征 犯罪人的 类型	动机	人格特征	潜在弱点
外来者	技术水平从低到高都有	恶意破坏者 带调制解调器的基本计 算机设备	有团伙支持
知情人	有一定的计算机技能， 编程知识从低到高都有	有进入目标主机的机会	无

以上图表为了解特定犯罪群体的一般文化提供了一些新的视野。然而，对人的行为作一般性的概括是很难的事，并且经常会导致得出不可靠的结果。既然侦查人员通常需要的是特殊的而不是一般性的结论，那么，犯罪心理画像就应该包含能由证据证明的、指向特定目标的结论。如果使用一般性结论的话，就应该非常小心，要进行大量研究，否则就很可能成为侦查活动的障碍。

最近，研究者们试图把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应用到具有危险威胁的关键信息技术知情人身上（Critic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siders，简称 CITI）——能从组织内部威胁组织关键性根基的人（Shaw, Ruby, Post, 1998）。^① 根据这一研究，所有的关键信息技术知情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品质——“内向”，这个品质使他们“不太会以公开的、有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压力，也不太可能寻求直接的协助”（Shaw, Ruby, Post, 1998）。还值得一提的是，关键信息技术知情人更可能通过电子邮件表达难题而不是亲自表述出来。这些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六个高危险度的特征：性格和社会挫折的经历，对计算机的依赖性，伦理方面的“伸缩性”，降低的忠诚感、权利感，以及缺乏移情。这些研究也提供了几个动机的种类，目的是能帮助确定有问题的个人（见表 27-2）。

①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研究都是集中在威胁评估而不是犯罪心理画像上的。

表 27-2 动机的种类 (Motivational categories)

动机的种类	叙述概要和实例说明
探究者	动机由好奇心所驱使，很少对目标造成损失 例如，百无聊赖的雇员为了解闷，未经授权进入了保护措施很差的网络资源内部
乐善好施者	动机由“挽救局面”或是炫耀能力的愿望所驱使 例如，某个系统的管理员发现了另一个系统的弱点，虽然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但却进入该系统进行处理，而不是通知应对此负责的系统管理员
电脑黑客	动机由突破访问界限以满足自尊心的需要所驱使 例如，有人违反规定擅自把老板的保密网络连接到因特网，还给他的网友提供进入保密系统的方法和一些敏感的数据
不择手段者	动机由个人利益所驱使，损害他人或计算机系统而利己 例如，有人很喜欢旅游，便在老板设在国外的配备里制造故障，希望通过发现故障，能派他到外国去修复系统
例外的人	认为自己很特别，有资格享受特殊待遇 例如，某个系统管理员有独一无二的该机构电脑系统的知识，觉得应该得到比其他人更高的薪水、津贴等对待
复仇者	动机由获知不公正待遇后产生的报复心所驱使 例如，某个系统管理员听说自己将被解雇，就把一些文件加密并保存起来，希望勒索更高的解雇费
职业小偷	动机由利益所驱动 例如，有人利用机构的电脑系统盗取钱财
间谍	被利益所驱使，但通过谍报活动间接进行 例如，某人怀着特殊的目的加入一个机构，以获取能卖给竞争对手的专利资料

这些动机的种类与第 16 章提到的行为—动机类型有重复的内容包括证明能力型（又称补偿型）、权力自信型（又称权力型）、愤怒报复型以及利益获取型。然而，这些动机类型不应该与犯罪心理画像相混淆，并且使用时要谨慎——把一般应用到具体情况时本质上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这一研究只是技术性的威胁评估，而不是犯罪心理画像，它是试图预测个体未来的行为。把这样的一般性结论应用到已知的尚未犯罪的个体身上是危险的实践，会危

及无辜的人。

另一个把犯罪心理画像应用到信息安全方面的学者是古戴蒂斯·特丽(Terry Gudaitis)，她概括出一种“三维画像”(Three - Dimensional Profiling, 简称3 - DP)的方法，用来帮助某些机构保护自己的数字资产(Gudaitis, 1998年)。虽然她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要点，并试图合并演绎式的心理画像方法，但是，在使用3 - DP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问题。由于没有区分出威胁评估与犯罪心理画像之间的不同，因而古戴蒂斯的方法是有问题的。结果是，运用这种方法可能鼓励对受到怀疑的犯罪人和已知的还没犯罪的个体进行心理画像（这又是一个冒着使无辜的人牵连其中的风险进行的危险实践）。“3 - DP的目标是：(1) 能评估机构和指出基于人员方面出现的弱点存在于何处。(2) 为了帮助预测犯罪人的行为和发现其身份，能够从机构内部或外部来评估未知的犯罪人。(3) 能减轻已知犯罪人造成的事件的严重性。”最后，3 - DP的方法因为太复杂以至于不能作为有效的侦查工具来使用，比起它试图延伸的演绎式的犯罪心理画像方法也没有什么可论证的优越性。心理画像的能力在于能解释某个特定犯罪人的行为，从而给侦查活动提供方向。

当处理涉及因特网的案件时，对于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来说把因特网看做物质世界的延伸是有价值的，而不能视为一个完全崭新和独立的空间。抱着这种态度的心理画像专家能采取本文所详细列举的步骤，并把它应用到网络犯罪中去。在演绎式的犯罪心理画像中，首要的设想就是关于被害人的选择、犯罪现场的选择，以及犯罪人在犯罪现场所做的举动，所有这些都会告诉我们有关某例特定犯罪案件的作恶者的情况。这个设想可应用到网络犯罪调查，条件是你必须承认：(1) 因特网是物质世界的延伸。(2) 网络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人的行为。为了充分使人信服这些设想的有效性，就需要考虑一下通常人们怎样使用网络以及犯罪人怎样利用网络。一个人可能会在网上作出在现实世界中干不出来的事，但他在网上的活动作为人的活动来说还是可以识别的。在网上对被害人和犯罪现场的选择仍然是人性的选择。

因特网上的行为证据

了解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Locard's exchange principle)在因特网上的应用是很重要的。计算机和网络能够保留有关个人活动的大量信息，当犯罪嫌

疑人进入网络中某个特定服务器的时候，就会在该服务器中留有曾登录的痕迹，离开时还会在自己的电脑中存下访问的信息。这些数字证据会告诉我们一些个人的私人想法、特定时间的行踪、行为的模式以及其他一些对画像有帮助的信息。因此，查找犯罪嫌疑人电脑中的痕迹证据和存储设备、犯罪嫌疑人的网络服务商、被害人的电脑和存储设备、被害人的网络服务商（ISP），以及犯罪嫌疑人和/或被害人曾经使用过的系统等都很重要。在此仅提供了对存在于网络中的行为证据类型的基本概要，想要得到进一步的资料请参见凯西（Casey）2000 年和 2001 年的研究。

电脑中的网络浏览器保留所有已浏览过的页面列表，以及为加快浏览速度在缓存中暂时存储的新近访问的内容。用于访问 USE - NET 新闻组的程序也会保留访问列表。电子邮件程序中包含着邮件的内容，有时还会有消息发送和接受的更新记录。在服务器中存有许多日志文件，它们对涉及网络的案件也有帮助。任何时候通过网络访问 Web 服务器中的文件，都会有一个包含什么电脑、什么时间、访问了什么文件的详细条目被写入日志文件中。连接到因特网的电脑经常保留着在特定时间试图与本机通信的其他电脑的详细日志信息。在多用户系统中，经常有关于谁在何时登录了系统甚至执行了什么命令的记录。任何时候电子邮件服务商发送或接收一封邮件，关于此信息的细节就被记录在日志文件中。因此，除了要检查特定时间内电子邮件服务器所包含的信息，侦查员还应能测定什么样的消息通过了系统。如果为了掩盖罪行某条信息已被从服务器中删除且无法恢复，那么，在日志文件中仍能保留曾存在的迹象。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邮件服务器的日志包含个人在什么时间查看了邮件的记录信息。网络流动的原始数据流也是丰富的证据资源。

把对犯罪分子行为的理解与在网络上获取的一系列信息结合起来，能够收获重要的证据。以下的案例概要示范了把对人类行为和对计算机网络的理解决相结合，是怎样给侦查活动（investigation）提供帮助的。

案例一

在一起敲诈案中，犯罪人从环球网的电子邮件账户中给被害人发了一条消息。邮件报头里包含的 IP 地址表明，该消息是从某网吧的一台电脑中发出的，但侦查人员无法确定当时什么人用了那台电脑。可是，侦查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检查邮件的账户以求回信，因此就秘密获得了所有有关该

账户的记录信息。这些记录显示，犯罪人实际上真的使用家中的个人电脑与该邮件账户联系过。

案例二

在一起凶杀案的调查中，侦查人员检查了被害人的个人电脑和网络活动情况。结果认定，就在遇害前不久，被害人在家中使用 Eudora 软件查看了邮件并收发信息，而后立即登录到能查看同一邮件账户的两个 Unix 多用户系统中。于是，侦查人员就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被害人以多种途径进入同一系统？被害人在寻找多用户系统中的其他用户就是可能性之一。因此，可取的办法就是询问当时登录到该系统中的所有人员。

案例三

一名女子因收到了含有威胁性信息的邮件而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这些消息都是通过匿名邮件服务发送的，侦查人员很难确定消息的原始来源。但是，邮件中包含的信息表明：发送信件的人和被害人属于同一个机构。侦查人员认为发信人很可能最初给自己发送过测试邮件，以确认在邮件的报头没有留下任何的身份认证信息。该机构邮件服务器的日志文件表明，机构中的另一个人确实也收到过来自同一个匿名邮件服务的消息。当检查这个人的电脑时，发现的大量数字证据表明，他应该对这些威胁性邮件负责。

案例四

在一起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盗窃信息案件中，侦查人员通过检查被入侵电脑测定了犯罪分子的操作程序和他仔细搜索系统所要寻找的东西。运用这些认识，侦查人员识别出并监控了网络中能吸引入侵者的其他电脑。几个小时后，在被监控的系统之一探测到了入侵者的踪影，这给了侦查人员最清晰的证据形式，即对正实施的犯罪进行当场记录。当监视入侵者的时候，侦查人员能够测出他是新近被解雇的员工并从家里上的网。随即迅速取得了对其个人电脑的搜查证明，并在电脑硬盘中发现了偷取的数据备份。

有关什么（what）、在哪里（where）、何时（when）、为什么（why）、怎样（how）和是谁（who）的数字证据都会告诉我们一个人在行为方面不连续的表现。除了要再现犯罪分子或被害人何时何地做了什么事之外，数字证据还能给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提供涉案人的技术水平或是犯罪人掌握的被害人情

况的相关信息。知道犯罪人有多高水平能够帮助侦查人员查找犯罪人或注意到其他的证据。如果犯罪人需要了解大量的被害人情况才能成功地实施犯罪的话，侦查人员就得确定犯罪人是怎样取得这些情况的。他追踪被害人了吗？他认识被害人吗？

数字证据中或许还包含着能用于确定犯罪人的性别、年龄、职业、兴趣、技术水平、社会关系和其他一些可能有用的信息。犯罪人的网站和在线表现能给观察者提供他的自我形象、精神状态、兴趣爱好，以及更多的印象性东西。选择的网上昵称也能暴露其性格（如“奴隶主”、“热情的人”、“邪恶先生”等），犯罪人的个人网页或许含有能借以洞察他/她的犯罪动机和幻想的故事，能够引出其他被害人和额外证据的链接。最后一点也可以应用到侦查实践之中——犯罪人的网页可能包含了他/她最喜爱站点的参照物或照片，这些对于寻找其他潜在被害人和物质证据都很有帮助。

电子邮件信息、USE - NET 新闻组邮件，以及其他一些在线语句可能含有不寻常或重复性的言语行为，或能显示与犯罪行为有关的策划水平和谋略。一个犯罪分子的在线活动还可以表明他是否采取了防范措施以避免被认出和被捕。例如，一些犯罪分子巧妙地使用网上昵称，如“En0ch1an”而不是用“Enochian”来保护自己。因为搜索引擎无法实现用“0”表示“o”，管状符号“1”表示“i”，因此搜索“En0ch1an”的结果不会找到标有“Enochian”的信息。^①另外，犯罪人可以使用匿名的或伪造的电子邮件来掩饰身份。心理画像专家就应该知道，完成这样的工作需要多少技术知识，这种修改对消除个人行踪是否必要，以及犯罪人是否还为了满足一种心理需要而实施犯罪。

单条的数字数据可能没什么用处，但当单条数字证据组合起来时就会展现出犯罪人的行为模式。被害人或许总是在某个特定时间检查邮件，或者总是在网上的某个特殊区域频繁露面。这个模式的中断可能表明了一个不寻常的事件——确定那个事件是什么就可能形成一条关键的线索。如果在被害人的常规里没有出现停顿，那么这种一致性就能帮助侦查人员猜测犯罪人是否也意识到了被害人的规律并因此而策划犯罪，还是犯罪人碰巧碰上了被害人

^① 有些搜索引擎把管状的“1”视为隔离符号，因此可能搜索不到那些指定的词，结果使事情变得更糟。

就利用了机会。有的犯罪人或许总是在特定的某天或特定的某个时间实施犯罪。当涉及数字数据时辨别这些模式就非常有挑战性，因为经常会有大量的信息出现，一时难以应对。所以，侦查员应该经常进行彻底的刑事疑点分析，使自己熟悉证据本身，给自己充分考虑所有可能性的机会，才能抓住某个细节或理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线交流和在线活动可能得以洞察某个人的幻想（McGrath and Casey, 2002）。由于感到被一定程度的匿名服务所保护，人们经常在网上做出在现实世界中只敢想像的事情来，把自己的秘密在网上暴露无遗。

倘若每个不连续的动作都会告诉我们犯罪人的一点东西的话，那么，养成把整个事件分解成各个子事件的习惯非常重要。例如，单是确定犯罪人如何连接到网络中就很有收益。如果他是利用公共图书馆终端或是在网吧接入到因特网的，这个选择就意味着他想隐瞒身份。另外，如果犯罪人使用家中的DSL专线/宽带/电话拨号连接上网，这样的决定可能意味着公共终端因其处于大庭广众之下或没有想要的软硬件配置而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如果犯罪人使用盗来的拨号账户，这一行为暗示他比普通人有更多的网络知识，已经竭尽全力要掩饰身份了。这些例子仅仅是建议性的而非权威性的——犯罪人选择的上网方法必须连同其他行为内容一起纳入考虑范围，以保证清楚地理解它的意思/重要意义。

当然，犯罪人对于犯罪现场、被害人和惯技的选择也是要重点考虑的。当犯罪人策划犯罪的时候，他们在心里可能会有某一个特定的被害人，某一种类型的被害人或者一个合适的被害人（一个机会被害人）。如果在心里已有一个特定的被害人，犯罪人就能确定被害人在特定的时间里可能出现在哪里，并因此策划犯罪。例如，某个妇女下班后总是按同一路线回家，某银行总是在一个固定时间开金库，某个机构总是在每天晚上固定进行成批交易，这些都可能成为了解这些日程的人的作案目标。在心里确定某一种类型的被害人以后，犯罪人就会去寻找这样的被害人可能出现的地方。一些色魔会频繁地出现在娱乐场所或在线聊天室以猎获儿童，另一些人则泡在单身俱乐部以猎取妇女。其他的色魔只是抓住机会而已，被害对象通常是邻居或邻家的小孩。当任何一个被害人都能满足犯罪人的需要时，他就可能搜罗一个便利的或是

舒适的地方等待被害人的碰巧出现。另外，犯罪人也可能因一时冲动而袭击最近处可得到的那种类型的某个人。本章的剩余部分将要探讨在因特网情况下的被害人研究、犯罪现场特征、惯技和标记行为。

案例五

在一次严重的系统崩溃之后，硬盘中所有的数据都毁掉了，这时操作员注意到控制台的一则消息暗示有人就在系统崩溃之前连接到了某部门的拨号网络调制解调器库。由于这一破坏行为的目标涉及广泛，因此，攻击的被害对象应该是依赖于计算机系统的整个部门。被侵害的目标系统由于运行了速度测量系统——一种鲜为人知的操作系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熟悉——因而在这起事件中处于低风险状态。而且该系统很安全，过去从未被攻击过。这个迹象表明，犯罪人非常熟悉侵害的目标系统。他把自己置于被侦查的一定风险之中，但又采取了自我保护措施。犯罪人是在早上计算机操作员换班时实施的犯罪。因为操作员在换班时一般都不积极工作，也不太可能立刻发现犯罪人或任何古怪之处，这就给了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和掩盖踪迹的时间。另外，犯罪的入侵方法也非常耐人寻味。犯罪人通过部门的拨号网络调制解调器库拨入，说明他/她是本部门的一员。攻击的方法很值得玩味——犯罪人删除了几个关键的系统文件使系统崩溃并无法启动，证明他/她对于侵害目标的主机拥有很多的技巧和知识。此外，删除重要的系统文件需要有很高的系统操作权限——犯罪人知道要取得权限和必须的密码。这个案件的动机看起来像是愤怒/报复，表明这一攻击是由与部门有深仇大恨的人实施的（如新近被解雇的职员）。

案例六

有位妇女遭到了来自网络中 Hotmail 账户的骚扰和威胁。被害人曾把大量的个人重要资料放在了网上，如年龄、住宅电话和地址、个人背景、照片和个人兴趣爱好等。犯罪人使用了一个虚假的匿名电子邮件账户来掩饰身份，但他又没有足够的网络知识来意识到邮件账户并非完全匿名（Hotmail 头文件中含有发信人计算机的 IP 地址）。尽管犯罪人声称是通过网页查找到被害人的位置的，但他表现出对被害人的周围环境较高程度的熟悉（如城镇、居民等情况），说明他在该地区曾呆过很长时间。此外，犯罪人并没有要求与被害

人见面，尽管网页中留有电话但犯罪人没有用，也许是因为他担心见面或通话可能会被认出或引起反感。或许犯罪人认识被害人，也可能面对面的交流感到不自信或者不自在。邮件信息中含有一些对犯罪人幻想的描述，表明他有一定程度的心理不稳定。

被害人研究

由于在因特网上彼此相遇和交流的人数大量增长，因此考虑犯罪人通过网络已经跟被害人接触过的可能性就变得十分必要。例如，在鲁宾逊·约翰一案（见“犯罪与因特网”部分）的侦查过程中，最初只发现被害人的尸体处于两个相邻的州内，后来侦查部门通过彼此合作克服了因物证联系不明显而导致的并案盲点（McClintock, 2001）。然而，通过对鲁宾逊的网上活动开展充分调查，全面地确定他在网上是否还与其他没被发现的被害人交流过。结果，通过对所有失踪妇女的计算机记录查询，发现各案均为同一犯罪人所为。因此，对被害人的研究通常也应包括对被害人的因特网和相关计算机进行彻底的调查。

例如，假定一起凶杀案中的被害人通过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线路访问因特网，使用该线路上的电子邮件与家人和朋友联系，但是用 Hotmail 和陌生人交流。被害人的电脑中可能会含有来自家人和朋友的邮件，但可能没有发给或收到网上碰到的陌生人的任何信件。当然，细心的侦查员可能会检查被害人浏览的历史网页，留心与 www.Hotmail.com 最多的连接，就可能得到那些被害人从 Hotmail 收到的信息。

另外，设想在一起系列强奸案中的几个被害人惟一共同的因素是她们都有同一款移动电话。这些移动电话有全球定位系统（GPS）的特征，这一特征是否能让别人定位并追踪被害人？如果是的话，有没有在犯罪时间访问服务商系统的任何日志记录？

除了考察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通过网络联系的可能性之外，还要设法从被害人的网上活动来理解他/她这个人。有关被害人生活和行为的每个细节都有助于了解为什么某个特定个人会成为犯罪被害人。通过询问以下问题设法确定被害人网上活动的目标、原因、地点、时间以及结果等的各种情况（Casey, 2000）：

1. 被害人有网页吗？定期通过 USENET 发邮件吗？使用聊天网络吗？在移动电话上收发邮件或文字消息吗？这些在线活动的内容和前后背景联系能有助于一个心理画像专家了解被害人。

2. 被害人使用的是父母的账户、自己的账户，还是匿名账户？如果使用的是匿名账户，他/她是想要瞒着谁（如口出恶言的前男友）？

3. 被害人从因特网上得到了不用此法就得不到的什么东西吗（如友谊、麻醉品、幻想的实现）？

4. 被害人从哪儿访问的因特网？例如，在家里、在上班的地方，还是在网吧？为什么被害人选择该地点上网？是为了独处而不受干扰、为了生意，还是要面见某人？

5. 被害人是否展示了任何可能透露其心理状态、性爱、生活方式、智力或自我形象的行为？例如，被害人是否卷入了网上的自虐和施虐受虐狂团体？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要这样？

6. 被害人的网上活动中是否有可察觉的模式会表现其习惯或行程？在犯罪前后的时间里这些模式被中断了吗？

当在网上收集信息时，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对计算机的调查中。只要有可能，就要随时去与被害人在网上接触过的人进行访谈。在展开犯罪侦查之前，任何能使犯罪人与被害人相遇的事都是非常重要的。

展开被害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被害人的风险进行评估。被害人风险能帮助画像专家确定需要什么样的策划水平才能捕获被害人，对被害人的事前了解是否是必需的。这个过程能帮助画像专家洞察犯罪人渴望的目标及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因特网能改变被害人的风险水平，把一个其他方面低风险的被害人变成特定案子中高风险的被害人。例如，如果一名女子把大量的个人信息放在网上，而且参加了能暴露弱点的网上活动，这就增加了被盯梢的风险。如果一名在现实世界中矜持又谨慎的女子使用网络暴露了自己自虐和他虐的幻想，并安排和网友见面以把这些幻想付诸实践，那么这样的活动会增加其被强奸和遇害的风险。

案例七

试析洛佩特卡·莎伦一案（Sharon Lopatka）。这名女子从马里兰（Maryland）来到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为的就是会见杀她的凶手。朋友们描述的洛佩特卡是一个喜欢孩子、喜欢小动物的普通女人。然而，她在网上的活动给人却是完全不同的印象。洛佩特卡明显地对含有虐淫倾向的性行为感兴趣。对被害人研究不考虑她网上活动是不完整的，缺乏了最有关联的性格方面的信息，可能会把她描述成低风险的被害人，而实际上她是相当高风险的被害人。例如，在洛佩特卡凶杀案中，被害人家中的个人电脑里包含了数百条跟凶手罗伯特·格拉斯（Robert Glass）之间保持着重要联系的电子邮件。在发现这些邮件之前，侦查人员认为，处理的是一起低风险被害人的案件，若没有这些邮件，侦查人员也不可能挖出犯罪嫌疑人来。

案例八

古吉·琳达（Linda Guge），53 岁，2001 年 1 月 1 日被发现死于田纳西州靠近维斯特尔（Westel）的一条森林公路旁，是离开她妈妈在绿林（Greenwood）的家大约 24 小时的时候。侦查人员介绍说，古吉被绑在车身后，在崎岖不平、冰雪覆盖的路面上被拖了好几公里。在发现尸体的 4 天前，古吉曾向绿林的警察队提交了一份报告，称因为通过邮件接到了恐吓而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田纳西州坎伯兰郡（Cumberland Country）的治安官伯吉斯·巴特奇（Butch Burgess）没有透露古吉的 4 台电脑是否被没收了。一个恐吓直接通过因特网在屏幕上显示给古吉——称谓是“麦克加勒特·史蒂夫”（Steve McGarrett），这是夏威夷第 5 频道长期播放的电视剧中的一个人物。根据绿林警察队的报告，该恐吓称现在是“捕猎的季节”，麦克加勒特“死定了”（Indiana Newspapers, 2001）。

因特网上的风险评估也像在现实世界中那样起作用，两者的对比如表 27-3 所示：

表 27-3 因特网上的风险评估

风险	现实世界	网际网络
高风险被害人	无人照顾的小孩在从家到学校的路上和陌生人交谈	无人照顾的小孩在网络聊天室和陌生人交谈

(续表)

风险	现实世界	网际网络
高风险犯罪人	在有安全摄影机俯视的地点和被害人接触	在有监视或记录的网络区域接触被害人
低风险被害人	避免独自进入特定地点而且不会给陌生人提供个人资料	避免独自使用网络而且不会给陌生人提供个人资料
低风险犯罪人	戴面具并进行掩饰行为以避免被侦查到	利用网络所提供的匿名性并进行掩饰行为以避免被侦查到



在以电脑为目标的犯罪中，犯罪心理画像专家仍然应当尝试进行被害人研究。在这些案子里，除了以机器主人为目标以外，被害对象都是电脑。虽然电脑不是人，但根本问题还是一样的——为什么犯罪人选择该电脑目标，犯罪人要冒什么风险？为此，侦查员要收集有关电脑的厂牌和型号、操作系统、位置等各种信息，弄清下列问题：它包含了哪些东西？谁曾经存取过？经常连接到哪些电脑？入侵有多困难？以确定犯罪人是否先前有任何意图进入这部电脑的不成功的尝试。如果犯罪人需要有关目标主机的大量信息才能实施犯罪的话，侦查人员就应该设法确定这些资料是如何得到的。只能是本单位的职工才能知道的吗？犯罪人能通过监控得到这些信息吗？如果是的话，进行监控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水平和设备呢？

而且，在进行被害研究时，评估犯罪人所冒的风险也是很必要的。一名犯罪嫌疑人捕获某个被害人所愿冒的风险能表明他的欲望以及和被害人的关系。此外，这一思路也可应用到以电脑为目标的案件中。例如，假定有一台保护措施很好的电脑，如果犯罪人克服了许多障碍，并且为了入侵电脑而把自己暴露于许多风险之中，这种能力或许说明犯罪人很熟悉目标系统，对目标上的某些东西有强烈的欲望，并且有足够的技术来克服这些障碍和风险。

犯罪现场的位置和类型

因特网既可以是真实世界犯罪现场的延伸，本身又可以是数字形式的犯罪现场。如果在现实世界里发生了一起案子，犯罪现场有一台连接到因特网的电脑，那么搜查一下电脑和上网记录可能会导出相关的数字证据。与此相

似地，如果一起案件首先是在因特网上被目睹或记录下来，那么最初涉及的那台电脑的物理位置就应该作为犯罪现场进行追踪（获得搜查证、收集物理证据和数字证据等）。正像早先提过的德勒彭特（Dellapenta）的案件那样，网络中包含有重要证据可能是不明显的，因此，在所有的案件中都调查相关的网络证据是可取之道。

正如在第11章里详述的，犯罪现场并不仅仅是最初实施犯罪行为的地方，而且包括实施相关行为以及发现相关犯罪证据的地方。例如，当实施单个犯罪的时候，犯罪嫌疑人可能在一个时间和地点获得一个被害人，然后把被害人重新安置到另一个地方（在重新安置的过程中，潜在地造成了数个关联的犯罪现场）杀死被害人后，又在另一个地方抛弃被害人，然后在别处销毁证据。

因特网上大致类似的情形也很容易想像。例如，某个色魔从一个位置调查被害人，再（实际上地）变换到网上的另一个位置和被害人接触，取得信任和对被害人的控制之后劝说和他/她单独见面，强奸后置被害人于死地，并且设法删除所有的数字证据。进一步类推，计算机黑客们经常在一个位置调查侵害目标的主机，（实际上）变换到网上的另一个位置去入侵目标的系统（可能经过了数台中间系统），未经授权访问侵害目标的主机并窃取金钱或机密，破坏系统和包含的所有证据，删除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利用过的其他电脑中的证据。

简言之，关于一起案件可能会有许多的犯罪现场——每个现场都包含着证据，每个都因其独特的特征而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例如，位于何处，被用来干什么，以及怎样使用的，等等。这里提供了一些网络上潜在犯罪现场的例子，包括从犯罪人的角度看能吸引他作案的特征，以及从侦查人员的角度看能获得的证据价值，一起呈现给大家：

1. 某个色魔因为美国在线服务拥有很高比例的新网民，而他们还不熟悉这一新媒体的风险性，就经常出现在美国在线服务提供的聊天室里。定位并检查犯罪人在美国在线注册的账户可能会找出有价值的数字证据。记录下犯罪人所有的聊天会话就会得到很多的行为证据。

2. 某个色魔频繁出现在本地聊天室中以寻找接近本地被害人的机会。把犯罪人的位置确定在一定区域内就大大地限定了嫌疑范围。对吸引该地理区

域人的聊天室进行监控可能会引出犯罪人或其他被害人。

3. 某个色魔频繁出现在用户咨询网站 USENET 上（如吸毒康复咨询站、问题青少年咨询站和痛苦咨询站）寻找某种特殊类型的被害人。调查用户咨询网站 USENET 的档案文件或许可以得出有关犯罪人的有用信息。

4. 某个色魔通过在网上张贴个人广告或使用网络约会服务来获得某种特殊类型的被害人。这样的广告/约会服务可能有包含着犯罪人用来张贴信息之 IP 地址的日志文件，或者能引出其他被害人的相关记录。

5. 某电脑解密高手使用了一台电脑作为攻击另一电脑的中间集结地。这部中间电脑可能包含着有关犯罪的证据和犯罪人遗留下的工具，可以给出某人与第一犯罪现场之间联系的信息。

6. 有一组电脑解密高手利用在线聊天系统（Internet Relay Chatting，缩写为 IRC）作为犯罪的中间集结地——集合起来策划攻击，共享信息，交换已暴露的系统。监控这些地方可以得出额外的信息。

当有些犯罪人选择某个网上的位置来猎取现实中距离很近的被害人时，另一些犯罪人却利用网络故意选择实际位置很远的被害人。

案例九

在 1999 年年末至 2000 年年初的时候，一种精密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工具在很大范围内垂手可得，使少数人就能造成大型计算机系统，如雅虎、E-Bay 和 CNN 等操作系统的失灵。其实，拒绝服务攻击的概念很简单——入侵几台配置良好的高性能服务器并在目标中灌注大量数据，再入侵少数其他计算机用于控制攻击。利用中间机器来控制攻击使得很难把攻击行为与实际的攻击者联系起来。这些攻击都是相当自动化的，有中等技术水平的人就能实施精密的犯罪，并且很难把一个特定罪行与某个人联系起来。然而，攻击目标和犯罪现场都是由犯罪人选择的，也就可以用来理解特定案件的作案人。某个犯罪人或许选择因为感受到不公正对待而要报复的对象作为特定目标，或者只是为了改善形象（他们自己眼中的或他人眼里的）而实施攻击。另一个犯罪人或许是想从攻击中捞取好处。分析犯罪现场的位置发现，有的犯罪人可能选择网上的特定区域来发动拒绝服务攻击，是因为那里距离指定目标较近因此可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冲击。在案件中促成选择特定计算机作为工具的其他一些因素包括：计算机本身运转速度较快，连接到速度很快的网络

上，入侵容易。但这些都是实践出来的选择结果。犯罪嫌疑人可能在挑选特殊的“发射台”时有自己更具针对性的动机。例如，他们可能以前进去过该计算机网络，自信使用时不会被逮到。

犯罪现场的类型往往能表明它所含有的证据多少以及如何能被找到。例如，最初的犯罪现场在局域网内包含高度集中的数字证据（每平方英寸数个字节），而且可以彻底地、系统地被找到。相反，当第二现场位于网上的时候，证据可能分散在世界各地，要做系统调查就不切实际了。因此，心理画像专家所指出的任何侦查方向都非常有价值。

惯技和标记

犯罪人可以主动地利用因特网上的变化来逃避侦查和拘捕，也可以主动地先发制人以提高自己的现行作案手法（Turvey，2000）。

案例十

原告方根据在德雷尔·罗伯特（Robert Durall）（40岁）的办公电脑里发现的预先策划的证据而把对他的指控提升到一级谋杀。他原本被控犯有二级谋杀。他的一位同事告诉警方，他在德雷尔的办公电脑里发现了大量的临时文件，表明德雷尔使用过因特网搜索引擎来查找关键词含有“谋杀+配偶”、“意外+死亡”等字样的网页，依照法庭的档案还有窒息、毒药、杀人、凶杀等关键词。“+”的意思是要让搜索引擎只找出同时包括这两个关键词的网页（Associated Press，1998年9月4日）。

在另一个案例中，鲁宾逊·约翰首先使用报纸上的个人广告来猎取被害人，然后，利用因特网主动地扩大影响。鲁宾逊也利用网络随机应变地掩饰自己的身份，经常化名为“奴隶主”（McClintock，2001）。

当在网上搜索有关案件的信息时，掌握犯罪人的惯技和标记的知识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会让侦查员明确判断出要找什么和到哪儿去找。要记住，因特网上有很多区域是相当隐秘的，用常规搜查的方法或许永远也找不到。有时候犯罪人的惯技和标记能表明他们利用了一处或多处这样的偏僻区域。

表 27-4 包含了实施网络犯罪时所采取主要步骤的相关惯技和标记行为。星号表示既可能是惯技，又可能是标记的行为。

表 27-4 实施网络犯罪所采取主要步骤的相关惯技和标记行为

活动	惯技行为	标记行为
网络服务商 (ISP) 的选择	选择网络服务商 (ISP) 是根据其位置容易转移、熟悉以及/或容易从事非法活动	* 选择网络服务商 (ISP) 是为了选择某种特定类型的被害人
用户名选择	选择一个能容易骗取被害人的用户名	选择一个对犯罪人来说极有某种人格意义的用户名
网络服务的选择	选择能把特定类型的被害人作为目标或能实施某种特定罪行的网络服务	* 选择能给犯罪人提供较广阔的视野并因此能吸引注意力的网络服务
软件选择	选择某种具有独特能力的应用程序 * 创建自己的具有独特能力的应用程序	选择可以帮助犯罪人感到有力量或可靠的应用程序
猎取被害人	扮演某种角色以获取某种类型的被害人信任	* 选择特定类型的被害人
一般性活动	采取复杂步骤以隐藏其真实身份 做一个网上的虚假面具用于网页、USENET 布告等	寻求保证或言语上的侮辱 保存战利品 * 采取一系列的动作 * 伪造 E-mail 以仿冒他人

至于说明惯技和标记之间有更深层的区别,有一案例可以参考,即有名的米特尼克·凯文案件 (Kevin Mitnick)。米特尼克有非常高水平的作案手法,很难追捕到。他入侵电话网,制造一个漂亮的拨号回路来掩藏自己的所在之处,接着使用便携式电话拨入到较大的网络服务商中,然后就利用高级技术入侵计算机,窃取软件、信用卡和数据。一个由计算机专家下村勤 (Tsutomu Shimomura) 和联邦调查局的侦查人员组成的侦查小组最终使用了蜂窝状频率方向探测天线追捕到了米特尼克。尽管米特尼克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利,但他的行为还具有并非实施犯罪所必需的行为方式,即标记。例如,除了入侵下村勤的电脑并偷窃其软件之外,米特尼克还在语音信箱里留下了嘲弄性的言语以显示自己的本事,这可以视为一种签名特征 (www.takedown.com/evidence/voicemail/)。

当犯罪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利用计算机的自动操作功能时，那么，关于惯技的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出现了——自动操作和犯罪人的行为很难区分开来。当几个犯罪人使用同一种自动操作工具时，自动行为就特别成问题。例如，使某些能入侵电脑系统并隐藏证据的若干方法自动运行的计算机程序确实存在，因此自动化的惯技（automated modus operandi）行为就让多个同时利用同一自动程序的犯罪人之间几乎毫无区别。当每个犯罪现场看起来差不多都一样的时候，把单个犯罪人所犯的案子并案以及理解不同犯罪人的独特动机就更困难了。

犯罪人如果使用因特网时在不同的案件里改变作案手法，此时想要并案就非常困难了。随着犯罪人更加熟悉因特网的情况，他们总是能找到新的方法来利用它，更有效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创造性地利用网络的犯罪人能够做到频繁而又彻底地更改作案手法，以至于堪称随机应变的高手。入侵保护措施良好的计算机系统的犯罪人，可能不得不为每一个独特的目标都制定一个新颖的入侵计划。当犯罪人有意识地设法要挫败侦查人员的侦查时，也可以看到随机应变的动态的惯技（dynamic modus operandi）。例如，当在网上悄悄跟踪猎物的犯罪人意识到侦查人员正在防范能恐吓被害人的一种方法的时候（如电子邮件），他就会选择使用另外的方法（如利用 ICQ，即网上寻呼机，它支持在 Internet 上聊天、发送消息和文件等）。

能够从已知的数字证据中摘取关键性的行为证据，并能基于该行为证据作出合理推理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对涉及因特网的犯罪侦查的作用是非常宝贵的。此外，在数字环境中能够辨别出标记行为的心理画像专家在战胜自动化的或动态的惯技（automated or dynamic modus operandi）行为过程中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他们能利用标记行为来串并案，并对犯罪人作出推断。

参考文献

1. APB News (2000) "Online Imposter Lured Student to Death, Cops Say: Texas Man Allegedly Posed as Woman; Other Victims Sought", April 27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apbnews.com/newscenter/breakingnews/2000/04/27/student_0427-01.html).
2. Casey, E. (2000) Digital Evidence and Computer Crime: Forensic Science and

the Internet, London: Academic Press.

3. Casey, E. (2001) Handbook of Computer Crime Investigation: Forensic Tools and Technology, London: Academic Press.

4. Court TV (2001) "Sex, Lies and Murder: Michigan v. Miller", February 26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court tv.com/trials/tapecl/miller.html>).

5. Dallas Morning News (2000) "Slaying Highlights Risks of Internet Relationships: A&M Student Missed Warning Signs, Parent Say", April 29.

6. Gudaitis, T. (1998) "The Missing Link in Information Security: Three Dimensional Profiling",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Vol. 1, No. 4, 1998. Mary Ann Liebert, Inc.

7. Icove, D., Seger, K. and VonStorch, W. (1995) Computer Crime: A Crimefighter's Handbook. O'Reilly & Associates.

8. Indiana Newspapers (2001) "E - mail Threats Were Enough to Make Victim Go to Police", January 6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mailutilities.com/news/archive/20/203.html>).

9. Johnson, S. (1997) "Psychological Force in Sexual Abuse - Implications for Recovery", in The Sex Offender, Schwartz, B. K. and Cellini, H. R. (Eds.) New Insights: Innovations and Legal Developments, Vol. II, Kingston, NJ: Civic Research Institute, pp. 17.1 ~ 17.11.

10. Kansas City Star (2001) "Judge Rules Robinson Must Stand Trial in 3 Deaths", March 2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kcstar.com/standing/robinson/case.html>).

11. Loknapatawpha County (2000) Law Enforcement Evidence File #12A - 1995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crimescene.com/crime/>).

12. McGrath, M. and Casey, E. (2002) "Forensic Psychiatry and the Internet: Practical Perspectives on Sexual Predators and Obsessional Harassers in Cyberspace",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30 (1; March).

13. McLean, J. J. (2001) "Homicide and Child Pornography", in Casey, E. Handbook of Computer Crime Investigation: Forensic Tools and Technology, London: Academic press.

14. McClintock, D. (2001) "Fatal Bondage", Vanity Fair, June.

15. Meloy, J. R. (Ed.) (1998) The Psychology of Stalking: Clinical and Forensic Perspective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6. Newsweek International (1989) "You Could Get Raped", February 8.
17. Psychiatric News (2000) "Protect Children from Predators on Internet, Parents Tell Congress", May 5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psych.org/pnews/00-05-05/protect.html>).
18. Rogers, M. (1999) "The Need for a New Hacker Taxonomy", Lecture Presented at Computer Security Institute's NetSec Conference, St. Louis, MO.
19. Shaw, E. D., Post, J. M. and Ruby, K. G. (1998) "Inside the Mind of the Insider", Business Continuity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securitymanagement.com/library/000762.htm>].
20. Shaw, E. D., Ruby, K. G. and Post, J. M. (1998) "Insider Threats to Crit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Technical Report #2,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ulnerable Critic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sider (CITI), Political Psychology Associates, Ltd. (www.poi-psych.com).
21. Turvey, B. "Modus Operandi, Motive and Technology", in Casey, E. (2000) Digital Evidence and Computer Crime: Forensic Science Computers and the Internet, London: Academic Press.
22. U. S. v. Romero, 167 US 7th Circuit 17 (1999)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kentlaw.edu/7circuit/1999/aug/98-2358.html> and <http://laws.lp.findlaw.com/getcase/7th/case/982358.html>).

第28章 道德规范与犯罪心理画像专家

Brent E. Turvey, M. S.

有些人认为他们拥有压制别人的特权，对于这种错误的想法，我们应该给予公开地谴责。漠视罪恶并将它深深地隐瞒起来，就是在无形地助长罪恶的气焰，带来的将是犯罪率的千倍上涨。坚持真理无所畏惧，匡扶正义宁可身陷囹圄。

索忍尼辛·亚历山大于古拉格群岛（Alexandr 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所谓道德规范（ethics），是指业已形成的用来约束职业人员行为的标准和法则。现在存在的问题是真正走向专业化^①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还为数不多。因此，当今的许多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见解得出专家性的结论，而不必顾及其所造成的各种后果。

例如，笔者认识的许多同事就有这样的说法：“真正完成案件侦破任务的不是犯罪心理画像专家，而是刑警。”现在尤其是在接受表彰的时候这一点尤应牢记在心，因为事实也就是这样的。刑警才是真正的破案人员，而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无非只是个技术顾问。但这并不能作为心理画像专家逃脱对犯罪事件提出质疑、进行推断并对犯罪人心理画像的局限性进行阐释的责任，而

^① 1999年3月16日，作者与其他5名来自侦查学、行为学和法学的专家共同创立了行为画像学会（Academy of Behavioral Profiling），它是第一个致力于犯罪心理画像的无党派独立专业组织。正像该学会主席迈克尔·麦格拉斯（Michael McGrath）硕士所讲的那样：“具有各自特定背景的个体联合起来，通过在各自领域努力去共同开创一条多学科协调的专业化道路。作为各自学科领域的专家，我们在与自己曾经和正在从事的工作以及做事的方式和原因作斗争。”该学会的网址为 www.profiling.org。

应该随时提供自己立论的依据，并以道德规范自己。

笔者惊骇地发现在犯罪心理画像学界，不计后果、缺乏道德规范的行为屡见不鲜。其中许多人甚至对自己这种无职业道德的表现以及由它带来的不良实际后果毫无意识，乃至漠不关心。事实上，更危险的是许多人处心积虑于谋取媒体关注，他们拾人牙慧却标新立异，发表似是而非的作品（其实无非来自简报的抄袭和冷饭的炒作而已）。

关键是责任感。记住也许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画像的方法和结果都不尽如人意，但单从行为举动就可以完全体现一个人的道德规范（例如，只会使用一种方法而又明知其不灵验的画像专家就应认为是不够称职的）。如果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只把自己看做是学术人员，一心只为实现自己崇高的学术目标，而不是以自己的研究用于协助实际的案件调查为己任，那么就是在办案中缺乏道德规范的，也就是说在工作中没有从道义上尽到自己该尽的责任。

我们怎么敢这样做事？

侦查目标与临床目标

无论是侦查过程还是法律诉讼过程，行为证据分析技术（behavior evidence analysis techniques）都是作为案件调查的辅助性手段为案件的现场再现工作而设计的，而不是用来进行心理诊断的。

临床医师的首要任务是诊断病情以便进行治疗。换句话说，他们对于犯罪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负有首要责任。诊断的过程是为了搞清楚犯罪人的犯罪动机，是什么导致他实施性侵犯，用什么方法可以进行有效补救等（Groth, 1979）。许多治疗模式主张，为对犯罪人进行有效治疗，临床医师必须把他们当人看待，但同时也冒着被犯罪人為自己犯罪所做“合理化”狡辩的言行迷惑的危险，甚至还可能为他们找出其他开脱罪责的理由（Marshall, 1990）。

这种治疗问题并不是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所关心的，他们的任务是进行并案调查和法庭辩论，惟一感兴趣的只是对事实的客观调查。他们关心的不是犯罪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而是通过匡扶正义，维护社会利益，避免更多人遭遇不必要的伤害。

这对于在案件侦查阶段中希望从事犯罪心理画像的临床医疗人员来讲，事实上是一个潜在的道德规范的矛盾体，他们必须将挽救犯罪人的初衷置于一边，

去寻找强有力的打击犯罪的证据以除恶扬善，匡扶正义。他们必须改变自身传统的治病救人的一面，协助警方抓获犯罪人，否则有朝一日犯罪人会再次成为他们的新病人。这绝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一个必须直接面对的问题，以防止对案件调查产生任何影响。这同时也表明，作为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如果借用专为治疗犯罪人而设计的工具和方法作为犯罪人画像工作的一部分，那么他就可能陷入伦理道德的矛盾之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可能并没有受过对犯罪人进行相应诊断方面的培训，甚至心理学分析也恰恰远离他们所学专业的范围。第二，正如前面讲到的，许多诊断工具和方法并不是针对案件调查而专门编写的，如弗洛伊德的学说、犯罪人分类研究以及人物性格特征测量学（一般的犯罪人类型）等，都是为诊断和对待那些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人设计的。这些工具和方法的运用要求与犯罪人正面接触（而这在犯罪侦查阶段是根本做不到的，何况即使犯罪人已经在押，并且为了审判的公正性，在庭审期间也不应让犯罪心理画像者与犯罪嫌疑人会面或有任何接触）。

关于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到底应在外围还是直接介入侦查这一令人头疼的道德规范问题，只能留待以后争辩了。

窥阴癖者与犯罪心理画像

窥阴癖病人（voyeur）是指通过观看色情场面而得到性满足感的人。正像是因为有窥阴癖者，就会像能吸引一定群体的人来投入其中的治疗方法一样，对犯罪心理画像也是如此。这些年来，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对涉及裸体和性行为的案件资料所表现出来的特别兴奋和热情让作者感到了一丝忧虑。为了和这种现象作斗争，对这些学生进行适当教育使之对这类受害人给予必要的尊重，作者提供了如下几方面的解决办法。

口头教育

作者在给学生分发新的案件材料或有关描绘裸体或性行为的资料前，首先要对大家进行人生价值的教育。因为我们所学到的这些教训都是以有些人的人格、身体甚至他们的生命为代价的。我们应该对这种牺牲表示理解和尊重，从中汲取教训，而不应轻视它。这可以通过说教来进行，教育学生在言

论中要尊重材料及受害者。当然最重要的是通过实例进行教育。

移情训练

在学生们得到或展示案件材料之后，让他们以受害者的名义选一个亲人，给父母，或者配偶，或者恋人写一封信，告诉他们自己被害的经过（如果必要一直写到被害）。几乎所有的学生都选择了恋人，无疑这种选择来自于他们个人的生活态度，信的内容也体现了很多学生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不过做这样的练习目的是让学生们意识到受害者也是人，并能做到举一反三。显然，这种练习会影响到将来研究本案时学生是否仍能保持客观。但是不考虑受害者痛苦的客观性是非人道的，作者也不愿见到鼓励学生这样。

媒体和娱乐业：相悖的兴趣

由于犯罪心理画像中包含大量的涉及情感和性侵害的情节，所以无论是真是假，都同样会有很高的收视率或阅读率。它不仅引起了大量观众对媒体中介绍心理画像相关内容的兴趣，而且也引起了很多在校学生研究相关课题的兴趣。总之，犯罪心理画像专家被频繁地邀请对媒体上的真实或虚拟的犯罪人和犯罪过程进行分析和咨询等。

新闻机构

新闻机构为了满足大众对案件侦破的兴趣，经常向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咨询他们的看法和观点。犯罪心理画像专家为此所做的第一个考虑就是自己是否有资格讲出案件的细节。第二个考虑是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已披露信息并使它们能够组合得出一定的结论。第三个考虑是若公布这些信息对案件的侦破过程是有利还是有弊。我本人的原则是，在不掌握有关案情的充分事实之前不妄加评论，何况这些事实通常媒体并不掌握。大多数情况下，作者都只是探讨犯罪心理画像的一般技巧和在实际案件调查过程中的具体应用。

对于一名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来讲，最危险的是当他开始被媒体誉为所谓的专家、在新闻和报纸上到处可以听到和看到他们单独的名字时，膨胀的个人虚荣使他只习惯于媒体对他们的点名吹捧，一旦从媒体看不到或听不到自己大名时反而会感到失落。于是，他会专门做一些引起媒体关注的事情，甚至直接笼络媒体。无论是上述哪种行为，均无疑会降低本人的公众形象和职

业可信度。

书籍、电影和电视

通常，电影和电视在制作过程中为了增加其视觉冲击力都会邀请一些专家对作品作技术处理或追求对作品至关重要的真实效果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例如，畅销书《红龙》（Red Dragon）和《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的作者托马斯·哈里斯（Thomas Harris）为了学术需要，曾特别被允许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当时的行为科学部（Behavioral Science Unit，简称BSU）体验生活。这对他的确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是史无前例的殊荣。之后，1986年由《红龙》改编的故事片《猎人》（Manhunter）一经德拉·劳伦斯影视公司（De Laurentiis Entertainment Group）推出便获得了惊人的票房，1991年，在奥林电影院（Orion Pictures）上映的《沉默的羔羊》一度获得了奥斯卡奖。

由于这些书被改编成了电影，美国联邦调查局当时的行为科学部的研究人员也一举成名。不过，这对该部门带来的麻烦远远超出了给它带来的荣誉。

伴随着《沉默的羔羊》等一系列影片的成功上映和一些早期的联邦调查局犯罪心理画像专家出版的回忆录的热销，犯罪心理画像专家们开始频繁地被影视娱乐业邀请作为影视片制作和拍摄的顾问。这无形之中更增添了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所包含的精神上特有的，或者说是超常能力的神秘感。显然绝大多数犯罪心理画像专家们并不苟同于现实中大量文学作品里所描述的那样。作为虚构故事创作当中的顾问，必然宣扬犯罪心理画像中超自然能力的运用，从而在公众当中形成了对这一领域错误信息的公认。

真实的犯罪

真实的犯罪推销莫过于将犯罪做戏剧性的改编、夸大性演绎或包装，兜售暴力性行为，将血腥的犯罪人推到公众面前，就像沃尔莫所表述的那样（Vollmer, 1949, p. 1）：

美化过的犯罪应该遭到谴责，利用变态犯罪人来制造英雄同样可恶，然而，真实情况是公众对此可做的事情却是少之又少。

如上所述，犯罪心理画像者已经通过出版自己办案的回忆录的形式做了

一定成功的尝试，但随之产生了一个职业道德问题，因为支持他们这样做的出版商的宗旨是赚钱而不是破案。正应了一句老话：“一仆不事二主。”犯罪心理画像者一方面进行案件调查，另一方面为满足公众口味、赢得一定的商业利益去编造事实是不可能的。

当犯罪心理画像造成损害时

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市邦德大学（Bond University in the Gold Coast）的犯罪学教授威尔逊·保罗博士（Dr. Paul Wilson）很好地阐述了与犯罪心理画像有关的一些道德问题。根据凯克西斯等人（Kocsis, 1998）的论著：

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有责任指出这种画像的局限性……犯罪心理画像在道德方面与其他的侦查技术都是一样的难免主观性。重要的是犯罪心理画像的技术（或者其他的侦查技术）是如何在案件中被运用的。

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犯罪心理画像技术都可能会造成损害，而不仅仅局限于以下几种：

1. 由于提供了错误的指导意见而延误了拘捕犯罪人。
2. 由于把目标指向了错误的犯罪人而延误了拘捕真正的犯罪人。
3. 由于排除了真正的作案人而延误了拘捕犯罪人。
4. 根据心理画像中的特征而将某个公民与犯罪联系起来，并因此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

上述前三项代表了那些不正确的画像方法所造成的结果。只有第四项代表了该技术错误使用所造成的对道德规范的破坏。但是，有一种为这些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进行申辩的观点就是，犯罪心理画像专家一直倡导和使用这些方法，但他没有正确地提醒那些使用他的画像结论的执法人员（这往往是导致前三项的原因）。

有许多违背道德规范运用犯罪心理画像的实例。我们要记住，违背道德规范运用该技术的含义是什么。另外，我们还应记住一点，违背伦理或道德并不一定就是犯罪。试析下列案例：

戴维斯·T. 卡尔兰案件（T. Cullen Davis）

1976年8月2日午夜前后，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潜入了石油大亨戴

维斯·T. 卡尔兰的家并向4个人开了枪：普里西拉·戴维斯（Priscilla Davis，戴维斯的前妻），斯坦·法尔（Stan Farr，普里西拉的男友），格斯·盖弗瑞尔（Gus Gavrel，普里西拉的老朋友），以及12岁大的安德里亚·威尔伯恩（Andrea Wilborn，戴维斯的养女）。斯坦·法尔和安德里亚·威尔伯恩在攻击过程中被杀死。

很快戴维斯就被认为是具有很强作案动机的犯罪嫌疑人。首先，普里西拉·戴维斯在离婚案中从她的前夫那里得到了300多万美元。另外，在枪案发生的当天，法庭曾判决戴维斯要向前妻支付加倍的抚养费，即一个月5000美元。他被指控并被送上了法庭，但最后被宣告无罪。

尽管法庭宣告戴维斯无罪，但是幸存的普里西拉·戴维斯还是决定为了安德里亚·威尔伯恩的死而控告她的前夫。一位联邦调查局的前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拉塞尔·沃佩奇尔（Russell Vorpagel）应邀来提供了证言。根据《达拉斯早间新闻》（Dallas Morning News，1987年）的报道：

拉塞尔·沃佩奇尔是一名犯罪嫌疑心理画像的专家，他把戴维斯描述成一个“冷酷、残忍、顽固”的人，这个人与其他人不会产生感情……

沃佩奇尔声称他的专业技术是通过在联邦调查局从事了22年的心理学角度的画像工作而训练出来的，他通过查阅戴维斯的犯罪审判证言、警方的报告、犯罪现场照片以及证人证言而形成了对该犯罪人的大致的心理刻画（psychological sketch）。他认为那个凶手很可能是在愤怒和复仇的动机驱使下携带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到现场去杀几个人……

“我看见了复仇、愤怒，这种愤怒是由其中一个尸体上的多处弹孔表现出来的。”沃佩奇尔是根据法尔躯干和颈部的4处弹孔而说这番话的，“他当时肯定觉得需要更多的枪弹来发泄。”

沃佩奇尔将自己分析的凶手形象结论与案件发生后戴维斯的两份心理评估报告进行了比较，该心理评估报告与凶手的心理画像非常吻合。

沃佩奇尔声称戴维斯正好是那种“冷酷、残忍、顽固、自我本位，把女人都看成是贪婪的那种大男子主义的人”。

我们非常感谢沃佩奇尔能凭自己丰富的经验从现场的物证和行为证据上分析出犯罪动机。但是他似乎走得太远了点。正如笔者和其他许多人所建议的那样，犯罪心理画像并不是用来指认犯罪人的。

犯罪心理画像不能用来针对某一个人。而沃佩奇尔的上述言论则是向法庭暗示，戴维斯的心理评估报告和凶手的心理画像吻合得很好。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通过比较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的心理特征来确定犯罪人是不可能的（参见第17章）。

韦科案件（Waco）

1993年4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烟草火器局（the FBI and the ATF）在得克萨斯州的韦科庄园围攻大卫教派（Branch Davidian），该事件经过51天之后以教主考雷什·大卫（David Koresh）以及他的85名追随者的死亡而告终。^①这些人里面包括男人、女人、小孩，他们都在联邦调查局用催泪瓦斯和坦克对楼房发动攻击的6小时后死于大火中（Hancock, 2000）。

当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警告联邦调查局的人员不要攻破堡垒的时候，这名专家被告知必须改变自己的观点，否则将会受到处罚。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1995）：

斯梅瑞克·彼得（Peter Smerick）是联邦调查局对考雷什的犯罪心理分析和画像（criminal analyst and profiler）的负责人，他打破了沉默而去控诉某些联邦调查局的领导，是他们迫使他改变了自己关于如何和平解决该事件的建议方案。

斯梅瑞克现在已从联邦调查局退休，在华盛顿特区担任顾问工作。他说，当时他提出了警告，在1993年3月3日到3月8日之间，他写了4份备忘录给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建议使用非对抗的方式来接近考雷什。

斯梅瑞克说道，就在他写第5份备忘录的时候他受到了来自上述那些人的压力。结果，那份备忘录在语气和着重点上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使得那种对付大卫教徒的攻击型方案得以出台。

在接下来的这个月中，联邦调查局从司法部长里诺·珍妮特（Janet Reno）那里得到了实施他们计划的命令。他们向堡垒中喷射催泪瓦斯，然后，考雷什和他的追随者就点燃了建筑物。这是司法部对当时围攻现场情况的报道。

^① 韦科案件中的死亡人数仍有争议。一些可靠的新闻机构和联邦调查局对此都有不同的报道。联邦调查局宣称是考雷什·大卫造成的这种差异，因为他提供了关于居住在卡梅尔山的人口数的虚假信息。

另外，根据汉考克（Hancock，2000）的资料：

尽管没人愿意承认自己应当被审查，但是，斯梅瑞克在 1995 年的时候声称他当时确实感觉到了一定的压力促使他改变自己的建议。他还在接受一次秘密采访的时候谈到：“联邦调查局进行中立的犯罪分析传统……在韦科案件中妥协了。”

斯梅瑞克告诉记者，他在递交了这份妥协性的备忘录后就不再写这方面的报告了。这份备忘录去掉了前几份备忘录中的出现过的不要逼迫这些教徒的警告，并且加入了一些对来自华盛顿总部的施压战术的意见。3 月 17 日，他在挫折中离开了韦科庄园，但是他还与一些谈判人员保持着联系。

斯梅瑞克在国会作证时承认自己受到压力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正如泽利夫（Zeliff，1995）论述的那样：

公开陈述，国会议员泽利夫·H. 威廉（William H. Zeliff），JR.

1995 年 8 月 1 日，星期二

……奥特曼·罗杰（Roger Altman）在他于 4 月 15 日作出的重要备忘录中写得很明白。奥特曼没有参与决策过程，但是他预料到了这场灾难。他说：“有可能会发生一场灾难。”

同时，联邦调查局的斯梅瑞克写下了 4 份备忘录，他也不同意放弃谈判而采取其他的战术行动。后来他感觉到了必须改变自己的观点，因为他必须迎合他的上级，包括联邦调查局的主管人员。

斯梅瑞克·彼得当时的上级道格拉斯·约翰（John Douglas）最近证实了这件事。根据沃顿（Worden，1999）的资料：

在参与那起案件的谈判人员中，有一个人感觉到了压力而只能对当时的谈判人员收集的信息闭口不谈，这就是道格拉斯·约翰。这名工作了 25 年的特工是联邦调查局里的老手了，他当时是联邦调查局里侦查支援组的负责人，该组为这起案件提供谈判人员。

……

“我觉得我除了保持沉默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否则别人会叫我‘多嘴驴’。”他说道。

道格拉斯是行为科学部的一名成员，这个组包括犯罪心理画像专家、犯罪分析专家以及犯罪心理专家。道格拉斯说，这个部与人质解救组发生了好

几次冲突，人质解救组是强硬的主战派，它拒绝了行为科学专家的意见，他们主张的是采取打击行动获得战果。

.....

在这次不幸的攻击行动开始前一周，位于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道格拉斯被问及了当时的状况。据他所说，当时房间里有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克拉克·弗洛伊德（Floyd Clarke）、犯罪侦查方面的局长助理波茨·拉里（Larry Potts）、局长助理考尔森·丹尼（Danny Coulson）以及犯罪侦查部门的负责人科霍·麦克尔（Michael Kahoe）。

道格拉斯向会议成员简要地汇报了他的谈判人员对考雷什和他的追随者们作出的心理画像情况。

“我告诉他们，考雷什有可能会变得狂暴……尽管我认为他目前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道格拉斯说道。“我告诉他们只要考雷什还同我们保持对话，他就不会伤害任何人。”

他陈述了20分钟后，波茨、考尔森和科霍离开了房间，并让一名职员把道格拉斯领了出去。他说：“我觉得他们把我叫到会议室的外面非常奇怪。”在外面，科霍对他说：“我们不希望你向局长汇报情况。有一些事情我们不想让局长知道。我们自己会去向他汇报的。”

道格拉斯声称，在他有机会讨论战术策略专家和谈判人员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的时候，会议突然结束了。

正像斯梅瑞克和道格拉斯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司法部长里诺·珍妮特是根据斯梅瑞克提供的信息而作的决定，而斯梅瑞克是迫于道格拉斯的压力而在最后一份报告中改变了自己的观点，道格拉斯则受到了联邦调查局中他的上级的压力，于是倾向于对韦科动武。

他们由于害怕失去工作或受到处罚而同意改变自己作为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所提供的专家意见，从而去迎合他们的上级领导。他们都知道这个决定可能会导致有人死亡。^①

^① 由于钱财的原因而改变自己的专家意见可以说是专家们所能做出的最不道德的行为。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如果改变自己的专家意见而可能导致有人死亡的话，这就是最极端恶劣的违反道德的行为了。

斯塔吉·科林案件（Colin Stagg）

1992年7月，23岁的尼凯尔·雷切尔（Rachel Nickell）和她两岁大的儿子亚历克斯（Alex）以及她们的狗在伦敦的温布尔登（Wimbledon Common）附近散步。她被人当着自己孩子的面刺了49刀，这是当年英国最具轰动性的案件。执法部门接受了心理学家布里顿·保罗（Paul Britton）的帮助，他所做的心理画像与一个名叫斯塔吉·科林（Colin Stagg）的人在很多方面非常吻合。但是，执法部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人犯下了杀人罪行。他们决定在布里顿的帮助下，让一名女警官与该人建立一种通信往来（Kocsis, 1998）。根据爱德华兹（Edwards, 1998）的资料：

心理学家通过这名秘密的漂亮的金发女警官与31岁的斯塔吉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她与斯塔吉一起分享了很多充满暴力的性幻想，谈论了杀死一个小孩和一个年轻妇女，她想让他来配合自己的故事，甚至告诉他自己非常希望他就是杀死尼凯尔的凶手，因为“我就是喜欢那种男人”。

斯塔吉从没声称自己杀过人，但是从700页的信件、电话记录中以及他们的约会见面中，心理学家保罗·布里顿推断出了斯塔吉的幻想，分析了那些与案件中的细节非常一致的信息，揭示了那些只有凶手才可能知道的一些犯罪现场的情况。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辩护方指出斯塔吉的幻想并不能说明他有罪，因为他不知道案件发生的地点，他在幻想中错误地认为被害人被强奸过……

法庭认定被告无罪，同时也承认警方办案中所受到的压力，最后被迫得出结论：认为警方的上述做法不仅暴露了它急于求成，甚至公然采取了一些主动的和欺骗的方法来使犯罪嫌疑人承认有罪。

这起案件中心理学家超出了他的专业范围而去分析犯罪现场上的行为，忽视了犯罪嫌疑人故事里的一些差异点，并且他最终没考虑这些客观情况而试图去证明警方的意见。

斯塔吉·科林并不是这出由犯罪心理画像导演的闹剧的惟一受害人。1998年6月12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

参与尼凯尔·雷切尔案件秘密侦察行动的女警官不得不提前退休了。

这名曾经化名詹姆斯·莉齐（Lizzie James）的33岁女警官由于健康原因

离开了警察部门，她在尼凯尔案件的侦查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使得她的健康受到了影响。

在法庭审判的时候，控方的观点完全是以莉齐和斯塔吉的通信和对话内容为基础的……

莉齐已经在警察部门工作了13年，其中有一段时间是在苏格兰场的SO10秘密行动组，在尼凯尔案件之后仍然继续工作。

一些官员声称，她一直没有摆脱在调查尼凯尔案件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创伤，而该案的侦查最终还是失败了。

朱厄尔·理查德案件（Richard Jewell）

1996年7月27日，一个装有炸弹的背包被安放到了亚特兰大市百年奥运公园中AT&T电讯环球村展台附近。这个公园是一处公共设施，当时里面有很多人，并且1996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者也大都住在那里。这个爆炸装置在凌晨1时20分发生爆炸，当场炸死了奥尔巴尼市的艾丽丝·霍索恩（Alice Hawthorne），并炸伤了111人。一名土耳其的摄影师后来也由于心脏受伤而死亡。

朱厄尔·理查德（Richard Jewell）是公园的一名安全人员，他在爆炸即将发生之前把这个可疑背包通知了警方，并且他还帮助疏散了该地点的人员（CNN，1996）。

这名34岁健壮的安全人员操南方口音，并且非常热心警务工作。由于他在公园里的长凳下最先发现了炸弹，人们都为他的勇敢和专业精神向他致敬。

在1996年7月27日的炸弹爆炸之前他帮忙从现场疏散了人群，这些快速的行动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尽管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从没有以英雄自居。他认为这只是他分内的工作。

但是几天之后，奥林匹克公园爆炸案出现了难以置信的、戏剧性的变化：联邦调查局怀疑是朱厄尔本人将炸弹安放在那里。7月30日，亚特兰大的一份杂志引用了来自执法部门的未经证实的信息，它推出了一份特刊来介绍联邦调查局怀疑朱厄尔就是犯罪嫌疑人（CNN，1997a）。

一个热心的、没有经验的联邦调查局职员把一条消息透露给该杂志：犯罪心理画像专家认为朱厄尔可能就是作案人。该杂志报道了朱厄尔·理查德

已经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头号犯罪嫌疑人，他符合联邦调查局作出的嫌疑心理画像，认为作案人曾经是名警察，并且渴望成为英雄。

在案件侦查的过程中，侦查人员把朱厄尔和他 60 岁的母亲一同居住的住所里的所有东西都翻了个遍。在他们最初申请搜查令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引用了一些证据，如朱厄尔“没有女朋友……非常喜欢有关警察的故事”，以及“曾经两次参加了有关爆炸和炸弹的讲座”。简而言之，很多侦查人员认为该心理画像描述的是一个疯狂崇拜警察的人，而曾经当过警察且目前是公园安全人员的朱厄尔非常符合这一特征，他可能先安放好炸弹再来“发现”它，从而赢得荣誉（Hewitt，1996）。

还有一些报道称，从朱厄尔的家中搜查出了一些东西，如他收集了很多把自己描绘成英雄的剪报。这些东西无异于给媒体火上浇油。当朱厄尔到联邦调查局接受询问的时候，他被告知这次询问是非正式的，并且他们也没有把他当做真正的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希望他相信，他们只是想要借他拍一部培训联邦特工的录像带。因为他们预料这做法对渴望成名的他具有吸引力。

事情终于真相大白，搜查证也没有查到任何证据，联邦调查局只得认输，他们给朱厄尔发了一份通知声称他被解除嫌疑。根据柯林斯（Collins，1996）的记载：

负责亚特兰大爆炸案侦查的检察官 B. 亚历山大寄来的信中对此并未表示丝毫歉意，但是最终使朱厄尔从担心被捕的恐惧中解脱了出来。信中说朱厄尔“不会被认为是侦查的对象了”。但信中还说“除非又找到新的证据，否则这种状态是不会改变的”。

这种语气没有排除将来还会对朱厄尔进行侦查，而且一些联邦调查局的侦查人员仍然认为他与这件犯罪有关。但是事实上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他与这起爆炸案有关。对他母亲住所的搜查没有找到任何东西。犯罪人制造奥林匹克公园的那种粗糙的炸弹必然要对炸药进行处理，但是，在朱厄尔的身上、他的卡车上、他的家里都没有爆炸物的痕迹。侦查人员甚至运用了灵敏度号称达万亿分之一的检测器也没有任何收获。“他们通过对他家连日的检验知道了这起案件不是他干的，但还是怀疑他。”朱厄尔的律师布莱恩特·G. 沃森（G. Watson Bryant）说道：“他们的行为非常卑劣。”

那名将心理画像结论泄露给媒体的联邦调查局职员遭到了投诉：

联邦调查局的职员约翰逊·堂（Don Johnson）在星期四上班的时候受到了同事们的热烈欢迎。在此之前，他由于在接受采访时发表了一些关于奥林匹克公园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朱厄尔·理查德的意见而被停职5天并扣发工资。

在约翰逊进入亚特兰大市联邦调查局总部的时候有几十人热烈鼓掌欢迎。

一位名叫格罗根·哈里（Harry Grogan）的职员在被问到约翰逊是否是政治上的替罪羊的时候说道：“是的，我认为是。”联邦调查局在上周对约翰逊进行了停职处理，同时还批评了亚特兰大的特别负责人伍迪·约翰逊（Woody Johnson）以及堪萨斯市的特别负责人大卫·塔伯斯（David Tubbs）在朱厄尔案件侦查中的表现。

朱厄尔没有在1996年奥林匹克公园爆炸案中被起诉，并且联邦调查局最终洗脱了他的嫌疑（CNN，1997b）。

这起案件不仅涉及联邦调查局违反道德规范将犯罪心理画像用于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人，而且媒体也参与了进来。幸运的是，由于没有任何确凿的物证将朱厄尔与这起案件联系在一起，使得他没有受到法庭审判。而这些传媒机构也主动为它们破坏朱厄尔名誉的行为对其进行了经济赔偿，从而避免了将他们告上民事法庭。

犯罪心理画像的道德伦理原则

行为画像学会（Academy of Behavioral Profiling，简称ABP）由于最先提出了一些用于指导犯罪心理画像专家的道德规范原则，从而协助完成了犯罪心理画像工作专业化的任务。1999年3月，行为画像学会出版了《专业行为的道德规范原则》（Ethical Guidelines for Professional Conduct）一书。我作为行为画像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鼓励从业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按照这些原则开展工作。这些原则可以通过核查避免从事研究或案件侦查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所作出的画像结论被滥用。行为画像学会提出的原则（参见 www.profiling.org/abp-conduct.html）包括：

申请人、学员、会员以及行为画像学会的成员都应当：

1. 保持一种专业精神和正直诚实的态度。
2. 进行研究的时候应当使用那些普遍认可的、科学的方法。
3. 采用他人意见时应确定其可靠性，不得盲从。

4. 非经特别允许,对于从委托人或委托机构处获得的信息要保密(来源公开的信息除外)。

5. 保持一种独立公正的态度,这样才能毫无偏见地分析和解释这些证据。^①

6. 尽力避免对犯罪人和被告人的预想意见和偏见影响到最后的犯罪心理画像和犯罪分析。

7. 使自己的意见和结论严格符合案件中的证据。

8. 在作证的时候不要夸张、修饰或虚假陈述自己的资格条件。在任何时候都不要以任何的方式犯这种错误。

9. 在作证的时候要以一种诚实、坦率的方式来进行,不要超出自己的专业范围而随意扩大自己的意见。作证中的措辞要尽量避免引起歧义。

10. 不要用犯罪心理画像或犯罪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某一起犯罪是否是某一个人所为。

11. 如果有理由断定一个相关证据的性质和含义不适于在法庭上被揭示出来,那自己就要尽力使法庭了解这一信息。

12. 遵守专业组织的规范和要求,向有关机构或专业组织报告那些违反道德伦理的行为。

这些原则与其他一些著名的法庭科学专业组织的要求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美国犯罪侦查专家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riminalists,简称ABC)和加利福尼亚犯罪侦查专家协会(California Association of Criminalists,简称CAC)。

参考文献

1. BBC News (1998) "Rachel Nickell Detective Quits at 33", June 12.
2. CNN (1996) "Olympic Bomb Chronology", October 26.

^① 笔者非常欣赏桑顿(Thornton, 1997, p.21)关于客观性的论述:个人偏见可能被减少到一个非常小的程度,但是没有一个严谨的科学家会声称他完全没有个人的偏见。个人偏见可以在实践中被抑制,但是这需要非常细心、非常努力才行。个人偏见有可能使法庭科学专家凭感觉认为案件中的被告人有罪或无罪,所以显然不该存在偏见。这种偏见的害处非常显而易见,不过,一种更加有害且不容易被发现的偏见往往源于分析人员为了维护自己而作出的结论。

3. CNN (1997a) "Richard Jewell Faces Cloudy Future", July 7.
4. CNN (1997b) "FBI Peers Applaud Suspended Agent in Jewell Case", May 29.
5. Collins, J. (1996) "The Strange Saga of Richard Jewell", Time, November 11.
6. Dallas Morning News (1987) "Ex - FBI Agent Testifies Davis Fits Mental Profile of Slayer", June 6.
7. Edwards, C. (1998) "Behavior and the Law Reconsidered: Psychological Syndromes and Profiles",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43 (1), 141 ~150.
8. Groth, A. N. (1979) Men Who Rape: The Psychology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press.
9. Hancock, L. (2000) "FBI Misled Reno to Get Tear - Gas OK, Ex - Agent Alleged", Dallas Morning News, March 6.
10. Hewitt, B. (1996) "Justice Delayed", People, November 11.
11. Kocsis, R., Lincoln, R. and Wilson, P. (1998) "Validity, Utility and Ethics of Profiling for Serial Violent and Sexual Offenders", Psychiatry, Psychology and Law, 6, 1 - 11.
12. Marshall, W. L., Laws, D. and Barbaree, H. (1990)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Issues, Theories, and Treatment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Press.
13. New York Times (1995) "FBI Agent at Waco Says Bureau Pressured Him on Koresh Reports", May 2.
14. Thornton, J. I. (1997) "The General Assumptions and Rationale of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in Faigman, D., Kaye, D., Saks, M. and Sanders, J. (Eds.),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Law and Science of Expert Testimony, Vol. 2,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
15. Vollmer, A. (1949) The Criminal, Brooklyn, NY: Foundation Press.
16. Worden, A. (1999) "Did FBI Staff Feuds Lead to Waco Disaster?" APB News, September 3.
17. Zeff, W. (1995) Testimony to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udiciary, Crime Federal Actions at Waco, Texas on August 1, 1995.

附录一

行为画像协会： 行为画像的指导方针

讨论及分析

“任何职业的确立都需要规则化，可以评判、抑制奇想，制定相应的操作标准，并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它。”[8] 这已经得到一致的认可。

过去，人们试图从什么是犯罪心理画像、包括哪些内容，以及它有什么用处等方面进行论述[1, 2, 4, 5]。但是，其中绝大部分仅仅专注于有限的细节问题，目的主要是为了教会执法者成为这一过程的最终使用者。基于此，犯罪心理画像的要点很简单，即关注的焦点很少集中在从物证得出的行为推断上，而是大量聚焦在侦查结果而非法庭鉴证方面。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日常调查工作的其中之一，它们没有包括直接关系到行为画像过程的特有方针或指导。

1999年12月15日，行为画像学会（Academy of Behavioral Profiling，简称ABP）全票通过了此文所阐述的指导方针。在这些方针的发展过程中，有些出版物对学会成员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并促使其作出决定，很值得注意，主要包括以下著作：

1. 《犯罪侦查》，汉斯·格罗斯著[3]。
2. 《强奸罪分析与犯罪人的画像》，罗伯特·哈兹伍德著[4]。
3. 《法医鉴定的一般性假设与认定》，约翰·I. 桑顿著[7]。
4. 《犯罪心理画像》，布伦特·E. 特维著[8]。

还应当注意的是，这些方针是由独立的专业组织对直接涉及画像进程所作的首次成文定义。行为画像学会（ABP）的犯罪心理画像方针是由其全体成员为了应用的目的而合作完成的。而且，他们希望这些方针对涉及以证据

为基础的犯罪过程和行为画像过程的任何参与侦查的人都有用，而不管其能力如何。该方针对涉及犯罪心理画像及其有关过程的综合学科学术组织非常有必要，可用于保证画像的质量，并可减少调查的错误。

该方针由行为画像学会（ABP）成员连同下文一起广为传播：

法庭科学不能仅以鉴定结果来评判，还应根据审查并解释证据的程序是否合法来判断。法庭科学家在书面报告里或在法庭上提出的任何观点必须要有事实或理论依据。没有这样的依据而得出的结论是无效的，会被看做笑柄。[7]

该段话表明在设计这些指导方针时所考虑的最有意义的宗旨和相关的哲学问题。

这些指导方针并不是简单地给侦查人员列出检查的清单，还提供了一种用于案件侦查逻辑的、统一的、全面的职业化法庭哲学体系。指导方针同样预先规定了侦查者对客体的热情度和对细节的注意度的测定标准，其核心是理想化的。彼得·诺威克（Peter Novick）在他有关专业化的著作《崇高的梦想》（That Noble Dream）一书中有所阐述，其任何解释的价值应当以它符合事实的程度而定，如果与事实冲突则应被放弃。

如果这些都正确，那么这些指导方针的发展就是专业化的必经阶段，它有助于为案件工作人员提供学习的平台。

犯罪心理画像的指导方针包括如下7个方面：

1.0 笔录

所有的现场勘查都是侦查活动、犯罪分析、嫌疑画像的支柱，勘查的所有内容都应按规定被保存，原始材料要以详细的方式记录在文件中。

2.0 书面报告

2.1 侦查的协助者

作为侦查的协助者参与所有案件时，都需要将侦查的各种发现写成报告，这一报告将作为犯罪分析和嫌疑画像的开始。要知道这些只是侦查的资料，而不必然成为专家的决定。

2.2 庭审前的专业审查

所有的现场勘查结果都被期待在法庭开庭之前提供给有关专家进行鉴定。如果勘查者将他们的现场发现写成报告用于犯罪分析和嫌疑画像就更为可取。要知道当事人或代理机构有权对报告保留疑问和研究，包括证词的争议点和结论，或完全拒绝这一书面结论。而且这样做并不会影响勘查者的勘查方法、结论和笔录。

2.3 口头作证及证言

在所有调查人员向法庭提交专业调查结果的案件中，大家应明白，他们的证言应当清晰而又连贯。同样，专家不应提供有关他们专业领域以外的观点，这同样是行为画像学会（ABP）的另一个道德标准的要求。我们应进一步明确，任何一个专家给出的观点应以手中的案件证据作为支持，并且证据来源应按要求对法庭说清楚。

3.0 客观性与偏见

在以侦查的协助者、犯罪分析者或犯罪心理画像者等身份参与的案件中，调查人员应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并抵制本人或其他方面的偏见。偏见也许不能完全从侦查过程中排除，但我们应努力减小它的作用。

3.1 指导方针

为了防止偏见，保持客观态度，侦查人员应当做到：

3.1.1 当开始根据可能的嫌疑信息进行初始评估或犯罪心理画像时应力求避免值得怀疑的信息。

3.1.2 力求避免对犯罪先入为主的假设。

3.1.3 不要删去或忽略那些不符合某些犯罪假设的证据。

3.1.4 必要时听取同行们的意见。

4.0 初始评估

初始评估就是形成一份调查报告，是在审查最初的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实物证据、被害人研究，以及对某一未破案件或有潜在联系的系列案件的犯罪现场特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以提供最直接的侦查方向。评估对象应

包括案件已知的大致情况、未知情况，以及借助前种情况可能提出的方法和建议。不要把评估与犯罪心理画像所混淆，也不要以犯罪心理画像的方式出现。

4.1 指导方针

初始评估一般要包括以下内容：

- 4.1.1 根据已确定的犯罪案件事实恰当地概述有关的犯罪行为。
- 4.1.2 根据已确定的犯罪案件事实恰当地概述被害人的有关情况。
- 4.1.3 根据已确定的犯罪事实恰当地概述有关犯罪现场的特征，并附有论据。
- 4.1.4 恰当地、有根据地假设具有潜在动机的行为和特征。
- 4.1.5 恰当地、有根据地假设有关犯罪嫌疑人的特征。
- 4.1.6 就需要进一步认定的事实提出建议，或者围绕着犯罪事件的顺序寻找其尚不能形成逻辑关系的断裂点进行研究，包括根据已有的物证提出需要补充法庭分析的建议。
- 4.1.7 提出深入收集被害人信息的建议。
- 4.1.8 提出能使犯罪嫌疑人露出水面的可行性侦查策略与途径。

5.0 被害者研究

被害者研究是对所有可用的被害人信息进行全面的研究，它包括如下内容：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家庭、朋友、熟人、教育程度、工作、居住地区和邻里情况；还包括有关被害人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类型的背景资料，如个人的总体习惯、爱好、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和有无服用毒品的记录等。研究被害者必须将其视为研究犯罪的一部分，要知道作为案情分析的基本要素/或进行犯罪心理画像必须依靠这些信息。

对某一特定案件进行被害者研究的目的是使调查人员能够依据被害人的所有生活方式，以及他们死亡前所发生的事件对他们成为某类犯罪被害人的风险作出评估。或许这有助于开展并案评估工作。

6.0 案情分析

案情分析是对某一特定犯罪或一系列相关犯罪的行为证据进行调查和解

释后形成的报告。

要知道案情分析应该根据被害者的行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以及可被直接观察到的环境情况进行，然后根据所形成的资料进行逻辑推理，或由有资格的法庭专家进行犯罪再现。提出与犯罪行为和环境有关的假设并不是案情分析的目的。所有的推论都要建立在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并用这种有事实根据的推论作为解释案情的基础。

6.1 指导方针

案情分析应包括以下内容（当时可含有推论）：

- 6.1.1 全面评估与犯罪行为有关的案件事实。
- 6.1.2 全面评估与被害人有关的案件事实。
- 6.1.3 尽可能地用论据来说明每一被害人的生活类型风险度。
- 6.1.4 尽可能地用论据来说明每一被害人的境遇风险度。
- 6.1.5 尽可能地用论据说明犯罪人猎获每一被害人时的风险度。
- 6.1.6 尽可能地用论据分析每起案件的犯罪现场特征，做最细致的

考虑：

- （1）犯罪地点和现场类型。
- （2）犯罪接触点。
- （3）犯罪人的接近方法。
- （4）犯罪人的攻击方法。
- （5）犯罪人的控制方法。
- （6）犯罪人使用的凶器。
- （7）犯罪人使用的暴力程度。
- （8）被害人的反抗。
- （9）性行为。
- （10）反侦查措施。
- （11）犯罪有无矛盾行为。
- （12）犯罪预谋的迹象。
- （13）犯罪技能水平。
- （14）犯罪人带走的物品。

(15) 犯罪人遗留的物品。

(16) 口头行为。

(17) 惯技行为。

(18) 动机行为。

6.1.7 尽可能地根据犯罪相关行为提出能证明其犯罪动机的证据。

7.0 犯罪心理画像

犯罪心理画像也要形成书面报告，其中需要描述与侦查有关的/或犯罪嫌疑人自身的特征，这类描述应根据一个全面的犯罪分析刻画出对某一特定犯罪或某一系列案件负有责任的犯罪嫌疑人特征。它还应该包括案情的分析和被害人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引申出的有逻辑、有根据的对特定犯罪嫌疑人特征的意见。

不难理解，犯罪心理画像实际上是由案情分析或被害人研究引申出的对犯罪嫌疑人特征的判断。所以，犯罪心理画像若没有首先进行案情分析或被害人研究就不可能被提出。

7.1 嫌疑人特征

嫌疑人特征是指刑侦人员归纳出的对某一特定犯罪事实负有责任的未知嫌疑人或相关人员的属性，包括物证的、心理的、社会的、地理的及其他相关属性，它还包括对嫌疑人在犯罪前、犯罪中和犯罪后可能发生的行为预测。其中生理属性如犯罪人的身高，心理属性如犯罪人在犯罪前、犯罪过程中、犯罪后的心理状态，地理属性如犯罪人的居住地，社会属性如被指控的同伙关系类型，相关属性如犯罪人同被害人之间关系的性质，犯罪人可能行为的预测如犯罪人是否将返回犯罪现场，等等。

7.2 指导方针

犯罪心理画像包括以下部分（恰当时可附作参考）：

7.2.1 全面评估与犯罪行为有关的案件事实。

7.2.2 全面评估与被害人有关的案件事实。

7.2.3 尽可能地用论据来说明每一被害人的生活类型风险度。

7.2.4 尽可能地用论据来说明每一被害人的境遇风险度。

7.2.5 尽可能地用论据说明犯罪人获取每一被害人时的风险度。

7.2.6 尽可能地用论据分析每起案件的犯罪现场特征，做最细致的考虑：

- (1) 犯罪地点和现场类型。
- (2) 犯罪接触点。
- (3) 犯罪人的接近方法。
- (4) 犯罪人的攻击方法。
- (5) 犯罪人的控制方法。
- (6) 犯罪人使用的凶器。
- (7) 犯罪人使用的暴力程度。
- (8) 被害人的反抗。
- (9) 性行为。
- (10) 反侦查措施。
- (11) 有无矛盾行为。
- (12) 犯罪预谋的迹象。
- (13) 犯罪技能水平。
- (14) 犯罪人带走的物品。
- (15) 犯罪人遗留的物品。
- (16) 口头行为。
- (17) 惯技行为。
- (18) 动机行为。

7.2.7 尽可能地根据犯罪相关行为提出能证明其犯罪动机的证据。

7.2.8 可能的话，通过有根据的分析列出与侦查相关/或嫌疑人行为特征的意见。可以包含如下特征，但并不局限于此：

- (1) 嫌疑人与被害人认识或熟悉的信息。
- (2) 嫌疑人对作案地点了解或熟悉的信息。
- (3) 有关嫌疑人前科的迹象。
- (4) 有关心理痕迹的证据。
- (5) 有关带有变态心理特征的证据，如浅薄性、欺骗性、冲动性、缺乏同情心、缺乏感情、以自我为中心或需要刺激兴奋等。

(6) 有关人格冲突或性冲突的迹象。

(7) 有性幻想的迹象。

参考文献

1. Burgess A. , Douglas J. and Ressler R. (1988) Sexual Homicide: Patterns and Motive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 Burgess, A. , Burgess, A. , Douglas, J. and Ressler, R. (1997) 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San Francisco: Jossey – Bass.
3. Gross, H. (192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4. Hazelwood, R. (1995) " Analyzing the Rape and Profiling the Offender", Burgess, A. and Hazelwood, R. (Eds.), Practical Aspects of Rape Investigation, 2nd ed. , New York: CRC Press.
5. Holmes R. and Holmes S. (1996) Profiling Violent Crimes: An Investigative Tool, 2nd ed. ,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6. Novick, R. (1988)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 Thornton, John I. , " The General Assumptions and Rationale of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in Faigman, D. , Kaye, D. , Saks, M. and Sanders, J. (Eds.),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Law and Science of Expert Testimony, Vol. 2,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
8. Turvey, B. (1999) Criminal Profiling: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vidence Analysis, London: Academic Press.

附录二

就山姆·斯皮尔德状况 诉俄亥俄州：案号. 312322

以下是理学硕士布伦特·E. 特维（Brent E. Turvey）于 2000 年 3 月 25 日准备的一篇 11 页的专家证词全文。2000 年 3 月 29 日，整篇证词被用于此案，并成功地限制了前联邦调查局的犯罪心理画像人员格雷戈·麦克格拉雷（Gregg McCrary）在本案中的证词。

布伦特·E. 特维，理学硕士

Knowledge Solutions LLC

1961 Main Street, PMB221

Watsonville, CA95076

(831) 786 - 9238

bturvey@corpus-delicti.com

2000 年 3 月 25 日

特瑞·吉尔伯特

1700 Standard Building

1370 Ontario street

Cleveland, OH 44113

(216) 241 - 1430

关于山姆·斯皮尔德（Sam Sheppard）财产案，俄亥俄州：第 312322 号案

加利福尼亚沃森维尔市的 Knowledge Solutions LLC 公司的调查人员布伦特·

E. 特维受斯皮尔德财产案的代理人特瑞·吉尔伯特（Terry Gilbert）的要求，提供与犯罪心理画像鉴定性质有关的专家证词，因为这些涉及德伯特标准（Daubert Criteria）^①，以及最近的库姆·泰瑞的判决词（Kumho Tire decision）^②。该调查人员同样被要求评价所谓的“犯罪侦查分析报告”中结论的性质、方法和范围。这份报告于1999年12月1日由维吉尼亚弗雷德里克斯堡市的行为犯罪学家的格雷戈·麦克格拉雷（Gregg McCrary）提供（见附图2-1）。



a. 山姆·斯皮尔德
(Samuel H. Sheppard)



b. 玛莉莲·斯皮尔德（Marilyn R Sheppard），系被谋杀的山姆·斯皮尔德的妻子



c. 山姆·斯皮尔德和他妻子玛莉莲·斯皮尔德的住所

附图2-1

①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 1993.

② Kumho Tire Co. v. Carmichael, 1999.

为完成这项工作，他们为我提供了如下的案件材料：

- 各种犯罪现场和尸检的照片；
- 玛莉莲·斯皮尔德（Marilyn Sheppard）的尸检和痕迹证据报告；
- 山姆·斯皮尔德（Samuel H. Sheppard）1954年7月10日的正式陈述；
- 山姆·斯皮尔德1954年法庭陈述的概要；
- 保罗·科克（Paul L. Kirk）1955年4月26日的证言；
- 牙医学博士迈克尔·索伯尔（Michael Sobel）的报告，未标明日期；
- 巴顿·埃波斯坦（Barton Epstein）1999年6月18日的报告；
- 医学博士威廉姆·福伦（William Fallon）1999年6月29日的报告；
- 医学博士、法学博士西里尔·H. 怀特（Cyril H. Wecht）1999年7月29日的报告，以及2000年1月14日增加的另一份报告；
- 医学博士伊曼纽尔·塔奈（Emanuel Tanay）1999年7月30日的报告；
- 格雷戈·麦克格拉雷（Gregg McCrary）1999年12月1日的报告，还有2000年1月14日在法庭上的证词；
- 罗纳吉特·查克拉伯蒂博士（Ranajit Chakraborty）2000年1月的报告。

讨论

参与犯罪心理画像实践的专家包括很大范围，有侦查人员、行为科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庭科学家。他们对办案工作参与的惯例将关系到犯罪侦查的结果。基于此，犯罪心理画像人员也被作为侦查工作的协助者参与进来，以帮助缩小犯罪嫌疑人的范围，帮助串并案和提出相关的侦查指导与战略（Burgess et al., 1988; Burgess and Hazelwood, 1995; Turvey, 1999）。

然而，犯罪心理画像人员发现，他们在法庭上被要求给出专家对案件的辩论意见和法律规定事项已变得越来越普遍。犯罪心理画像人员的证词被认为是与特殊知识领域有关（如被害人研究、犯罪预谋、实施的内容或计划、动机等），同样，也集中于犯罪嫌疑人是否与案件有关的认证上。这些鉴定结果由以下的事项组成，例如，与特定行为模式有关的犯罪人的性格特征，通过关联性回推可决定个别人的案件特征，等等。因最初主要是为侦查使用而发展的，犯罪心理画像是否可以被法庭采信仍存在着合法性问题。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讨论：聘用犯罪心理画像人员作为法庭鉴定人员的相

关法律和科学问题，以及犯罪心理画像（即犯罪人性格认定）是否具有合法性等问题。为了做到这些，我们将讨论犯罪心理画像由什么组成，然后讨论它是否应当或可以满足德伯特标准（1993），还将简单讨论一下有关科学、法庭鉴定和犯罪心理画像之间的关系。

界定：犯罪心理画像的组成

“犯罪心理画像”这一术语（又名犯罪人画像、心理画像、犯罪人格画像、行为画像、犯罪现场画像和犯罪侦查分析）在已发表著作或论文中都被认定为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概念。但是，重新评价这些定义对我们的研究是明智之举：

联邦调查局将其定义为犯罪侦查分析，即根据他或她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来鉴别犯罪人的主要人格特征和行为特征的侦查过程（Burgess et al.，1992）。

进而言之：

以前使用的“心理画像”、“犯罪人格画像”的定义，以及“犯罪侦查分析”的术语是被用来区别于精神病学家在法庭上进行的鉴定……（Depue et al.，1995）

其他词汇的由来则是用以描述不同种类的犯罪人特征，以及对犯罪心理画像特性的定义：

犯罪人画像（Offender profiling）是通过犯罪人实施犯罪时的行为方式来推论其人员特征的过程（Canter，1995）。

犯罪人格画像（A criminal personality profile）是一种通过专业培训为侦查机构提供关于某一特定犯罪类型的作案人员信息的推断（Geberth，1996）。

推断实施犯罪的行为人其独特个性特征的过程通常被称为犯罪心理画像（criminal profiling）（Turvey，1999）。

犯罪心理画像（criminal profiling）是描述对一起特定案件或系列案件负有责任的犯罪人在侦查上相关的和/或证据上的行为特征……

犯罪人的特征（Offender characteristics）包括所有的对某一犯罪行为负有责任的那个未知的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包括身体的、心理的、社会的、地理的及其他相关属性（Baeza et al.，2000）。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提供可能的、大约的或

可推断犯罪人员特征的分析、报告或观点（如某犯罪人可能具有某种特点）都可以被认为是犯罪心理画像的一种形式，或一部分，或就是犯罪心理画像。与此相反，任何不符合犯罪人特征的分析、报告或观点就不是犯罪心理画像。还可以认为，不管确定犯罪嫌疑人特征所用的方法如何，不管他们是用统计或归纳的方法描述一般犯罪人的特征，还是用分析或犯罪再现的方式描述犯罪人的特征，他们同样可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些观点在奈特（Knight）、普雷蒂（Prentky, 1990）和特维（Turvey, 1999）等人的著作中都有所阐述。

犯罪心理画像是科学吗

对于这一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不，犯罪心理画像不是科学。许多研究者在他们的研究中都指出，犯罪心理画像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推断或推测。犯罪心理画像者提出的意见并不是科学的结论（Geberth, 1996; McCann, 1992; Holmes and Holmes, 1996; Turvey, 1999）。但是，这并不成为限制犯罪心理画像工作者参与法庭辩论的理由，因为他们的意见并不是一种法庭的判决。

正如桑顿所指出的（Thomton, 1997）：

科学的经典定义是：“具有某种原则指导下的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这一定义总体上是对的，但是，补充一些说明是必要的。例如，科学通常需要具备可实验性并来源于客观现实。

然而，犯罪心理画像也存在着相关的知识体系，尽管不成熟或较凌乱。因此，人们对于犯罪心理画像是否是科学尚有分歧的看法（Burgess et al., 1988; Hickey, 1991; Burgess et al., 1992; Burgess and Hazelwood, 1995; Holmes and Holmes, 1996; Turvey, 1999; Baeza et al., 2000）。但是，许多犯罪心理画像的研究著作尽管形成了一定的知识体系，尽管也有许多的原则，然而必须承认，这些原则并不能用于解释现实中许多不确定的细节问题。换言之，犯罪心理画像尚不能在方法和基本概念上形成一个清晰的、一致的结论而应用于各种个案的解释。进一步说，这些著作中的相关研究，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归纳出的结论，都有待于应用时的检验。它不同于那种演绎法引出的结论更为有效和客观。

这一争议现在已被德伯特标准的讨论所替代（Daubert, 1993），因为德伯特标准就与犯罪人特征的推断有关。

鉴别问题

犯罪心理画像的目的就是找出犯罪人应有的特征，以帮助侦查人员将犯罪嫌疑人同一般人区分开来，从而确定侦查过程中最初的犯罪嫌疑人范围。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对犯罪人认定中的一种工具。尽管如此，它不是区分犯罪人个体化的工具（《主体确定化和个体化的讨论》，Thornton, 1997）。

在许多研究著作中都指出，单独的行为证据和犯罪心理画像不能被用来当做某一个体与某一特定犯罪或系列犯罪是否有关的认定（Burgess, 1992; Burgess and Hazelwood, 1995; Holmes and Holmes, 1996; Turvey, 1999）。它们只能用于提出那种容易实施此类犯罪的人员类型或特征，而不是具体的个人。美国法院也完全同意，这样的证词具有偏见性而不是帮助作用，并且坚决规定这样的证词不得进入法庭（Ingram, 1998; Grezlak, 1999; Roy, 1999; Siegal, 2000）。

因此，犯罪行为画像学会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组织致力于把根据犯罪心理画像为基础提出的证据更加专业化（本文作者是它的组建成员之一），防止将其滥用于法庭个人责任的认定。此学会对其成员提出了道德原则，即该组织成员“禁止使用心理画像或案情分析（即对犯罪人或犯罪现场特征的推断）来确定某个人对某犯罪有刑事责任或无刑事责任”。

犯罪心理画像与德伯特

评估犯罪心理画像在法庭上的鉴定价值的一种方法就是应用德伯特标准（Daubert Criteria）^①。最初的问题是，德伯特标准是否能够用于这一尚未成熟的司法学科中。虽然它不是一门科学，但是，它可以被视为一门特殊的专业知识。当办案人无从下手、无法搞清事实真相时，犯罪心理画像者的意见和证言才有帮助（Thornton, 1994）。然而，有些人有不同看法，德伯特标准应该运用于所有的证词，而不论这些证词是否具有科学的标签（Jonakait, 1994; Saks, 1994）。而且，美国的最高法院对库姆·泰瑞（Kumho Tire Co）诉卡米

^① 德伯特标准源于一个判例，即1993年德伯特诉梅里尔·道药业案（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1993），译者注。

克尔（Carmichael）的判例（1999）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

德伯特的“监督”（gatekeeping）职责不仅适用于“科学”的证词，而且适用于所有的专家证词。702 法则并不能区别“科学”的知识和技术或“其他专业性”的知识。

如果认为犯罪心理画像证词（与犯罪人特征有关的观点）有助于认定案件事实，那么仍需要考虑下列德伯特标准：可验证性、同行评估、错误率和普遍的接受程度（即可采性）。

标准一：检测与真伪

根据桑顿的观点（1997），“科学方法的基础，即科学方法最重要的方面，是假设的形成和可证性”。他在 13 页中深入地论述到：

大部分司法科学家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都比较随意。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归纳并非演绎，归纳恰恰不能检验假设和修正理论。他们往往把演绎当做假设，但演绎实际上并不是假设。因此，许多人声称他们的假设是演绎的结果，但实际上却需要通过验证来检验。

犯罪心理画像者基本上采用的是同一种模式。凭笔者的经验，许多犯罪心理画像都部分地或全部地建立在无须证实或证伪的猜测、假设或先验的理论基础之上（Gross，1924）。

例如，联邦调查局的心理画像者曾在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面前作证，他们并不习惯于这样一种完整的调查，他们只根据提请调查的机构提供的案件材料进行假设、猜想和提出观点。联邦调查局的特别顾问罗伯特·哈兹伍德说，“不论何时，当我们被要求为一个机构进行案件分析时，我们都假设我们在和专业人员打交道。他们提供给我们分析的材料，然后，我们对提供的材料进行研究”（The U. S. S. Iowa，1990）。

联邦调查局的心理画像者也由于下列做法而被法庭和独立的同行评估批评（Darkes et al.，1993；Homant and Kennedy，1998；New Jersey v. Fortin，2000；Turvey，1999）：

没有系统地收集犯罪人的个人经历材料以供研究；

盲目地依赖犯罪人访谈，将访谈结论作为研究的数据来源；

没有使用合适的对照组；

盲目地依赖于执法部门的假设和意见，并将其视为事实；
将侦查人员的想法视做事实；
没有进一步地提出某一意见或结论的不合理之处；
没有仔细地核查已确定的画像结论；
在结果证实之后并没有将画像结论与实际犯罪人比较；
把可疑的、应当予以验证的数据作为结论的基础；
轻信明显带有倾向性的学会研究和公开发表的研究。

还包括那些未曾验证过的犯罪人特征的分类理论和在国家暴力犯罪分析中心（NCAVC）工作的联邦调查局的心理画像人员提出的犯罪个人特征、诸如犯罪人标记的理论。这些东西后来发表在《犯罪分类手册》中（Burgess et al.，1992）。

这是许多评论者的观点，即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关于犯罪人特征的推论和假设是如何依靠案件事实与相关理论检验的（即通过证实或证伪），他们就将受到批评。

标准二：同行的评论与出版物

由于犯罪心理画像的不可验证，以及在犯罪心理画像领域中发表资料的质量参差不齐，因此，不能说同行的评论和发表出版物在决定画像方法的有效性及相关性方面起什么重要的作用。这不是检验犯罪心理画像惟一的领域。桑顿（1994，p.480）对此有中肯的评论，他说：“只是公开发表画像的成果并不能说明其方法的正确性。”

正如已指出的，联邦调查局很难向同行详尽地介绍其案件分析和公开发表的画像情况（Darkes et al.，1993；Turvey，1999）。它包括对36名犯罪人和他们的118名被害人的调查项目。根据诺柏尔（Nobile）的观点，当政府公布的数据统计和研究方法受到人们的质疑后，司法部门拒绝了这份研究。尽管这份研究的方法归于失败，但联邦调查局还是公布了这项研究（Burgess et al.，1988）。这一研究仍是目前联邦调查局研究画像使用的概念、方法和研究模式的基础。

评论者认为，进行研究和随后公布研究成果时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心理画像的结论、假设和理论就不具有任何价值。

标准三：错误率

乍看起来，这是简单、合理的要求。所有的司法鉴定方法都将经过检验，并掌握其出错率，以此决定其方法的可靠性。然而，在萨克斯看来（1994）：

鉴定科学中包含了大量的推测、印象和直觉。它自称是一种科学努力，但其本身并不能提供充足的研究数据，因为它基本的概念假设实际上几乎并未通过经验来证明。

毫无疑问，司法鉴定科学家由于在多数情况下具有指导作用，他们往往倾向于宣称自己的鉴定绝对可靠，并有夸大他们结论的传统倾向。在这种背景下，与自称是科学的情况相反，经验的研究恰恰被视为是一种危险的，而不是一种帮助或对本质问题的界定。

桑顿（1994）似乎也出现过类似的感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他指出：既然被认为很有力的法庭鉴定科学的错误率也是不清楚的，那么，对于这些评论者来说，也不宜在一些特殊的知识领域（如犯罪心理画像的领域）坚持如此高的标准，应在鉴定科学中坚持如此高的标准。

在所有的情况下，犯罪心理画像的错误率也是不清楚的，如同赫曼特和肯尼迪所言（1998）：

就我们所确定的范围而言，没有人能试图评价犯罪现场的心理画像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的有效性。因为其中会遇到一些特殊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对真实的画像样本进行测评的客观标准……甚至就在犯罪人的认定已经非常确定的情况下，对犯罪人与画像结论的匹配效果问题仍然存在大量的主观因素。

本人也同意上述观点，即正如法庭的有罪判决（不论被告是否认罪）并不代表此人真的有罪一样，宣判无罪的人也并不意味着他真的无辜。同样，在特定案件中清晰地作出关于犯罪嫌疑人精确无误的认定，这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对于犯罪心理画像的准确性和其他司法鉴定方法的可靠性的研究就不具有完整的意义。

标准四：普遍接受程度

一般来说，将犯罪心理画像视做一种合理的侦查工具，这对于司法机关和侦查机构来说没有异议。然而，对这种侦查方法的认同并不与这种方法的

有效性必然相关（它不具有有效性，如前所述它没有被经验证明或被实践检验，只是事前的一种描述），而且，也没有专业团体专门对正确的心理画像予以奖励、对错误的心理画像予以惩罚，考虑到许多的犯罪侦查人员通常也采用一些不太严密或不可靠的侦查方法，诸如证人辨认（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心理测谎仪（polygraphy）、声音重音分析（voice stress analysis）和心理直觉（psychic intuition）等。还要考虑到人们对心理画像的接受也与犯罪心理画像者的一种倾向性有关，例如，这些心理画像者会对那些了解心理画像甚少的侦查人员过分肯定或夸大他们结论的可信性和确定性，并使侦查人员完全相信或屈从（Darkes et al., 1993）。

结论

1. 犯罪心理画像作为侦查过程中用于排查犯罪嫌疑人，而不是认定犯罪人的工具已被普遍地接受。在许多相关的学术著作中和在美国的法庭审判中得到较为一致认可的观点是：犯罪心理画像既不是一门科学，也不是法庭认定有罪的有效工具。不管德伯特标准是否有争议，作为法庭科学的实践者仍被鼓励参与侦查中的犯罪心理画像研究。我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2. 《犯罪分类手册》（Burgess et al., 1992）作为刑事侦查的课本，应该肯定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其结论的研究基础数据和研究的方法是有缺陷的，同时，也未经过样本检验。

3. 我根据迪佩等人（1995）明确提出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将犯罪侦查分析用以替代“犯罪心理画像”术语的这一事实，以及将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作为有罪认定的结论事实确定：格雷戈·麦克格拉雷（Gregg McCrary）在1999年12月1日提出的犯罪侦查分析报告就是一个犯罪心理画像。

4. 麦克格拉雷几乎没有经过认真审查就全盘地接受了侦查机构提出的结论。他并没有说明他所陈述的专家证词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局限之处。因此，这不是一个合法的法庭证词。

5. 麦克格拉雷承认他并没有专门调查弑亲案件的经验，在他的报告中所做的相关证词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专业知识和范围，这不是一个合法的法庭证词。

6. 麦克格拉雷自己也承认，他不是刑事科学家，也不是血迹模式分析专

家。鉴于此，在他的报告中所做的相关证词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专业知识和范围，这不是一个合法的法庭证词。

7. 麦克格拉雷忽略或者完全没有考虑到，也没有提出这样的意见，即在此案中需要对原告与被告同时做一个血样检验。因为这又一次超出他的知识与经验范围。我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报告为合法的法庭证词。

8. 麦克格拉雷称，在他的报告中引用了权威和可靠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也超出了他的经验范围，只根据单独的行为信息认定犯罪人。这一方面夸大了理论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也犯了将某种意见或理论作为事实的错误。他没有提出作为法庭专家应该提出的个人意见和对法庭材料的质疑，没有提出他个人意见的可能的局限性，没有讨论各种变化的可能。因此，这不是一个合法的法庭证词。

我发誓并肯定：我以自己最良好的知识水平作出上述证词，若有虚假甘受处罚。

刑事科学家 布伦特·E. 特维

附录

本案中的法官最终裁定，麦克格拉雷不能就斯皮尔德案件中的伪造问题进行专家作证，而且他也不能针对一般的伪造而谈。根据麦克·金（McKnight）所言（2000）：

一位曾经所言在他进行的犯罪现场分析中从未出过错的前联邦调查局侦查人员昨天就 1954 年玛莉莲·斯皮尔德（Marilyn Sheppard）被大头棒致死案件作专家证言，结论是此案系“伪造的家庭谋杀案”。

但是，不知他准备得是否充足，格雷戈·麦克格拉雷（Gregg McCrary）像许多其他证人一样，在因山姆·斯皮尔德错误关押而引起的民事诉讼中，被斯皮尔德聘请的律师特瑞·吉尔伯特（Terry Gilbert）大量地质疑：他是否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而能够作出如此的结论。

最后，麦克格拉雷未被允许就斯皮尔德谋杀案被伪造问题作出任何证词，因为法庭认为，他的意见并不十分可靠，而且大量意见源于心理画像分析（见附图 2-2）。



a



b



c



d



e

由警察提供的斯皮尔德家的犯罪现场和玛莉莲·斯皮尔德的尸体照片（共5张）

附图 2-2

参考文献

1. Baeza, J. , Chisum, W. J. , Chamberlin, T. M. , McGrath, M. , and Turvey, B. (2000) " Academy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Criminal Profiling Guidelines", Journal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1 (1, January).
2. Burgess, A. G. , Burgess A. W. , Douglas, J. , and Ressler, R. (1992) 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3. Burgess, A. , Douglas, J. , and Ressler, R. (Eds.) (1988) Sexual Homicide: Patterns and Motive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4. Burgess, A. and Hazelwood, R. (Eds.) (1995) Practical Aspects of Rape investigation, 2nd ed. , New York: CRC Press.
5. Canter, D. (1995) "The Psychology of Profiling", in Bull, R. and Carson, D. (Eds.), Handbook of Psychology in Legal Context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6. Darkes, J. , Otto, R. K. , Poythress, N. , and Starr, L. (1993) "APA's Expert Panel in the Congressional Review of the USS Iowa Incid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January, pp. 8 ~ 15.
7.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 113 S. Ct. 2786 (1993).
8. Depue, R. , Douglas, J. , Hazelwood, R. , and Ressler, R. (1995) "Criminal Investigative Analysis: An Overview", in Burgess, A. and Hazelwood, R. (Eds.), Practical Aspects of Rape Investigation, 2nd ed. , New York: CRC Press.
9. Geberth, V. (1996) Practical Homicide Investigation, 3rd ed. , New York: CRC Press.
10. Grezlak, H. (1999) "'Profiling' Testimony Inadmissible in Murder Trial", Pennsylvania Law Weekly, April 12.
11. Gross, H. (192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12. Hickey, E. W. (1991) Serial Murderers and Their Victims,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Publishers.
13. Holmes, R. , and Holmes, S. , Profiling Violent Crimes: An Investigative Tool, 2nd ed. ,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4. Homant, R. J. and Kennedy, D. B. (1998)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Crime Scene Profiling: Validity Research",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25 (3, September), 319 ~ 343.

15. Ingram, S. (1998) "If the Profile Fits: Criminal Psychological Profiles into Evidence in Criminal Trials", *Journal of Urban and Contemporary Law*, 54, 239 ~ 266.
16. Jonakait, Randolph N. (1994) "Real Science and Forensic Science", *Shepard's Expert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Quarterly*, 1 (3, Winter), 435 ~ 455.
17. Knight, R. and Prentky, R. (1990) "Classifying Sexual Offenders: The Development and Corroboration of Taxonomic Models", in Barbaree, H., Laws, D., and Marshall, W.,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Issues; Theories, and Treatment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Press.
18. *Kumho Tire Co. v. Carmichael*, 526 U.S. 137 (1999).
19. McCann, J. T. (1992) "Criminal Personality Profiling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Violent Crime: Recent Advanc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10, 475 ~ 481.
20. Lee, H. (Ed.) (1994)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Taoyuan, Taiwan: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Press.
21. McKnight, K. (2000) "Expert's Opinion Challenged", *Ohio Beacon Journal*, April 1.
22. Nobile, P. (189) "The Making of a Monster", *Playboy*, July.
23. Roy, Y. (1999) "New York Judges Rebut County Prosecutors' Mateo Thesis", *Rochester Democrat and Chronicle*, March 24.
24. Saks, Michael J. (1994) "Implications of the Daubert Test for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Science", *Shepard's Expert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Quarterly*, 1 (3, Winter), 427 ~ 434.
25. Siegal, R. (2000) "Court rules ' profiler ' testimony can't be used to pinpoint suspect", *Associated Press*, February 24.
26. Thornton, John I. (1994) "Courts of Law v. Courts of Science: A Forensic Scientist's Reaction to Daubert", *Shepard's Expert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Quarterly*, 1 (3, Winter), 475 ~ 485.
27. Thornton, John I. (1997) "The General Assumptions and Rationale of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in Faigman, D., Kaye, D., Saks, M., and Sanders, J. (Eds),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Law and Science of Expert Testimony*, Vol 2,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
28. Turvey, B. (1999) *Criminal Profiling: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vidence*

Analysis, London: Academic Press.

29. The U. S. S. Iowa (1990) "The U. S. S. Iowa: Guilt by Gestalt",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Harper's Magazine, March.

附录三 初始评估： 威斯康星州诉约翰·麦勒尼 （桑多拉·麦勒尼死因疑点）

尸体发现时间：1998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10: 59 之前，由罗拉·卡特尔（Lola Cator，死者的母亲）发现。

侦查机构：威斯康星州（WISCONSIN）绿堤郡（Green Bay）绿堤警察局，案件编号：98 - 07902；威斯康星州法院（WDOJ），刑事侦查部门（DCI），案件编号：SA - 9553。

报告人：

布伦特·E. 特维（Brent E. Turvey），法庭科学理学硕士，

法庭科学家和犯罪心理画像专家，

Knowledge Solutions, LLC

1961 Main Street, PMB221

Watsonville, CA95076

（831）786 - 9238；bturvey@corpus - delicti.com

呈送对象：

希拉和达格贝利（Sheila & Doug Berry）里士满，阿法里路 9808 号，VA 23237。

在回顾了以下有关案情的详细材料后，审查者认为，在该案中存在调查不足和法庭分析不充分的问题。也就是说，该案中提出的许多事件和情形仍然只是有待通过检验证实的归纳性假设，而非推理性结论（Thornton, 1997）。只有在推理性结论的基础上才可能作出比较可靠的关于现场活动和行为的试探性推论。为协助对该案中的证据和材料的成功调查和分析，这位审查者作

出了一份初始评估。

一份初始评估就是对某一未决案件或某一具有系列特点的案件其最初的与犯罪行为有关的物证、受害人材料以及犯罪现场的特点经过审查作出的调查报告，从而为以后的侦查提供方向（Baeza, etc, 2000）。它涉及许多科学原则和知识的使用，包括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批判性思维、分析性逻辑和证据动态变化。

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是法庭科学的基石，它提出当一名罪犯与某地方或某个人发生接触时，就会发生证据的交换（Saferstein, 1998）。由于这种交换，罪犯会留下某些和他们自己有关的东西，并在离开时带走某些与那个地方或另一个人有关的东西。

批判性思维或许可被描述为对通过观察、经验、反省、推理或交流得来或总结得出的信息进行积极、巧妙地概括、运用、分析、整合和评估的智力训练过程，批判性思维作为信念和行动的指导方针而存在（Turvey, 1999）。就法庭分析而言，它涉及对物证的真实价值和局限性，以及随后对那些证据所作的检验结果的评估，使之不因其与个人在某个问题上的看法一致而被采用。

逻辑性分析是指研究一个犯罪现场和所有后继的证据资料，并得出富有逻辑性、证据充分的结论的能力。这要求假设有关的信息能经得起已得出的案情事实的检验。这个过程最终结果是结论只能源于证据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才可称为推论（Thornton, 1997）。

证据动态变化是指任何被认为有意或无意地改变、移位、模糊或抹除物证的影响。这种影响出现在某一物体被作为证据开始时至案件判决结束期间的任何改变（Chisum and Turvey, 2000）。

已经完成的审查

审查者在对以下案情材料以及其他材料作仔细分析的基础上写出了这份初始评估：

绿堤警察局对犯罪现场的侦查报告；

绿堤消防局对犯罪现场的侦查报告；

威斯康星州法院、犯罪侦查部门对犯罪现场的调查报告；

各种尸检和犯罪现场照片；

各种犯罪现场图表；

尸检报告和相关报告；

各种犯罪实验室的报告；

各种证人和犯罪嫌疑人的谈话记录；

桑多拉·麦勒尼（Sandra Maloney）及约翰·麦勒尼（John Maloney，桑多拉的丈夫）有关的医疗、法庭和财政记录；

各种对约翰·麦勒尼和翠西·海伦布兰德（Trace Hellenbrand，约翰的女友）的监视录像带；

地区检察官最终对陪审团所陈述的意见的副本。

背景资料

根据侦查报告，桑多拉·麦勒尼是在她家中被发现的，尸体被发现前她家里被火烧过。桑多拉的母亲罗拉·卡特尔于1998年2月11日早晨发现桑多拉时，桑多拉已经死亡且尸体被焚烧。死者被发现时是在楼上起居室的沙发上，脸部朝下。电话线被掐断，外间的房门从里面被一根鞋带和前门系在一起（卡特尔用剪刀剪断了鞋带进入房间）。后两种情况在过去死者不希望被人打扰时也出现过。火灾的起源被认定为在靠近死者膝部的地方，火势燃及沙发。家里大面积受到煤烟污染，但房屋结构没怎么被破坏。家中所有的窗户都关着，只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仅几厘米。勘查者认为，火是自己熄灭的。当地有关机构的火灾调查报告认为，该火灾属意外事故，没有任何可疑的因素或情景。但是，尸检结果表明死亡方式是他杀。随后的一份由州侦查人员作出的火灾原因分析报告指出是有人故意纵火。

死者已分居的丈夫约翰·麦勒尼是绿堤警察局的一名侦查人员，由于他和死者即将离婚，并正在争夺孩子的监护权，二人婚姻关系也一直不合，所以被列为犯罪嫌疑人。此后，约翰·麦勒尼的女朋友翠西·海伦布兰德——一位税务机构派驻在绿堤郡刑事侦查部门内的一名特别代理，在刑侦人员的授意下试图套出约翰·麦勒尼的犯罪供述。尽管海伦·布兰德没有成功，也缺乏任何可以证明约翰·麦勒尼在现场的证据，他还是被指控并在2000年2月被判处一级谋杀罪、纵火罪和毁坏尸体罪。

被害人分析

被害人分析是对所有可获得的关于被害人信息的全面调查，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家庭、朋友、熟人、教育、职业、居住地以及邻里关系，也包括和被害人的过去和生活方式有关的一些背景信息，如所有的个人习惯、爱好、犯罪经历以及病史。建立被害人分析对于判断某些犯罪发生时的情景是非常必要的（Baeza et al.，2000）。此外，一般都认为，了解死者的社交、病史以及心理健康状况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了解个体的行为或精神状态，提出进一步调查的重点，并为确定死亡原因、方式和情境提供线索。

姓名：桑多拉·麦勒尼（桑迪）

种族：高加索人

性别：女

出生日期：1957 年 7 月 30 日

年龄：40 岁

身高：163 厘米

体重：44 千克

头发：棕色

居住地：威斯康星州，绿堤，湖石街 368 号

住宅类型：死者的家是一层的砖砌平房，三间卧室，独户居住，有地下室和车库。

关系状况：桑多拉于 1978 年嫁给绿堤警察局的侦查人员约翰·麦勒尼。根据桑多拉·麦勒尼在绿堤县白林精神治疗中心的精神治疗纪录，这段婚姻关系动荡不安，期间她遭受了身体和感情的虐待。她和约翰·麦勒尼从 1997 年 5 月或 6 月开始分居，但在她死之前他们还没有离婚。此后，桑多拉又和约翰·麦勒尼为 3 个儿子的监护权而争吵，3 个儿子现在的年龄分别为 12 岁、9 岁和 8 岁。

和丈夫分居后，桑多拉和他人有过约会，但都没有认真，其中包括她最近的男友安德鲁·福尔克（度鲁）。

通过对朱迪·宝拉克（福尔克的同事和桑多拉最好的朋友）和福尔克的询问得知，安德鲁·福尔克于 1997 年 9 月通过宝拉克而与桑多拉认识。安德

鲁·福尔克现年 32 岁，白人，男性，开一辆红色“福特”车，有两个不同的偷来的牌照，并且没有有效的驾驶执照。桑多拉死亡时，福尔克住在威斯康星州 DePere, Bernard Drive 街 419 号。由对福尔克的询问得知，桑多拉对她说她已经离婚，他是从她死后报纸上对她的报道才知道真相的。福尔克陈述桑多拉由于争夺孩子监护权的问题而承受极大压力，她摆脱压力的办法就是增加饮酒量和吸烟量。她最喜欢的酒是伏特加，常抽的烟是“Marlboro Light 100s Menthol”。福尔克说她不断增加的饮酒量和吸烟量是导致他们分手的原因之一。据福尔克的陈述，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 1998 年 1 月 31 日，在他的公寓中，他们双方同意结束他们的约会关系。

社交历史：值得注意的是，桑多拉当时最好的朋友朱迪·宝拉克也是一名处于恢复期中的吸毒者，并在一名医生的照料下接受药物治疗。她们是在小组治疗中认识的。其他值得注意的是，朱迪·宝拉克的同居男友马克·贝恩也是一名恢复期中的吸毒者。

家庭历史：值得注意的是，桑多拉·麦勒尼的父亲是一名警官，也是一名酗酒者。

医疗和精神健康状况历史：威斯康星州法院犯罪调查部门（WDOJ - DCI）1998 年 4 月 2 日的一份案情报告提到了对琳达·克洛克所做的一次询问，琳达在威斯康星大学儿童神经症治疗中心工作，她的陈述如下：

1994 年，克洛克开始为麦勒尼一家工作。在查看了孩子们的医疗图表后，她发现他们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被配给了她形容为“不可思议的数量”的药物。克洛克特别提到在 1994 年，30 片药片分别在下列日期被开给马泰·麦勒尼：3 月 3 日、5 月 10 日、5 月 16 日、5 月 23 日、5 月 31 日、6 月 8 日、6 月 14 日、6 月 16 日、6 月 21 日和 6 月 28 日。桑多拉·麦勒尼的另一个儿子也在 1994 年的下列日期被开给了 30 片药片：5 月 7 日、5 月 16 日、5 月 23 日、6 月 5 日和 6 月 11 日。

克洛克解释了那些开出的药物，Fioricet 不是催眠药，却是一种可以上瘾的巴比妥酸盐，长期服用会产生抗药性。麦勒尼的 3 个孩子都接受了 Fioricet 处方。克洛克曾打电话给配药的药房，那些药剂师也表示了他们对这么短的时间内使用那么大剂量的药的担心。

麦勒尼偶尔会给克洛克打电话称她需要额外的处方药，因为那些药弄丢

了，被偷了或忘在一个旅馆房间里了。克洛克并不相信麦勒尼的话。她将麦勒尼的电话形容为“药物寻求”行为，并相信麦勒尼在试图利用她。克洛克推测麦勒尼自己才是服用那些药物的人，但她无法证实这个推测。

以下材料由威斯康星州法院犯罪调查部门（WDOJ - DCI）1998 年 12 月 2 日的案情报告提供。来自里弗赛德精神治疗所和绿堤郡白林精神治疗中心的资料是对桑多拉·麦勒尼的精神治疗纪录的精确概要：

……1992 年 9 月，桑多拉·麦勒尼因为消沉和焦虑失调第一次到约翰·R. 斯达姆医生处就诊，此后一直由他主治。桑多拉抱怨她有阵发性的焦虑和恐慌，并称这种症状在她接受颈部指压疗法的几年后开始出现。随后医生对桑多拉使用各种控制类的药物，包括 Pamelor、Klonpin 和 Zoloft。记录显示桑多拉有两次被收入白林精神治疗中心接受治疗，第一次是在 1996 年 10 月 10 日，第二次是在 1997 年 4 月 11 日。在 1997 年 4 月 25 日被白林精神治疗中心遣退结束后，桑多拉还在 Jakie Nitchke 中心接受过戒酒治疗。

根据这些记录，桑多拉还被开过或服用过以下药物：BuSpar、Fioricet、Inderal、Prozac 和 Xanax。

约翰·R. 斯达姆医生于 1997 年 4 月 25 日写的遣退陈述摘要如下：

桑多拉·麦勒尼夫人被紧急收入治疗，因为她有严重的中毒现象并伴有抑郁和焦虑，使得旁人感到她有伤害自己的潜在危险且不能自理。就在她住院治疗前的即刻，她还因为过量醉酒而卷入一起汽车事故……

最终诊断：

参考 1：

- （1）酒精依赖。
- （2）镇静药物（benzodiazepine）依赖。
- （3）综合的焦虑失调。
- （4）恐慌失调。
- （5）精神抑郁症。

参考 2：

人格失调，但不具体。

参考 3：

- （1）过去曾患有脑疝并伴有不适和神经上的症状。

(2) 有周期性偏头痛病史。

参考 4:

心理的和环境的问题：问题严重，婚姻不和谐，感觉其脑瘤已经影响到她身体的右半部分，还有慢性的颈部发紧病状。

参考 5:

对执行遣退的总体评估：48。

……在急救室对她进行评估时，她在情绪上已经非常狂乱并有严重的中毒现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 29……尽管她母亲曾写过一封长信以表达对她酗酒和滥用精神治疗药物的担忧，她还是把过度饮酒放在心上。

抽烟习惯：值得注意的是，绿堤消防局的 A. 贝利队长在一份事故报告中的发现，日期是 1998 年 2 月 11 日，陈述如下：

许多烟灰缸散放在楼里各处，其中很多都装满烟头。我们注意到有好几支烟还在点着时就被放在桌上、柜台顶部和一本电话簿上，然后越烧越小或自己熄灭。在起居室的地板上挨着咖啡桌的地方有两根烧过的纸火柴，咖啡桌放在沙发东边……

这些在寓所的证据，包括几个装着烟头的烟灰缸，起居室的毯子上已经烧过的散落的火柴，以及家里各处家具上自己熄灭的烟头，都显示出居住者粗心随意的吸烟风格。

对朱迪·宝拉克的访谈也证实了桑多拉随意的吸烟风格，包括发现桑多拉以前曾发生过的一个小事故，即她曾将一个烟灰缸放在膝盖上，拿着一支点燃的香烟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生活方式风险：这一风险取决于人的个性、个人本身、职业以及社会环境特点。我们相信特定的环境、习惯或活动倾向会增加某一个体遭受伤害或损失的可能性（Turvey, 1999）。从各方面来看，桑多拉·麦勒尼的生活方式风险很高，很有可能成为某些蓄意或意外伤害的受害人，这些伤害可以来自她自己，也可以来自她固定交往的人。这是由以下情形决定的：

- 她和约翰·麦勒尼的婚姻中有暴力历史；
- 与约翰·麦勒尼有关于孩子监护权的争夺；
- 她酗酒和滥用药物；
- 她粗心随意的吸烟习惯；

- 她不断恶化的精神和情绪状态；
- 她最好的朋友朱迪·宝拉克也滥用药物和酗酒；
- 与朱迪·宝拉克的男友马克·贝恩有长期接触，此人也是一名恢复期中的吸毒者；
- 她的前男友安德鲁·福尔克有过犯罪记录；
- 她最近与安德鲁·福尔克的分手。

意外风险：这是指被害人的死亡是由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其周围环境中的危险因素特点带来的风险。从各方面来看，桑多拉·麦勒尼总的意外风险度很高，很有可能成为某些蓄意或意外伤害的受害人，这些伤害可以来自她自己，也可以来自她固定交往的人。这是由以下情形决定的：

- 她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 25，证明在她死亡之前一刻还在过量饮酒；
- 她一直酗酒和滥用精神治疗药物；
- 她粗心随意的抽烟习惯；
- 她死亡前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有过自杀并表示，这可以由刑侦人员在她的垃圾堆里找到的她写给其朋友朱迪·宝拉克的几个关于自杀的字条来证明；
- 其母亲罗拉·卡特尔和最好的朋友朱迪·宝拉克都可以证明，在死前的一段日子里她情绪抑郁，精神状态已经恶化。

尸检的疑点分析

在该案中，于 1998 年 2 月 12 日对桑多拉·麦勒尼的尸体进行尸检，尸检报告由密尔瓦基县医检办公室的主医检官约翰·泰格兹（John R. Tegatz）主治医师完成。我非常尊重该报告中得出的病理发现，但对它由此推测出的关于犯罪现场重建的意见却不是很赞同。我的看法是对以下犯罪现场重建问题的思考为基础的：

1. 我们已提到过，一般都认为死者的社交、病史以及精神健康状况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了解个体的行为或精神状态，并可以为解释死亡原因、方式和情境提供线索（NMRP，1999）。在该尸检报告中，对死者的过去仅有的讨论是一段简短的情景描述，即被害人被发现死亡于一座被火烧过的房子里。没有证据表明，在这份尸检报告中考虑过被害人的社交、病史、精神健康状况和吸烟历史，这些证据还包括要提及死者的过去，收集和详述在其家中发现

的处方药物，以及随后所做的严格的毒物测试。根据《国家司法部死亡调查纲要》中的第5部分规定，寻找和记录可描述死者的信息（NMRP，1999），这个遗漏使此次尸检不能成为有效的法庭报告。

2. 死亡原因被列为“可能是人为勒死”。我对这个可疑结论的得出很佩服，因为它体现出必要的保守倾向。所得证据被认为符合人为勒死的特征，但它同时也可能符合其他种死亡的方式。然而，报告中没有试图排除或讨论可以导致相似伤害的其他可能情形，这是值得怀疑的。审查者为何不在努力排除所有其他可能性的情况下，就允许成立一个“可能的”死亡原因。由于所举出的该部分中第1项的疏忽，我们不能承认这份法医调查的有效性。

该案的尸检结果随后经布朗县医检办公室的主医检官乔治·斯可马克（Gregory A. Schmunk）主治医师查阅。在1999年1月19日给维尼巴沟地区检察官约瑟夫·帕勒斯（Joseph F. Paulus）的一份备忘录中，斯可马克医生概述了他对此案的犯罪现场重建。尽管我对斯可马克医生提出的医检发现表示尊重，但对他提出的某些犯罪现场重建却没有多大兴趣。我的看法是以对以下犯罪现场重建问题的思考为基础的：

1. 备忘录中列出的犯罪现场重建认为，“背上的青肿可能是由攻击者在进攻时压在背部造成的，用的可能是膝盖”。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只有假定存在一名攻击者时才有此可能。事实是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个伤害和受害人的死亡有关。实际上，我们应该就桑多拉·麦勒尼左臀部、中背部和头部（右部靠后）这三处与意外跌倒一致的伤痕展开讨论。由斯可马克医生提供的犯罪现场重建并没有试图排除这种可能性的讨论，所以它缺乏可信度。

2. 犯罪现场重建者指出，“我从现场照片和查看现场后注意到，在沙发上一处她的手的压痕，似乎她在挣扎中想抓住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可能性，但这也是只有假定存在一名攻击者时才有此可能。事实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个沙发上的压痕和受害人的死亡有关。实际上，我们应该讨论死者是否由于饮酒、滥用药物，一般情况下或任何这些情况的综合而带来一时愤怒、悲伤或其他极端的情绪，从而造成了这个压痕。由斯可马克医生提供的犯罪现场重建并没有试图排除这些可能性的讨论，所以它缺乏可信度。

3. 犯罪现场重建者提出，“她的头部脸朝下贴近沙发靠垫，如果她是自然死亡不会是这种姿势。这表明她的脸是被迫贴近靠垫的”。要提出这个设想

必须假定死者所处的位置就是她死亡之前所处位置，才能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但是，死者死亡前所处位置并未被证实，所以这个设想缺乏可信度，缺乏和该案的联系。

4. 所做的犯罪现场重建没有试图追查或解释在楼下浴室门上发现的带血指纹，这个指纹已于1998年6月10日（星期三）经威斯康星州犯罪实验室的分析师哈里·瑞德（Harry Reed）确定属于朱迪·宝拉克。这个带血指纹的存在揭示出，在死者遭受头部伤害后到起火之前，朱迪·宝拉克曾在死者家中的地下室里。

5. 犯罪现场重建者提出，“除了他人勒死或窒息而亡外，由尸检结果看没有其他死亡原因”。即使这是真的，但由以上对斯可马克医生的尸检结论所作的分析，并结合该报告中列出的调查建议看来，之所以得出缺乏其他可能性的结论是因为没有进行一个完整的刑事调查。斯可马克医生没有提到过这个明显的缺失，这让人感到有点不妥。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斯可马克医生于1999年1月19日提供的犯罪现场重建和里特（Lt. Litor）于1998年7月29日填写的绿堤警察局细节记录表之间有不符之处。斯可马克医生说：

其淤点出血和颈部挫伤表明，造成麦勒尼夫人死亡的是勒束或窒息。

里特曾到布朗县医检办公室和斯可马克医生一起讨论关于桑多拉·麦勒尼的死亡问题，他报告说：

斯可马克医生认为，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桑多拉·麦勒尼死于湖石街368号的那场火灾。他说她体内低水平的一氧化碳、房间通风孔处极少量的煤烟以及淤点出血的缺乏都显示出桑多拉·麦勒尼是在火灾前被人为勒死，且死时没经过多少挣扎。

这个矛盾之处也许微不足道，但也应该进一步查清。

总之，作为审查者看来，由斯可马克医生提供的相关犯罪现场重建见解显然不是建立在对假设的检验，对其他种可能假设的思考或调查，以及其他有说服力的刑事调查基础上。与此相反，它们更像是为了符合他杀死亡的假设而逐渐形成的一些意见。这不是一种合法的刑事调查。

火灾调查的质疑

1998年2月11日由卡帕泰·贝利（Captain A. Bailey）提交的火灾事故调查报告中写道：

……沙发后西面墙上火焰燎过的痕迹最为明显，就在从北至南的一排沙发后面。这一区域正上方的天花板也呈现出被大火燎过的迹象，上面的一块无浆墙皮已被烧透并脱落下来。

包括受害人状况在内的现场证据表明，火是在两段沙发中南面的那一段垫子上被点燃的。显然，火在沙发的垫子上燃烧时释放出大量有毒的浓烟，表面温度也急剧升高。

火一直在浓烟中烧着，直到氧气用尽，不足以支持物体的燃烧。

居所中的证据，包括灰烬中找出的烟蒂，起居室地毯上的点过并废弃了的火柴棒，以及屋内随处可见的家具上自燃过的香烟，表明房子的主人有抽烟并随处乱放的习惯。火源的位置表明了抽烟时的疏忽大意可能就是火灾发生的原因。

另外，1998年2月11日一份来自布朗郡纵火调查部托马斯·海兹（Thomas. Hinz）的备忘录中也提到类似的情况：

参与这场火灾的调查的人员包括我自己、史密斯警员、贝利队长、理查德·巴勒特（Richard Barlett）队长和乔·卡密斯克（Joe Kaminski）侦查人员。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场火灾是由吸烟引起的，大火集中在沙发那儿……

在现场我们未能发现任何罪恶的行为，所有的事情都与由于抽烟而导致意外死亡这一结果一致。尸体已被运到圣·文森特（St. Vincent）医院做X光检查，然后它可能还要被运到密尔瓦基（Milwaukee）做尸检。除非他们发现什么异常之处，这起死亡应该是出于意外。

然而，来自威斯康星州法院犯罪调查部门的调查员对同种迹象的解释却与之大相径庭。一份来自被特定委托的厄格姆（Eggum）在同年2月26日的事故调查报告中指出：

沙发椅子上面、沙发的内部以及沙发前面全部都是助燃物。这些助燃物包括纸火柴、报纸和布。火灾时沙发椅子上的受害人也在火源区范围内。不能排除受害人被置于火中的可能。

在坐卧式沙发和咖啡桌之间的地板上，一片已被严重烧焦的地板周围，有一块看上去像是什么助燃物燃烧时留下的不同的燃烧痕迹，是固体的还是液体的并不确定。另外，当水被倒在这个被烧焦的洞旁边的地板上时，情况表明，水是从洞流向沙发方向的。

可以这么说，这场火灾一定是被精心策划的。

应当指出的是，在现场并未发现任何液体助燃物存在的证据。另外，被委托调查的厄格姆在他的判断中也只是说“对所有意外死亡原因的排除”。这也与 NFPA1998 年的第 921 号《导致火灾的因素》指导文件相吻合。文件中指出：“只有在有确切证据表明，某一原因不可能导致火灾发生时，这一可能因素才能被排除。”然而，在他长达 18 页的报告中，并没有对他的结论进行任何证伪测试的讨论；同样，也没有对来自火灾部贝利队长和布朗郡纵火调查部的相悖结论经任何证伪测试的讨论。仅仅这一点似乎足以使厄格姆的结论丧失其科学性和可信度。

应当指出的是，厄格姆提到他在呈递自己的结论之前，确实看过了尸检结论。而尸检结果也认为死亡的方式表明这是一桩谋杀案。

上述由厄格姆提交的判断结论的支持证据中，提到了以下几点：

1. “在北面的垫子和靠背之间有一张纸毛巾或是餐巾纸，这是人为在靠背和垫子中间放好了的。这张纸被揉成灯心形状。”然而它却没有被烧着，从而排除了将其作为灯心用在与桑多拉·麦勒尼死亡有关的火灾中的可能。

2. “在坐卧式沙发上北边和中间的垫子之间有一个棒球帽，一盒被烧过的纸火柴就在帽子的下面。”这盒纸火柴也被认为是助燃物，然而火柴上覆盖的那顶帽子却未被烧着。看来，纸火柴和火灾有关的可能也被排除了。

3. “在坐卧式沙发旁边的地板上，在第二块垫子的下面靠北一角有一盒烧焦了的纸火柴。这些火柴就在坐卧式沙发的从北边数第二块垫子的正下方，而那些垫子正是被严重烧毁的部分。”这里的纸火柴也被列入助燃物的范围，然而它们自己并没有被烧着。看来，这里的纸火柴和火灾有关的可能也被排除了。

4. 报告中提到了那些在长沙发椅的垫子之间环绕着的可恶的纸毛巾以及纸巾。同时他还提到了可能被用做“蔓草”的材料。德汉（DeHan）说“蔓草”有可能是由普通的燃料加工而成……多处燃烧的起火点也被仔细地掩藏

好了，从而使火燃起的真正原因无从查找。

报告中并未根据与这一火灾现场相联系的潜在的证据，对存在多处起火点的其他解释进行分析和排除，也没有对存在的纸火柴以及纸毛巾和纸巾的其他可能进行解释（Chisum and Turvey, 2000）。例如，可能死者当时不小心弄伤了自己的头部正试图为自己止血，随意将带血的纸巾丢弃在沙发周围。然而尸检并未发现这种可能性。

应当指出，上述厄格姆提出的未经检验的起火原因并不符合由国家防火协会（NFPA 921）于 1998 年颁布的题为《致火因素》的指导文件的基本规定。这份规定中，要求对一个案件需作出完整的重新建构：

在找到某种极易点燃的燃料和可能性很大的可燃物，调查员就急于确定一场火灾的原因时，他一定要保持沉着冷静。使这种易燃物和燃料相混合的接下来的动作才是火灾的真正起因。

本案中大量的物证都未得到验证（正如报告中“调查建议”部分提到过的）。另外，厄格姆也没有对受害人嗜烟一事作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如果这两点都没做到，由于事实不清，任何人也无法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这样说似乎是对厄格姆的结论价值和可靠性的怀疑。

总而言之，这位分析者认为有人故意纵火的结论并不是建立在验证假设、排除其他多种可能，或者是在其他规范的法庭分析方法基础上得出的。与之相反，这些结论看来似乎是为了配合尸检结论，即排除意外原因导致火灾这一结论而有意简化形成的。这不是一次合理的法庭科学实践。

现场特征

地理位置与现场类型：本案中已知的死亡现场是在死者所在的威斯康星州绿堤郡 Huch 大街 368 号的家里。

接触点：这是指犯罪人第一次接近或控制住受害人的地点（Turvey, 1999）。因为这一点假设有入侵者的存在，而事实上，这是否存在还是个问题，因此现在考虑这一点还为时过早。

凶器的使用：这一项也假定有攻击者的存在，但事实上是否存在还是个问题，因此现在考虑这一点也为时过早。

接近的方式：这是指犯罪人接近目标的方式（Turvey, 1999）。由于这一

项也假定有攻击者的存在，而事实上其是否存在还是个问题，因此现在考虑这一点也为时过早。

攻击方式：这是指当犯罪人有了犯罪意图后，他们一开始是如何制伏受害人的。这里专指使用武器进行的攻击和攻击的方式（Turvey, 1999）。由于这一项也假定有攻击者的存在，因此现在考虑这一点也为时过早。

控制方式：这是指犯罪人在实施侵犯过程中，对受害人的行为进行操纵、约束和掌控的各种方式（Turvey, 1999）。由于这一项也假定有攻击者的存在，而他事实上是否存在还是个问题，因此现在考虑这一点也为时过早。

暴力的使用：这是指犯罪人在实施侵犯过程中，所使用的一切暴力手段（Turvey, 1999）。由于这一项也假定有攻击者的存在，而他事实上是否存在还是个问题，因此现在考虑这一点也为时过早。

受害人的反抗：这是指在被侵害过程中，受害人曾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和不屈服的行为的总和（Turvey, 1999）。由于这一项也假定有攻击者的存在，而他事实上是否存在还是个问题，因此现在考虑这一点也为时过早。

性行为：医学检查部的副主管约翰·泰格兹在密尔沃基（Milwaukee）郡医学检查室对死者进行了性侵犯检查。化验结果呈阴性，证明死者近期并无任何形式的性接触。

言语行为：未确定。

预谋和反侦查的证据：反侦查行为是指犯罪人为了隐藏他们的身份，以及他们与犯罪有关的证据，甚至是罪行本身，而在他们犯罪前、犯罪中或犯罪后有意识地扰乱、妨碍或阻止侦查活动的行为（Turvey, 1999）。这些行为可能被用于制定实施犯罪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由于这一项也假定有攻击者的存在，而他事实上是否存在还是个问题，因此现在考虑这一点也为时过早。

然而，由地区检察官提出的最后陈述中出现了几点更为大胆的结论，让我们一同来看一下。

1. 地区检察官在他最后的陈述中提出，犯罪人将受害者的血衣拿到了楼下的洗衣篮里从而想逃避警方的侦查。如果犯罪人有意将房子烧毁，把一件衬衣放在篮子里，这似乎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与他的初衷相矛盾的，因为这样并不利于火灾的蔓延。不仅如此，血衣所在之处正是脏衣服平时经常放的地方，正如后来找到的那样，在家里。应当指出的是，任何人只要他有点关

于凶杀案件的侦查常识，都会意识到这一点。

2. 地区检察官在他最后的陈述中提出，犯罪人精心设计了这场火灾，关上了所有的窗户从而使火焰在房内烧毁了所有的可能对他不利的证据。由于以下原因，这种观点仍有偏颇之处：

(1) 经常在用于娱乐的小说里可以看到，为了达到掩盖自己罪行的目的而将所有的希望统统寄予一把火上是多么不可信赖。事实上，大火并没有发生。更重要的是，当罗拉·凯特打开大门进入房间进行调查时，大火仍然没有出现。

(2) 如果纵火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可能会使自己受牵连的证据，这也就是假定了现场存在着犯罪人的犯罪证据。在现场所找到的惟一点证据就是朱迪·宝拉克(Jody Pawlak)的一枚血指纹。再就是受害人的尸体。仅就这一点来说，并不能得出什么不同寻常的假设。

(3) 关于用纵火来损毁尸体以及犯罪证据的手段，我们可以看看迪玛欧2人(DiMaio and DiMaio)在他们的著作中是怎么说的：(1993, p. 340)

偶尔会发生纵火烧毁尸体并隐瞒死因的情况。这种做法通常是徒劳的。因为法医可以很轻易地判断出死者在火灾前已经死亡。事实上，由于人体内含大量的水，一般是很难被烧着。因此，当一个人身体表面已经严重炭化，皮肤已被烧裂，四肢也已经残损，他的内部器官往往仍能保持完好。普通住宅着火产生的温度很少能达到1600F(一般为1200F~1600F)。然而，要烧焦一具尸体需要1800F~2000F的高温持续作用1.5小时到2小时才有可能。一般的房屋并不具备将一个人烧成灰的条件。除了火葬以外惟一的办法，只能是将尸体抬高，从而用烧化了的脂肪支持进一步的燃烧。躺在平面上的尸体即使表面皮肤烧焦程度再严重，紧贴地面的那部分也不会有事，内脏也会被保存完好。

因此，任何人，只要是有点关于纵火凶杀案件的侦查工作常识的，都应该明白，把房子烧掉并不足以毁掉尸体，掩埋证据。

侦查建议

以下所列的是为进一步的侦查和寻找本案有关事实而提出的建议：

1. 1998年2月26日威斯康星州法院犯罪调查部门(WDOJ-DCI)案件

报告在第8页到第18页中提到：“犯罪实验勘查组在污迹中发现了一枚指纹，并怀疑是血指纹。”这枚指纹是在浴室的淋浴器上被发现的。

后来，威斯康星州刑事技术勘查组的分析者哈里·瑞德于1998年6月10日（星期三）作出结论，认定这枚指纹属于朱迪·宝拉克（Jody Pawlak）。这枚指纹足以说明当时在死者头部受伤以后，大火燃起之前，朱迪·宝拉克就在死者家中，就在她家的地下室里。然而，在这枚血指纹发现之后，朱迪·宝拉克并未就此受过询问；她本人也从未提起事发当天，在死者头部受伤后她就在死者家中一事。

勘查者未能对这一或许是十分重要的证据给予足够的重视。而调查者也未能及时对这一证据现象进行跟进调查。应当将朱迪·宝拉克作为本案的一名犯罪嫌疑人，找一名资深刑事预审员对其进行讯问。

2. 根据绿堤警察局范·浩特提供的1998年2月19日的记录清单，通过使用鲁米那试剂，在楼下的洗衣房和淋浴的旁边发现了一些指纹。鲁米那是一种检测是否含有血液成分的化学试剂。发现这些指纹以后，似乎还没有进行身份认定的测试。也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指纹已经与任何已知的标准对比过。如果这些指纹的由来以及身份已经认定（假如这些真是血指纹的话），这将对本案事实的澄清有重大意义（例如，如果这是死者自己的指纹，血迹也就是她自己的，这就可以得出结论，死者当时被伤到头部后，自己在楼下的洗衣房和淋浴旁走动过。）

3. 1998年2月24日，威斯康星州法院犯罪调查部门（WDOJ - DCI）的案件报告中提到“一条电线和一段导管”从地下室天花板的托梁上移开了。（第29号物证）至今并没有听说已对这些物品进行了包括血迹、毛发或其他有关痕迹的检验。事实上，这份报告的第8页中提到，这些物品根本就没有被送到实验室，而是和许多其他证物一起被堆放在绿堤警察局的物证陈列室内。

为了能准确地排除本案中意外死亡的种种可能，以上所提到的验证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4. 1998年2月24日，威斯康星州法院犯罪调查部门的案件报告中提到：“刑事技术勘查组在地下室的其他地方以及沙发前的咖啡桌上也发现了疑似血指纹的痕迹。”文中进一步指出：“咖啡桌的位置是在位于娱乐室的东北角靠

东面墙的沙发前面。咖啡桌上摆放着两台卡式录像机。”

对这一方面的证据似乎并未进行进一步的收集、分析或司法鉴定。我们认为，至少应对两台卡式录像机进行指纹收集，以及对可疑血迹进行化验分析、鉴定血型，从而为案件的侦破提供进一步的线索。另外，DNA 检测也是必不可少的。

犯罪重建也不能对楼下发现的证据作出任何合理的解释。正是由于对这部分证据缺乏必要的分析和检测，才使得整个案件的重建过程缺乏来自房子楼下部分证据的支持。

5. 1998 年 2 月 24 日，威斯康星州法院犯罪调查部门的案件报告中提到：一件灯心绒上衣从洗衣篮里被拿到死者常住的地下室内（见物证 10 号）。这可以理解为是死者的衣服。这件衣服被送至犯罪实验室做痕迹检验。关于这一点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但是一定要注意对衣服中可能隐藏的指纹进行提取检验。应当指派专门的指纹提取专家完成这项工作。

报告中也没有反映出通过对这件血衣的血迹模式进行研究在犯罪重建中的作用。报告中提到这件衬衣上的血迹集中在“领子和背部”。这说明死者生前曾长时间的站立或挺直坐着，只有这样才会产生这样的血迹痕迹。这一点的发现排除了死者仰卧时头部突然遭受重创的可能。这一点一定会得到血迹类型专家的证实。

6. 由密尔瓦基县医检办公室的主医检官约翰·泰格兹主治医师提供的尸检报告存在一些模棱两可之处。他将死因归结为“疑似勒死”而非简单的“勒死”。然而在他的报告中却未出现得出这一结论的详细阐明。介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认为应当聘请一名专业的刑事病理学家针对上述问题重新分析尸检结果。

7. 根据尸检和毒物研究报告，并没有对桑多拉·麦勒尼日常吸食或已经上瘾的多种药品的代谢物进行特别化验。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现场已识别、收集或将哪一种药物进行登记造册。如果缺少这样的分析、辨别，我们就不能排除死者曾吸毒过量和嗜酒的可能。

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应该罗列出桑多拉·麦勒尼可能用过的所有药物。并且，刑事毒物分析学家也应对她血样和尿样中的代谢物进行化验。

8. 尸检和毒物研究报告中并没有提到对死者褐色胃溶物和小肠中黄色液

体进行过任何化验。就桑多拉·麦勒尼曾有过吸毒史这种情况而言，这一点与第六点应该说是找寻死者死因的十分关键的一步。这一系列的检测工作应该在专门的刑事毒物学家的指导下尽快完成。

9. 根据狄汉（DeHaan）所言（1997）：

雪茄和香烟，与热塑性物和泡沫相比，更容易点燃含纤维素的材料，如含棉花的靠垫。前者多数情况下仅仅是被烧化而非点着。以前，床垫和家具表面的装饰是用内含棉絮、表面为纤维材料的亚麻和棉布的垫子做成的。因此，不经意滑落的烟头很容易就能在表面烧出一个窟窿，并极有可能引发一场不小的火灾。

如果我们对房内楼上的沙发材料进行一下仔细的研究就可以发现，上述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本案中多份关于纵火的报告中没有一份对这个沙发的内部材料作过精密分析，并且，也没有一份报告进行过现场试验，对这种材料引发火灾的情况进行实践讨论，从而判定这种特殊情况引发火灾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是推导出合理的死亡原因必不可少的一步，也是排除本案属意外死亡可能性的重要步骤（见附图3-1）。



a



b

麦勒尼死亡现场（当局提供的地下室的照片，没有提供楼上燃烧区域的照片）

附图 3-1

参考文献

1. Baeza, J. , Chisum, W. J. , Chamberlin, T. M. , McGrath, M. , and Turvey, B. " Academy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Criminal Profiling Guidelines", Journal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1(1, January).
2. Chisum, W. J. and Turvey, B. (2000) " Evidence Dynamics: Locard's Exchange Principle and Crime Reconstruction", Journal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1 (1, January).
3. DeHaan, J. (1997) Kirk's Fire Investigation, 4th ed. , Upper Saddle River, N. J. : Prentice - Hall.
4. DiMaio D. and DiMaio V. (1993) Forensic Pathology, New York: CRC Press.
5. NMRP (National Medicolegal Review Panel) (1999) Death Investigation: A Guide for the Scene Investigato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6. NFPA 921: Guide for Fire and Explosion Investigations, 1998 Edition,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7. Saferstein, R. (1998) *Criminal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Science*, 6th ed. , Upper Saddle River, NJ:Prentice – Hall.
8. Thornton, J. I. " The General Assumptions and Rationale of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in Faigman, D. , Kaye, D. , Saks, M. , and Sanders, J. (Eds.),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Law and Science of Expert Testimony*, Vol. 2,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
9. Turvey, B. (1999) *Criminal Profiling: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vidence Analysis*, London: Academic Press.

附录四 初始评估： 昆士兰州诉格雷厄姆案 （利恩·霍兰德的被谋杀案）

发现尸体时间：1991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1 时 45 分

调查机构：澳大利亚昆士兰州（Queensland）警察局

报告人：

布伦特·E. 特维（Brent E. Turvey），法庭科学理学硕士，
法庭科学家和犯罪心理画像专家

Knowledge Solutions, LLC

1961 Main Street, PMB221

Watsonville, CA95076

（831）786-9238；bturvey@corpus-delicti.com

呈送对象：

保罗·威尔逊（Paul Wilson），犯罪学家

格雷姆·克罗雷（Graeme Crowley），私人咨询顾问

在详细复查了以下的案件材料之后，本人认为，本案中的刑事侦查工作和刑事分析并不十分充分。本案中提到的许多事实只是一些等待检验的归纳性假设，而不是可以依赖的演绎性推论（Deductive Conclusion, Thornton, 1997），更不能基于这些事实对犯罪活动和犯罪行为作出鉴定性结论。为了顺利地开展侦查工作并对证据作出正确的法庭分析，审查人准备了一份初始评估。

初始评估也就是侦查报告，这份报告复查了在某一起案件或某一串可能的系列案件中存在着的与犯罪行为、被害人、犯罪现场特征有关的原始物证，

以期能够明确侦查方向（Baeza et al., 2000）。这份报告运用了科学原理和相关知识，包括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Locard's Exchange Principle）、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逻辑性分析（Analytical logic）和证据动态变化（Evidence dynamics）。

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Locard's Exchange Principle）是法庭科学的基石，意思是说，一旦犯罪人与某一场所或别人接触，物质交换就发生了（saferstein, 1998）。交换的结果就是，一方面，犯罪人留下了本属于自身的东西，另一方面，犯罪人也带走了本属于这一场所或别人的东西。

批判性思维可以被视为一种积极而巧妙地捕捉、应用、分析、综合、评估那些在观察、体验、沉思、推理或交流的过程中收集或产生的信息的思维过程，从而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先导（Turvey, 1999）。所谓法庭分析，涉及对物证的有效性和局限性以及对证据系列检验的结果进行评估，而这一过程是不依人的主观意愿为依据的。

逻辑性分析涉及研究犯罪现场、分析相关材料、形成逻辑严密的推理结论的思维能力。理想的逻辑性分析也就是形成假设、用事实验证假设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从存在的证据中自然地得出确定的结论，即演绎性推理的结论。

证据动态变化指任何被认为有意或无意地改变、移位、模糊或抹除物证的影响。这种影响出现在某一物体被作为证据开始时至案件判决结束的期间的任何改变（Chisum and Turvey, 2000）。

已经完成的审查

审查人就本案作出了一份初始评估，但并不仅限于此，严格的审查必须考虑到以下事实：

- 各种媒体认为与利恩·霍兰德有关
- 各种媒体认为与格雷厄姆·斯坦福德的法庭活动有关
- 昆士兰州警察局记录：利恩·霍兰德失踪案
- 昆士兰州警察局突发事件处理机构（Major Incident Job Logs）
- 昆士兰州警察局犯罪侦查机构
- 被害人房间的各类照片

- 犯罪现场的各类照片
- 尸体检验的各类照片
- 布里斯班司法病理学院 (Institute of Forensic Pathology, Brisbane) 的罗斯玛丽·阿史伯 (Rosemary Ashby) 博士于 1991 年 11 月 5 日所作的死后伤的检验报告
- 布里斯班司法病理学院罗斯玛丽·阿史伯博士于 1991 年 11 月 5 日所作的法定声明
- 布里斯班司法病理学院克里斯蒂·班特里 (Kristine Bently) 于 1991 年 11 月 25 日所作的法定声明
- 克里斯廷·劳伦斯 (Christine Lawrence), 克威克酒店 (Kerwick Hotel) 和红色银行 (Redbank) 以前的律师团顾问, 于 1995 年 5 月 18 日所作的法定声明
- 柯林斯森林公园 (Collingwood Park) 的伊丽莎白·瑞莫斯 (Elizabeth Reimers) 和利恩·霍兰德的朋友萨拉 (Sarah) 的母亲, 于 1995 年 6 月 15 日所作的法定声明
- 法庭科学约翰·唐德 (John Tonge) 研究中心的安东尼·安斯福德 (Anthony Ansford) 教授于 1996 年 7 月 17 日所作的法定声明
- 法庭科学约翰·唐德 (John Tonge) 研究中心的里奥·弗仁尼 (Leo Freney) 教授于 1996 年 7 月 26 日所作的法定声明
- 律师尼尔 (Neil) 于 1996 年 9 月 18 日作出的皇家仁慈特权请求
- 就成年人利益的辩护词, 昆士兰 (澳大利亚州名) 最高法院的上诉法庭, 奎恩诉格雷厄姆·斯图亚特·斯塔福德案 (The Queen v. Graham Stuart Stfford)
- 昆士兰州最高法院上诉法庭的菲茨杰拉德 (Fitzgerald) 法官于 1997 年 9 月 23 日作出的关于“昆士兰州诉格雷厄姆·斯图亚特·斯坦福德一案”的判定理由
- 昆士兰州最高法院上诉法庭的戴维斯 (Davis) 法官于 1997 年 9 月 23 日作出的关于“昆士兰州诉格雷厄姆·斯图亚特·斯坦福德一案”的判定理由
- 昆士兰州最高法院上诉法庭的麦弗逊 (Mcpherson) 法官于 1997 年 9 月

23日作出的关于“昆士兰州诉格雷厄姆·斯坦福德一案”的判定理由

背景/时间表

根据利恩（Leanne）的大姐梅丽莎·霍兰德（Melissa Holland）的陈述，她最后一次看到利恩是在1999年9月22日（星期天）晚上。利恩当时正在看电视。梅丽莎进一步陈述说，后来她就回屋睡觉了，星期一早晨7时45分她离家去上班。她并没有提到说看到了利恩，那天是利恩学校放假的第一天。

14岁的贾森·法雷尔（Jason Farrell）说他在1991年9月23日（星期一）早晨7时55分跟利恩在她家——古德纳市艾丽斯大街（Alice Street, Goodna）70A——前院里说过几句话。利恩当时的情绪和神态都很正常，她的头发仍然是通常的金黄色。

西西尔酒店（Cecil Hotel）的夏·卡斯维（Shane Cuthway）说，他在1991年9月23日（星期一）早晨8时30分看到利恩在她家阳台上。

据特伦斯·霍兰德（Terrence Holland）和格雷厄姆·斯坦福德（Graham Stafford）说，他们最后看到利恩是在1991年9月23日（星期一）早晨9时30分，当时利恩离家去购物中心见一个朋友。霍兰德是利恩·霍兰德的父亲。他说格雷厄姆·斯坦福德是在他们家最后一个看到利恩的人。此人是与利恩的大姐梅丽莎·霍兰德同居的男友。

西西尔酒店的彼得·艾奇古博（Peter Edgecumbe）说，在1991年9月23日（星期一）早晨9时至9时30分之间，他看到利恩独自朝艾维斯大街（St. Ives）购物中心走去。

根据昆士兰州（Queensland）警察局的记录，一位不愿提供姓名的15岁目击者说在艾维斯大街购物中心看到过利恩。他说1991年9月23日（星期一）早晨9时50分看到利恩“拿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购物袋跟一个男人在说话，这个男人穿着一件黑色的AC/DCT恤和黑色夹克。这人金黄色的头发，大约十六七岁的样子”。据说，这位目击者是利恩的前男友。

据古德纳方便食品店（古德纳市女王大街24号）店主凯丽·斯塔克（Kylie Stark）说，1991年9月23日（星期一）那天，利恩来过她的食品店两次。当天下午大约3时5分，凯丽来与丈夫交班的时候，看到利恩独自从店里出来兴高采烈地走了。下午3时30分到4时之间，利恩又单独来了一次，

买了一些油煎土豆片。

费奇大街9号的罗伯特·贝可尔(Robert Baker)说,1991年9月23日(星期一)晚上8时30分,他看到利恩走进西西尔酒店的私人酒吧间中。

根据昆士兰州(Queensland)警察局的记录,特伦斯·霍兰德是于1991年9月24日下午5时45分向警方报告利恩失踪的。明显地,他们家直到那时才发觉利恩失踪了。

根据侦查人员和验尸官的报告,1991年9月26日(星期四)下午1时45分,当自行车搜捕队(Trail Bike Units)在红岸平原大街(Redbank Plains Road)搜索时发现了利恩·霍兰德的尸体。她的尸体躺在格林伍德村(Greenwood Village)与红岸平原大街交叉地带以西不远的灌木丛中。

格雷厄姆·斯坦福德很快就被视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因为据称他是在霍兰德家最后一个看到活着的利恩·霍兰德的人。昆士兰州警察局在没有调查许多有价值的线索的情况下就将格雷厄姆逮捕。在这些线索记录下面简单地写着“这一信息与霍兰德谋杀案无关,因为格雷厄姆·斯坦福德已经作为利恩·霍兰德的谋杀者而被逮捕”。在这一没有深入调查的线索中包括一位40岁、曾有性犯罪前科的男性邻居,据说此人一直试图接近邻家女孩。还有一位手上和夹克衫上沾有血迹的人于1991年9月25日进入那家商店要钱。这些都能明显弱化逮捕斯坦福德的证据。

尽管缺乏任何利恩在家被害的证据,尽管缺乏任何直接证据和目击证人,格雷厄姆·斯坦福德还是卷入了这起事件之中,他被审讯并于1992年3月25日以谋杀罪被起诉。因有罪判决而上诉。1992年8月25日,上诉法院驳回了上诉。然而法院并没有发现罗斯玛丽·阿史伯(Rosemary Ashby)——本案的司法病理学专家——提供的部分证据存在着严重的错误。

1996年9月18日,当事人针对本案中法庭证据的确定性又提起了上诉。然而,1997年9月23日,昆士兰州最高法院上诉法庭以2:1的投票维持格雷厄姆·斯坦福德有罪的判决。

1997年9月23日,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法官用27页的篇幅说明撤销有罪判决的理由,其中他说:

本案中,弗伦尼(Frenney)、安斯福德(Ansford)教授和莫里斯(Morris)硕士的证据已经明显弱化了起诉的基础,并且在起诉意见的关键环节存在着

严重错误。我不得不怀疑基于这些存在严重不确定性的证据而作出的审判的公正性。

我支持上诉，请求取消有罪判决并重新审理本案。

1997年9月23日，戴维斯（Davis）法官用15页的篇幅说明驳回上诉的理由，其中他说：

除了1991年9月23日下午或下午之后看到利恩的证据不太可靠以外，也没有明显的证据让人们怀疑当天下午上诉人有杀死利恩的机会……虽然新证据表明上诉人不可能在家里杀死利恩后将尸体放在汽车后备箱里达两天之久，但我认为陪审团的判断是公正的。

……

因此我请求驳回上诉。

1997年9月23日，麦弗逊法官（Mcpherson）明显与戴维斯法官合作，他用2页的篇幅说明驳回上诉的理由，其中他说：

我已经阅读并同意戴维斯法官驳回上诉的意见。

……问题不在于起诉方在法庭的假设或解释是否超出了合理怀疑的限度。

本案中，呈现给陪审团和法庭的证据是为了对上诉人如何杀人、如何处理尸体作出更多的解释。为了寻求公正，陪审团对此已经作了一个或更多的假设。

因此，事实上，昆士兰州最高法院上诉法庭承认起诉意见和有罪证据存在很大的缺陷。然而，三名法官中有两名认为无须证明起诉意见已经超出了合理怀疑的限度。这些法官甚至认为，陪审团在作出斯坦福德有罪判决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起诉意见。值得注意的是，法庭上并没有呈交斯坦福德有罪的另一份起诉意见。陪审团也没有了解这份能证明斯坦福德有罪的起诉意见。

被害人特征分析

被害人特征分析是指深入地研究被害人各种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家庭、朋友、熟人、教育、职业、住所、邻居等多方面内容，也包括和被害人的过去及生活方式有关的一些背景信息，如所有的个人习惯、爱好、犯罪经历以及病史。建立被害人特征分析对于判断某些犯罪发生时的

情景是非常必要的 (Baeza et al., 2000)。此外，了解死者的社会关系、既往病史、精神病史都有助于探究死者生前的行为或心理状态、提出进一步调查的重点，并为确定死亡原因、方式和情境提供线索 (NMRP, 1999)。

姓名：利恩·霍兰德

种族：高加索人种

性别：女性

出生日期：1978 年 10 月 1 日

年龄：12 岁

身高：不足 150 厘米

体重：41 千克

头发：金黄色

居住地：古德纳市艾丽斯大街 70A

职业：红岸平原学校的学生

交友情况：根据调查报告，利恩曾有一位男友，然而仅仅知道此人大约 15 岁。利恩姐姐说，利恩也跟一名年龄不相称的男子（19 岁）通过电话。

社交经历：根据昆士兰州警方的调查，利恩与邻居家的男孩子们有过性经历。她也有与陌生人搭车尤其是搭便车的经历。

家庭情况：根据昆士兰州警方的调查，利恩与她的父亲（特伦斯）、姐姐（梅丽莎）以及姐姐的男友（格雷厄姆·斯坦福德）住在一起，她的母亲和祖母不在这里住，而且有时候也看不到她。据利恩朋友的反映，利恩与她的大姐梅丽莎关系紧张，因为当特伦斯·霍兰德不在的时候她就失去了姐姐的照顾。据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利恩在自己家里的时间非常少，缺乏成年人的监督。

既往病史和精神病史：不知道。

生活方式风险 (lifestyle risk)：就一个人的个性、生活环境、职业环境、社会环境而言，他所面临的所有风险。也就是说，某些情境、生活习惯或活动往往增加了他遇害的可能性 (Turvey, 1999)。基于这些有限的信息也可以推知，利恩·霍兰德在生活方式风险方面极有可能成为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因为考虑到以下一些因素：

- 与年龄不相称的男子交往的经历

- 性乱交的经历
- 搭便车的经历
- 与陌生人乘车的经历
- 与相识的性犯罪人居住在同一区域
- 很长时间缺乏家庭监管

意外风险（incident risk）：由于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其周围环境中的危险因素特点带来的风险。基于目前有限的信息也可以推知，利恩·霍兰德在意外风险方面极有可能成为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因为考虑到以下一些因素：

- 1991年9月23日她从没有监管的家里离开
- 1991年9月23日她曾被人看到搭便车（一个人在路上走）
- 1991年9月23日有人看到她出现在艾维斯大街购物中心
- 1991年9月23日有人看到她与一名年龄不相称的男子在一起
- 1991年9月23日有人看到她走进一家酒吧

尸检的疑点分析

布里斯班司法病理学院的罗斯玛丽·阿史伯博士于1991年11月5日作出了关于利恩·霍兰德的死后伤的检验报告。我注意到这份报告提出了犯罪现场的重建。我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对下述犯罪现场重建问题的考虑：

1. 烧伤证据：本案中的起诉方、法官和新闻媒体都提到了尸体上的烧伤。然而，尸体检验的发现是模棱两可、不完全的，即尸体检验报告并不能完全确定被害人的尸体上有烧伤痕。在报告的第4页这样写道：

尸体上有一些黑红或褐色的硬壳状的伤疤，可能是磨损伤疤或干的烧伤疤，但伤疤附近并没有明显的致命伤。

上面提到的这些伤疤有一处在左臀部，两处在左膝处，右大腿上也有一处圆形伤疤。这份报告在第6页得出这样的结论：

右大腿上的伤疤——显示了炭化痕迹、表皮及真皮的受热反应，这些与烧伤痕迹是一致的。这是一处稍显轻微的致命伤。

左臀部的伤疤——与以上反应相似而且还有一处大水泡。这也是一处稍显轻微的致命伤。

左膝处的伤疤——与以上反应相似但没有致命伤。

“一致”这一限定词说明结论缺乏确定性，存在其他解释的可能。考虑到报告中提到的其他解释（磨损伤）、尸体的腐败状态以及上述尸检报告中模棱两可的语言，这些伤是否是烧伤还存在着明显的不确定性。

而且，纵然这些伤是烧伤，司法病理学家在区分行为是属于预谋还是临时起意时并没有提到这些伤。这是一个难题，需要对烧伤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根据皮特尔等人（Pelteir et al.，1997）：

孩子们出于各种原因被烧伤……一份记录详细的病史（包括以前的外伤、最近的病痛、免疫情形、通常的用药情形等）是很重要的。受伤情形的记录是仔细的，包括照片和书写。

.....

故意造成的“烙印伤”（branding）能反映出引起烧伤的物体（如打火机和熨斗），这些伤比无意接触这些物体造成的烧伤要深得很多。无意烧伤大多在发热物体（如热蒸气熨斗）被无意碰到或跌落时发生。无意烧伤一般是二度伤，如果熨斗跌落时接触到身体不同部位则会造成多处伤。

.....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

- 烧伤是在哪里发生的？孩子能否独自够得着这些地方？
- 孩子通常能接触到这些引起烧伤的东西（如打火机）吗？
- 东西多重？孩子多强壮？比如说，这个蒸气熨斗是小孩可以拿得动的供旅行携带的小型号，还是非常重的那种家庭用的大型号？
- 是否缺乏引起烧伤的其他重要因素？
- 物体如何加热以及它从加热到引起烧伤经历多长时间？
- 烧伤是清晰的、规则的、能明显反映出物体外形的还是模糊的、不规则的、由于突然接触而导致的？
- 一些可以清晰分辨的烧伤，尤其是对一些年龄大点的孩子来说，可以清晰地反应出是由于孩子无意碰到所致还是有人恶意烫伤孩子。
- 有否多处烧伤以及其他已经治愈的烧伤？
- 孩子在玩或者接近这些受热物体之前是否受到过惩罚？

蒙特莱奥（Monteleone，1996）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故意的香烟烫伤通常更深而且疤痕面积更大”。

另外，在这份报告中并没有将这些烧伤分为五个等级，而实际上这种划分是很有意义的。

这份报告在评估所谓的烧伤时，没有对这些关键问题给予关注，当然也没有提到被害人的经历，而这一点对认定事实真相是非常必要的。这位司法病理学专家缺乏仔细调查、认真考虑、科学分类的分析方法，致使其对所谓的烧伤是偶然的引起，还是恶意所为无法作出可靠的判定。

由此可见，这位司法病理学专家连无意伤和故意伤都无法作出可靠的认定，这说明他在报告之前就已经先入为主地作出了故意犯罪的假定。基于自身假定而非客观事实作出的推论结论是不能作为司法鉴定证据的。

2. 肛门附近的伤。尸检报告的第3页描述了被害人肛门附近的伤，这样写道：

就肛门附近部位而言，肛门边缘并没有撕裂，也不太可能发生完全的肛交行为……仅仅在肛门边缘左侧有一处自然撕裂的伤痕，2厘米至2.5厘米长，由于尸体腐败所致，一端比另一端稍显清晰。

然而，罗斯玛丽·阿史伯博士却在法定声明中就这样说道：

肛门附近的伤看起来可能是由钝刀所致。

在这份尸体检验报告中并没有提到此处伤是否是撕裂伤（往往有磨损或挫裂边）、锐器伤或刀割伤（捅、割、切），或尸体腐败所致（DiMiao and DiMiao, 1993; Turvey, 1999）。直到法定声明的时候才对此处伤作出这样的解释。甚至，阿史伯博士拒绝对伤痕进行分类分析，只是说可能由钝刀所致。他解释说这把刀可能在别的地方用过，然后大概变钝了，因为并没有留下锐器刀的痕迹。这种调查方法是还原式的，根据对刀型的假定而提出一种观点，不是根据客观的伤口提出可能使用的刀型。

另外，“可能”这一限定词说明结论缺乏确定性，存在其他解释的可能。事实上，伤口附近大量的昆虫活动以及尸体的腐败状态说明这一伤口很可能是尸体腐败的自然结果而根本不是由故意的伤害行为造成的。根据对伤口状态的其他解释可以看出，阿史伯博士并没有调查其他解释的可能性，而对伤口的解释也是模棱两可的，从中明显可以看出，这一伤口是由钝刀所致这一结论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

3. “性虐杀”的证据。根据罗斯玛丽·阿史伯博士的法定声明：

这种死亡类型可能是由变态性动机引发的性欲谋杀或虐待狂谋杀。在这种案件中，可以在皮肤上找到割伤或抓伤的痕迹。在本案中，这些痕迹可能在死后出现而且轮廓上有血迹。

这一结论的提出并没有充分的理由。

首先，根据伤口的状态并不能排除由于环境和尸体腐败导致的证据动态变化（Evidence dynamics）。

奇瑟姆和特维（Chisum and Turvey, 2000）认为：

在犯罪现场重建过程中不考虑证据动态变化很可能对证据作出错误的解释，导致不准确或不完整的犯罪现场重建。在随后的侦查、审判或行为分析中使用这一重建结论就失去了正确的根基，而在侦查、审判、法庭辩论中就会带来相应的危害。法庭科学家有责任认真地根据与犯罪有关的环境和行为进行犯罪现场重建，而且尤其要注意证据动态变化的可能性，以便在犯罪现场重建中能最科学、最准确地使用证据。

其次，由理查德（Richard）提出的刺激性术语“性虐杀”是一个不具体、几乎可以用来描述所有的因性动机而引起的谋杀，与术语“性谋杀”（sexual homicide）很难区分开来（Baze and Turvey, 1999），而且，与“虐待狂杀人”（sadistic killing）也不属于同义词。作为性虐待行为的证据要求犯罪现场具备下列三个要素：有意识的被害人、持续的一段时间（重复的不致命伤可供证明）、有证据证明犯罪人得到性满足（Baze and Turvey, 1999）。而本案中，被害人因伤害而死亡、犯罪人的性满足只能凭假定而未能证实（被害人的性器官没有受到侵害，没有性交插入的证据，肛门附近伤的描述也是模棱两可），而在本案中每个要素都不具备。

对这一问题在比兹和特维（Baeze and Turvey, 1999）关于性虐待行为的综述中也有讨论，他们说：

有人将恋尸癖解释为性虐待，要让被害人再次承受犯罪人性唤起的痛苦。但死人并不知道痛苦。对性虐待作出最有帮助和最有力解释的大概是迪兹等人（Dietz et al., 1995）：

性虐待是一种持续的行为模式，行为人能从别人的痛苦中获得性幻想。……造成伤害即意味着创造痛苦，也是为了从别人对他的顺从、屈服、耻辱、恐惧和害怕中获得满足。

总之，明显可以看出，罗斯玛丽·阿史伯博士有关本案犯罪现场重建、犯罪分类的观点是模棱两可的、还原性的、不完全的、见识狭窄的。因此，这些观点并不是假设检验式的，没有考虑其他的解释，也没有运用其他合理的刑事分析方法。

犯罪现场特征

现场地点和类型：第一现场（primary scene）是犯罪人对被害人实施了主要攻击或袭击的地点。抛尸现场（disposal scene）或倾倒现场（dumpsite）是发现尸体的地点（Turvey, 1999）。发现利恩·霍兰德尸体的户外现场明显是一个抛尸现场。然而，死亡现场或原始现场还没有找到。然而，并没有侦查人员在抛尸现场附近搜索原始现场的记录，尸体周围很开阔，附近不太可能再有潜在的原始现场。然而，也没有证据记录表明其他地方可能成为本案的第一现场或第二现场。

注意：本案中斯坦福德的后备箱被认为是第二现场。因为在后备箱里发现了一条蛆，在毯子、布和袋子上发现了血迹。蛆只有一条，因此它的出现是明显的。然而，根据本案尸体的DNA检验，这条蛆与被害人并不能认定同一。根据DNA检验的结果，后备箱里发现的滴落的血滴与被害人也不能认定同一。另外，如果假定后备箱里发现了脱落毛发或尸体组织，则说明尸体腐败已经发生了。但弗仁尼（Freney）的报告中却指出袋子上的血迹明显是新鲜的，没有发生腐败现象。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很明显，审理本案的法官不会认为被害人的尸体曾放在这辆车的后备箱中。

接触地点：这是指犯罪人首先接触或得到被害人的地点（Turvey, 1999）。本案中缺乏可靠的证据以及被害人的实际活动，即使被害人曾经被熟人看到，也不能对当时双方接触的地点提出可靠的论断。

注意：警方并没有发现被害人的鞋、袜子、背包或购物袋。如果这些东西在她家里被发现，那么很可能她回家后遇害。如果家里没有找到这些东西，那么它们出现的另一个地方就极有可能成为原始现场或接触地点。

犯罪工具的使用：最有可能造成被害人头部伤的是一种钝器，然而与犯罪有关的地点都没有找到这种工具。本案中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使用了其他工具。

被害人反抗：这是指袭击发生时被害人反抗的数量及类型（Turvey, 1999）。被害人手背的青肿伤证明她曾实施过反抗行为。极有可能是当袭击发生时被害人用手抱着头以免头部受打击。

接近方式：这是指犯罪人接近被害人的策略（Turvey, 1999）。本案中缺乏可靠的证据以及被害人的实际活动，即使被害人曾经被熟人看到，也不能对犯罪人接近被害人的方式提出可靠的论断。

攻击方式：这是指当犯罪人与被害人接近的时候，犯罪人起初用强大的力量制伏被害人的方式。通常可以把这种攻击方式描述为利用工具型和徒手型（Turvey, 1999）。很明显在袭击的某一时刻，由于被害人没有屈服而犯罪人便使用钝器实施了一种出于惩罚的暴力。这种对被害人头部猛烈的、重复的打击也造成了被害人手背的青肿伤。在特维（Turvey, 1999）看来，出于惩罚的暴力被定义为“残忍的、短暂的、造成了大面积严重伤害的暴力。通常当这种暴力案件发生时，要立即将被害人送往医院，否则被害人就会因此而毙命。明显地，在这类案件中谋杀并不必然是犯罪人期望发生的结果”。

同样也有证据表明，犯罪人实施的暴力行为也显示出犯罪人试图操纵、控制、限制、征服被害人的意图，即下面讲到的出于控制的暴力（Turvey, 1999）。

控制方式：这是指在攻击期间，犯罪人操纵、控制、限制、征服被害人的各种方式（Turvey, 1999）。本案中的控制方式是徒手，在被害人的前臂和脖颈处留下了手掐的青肿伤。在尸检报告中，窒息并没有被列为导致死亡的原因。本案中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使用了其他控制方式。

性行为：犯罪现场的照片与尸检报告是明显一致的（除上文讨论过的肛门附近伤以外），本案没有证据显示犯罪人实施了性侵害。

注意：现场发现的尸体是半裸的，背部下方、屁股、腿和脚是裸露的。这可以部分地由拖拉过程来解释。然而，没有证据显示犯罪人实施了性行为或性侵害。

口头语：不知道。

预谋或反侦查行为证据：反侦查行为是指犯罪人为了掩盖自己身份、与犯罪的联系或犯罪事实本身，而在犯罪前、犯罪中或犯罪后实施的试图迷惑、妨碍、逃避侦查或司法活动的行为。反侦查行为可显示犯罪人在各个犯罪阶

段的谋划。本案中原始现场的选择明显就是一项反侦查行为。

注意：如果抛尸现场周围确定没有原始现场，那么将抛尸地点与原始现场分离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反侦查行为，而且，被害人的头发已经被染成了红色或赤褐色。如果被害人不可能自己染发，如果犯罪人不是出于惩罚而对被害人染发，那么染发就是一项明显的反侦查行为以掩盖被害人的身份。

动机问题：这是指犯罪人情感上或心理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在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时获得满足。在本案中，犯罪时间、犯罪人的努力程度、暴力的残忍程度都支持这样一个结论：犯罪人是由于愤怒、渴望报复而实施了犯罪行为。愤怒—报复动机在汇集狂暴的行为中得到证明，或者指向某个特殊的个人、群体、组织，或者指向具有个人、群体、组织的某种象征。这种动机经常公然表现在过度的或残忍的暴力行为中（Turvey，1999）。本案中显示动机的行为已包括、当然可能不限于此：

对被害人头部残忍的多次重重打击。

在复审人看来，愤怒和报复动机并不直接对准利恩·霍兰德，可能是与被害人并无关联的积累许久的愤怒引发了这一行为。

注意：我们并不清楚被害人的内裤和衬衫是如何被撕破的，可能是由于转移、拖拉或与犯罪人扭打而造成的。我们更不清楚被害人在犯罪现场是如何停止活动的。如果犯罪人故意将被害人下身裸露地留在犯罪现场，那么这一行为可能是由特定动机支配下实施的行为。然而，这也可能是由于犯罪人在抛尸时被人发现或匆忙离开而造成的。

犯罪人特征

犯罪人特征用来描述实施了特定犯罪行为的人，其中包括可以描述任何不相识的人的特征，如生理、心理、社会、地理或亲属等特征（Baeza et al.，2000）。

性别：本案的侦查假设中明显包括一个预想观点（被当做事实的），即本案的犯罪人只有一个，而且是男性。这一假设的前半部分不一定是正确的。有证据表明尸体旁边的泥土中有两种不同的鞋印。这一假设的后半部分既不能被本案中的证据完全支持，也不能被完全否定，要依赖于以下两个问题：

本案并没有性攻击的可靠证据。纵然肛门附近的撕裂伤与犯罪人对臀部

的攻击有联系（尚未得到证实），这也不是男性犯罪人的明显证据。

愤怒和出于惩罚的暴力行为说明，如果本案是由一个女性所为，那也是一名非常像男性攻击者的攻击行为。考虑到与被害人年龄相关的其他因素，侦查人员更应当加倍努力地去排除她所有的监护人作案的可能性。

对犯罪现场的了解和熟悉度：犯罪人对抛尸地点的选择显示了他对现场周围环境非常了解，高度熟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靠近红岸平原大街而言，这一地区又是很公开的。来去附近城镇的居民或游客很可能来过并熟悉这里。

技能水平：尽管在本案中犯罪人的反侦查行为很明显，但他还是在现场留下了大量物证。由于尸体被放置在比较公开的区域，这些物证就很容易被发现，并被确定与犯罪的联系。虽然有预谋和反侦查行为，但犯罪人的谋杀水平并不高。

与被害人的熟悉度：通过这份报告中对被害人的风险和犯罪动机的分析，我们从犯罪事实和现场环境来看，犯罪人不需要对被害人熟识。但考虑到犯罪人对被害人明显的疯狂报复，也不能排除双方熟悉的可能性。

侦查建议

下面列出对本案进一步侦查的建议：

1. 根据《为皇室而辩护的纲要》（the Outline of Submissions on Behalf of the Crown）进行 DNA 检测，考克瑞斯亨·班特里（Kristine Bently）在 1996 年 6 月 26 日的报告中提到了血液检验的证据。但至今在报告中没有看到对此详细的阐述。在检验的内容、进行检验的地点、每项证据检验的结果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的混乱。这些混乱可能是由于在上诉案件中法官和陪审团过分信赖血液检验证据而造成的。审查者强烈要求先前所有的血检验结果必须重新确定，并由独立的司法血液学专家审核。与犯罪证据有关的所有血液必须进行 STR DNA 检验。

2. 移开被害人家中浴室内的护壁板看看这些地方有没有血迹。

3. 在格雷厄姆·斯坦福德的汽车后备箱中发现了不知是谁的头发。应该由毛发纤维专家将这一头发与被害人的毛发样本进行比对检验。对有发根的尽量做 STR DNA 检验，没有发根的可以做线粒体 DNA 检验。

4. 在格雷厄姆·斯坦福的汽车后备箱中发现了一条蛆。应该将这条蛆进行 STR DNA 检验，与已知的被害人 STR DNA 检验结果进行个体识别比对。

5. 从尸体照片上可以看到警方用刻度尺测量被害人臀部的一处伤口，就在刻度尺右边有一根短的、较隐蔽的毛发。应该确定这根毛发是否已经被警方注意到并提取。如果提取，毛发应当送检并由毛发纤维专家将这一头发与被害人的毛发样本进行比对检验，并对有发根的毛发尽量做 STR DNA 检验。

6. 本案材料中并没有提供对手指甲进行检验的说明，虽然这些手指甲检材已经提取并呈送给了克瑞斯亨·班特里。这些生物组织应该得到检验。如果这些组织还在的话，应该做 STR DNA 检验。

7. 被害人浴室里的箱柜中发现了一团头发。报告中并没有提到对这些头发的检验分析。应当由毛发纤维专家将这些头发与被害人的毛发样本进行比对检验。应当确定这些毛发是否被染色，如果被染色，那么是什么颜色。对有发根的尽量做 STR DNA 检验，没有发根的可以做线粒体 DNA 检验。

8. 在被害人的尸体下方发现了塑料袋。应该运用真空金属镀膜（Vacuum Metal Deposition）技术检验塑料袋上是否留存有指纹。同样也应该与被害人家中未使用的塑料袋进行比对检验。不仅要检验塑料袋的牌子、大小、类型，而且要检验塑料袋的个体特征，如机器压过留下的膛线。撕开的塑料袋应该连在一起，以便进行相同的检验。

9. 邀请血迹专家复查本案中的所有血迹，尤其是在格雷厄姆·斯坦福汽车里发现的血迹。血迹是滴落还是涂抹到物体上去的？这些血迹是新鲜没有腐败的吗？这些血迹是如何带到这些地方的？由专家判定起诉方提出的“衣服上没有血迹观点”的正确性。

10. 邀请法庭昆虫学家检验本案中的昆虫。这些昆虫告诉了我们有关犯罪现场的什么信息？能确定死亡时间吗？检验在格雷厄姆·斯坦福汽车里发现的蛆，判定蛆的年龄，并且由蛆的生长时间判断被害人可能的死亡时间。如果这个时间段能确定的话，可以确定当时谁有机会动用这辆车。

11. 目前，对被害人的内裤和衬衫是撕破还是割破存在不同意见。割意味着犯罪人使用了武器，撕意味着被害人曾经有过反抗。应当从有关内裤和衬衫的现场照片中确定到底发生过什么。

12. 被害人的前男友是本案中的一位目击者。他提供了有关犯罪嫌疑人

和被害人活动的一些信息。调查他在 1991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到 9 月 26 日（星期四）的活动情况，并与证词相互印证。

13. 根据特伦斯·霍兰德和格雷厄姆·斯坦福德的证词，利恩于早晨 9 时 30 分离家去购物中心见一个朋友。为确定这位朋友的身份，警方调查了被害人的一些女性朋友，然而，却很少调查与被害人有交往的年龄不相称的男性朋友。应该将这些男子列出名单并作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14. 向特伦斯·霍兰德、格雷厄姆·斯坦福德、梅丽莎·霍兰德深入调查那天与被害人在购物中心会面的朋友可能是谁。

15. 在格雷厄姆·斯坦福德被捕之后，附近另一名 12 岁的女孩被害。应该仔细调查这起案件的细节并与利恩被害案比较。

16. 仔细查阅被害人的日记以便发现犯罪嫌疑人线索并得到更深入的被害人的信息。

17. 从电话公司记录中查阅被害人失踪期间打进和打出被害人家的电话信息，很可能发现嫌疑线索。

18. 复查在被害人家附近、看到被害人的地点附近、被害人来往路线附近、犯罪现场附近警察走访的记录，可能从中会发现嫌疑线索。

19. 复查有关在这些地区使用交通工具（停车或违章）的警方记录，可能从中会发现嫌疑线索。

法庭科学家对驳回上诉的看法

很明显，戴维斯（Davis）法官和麦弗逊（Mcpherson）法官都认为，斯坦福德是有罪的，因而不需要重新审理。他们是基于下述证据而作出的结论：第一，在斯坦福德的车里发现了少量血迹，显然，他们认为这是被害人的血。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血迹并没有通过现代 DNA 技术检验而认定血的来源，也没有尸体转移的可靠证据。因此，这里的血迹可能与被害人或这起谋杀案没有任何关系。第二，在被害人家的浴室里发现了少量血迹，明显地他们认为这是被害人的血。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血迹并没有通过现代 DNA 技术检验而认定血的来源，也没有尸体转移的可靠证据。因此，这里的血迹可能与被害人或这起谋杀案没有任何关系。第三，在斯坦福德的车里发现了一条蛆，明显地他们认为这条蛆与被害人有关。应当注意的是，这条蛆并没有通过现代 DNA 技术检验而认

定其来源，因此，这条蛆可能与被害人或这起谋杀案没有任何关系。

基于他们对有罪证据不合理的信任，本案中的两位法官至今没有区分这样两种概念，即刑事同一认定（同类特征）与刑事个体认定（个体特征）。这可能与本案起诉中法庭科学家提出的专家证词的质量有关。科克（Kirk，1974）曾经深入讨论了司法认定的问题，他提到：

不称职的或有偏见的证人作出的认定很可能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他对认定本质的认识模糊、对观察结果的评估不妥或者因为他用来得出结论的技术存在缺陷。

桑顿（Thornton，1997）对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司法问题作出了最充分的解释，他提到：

§ 20 - 2.1 种类特征和个体特征

在物证的比较中，运用种类特征和个体特征这两个概念通常是很有帮助的。种类特征是指能够从所有不同的事物中区分出一组特征相同的事物。在比较过程中，种类特征在排除不同类事物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种类特征并不能确定事物的惟一性；另一方面，个体特征是能确定事物惟一或独一无二的特征。孤立地看，一个单独的个体特征并不是惟一的，但一系列个体特征的组合就能确定其惟一性。例如，子弹上的一道划痕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子弹上所有划痕的组合排列就使得这颗子弹独一无二。

例如，“红色”是一种种类特征。“红色”这一特征将红色物体与别种颜色的物体区分开来。种类特征的组合能够优化扫描或排除过程。“红色别克车”这一特征能够迅速排除别的汽车，但并不能在一堆“红色别克车”中认定是哪一辆。通过种类特征进行排除有其基本的数学原理，即布尔代数（Boolean algebra）中的“或者”逻辑。任何一辆“非红色别克车”能够被排除是因为它“或者”是其他物体“或者”是其他颜色。

个体特征的例子是汽车牌号。这个号码可能是一种个体特征，但同样的号码可能存在于其他州或其他国家。

明显地，血液证据，除非运用 STR 或 RFLP 技术进行了分析，否则不能用做同一认定（Saferstein，1998）。毛发证据也是如此，除非运用 STR 或 RFLP 技术进行了分析，否则不能用做同一认定。它们都是种类证据（Saferstein，1998）。如果缺乏最初来源的样本，那么所有有关它们的认定检

验都仅仅是一种假设而不是结论。起诉方邀请的法庭科学家的明显失败之处就在他们实际上向法庭和陪审团解释了本案中种属证据的局限性，而这一问题却是骇人听闻的。

另外，两名法官认为无须进一步证明起诉意见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案件事实超出合理怀疑的限度，这简直是对法律公正的公开侮辱。这种影响是双重的。首先，这种做法单方面减轻了起诉方的证明责任，因为在法庭上提交给法官和陪审团的起诉意见可以是不确定的。其次，这种做法减少了对法庭科学家的需求，因为任何一位法庭科学家只要能使陪审团相信他对复杂物证的解释和重建就可以了，而不论这份专家证言是否可靠。在这两种情况下当然不需要理性的质疑（见附图4）。

最后有必要援引一位博学的法庭科学家和学者对此问题简洁而理性的论断作为本文的结尾（Chisum，1999）：

起诉方为了证明被告有罪而使犯罪行为显得更可恶。辩护方却极力证明被告无罪。双方对犯罪事实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二者都是不确切的、缺乏建设性的，很可能都是错误的。只有证据才能证明一切。



a



b



c

利恩·霍兰德的尸体和户外弃尸现场（由警方提供的照片）

附图4

参考文献

1. Baeza, J. , Chisum, W. J. , Chamberlin, T. M. , McGrath, M. , and Turvey, B. (2000) " Academy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Criminal Profiling Guidelines",

- Journal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1 (1, January).
2. Baeza, J. and Turvey, B. (1999) "Sadistic Behavior: A Literature Review", Knowledge Solutions Library, Electronic Publication, URL: <http://www.corpus-delicti.com/sadistic-behavior.html>, May, 1999.
 3. Chisum J.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Crime Reconstruction" in Turvey B. Criminal Profiling: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vidence Analysis, London: Academic Press.
 4. Chisum, W. J. and Turvey, B. (2000) "Evidence Dynamics: Locard's Exchange Principle and Crime Reconstruction", Journal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1 (1, January).
 5. Dietz, P., Hazelwood, R., and Warren, J. (1995) "The Criminal Sexual Sadist", in Burgess, A. W. and Hazelwood, R. (Eds.) Practical Aspects of Rape Investiga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2nd ed., New York: CRC Press.
 6. DiMaio D. and DiMaio V. (1993) Forensic Pathology, New York: CRC Press.
 7. Kirk, R (1974) Criminal Investigation, 2n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8. Monteleone, J. (1996) Recognition of Child Abuse for the Mandated Reporter, 2nd ed., St. Louis: GW Medical Publishing Inc.
 9. NMRP (National Medicolegal Review Panel) (1999) Death Investigation: A Guide for the Scene Investigato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10. Peiteir, P., Purdue, G., and Shepard, J. (1997) Burn Injuries in Child Abuse,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OJJDP),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11. Saferstein, R. (1998) Criminal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Science, 6th ed.,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2. Thornton, J. I. (1997) "The General Assumptions and Rationale of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in Faigman, D., Kaye, D., Saks, M., and Sanders, J. (Eds.),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Law and Science of Expert Testimony, Vol. 2,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
 13. Turvey, B. (1999) Criminal Profiling: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vidence Analysis, London: Academic Press.

附录五 初始评估： 伊利诺伊州诉杰尔拉德·西蒙斯案

Angela Torres, B. A.^①

发现尸体时间：1992年6月26日（星期五）在早晨4时35分左右、一名过路的汽车乘客发现了尸体。

侦查机构：马里恩郡（Marion County）治安官部、费特郡（Fayette County）治安官部、马里恩郡验尸官（coroner）部、弗瑞纳（Farina）警方、第12地区的州警方及刑事侦查部门。

在复查了案件材料之后，审查人认为辩护方并没有很好地利用本案提供的物证。辩护方没有邀请独立的法庭实验室或法庭科学专家对本案中复杂的生物物证和血清物证进行检验。另外，其他一些已经完成的检验明显是偏袒辩护方的，其中包括血型分析、伤口病理学分析以及犯罪现场重建专家的结论，甚至某些物证检验的结果也并不支持辩护方的结论，如在被害人左眼附近发现的类似精液的物质。

初始评估被视为一种“侦查手段，用来审查某一特定案件的行为、被害人、犯罪现场特征的原始物证，以期尽快破获案件（Turvey, 1999）”。侦查人员将初始评估作为一种“活动计划”来引导侦查。

法庭科学的基本理论是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这是一条最基本的原理，意思是指进入犯罪现场的任何事物或任何人，都会带走证据并留下证据（Saferstein, 2001）。本案中典型的例子是杰尔拉德·西蒙斯（Gerald Simonson）

^① 安吉拉·托雷斯（Angela Torres）在位于伯克利（Berkeley）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刑事司法心理学专业学士学位。2000年她在实习期间接触了各种案件并进行了研究，在得克萨斯完成了司法心理学研究生课程。她目前是“行为画像协会”的一位学生成员。

的内裤沾上了谢乐尔·麦克林（Sheryl McLean）的血迹，同时在谢乐尔的尸体上留下了自己的毛发。

批判性思维是任何侦查活动中最核心的部分，它要求积极地运用信息检验假设（Turvey, 1999）。与仅仅吸收信息相比较，批判性思维能为侦查活动开辟新的思路。

逻辑性分析是侦查人员或案件审核人员所应具备的研究所有文件、照片、实验室结论和犯罪现场以形成逻辑性结论的思维能力。通常这些结论都以假设的形式出现，随后用案件事实加以证明（Thornton, 1997）。

证据从提取到呈送给法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变化，证据会有意无意地发生变化甚至消失。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证据动态变化过程。

审查

“伊利诺伊州诉杰尔拉德·西蒙斯（Gerald Simonson）”这一案件的初始评估是基于以下材料作出的：

涉及西蒙斯案件的新闻报道剪报

犯罪现场照片

尸体检验照片

警方的报告

犯罪实验室的各种报告

有关杰尔拉德·西蒙斯的实验室报告和医学报告

与犯罪嫌疑人、目击者及其他人员的访谈记录

背景

1992年6月26日，一名过路的汽车乘客在简哈鲁斯（Jaharus）家前面发现了一具赤裸并被殴打过的尸体。警方接到报警后来到现场。除了尸体以外，离尸体3米左右的一辆被烧毁的汽车也引起了警方的关注。这辆车是死者麦克林（McLean）的，据分析，有人用助燃剂点火并烧毁了这辆车。罗伯特·简哈鲁斯（Robert Jaharus）——尸体发现地点的房主，告诉警方那天凌晨1时10分左右他家的狗狂吠了一阵。他出门探看并朝狗棚开了一枪以便使狗停止叫喊。同时，他告诉警方当时他听到了邻居杰尔拉德·西蒙斯的声音。西

蒙斯在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但却听不清。据此，警察到隔壁杰尔拉德·西蒙斯家里检查。他们发现，他家里没人，但在进入车库时却发现西蒙斯躺在地板上。当护理人员来到时，他说了几句诸如“别再从后面袭击我”之类的话。

医院对杰尔拉德·西蒙斯进行了医学检查。根据警方的要求，按照通常的程序，他的衣服被作为袭击被害人的证据。体检结果表明他一切正常，即使脑部后侧受到打击也没有发生神经损伤。医务人员对于西蒙斯脑部是否有另外的伤意见不一，但是发现他血液酒精浓度很高。据推测，那晚9时30分左右，也就是他说他遭袭击的那段时间，很可能血液酒精浓度达3.2%。

从医院出来之后，警察对杰尔拉德·西蒙斯进行了讯问。讯问之前，警方告诉他：他将是谢乐尔·麦克林谋杀案的犯罪嫌疑人。他反复问：被害人是谁。警方告诉他，谢乐尔·麦克林被人谋杀了，他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最后看到谢乐尔·麦克林的人证实，被害人当时跟喝醉的杰尔拉德·西蒙斯在一起。西蒙斯被审讯，并因实施了性侵犯和一级谋杀而被起诉。

被害人分析

被害人分析是一种重要的侦查分析方法，通过分析被害人特征能确定被害人在被害前和被害中的行为与案件本身的联系。这些线索有助于谋杀案件的侦查。这种分析涉及有关被害人的所有信息，其中包括下面一些因素，如性别、年龄、经历、潜在风险度等（Baeza et al.，2000）。

姓名：谢乐尔·麦克林（Sherly Sue Mclean）

种族：高加索人

性别：女性

出生日期：1964年11月26日

年龄：27岁

身高：160厘米

体重：50千克

头发：褐色

居住地：塞伦学院613号

居住类型：公寓住宅

交友：麦克林在死亡前刚离婚。她丈夫对她滥施暴力是离婚的原因。死亡前不久双方还有联系。认识她的人都不太知道她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交往。

社交经历：所有的人都认为，谢乐尔·麦克林是一位可爱的、谦虚的、健谈的姑娘。最近她刚辞去了在塞伦的双胞胎护理院的护士职位，以便使自己有时间作为耶和华受难礼拜的志愿者。她同时也在油炸圈饼店做兼职。她的同事认为她“是友好的、健康的……也是谦恭的、非常和蔼可亲的”。

家庭情况：不太清楚

既往病史和精神病史：没听说她得过什么病。

抽烟习惯：她不抽烟。

生活方式风险度：生活方式风险常常与意外风险（Incident risk）相比较。生活方式风险是指根据一个人的个性、生活习惯和生活状况而可能遭受到的伤害风险（Turvey, 1999）。对任何伤害来说，谢乐尔·麦克林女士的生活方式风险都非常低。这是因为：

穿戴和行为举止都很谦逊；

没有男朋友；

热衷教堂的事务；

不滥用药，不酗酒，不沾毒品。

惟一能提高她生活风格风险的是她与过去的暴力丈夫之间的关系，以及她太容易相信别人的个性。

意外风险度：意外风险是指被害人面临死亡时，由情绪状态和当时环境因素决定的潜在风险。谢乐尔·麦克林女士的意外风险度呈中等水平，因为：

单独与并不十分熟悉的男子工作时相处得很好；

当她意识到自己单独跟陌生男子相处时仍不及时离开；

纵然杰尔拉德·西蒙斯明显喝醉了，她仍没有离开，并让他在她面前继续喝酒。

尸检的质疑分析

1992年6月26日下午3时左右，亨廷福德（Heidingsfelder）教授在玛丽医院的太平间中对尸体进行了检验。这份报告和验尸官的调查都是很全面、很仔细的，但是仍然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确认：

1. 被害人颅骨左上方的击打伤痕迹与锤子并不一致。对这个问题要深入分析而不能假定在整个袭击过程中只用了一种工具。

2. 亨福德教授提到麦克林女士的尸体上沾有她自己的血迹。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一血迹是打斗的结果，还是犯罪人故意涂抹到尸体上的。这有可能启发人们联想到犯罪人在犯罪后的行为，这对于行为画像是非常重要的。

对其他侦查结论的质疑分析

在审查者看来，下面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

1. 家里和在前院发现的血迹应该由血迹分析专家和犯罪现场重建专家深入研究，以确定犯罪人在犯罪前、犯罪中、犯罪后的行为。
2. 对那辆烧毁的汽车进行更加深入、仔细的研究，以发现证据。
3. 在被害人身上发现的类似精液的物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检验。

犯罪现场特征

现场地点和类型：谢乐尔·麦克林女士的尸体是在简哈鲁斯家的前院里发现的，往南距离詹妮哈里大街（Jennie Haley Rd）和林肯大街的交叉地带仅0.5米。据怀疑，开始袭击发生在隔壁杰尔拉德·西蒙斯的家里。

接触地点：是犯罪人最先遇到被害人的地点（Turvey, 1999）。最可能的接触地点是在被害人的汽车中。在被害人头发里发现的挡风窗玻璃碎片可以证明这一点。

犯罪工具：本案中犯罪嫌疑人袭击被害人时使用的工具是锤子，后来在西蒙斯家里发现了这一工具，上面还有血迹。

接近方式：是指犯罪人接近被害人的方式（Turvey, 1999）。最可能的是当时西蒙斯在家里以及独自在车库和前院里袭击被害人的。

袭击方式：是指犯罪人首先制伏被害人的方式。最可能的袭击方式是犯罪人用钝器通过击打挡风窗玻璃而袭击被害人的。

控制方式：是指犯罪人控制、征服被害人的方式。被害人身上多处抵抗伤和在肩部发现的青肿伤说明，犯罪人极有可能是跪在被害人身上击打她的。

使用暴力：是指犯罪人在袭击过程中使用的暴力等级。从被害人手部严

重的撕裂痕和青肿伤可以看出，犯罪人使用暴力的程度非常高。

被害人反抗：是指被害人不屈服而反抗的类型（Turvey, 1999）。麦克林女士尸体上的多处抵抗伤说明被害人有过反抗。她的尸体与最先袭击的地点有一段距离，说明她曾试图从攻击者手中逃跑。

性行为：麦克林女士的尸体被发现时是赤裸的。因此，杰尔拉德·西蒙斯被起诉并被法庭判定实施了性侵犯行为。在任何性侵犯检查部位（口、肛门、阴道）中都没有发现精子。然而，在被害人左眼附近发现了未被确认的类似精液的物质。很明显，这一物质没有得到检验。

口头语：罗伯特·简哈鲁斯（Robert Jaharus）证实，他在麦克林死亡的那段时间听到了杰尔拉德·西蒙斯的声音，他在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简哈鲁斯能确信这是杰尔拉德·西蒙斯的声音，因为他明显听到了西蒙斯“Minnesota twang”的发音，虽然没听清说的是什么。

预谋和反侦查行为证据：反侦查行为是犯罪人在犯罪前、犯罪中、犯罪后为了妨碍侦查和毁坏证据而实施的行为。麦克林的车停靠在一间废弃房屋旁边3米处。汽车被严重烧毁以致发现不了任何物证，一定是使用了某种助燃剂引发了燃烧。另外，在被告人家里，尤其是浴缸里发现的血迹说明，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洗了澡，以除去血迹和其他物证。可能这也改变了犯罪人的衣着：一位邻居证实，西蒙斯当天的穿着与发现他时的穿着截然不同。

侦查建议

下面列出了对本案进一步侦查的建议：

1. 辩护方应当邀请一名独立的、博学的血清学和DNA证据专家来解释由州方代表提出的资料。另外，大量“不确定的”和“被污染的”DNA样本应当送到独立的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2. 辩护方应当邀请一位法医病理学专家对伤口作出分析。布伦特·E. 特维（Brent E. Turvey）是一位法庭科学家，他认为，被害人头部左上方的伤

能够支持犯罪工具不只一种的可能性（Turvey, 2000）。^①

3. 现场遗留的足迹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行走模式。法庭科学家应当弄清楚，西蒙斯是否有同样的行走模式。

4. 辩护律师应当追问被害人身上发现的类似精液的物质检验的结果。

5. 辩护律师从来没有问过发现尸体的前院中奇怪的圆圈以及被害人血迹上的苏打水是怎么回事，这些可能将本案与邪教或第三方的活动联系起来。

6. 辩护方没有邀请犯罪现场重建专家来帮助分析现场。而且，辩护方也

① 特维的书面陈述包括下列推理过程和观点（Turvey, 2000）：

“（1）被害人头部左上方区域的伤呈现不规则和混乱的特点，与被害人头部左下方区域新月形的伤在形状、大小、方向上都存在着差异。新月形的伤与锤子打击的痕迹一致（如19号的拔钉锤），而其他的伤则缺乏这一形状。这就明显证明了犯罪人使用了至少两种工具袭击被害人。审查者没有看到有关这种可能性的报告。审查者怀疑被告方是否邀请了在伤痕分析领域的法庭鉴定专家（如犯罪现场重建专家或法医病理学专家）对被害人的伤作出检验，而且怀疑他们是如何确定犯罪事实的。

（2）本案中有大量的物证，但却没有一名犯罪目击者。这些物证中包括血迹证据，血迹不仅与被告人的家、衣物相关联，而且与被害人的尸体、衣物、处理证据的现场相关联。审查者怀疑被告方是否邀请了在犯罪现场重建或血迹分析领域的法庭鉴定专家对这些证据作出检验，而且怀疑他们是如何确定犯罪事实的。

（3）本案中有大量的生物物证，州实验室用这些物证做基因检测，包括DNA检验，随后与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样本比对。审查者怀疑，被告方是否也邀请了在血清学和DNA检验领域的专家在这项令人畏缩的、复杂的任务中帮助复查和解释这些结果。如果没有这样一位专家，辩护律师将不能清晰地理解州实验室检验结论的含义以及这些结论对本案的重要意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将不会理解这些证据的重要性，也不知如何预先审核这些结论，最后也不能分辨未经检验的证据的可靠性。

对物证完全而有力的分析能够客观地看待与案件有关的事实。这种分析在确定犯罪的总体环境、建立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及犯罪人之间的联系、确定目击者或被告人的陈述、提供侦查指导、认定犯罪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缺乏这种知识，我们就怀疑辩护律师是否弄清了案件事实及与犯罪有关的情况。同样也怀疑辩护律师是否理解了起诉方的观点，怀疑他是否知道什么样的证据才是本质上能作为无罪辩解的证据。

上述问题在本案中真实存在着，本案中物证如此之多，被告方也作出了辩护，但辩护与物证必须相互对应才能确定辩护的正确性。作为一名法庭科学家和一名对涉及复杂而多样物证的案件进行常规检查的专家，我认为，在上述问题上失误的法庭科学家对辩护方来说至少是不负责任的、不称职的。希望本案能够对被告人、相似案件中犯同样错误的专家、邀请这些专家的起诉方和辩护律师给予应有的警惕。”

没有对在下面两处地方发现的血迹作出任何解释：

（1）在西蒙斯内裤上发现的血迹，看起来这些血迹好像是渗出来的，但没有人知道血迹是从哪里来的。

（2）在杰尔拉德·西蒙斯家里发现的血痕。

7. 没有对杰尔拉德·西蒙斯家里的助燃剂或使用过助燃剂的人进行调查。

8. 辩护律师应当邀请医生来判断在高浓度酒精的作用下，西蒙斯头部受到轻微打击以后，是否会出现无意识状态。

9. 在犯罪现场发现的口香糖从来没有做过 DNA 检验，这可以通过提取唾液的上皮细胞来完成。同样，也没有调查麦克林或西蒙斯通常是否咀嚼这种牌子的口香糖。

10. 据 1992 年 6 月 26 日的警方调查记录记载，当天早晨 4 时 35 分，有一位遭殴打的人曾在现场附近徘徊。但这个人从来没有被纳入侦查视线。如果杰尔拉德·西蒙斯的证词是正确的，那么，他不可能看到这个人，因为此时他正躺在车库的地板上。这可能为侦查第三方犯罪人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11. 没有对在西蒙斯蓝色夹克衫上发现的血迹进行司法鉴定。

12. 本案应该进行血型分析，以确定西蒙斯内裤上的血迹是不是第三个人殴打麦克林时溅到西蒙斯身上的。

13. 值得注意的是，西蒙斯的右腋下最近有一块青肿伤，他说是有人殴打过他，但他的辩护律师却从未提到过这一点。

14. 从来没有对西蒙斯家门前的轮胎印记制模提取，以便与已知的汽车轮胎比较。

15. 西蒙斯手掌上有动物的血迹，这一点从未提起过。

16. 辩护方没有提到是否在西蒙斯家里发现了出现在现场的银颗粒物。

17. 辩护律师也没有指出，当西蒙斯要求律师提供帮助时，汉宾（Henby）警官曾告诉西蒙斯，“无辜的人不需要律师”。这可能是致使本案败诉的关键。

18. 辩护律师也没有提到本案的矛盾之处，其中有第三方存在的可能性。

（1）麦克林的其他衣服在哪里？为什么有些衣服被留在了现场？

（2）为什么西蒙斯将锤子和尸体放入警方视野之内却将汽车烧得面目

全非？

参考文献

1. Baeza, J. , Chisum, W. J. , Chamberlin, T. M. , McGrath, M. , and Turvey, B (2000) "Academy of Behavioral Profiling: Criminal Profiling Guidelines", Journal of Behavior Profiling, 1(1, January).
2. Saferstein, R (2001) Criminal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Science, 7th edn. ,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 Hall.
3. Thornton, J. I. (1997) " The General Assumptions and Rationale of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in Faigman, D. , Kaye, D. , Saks, M. , and Sanders, J. (Eds),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Law and Science of Expert Testimony, Vol. ,2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
4. Turvey, B. (1999) Criminal Profiling :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vidence Analysis, London: Academic Press.
5. Turvey, Brent, Affidavit dated November 23, 2000.

附录六 并案分析： 在加利福尼亚州诉 韦恩·安德姆·福德案

约翰·E. 罗斯（John E. Roth）

独立检察官

大卫·W. 尼格斯（David W. Negus）

主任检察官

根据：约瑟夫·D. 肯迪（Joseph D. Canty）委托

代理检察官

State Bar No. 39007

8303 Haven Avenue

Third Floor

Rancho Cucamonga, CA91730

Phone: 909 (945 - 4100 Fax: 909) 945 - 4295

为被告韦恩·安德姆·福德（Wayne Adam Ford）的辩护律师

加利福尼亚州人，原告，

诉韦恩·安德姆·福德，被告

案号：FSB 027247

布伦特·E. 特维的证词

日期：2001 年 1 月 4 日

时间：上午 9: 00

法庭室号：S19

加利福尼亚上诉法庭

在圣·伯纳丁 (SAN BERNARDINO) 郡庭

我，布伦特·E. 特维向法庭作出书面陈述如下：

我是一名有经验的法庭科学家，尤其擅长犯罪心理画像。我的教育背景、个人经历和其他资格证明已经在履历书中有所说明。

我被邀请来复查本案，是要对本案中的犯罪惯技因素和可能的标记行为作出检验性的说明。在大陪审团审理本案之前，我已经查阅了犯罪现场和尸体照片、侦查报告、尸检报告、证据报告、证词复印件等文件，包括前一阶段“心理画像专家”提供的材料。

基本观点：对事实的认定

我认为，仅仅依靠本案中的物证和行为证据以及被害人特征，^① 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可以通过犯罪惯技和标记能将下列案件并案：洪堡郡 (Humboldt County) 发生的简·窦 (Jane Doe) 被谋杀案、科恩郡 (Kern County) 发生的蒂娜·吉布斯 (Tina Gibbs) 被谋杀案、圣华金郡 (San Bernardino) 发生的兰尼特·怀特 (Lannett White) 被谋杀案、萨伯纳狄诺郡 (San Bernardino) 发生的帕特丽夏·泰米兹 (Patricia Tamez) 被谋杀案。同时也排除了同一个犯罪人实施了这四起谋杀案件的可能性。

作出这一结论的理由如下：第一，单靠物证来并案并不充分确定，需要利用行为证据对上述四起案件中的犯罪惯技和标记进行充分的分析、比较。第二，物证显示，上述四起案件中的犯罪惯技和标记是明显不同的。第三，对被害人知之甚少，导致不能做出准确的被害人画像，关于被害人的已知事

^① 被害人分析是指对被害人信息完全仔细的研究，其中包括被害人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家庭、朋友、熟人、教育、职业、住所、邻里关系等，同时也包括被害人经历和生活风格的背景信息，如总体的生活习惯、爱好、犯罪经历、既往病史等。被害人分析是判定某些犯罪过程必不可少的部分。某些犯罪分析和犯罪心理画像必须依靠被害人分析。

进行被害人分析的目的在于评估被害人在犯罪前的各种风险。这也同样有利于并案侦查。

实并没有太多的价值。

行为证据的不足

单靠物证来并案并不是充分确定，需要利用行为证据对上述四起案件中的犯罪惯技和标记进行充分的分析、比较。

在洪堡郡（Humboldt County）发生的简·窦（Jane Doe）被谋杀案中，死者身份和死亡原因都不清楚。而且尸体被极度肢解，这就意味着找不到丢失的尸块上的伤口。另外，也得不到有关本案的关键信息，例如，被害人特征、接触被害人的地点、被害人的生活方式风险度、犯罪人接近被害人的方式、犯罪人的攻击方式、犯罪人控制被害人的方法、犯罪人使用的犯罪工具、犯罪人的暴力使用、犯罪人的谋杀方式以及其他的犯罪特征，缺乏所有的用来跟其他案件相对比的犯罪惯技或标记行为。

在蒂娜·吉布斯（Tina Gibbs）案、兰尼特·怀特（Lannett White）案、帕特丽夏·泰米兹（Patricia Tamez）案中，本审查者获得了关于被害人和犯罪行为的较多信息，但也仅仅限于被害人特征、被害人尸体伤口以及在第二现场发现的证据。在这几个案件中，本审查者得不到有关接触被害人的地点、主要现场^①的地点和特征、犯罪人接近被害人的方法、犯罪人袭击的方式以及运送被害人尸体的方法（运送车辆类型、储存尸体的方法……）等相关信息。

犯罪惯技与标记行为的明显差异

现有的物证体现出明显的行为差异，从行为方面分析，这些案件是不同的。不能通过相似但存有差异的犯罪惯技与标记行为将这些案件并案。

所有的被害人都是女性，所有的被害人都大约处于相同的年龄段，而且所有被害人尸体都赤裸地泡在水中。这些相同的特征无疑会让人考虑到犯罪惯技或犯罪人标记。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案件中，行为的差异性远远超

^① 主要现场是犯罪人与被害人发生交互作用最多的地方。在谋杀案件中，通常是犯罪人杀害被害人的地方。

出了行为的相似性。^① 原因如下：

简·赛被谋杀案中，犯罪人用锐器割去了被害人的双乳；在泰米兹被谋杀案中，犯罪人用锐器只割去了被害人的左乳；而在吉布斯和怀特被谋杀案中，犯罪人并没有割被害人的乳房。这些差异，反映了犯罪人兴趣和动机，说明这些案件中犯罪人在行为方面（犯罪惯技或犯罪人标记）的差异很大。

简·赛被谋杀案中，犯罪人疯狂地肢解了被害人的尸体，包括肢解头颅、手足、乳房、会阴部。其他案件并没有肢解这一特征。这说明这起案件对尸体的处理计划比另外三起案件更为诡秘。

简·赛被谋杀案中，尸体可能有一处死前刺伤，而在尸体后背下方区域则有 26 处死后刺伤。在吉布斯和泰米兹案件中，尸体却没有刺伤。在怀特案中，尸体乳房处只有一处刺破伤。这些差异，反映出犯罪人的兴趣和动机，说明这些案件中犯罪人在行为方面的差异很大。

简·赛被谋杀案中，尸体腹部被切开。而其他案件中并没有这一特征。这些差异，反映了犯罪人兴趣和动机，说明在这些案件中犯罪人在行为方面的差异很大。

在吉布斯一案中，被害人面部有大量的伤口。在怀特和泰米兹案中，却没有这样的伤。犯罪人兴趣和动机上的明显差异，反映这些案件中犯罪人在行为方面的差异很大。而在简·赛被谋杀案中，由于被害人头部被割掉，致使不可能对其进行面部伤比较。

在泰米兹一案中，有证据证明犯罪人曾在被害人生前用绳子捆住被害人的手腕和脚踝来控制被害人。在抛尸现场绳子并不在被害人身上，说明这些绳子在将被害人投入水中之前就被拿走了。而在吉布斯和怀特案件中，并没有使用绳子的痕迹。这些差异，反映了犯罪人的控制方法，说明在这些案件中犯罪人在行为方面的差异很大。而在简·赛被谋杀案中，由于被害人手足被砍掉，致使不可能对其进行这种伤害的比较。

^① 我们对已知的行为不能给予足够的强调，因为如前所述，这些案件中的很多行为信息是不知道的（或者不确定的）。缺乏信息本身就足以令审查者难以得出所有的谋杀均为一人所为的结论，因为许多其他差异得不到检验。

原报告中相同点的实质差异

约翰·伽伯诺（John Yarborough）在7月24日的报告中指出，案件之间明显的差异实际上相同。在这份报告的第12页，有一部分的标题是“支持结论的观点概要”。这部分显然在为前几部分提出的观点辩护。他认为，这四起案件都为同一人所为，犯罪人是韦恩·安德姆·福德（Wayne Adam Ford）。下面列出了这些观点，审查者对此进行评论：

“所有的谋杀案都发生在1997年10月到1998年10月之间。有一半的谋杀案发生在一周中的同一天——星期天。这四起案件的间隔时间变得越来越小。”这一观点如果正确的话（实际上是不确定的），对4起案件的并案也是无助的。这个结论只是观察性的，因为很多谋杀案都发生在这个时间段，“发生在一周中的同一时间”这一特征不能将四起案件中的另外两起联系起来。每起案件之间的相隔时间并不存在可证明的差异，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同一犯罪人实施的犯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快。

“所有的被害人都是女性。”虽然这是这些案件中明显的相同点，但却并不是什么独特的特征。

“所有的被害人都是高加索人或者是西班牙人。在2起案件中，有目击者看到有一名高加索男子跟踪着被害人。”这一点却又论证了案件的差异性。被害人并不是同一个种族。关于这位男子的种族，目击者也不是十分确定。而且，没有证据证明这位男子与案件有什么联系。

“所有的被害人都接近25岁。”尽管每位被害人的年龄都是确定的，但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所有的被害人从事的都是高风险的活动。3名被害人都是妓女。最后被人看见的时候，4名被害人有3名在红灯区单独地沿着主要交通干线走（可能是接触地点）。”这也不是仅有一名犯罪人的证据。但这却提示了相反情况的可能性，高风险活动（诸如吸毒和卖淫）实际上扩大了犯罪嫌疑人的范围。

“当尸体被发现时，所有的被害人都是赤裸的。”这是各类犯罪人惯用的抛尸技术，将水池作为抛尸现场，以便消灭或毁坏证据并转移犯罪现场。这并不是什么独特的特征。

“每个抛尸地点都与主要的交通干线（譬如高速公路）相毗邻。在2起案

件中，发现尸体的地方与她们最后被看到的地方之间距离比较远。”与交通要道间隔以说明犯罪人作案方便，但这也不是独特的特征。而且报告显示还有2起案件并非如此。

“每具尸体都有明显外伤。有2具尸体被割去了乳房。有证据证明：4起案件中有3起使用了切割工具。”每具尸体都有外伤并不是并案的依据，因为许多谋杀案的尸体都有外伤（除了将被害人窒息、将被害人淹死、给被害人投毒等之外）。而且其中有2起案件还存在差异，前文已经讨论过了。

“2起案件的死亡原因是可以确定的：勒死。”然而，这2起案件也是不同的。前文已经讨论过了。

“2起案件都有性攻击的证据，另外2起也是由性动机引发的。”然而，这份报告也已经描述了：这2起案件有明显差异。而且是在假定这些案件都是一人所为之后才得出犯罪动机相似的结论。本审查人对这种做法的积极性给予完全的否定。

我声明，就我现有的知识和信仰而言，我前面的陈述是正确的。如果作了伪证，请依照加利福尼亚法律给予处罚。

布伦特·E. 特维 理学硕士

2000年12月